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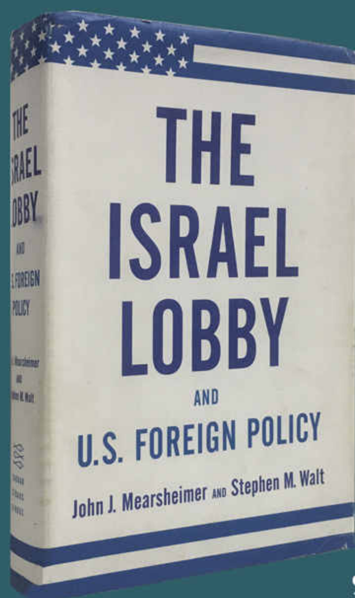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JOHN J. MEARSHEIMER, STEPHEN M. WALT

［美］约翰·J. 米尔斯海默　斯蒂芬·M. 沃尔特 著

王传兴 译

东方编译所译丛



美以之间存在怎样的“特殊关系”？
是物质交易，还是战略考量？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挑战华盛顿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
揭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运作方式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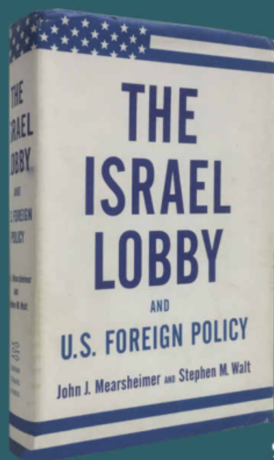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JOHN J. MEARSHEIMER, STEPHEN M. WALT

[美] 约翰·J. 米尔斯海默　斯蒂芬·M. 沃尔特 著

王传兴 译

东方编译所译丛



美以之间存在怎样的“特殊关系”？
是物质交易，还是战略考量？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挑战华盛顿
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
揭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运作方式
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美）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Walt）著；王传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Israel Lobby and U.S.Foreign Policy

ISBN 978-7-208-15752-1

I.①以… II.①约…②斯…③王… III.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以色列 IV.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1482号

责任编辑 王冲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 斯蒂芬·M.沃尔特 著

王传兴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33.75

插　页 4

字　数 528，000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5752-1/D·3385

定 价 98.00元

中文版序言

对于那些不熟悉美国政治制度如何运作的人来说，要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是困难的。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民主国家，因此人们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利得到了保证。美国还拥有一个分权政府——权力由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分享，以及一种运作起来成本高昂的选举制度，在这种选举制度中，个人和组织被允许向政治家和政党进行大量的竞选捐助。

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中，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或“游说集团”自然而然地将在关键议题——其中包括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上对政府施加影响。这种制度也为这些团体提供了众多使其如愿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途径。这些途径包括：它们可以捐助支持自己议程的政治家竞选，直接游说立法人员和行政部门的官员，或者通过对媒体组织施压或撰写推动其特定政策偏好的著述来塑造公众舆论。在美国，这一切活动都是人所共知的合法政治参与形式。

考虑到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质，即便是那些相对较小的团体，如果它们强烈地关注某一特定议题，而其他人对此不是很关心，那么它们也能够对政策过程施加重大的影响。当针对这些规模虽小但却集中关注特定议题的团体的反对力量非常弱小或者并不存在的时候，当这些团体的成员受过良好教育、富有且善于组织、政治上又非常积极的时候，其影响力甚至会进一步得到加强。

本书考察的乃是所谓的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该集团是一个由个人和组织所构成的松散联盟，它们积极地进行着维持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特殊关系”的活动。具体而言，以色列游说集团试图确保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广泛的物质和外交支持，并且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游说集团还试图使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不敢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进行批评，并确保美国在处理中东政策的其他方面时顾及以色列的利益。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华盛顿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之一。然而一直到最近，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部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开谈论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事实上，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在推动这一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在美国是一个禁忌性的话题。即便在“9·11”恐怖袭击为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令人困惑的立场提供进一步的事实之后，情形也是如此。

我们两位作者决心要挑战这一禁忌，而最好的挑战方法就是拿出一份仔细的研究报告，解释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如何运作的，并对它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描述。我们所作努力的最初成果是2006年3月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一篇冗长文章，该文不仅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而且引发了大量的争议。为进一步推动这一讨论和更加完整地陈述我们的观点，我们决定将文章中的观点扩展成一本著作，该书随后在2007年9月出版。从一开始，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鼓励对华盛顿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进行更公开的讨论，并证明美以之间更加正常的关系对两个国家都将更加有益。

我们所作的努力取得成功了吗？虽然美以“特殊关系”的辩护者对我们起初的那篇文章和随后的这本书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对我们俩进行了毫无根据的人身攻击，但是我们还是要就人们对我们所做工作的总体反应表达感激之情。本书上过《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已翻译成17种语言，在20个不同国家以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出版。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关美国的以色列政策、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这些问题，美国的公众话语现已公开多了。新闻记者、学者，甚至某些政治家现在都公开谈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而且当涉及以色列的时候，有关美国中东政策正确路线的真正辩论已经变得更为普遍了。

进而言之，有迹象表明，一方面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可能也在朝我们所建议的方向演变；另一方面美国可能正缓缓地朝一种同以色列更为正常的关系方向前进。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们所表达的希望是，一方面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温和派团体将变得更加活跃和更具影响力；另一方面美以之间“特殊关系”的强硬派辩护者将开始认识到，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害的。

这些情况似乎正在发生。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温和派团体——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和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正变得更加活跃和直言不讳，一个推动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和更平衡的美国中东政策的亲以色列新游说组织——名为J街（J Street）——成立了。虽然这些团体具有强烈的亲以色列倾向，但是它们相信，美国应该趁早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拿出一项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否则就来不及了。虽然奥巴马政府肯定支持它们的观点，但白宫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是否支持奥巴马总统，取决于它们是否支持以色列使西岸地区殖民化的努力，取决于它们对以色列自身同巴勒斯坦人之间达成和平成为不可能而花费的气力持支持的态度。

虽然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未虑及中国，但是我们的分析对未来

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却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维持美以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将使美国陷身于中东，这样美国就不能够集中关注亚洲。事实上，华盛顿在亚洲有时候将不得不求助于中国提供帮助，就像最近在应对朝鲜核问题时所做的那样。美国肯定将向台湾施压让它别惹麻烦，因为美国在如此深地卷入中东之际，是不能够应付在亚洲发生的危机的。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也使得美国同众多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使得美国同伊朗之间更可能爆发一场冲突。这些情形将促进中国赢得朋友的努力，扩大中国在石油丰富的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力。

因此，那些担心美中注定要成为对手的读者应该希望，以色列游说集团继续成功地捍卫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因为这一政策有利于中国。

米尔斯海默

沃尔特

2009年8月1日

前言

在一切的事务当中，不时地对你长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打上一个问号，那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2002年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邀请我们两位作者撰写一篇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特写文章。我们俩有些保留地接受了这一委托，因为我们俩知道，这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而且任何对这一游说集团、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或者对以色列的政策本身进行追根究底细查的文章，都可能激起严厉的反应。然而，我们却感到，人们再也不能够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了，特别是在考虑到“9·11”的恐怖袭击和令人忧虑的伊拉克战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中东的反美主义以及美国与其主要的战略盟友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的话，如果亲以色列的团体和个人是对美国在这一至关重要地区的外交政策的一股主要影响力量的话，那么公开提出这一问题并鼓励对这一游说集团的行动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公开的讨论，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在随后的两年里，我们两位作者时断时续地撰写这篇文章，并且与《大西洋月刊》的编辑们保持紧密的合作协调。2005年1月，遵照先前的合同，在其中几乎加入了编辑们的所有建议，我们将一份手稿寄给了他们。令人吃惊的是，几个星期过后，文章的编辑通知我们说，《大西洋月刊》已决定不采用这篇稿件了，说他对我们打算修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

我们考虑过将这篇文章送交给其他几家刊物，但是得出的一个结论却是，他们不可能采用这篇稿件，原因既在于它的内容，又在于它的长度。我们也曾考虑过将这篇文章扩展为一部专著，但是人们对我们刚开始的研究所作出的反应，不足以使我们有热情说服自己去额外地耗时、耗力做这件事情。因此，我们将文章的手稿搁在了一边，转而去忙其他的项目。虽然如此，这份材料的缩写版，却已纳入了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Walt）所著的《驯服美国权力》（*Taming American Power*）一书当中，该书于2005年由诺顿（W.W.Norton）公司出版。

随后，在2005年10月，有位著名的美国大学教师与我们联系，

并建议我们应考虑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这篇文章。《大西洋月刊》给了这位教师一份这篇被拒文章的复印件，他告诉我们说，《伦敦书评》的编辑玛丽-凯·威尔默斯（Mary-Kay Wilmers）会对这篇文章有兴趣。我们将手稿寄给了她，她很快就表达了发表这篇文章的愿望。经过另一轮的更新修改后，被冠以《以色列游说集团》（The Israel Lobby）的这篇文章，在《伦敦书评》2006年3月23日那一期发表了。由于那些曾阅读过这篇文章较早的草稿、并对之进行过评论的学者们的建议，我们同时将这篇文章的完整版张贴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员工作底稿（Faculty Working Papers）网页上。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伦敦书评》的版式不允许刊出旁征博引的参考内容或注解说明，而我们则要让读者明白，我们的观点是建立在大量广泛的可信资料基础之上的。

文章中提出的论据是直截了当的。在对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程度可观的物质和外交支持进行描述之后，我们认为这种支持并不足以用战略的或道德的理由来加以解释。相反，这种支持基本上是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这是一个由个人和团体组成的松散联盟，其目的是以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式来寻求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政治权力所导致的。除了鼓励美国或多或少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之外，在制定美国的以巴冲突政策、注定要受到惩罚的对伊拉克的入侵、持续地同叙利亚和伊朗保持对峙等问题上，这一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和个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们认为，这些政策既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又对以色列的长远利益造成了伤害。

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十分令人激动。到2006年7月，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网页记录显示，下载这篇工作底稿的次数达到了27.5万次，而且我们收到了翻译或重印《伦敦书评》上这篇文章的无数请求。正如预期的那样，文章一开始的时候引发了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著名团体或个人的猛烈批评，我们两位作者则被“反诽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谴责为反犹分子。《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则用了四篇不同的文章来攻击我们的文章，而且还有许多批评者指责——错误地指责——我们犯了无数的历史事实错误。有几位批评者甚至预言，这篇文章（及其作者）很快就会被世人遗忘——他们认为这是罪有应得。

他们错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读者——既有犹太人，又有非犹太人——出来支持这篇文章。他们并不同意我们文章中的每一个观点，但是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研究考察早就应该进行了。

可以预料，来自美国之外的反应普遍都是赞成嘉许的，甚至以色列本身也有一些正面的回应。《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和《国家》（*Nation*）杂志上纷纷出现了表达尊敬的评价，而且这场论战最终在一系列的新闻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从以色列的《国土报》（*Ha'aretz*），到美国的“全国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著名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在其2006年7/8月的一期上为这篇文章组织了一组专题文章，而《华盛顿邮报星期日杂志》（*Washington Post Sunday Magazine*）则在7月就我们提出的问题出版了一个有思想深度的封面专题。当年的夏末，《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一位评论者，把这篇文章描述为“无懈可击的分析……它可能掀起美国中东政策有益的范式变化”。

在2006年期间，有关以色列和美国中东政策确实在发生变化的对话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对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的讨论也容易一些了。当然，这并非全部是我们的贡献；2006年夏，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那场灾难性的战争、美国在伊拉克灾难性失败的继续、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巴勒斯坦：要和平而非种族隔离》（*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一书出版后受到的人身攻击、美国和伊朗之间火药味十足的战争言辞，以及明显但并不成功的封杀或诽谤其他批评以色列游说集团者的企图，也使得人们增强了对以色列游说集团活动和影响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认识到，这一话题需要宣扬，而且有更多的人愿意大胆地说出来。

同样重要的是，那些有思想见地的人开始承认，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其他强硬派团体——其中包括一些大声叫嚷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Christian Zionists），他们并不代表美国犹太人团体，或者更广泛地说，并不代表美国的主流舆论。有关那些团体所提倡的政策是否符合美国或者以色列利益的辩论变得激烈起来。结果，一些亲以色列的团体开始公开谈论有关均势朝更温和方向变化的需要，而像《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纽约时报》这样的著名出版物则发表评论，认为为了双方的利益，是形成新的美以关系的时候了。

对这样的发展我们感到满意和高兴，因为我们当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促成对这一话题进行更加清醒而开诚布公的讨论。尽管

对话刺耳难听、充满对抗，并且有公然的人身攻击，但是依然在进行。可是我们需要写一部专著吗？或许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而这正是转向其他话题的时候。在进行一些思考之后，尽管有些疑虑依然挥之不去，我们却得出一个结论——撰写一部专著将可以在几个方面有助于促进这场对话。

第一，尽管最初的那篇文章对大多数杂志而言是够长的，但是版面篇幅的限制迫使我们略去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在处理一些话题时比我们希望的更加简略。这种不可避免的长话短说，可能导致读者对原来那篇文章产生一些误解，而撰写一部专著将使我们有机会来向读者呈现我们观点中更加详细周到的内容。

因此，这本书包括了对游说集团更加完整的定义、对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所起作用的进一步讨论，以及对随着时间流逝而演变的以色列游说集团更加全面的叙述。我们也对以色列过去和当前的行为——尤其是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叙述。我们这样做并非出于任何对以色列或者它在美国的支持者的偏见，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热衷于夸大以色列的不当行为。相反，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是因为这一话题对一些道德观点而言是重要的，而这些道德观点被普遍地用来为美国例外地支持这个犹太国家所达到的程度进行辩护。换言之，我们之所以集中关注以色列的行为，是因为美国集中关注对以色列的支持达到了超常的程度。我们也提出了充满争议性的双重效忠问题，而这在最初的那篇文章中并未涉及。

第二，撰写这本书，使我们能够对那些反对我们最初那篇文章的主要批评作出回应。我们在随后给《伦敦书评》以及上面提到的《外交政策》杂志的那组专题文章的两封信中进行了回应，并且逐点对那些针对那篇文章的指控一一进行了驳斥[可登录www.israellobbybook.com，参见《正确记录：对〈以色列游说集团〉一文批评者的回应》一文]。尽管绝大部分反对那篇文章的指责之词是站不住脚的，就像那些对我们的人身攻击一样，但是存在许多富有思想见地的批评，它们提出了进行阐释和加以强调的重要问题。即便在并非完全被说服的时候，我们也从中受益良多，我们试图在此加以提出。

第三，撰写一部专著，使得为我们的核心主张提供经验上的支持，并进行最新的分析成为可能。不仅有关那些重要事件的额外证据逐渐被大家知道了，如伊拉克战争，而且在最初的那篇文章出现时，其他一些事件——最著名的是2006年7、8月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还未发生。美国对那场战争的反应，进一步说明了那一游说集团的力量，以及它对美国和以色列利益的有害影响。以色列游说集团的

活动，也可以从美国对伊朗和叙利亚政策的演变中，从前总统吉米·卡特、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以及其他数位批评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行径的著名人士的严词攻击中看得出来。

第四，本书提供了一个机会，讨论美国应该如何在中东推动自己的利益，以及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应该如何考虑亲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对于美国人和非美国人来说，赌注同样是很高的，因为中东是一个战略上至关重要但却并不稳定的地区，而美国对那一地区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广泛的回响。就像伊拉克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政策被误导，美国能够对自身和他人产生巨大的伤害。这一事实使得认清是什么在驱动美国的政策，并领会到那一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内容，变得更加重要。我们最初的那篇文章并没有给出正面的解决问题之道，但是在本书的结尾一章，则勾画出了美国中东政策的不同方法途径，辨明了应该如何来减小那个游说集团的权力，或使之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方法。尽管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令人鼓舞、进行更加公开讨论的迹象，但是那一游说集团依然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力。自我们当初的那篇文章发表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一地区所面临的难题并未减少；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这些难题是进一步恶化了。伊拉克是一个大失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还陷在冲突之中，哈马斯和法塔赫在为控制巴勒斯坦社会而战，真主党在黎巴嫩的作用是个大麻烦。伊朗正在寻求获得对核燃料循环技术的完全掌握，像基地组织那样的团体依然活跃而危险，而工业世界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依然故我。这些都是非常麻烦的问题。如果美国不能够就我们在那一地区的利益，以及所有那些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包括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一场文明而又礼貌的对话，那么美国就不能够有效地处理任何或者全部难题。为鼓励对话继续进行，我们写出了这一本书。在本书的结束之处，我们表达了对众多亏欠过的人的感谢之情，但我们愿意在此提及其中的一位。在超过25年的岁月里，我们一直有幸享受到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美国最为成就卓然的社会科学家中的一位——的友谊和支持。他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好的行为榜样。萨姆总是处理那些重大的问题，而他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式，是世界其他地方不能够忽视的。在过去的岁月里，虽然我们俩在数不清的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有时候还是激烈而公开的意见相左，而他却从来没有以此来反对我们，而是持之以恒地、通情达理地支持我们的工作。他理解学术研究并不是一种知名度的竞争，他理解对于学术进步和健康的民主来说，勇敢而礼貌的辩论乃是根本。我们对萨姆满怀感激之情，感激他给予我们的友谊，感激他在自己整个的学术生涯中为我们树立的榜样。我们很高兴将此书奉献给他。

约翰·J.米尔斯海默于芝加哥大学

斯蒂芬·M.沃尔特于哈佛大学

致谢

几乎没有哪个人是独自工作的，我们也不例外。对其他人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深怀感激之情，而对他们的帮助致以谢意，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本书的诞生始于《伦敦书评》上的一篇文章，而就像在本书的前言中所叙述的那样，如果不是由于《伦敦书评》的编辑玛丽-凯·威尔默斯的勇气和远见卓识，那篇文章可能不会发表。没有她，这本书是不会存在的。《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莫伊塞斯·奈姆（Moises Naim）在该期刊的2006年7/8月一期上，组织了一次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讨论会。那次辩论使得针对我们那篇文章以及我们俩人本身不理性的攻击的讨论，转向了对这些问题的更严肃考虑，我们赞赏奈姆在处理意见交流中不偏不倚的方式。

我们曾在以下这些场合的陈述发言中，讨论过我们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想法：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的卡姆以塞亚以色列宗教团体、康奈尔大学、外交关系委员会、波士顿的爱默生学院、乔治敦大学、帝国美术展览馆、国家新闻俱乐部、哈佛大学的尼曼资助研究项目，以及米苏拉的蒙大拿大学。这些会议帮助我们进一步提炼了自己的观点，因而我们要对这些讨论的组织者们表示感激：他们是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拉比·阿诺德·沃尔夫（Rabbi Arnold Wolf）、 杰-琼·苏（Jae-Jung Suh）、 奈杰尔·吉布森（Nigel Gibson）、拉尼亚·吉布拉维（Rania Kiblawi）、约翰·亨利（John Henry）、莫哈默德·尼摩尔（Mohamed Nimer）、考利·克罗斯利（Callie Crossley）、 理查德·德雷克（Richard Drake）。我们也要对众多的会议参加者，以及给予我们批评和建议的人表示感激。

以下的这些人对我们手稿的部分或全部进行过有价值的评论：他们是柯克·J.贝蒂（Kirk J.Beattie，）、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约翰·C.格林（John C.Green）、伊恩·鲁斯迪克（Ian Lustick）、斯蒂文·E.米勒（Steven E.Miller）、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杰里米·普雷斯曼（Jeremy Pressman）、威廉·匡特（William Quandt）、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杰罗米·斯莱特（Jerome Slater）、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马丁·沃尔特四世（Martin Walt IV）、萨拉·利娅·惠特森（Sarah Leah Whitson）。我们要特别提到对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的感谢，因为他在近乎创纪录的长时间里，向我们

提供了富有洞见而又非常详细的建议，并且润饰了我们文章中许多粗陋之处。当然，本书中表达的乃是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对任何依然存在的错误承担责任。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芝加哥的瓦伊迪亚娜莎·刚德鲁珀特（Vaidyanatha Gundlupet）和坎布里奇（Cambridge）的保罗·麦克唐纳（Paul MacDonald）两位研究助手的帮助。像往常一样，我们的其他两位研究助手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是哈佛大学的戴维·赖特（David Wright）和芝加哥大学的索维克·德（Souvik De）。戴维·恩德斯（David Enders），尤其是马克斯·弗雷泽（Max Fraser），他们两位细心而快速地对手稿进行了事实的核实，我们感谢他们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在指定的紧迫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的能力。

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代理商比尔·克莱格（Bill Clegg）就是一位精力充沛、富于智慧的支持者；我们非常赞赏他的热情和指导能力。对于他让我们找到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Farrar，Straus and Giroux）来出版此书，我们感到十二万分的高兴。同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一起工作的经历，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对该出版社的出版商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以及出版社其他情绪高昂、具有无穷专业精神的工作人员表示感激。我们的编辑埃里克·钦斯基（Eric Chinski）特别值得赞赏：他的洞察力、他对细微之处的敏感性，以及他那一贯的高标准要求，促使我们写出了一本质量比原本要好得多的书。辛西娅·默尔曼（Cynthia Merman）的编辑校对工作做得棒极了，而吉纳·哈姆肖（Gena Hamshaw）则使这本书的流通工作处理得顺畅和令人高兴。

最后，撰写一本大部头的书，不可避免地要给作者的家人和朋友带来牺牲。我们两人独自是完不成本书写作的；或者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妻子、子女，以及许多很棒的朋友、同事给予我们的爱和支持，我们两人是完不成本书写作的。对于过去一年中我们毫无疑问曾表现出的那些疏离、分心和易怒的时刻，我们表示歉意；我们感谢你们所有人的耐心。我们欠你们一份人情。

- 导言
- 第一部分 美国、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
    - 第一章 最大的赞助者
    - 第二章 以色列：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担？
    - 第三章 越来越站不住脚的道德理由
    - 第四章 何为“以色列游说集团”？
    - 第五章 操纵政策过程
    - 第六章 控制公共话语
- 第二部分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行动
    - 第二部分导论
    - 第七章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巴勒斯坦人
    - 第八章 伊拉克与改造中东之梦
    - 第九章 目标对准叙利亚
    - 第十章 瞄准伊朗
    - 第十一章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第二次黎巴嫩战争
    - 结论 该做什么呢？
- 译者后记

导言

美国即将要进入总统选举年。尽管在此阶段当然不可能预测到选举的结果，但是却很容易预见到竞选的一些特点。在卫生保健、堕胎、同性恋婚姻、税收、教育和移民等各种各样的内政问题上，候选人将不可避免地表现得不同，而且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也肯定会爆发激烈的争论。美国在伊拉克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行动路线？对达尔富尔危机、伊朗的核野心、俄罗斯对北约的敌意，以及中国正在上升的权力，什么样的回应是最恰当的？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如何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如何使自己受损的国际形象回转过来？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上，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期望看到各候选人之间存在鲜明的分歧。

然而在一个话题上，我们同样有足够的信心期望看到那些候选人将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在2008年，正如在其他的选举年一样，为得到国家最高职位的严肃的候选人，将会全力表达自己对一个外国——以色列——深切的个人承诺，以及他们决心维持美国对这个犹太国家的坚定支持。每个候选人都会强调，他或者她完全意识到以色列面临的多种威胁，并清楚表明，如果自己当选的话，美国将继续坚定地承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将捍卫以色列的利益。没有一位候选人会有可能以任何重要的形式对以色列进行批评，或建议美国应在这一地区追求更加平衡的政策。任何这样做的候选人都将可能被甩到一边。

这种观察几乎谈不上是什么大胆的预测，因为那些希冀爬上总统宝座的人，在2007年初已经宣示了自己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一过程始于1月份，当时那四位潜在的候选人在以色列有关安全问题的年度荷兹利亚会议（Herzliya Conference）上发表了讲话。正如乔舒亚·米特尼克（Joshua Mitnick）在《犹太人周报》（*Jewish Week*）上所报道的那样，他们"似乎要竞相看看谁发出的保卫这个犹太国家的声音最高"。经由卫星连线的方式，2004年的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告诉他的以色列听众，"你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并且说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纽带"永远牢不可破"。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说到自己是"在一个我所热爱的、有着我热爱的人民的国家"，并且清楚以色列对可能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的深切关注，宣称"现在是这个世界说出三个真相的时候了：第一，伊朗（可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被阻止；第二，伊朗能够被阻止；第三，伊朗将被阻止"！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宣称："当关乎保卫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的确不能够

妥协。”而佐治亚州的共和党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则告诉听众说：“以色列正面临1967年胜利以来生存（原文如此）的最大危险。”[1]

在此后不久的2月初，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有着巨大权势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当地分支机构发表讲话，她说：“在以色列面临如此巨大困难和危险的此时此刻……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与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要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站在一起。以色列是一座代表正确性的灯塔，而它周围的邻国，则笼罩在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罪恶行径之中。”[2]与希拉里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对手之一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一个月后在芝加哥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听众发表讲话。奥巴马对巴勒斯坦人过去的苦难表达了一些同情之词，并且在2007年3月出席一次竞选活动时简略地提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遭遇”；但是这根本比不上他对以色列的溢美之词，他明白无误地说自己怎么也不会改变美以关系。[3]其他有希望成为总统的人包括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和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他们都以同样或者更高的热情，表达了自己的亲以色列观点。[4]

用什么来解释这样的行为呢？为什么在美国的中东政策明显糟糕透顶的时候，这些有望成为总统的人在有关以色列的问题上分歧如此之少，而他们之间在美国面临的其他每一个重要问题上几乎都存在深刻的分歧呢？为什么当以色列自己的公民经常对其现行政策进行深刻批判的时候，它却可以从美国的总统候选人那里免费搭车呢？而这些候选人对其他国家所做的许多事情，却是那么愿意去进行批评指点。为什么美国那些杰出的政治家对以色列、而非世界上别的哪个国家表现出如此一致地顺从呢？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对于美国来说，以色列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确实，以色列被说成是“反恐战争”不可或缺的伙伴。其他人则可能答复道，对以色列提供无条件的支持有着巨大的道德理由，因为它是在该地区唯一“享有我们共同价值”的一个国家。但是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公平、客观的检测。华盛顿与耶路撒冷的关系，使得击败那些现在将目标对准美国的恐怖分子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困难；这种关系同时削弱了美国及其世界上重要盟友的地位。既然冷战已经结束了，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以色列就已经变成了负资产。然而，却没有哪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打算公开这样说，或者甚至只是提出这种可能性来。

对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不加批判的坚定关系，也不存在引人注目的合乎逻辑的道德理由。对于以色列的生存来说，有强烈的道德理由；而如果以色列的生存受到威胁，美国有足够的理由来承诺给予它帮助。但是，考虑到以色列在被占领土野蛮地对待巴勒斯坦人的行径，道德上的考虑可能需要这样的主张，即美国应追求一种对巴以双方更为平衡的政策，甚至可能要倾向巴勒斯坦人一边。然而，我们却不可能听到任何一位希望成为总统的人，或者想在国会中占有一席地位的人表达这样的观点。

美国的政治家们如此恭敬顺从的原因，在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权力。这一游说集团是一个由个人和组织组成的松散同盟，他们积极活动，以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朝亲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就像我们将要对之进行详细描述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是一场有着中央领导的单一统一运动；它当然也不是一个“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阴谋小集团，或者一个阴谋诡计。它只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而已，成员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其认可的目标是将以色列的理由强塞给美国，以其成员相信将使这个犹太国家受益的方式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构成这一游说集团的各种团体具有推进美以“特殊关系”的共同愿望，但是他们并非在任何问题上都是意见一致的。就像其他族裔的游说集团和利益集团所作的努力一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各种成员的活动，也都是民主政治参与的合法形式；它们绝大部分都与美国利益集团活动的悠久传统相一致。

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已经逐渐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那些竞选高官的候选人都密切关注它的愿望。在美国，组成这一游说集团的个人和团体，深切地关心着以色列，他们不希望美国的政治家对它进行批评，即便在批评可能具有正当理由、可能有利于以色列利益的时候，其反应也是如此。相反，这些团体希望美国把以色列当作自己的第51个州那样对待。民主党人同共和党人一样，都畏惧这一游说集团的权势。他们都明白，任何一个挑战该游说集团政策的政治家，其成为总统的机会都十分渺茫。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的中东政策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权力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影响到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的言辞，而且还因为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在这个不稳定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对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对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只要考虑一下布什政府所进行的拙劣的伊拉克战争，是怎样影响到那个支离破碎的国家的人民遭受长期的苦难即可：

数万人失去生命、数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没有尽头的罪恶的派系战争正在进行。这场战争对美国来说是战略上的灾难，使美国在这一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盟友都感到惊恐不安。当美国随意释放自己的权力时——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念——人们几乎再也想象不出美国力量的展示能够产生比这更加生动或悲剧性的影响。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就一直卷入到中东地区，大量的活动是以教育项目和传教工作为中心。由于受到圣地（the Holy Land）的圣经魅力的强烈激励，以及犹太教在圣地历史上的作用，导致了一些人支持犹太民族恢复在那里的家园的想法。这种观点普遍为某些宗教领袖和政治家欣然接受。但是，将这种适度且多为私人性的涉入该地区的历史，尤其是将美国今天同以色列非比寻常的关系，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该地区所起作用的核心内容是错误的。[5]在200年前北非海盗[6]（the Barbary pirates）线路的存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在该地区的任何地方都曾扮演重要的安全角色，而且美国领导人也不渴望这样的角色。[7]虽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支持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该宣言表达了英国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支持，但是他对于这一目标可谓未进行丝毫的推动。事实上，美国这一时期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卷入，是由巴黎和会于1919年派往该地区的真相调查使团——该使团由美国人亨利·丘吉尔·金（Henry Churchill King）和查尔斯·克兰（Charles Crane）率领。真相调查使团得出的结论认为，当地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不断侵犯，并提出反对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的建议。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人花上一丁点儿精力去注意。”虽然美国短暂地考虑过对中东地区某些部分进行委托管理的可能性，却从未追求这样的目标；英法两国最终在它们两者之间瓜分了奥托曼帝国的相关领土。[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中东安全问题上所起到的作用，其重要性稳步增加，起初为石油利益所驱动，随后为反共因素所驱动，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为自己与以色列不断加深的关系所驱动。美国在该地区安全政治中的第一次重大卷入，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与沙特阿拉伯形成的新伙伴关系，双方的意图是制衡英国在该地区的野心；美国最初的两次正式联盟承诺，是土耳其于1952年被纳入北约，以及1954年签署的反对苏联的《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9]1948年支持以色列建国之后，美国领导人试图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平衡的立场；由于担心威胁到更重要的战略利益，美国领导人小心翼翼地避免对这个犹太国家作出任何正式的承诺。像六日战争、苏联对众多阿拉伯国家进行军售，以及美国国内亲以色列团体

影响力的日益强大，美国对这些事件的回应，使得局面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逐渐地发生了改变。假如美国在这一地区角色的变化很大，那么企图用过去时代的宗教信仰，或者美国过去截然不同的卷入形式来解释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显得毫无意义了。美国与以色列当前的“特殊关系”，根本既不是不可避免的，又不是先天注定的。

自从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来，美国中东政策一个显著而且可以加以证明的特点，就是它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物质和外交支持，其所达到的程度是令其他国家相形见绌的。那种支持基本上都是无条件的：无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如何，美国对其支持的程度大部分都没有改变。具体而言，美国不断支持以色列而非巴勒斯坦人，很少对这个犹太国家施压，以使之停止在西岸地区建立定居点和修筑道路。尽管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两位总统都公开赞成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运用美国的影响力使之成为现实。

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政策，反映出来的也是以色列优先。例如，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伊朗政策严重受到以色列前后各届政府需要的影响。最近几年，德黑兰数度尝试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将那些明显的分歧搁置一旁，但是，以色列及其美国的支持者都能够阻挠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缓和，使这两个国家保持疏远的关系。另一个例子，是2006年夏以色列发动的对黎巴嫩战争期间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严厉批评以色列的轰炸活动——轰炸导致1000多黎巴嫩人丧生，他们中多为平民。但是美国却没有这样做。相反，它却帮助以色列继续进行战争，美国两党的那些著名人物公开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这种对以色列毫不含糊的支持，削弱了贝鲁特的亲美政府，加强了真主党的力量，驱使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而这些结果几乎都是对华盛顿或者耶路撒冷不利的。

许多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追求的政策，现在危害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对以色列不加限制的支持，加上以色列延长对巴勒斯坦人领土的占领，助长了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情绪，从而增加了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也使得华盛顿在应对像停止伊朗核计划那样的其他问题上更加困难。由于美国在这一大中东地区内如此不受欢迎，那些本可能与美国拥有共同目标的阿拉伯领导人因而也不愿意公开帮助我们，这种困境削弱了美国为应对一系列的区域性挑战所作出的努力。

这是美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情形，其产生的原因主要归因于以色

列游说集团的活动。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包括代表古巴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和印度裔美国人的那些族裔的游说集团——尽管他们都设法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偏移，但是没有其他哪一个族裔的游说集团，像以色列游说集团那样使美国的政策偏离得如此之远，以致它与美国原本的国家利益相去甚远。以色列游说集团成功地使许多美国人坚信，美国与以色列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和对美国利益的负面作用，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无意间也伤害到了以色列自身。以以色列的定居点为例，即便像利昂·威泽惕尔（Leon Wieseltier）那样对以色列怀有同情的作家，最近也称那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巨大的道德和战略错误”[10]。如果美国早就利用自己的财政和外交影响力，来劝阻以色列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建立定居点，帮助以色列在那些土地上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家，那么今天以色列的处境将会好得多。然而，华盛顿并没有这样做，主要原因是，对于任何试图这样做的美国总统来说，政治上的代价会很高昂。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美国告知以色列进行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的军事战略将注定要失败的话，而不是反过来支持并推动这一战略，那么以色列的状况就会要比现在好得多。通过使美国政府从难以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批评到不可能对其行为进行批评、迫使以色列改变一些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政策，以色列游说集团甚至可能正危害到这个犹太国家的长远前景。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一贯做法

讨论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存在困难，至少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这样的讨论无不被指责为反犹主义或者被贴上仇恨自己的犹太人标签。而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批评，或者礼貌地质疑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是困难重重。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利用它们的权力，来确保使公共话语与其为了美以“特殊关系”的战略和道德观点相呼应，因此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的慷慨支持，几乎没有受到什么质疑。

对前总统吉米·卡特《巴勒斯坦：要和平而非种族隔离》一书的回应，绝好地说明了这一现象。卡特的这本书是一种个人请求，请求美国恢复介入到和平进程之中，这种请求基本上是基于他过去30年中在这些问题上的大量经验而提出的。理性的人们可以对他的论据进行挑战，或者不同意他的那些结论，但他的最终目标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和平，而且卡特还毫不含糊地为以色列和平安全生存的权利进行了辩

护。然而，由于他认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实施的政策就像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一样，公开说亲以色列的团体使得美国领导人很难为和平而向以色列施压，因而许多这样的相同团体发动了对卡特恶意的诽谤和攻击。卡特不仅被公开指责为一个反犹分子和“仇视犹太者”，有的批评者甚至指控他同情纳粹。[11]由于这个游说集团要维持目前的这种美以关系不受影响，而且因为它的战略观点和道德观点事实上是如此的脆弱，因此它除了企图对严肃的讨论进行压制或使之边缘化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尽管这个游说集团花了这样大的气力，相当多的美国人——几乎40%——承认，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世界各地反美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精英分子当中，这一数字实质上要更高。[12]进而言之，明白这一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但并非总是积极影响的美国人，其人数之多令人吃惊。在2006年10月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民意调查中，39%作出了答复的人说，他们相信“以色列游说集团对国会和布什政府所做的工作，是美国到伊拉克进行战争以及现在正与伊朗对抗的一个主要因素”[13]。在2006年对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的一项调查中，66%作出了答复的人说，他们同意这一观点，即“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太大”[14]。尽管美国人民普遍对以色列怀有同情，但是他们许多人对以色列的具体政策是持批评态度的，如果以色列的行动被认为是违背美国利益的话，他们愿意停止对以色列的援助。

当然，如果对这些事情进行更加公开的讨论，美国公众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对以色列以及它与美国“特殊关系”的态度会更加强硬。然而，人们可能会问，如果公众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和以色列持这样的观点，那么，为什么无论以色列的行为是否有利于美国，美国的政治家们和决策者们却都如此不情愿批评以色列、不情愿给以色列的援助附加条件呢？美国人民当然要求他们的政治家不要完全地支持以色列。从根本上来说，在广大公众如何看待以色列以及它与美国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与华盛顿的精英如何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

这种鸿沟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华盛顿圈内令人畏惧的声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它不仅对民主、共和两党当政的政府施加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国会山上甚至更有权势。[15]新闻记者迈克尔·马辛（Michael Massing）报道说，有位对以色列怀有同情的国会工作人员告诉他，“我们可以统计到超过一半的众议院议员——250到300人，反过来会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要他们做的任何事情”。与此类似，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前官员斯蒂文·罗森

（Steven Rosen）——他曾被控涉嫌将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送给以色列——曾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权力：他把一块餐巾放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面前时说："在24个小时里，我们就能够有70名参议员在上面签名。"[16]这些并非虚妄之辞。就像即将清楚显示的那样，当有关以色列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国会几乎总是支持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立场，而且通常是占绝对多数。

为什么谈论以色列游说集团如此困难？

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的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得到保障，利益集团将逐渐支配美国的政治进程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一个移民国家来说，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有些利益集团按照种族的界限来形成，试图以各种方式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17]古巴裔美国人曾游说维持对卡斯特罗政权的禁运，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曾推动华盛顿承认1915年土耳其的种族灭绝罪行，以及最近限制美国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关系，而印度裔美国人则集会支持美印之间最近的安全条约和核合作协议。自从建国以来，这样的活动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指出这些几乎不会引起什么争论。[18]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美国人公开谈论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十分困难。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一游说集团本身——它既热衷于大肆宣传自己的权势，又急忙挑战任何认为其影响力太大以至于可能伤害美国利益的人。然而，在更难对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力进行坦诚讨论的问题上，还存在其他原因。

首先，质疑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做法及其后果，对有些人来说，似乎就是等同于质疑以色列本身的合法性。由于仍然有一些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一些对以色列及以色列游说集团持批评意见的人确实质疑以色列的合法性，因此许多以色列的支持者可能把善意的批评也看作对以色列生存的隐性挑战。由于许多人对以色列怀有强烈的情感，尤其是它作为从大屠杀中逃离出来的犹太人的安全避难所，以及作为当代犹太人身份中心焦点的作用和角色，因此当人们认为它的合法性或生存受到攻击的时候，就注定会有满怀敌意的防卫性反应。

但事实上，对以色列政策及其美国支持者所作努力的审查，不意味着就是反以色列的偏见，就像对美国退休人员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政治活动的审查不意味着就是反老年人的偏见一样。我们并不是在挑战以色列生存的权利或者在质疑这个犹太国家的合法性。有人坚持认为本不应该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希望看到以色列从一个犹太国家转变成为一个由两个民族

组成的民主国家。我们却不持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以色列人民的历史，以及民族自决的准则，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提供了足够充分的正当性。我们认为当以色列的生存受到威胁时，美国的立场应该是愿意向以色列提供援助。而我们的基本关注虽然是集中在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消极影响作用，但我们也确信，这种影响也已经对以色列有害了。就我们的观点而言，这两种影响都是糟糕的。

此外，那种观点即一个其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的利益集团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且不说消极的影响，肯定会使得一些美国人感到非常不快，甚至有可能是恐惧和愤怒，因为那听起来就像是摘自臭名昭著的《犹太长老秘密会议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这份众所周知的被杜撰出来的反犹的东西，声称要揭露一个无所不能的犹太人阴谋集团正实施一项控制全世界的秘密计划——中的指控。

任何对犹太人权力的讨论，都是在两千年的历史阴影，尤其是近几个世纪欧洲真切的反犹历史阴影之中进行。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基督教徒屠杀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在1290年至1497年期间，将他们全体驱赶出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地方，而且在欧洲其他地方将他们限定在隔离区居住。犹太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受到粗暴的压迫，在东欧和俄罗斯发生了无数次残酷谋杀犹太人的事件，而且其他执迷不悟的反犹活动直到最近都很普遍。纳粹的大屠杀使这一可耻的记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近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犹太人在部分阿拉伯世界也遭受压迫，但其情形远不及如此的严重。[19]

由于这种长期遭受迫害的历史，因此可以理解，美国犹太人对任何指责他们为错误政策负责的观点都很敏感。这种敏感度因为对《犹太长老秘密会议纪要》中所展现的那类荒诞不经的阴谋理论的记忆而得到了加强。诡秘的“犹太人影响力”依然是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端分子——例如兜售仇恨的前三K党（Ku Klux Klan）首领戴维·杜克（David Duke）——耸人听闻警告的主要内容，而这一切甚至更加强化了犹太人的担心和忧虑。

这些反犹主义的指责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即认为犹太人通过“控制”银行、媒体和其他主要机构，来发挥自己不合法的影响力。因此，如果有人说美国的新闻报道更偏向以色列而非其敌手，那么这让人听起来就像是那个“犹太人控制媒体”的谣言。类似地，如果有人指出美国犹太人的一个丰富传统，就是向慈善事业和政治事业捐赠，那么它听起来就像是在主张，“犹太人的金钱”正在以一种秘密卑劣或阴谋诡计的方式，在购买政治影响力。当然，任何给政治竞选捐赠的人

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都是要推进某一政治事业，而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希望塑造公众舆论，对有利于己的媒体报道有兴趣。对任何利益集团竞选资金捐赠的作用、游说效果，以及其他的政治活动进行评估，应该并非一件引起争议的事情，但由于反犹主义的缘故，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讨论药业游说集团、工会、武器商、印度裔美国人团体，等等之类的影响力，相对于讨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而言，要更加容易。

对由来已久的“双重忠诚”的指责，使得对在美国的亲以色列团体和个人进行讨论变得更加困难。根据这一由来已久的谣传，流散在外的犹太人永远是他乡的异客，他们决不可能被同化或者成为优秀的爱国者，因为他们相互之间的忠诚要胜过对自己所居留国家的忠诚。如今的担忧是那些支持以色列的犹太人将被看作不忠诚的美国人。就像前华盛顿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代表海曼·布克班德（Hyman Bookbinder）曾经评论过的那样，“犹太人对那种”有关他们支持以色列的做法中“存在着某些不爱国的东西的看法，作出了本能的反应”[20]。

我们还是清清楚楚地表明自己的主张吧：我们绝对拒绝所有这一切反犹主义的主张。

在我们看来，对任何一个美国人来说，与外国有着重要联系是完全合法的。事实上，美国人允许持有双重国籍并在外国军队中服役，当然，另一个正与美国交战的国家除外。就像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在美国有无数族裔团体卖力地劝说美国政府以及他们的同胞，来支持那个与之存在强大联结的外国的例子。外国政府通常对那些以族裔为基础、对己怀有同情的利益集团的活动心知肚明；外国政府自然试图利用这些团体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推进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就这一点而言，犹太裔美国人与他们的美国同胞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21]

以色列游说集团不是一个阴谋集团、诡计集团，或者诸如此类的集团。它涉及良好的老式利益集团政治，其美国特性就像苹果派一样。美国亲以色列的团体所涉及的业务，就像其他的利益集团——如美国枪支协会（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或者像美国石油研究所（the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那样的专业协会所涉及的业务一样，都是要使尽浑身解数来影响国会的立法或者总统的政策优先顺序，而且大部分是公开进行的。除了在随后的篇章中将要讨论的少数例外，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行为完全是美国式的，完全是合法的。

我们不相信以色列游说集团是无所不能的，或者说它控制了美国的重要机构。就像在随后的几章中所要讨论到的那样，有大量的例子表明以色列游说集团并未能够做到如其所愿。然而，有大量充分的证据表明，以色列游说集团发挥的影响力令人印象至深。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亲以色列的最重要团体之一，它过去常常在其网站上吹嘘自己的权力。吹嘘的方式不仅包括在网站上列举它所取得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而且还展示那些著名政治家的原话，以证实它影响那些事件朝有利于以色列方向发展的能力。例如，它的网站曾发布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的一则声明，他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次集会上说："如果没有你们的不断支持……以及你们日复一日地来加强（美以关系），就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22]甚至连哈佛大学直言不讳的法学教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他经常急不可耐地给批评以色列的人贴上反犹分子的标签——也在一部回忆录中写道："我这一代犹太人……成为了在民主历史上或许是最有效的游说和资金募集努力的一部分。我们真的是做得很出色，我们做到了我们能够做到，并且被允许做到的极致。"[23]

犹太周报《前沿》（*Forward*）编辑、《犹太人的权力：深入美国犹太人核心集团内部》一书的作者J.J.戈德堡（J.J.Goldberg），很好地表达出了谈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困难之处，"就好像我们被迫得在犹太人掌握着巨大而致命的控制力，或者犹太人的影响力根本就不存在之间作出选择"。事实上，他指出："现实情况是介于两者之间，但却没有一个人讨论这一点，即存在着一个由一群组织和公共人物组成的实体，它被称为犹太人社会，只是乱哄哄的政治的一部分。"[24]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我们认为，对这种"乱哄哄的"利益集团政治对美国及整个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进行考察，既是公平的，又确实是有必要的。

如何证明我们的观点？

为了证明我们的观点，必须完成三项任务。具体而言，我们必须使读者相信，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物质援助和外交支持异乎寻常得多，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则是提供那一支持的主要原因，但这一无任何条件、不受批评的关系，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以下面的方式展开。

通过对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在和平时期与战时华盛顿对以色列的外交支持的描述，第一章直接提出了上述的第一个问题。接下来的数章中也讨论到美国中东政策的不同因素，这些

有意设计出的政策因素或是全部、或是部分对以色列，而不是它的那些对手有利。

在第二章，我们要对为人所熟知的一个观点——即由于以色列是宝贵的战略资产，因此它值得这样大力支持——进行考察。我们要揭示的是，尽管在冷战时期以色列可能曾是一项战略资产，但是现在却越来越成为一个战略负担。强烈地支持以色列使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雪上加霜，而且使得美国在对付所面临的其他中东地区问题时更加困难。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也使得美国与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从而给美国添加了额外的成本。然而，尽管对以色列支持的利益和成本已经此消彼长，美国的支持却在继续增加。这种情形说明，某种并非战略动机的东西在起作用。

第三章（“越来越站不住脚的道德理由”）考察的是，以色列人及其美国支持者经常用来解释美国支持这个犹太国家的道德理论。具体而言，我们要考虑这样一种主张，即美国支持以色列是因为它们共有的“民主价值”，是因为以色列代表的是一个面对强大的阿拉伯的歌利亚（Goliath）时体力虚弱、易受攻击的大卫[25]，是因为它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要比它的那些敌手更加道德，或者说是因为它总是寻求和平，而它的邻居则总是选择战争。进行这样的评估，不是因为我们对以色列怀有敌意，或者说因为我们认为它的所作所为比别的国家更恶劣，而是因为这些从根本上来说的道德主张，是如此频繁地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应该给予以色列格外的援助。我们的结论是，以色列的生存固然有很强的道德理由，可给予它如此慷慨而且几乎是无条件支持的道德理由并不引人注目。这种越来越站不住脚的道德理由与美国不断增加的支持，再次显示必定有别的什么东西在起作用。

既然已经确认战略利益和道德理论都不足以解释对以色列的支持，我们就将注意力转到“别的什么东西”上。第四章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不同组成部分进行辨析，以及对这一松散的联盟如何演变进行描述。我们强调它不是一场单一的统一运动，组成它的不同部分在某些问题上有时意见不一，而且它既有犹太人，又有非犹太人——包括所谓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也揭示了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一些最重要组织，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向右漂移的，且越来越不能代表他们经常声称所代表的那些更多人的利益。

阿拉伯-美国团体，即所谓的石油游说集团，或者说富裕的阿拉伯石油商是否既是抗衡以色列游说集团的重要力量，又是美国中东政策背后的实际推动力，这也是本章考虑的内容。例如，许多人似乎相信，入侵伊拉克主要是为了石油，而石油公司的利益则是美国决定进攻伊拉克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情形并非如此：尽管获取石油显而易见

是美国的重要利益，但是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沙特王室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发挥的影响力远不及以色列游说集团。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我们对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团体所采用的不同战略——目的是为了促进以色列在美国的利益——进行了描述。除了在国会山进行直接游说外，以色列游说集团主要是通过它引导竞选资金捐助流向的能力，来对政治家们进行奖惩。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组织，也通过大量的机构来向行政部门施压，其中包括通过对其观点持同情态度的政府官员来做工作。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对媒体和学术界施压，以及通过在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思想库中确立自己的存在，以色列游说集团已经相当程度地塑造了有关以色列的公共话语。塑造公众认知的那些努力通常包括以反犹主义来指控那些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人，这是一种为使任何对目前的美以关系进行挑战的人失去信誉和边缘化而设计的战术。

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后，第二部分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制定美国最近的中东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勾勒。应该强调的是，我们的观点并不是说，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影响美国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决策的唯一因素。因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它不会在每一问题上都现身。以总是有利于以色列——并且也被认为对美国有利——的方式，以色列游说集团非常有效地塑造了美国对以色列及其周边地区的政策。不幸的是，它成功鼓励的这些政策实际上却对美国非常有害，对以色列而言也是如此。

在简要地介绍了本书的基础性工作之后，第七章揭示的是美国如何一以贯之地压制或限制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渴望。即使当美国的总统们向以色列施压，或者试图使美国同以色列的政策保持距离的时候，就像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之后曾经数度尝试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也会介入进来并使之回到原路上。结果是美国的形象不断恶化，继续在以巴之间的对立中两面受气，以及巴勒斯坦人内部的不断激进化。这些发展趋势没有一个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在第八章中，我们要揭示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特别是其中的新保守派——如何成为布什政府2003年决定入侵伊拉克背后的主要动力。我们强调指出，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引发了这场战争。9月11日的攻击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发动这场战争。以色列游说集团是这场战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这场战争却是美国的战略灾难，是以色列最严重的地区对手伊朗的天赐良机。

第九章对美国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困难关系进行了描述。我们用文件证明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如何推动华盛顿采取与叙利亚的对抗性政策的，包括有时候政权更迭的威胁，而这样做正是以色列政府所希望的。如果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关键团体没有那样大的影响力的话，尽管美国与叙利亚成不了盟友，但是美国将会采取远不是那么具有对抗性的方法，甚至可能以大量有限而有益的方式同叙利亚进行合作。事实上，如果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存在，以叙之间可能已经签署了和平条约，大马士革可能也不会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而这对华盛顿和耶路撒冷来说都将是一桩好事。

在第十章中，我们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对伊朗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勾勒。自从1979年推翻伊朗国王的革命以来，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处于困境；而由于伊朗的核野心和对像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团体的支持，以色列已逐渐将伊朗看作自己最严重的对手。因此，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已经反复推动美国紧抓伊朗不放，并采取行动抵制了先前的数次缓和机会。很不幸，结果是伊朗的核野心进一步增加，和更加极端的分子上台掌权，如伊朗现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从而使得本来困难的局面更加糟糕。

黎巴嫩是第十一章的主题，模式几乎是一样的。我们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2006年夏季并未被证明的挑衅所作出的反应，在战略上既是愚蠢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然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使得美国官员除了强烈地支持以色列之外，作出任何其他选择都很困难。这提供了另外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和以色列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影响力：通过使美国的决策者的立场很难后撤和使美国很难给以色列的对手诚实而关键的建议，以色列游说集团促进的是一项进一步有损美国形象、削弱贝鲁特的黎巴嫩国内民选政权并强化黎巴嫩真主党的政策。

最后一章要探究的内容是，这样一种不幸的局面可能应该怎么样进行改进。我们一开始是对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进行识别鉴定，然后再概略地叙述我们加以命名的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ing）战略的核心原则，这一战略能够更有效地捍卫美国的这些利益。我们并不要求放弃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事实上，如果以色列的生存受到任何威胁，我们都明白无误地支持对以色列进行援助。但是我们认为，美国是时候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对待以色列了，美国是时候以以色列结束占领和愿意使其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的条件来对它进行援助了。完成这一转变，就要求提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政治权力及其现行政策议程的问题。为了使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更符合美国也

更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我们提出了几项如何修正其权力的建议。

那些使我们得到教益的人们

没有哪位作者会是一座孤岛，而我们也要感谢先于我们考察这一主题的那些学者和作家。首先要说的是，存在着大量有关利益集团的学术文献，这些文献使我们懂得了，那些规模虽小但却集中精力的运动，是如何施加远比其在美国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人的影响力。[26]其次也存在着有关族裔团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坚实文献，而这也证明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独特性，不是由于它的那些基本活动，而是由于它的影响力所达到的非比寻常的程度。[27]

第二类是研究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的文献。许多新闻记者、学者和前政治家都写到过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些作品的出发点既有批评性的，也有持同情态度的，其中包含大量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如何运作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有用信息。我们希望，我们的描述将沿着早先那些作家开辟的道路并有所拓展。[28]

我们也从那些难以一一列举的其他研究中受益良多，有些是针对美国中东政策某些具体方面的研究，有些是美伊关系的研究，或者具体政策议题的研究。尽管其中有些作品——如史蒂文·施皮格尔（Steven Spiegel）的《另一种阿以冲突：从杜鲁门到里根的美国中东政策制定》和沃伦·巴斯（Warren Bass）的《是朋友就支持：肯尼迪的中东以及美以同盟的形成》——有意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不予重视，但是这些严肃的学术作品中，却包含了大量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特别是它那不断增加的权势的证据。[29]

存在的最后一类文献，是那些帮助我们想到以色列、以色列游说集团以及美国与这个犹太国家之间关系的文献，它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参照了过去20年中从以色列冒出的所谓的新历史。通过广泛地使用档案文献研究，像施罗姆·本-阿米（Shlomo Ben-Ami）、塞姆哈·弗拉番（Simha Flapan）、布拉什·基墨林（Baruch Kimmerling）、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伊兰·佩普（Ilan Pappe）、汤姆·塞戈夫（Tom Segev）、阿维·施莱姆（Avi Shlaim）、泽夫·斯特恩赫尔（Zeev Sternhell）这样的以色列学者，实际上推翻了有关以色列国家成立，以及它对周边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的传统学识。[30]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们也对纠正历史记录作出了贡献。[31]这些人一道破除了原先那个高度浪漫化的以色列建国版本，在该版本中，犹太人通常被描绘成好人，而阿拉伯人则通常被描绘成坏人。进而言之，这些作品清楚地表明，在以色列获得独立之后，它对巴勒斯坦人及其他阿拉伯人的所作所为，比普遍认为的要更

具侵略性。

当然，在这些历史学家之间存在各种争议，而且不是他们的每个观点我们都同意。然而，他们集体讲述的这个故事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叙述兴趣的问题。事实上，对于人们如何考虑支持以色列而非巴勒斯坦人的道德理论，这个故事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有助于使人明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对美国如此无条件地慷慨支持以色列深感愤怒。

有关资料来源的说明

在按次序继续往下写之前，简要地说说有关资料来源的问题。本书研究的内容——特别是第二部分——都是最近的历史，或者说是那些其最终结果还不确定的事件。由于学者们不能够常规地得到有关当代事件的官方文件，因此我们被迫依赖其他的资料来源：包括报纸、杂志、学术文章、著作、人权组织报告、电台电视台抄本，以及我们进行的个人访谈。在少数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以那些对事件明白无误的零星记录来进行写作。虽然我们认为不太可能，但是一旦官方记录可以得到的话，我们这部作品的某些部分可能会与之存在出入。

为了确保我们的各种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几乎对每一个重要观点都用多种资料来源加以支撑，这就是为什么在本书的结尾处提供了那么多注解的原因。我们大量依赖像《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以及以色列学者这样的以色列资料来源。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是，像《前沿》和《犹太人周报》这样的美国犹太人出版物。这些以色列和美国裔犹太人的资料来源中不仅充满了重要的信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找不到这些信息，而且这些报纸基本上不可能对我们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观点持同情的态度。我们对这些资料来源的依赖，应该使得我们的结论更加可靠。

结论

我们的分析始于描述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物质与外交支持。美国提供给这个犹太国家可观支持的这一事实，尽管很少见诸报纸的头条，但是，如果读者知道这种慷慨施与的实际范围和种类有多么的广泛和多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有怎样的吃惊！下面一章的内容，是用文件来证明这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

[1] Joshua Mitnick，“Iran Threat Steals Show at Herzliya，” *Jewish Week*， January 26， 2007.也可参见Ron Kampeas，“As Candidates Enter 2008 Race， They Begin Courting Jewish Support，” *JTA.org*， January 25， 2007； Ron Kampeas，“AIPAC Conference—The First Primary？” *JTA.org*， March 6， 2007； Joshua Mitnick，“Candidates Court Israel， Cite Iran Risks，” *Washington Times*， January 24， 2007，以及

M.J.Rosenberg，“Pandering Not Required，”Weekly Opinion Column，Issue #310，Israel Policy Forum，Washington，DC，February 9，2007。爱德华兹、金里奇、麦凯恩和罗姆尼的发言副本，登录www.herzliyaconference.org/Eng/_Articles/Article.asp？CategoryID＝226&ArticleID＝1599。

[2] “Senator Clinton's Remarks to 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February，2007，登录http：//clinton.senate.gov/news/statements/details.cfm？id＝268474，参见Joshua Frank，“Hillary Clinton and the Israel Lobby，”*Antiwar.com*，January 23，2007，以及 E.J.Kessler，“Hillary the Favorite in Race for Jewish Donations，”*Forward*，January 26，2007。

[3] Thomas Beaumont，“Up-Close Obama Urges Compassion in Mideast，”*Des Moines Register*（online），March 12，2007；James D.Besser，“Obama Set for Big Jewish Push，”*Jewish Week*，February 16，2007；Larry Cohler-Esses，“Obama Pivots Away from Dovish Past，”*Jewish Week*，March 9，2007，以及Lynn Sweet，“Obama to Offer Pro-Israel Views at Chicago Gathering，”*Chicago Sun-Times*，March 1，2007。

[4] 对于麦凯恩、克林顿、奥巴马、罗姆尼、理查森和布朗巴克的亲以色列声明，参见“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Israel-US Ties，”*Jerusalem Post*，May 24，2007。

[5] 以色列裔美国作家迈克尔·B.奥伦（Michael B.Oren）在他有趣的通俗历史作品《权力、信仰和幻想：1776年至今的美国在中东》（*Power，Faith，and Fantasy：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1776 to the Present*）（New York：Norton，2007）一书中，对较早时期美国参与该地区的事务有许多生动的描述。他所持的没有明言的观点——他在公共演说中明示了这一观点——认为，美国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很长的时间里，就已经参与到中东地区的事务之中；因此，目前美国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支持，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含有这种意思的典型公开声明，可参见奥伦向2007年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政策会议所发表的演说。在该演说中，奥伦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本身描述为“一种对几乎长达400年之久的传统的表达；在这一传统中，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想法与一个被重建起来的犹太国家的想法，两者几乎是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的。这一传统是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同样久远的坚定信念——即对这个犹太国的信念等同于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信念——的体现”。对于1776年以来美国在中东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多么大的变化，特别是自从1948年和1967年以来的变化，这种奇怪的观点却视而不见。关于奥伦演说的副本，登录www.aipac.org/Publications/Oren-PC-2007.pdf。

[6] 北非海盗是指19世纪初在北非海岸攻击美国船只的一群好战者。他们来自好几个非洲国家。这些国家与美国签订过不攻击美国船只的条约，可是他们后来违约了。美国还以武力，取得了大胜。——译者注

[7] 如同历史学家彼得·L.哈恩（Peter L.Hahn）所写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官方对中东几乎不感兴趣。虽然欧洲的诸帝国曾长期卷入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对中东（以及南亚）进行支配的外交对抗问题，但是华盛顿的政府却没有在该地区发现自己的战略利益或政治利益，因而避免在那里被卷入到帝国的对抗之中。”参见*Crisis and Crossf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Washington，DC：Potomac Books，2005），1。

[8] 麦克米伦也曾写过有关对巴勒斯坦进行处置的文章，“The United States，in Contrast to What Happen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Played a Minor Role”，参见*Paris 1919：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New York：Random House，2001），pp.422—423。

[9] 有关沙特阿拉伯-美国安全合作的根源，参见Nadav Safran，*Saudi Arabia：The Ceaseless Quest for Securi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60—68，以及Rachel Bronson，*Thicker than Oil：America's Uneasy Partnership with Saudi Arab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s.1—2。关于《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参见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p.58—59。

[10] 威泽愓尔的这番评论，出现在对巴勒斯坦知识分子萨利·努赛贝赫（Sari Nusseibeh）的回忆录书评之中。参见“Sympathy for the Other，”*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April 1，2007，13。

[11] 这一指控是基于卡特曾经在1987年收到的一封信上所写的一纸短笺，这封信是来自一位前纳粹监狱看守的女儿，她是为了保护她的父亲免受驱逐而写了这封信。在这张只有一句话长的便条中，卡特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位前纳粹监狱看守的任何同情，并且也没有以他的名义建议采取任何行动，他仅仅只是说希望特别调查局（负责起诉纳粹时代战犯的美国机构）能够“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对那些受到影响的家庭进行特别考虑”。但是，这件事情却被用来诋毁卡特，说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情纳粹主义。参见Daniel Freedman，“President Carter Interceded on Behalf of Former Nazi Guard，”*New York Sun*，January 19，2007。

[12] Jodie T.Allen and Alec Tyson，“The U.S.Public's Pro-Israel History，”Pew Research Center，July 19，2006，以及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2005：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ttitudes of American Opinion Leader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about International Affairs，”November 2005，pp.11—12。

[13] 这一民意调查是由左格比国际公司代表国家利益委员会于2006年10月10日至12日进行的。结果可登录www.cnionline.org/learn/polls/czandlobby/index2.htm。

[14] Daniel Maliniak et al.，“Inside the Ivory Tower，”*Foreign Policy*159（March—April 2007）：66.

[15] 这就是为什么奥萨马·本·拉登最初想要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国会大厦的原因。他把国会山看作美国支

持以色列的主要堡垒。参见“Outline of the 9/11 Plot，” Staff Statement no.16，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June 16， 2004， 4。

[16] Michael Massing， “The Storm over the Israel Lobb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8， 2006，以及Jeffrey Goldberg， “Real Insiders，” *New Yorker*， July 4， 2005。

[17] 纳达夫·萨夫兰（Nadav Safran）在他关于美以同盟的书中指出：“犹太人并不是最早在美国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族裔或宗教团体，以便有利于其亲族或同他们持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就像利益集团政治一样，族裔宗教政治已成为美国生活中多元主义和利益多元性不可避免的后果。”参见*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76。

[18] 在大量的文献中，有益的作品包括Tony Smith， *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thnic Groups and U.S.Foreign Policy*， ed.M.E.Ahrari（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7）； *Ethnicity and U.S.Foreign Policy*， 2nd ed.， ed.A.A.Said（New York： Praeger， 1981）； Charles McC.Mathias Jr.， “Ethnic Groups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59， no.5（Summer 1981）； Alexander DeConde， *Ethnicity*， *Ra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2）； Yossi Shain， “Ethnic Diasporas and U.S.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09， no.5（1994—1995）； Paul Watanabe， *Ethnic Groups*， *Congres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Politics of the Turkish Arms Embargo*（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4）； Patrick J.Haney and Walt Vanderbush， “The Role of Ethnic Interest Groups in U.S.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the Cuban-American National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43， no.2（June 1999）； Max J.Castro， “Miami Vise，” *Nation*， May 14， 2007； Gabriel Sheffer， *Diaspora Politics*： *At Home Abroa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vid King and Miles Pomper， “Congress and the Contingent Influence of Diaspora Lobbies： Lessons from U.S.Foreign Policy Toward Azerbaijan and Armenia，” *Journal of Armenian Studies*8， no.1（Summer 2004），以及R.Hrair Dekmejian and Angelos Themelis， “Ethnic Lobbies in U.S.Foreign Polic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Jewish， Greek， Armenian and Turkish Lobbies，” Occasional Research Paper no.13，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nteion Universi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Athens， Greece， October 1997。

[19] 关于反犹主义的历史，参见James Carroll， *Constantine's Sword*： *The Church and the Jews*； *A History*（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Edward H.Flannery， *The Anguish of the Jews*： *Twenty-Three Centuries of Antisemitism*， 2nd rev.ed.（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04）； Israel Pocket Library， *Anti-Semitism*（Jerusalem： Keter， 1974）； and Marvin Perry and Frederick Schweitzer， *Anti-Semitism*： *Myth and Hat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关于阿拉伯世界中犹太人的地位和待遇问题，参见Bernard Lewis， *Semites and Anti-Semites*： *An Inquiry into Conflict and Prejudice*（New York： Norton， 1986）， chap.5，以及Charles D.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A History with Documents*， 5th ed。（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2004）， p.8， pp.10—11。

[20] 引自*The Middle East*， 5th ed.（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81）， p.68。

[21] 就像一个印度官方的政府委员会在2002年所指出的那样：“从1998年的核试验到（1999年5月26日印巴在克什米尔发生）卡吉尔（Kargil）冲突，印度裔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成功的动员，对在（美国）国会形成一种有利于印度的舆论氛围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且对他们所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游说……这是印度第一次在美国拥有了一个真正有影响力和有地位的选民群体。美国的印度人社会构成了加强印度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之间纽带的宝贵资产。”参见*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Committee on the Indian Diaspora*（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January 2002）， pp.xx—xxi。

[22] 除了格普哈特的声明以外，本文引用的有关比尔·克林顿、纽特·金里奇，以及其他几位著名人物就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影响力所发表的声明，先前可登录www.aipac.org/documents/whoweare.html#say（2005年1月14日可进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似乎已从其目前的网站版本中删除了这些声明。

[23] Alan M.Dershowitz， *Chutzpah*（Boston： Little， Brown， 1991）， p.16.

[24] 引自Samuel G.Freedman， “Don't Blame Jews for This War，” *USA Today*， April 2， 2003。

[25] 在《旧约全书》中，歌利亚是非利士人与未来的以色列王大卫进行战斗的著名勇士。——译者注

[26] 关于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参见Frank R.Baumgartner and Beth L.Leech， *Basic Interests*： *The Importance of Groups in Politics and in Political Scien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Richard L.Hall and Frank W.Wayman， “Buying Time： Moneyed Interest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Bias in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4， no.3（September 1990）； Richard L.Hall and Alan V.Deardorff， “Lobbying as Legislative Subsi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0， no.1（February 2006）； John Mark Hansen， *Gaining Access*： *Congress and the Farm Lobby*， *1919—1981*（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Ken Kollman， *Outside Lobbying*： *Public Opinion and Interest Group Strategi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Richard A.Smith， “Interest Group Influence in the U.S.Congres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20， no.1（February 1995）； Raymond A.Bauer， Ithiel de Sola Pool， and Lewis Anthony Dexter， *American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Trade*（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3）； David B.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New York： Knopf， 1951），以及James Q.Wils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27] 参见注释17。

[28] George W.Ball and Douglas B.Ball， *The Passionate Attachment*： *America's Involvement with Israel*， *1947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orton， 1992）； Mitchell G.Bard， *The Water's Edge and Beyond*： *Defining the Limits to Domestic Influence on U.S.Middle East Policy* （New York： Transaction Books， 1991）； Paul Findley， *They Dare to Speak Out*：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Confront Israel's Lobby* （Westport， CT： Lawrence Hill， 1985）； J.J.Goldberg， *Jewish Power*： *Inside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New York： Perseus Books， 1996）； Anatol Lieven， *America Right or Wrong*： *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6； Michael Lind， "The Israel Lobby，" *Prospect*73（April 2002）； Massing， "Storm over the Israel Lobby"； Michael Massing， "The Israel Lobby，" *Nation*， June 10， 2002； Michael Massing， "Deal Breakers，" *American Prospect*， March 11， 2002； Edward Tivnan， *The Lobby*： *Jewish Political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以及James Petras， *The Power of Israel in the United States* （Atlanta， GA： Clarity Press， 2006）。虽然我们并不同意这些作品中的每个主张，但是每部作品中都包含了有关美以关系的有益信息。

[29] Steven L.Spiegel， *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Making America's Middle East Policy from Truman to Reag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以及Warren Bass， *Support Any Friend*： *Kennedy's Middle East and the Making of the U.S.-Israeli Alli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其他有益的作品包括Abraham Ben-Zvi，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Limits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Abraham Ben-Zvi， *Decade of Transition*： *Eisenhower*， *Kenned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Israeli Relatio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eter L.Hahn， *Caught in the Middle East*： *U.S.Policy Towar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45—1961*（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William B.Quandt， *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3rd ed.（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David Schoenba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以及Peter Grose， *Israel in the Mind of America* （New York： Knopf， 1983）。

[30] 相关的作品有Shlomo Ben-Ami， *Scars of War*， *Wounds of Peace*： *The Israeli-Arab Trage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Simha Flapan， *The Birth of Israel*： *Myth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Baruch Kimmerling， *Politicide*： *Ariel Sharon's War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London： Verso， 2003）；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1999*（New York： Knopf， 1999）； Ilan Papp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Oxford， England：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6）； 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trans.Haim Watzman（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 Tom Segev， *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trans.Jessica Cohen（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Norton， 2000），以及Zeev Sternhell， *The Founding Myths of Israel*： *Nationalism*， *Soc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Jewish State*， trans.David Maisel（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 参见Nur Masalha， *Expulsion of the Palestinians*： *The Concept of "Transfer" in Zionist Political Thought*， *1882—1948*（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92）； Eugene L.Rogan and Avi Shlaim， eds.， *The War for Palestin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Norman G.Finkelstein， *Image and Reality of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London： Verso， 2001），以及Rashid Khalidi， *The Iron Cage*：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

第一部分 美国、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

第一章 最大的赞助者

1994年7月26日，当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出现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的时候，他所说的热情洋溢的话并无什么典型特征，“我们对你们不只限于感激”。当他将自己的评述扩及“令人愉快的美国人民”的时候，拉宾强调说：“对于你们所给予的、现代历史上无出其右的慷慨支持、理解和合作，我们是无法用言词来表达感激之情的……”两年之后，拉宾遭到暗杀的悲剧发生，他的一位继任者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站在同一个地方，表达他与拉宾类似的感激之情：“美国给予了以色列——我能怎样向你们这个机构讲述呢？除了政治和军事支持，美国还在经济领域给予了以色列慷慨而高尚的援助。由于美国的帮助，以色列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他对自己的听众说：“当我今天对你们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在代表每个以色列人，以及世界上的每个犹太人说‘谢谢你们，美国人民。’”[1]

这些陈述——以及像这样的其他陈述——不仅仅只是出自来访的外国高官口中典型的华丽言词而已。拉宾和内塔尼亚胡所说的这些话，精确地描述了美国对这个犹太国家长期以来提供的异乎寻常的支持。美国纳税人的钱用来补贴以色列经济的发展，将它从那些财政危机中拯救出来。美国的军事援助使以色列在战争时期的力量得到加强，使之在中东保持着军事支配地位。在战时与和平时期，华盛顿曾给予以色列广泛的外交支持，并且使之免受因自己的行动而造成的不利后果的影响。由于《戴维营协议》（the Camp David Accords），或明显依靠承诺增加美国援助而达成的以色列同埃及和约旦之间的和平条约，美国也是延宕不决的阿以和平进程的一个主要因素。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赞助者。

经济援助

以色列有利地位的最明显指标是它从美国纳税人那里得到的美国外援的总数额。以2005年为例，美国给以色列的直接经济和军事援助达到了1540亿美元（2005年的美元价格），其中的大部分是由直接

赠款而非贷款构成。[2]就像在下面所要讨论到的那样，实际的总数要大大高于这一数字，因为美国的直接援助条件是异乎寻常有利的，而且美国还提供给以色列不包括在对外援助预算中其他的物质援助。

因为对以色列此种程度的支持今天几乎不会受到质疑，所以人们容易忘记，现在的这种美以间的“特殊关系”，是在以色列建国数十年之后才出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虽然美国领导人偶尔会在口头上表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犹太人家园的目标，但是没有哪位总统做出过很大的努力来推进这一目标。当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总统决定支持联合国1947年的分治计划，并在以色列于1948年5月宣布独立后立即对它给予承认，他确实在支持建立犹太人家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意识到，同以色列抱得太紧将会威胁美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诱使苏联获得在中东提高影响力的机会。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美国寻求在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国之间走中间道路；美国给予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是适度的，而且几乎不向以色列提供任何直接的军事援助。[3]以色列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请求以及希望得到美国安全保证的请求，都被礼貌性地拒绝了。[4]

这一时期华盛顿与耶路撒冷之间还有过数次尖锐的外交分歧。当以色列无视联合国的要求而在1953年9月修建一条运河，并从约旦河中引水的时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国务卿立即宣布美国终止对以色列的外交援助。威胁的效果立竿见影：以色列在10月27日同意停止引水计划，而美国的援助也随之恢复。[5]在说服以色列撤出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从埃及手中夺取的领土问题上，类似停止美国援助的威胁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明白，战争是领土扩张的机会，因此在战前就开始与英法两国——它们是进攻埃及的主要煽动者——进行讨论，建议以色列和伊拉克两家分割掉约旦、黎巴嫩的部分让给以色列，由以色列来控制西奈半岛的堤蓝海峡（the Straits of Tiran）。[6]由于英法两国正全神贯注于埃及身上，故而对这个大方案没有兴趣。但是本-古里安在以色列国防军征服西奈半岛后的几次声明——包括11月7日在议会的讲话——中认为，1949年的停战协议已然无效，以色列打算保留它刚夺取到的土地。当艾森豪威尔威胁说要停止所有一切给以色列的公共及私人援助时，本-古里安立即退让，答应“在原则上”撤出所占领的土地，以换取对以色列足够的安全保证。而后以色列在美国纠集对自己的支持，这场运动削弱了国会对艾森豪威尔的支持，导致他发表全国性的电视转播讲话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1957年春，以色列最终撤出了它所占领的那些领土，条件是保证它在加沙地带的边界安全以及在堤蓝海峡的自由航行权利。[7]

20世纪50年代末，美以关系已经回暖，但在肯尼迪政府的时候，美国才真正第一次承诺以色列的军事安全。[8]事实上，在1962年12月，肯尼迪曾告诉以色列外交部长戈尔达·梅厄（Golda Meir），美国“在中东地区同以色列所具有的‘特殊关系’，只有同英国在一系列广泛的世界事务上的关系可以相比拟”。他接着说道：“我认为十分清楚的是，如果发生侵略以色列的事件，美国会来支持以色列的。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在不断增加。”[9]此后不久，肯尼迪即在1963年授权出售给以色列第一批主要的武器——霍克防空导弹（Hawk antiaircraft missiles）。这一转变反映了许多战略考虑，如平衡苏联对埃及的军售、打消以色列的核野心，以及鼓励以色列领导人对美国的和平倡议作出好意的回应；但是，技巧娴熟的以色列外交、数位亲以顾问的影响，以及肯尼迪渴望维持的犹太选民和捐款人的支持，也同样在他的决定中发挥了作用。[10]霍克防空导弹的销售为另外几批武器交易打开了大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964年销售的两百多辆M48A式战地坦克。为了掩盖美国卷入这一军售行为中，限制这一事件在阿拉伯世界的反应，这些坦克是由联邦德国运送给以色列的，而联邦德国则从美国得到替代性武器。[11]

然而，至于美国援助以色列的绝对数量，真正的突变是发生在随后的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the Six-Day War）。从1949年至1965年期间，美国每年对以色列的援助——其中超过95%是经济和食品援助——大约是6300万美元；而此后在1966年至1970年期间，每年的援助增加到1.02亿美元；1971年，美国的援助飙升到6.345亿美元——其中大约85%是军事援助；而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the Yom Kippur War，又称“十月战争”）中，援助的数量是1971年的5倍之多。1976年，以色列成为美国每年最大的外援接受国，而这一地位一直保持至今。这一时期对以色列的支持从贷款转为直接赠予，而其中的大部分则是美国的军事援助，而非经济或技术支持。根据美国国会官方的武器研究机构——国会研究处（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的克莱德·马克（Clyde Mark）的说法：“以色列更喜欢的是贷款而非赠款形式的援助，以避免有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在以色列对赠款项目进行监督。自1974年以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某些或全部军事援助都是以贷款形式进行的，而美国则放弃贷款偿还的要求。从技术上来说，援助被称为贷款，但军事援助实际上就是赠款。”[12]

以色列现在从美国得到的直接外援每年大约为30亿美元，这一数目大约占美国直接对外援助预算的1/6，约等于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2%。在近几年里，美国给以色列的援助中大约75%是军事性的，剩余的部分则被分解为各种形式的经济援助。[13]如果按照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来算，这种程度的外援等于每年向每个以色列人直接补贴500美元。与此相比较，处在接受美国外援第二位的埃及，每个人只得到20美元；而像巴基斯坦和海地这样的贫困国家的外援，平均每人则只分别得到5美元和27美元。[14]耶路撒冷与华盛顿同意从1997年开始逐渐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自1999年财政年度以来，美国国会开始以每年1200万美元的幅度削减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通过美国承诺每年增加6000万美元军事援助的平行方案，以及国会投票支持追加援助的一揽子方案，这一削减步骤得到了补偿。军事援助的平行方案和追加援助的一揽子方案，包括像提供支持实施1998年怀伊河协议（Wye Agreement）——在该协议中，以色列答应从西岸的部分地区撤出——的12亿美元，以及2003年帮助以色列准备伊拉克战争而额外增加的10亿美元美国对外军事财政资助。[15]

每年30亿美元已经够慷慨的了，但这几乎不是全部的援助实情。就像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在规定的30亿美元中，以色列得到的大量其他好处都被略去了，因此，以上所说的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比实际上的支持打了很大的折扣。事实上，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在1991年告诉记者，以色列是得到援助的“实际量大大超过普遍引用的数字”的三个国家之一，他说每年的实际数额超过了43亿美元。[16]

误差部分是因为以色列比大多数其他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条件更加优惠。[17]大多数美国对外援助的接受方，都是分四次来领取钱款，但是从1982年以来，美国的年度对外援助法案当中包括了一条特殊的条款，规定在财政年度最初的30天里得到它的整个年度拨款。[18]这就类似于在1月1日就拿到了全年的工资，因此就能够在将未花完的那部分钱花掉之前赚取利息。

由于美国政府通常是进行预算赤字运作，因此将全部援助即刻交付给以色列，就要求它预先借贷必要的欠款量；而根据国会研究处的估计：“为了提前一次性地支付这笔钱给以色列，每年借贷的资金所耗费的美国纳税人的钱达5000万至6000万美元。”[19]更有甚者，当以色列将未花完的那部分钱再投资到美国的短期国库券的时候，美国政府最终还要支付给以色列额外的利息。按照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说法，提前向以色列支付美国对外军事财政资助，使得以色列在2004年赚取了大约6.6亿美元的额外利息。[20]以色列还同样接受“额外军品”（excess defense articles）——美国以免费或大幅折扣的方式提供给友好国家的剩余军事装备，而不受1976年《武器出口管制法案》（Arms Export Control Act）的常规限制。这一限制起初的限额是2.5亿美元——其中不包括舰只；但是，1990年11月5日的拨款法案，授

权“一次性地”在1991年转让给以色列价值7亿美元的美国剩余装备。[21]

类似地，美国对外军事财政资助计划通常要求美国军事援助的接受方把钱花在美国，以使美国国防工业的员工不会失业。然而，国会却在年度拨款法中给予以色列特例，授权它将接收到的美国军事援助的每4美元中的1美元，用于补贴它自己的国防工业。一份近期的国会研究处报告指出：“没有任何其他美国军事援助的接受方曾经得到过这种好处，从使用美国的资金进行采购的那些以色列国防工业公司所得到的收益，使得以色列国防工业获得了必要的经济规模并变得高度精密复杂。”到2004年的时候，作为一个相对的小国，以色列却成为了世界上的第八大武器供应国。[22]

以色列也同埃及和土耳其一道，被允许将全部的美国对外军事财政资助资金用于应对当年的负担，而不用匀出部分钱来应对接下来的那些年份里的预期花费。根据美国审计总署（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的说法，这种“现金流转”（cash flow）的融资方式，“允许一个国家比通常能够做到的订购更多的国防物资和服务，因为当一项合同签订时，必须保留较少的欠款”[23]。只要美国继续提供类似的援助数额，以色列就能够进行偿付，这种情况使得美国在将来减少对它的支持更加困难。而在更进一步的对资金控制方式上，美国援助的接受方通常要求的是美国对外军事财政资助贷款的到期支付，并给予同等的利息额；但是，以色列却被允许在它使用任何被贷出的部分款额之前，通过延期贷款的激活日期，这一程序减少了以色列所欠的山姆大叔的利息额。[24]

引人注目的是，以色列是接受美国经济援助唯一不用解释援助的钱是怎么花费的国家。给别的其他国家的援助，是按照具体的发展计划来分配的：防止艾滋病、反毒、儿童健康、推进民主、改善教育等。但是，以色列却是一次性地得到直接的现金交付。[25]这种例外使得美国几乎不可能阻止以色列将得到的援助金用于美国所反对的目的，例如在西岸建立定居点。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克莱德·马克的说法：“由于美国的经济援助是直接按照政府对政府的预算授权方式拨付给以色列的，没有进行具体的项目会计，并且钱款是可替代的，因此无法弄清楚以色列是怎样使用美国的援助的。”[26]

美国对以色列的另外一种形式的支持是贷款担保，这项担保允许以色列以较低的利率从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使得以色列在利息偿付中节省数以百万计的美元。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安置苏联犹太移民到以色列定居的花费而进行融资，以色列从美国请求得到的贷款担保大约为100亿美元。美国政府并不直接以贷款担保的形式提供资金——

它只是在出现的那些玩忽职守的事件中才向私人放贷者进行偿付。而促成这些贷款担保措施的人则经常宣称，这样做不存在实际的费用，因而对美国纳税人来说也不存在实际的成本。然而，贷款担保确实存在预算上的影响和后果，因为国会必须拨付资金，以弥补基于现值的贷款期而估计到的可能损失。1992年贷款担保成本的估计值介于1亿美元至8亿美元之间。[27]

华盛顿于2003年批准了第二轮的贷款担保，总额几乎达到90亿美元，以帮助以色列准备伊拉克战争，应对经济危机的延长，以及弥补因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所导致的成本。由于在法律上以色列被禁止在被占领土使用美国的经济援助，因此，实际的拨付量是按照等于以色列估计的在定居点建设上所花费的数量而加以削减的。然而，这一削减量可能并不像听起来那么严重，因为它不涉及美国直接援助的减少，而只是迫使以色列对所借资金的一小部分支付稍微高一点的利息而已。

除了政府的补贴援助和贷款担保之外，以色列每年还从美国公民那里得到估计为20亿美元的私人捐款，其中直接支付和购买以色列的国家债券大约各占一半。[28]在美国的法律中，这些债券受到优惠对待；虽然这些债券的利息并不是免税的，但是国会特别将其从《1984年预算赤字削减法案》——该法案对低于联邦利率的其他债券进行额外的税收惩罚——的条款规定中加以剔除。[29]类似地，在大多数其他国家，私人慈善捐款是不能够减税的，但是根据美国-以色列收入税条约中的一项特别条款，许多给以色列的私人捐款却可以享受减税的待遇。[30]

流向以色列的金钱对以色列总体经济的实惠一直以来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美国公民的私人捐款也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性作用，这可以回溯到以色列独立前的时期。[31]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来自海外犹太人——其中包括一些美国犹太人——的私人捐款，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以色列的秘密核计划筹得了资金。按照以色列新闻记者迈克尔·卡尔平（Michael Karpin）的说法，这一资金募集努力的协调者是亚伯拉罕·范伯格（Abraham Feinberg）——他是一位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美国商人、慈善家和政治顾问；而据报道，捐款人还包括加拿大啤酒业巨头塞缪尔·布朗夫曼（Samuel Bronfman）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 family）的几位成员。然而，范伯格从未泄漏过那些美国捐款人的名字，他自己扮演的角色也从未得到过正式的确认。[32]今天，像以色列国防军之友（the Friends of Israel Defense Forces）这样的团体在美国募集资金，以“支持那些捍卫犹太人家园的男女青年

士兵的社会、教育和娱乐项目及设施”。据报道，最近在纽约的一次餐会上募得了1800万美元，而这笔钱根据美国的法律可以减免税款。[33]

来自美国公民的其他私人捐款，也用来资助被占领土旷日持久的殖民活动。人们期望这些给西岸定居点的捐款——其中包括那些通过美国慈善机构或其他“……之友”组织得到的捐款——不应免税，但是这样的限制从根本上来说却很难执行，而且过去的监控也很松散。[34]例如，为了保证美国捐给以色列犹太人代理处（the Jewish Agency for Israel）——这是一个帮助安置新到以色列人的准政府组织——的钱款所享受的免税地位，资助被占领土定居点的工作就从该代理处的定居点科室中剥离出来，转而分派给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WZO）中新设立的“定居处”这个部门。但是正如格肖姆·格伦伯格（Gershom Gorenberg）所指出的那样：“定居处只是承接以色列犹太人代理处所有服务的一个空壳机构而已……这一改变使得美国犹太人的慈善捐款，可以用来清理被占领土。同样的人在当场继续着同样的努力。”[35]由以色列前刑事检察官塔丽娅·萨森（Talia Sasson）指导的一个官方的以色列政府研究项目显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该组织得到全世界那些著名的犹太组织的支持——的定居处积极卷入到在被占领土上建立未经批准的定居点活动中，此时，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得到了凸显。[36]更广泛地说，由于以色列慈善捐款的运作是美国税收当局鞭长莫及的，因此从犹太人和福音派基督教组织得到的捐款，一旦转给了以色列就难以监控。所以美国政府事实上不能够容易地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对转而用于未经批准用途的私人捐款进行免税。[37]

当人们意识到以色列并非一个贫穷国家，或者像阿富汗、尼日尔、缅甸和塞拉利昂那样遭受毁灭的国家的时候，所有这些慷慨捐赠就尤其引人注目。相反，以色列现在是一个现代工业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2006年它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排第29位；这一收入几乎是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2倍，实际上比葡萄牙、韩国或中国台湾要更高，远远超过任何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38]在2006年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以色列排名第23位；而在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2005年的“生活质量”报告排名中，以色列则位列第38位。[39]然而，这个相对繁荣的国家却是美国最大的援助接受国，它每年从美国接受的援助总额，使美国对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和利比亚那些贫穷国家的支持相形见绌。甚至连一些更加狂热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都承认这种反常现象的存在。例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近东报道》（*Near East Report*）前编辑米切尔·巴德（Mitchell Bard）和亲以的中东论坛（Middle East Forum）鹰派创办人丹尼尔·

派普斯（Daniel Pipes）就在1997年写道："由于以色列已经成为了一个其个人收入能够与英国比肩的富裕国家，因此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援助不再纯粹是基于短缺需要的原因。"[40]

为了以色列的利益，美国还承担了其他的经济负担，经常是作为说服以色列接受或实施与其邻国之间的和平协议所进行的努力的一部分。例如，作为1975年埃以脱离接触协议的组成部分，国务卿基辛格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保证以色列的石油需要，为以色列提供估计耗费数亿美元的"额外战略石油储备"。[41]在1979年3月的埃以最终和平谈判期间，美国再次确认对以色列的石油担保，在那以后就静悄悄地不断进行重新担保。[42]

最后，美国向以色列数个邻国提供的援助，至少部分地也是打算让以色列受益。埃及和约旦是美国对外援助的第二和第三大接受国，但其中的大部分援助钱款应该被看作它们表现良好的回报——具体而言，就是它们愿意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1974年，埃及从美国的援助中获得了7170万美元的援款，但是，随着西奈半岛第二阶段埃以脱离接触协议的完成，埃及在1975年和1976年（按照2005年的美元不变价值计算）分别得到11.27亿美元和13.2亿美元的援款。美国对埃及的援助在1978年达到23亿美元，在1979年猛升到59亿美元——这一年签署了埃以和平条约。开罗现在每年还从美国得到大约20亿美元的援助款。[43]类似地，约旦在1994年得到的美国援助是7600万美元，而1995年则只有5700万美元，但是对于1994年侯赛因国王决定签署和平条约，美国国会的回报是免除约旦所欠美国的7亿美元债务，并取消美国援助的其他限制。1997年以来，美国给约旦的援助一直是平均每年大约5660万美元。[44]美国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回报埃及和约旦，显示的依然是华盛顿对这个犹太国家的另外一种慷慨大方。

军事援助

这些各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一直并且依然对以色列很重要，但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大部分支持，却是致力于维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45]以色列不仅能够得到美国最重要的武器——F-15和F-16战斗机、黑鹰直升机、集束炸弹、"智能炸弹"等，还通过一系列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协议，同美国的国防情报核心部门连接在一起。根据国会研究处的资料："美国的军事援助，已经帮助以色列武装力量成为了世界上技术最精良的军队之一。"[46]

进而言之，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以色列"在使用（军事援助）资金上享有异乎寻常的行动自由"[47]。美国国防安全协作局（The 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DSCA）处理几乎所

有的采购事宜，管理所有美国军事援助的其他接受方，但是以色列几乎所有的采购都是直接与军事承包商打交道，然后再从援助账户上进行偿付。[48]以色列也是唯一一个合同额低于50万美元就可免受美国事先审查的国家。[49]

隐含在这些相对松散安排中的潜在风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显现出来了，那时候的以色列空军采购负责人拉米·多坦（Rami Dotan）准将被发现盗用并非法转移数以百万计美元的美国援助款。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说法，据传多坦（其后来在以色列服罪并受到长期监禁）“将工作订单的额度分成低于50万美元的最高限值”。然而，美国国防援助局——美国国防安全协作局的前身——的特迪·艾伦（Teddy Allen）中将随后告诉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说，美国国防援助局总检察官向国防部提出的以色列援助项目应该进行“修订”的建议却遭到拒绝，因为这可能引起“我们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动荡”[50]。

除了已经讲述到的对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之外，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差不多30亿美元来开发新的武器，如拉维（狮子）多用途战斗机、梅卡瓦坦克和箭式导弹。[51]虽然这些项目通过美国国防部得到资助，经常被描绘成双方努力的合资研发，但是美国不需要这些武器，也从未打算买来自己使用。拉维多用途战斗机项目最后由于成本-效用的原因而被取消——项目取消的许多费用由美国承担，但是其他武器则进入到以色列的武器库之中，而买单的则是山姆大叔。[52]例如，在2004年的美国国防年度财政预算中，包括给箭式导弹提供1.36亿美元的要求，其中6600万美元用于对系统进行另外的改进，7000万美元被批准用于另外部件的生产。因此，华盛顿出钱帮助以色列国防工业开发或生产这些“合资武器项目”，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补贴。[53]虽然美国有时候从以色列公司开发的技术中受益，但是如果这些资金用于支持美国的高科技产业，那么美国的获益甚至会更多。

20世纪80年代，作为里根政府在中东建立反苏“战略共识”的组成部分，美以之间的军事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升级。1981年，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同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建立“一个为改善两国安全关系而继续协商合作的框架”[54]。这一协议催生了联合安全军事规划组（Joint Security Assistance Planning Group， JSAP）这个机构，该规划组定期会晤以评估以色列的援助要求，协调军事计划、联合演习和物流安排。尽管以色列领导人希望有一个正式的同盟条约，并且对框架协议的实质内容受到限制感到失望，但这却是比此前的那些总统声明——例如1962年肯尼迪向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所作的私下评

论——更加正式地表达美国的承诺。

在里根当政的那些年里，以色列同美国的安全合作稳步增加，尽管它们在一系列广泛的议题上存在紧张关系——这些议题包括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1981年以色列对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轰炸、以色列在1981年12月兼并戈兰高地、以色列1982年入侵黎巴嫩，以及以色列1982年9月出乎意外地拒绝为了实现和平的“里根计划”。美以两国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始于1984年，并且在1986年成为应邀参与美国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Star Wars”）——即“星球大战”——的三个外来国家中的一个。最后，在1988年，一项新的协议备忘录再次确认“以色列同美国之间紧密的伙伴关系”，同澳大利亚、埃及、日本和韩国一道，以色列被认定为美国“主要的非北约盟国”。享有这种地位的国家有资格以较低价格购买更多种类的美国武器，优先得到战争剩余物资的转让，并参与联合研发项目和美国的反恐计划。在竞标美国的国防合同时，来自这些国家的商业公司也受到优待。[55]

两国间的安全联系自那以后一直在扩大。1989年，美国开始向以色列预先提供军事补给，而且国会在2006年投票将大约每年1亿美元的储备增加到2008年的4亿美元。[56]这一政策的理由被认为是国防部对地区危机作出迅速反应能力的一种方式，但是，预先向以色列提供军事用品，对于这样的意外事件实际上是一种无效的方式，而且五角大楼从未对这一政策有过热情。根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贾菲战略研究所前所长夏伊·费尔德曼（Shai Feldman）的说法：“目前的安排允许储备的只是以色列军队也可以在一次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物资。在五角大楼的规划者们看来，这意味着美国没有绝对把握，是否可以在危机情势中获得储备在以色列的武器弹药。进而言之，这种‘双重使用’的安排意味着不是将储备的武器弹药提前派发给美国的战斗单位，相反，在危机情况下这些武器将不得不从总储备中进行分发，然后再进入战斗单位，从而导致物流上的噩梦。”[57]储备计划的真正用意是要提高以色列的作战物资储备。挂靠以色列报纸《希伯来文报》（*Yedioth Ahronoth*）的以色列亚特新闻网（*Ynetnews*）在2006年12月报道说：“大部分美国储备在以色列的装备……用在了（2006年）夏季的黎巴嫩战争之中。”[58]这种报道几乎一点也不令人吃惊。

1996年成立的美以联合反恐工作组，是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创办的其他工作组基础之上的；两国还设立了五角大楼与以色列国防部之间的电子“热线”。由于两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固，因此以色列在1997年可以进入美国的卫星导弹预警系统之中。两国在2001年建立了年度“跨部门战略对话”，以讨论“那些长远的议题”。在

以色列将美国的军事技术销售给中国的争议期间，这一论坛被临时取消，但却在2005年11月得以重新召集。[59]

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美以安全合作也延伸到了情报领域。美以之间的情报服务合作可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而据报道，到1985年的时候，两国已经签署了大约24个情报共享协议。以色列让美国得到缴获的苏联武器和从苏联集团来的流亡者的报告，而美国则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期间和（乌干达）恩德培人质解救行动之前，向以色列提供卫星影像，还有报道说其出钱帮助过以色列在非洲的数次情报行动。[60]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甚至让以色列可以得到美国最紧密的北约盟国都得不到的一些情报表格。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据报道以色列几乎不受限制地得到精密的KH-11成像卫星的资料——据以色列军队情报负责人说，可以得到的“不仅是信息，而且还有照片”，而英国进入同一资源则大受限制。[61]1981年，以色列轰炸伊拉克的奥希拉克（Osirak）核子反应堆之后，以色列进入这一资源受到限制。但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据信老布什总统已授权转让有关伊拉克飞毛腿导弹袭击的实时卫星信息。[62]

与华盛顿长期存在的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相反，美国心照不宣地支持以色列维持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对以色列暗中进行的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其中包括以色列拥有超过200件核武器——视而不见。[63]美国政府曾向几十个国家施压，要求它们签署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但是美国领导人却几乎不对以色列施压，要求它中止核项目和签署该协议。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明显地要对以色列的核野心进行限制，最终说服以色列允许美国科学家巡视以色列在迪摩纳（Dimona）的核研究设施，以查明以色列是否企图生产出一颗核弹。以色列政府一再否认自己有核项目，迟迟不安排美国科学家的访问，并且在访问成行时对检查人员进入核研究设施施加繁多的限制。因此，1961年5月18日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只涉及两位美国科学家，持续的时间只有4天，两位科学家只有一人是在迪摩纳现场。根据沃伦·巴斯的说法：“以色列的战略是允许一次访问……但是要确保检查人员什么也发现不了。”在由于压力而被迫允许一年后接下来的那次访问中，以色列政府出人意料地邀请检查以色列一个不同设施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官员，临时到迪摩纳巡视。正如巴斯所指出的那样，这次访问“几乎谈不上是‘检查’”，但是肯尼迪政府似乎没有热情进行争吵。[64]

然而，接下来的一年肯尼迪增加了压力，向本-古里安及其继任者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发去了数封措辞严厉的信函，要求“按

照国际标准”进行半年一次的检查，并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能够解决对以色列核野心问题的关注，“将严重危及本届政府对以色列的承诺和支持”[65]。肯尼迪的威胁说服了以色列领导人允许额外的访问，但是让步并未导致遵守的结果。就像报道的那样，在接到肯尼迪在1963年7月表达的意见时，艾希科尔对他的同事说：“我有什么好怕的？他的人会来这里，而实际上来的人将被告知能够访问（迪摩纳现场），而且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但是当他要求在这里或那里打开一扇门的时候，（迪摩纳项目建设负责人）伊曼纽尔·普拉特（Emanuel Prat）就会告诉他说：‘不是那一扇。’”[66]在其他几次访问中，检查人员不允许将外面的设备带进来或者进行取样。

就像最近伊拉克和朝鲜的例子提醒我们的那样，这样的迷惑战术是所有进行秘密核扩散者们的标准剧本。虽然美国官员依然怀疑耶路撒冷的核计划，但是以色列的欺骗奏效了，因为如果以色列的核项目不是更紧迫的话，肯尼迪及其继任者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都不愿意拒绝对以色列的支持。结果，就像阿维纳尔·科恩（Avner Cohen）在他有关以色列核项目详细的历史记录中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人能够决定（美国）访问的规则，而约翰逊政府因为担心以色列结束这种安排，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不与以色列对抗……肯尼迪对本-古里安和列维·艾希科尔两人都发出威胁，不遵守……会‘危及美国对以色列安全和福利的承诺’，但约翰逊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冒一场美以危机的风险。”[67]巴斯写道：“实际上，约翰逊决定大约每年进行一次快速的访问，而不是每半年检查一次。”[68]而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在1968年来到白宫，告知约翰逊，美国的情报结论是以色列事实上已经获得了核能力的时候，约翰逊叫他保证不会使任何其他人得到证据，包括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根据新闻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的报道：“约翰逊很明显要打发走赫尔姆斯——以及他的情报：他不想知道中央情报局要告诉他的东西，因为他一旦接受了那一情报，他将不得不据此采取行动。到1968年的时候，总统没有任何意愿来阻止以色列的核弹了。”[69]

除核武器外，以色列还积极维持其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计划，至今还未批准化学或生物武器公约。[70]很难不让人想到的具有讽刺性的事情是：美国已经向许多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对那些公然蔑视美国意愿、想尽办法获得核武器的国家进行制裁，为防止伊拉克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2003年发动了战争，并出于同样的原因计划进攻伊朗和朝鲜。然而，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资助一个秘密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活动的盟国，而这个盟国的此类活

动是众所周知的，它的核武器已成为其数个邻国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强大动力。

除了苏联对古巴的局部支持外，很难再想到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物质援助在如此长的时期达到这种程度。[71]当然，美国愿意向以色列提供一些支持并不会令人感到吃惊，因为美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赞成以色列的生存，明白它所面临的环境充满敌意和威胁。就像在第二章中要讨论的那样，美国领导人也将对以色列的援助视为推进更为宏大的外交战略的一种方式。然而，美国巨额的援助却是异乎寻常的。就像第三章所显示的那样，在美国的重要军事援助开始之前，以色列就比其邻国强大，它现在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毫无疑问，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对它很有帮助，但是其重要性还没有到关乎以色列存亡的地步。

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最奇特之处，是其越来越无条件的实质。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能够令人相信地向以色列发出停止援助的威胁，尽管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甚至也面对国会的严厉反对，但那样的日子已是遥远的过去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就不断得到美国的慷慨支持，即使在以色列采取美国领导人认为不明智，或者与美国利益相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尽管以色列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而且还拥有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它还是得到了援助。当它在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的时候，它得到了援助——只是通过减少贷款担保而丧失了一小部分的援助，即使美国政府反对这一建立定居点的政策；当它兼并自己所征服的土地——就像在戈兰高地和耶路撒冷所做的那样——的时候，当它将美国的军事技术卖给像中国那样的潜在敌人的时候，当它在美国的土地上进行间谍活动的时候，或者当它以违反美国法律的方式使用美国武器——例如在黎巴嫩平民区使用集束炸弹——的时候，它也得到了援助；当它为了和平而进行退让的时候，它得到了额外援助；当它所采取的行动使得和平更加难以捉摸的时候，它也几乎没有失去美国的支持；甚至当以色列领导人背弃了对美国总统所作的保证的时候，它还是得到了援助。例如在1981年，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答应罗纳德·里根，他不会游说反对美国卖给沙特阿拉伯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AWACS），但随后他却上了国会山，告诉一个参议院小组说他反对这一交易。[72]

人们可能会认为，美国的慷慨大方将使得华盛顿对以色列的行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情形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同以色列打交道的时候，美国领导人通常能够引起以色列的合作，是通过额外给予对方胡萝卜——增加援助，而非挥舞自己的大棒——威胁停止援助。例

如，只是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私下保证将给以色列额外的飞机之后，以色列内阁才同意公开支持联合国的242号决议——最初于1967年通过的一项旨在呼吁以色列从六日战争中夺取的领土上撤走的决议。[73]更有甚者，促成以色列接受停火协议以结束所谓的与埃及的消耗战——从1969年3月持续到1970年7月沿苏伊士运河一系列旷日持久的空战、炮战和步兵战——的原因，是由美国保证加快将战斗机交给以色列，保证提供以色列先进的电子抗衡设备来反击苏联向埃及提供的防空导弹，以及更为全面地“维持均势”。[74]根据西蒙·佩雷斯——时任“不管部”部长——的说法：“至于美国向我们施压接受他们的计划这个问题，我愿意说他们更多地是以胡萝卜而非大棒来对付我们；在任何一次事件中他们都不曾用制裁来威胁我们。”[75]

这一模式持续到整个20世纪70年代，伴随期间的，是在与埃及脱离接触的会谈过程中，以及在导致1978年的《戴维营和平协议》和1979年埃以和平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位总统保证对以色列援助的不断加大。具体而言，在西奈半岛第二阶段协议完成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从1975年的19亿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62.9亿美元；在以色列与埃及的最终和平条约完成之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从1978年的44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09亿美元。[76]就像在下面要讨论到的那样，为了说服以色列签署条约，美国也向以色列作了大量其他的承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作为1994年以色列与约旦和平条约的组成部分，克林顿政府对以色列的援助作了增加；而克林顿为推动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努力，则导致他保证对以色列增加12亿美元的额外援助，以赢取以色列接受1998年的《怀伊河协议》。然而，在《怀伊河协议》签署之后，随着一群巴勒斯坦人与两名以色列公民之间暴力冲突的发生，内塔尼亚胡总理就很快将它中止了。[77]根据美国谈判人员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的说法：“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比比（Bibi，即内塔尼亚胡）……是在抓住这一事件来躲避更进一步对协议的执行。这是不幸的，因为巴勒斯坦人正全力贯彻执行《怀伊河协议》中他们作出的大部分承诺，尤其是在该地区进行逮捕和对恐怖行为进行打击。”[78]然而，就像以色列学者亚伯拉罕·本-泽维（Abraham Ben-Zvi）所观察的那样：“克林顿政府对内塔尼亚胡的行事风格的焦虑，很少转变为有损美以‘特殊关系’的政策。”[79]

实际上，试图使用美国的潜在影响力面临严重的障碍，并且几乎就没有试图这样做过，即使以色列的行动让美国官员很不快的时候也是如此。在1975年与埃及进行的脱离接触会谈期间，当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国务卿对以色列的不妥协态度变得不耐烦的时候，一项压缩对以援助以及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更深

远的重新评估的威胁却脱离了正轨，因为当时有76位参议员在美国以色列人公共事务委员会发起的一封信上签了名，那封信要求福特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需求保持“回应”。由于他们减少美国对以援助的能力实际上被阻，因此福特和基辛格别无他法，只能重新恢复“走一步看一步”的外交，并且通过提供额外援助的刺激，试图获得以色列的让步。[80]

类似地，梅纳赫姆·贝京总理没能完全实施1978年《戴维营协议》——该协议具有突破性，为随后的埃以和平条约打下了框架——中的条款，也使得吉米·卡特总统不快，但是他却从没试图将美国的援助同以色列的承诺挂钩。[81]当内塔尼亚胡总理和巴拉克总理没有实践以色列在《奥斯陆协议》中的全部承诺时，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也感到沮丧；而据报道，当巴拉克违背承诺不将三个耶路撒冷村庄交给巴勒斯坦人控制的时候，克林顿“暴怒”了，他宣称巴拉克正使他在另一位外国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眼中，成为一个“伪先知”。当巴拉克企图改变2000年戴维营首脑会议期间立场的时候，克林顿发作了，他告诉巴拉克说：“我不能带着经过删除的东西去见阿拉法特！你可以出卖；我却怎么也做不到。这是不真实的。这是不严肃的。”[82]然而，克林顿对这些企图的反应并不是威胁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

确实，为了表达对以色列某些具体行动的不快，美国曾偶尔临时停止对以色列的援助，但是这样的姿态经常都是象征性的、非持久性的，对以色列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持续的影响。例如在1977年，以色列使用美国的装甲运兵车来干涉南黎巴嫩——这是一种既违犯《武器出口管制法》（该法要求美国武器只可用于“合法防御”），又违背梅纳赫姆·贝京总理保证在采取行动之前首先与华盛顿进行协商的举措，然后却又否认那样做过。在确凿无疑的情报信息暴露了以色列的欺骗行为后，卡特政府威胁中止以后的军事物资装运，故而贝京下令将装甲运兵车的装备撤出。[83]

类似的一个例子是，在以色列实际上兼并戈兰高地之后，里根政府决定废除1981年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即使以色列并没有放弃兼并，里根后来却执行了那一谅解协议中的关键条款。在以色列违反前面有关他们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使用装甲运兵车的协议后，美国也中止了向以色列运送集束炸弹，但是却在1988年又继续向以色列供应。[84]

虽然美国的压力也有助于说服以色列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武力——1982年以色列入侵后避难于贝鲁特——进行全面攻击，但是以色列领导人自己也不愿意采取这一步骤，因此并不需要太多的劝说。[85]

1991年，老布什政府通过停止1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而向沙米尔（Shamir）政府施压，要求它停止建立定居点并参加一次计划好的和平会议。但是这项被取消的贷款担保只持续了数月，而一旦伊扎克·拉宾取代沙米尔成为以色列总理，贷款担保就被批准了。[86]以色列同意停止修建新的定居点，但是却继续扩大现有的街区，而被占领土上定居者的数量则在1991年、1993年、1994年和1996年分别增加了8000人（14.7%）、 6900人（10.3%）、 6900人（9.7%）和7300人（9.1%）。被占领土上这些年的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以色列总人口的增长。[87]

一个类似的插曲发生在2003年，当时小布什政府试图通过部分减少美国对以色列的贷款担保，来表明他对以色列在西岸地区修建“安全墙”的反对。如果停止整个贷款担保或削减对以色列的直接外援，就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小布什只是停止了相当于那堵墙侵入巴勒斯坦土地部分所估计的费用部分的贷款担保。以色列仅仅只要为那一小部分贷款支付更高的利息而已，这一惩罚的额度总共才几百万美元。相较于以色列已经拿到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以及相较于它在未来预计拿到的美元，这只不过是轻微的惩罚而已。这种惩罚对以色列的行为没有产生清晰可见的影响。

外交保护和战时支持

除了这些有形的经济军事援助外，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持续的外交支持。在1972年至2006年期间，华盛顿否决了42项联合国安理会批评以色列的决议。这一数字比同期所有其他安理会成员的否决总数还要多，略微超过了同期美国否决数的一半。[88]由于美国威胁要进行否决，还存在大量从未到安理会进行投票的关注以色列的决议。据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在2002年安理会的一次闭门会议上说，如果任何谴责以色列的决议而不同时对恐怖主义进行普遍地谴责——他特别提到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Islamic Jihad）、哈马斯（Hamas）和阿克萨烈士旅（al-Aqsa Martyrs Brigade）的名字，那么美国今后就会否决任何这样的决议。[89]美国有几次也投票谴责以色列，但那只是在以色列采取了特别惊人的行动之后才这样做的。而这种时候要么是被讨论的决议只存在温和的批评，要么是美国要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传达某种程度的不快。[90]

在安理会之外，无论什么时候联合国大会通过众多谴责以色列行为中的一项决议，或者呼吁为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美国都是一以贯之地支持以色列。虽然这些决议不具有约束力、大多数都是象征性的，但是华盛顿的立场却常常与其盟国相左，只是与其他一

小撮国家为伍。举一个典型的例子：2004年12月10日，有关“以色列的做法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联合国大会59/124号决议，投票通过的情况是149票对7票——另外有22票弃权、13票没有投。在众多支持这一决议的国家中包括日本、德国、法国、中国和英国。而同美国一道反对这一决议的国家是以色列、澳大利亚、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努和帕劳。[91]

类似地，当阿拉伯国家试图向国际原子能署提出以色列未经宣布的核武器问题时，华盛顿站出来阻止该组织将这一问题安排在其议程中。就像以色列前外交部发言人乔奈森·皮莱德（Jonathan Peled）在2003年对犹太人报纸《前沿》所说的那样，“虽然阿拉伯人每年都做这件事，但是为了在反对以色列决议的共识上进行全面的辩论，首先需要（国际原子能署）理事委员会点头同意”，而由于华盛顿在理事委员会的影响力，“他们却得不到这种点头同意”[92]。

美国在外交和战争问题上愿意同以色列站在一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大大加强。就像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曾迫使以色列从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夺取的领土上撤出，成功地停止了以色列单边转移主要水资源的企图。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主要的冲突以及随后进行的谈判中，美国变得更多地承诺保护以色列的利益。虽然华盛顿没有让耶路撒冷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但是美国对它的支持却是一以贯之和程度可观的。

在1966年至1967年期间，当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冲突，导致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在5月下令将军队重新开进西奈半岛——这一行动让以色列领导人惊慌，并且引发了一场范围更广的战争危险——的时候，约翰逊政府却让以色列相信，它的军事力量强过其阿拉伯对手，并且它夸大了阿拉伯人进攻的危险。[93]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Earle Wheeler）将军告诉约翰逊说：“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如果发生战争，以色列人将在5至7天里赢得战争。”而约翰逊自己也告诉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说，如果埃及发起进攻，“你们将狠狠地揍他们一顿”[94]。虽然以色列的主要领导私下里同意这种评估，但是作为刻意引起同情和支持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色列还是继续向华盛顿发出警报。[95]

基于自己的评价，美国试图通过说服以色列政府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保持克制，通过寻求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以阻止战争的爆发。[96]约翰逊总统声称埃及在5月26日关闭堤蓝海峡、不让以色列船只通过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并且对以色列关心的问题怀有同情，但是由于美国在越南的卷入，他没有对美国的军事力量作出承诺，并且拒绝

为援助以色列而作出空口保证。然而，他对以色列进行约束的努力却被逐渐软化，到6月第一个星期的时候，约翰逊和他的几位高级顾问向以色列官员暗示，如果以色列采取行动，美国将不会反对，只是警告说如果事情变糟，则不要指望美国伸出援手。迪安·腊斯克国务卿对一位新闻记者说："我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要约束任何人。"据迈克尔·布里彻（Michael Brecher）报道，到7月3日，"（以色列）给人感觉到的印象是，如果以色列采取行动的话……美国将不会持不友好的观点"。事实上，约翰逊给以色列人打开了后来被专家称之为进行进攻的"黄灯"。[97]虽然以下几个原因可能起了作用，但约翰逊立场的转变原因却还不清楚：来自数位亲以色列朋友和顾问的压力、以色列大使馆组织的写信运动，以及不断强化的以色列无论如何都会进行打击的感觉。[98]

直到以色列显露出胜利的势头，美国才向以色列施以重压要求其停止战斗，在战争结束后也没有批评以色列。事实上，在以色列占领了戈兰高地——这威胁到苏联的盟友叙利亚——后，当苏联威胁要进行干涉的时候，美国总统下令美国的第6舰队朝以色列更近的海域移动，以吓阻苏联的干涉。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形成尖锐对照的是，在不存在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背景下，约翰逊政府清楚表明不存在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撤退的问题。[99]美国也不坚持要求对以色列海空军在6月8日对悲剧性地攻击美国情报侦察船自由号——这是一个起因依然存在争议的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清查。[100]虽然危机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可能没有给予以色列所寻求的外交和军事保护，但是美国所同情的一方却是毫无疑问的。

在1969年至1970年期间的消耗战中，美国甚至更加偏向以色列。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在战争期间保持增加，这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信念是一致的——即美国对以色列坚定不移的支持将表明苏联援助价值的有限性，并最终说服莫斯科的阿拉伯代理人应与美国结盟。虽然尼克松政府没有按照以色列的要求提供所有的武器——这偶尔会导致美以两国政府之间在交流上的尖锐对立，但是美国政府提供给以色列的武器确实在增加，而且几乎不鼓励以色列在此期间举行的各种和平会谈中作出让步。然而，当暴力升级使得人们提出超级大国之间可能爆发冲突的担心时，华盛顿就带头安排了一次停火，通过答应增加更重要的援助来说服以色列接受停火。[101]1972年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承诺向以色列长期性地提供飞机和坦克，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以色列保证，在提出任何新的和平建议之前同以色列进行磋商。在这样做的时候，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实际上在一系列的外交动议上给一个小国赋予了半否决权。威廉·匡特（William Quandt）写道：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东政策几乎全部都是支持以色列"。而以色

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后来则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美国武器供应的“黄金时代”。[102]

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期间，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尼克松和基辛格起初有信心认为以色列将很快赢得胜利，相信如果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不是太过于公开，以色列的胜利也不是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么美国在战后将起到最大化的平衡作用。就像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样：“如果以色列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就像我们起初预计的那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避免成为阿拉伯国家憎恨的焦点。我们必须阻止苏联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救星。……如果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并且以色列陷入到困难之中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对它进行必要的拯救。”[103]由于这些预期和战略目标的原因，美国对以色列的最初请求反应迟缓。然而，当以色列遭遇到出乎意料的困难，关键的军事供应开始出现短缺的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下令对关键的军事装备进行全面空运，并支付了22亿美元的追加军事援助担保。[104]虽然重要的美援来到之前战斗高潮已过，但是美援鼓舞了以色列的士气，帮助它巩固了胜利。[105]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向以色列重新供应军备的努力也引发了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和降低产量，由此使世界石油价格急剧攀升，从而使美国及其盟国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在某些限定的范围之内，美国的外交在战争期间有利于以色列：美国帮着说服约旦国王侯赛因保持超然态度，而基辛格在处理停火谈判——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于10月21日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时，则着眼于保持以色列直到战争最后阶段的行动自由。尼克松曾指示基辛格告诉苏联的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美国“要通过战争来强行推行中东的全面和平”。但是基辛格却在莫斯科成功地施压实行简单停火，这将使得以色列占有上风，并促成了随后将苏联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的努力。根据历史学家肯尼思·斯坦（Kenneth Stein）的说法：“由美国编好的基辛格同勃日列涅夫参加的三次会议的备忘录明明白白地显示，他准确而反复地在莫斯科代表着以色列的利益，而这几乎完全同尼克松的优先关注背道而驰。”虽然以色列领导人对他们所看作的苏美共谋主持一次停火感到厌恶憎恨，但是就像斯坦所指出的那样：“基辛格虽然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代表以色列，可他肯定提出了以色列所关注的东西。”[106]

当联合国安理会在10月22日通过停火决议呼吁在12小时之内停止所有战斗的时候，为了让以色列巩固其军事地位，基辛格允许以色列违反该决议。他曾事先告诉以色列大使希姆查·狄尼兹（Simcha Dinitz）说，将“充满好意地建议”以色列利用他去莫斯科进行这一趟

行程的时间，来完成它的军事行动；而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华盛顿一家专门处理美国解密资料的研究机构——的资料，“基辛格秘密给以色列当局打开了违反停火协议的绿灯”，以便“为以色列的军事推进赢取时间，尽管停火最后时间就要到了”[107]。当停火完全破裂，以色列国防军包围了埃及的第3军，由此促使苏联直言威胁要使用自己的军队来进行干涉的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下令进行全球军事警戒，并向莫斯科发出了不要进行干涉的警告，同时告诉以色列现在是停止战斗的时间了。

虽然在随后导致1975年第二阶段西奈半岛脱离接触协议的“走一步看一步”外交期间存在相当艰难的讨价还价，但是美国依然在为保护以色列的利益而忙活。除了给予以色列不断增加的军事援助外，美国还向以色列保证，在准备下一阶段的和平协议时同以色列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给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来参加任何和平会谈实际上的否决权。事实上，基辛格答应，只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或者不接受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这两项停火决议分别结束了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并呼吁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撤出，同时承认以色列的主权和独立，美国就不会“承认或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会谈”。1984年，美国国会使这项保证成为成文的法律。[108]根据以色列历史学家阿维·施莱姆的说法，“（以色列总理）拉宾向基辛格清楚地表明，除非西奈半岛第二阶段脱离接触协议伴以一项美以协议，否则以色列内阁不会批准”。施莱姆将这一安排结果称为“与美国有实无名的同盟”。[109]

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构想拙劣的侵略之后，美国又再次跑过来援助以色列。在以色列军队与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在南黎巴嫩暴力不断升级期间，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寻求美国批准一项军事反应，以便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赶出黎巴嫩，清除叙利亚的影响力，并让黎巴嫩基督教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上台掌权。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虽然可能并不清楚以色列的野心有多大，并且警告说只有在黑格自己所说的“国际普遍承认的挑衅”情况之下，以色列才可以采取行动，但是他在同以色列官员的会谈中却似乎有条件地赞同这项计划，说假定以色列要在某一时刻作出反应，就应该“像脑叶切除手术一样”迅捷。[110]虽然以色列最终在1982年6月入侵黎巴嫩——这并不符合黑格的标准，但是它那重组黎巴嫩国内政治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却走样了。虽然以色列国防军很快击溃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军队，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残余力量却在贝鲁特避难；而以色列国防军如果要清除他们，则需要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和导致对黎巴嫩平民的大规模伤害。美国特使菲利普·哈比卜（Philip Habib）最后协商出一项结束围困的协定，

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贝鲁特撤出。数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随后被部署到黎巴嫩，作为国际维和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杰马耶勒在9月的遇刺身亡，挫败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亲以政府的希望，因此以色列国防军让基督教民兵进入萨巴拉和沙提拉难民营，他们在那里开始屠杀大量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据估计屠杀的人数大致在700人至2000人之间。[111]结束黎巴嫩内部争斗和外国占领的不断努力失败了，而美国的人员则逐渐被拖入到这一正在加剧的黎巴嫩大漩涡之中。一名炸弹自杀者在1983年4月袭击了美国大使馆，结果导致63人被杀；10月的一次卡车炸弹袭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这一袭击致使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丧生，并为次年美国从黎巴嫩全部撤出铺平了道路。

尽管美国官员——包括里根总统本身——对以色列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感到心烦意乱，但他们却不打算因为以色列的行为而对其施以惩罚。里根确实曾在6月9日向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发去一封措辞尖锐的信函，要求他接受同叙利亚的停火建议，但那时候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叙利亚的目标已经完成，因而以色列同意该建议并不涉及很大的损失。[112]

历史学家、外交官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Itamar Rabinovich）指出，美国“尽管进行了口头抗议并做出其他姿态，偶尔会真的被激怒，但是却给予以色列政治支持，以便使之能够在这样异乎寻常的长时间里继续进行战争”[113]。

事实上，美国国会不是因为以色列侵略一个邻国而对它进行制裁，相反，却在1982年12月投票给以色列2.5亿美元额外的军事援助，这一结果遭到里根总统及其新上任的国务卿乔治·P.舒尔茨（George P.Shultz）的强烈反对。就像舒尔茨后来所回忆的那样：

在（1982年）12月初，……我听说追加贷款正在那届已是跛脚鸭的国会进行，以向以色列增加提供2.5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担保：这是在面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用集束炸弹，以及犯下萨巴拉和沙提拉难民营两次大屠杀罪行的情况下，向以色列提供的追加贷款！我们尽力阻止、艰难地尽力阻止这笔追加贷款。里根总统和我都私下里参加到这一阻止行动中，向参议员们和国会议员们打过无数的电话。12月9日，我在我的阻止行为中增加了一封正式反对的信件，信中说追加贷款似乎是在“支持和奖励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外交部长沙米尔称里根总统的反对是个“不友好的行动”，并且说“这一行动危害到和平进程”。国会就在我们眼皮底下通过了追加援助，好像里根总统和我压根就不存在一样。我既感到诧异，又感到沮丧。这活生生

的一幕使我切身感受到以色列在我们的国会里的影响力。我明白，如果我要处理任何可能影响到以色列的国会行动，如果我要在取得中东问题进展的努力中得到国会的支持，我就必须谨慎地同以色列人一道进行工作。[114]

然而，舒尔茨和里根不久就与国会一道随波逐流：由于关键的美国官员相信，同以色列的密切合作是影响以色列行为的唯一途径，因此1981年两国有关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一备忘录在以色列兼并戈兰高地之后被终止了——在1983年11月又得以恢复。[115]

美国同以色列站在一道的趋势，同时延伸到了和平谈判领域。在六日战争之后流产的和平努力，以及结束旷日持久的1970年战争的努力中，美国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在1972年发起进一步的和平倡议之前，美国同以色列进行磋商；而在进行他那十月战争之后“走一步看一步”的外交活动期间，基辛格从来就不能够向以色列施以很大的压力。基辛格在谈判期间一度抱怨道：“我要求拉宾作出让步，而他说因为以色列是个弱国，所以他不能这样做；因此我给他更多的武器，而后他却说因为以色列强大，所以他就不必作出让步。”[116]就像上面讨论过的那样，埃以脱离接触协议的产生，主要是通过保证对以色列增加美国援助，以及美国承诺在西奈半岛驻扎民事监察员而得以实现的。

同样的模式可以见诸克林顿政府处理1993年产生《奥斯陆协议》的谈判问题，以及1999年至2000年期间达成最终地位协议的并不成功的尝试之中。虽然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与其以色列的相应官员之间偶尔存在摩擦，但是美国却是使自己的立场同以色列紧密协调，总的来说支持以色列的和平进程方法，即使在美国代表对以色列的战略怀有严重保留态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17]根据以色列谈判人员罗恩·庞达科（Ron Pundak）——他是导致奥斯陆谈判的一位关键代表，以及随后的2000年戴维营最终地位会谈框架的设计者之一——的说法：“（美国）国务院传统的方法……是采用以色列总理的立场。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期间，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那时候的美国政府有时候似乎是在为以色列总理工作，因为国务院试图说服（施压）巴勒斯坦一方接受以色列的条件。在巴拉克的任期内，美国的这一倾向也很明显。”[118]

和平进程中的美国参与者作出类似的判断。根据克林顿总统的阿以事务特别助理、戴维营会谈的另一位参与者罗伯特·马利（Robert Malley）的说法：“（以色列）在戴维营提出的想法从未以书面形式进行陈述……它们总体上以美国而非以色列的概念加以呈现。”这一做法强调了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外交帮助所达到的程度，即使在美国被

认为是在充当中间协调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不让人吃惊规则”也制约着美国的谈判人员。马利将这一规则描述为“美国承诺，如果不是清楚的承诺，至少也是事先同以色列分享每个想法。由于巴拉克的战略是排除事先向任何人——包括美国总统——透露他的底线，因此他援引‘不让人吃惊规则’来反对大量他认为走得太远的美国建议。结果是美国（通常无意地）向以色列呈现了自己的那些谈判立场，将它们表述为以色列不能够超越的最低红线”[119]。阿伦·戴维·米勒（Aaron David Miller）曾担任过六位不同美国国务卿的中东和阿以事务顾问，他还是克林顿政府进行和平努力的另一位主要参与者。就像他在2005年谈判失败事后所说的那样，“有太多次，我们的作用……好像是以色列的律师。”[120]

结论

自1948年以色列成立以来，美国中东政策的许多重要因素已逐渐围绕着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承诺打转。就像我们将要在第二章中进行的详细讨论那样，这一倾向甚至随时间流逝而更加明显。注意以下以色列在美国盟友中所享有优势地位的最后一个标志：自1976年以来，六位以色列领导人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过讲话，这一数字比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讲话的次数总和都要多。[121]这或许是一个琐碎的标志，然而，考虑到这六位领导人所代表的整个国家人口在2007年还不足纽约人口的情况，那么这一标志是引人注目的。

伊扎克·拉宾的观点是正确的：美国对以色列的慷慨大方“在现代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开始是适度的慷慨，然后变成了无出其右的“特殊关系”。就像米切尔·巴德和丹尼尔·派普斯所说的那样：“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中最为异乎寻常的关系。”[122]

这种支持取得了一个积极目标：它有助于以色列的繁荣兴旺。对于许多人来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美国这些年来向以色列提供的全部支持的正当性。由于这一纪录，2003年6月进行的一次皮尤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结果因而就并不令人吃惊：在进行调查的21个国家——其中包括像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美国盟国——当中，其中20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或多数民众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太有利于以色列”。或许更加使人吃惊的是，以色列也有多数民众（47%）同意这种看法。[123]

虽然美国从其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以色列无可否认的成就中获得了大量利益，但是它的所给却大大高出它的所得。如果以色列是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生存和继续增长从根

本上来说使得美国更加安全，那么这种慷慨大方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存在着迫切的道德理论来对以色列维持如此高水平的物质援助和外交支持，那么这种慷慨大方也很容易解释。但是，情形并非如此。我们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表明，战略利益和道德动机，都不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继续给予以色列如此慷慨大方、毫无条件的支持。

---

[1] “Address by PM Rabin to the U.S.Congress-26-Jul-94，”以色列外交部，www.mfa.gov.il/MFA/Archive/Speeches，以及Benjamin Netanyahu，“Speech to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July 10，1996，”登录www.netanyahu.org/joinsesofusc.html。

[2] 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报道“海外贷款和拨款”的《绿皮书》（*Greenbook*），以色列在整个2005年从美国得到了1538.947亿美元（2005年价值不变的美元）。参见http：//qesdb.usaid.gov/gbk。

[3]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的说法，美国在1949年到1959年没有直接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参见Clyde Mark，“Israel：U.S.Foreign Assistance，”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April 26，2005，pp.13—14，Table 3。美国确实在1958年向以色列出售了100架无坐力反坦克炮，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作为以色列在1958年约旦危机问题上支持美国而得到的奖赏。 参见Warren Bass，*Support Any Friend*：*Kennedy's Middle East and the Making of the U.S.-Israeli Alli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51，以及Douglas Little，“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1957—196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25，no.4（November 1993）：566。据威廉·H.莫特四世（William H.Mott Ⅳ）报道，在以色列的独立战争（War of Independence）期间，以色列秘密地得到了额外的500辆半履带装甲车，并且还在1951年至1952年期间得到了一些额外的坦克。华盛顿还在1954年资助以色列购买法国战斗机，“这是美国对于法国军工业发展的军事援助的一部分”，并且在1955年也提供了类似的资助，即购买法国的“神秘”（Mystere）战斗机。因为法国曾经是这些资助的表面受益者，所以这些金额并没有归入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之中。莫特报道，在1946年至1955年期间，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总额达到了9450万美元，1956年至1965年期间又增加了1.891亿美元。参见William H.Mott Ⅳ，*United States Military Assistance*：*An Empirical Perspective*（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2002），pp.176—177。

[4] 参见Zach Levey，“Israel's Quest for a Security Guarantee from the United States，1954—1956，”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22，no.1/2（1995）。扎克·利维（Zach Levey）描述说，戴维·本-古里安对这一时期美国担保的好处持一种矛盾的心理。他虽然承认大国保护的价值，但是却担忧这可能削弱以色列的自治地位。利维还指出，某些以色列官员[其中最著名的是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将美国的担保看作是对本-古里安和其他人所支持的更加咄咄逼人的政策进行约束的一种方式。

[5] Michael Brecher，*Decisions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p.191—192，p.220.

[6] Avi Shlaim，*The Iron Wall*：*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New York：Norton，2001），pp.172—173.

[7] Ibid.，pp.178—185；Benny Morris，*Righteous Victims*：*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1881—2001*（New York：Vintage，2001），p.290，pp.297—300；Brecher，*Decisions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pp.282—303；Steven L.Spiegel，*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Making America's Middle East Policy from Truman to Reag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p.74—82，以及David Schoenbau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15—123.

[8] 根据沃伦·巴斯的说法：“肯尼迪政府……是美以关系中关键的一个总统任期，因为这是双方关系从1950年的冷漠交往，过渡到我们今天所见的全方位联盟的关键。”*Support Any Friend*，p.3。亚伯拉罕·本-泽维将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开始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特别是追溯到以色列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即美国保证支持那些受到“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中东国家），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等各种危机中对美国的支持。参见*Decade of Transition*：*Eisenhower*，*Kenned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Israel Alli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以及Little，“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9] 肯尼迪在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形容美国的承诺时显得更加谨慎。参见Bass，*Support Any Friend*，3，p.183，以及Spiegel，*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pp.106—107。

[10] 沃伦·巴斯指出，以色列游说集团（巴斯将以色列游说集团描述为“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的权力源”）在20世纪60年代并非那么有权有势；并且他说：“几乎没有证明文件表明，霍克防空导弹的销售是出于国内因素的考虑。”没有证明文件虽然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然而，美国总统们及其顾问一般都不可能承认重要的战略选择是出于国内因素的考虑来决定的。巴斯还承认，“当以色列（有关霍克防空导弹销售）观点的形成仅仅只是出于战略考虑的时候，结果并不明朗的中期选举——无论怎样悄无声息——本来几乎不会成为障碍”，他还进一步观察到，“肯尼迪是一个政治动物，并且他知道霍克防空导弹销售将只对亲以色列的选民和捐助者有益”。Bass，*Support Any Friend*，pp.145—150，也可参见Spiel，*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pp.106—110，以及Mordechai Gazit，*President Kennedy's Policy Toward the Arab States and Israel*（Tel Aviv：Shiloah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Studies， 1983）， pp.30—55。

[11] A-4天鹰战斗轰炸机的销售协议也是在此时签署的，虽然这批飞机是在7年之后才交货的。参见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 *The Arms Trade with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1）， p.532， p.535。

[12] 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6， p.13.

[13] 计算结果来自http：//qesdb.cdie.org/gbk/index.html网站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绿皮书》。

[14] 同上书，以及*The Military Balance 2006*（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06）。

[15] 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2， p.10，以及Matthew Berger， “Good News—and Bad—for U.S.Aid to Israel，” *JTA.org*， March 28， 2003。

[16] Edward T.Pound， “A Close Look at U.S.Aid to Israel Reveals Deals That Push Cost Above Publicly Quoted Figure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9， 1991.

[17]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外交、国防与贸易科的克莱德·马克的说法，以色列“从美国的援助项目中得到了其他国家无法得到的优惠待遇和特别利益”。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8.

[18] Jeremy M.Sharp， “U.S.Foreign Aid to Israel，” *Report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anuary 5， 2006， pp.5—6.

[19] 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p.8—9.

[20] “U.S.Assistance to Israel，”登录http：//telaviv.usembassy.gov/publish/mission/amb/assistance.html。

[21] Duncan L.Clarke， Daniel B.O'Connor， and Jason D.Ellis， *Send Guns and Money*：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U.S.Foreign Policy* （Westport， CT： Praeger， 1997）， p.24； 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10，以及Shirl McArthur，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of Total Direct U.S.Aid to Israel： ＄ 108 Billion，”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online）， July 2006， pp.16—17.

[22] Sharp， “U.S.Foreign Aid to Israel，” p.11.

[23] 虽然美国审计总署还发现，国防部曾经减免了以色列的终止责任要求（即购买者必须持有可以覆盖终止合同所需费用的数额），但是却相信，“由于有可能将对以色列继续进行援助，所以这一责任减免代表的是最低风险”。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Military Sales Cash Flow Financing.” GAO/NSIAD-94-1024，Washington， DC， February 8， 1994， p.3。

[24] 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8.

[25] 在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以色列国家页面（www.usaid.gov/policy/budget/cbj2007/ane/il.html）与美国其他重要援助国的页面进行比较时，反差明显是很强烈的。

[26] 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7.

[27] 美国国会研究处还报告说，有大约4%的保证金作为防止不还款的储备而放在国库账户里。对于100亿美元的贷款来说，这笔拨款总共达到4亿美元。参见Mark， “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3； Larry Nowels and Clyde Mark， “Israel's Request for U.S.Loan Guarantee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8， 1991，以及Sheldon L.Richma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Israeli Loan Guarantee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21*， no.2（Winter 1992）。

[28] 按照美国国会研究处马克的说法：“据统计，以色列每年从慈善业中得到了10亿美元，从长短期商业贷款中也得到了相同金额的10亿美元，并从以色列债券收益中得到了大约10亿美元。”参见Mark， “Israel：U.S.Foreign Assistance，” summary page。以色列国债通过以色列发展公司（Development Corporation for Israel， DCI）在美国售卖，这些债券禁止转让，被以色列政府看作一种“稳定的海外借款来源，以及维系海外犹太人纽带的重要机制”。虽然从1951年至1989年的平均利率为4%（随着美国财政部利息在1980年后急剧上升，这一利率意味着大量的“爱国的折扣”），但是“近几年来以色列发展公司的债券供给却必须向市场价格变动了”。据报道，2006年的以色列债券销售额达到了12亿美元，而通过出售这些债券所积累下来的总资金现已超过250亿美元。参见Suhas L.Ketkar， “Diaspora Bonds： Track Record and Potential，”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August 31， 2006，以及 Avi Krawitz， “Israel Bonds Raises ＄ 1.2 billion in 2006，”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10，2006。

[29] Dale Russakoff， “Treasury Finds Bite in Israel Bonds； 1984 Law Places New Tax on Artificially Low Interest Rate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2， 1985； “Tax Report，”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0，1986，以及Russell Mokhiber， “Bonds of Affection，” *Multinational Monitor* （1988），登录http：//multinationalmonitor.org/hyper/issues/1988/04/mm0488_10.html。

[30]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的说法，如果要获得减税的资格，纳税人就必须向“在一个以色列法律条件下创建并被认可为慈善机构的组织进行捐赠。假如该组织在美国法律许可下得以创建，减少的税额将在允许的情况下实施，但限制在（纳税人）以色列所得总收入的25%”。“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Publication 526， U.S.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p.3，登录www.irs.gov/pub/irs-pdf/p526.pdf。墨西哥和加拿大似乎是仅有的、有着类似规定的另外两个国家。

[31] 独立前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获得武器所作的秘密努力，在以下这本书中有所叙述：Leonard Slater， *The Pledg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0）。

[32] Shimon Peres， *Battling for Peace*： *A Memoi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p.119；Michael Karpin， *The Bomb in the Basement*： *How Israel Went Nuclear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pp.135—137，以及Avner Cohen， *Israel and the Bomb*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67， p.70。

[33] 以色列国防军之友，“Mission Statement，”登录www.israelsoldiers.org，以及Aimee Rhodes， “New York Dinner Raises ＄ 18m for IDF，” *Jerusalem Post*， April 3， 2007。

[34] 就像一本耶路撒冷银行以色列慈善事业指南最近所建议的那样，“虽然管理美国对外慈善援助的法律一直存在，但是这些法律都是模糊的，并且结果很少执行。来自个人以及美国501c（3）法规规定中的公司**501c**是美国国内税收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中的一条规定，其中列举了**28**类非营利组织可免除某些联邦收入税。——译者注[American 501c（3） corporations]对以色列的慈善捐赠是不受监控的，而且这些捐赠的最终用途是难以跟踪和确定的”。该指南警告说，2001年9月11日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Bank of Jerusalem，“Help Them Help You： A Recommendation for the Israeli Charity，”登录www.bankjerusalem.co.il/indexE.php？page＝588（accessed March 28， 2007）。

[35]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1967—1977*（New York： Times Books/Henry Holt， 2006）， pp.218—219.类似地，据报道以色列政治学家戴维·纽曼（David Newman）曾将以色列犹太人代理处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这两个机构，描述为“在同一把伞下面”进行运作，“因为它们的官员相同、部门相同、对活动进行监督的管理人员相同”。参见Amy Teibel and Ramit Plushnick-Masti，“As Israel Leaves Gaza， Bill for Its Settlement Ambitions Is Shrouded in Mystery，”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10， 2005。

[36] Nathaniel Popper， “Jewish Officials Profess Shock over Report on Zionist Body，” *Forward*， March 18， 2005，以及“Summary of the Opinion Concerning Unauthorized Outposts”（the Sasson Report），登录www.fmep.org/documents/sassonreport.html。

[37] “U.S.Tax-Exempt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to Israel： Donations， Illegal Settlements， and Terror Attacks Against the US，” *Middle East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Note*， October 5， 2005，登录www.irmep.org/tec.htm。

[3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for September 2006，”登录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6/02/data/index.aspx。

[3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6），登录http：//hdr.undp.org/hdr2006/statistics； and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05 Quality of Life Rankings，”登录www.economist.com/media/pdf/QUALITY_OF_LIFE.pdf。

[40] Mitchell G.Bard and Daniel Pipes， “How Special Is the U.S.-Israel Relationship？” *Middle East Quarterly*4， no.2（June 1997）： 43.

[41] Bishara A.Bahba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s Energy Securit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11，no.2（Winter 1982）： pp.118—130.协议的初始文本，参见“Israel-United State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eptember 1， 1975”，以及“Memorandum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Israel—Oil，”登录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Peace/mou1975.html和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Peace/cdoilmou.html。也可参见“Oil from Iraq： An Israeli Pipedream，” *Jane's Middle East/Africa Report*， April 16， 2003，登录www.janes.com/regional_news/africa_middle_east/news/fr/fr030416_1_n.shtml。

[42] William B.Quandt， *Camp David*： *Peacemaking an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6）， p.313； Spiegel，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pp.371—372； Moshe Dayan， *Breakthrough*：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Egypt-Israeli Peace Negotiations* （New York： Knopf， 1981）， pp.274—276；“Israel： Oil Supply Arrangement，” Memoranda of Agreement， United States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Series 9533， 30 UST 5994（Washington， DC， March 1979）， pp.5989—5996； Judith Miller， “Israel Pressing U.S.on Oil Sales Accord，” *New York Times*， August 17， 1980，以及Steven Rattner， “U.S.and Israel Reach Agreement on Oi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1980。

[43] USAID， “Greenbook.”

[44] Alfred Prados， “Jordan： U.S.Relations and Bilateral Issue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anuary 9， 2002，以及USAID，“Greenbook”。

[45] 1975年的以美相互理解备忘录承诺，华盛顿“竭尽全力对……以色列军事以及防御装备的需求作出全面回应”，并且“继续通过先进设备的供给来维持以色列的防御力量”。

[46] Sharp，“U.S.Foreign Aid to Israel，” p.1.

[47] David Rogers and Edward T.Pound，“How Israel Spends ＄ 1.8 Billion a Year at Its Purchasing Mission in New York，”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0， 1992.

[48] 美国国防安全援助局（Defense Security Assistance Agency， DSAA）在1998年更名为美国国防安全协作局。

[49] 按照美国审计总署的说法，“其他国家主要采用政府对政府这种途径进行采购，而以色列则采用商业合同来进行他们的99%的采购……通过采用商业采购途径，以色列可以避免美国国防部对对外军售（FMS sales）征收3%的管理费”。对于向以色列进行商业销售，政府的监管和批准指南也更宽松。“在以色列收到对外军售的资金之前，并不要求美国国防安全援助局对金额介于5万美元到50万美元的合同和采购订单进行审查”，而且“美国国防安全援助局对金额在5万美元以下的合同和采购订单不进行审查”。进而言之，美国国防安全援助局这种非同寻常的管理以色列项目的方式和工作人员配置上的限制，使得对完全执行协议的……敏感内容进行报告变得复杂化。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Security Assistance： Reporting of Program Content Changes，” GAO/NSIAD-90115， Washington， DC， May 1990， pp.8—9， p.14。

[50] 引自Steven Pearlstein，“U.S.Military Office Defends Israeli Aid； Closer Scrutiny of Program Described as Unnecessary，” *Washington Post*， July 30， 1992。也可参见David Rogers and Edward Pound，“The Money Trail： U.S.Firms Are Linked to an Israeli General at the Heart of a Scandal，”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0， 1992； Rogers and Pound，“How Israel Spends ＄ 1.8 Billion”； Joel Brinkley，“Israeli General Pleads Guilty in Bribery Case，”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1991； Hillel Kuttler，“U.S.Defense Procurement Faults Led to Dotan Affair，” *Jerusalem Post*， August 12， 1993，以及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Foreign Military Aid to Israel： Diversion of U.S.Funds and Circumvention of U.S.Program Restrictions，” GAO/T-OSI-94-9， Washington， DC， October 1993。

[51] 2004年在拉维（狮子）多用途战斗机、梅卡瓦坦克、箭式导弹，以及其他项目上的花费总额达26.8亿美元。

[52] Dov S.Zakheim，*Flight of the Lavi*： *Inside a U.S.-Israeli Crisis* （Washington， DC： Brassey's， 1996）. 达夫·S.扎克海姆（Dov S.Zakheim）是里根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和富有经验的国防分析师。虽然他也是个正统派犹太人犹太人按着他们对旧约礼教法典严格恪守的程度，可分为正统派犹太人（**Orthodox Jew**），不重法典只重伦理的改革派犹太人（**Reformed Jew**），以及居间的保守派犹太人（**Conservative Jew**）。正统派犹太人最易分辨，他们穿戴全黑，男人蓄有黑色卷曲络腮胡子。他们的少年人头顶一块比我们熟知的瓜皮帽小很多的圆盖（**Kipah**）。他们具有最强烈的民族骄傲感，对法典的恪守也严谨到外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他们最大的羞辱就是成为“外邦人”，若是家族中年轻一代有人信了基督教，或是与“外邦人”通婚，那么家族会悲恸地为他举办丧礼，宣告他在家族中的死亡。——译者注（Orthodox Jew）和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对拉维（狮子）多用途战斗机项目真正费用评估所进行的坚决努力，并最终导致这一项目的取消，使他的品性受到反复的攻击。事实上，他报告说，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Moshe Arens）曾一度称他为“家族的叛徒”。参见See xv， pp.256—257，也可参见Duncan L.Clarke and Alan S.Cohen，“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Lavi Fighter，” *Middle East Journal*40， no.1（Winter 1986），以及James P.DeLoughr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AVI，” *Airpower Journal*4， no.3（Fall 1990）。

[53] Mark，“Israel： U.S.Foreign Assistance，” p.8； Carol Migdalovitz，“Israel： Background an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31， 2006， p.19，以及Duncan L.Clarke，“The Arrow Missi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Strategic Cooperation，” *Middle East Journal*48， no.3（Summer 1994）。

[54]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Israel on Strategic Cooperation，” November 30， 1981，张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阿瓦隆项目（Avalon Project at Yale Law School，）阿瓦隆项目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有关法律、历史和外交数字化文件图书馆的名称。——译者注的网页上，登录www.yale.edu/lawweb/avalon/mideast/pal03.htm。

[55] 作为美国法典第十卷（武装力量）[U.S.Code Title 10（Armed Forces）]的组成部分，国会在1988年确立了主要的非北约“盟国”的称谓。参见Subtitle A， Part IV， Chapter 138， Subchapter II， Section 2350a，有关以色列的称谓，参见Migdalovitz，“Israel： Background and Relations，” p.19。

[56] Yitzhak Benhorin，“US to Double Emergency Equipment Stored in Israel，” *Ynetnews.com*， December 12， 2006.

[57] （夏伊·）费尔德曼也指出，对美国来说，把这些装备从以色列转移到它最有可能进行军事部署的地区——波斯湾，将是困难而昂贵的。参见Shai Feldman，*The Future of U.S.-Israel Strategic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1996）， pp.45—46。也可参见 Clarke et al.，*Send Guns and Money*， pp.162—163。

[58] Benhorin，“US to Double Emergency Equipment.”

[59] 这些发展记载在这些作品中：Spiegel，*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pp.410—411；Migdalovitz，“Israel：Background and Relations，”pp.18—19；Bard and Pipes，“How Special Is the U.S.-Israel Relationship？”Clyde Mark，“Israeli-United States Relations，”*Issue Brief for Congres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November 9，2004，pp.9—10，以及Schoenbau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pp.280—281。

[60] Jeffrey T.Richelson and Desmond Ball，*The Ties That Bind*：*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KUSA Countries*（Boston：Unwin Hyman，1990），p.173，p.304；Jeffrey T.Richelson，“The Calculus of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4，no.3（Fall 1990）：314，以及Benjamin Beit-Hallahmi，*The Israeli Connection*：*Who Israel Arms and Wh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7），pp.40—41。

[61] Jeffrey T.Richelson，*The U.S.Intelligence Community*，2nd ed.（Cambridge，MA：Ballinger，1989），pp.275—277，以及Seymour Hersh，*The Samson Option*：*Israel's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Random House，1991），pp.3—8。

[62] Ephraim Kahana，“Mossad-CIA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14，no.3（July 2001）：416.

[63] Robert Norris et al.，“Israeli Nuclear Forces，2002，”*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58，no.5（September/October 2002）：73—75，以及“Israel Profile：Nuclear，”*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登录www.nti.org/e_research/profiles/Israel/Nuclear/index.html。

[64] Bass，*Support Any Friend*，p.198，p.206.

[65] Ibid.，p.216，p.219，p.222.

[66] 引自Karpin，*Bomb in the Basement*，p.237。

[67] Cohen，*Israel and the Bomb*，p.193.白宫助理罗伯特·科默（Robert Komer）后来声称，虽然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作出向以色列提供美国武器的决定，乃是刻意说服耶路撒冷不要寻求核武器努力的一部分，但如果这是实际上的目的，那它明显是失败的。就像迈克尔·卡尔平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既要迪摩纳的‘产品’（即核武器），也要美国的进攻性武器。而这正是以色列最终所得到的东西。”*Bomb in the Basement*，p.238.

[68] Bass，*Support Any Friend*，p.252.

[69] Hersh，*Samson Option*，pp.188—189.（沃伦·）巴斯将约翰逊总统解决以色列迪摩纳核武器问题的方法，描述为“愿意满足于相互容忍的口是心非的程度”。*Support Any Friend*，p.252.

[70] Avner Cohen，“Israel and Chemical/Biological Weapons：History，Deterrence，and Arms Control，”*Nonproliferation Review*8，no.3（Fall—Winter 2001）.

[71] 在某些年份里，虽然苏联对古巴的援助金额与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金额一样庞大（大约每年30亿美元），但这些援助是用美元与比索的汇率来进行估价的，因而高估了苏联援助的总额。由于古巴的人口大约是以色列的两倍，所以苏联对古巴的人均援助额实质上低于美国对以色列的人均援助额；而且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时间要比莫斯科资助哈瓦那的时间更长。卡斯特罗也是一个更加驯服的代理人。就像乔根·多明古茨（Jorge Dominguez）所指出的那样：“古巴并不反对苏联的利益；它在行使自治权的时候不忘记与苏联的利益保持一致。在一些关键时刻，比如苏联入侵阿富汗，古巴采取了有损本国利益的政策。……甚至在苏联的国内政策与古巴自己的政策相左时，古巴对莫斯科的批评也是小心谨慎的。苏联的严厉霸权因而对古巴的自治形成了真正重要的制约。”*To Make a World Safe for Revolution*：*Cuba's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11 and Appendix B.

[72] Quandt，*Peace Process*，p.249.某些资料来源声称，贝京事实上并没有食言，因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他并没有发起对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的讨论，但却只是在美国国会议员向他询问此事时对这一销售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显然，在里根的回忆录中，这位前总统并没有发现对贝京行为的解释具有说服力。“我不喜欢让一个外国——任何一个外国——的代表，试图干涉我们的国内政治进程以及我们外交政策的制定……我感觉他（贝京）食言了，并且我对此感到气愤。”Ronald Reagan，*An American Life*（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0），p.412，pp.414—416.

[73] 联合国242号决议的英文文本在下面这本书中被重印：*The Arab-Israeli Conflict*：*Readings and Documents*，ed.John Norton Moo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1083—1084。也可以参见David Pollock，*The Politics of Pressure*：*American Arms and Israeli Policy Since the Six Day War*（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2），p.74。

[74] 尽管1968年以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升级，但是美以关系却经常因为这两个因素受到制约：有关美国对以色列军事支持水平的争议，以及以色列不愿接受各种各样的调停者所提出的任何和平建议。然而，美国为了迫使以色列作出让步而采取武器限制的努力，总的来说是失败的，而且这些让步是通过保证提供额外的支持而赢得的。参见William B.Quandt，*Decade of Decisions*：*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1967—*

1976（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97—98， 100—102； Pollock， *Politics of Pressure*， pp.74—77； Brecher， *Decisions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pp.487—488， 493—496，以及Spiegel，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pp.190—191。

[75] 引自Brecher， *Decisions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p.493。

[76] 这些数额是以200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的。USAID，“Greenbook”。

[77] Shlaim， *Iron Wall*， pp.603—605.

[78] Dennis Ross， *The Missing Peac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Fight for Middle East Pea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4）， p.478.

[79] 本-泽维继续写道：“1996年至1999年期间，华盛顿与耶路撒冷的战略关系继续得到拓展……拓展的内容包括战时在以色列预置武器和弹药，以及发展包括箭式导弹、鹦鹉螺高能战术激光武器（Nautilus）和加速阶段拦截（Boost Phase Intercept）在内的反导弹系统。两国定期在像联合政治军事规划小组、联合安全援助规划小组和联合经济发展小组这样的小组中会晤。事实上，美国以色列联合委员会的战略规划……如期于1999年2月21日召开，尽管以色列决定取消怀伊河协议中所规定的重新部署。”“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The Netanyahu Era，” *Strategic Assessment* （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Tel Aviv University）2， no.2（October 1999）。

[80] 关于对福特命运的重新评估，参见Quandt， *Decade of Decisions*， pp.267—271； Edward Tivnan， *The Lobby*： *Jewish Political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p.89； Charles McC.Mathias Jr.， “Ethnic Groups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59， no.5（Summer 1981）： 992—993，以及Spiegel，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p.296。

[81] 卡特后来回忆道：“我认为贝京用那该诅咒的定居点蓄意破坏了整件事情（《戴维营协议》）。他知道他撒谎了。离开戴维营不到12小时，他就受到了巨大的（国内）压力……当我们离开戴维营时，我们对过渡期间无任何协议没有异议。在过渡期间，我们将对最后和平协议进行谈判。这是绝对完全达成共识的。”引自Kenneth W.Stein， *Heroic Diplomacy*： *Sadat*， *Kissinger*， *Carter*， *Begin*， *and the Quest for Arab-Israeli Pea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256。

[82] 克林顿怒火的爆发引自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 “Camp David： The Tragedy of Error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9， 2001， p.60。

[83] William B.Quandt， *Camp David*： *Peacemaking an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6）， pp.103—104.

[84] Sharp， “U.S.Foreign Aid，” p.4.

[85] Itamar Rabinovich， *The War for Lebanon*， *1970—1985*， rev.ed.（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38—143.

[86] William B.Quandt， *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3rd ed.（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p.307—310，以及Glenn Frankel， *Beyond the Promised Land*： *Jews and Arabs on the Hard Road to a New Israe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p.301—304。

[87] 以色列在1991年、1993年和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9%、 2.5%和2.7%。“Sources of Population Growth： Total Israeli Population and Settler Population， 1991—2003，” 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 Washington， DC，登录www.fmep.org/settlement_info/stats_data/settler_population_growth/sources_population_growth_1991_2003.html。

[88] 虽然苏联/俄罗斯在1946年至1985年期间使用过119次否决权，但自那以后却只使用过4 次。美国直到1970年才第一次使用否决权，但到2007年3月为止，它却总共使用了82次否决权。“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Use of the Veto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Global Policy Forum，登录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data/vetotab.htm。

[89] 这一立场变成了人们所知道的“内格罗蓬特主义”。参见Michael J.Jordan， “Symbolic Fight for Israel at U.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8， 2003。

[90] 美国对安理会谴责以色列的两项决议案投了赞成票，即谴责以色列于1953年对凯比亚村（Qibya）的血腥攻击沙龙率领**101**部队于**1953**年**10**月袭击了位于约旦河西岸约旦控制区内的凯比亚村（**Qibya**），杀死了**70**余名巴勒斯坦平民，其中还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译者注，以及于1981年对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袭击。它也在1990年对联合国672号决议和681号决议案投了赞成票，这两项决议案批评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驱逐巴勒斯坦人。美国于1985年对联合国573号决议案投了弃权票，该决议案谴责以色列轰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突尼斯的总部，并于1996年对联合国1073号决议案投了赞成票，该决议案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附近修建一条隧道表示关注。

[91] 联合国的投票纪录可登录http：//unbisnet.un.org：8080。联合国大会关于以色列的决议案，以及部分的投票记录，登录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UN/gatoc.html。

[92] Marc Perelman，“International Agency Eyes Israeli Nukes，” *Forward*，September 5，2003.

[93] 迈克尔·B.奥伦在《六日战争：1967年6月与现代中东的形成》[*Six Days of War*：*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一书中，虽然提供了对六日战争范围广泛的研究，但却毫无疑问是亲以色列的报道；对此进行令人信服的纠正，参见Roland Popp，“Stumbling Decidedly into the Six Day War，” *Middle East Journal*60，no.2（Spring 2006）。对此进行更为平衡的最新处理的另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的观点，参见Tom Segev，*1967*：*Israel*，*the War*，*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trans.Jessica Cohen（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7）。

[94] 所引用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的话，参见Spiegel，*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p.141；约翰逊总统对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发表的评论，引自Popp，“Stumbling Decidedly into the Six Day War，” p.304。罗兰·波普（Roland Popp）还指出，“美国政府内几乎没有人对此怀有任何疑问，即以色列（关于迫在眉睫的阿拉伯国家攻击）的警告是子虚乌有的”（p.302），而且威廉·匡特还报告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曾告诉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说，他们“确信如果敌对行动开始，不管是谁先发起攻击，以色列将轻易取胜”。*Decade of Decisions*，p.50.

[95] 以色列政府5月25日向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和派驻华盛顿的大使阿夫拉姆·哈曼（Avraham Harman）发电报，声称阿拉伯国家的攻击迫在眉睫，并要求他们寻求美国的迅速承诺，即把对以色列的攻击看作对美国本身的攻击一样。但是汤姆·塞戈夫指出：“以色列在同一个晚上的情报评估，与传到华盛顿的信息完全不同……艾希科尔（总理）显然试图误导埃班，并通过埃班来误导约翰逊总统，以确保得到美国的支持。在一份发给哈曼的电报上，艾希科尔亲笔写道：‘一切都是为了制造托词。’”

[96] 约翰逊在5月26日晚会见埃班时给了他一份备忘录，备忘录的结尾写道：“我必须强调，没有必要使以色列本身对敌对行动的开始承担责任。以色列将不会被孤立，除非它决定这样做。我们无法想象以色列将作出这个决定。”引自Brecher，*Decisions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p.393。约翰逊在5月28日致艾希科尔的信重复了类似的警告。

[97] 用威廉·匡特的话来说，当约翰逊“于6月5日上午被战争已经开始的消息惊醒时，他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惊讶。毕竟，他已采取步骤向以色列人保证，5月26日的‘红灯’已变成黄灯……他在6月3日向（以色列总理利维·）艾希科尔的信中暗示，‘黄灯’的意思是要‘小心’，‘如果遇到麻烦，别指望美国’。这一观点在（阿贝·）福塔斯[（Abe）Fortas]和（阿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的评论中得到重申。但是，大多数驾车人都知道，黄灯等同于绿灯”。匡特还指出：“虽然约翰逊并未向以色列人大开绿灯，但他对以色列人的行动已撤销了自己的否决权。”*Peace Process*，p.38，pp.41—42，以及Cheryl Rubenberg，*Israel and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6），p.120.

[98] 在对奥伦的《六日战争》一书进行评论时，匡特指出：“约翰逊（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单独采取行动，并在一段时间内他的确说到做到。到5月底的时候，他显然已经改变了主意。以色列人迅速意识到这一变化，而当他们决定进行战争的时候，这一变化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约翰逊为什么如此犹豫不决，然后他为什么却对以色列采取了强硬路线，或者为什么他后来改变了主意。”“Book Review：Six Days of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6，no.4（Summer 2004）：147.对约翰逊施加的其他压力，包括写信运动，参见Segev，1967，pp.253—254，264—265，304。

[99] Quandt，*Peace Process*，pp.43—44.

[100] 1967年6月8日，在六日战争进行中，以色列飞机和鱼雷舰袭击了西奈半岛外公海区的美海军情报船只自由号（USS Liberty）。这次袭击打死34名美国水兵，并对自由号情报船造成了严重损坏。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声称，这次袭击是基于错误识别而导致的意外事件，并向美国道歉和赔付了1300万美元。遭到这次袭击的幸存者、其他美国海军军官，以及许多美国官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都相信，这次袭击是蓄意而为的；主张这个观点的人还认为，随后的调查是草率而不全面的。其他评论者则对以色列有关该事件的说法进行辩护，并把袭击看成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对此进行的不同叙述，参见James Bamford，*Body of Secrets*：*Anatomy of the Ultra Secret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ew York：Random House，2002）；A.Jay Cristol，*The Liberty Incident*：*The 1967 Attack on the U.S.Navy Spy Ship*（Washington，DC：Potomac Books，2002）；James M.Ennes Jr.，*Assault on the Liberty*：*The True Story of an Israeli Attack on an American Intelligence Ship*（Gaithersburg，MD：Reintree Press，2003）；Oren，Six Days of War，pp.263—271，以及Segev，1967，p.386。

[101] 有关（1967年至1970年期间的）消耗战外交的总结，参见Lawrence Whetten，*The Canal War*：*Four-Power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Cambridge，MA：MIT Press，1974）。那些有益于以色列人的观点包括Ya'acov Bar-Siman-Tov，*The Israeli-Egyptian War of Attrition*，*1969—197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以及Jonathan Shimshoni，*Israel and Conventional Deterrence*：*Border Warfare from 1953 to 1970*（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chap.4。

[102] Quandt，*Decade of Decisions*，p.147.也可参见Pollock，*Politics of Pressure*，pp.112—114，124，126—127，以及Brecher，*Decisions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p.510。

[103] Henry 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Boston：Little，Brown，1982），p.468.

[104] 通过帮助以色列在战场上占得上风，尼克松和基辛格设法说服埃及和叙利亚接受停火，并认识到苏联支持的局限性。参见Quandt，*Peace Process*，pp.113—115，118。

[105] Stein， *Heroic Diplomacy*， pp.78—79.

[106] Ibid.， p.86， p.90； William Burr， ed.， *The October War and U.S.Policy* （Washington， DC：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October 7， 2003），以及Quandt， *Peace Process*， p.118。

[107] “Kissinger Gave Green Light for Israeli Offensive Violating 1973 Cease-Fire，”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新闻稿，2003年10月7日，以及Quandt， *Peace Process*， p.120， p.461nn62， 63。肯尼思·斯坦报告说：“基辛格告诉以色列领导人，如果他们的意图是用饥饿来迫使埃及第三军就范，那么美国将‘与他划清界限’。但基辛格并没有告知以色列人不要加强他们在军事上的优势。达扬需要另外的72个小时，而基辛格则对此加以默许。”斯坦还指出：“由于以色列不受惩罚和得到基辛格的许可——尽管萨达特对此并不清楚，但是以色列却违反了停火决议。”*Heroic Diplomacy*， p.92.

[108] “U.S.-Israe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eptember 1， 1975.”国会立法（Section 535， P.L.98—473， October 12， 1984）增加的规定，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放弃恐怖主义”。参见Clyde Mark，“Palestinians and Middle East Peace： Issu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24， 2002， p.2。

[109] Shlaim， *Iron Wall*， pp.337—340.就像史蒂文·施皮格尔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此也允诺了一项同以色列一致的统一战略，从而限制了美国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独立对话的能力。”*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p.302.有关国会在1984年的行动，参见Clyde Mark， “Israeli-United States Relation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28， 2005， p.9。

[110] 战争的借口是对以色列驻伦敦大使的暗杀企图。这一行动完全缺乏黑格所要求达到的标准，它既同以色列—黎巴嫩边界线的局势毫无关系，也不是由亚西尔·阿拉法特或法塔赫下令进行的，而是由阿布·尼达尔（Abu Nidal）领导的巴勒斯坦持不同政见团体所为。就像施罗姆·本-阿米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应该知道，当他在与沙龙谈话中使用不必要的含糊不清的语言时，以色列政治家们对其中的细微差别和未尽之意并不是特别敏感”。参见Ben-Ami， *Scars of War*， p.179； Quandt， *Peace Process*， pp.250—251； Ze'ev Schiff， “The Green Light，” *Foreign Policy*50（Spring 1983）； Ze'ev Schiff and Ehud Ya'ari， *Israel's Lebanon War*， trans.Ina Friedman（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 pp.71—73； Avner Yaniv， *Dilemmas of Security*： *Politics*， *Strategy*， *and the Israeli Experience in Leban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02—103， 105，以及James McCartney， “Officials Say Haig Let Israel Think U.S.Condoned Invasion of Lebanon，” *Philadelphia Inquirer* （online）， January 23， 1983。

[111] Shlaim， *The Iron Wall*， p.416.

[112] 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指出，到停火开始生效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成功地击败了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并限制了遭遇战的范围……同样重要的是，叙利亚因寻求早早停火而任由以色列将战争重点放在贝鲁特。在停火之后的那些日子里，以色列部队继续往前挺进到南贝鲁特和东贝鲁特，并且通过黎巴嫩前线的军队建立了领土上的联系”。*War for Lebanon*， p.138.

[113] 拉宾诺维奇继续说道：“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在6月下半月捉摸不定的贝鲁特形势的情况下，维持那项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这些困难……诱使美国政府明显拉开了自己同以色列的距离，但却并没有改变其政策的本质。” Ibid.， p.146.

[114] George P.Shultz， *Turmoil and Triumph*： *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 （New York： Scribner， 1993）， p.112.

[115] Quandt， *Peace Process*， pp.258—259.

[116] 引自Edward R.F.Sheehan， *The Arabs*， *Israelis and Kissinger*： *A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Pleasantville， NY： Reader's Digest Press， 1976）， p.199。

[117] 在美国谈判代表丹尼斯·罗斯对和平进程的叙述中，他提供了大量有关克林顿政府适应埃胡德·巴拉克总理偏好的谈判策略的例子，特别是为同叙利亚达成一项和平协议方面所做的并不成功的努力。参见Ross， *Missing Peace*， pp.530—532， 539， 550—551， 578—580。而就像阿加（Agha）和马利（Malley）在他们有关戴维营的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不过最终在几乎所有这些不可靠的战术判断上，美国要么是放弃、要么是退让，结果是出于对巴拉克正试图做的那些事情的尊重，美国不情愿地默许他做那些事情。”“Camp David： The Tragedy of Errors，” p.60.

[118] Ron Pundak， “From Oslo to Taba： What Went Wrong？” *Survival*43， no.3（Autumn 2001）： 40—41。

[119] Agha and Malley， “Camp David： The Tragedy of Errors，” pp.62—63.

[120] “Lessons of Arab-Israeli Negotiating： Four Negotiators Look Back and Ahead，” 2005年4月25日中东研究所小组讨论副本；Nathan Guttman， “U.S.Accused of Pro-Israel Bias at 2000 Camp David，” *Ha'aretz*， April 29， 2005，以及Aaron D.Miller， “Israel's Lawyer，” *Washington Post*， May 23， 2005。

[121] “A History of Foreign Leaders and Dignitaries Who Have Addressed the U.S.Congress，”登录http：//clerk.house.gov/art_history/art_artifacts/foreignleaders.html。第一位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的以色

列领导人是1976年的伊扎克·拉宾；同期在国会多次会议上发表演讲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包括印度（4次）、爱尔兰（3次）、意大利（3次）及韩国（3次）。如果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间）开始算起，以色列同法国和意大利一道，各有6次。

[122] Bard and Pipes， “How Special Is the U.S.-Israel Relationship？” p.41.

[123] 被问及的问题是：“你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有什么看法——你认为这些政策公平吗，或者说它们太过偏袒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人？” 参见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Washington， DC：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2003）， p.5，以及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Wave 2 Update Survey； 21 Publics Surveyed， Final Topline（2003），” T-151，登录http：//pewglobal.org/reports/pdf/185topline.pdf。

第二章 以色列：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担？

如果美国给予以色列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支持，提升了美国的总体战略利益，那么这将使人能够容易理解这种支持。例如，如果美国对那些华盛顿先前认为的敌对国家采取的是一种含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那么这种对以色列的慷慨援助就可能是正当的；如果美国得到大量的利益回报，如果这些利益的价值超过了美国所付出的经济、政治成本，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就可能是有意义的；如果以色列拥有关键的自然资源——如石油或天然气，或者说如果以色列占据关键的地理位置，那么为了与之维持良好关系或使之不为敌手所控制，美国就可能要向其提供支持；简言之，如果以色列有助于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或更加繁荣，那么就容易解释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如果美国支持以色列使美国在世界上赢得额外的朋友、不会削弱美国与其他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就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并不使人感到吃惊的是，那些赞成美国给予以色列慷慨支持的人，一直在进行诸如此类的辩解。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像斯蒂文·斯皮格尔和A.F.K.奥根斯基（A.F.K.Organski）那样的学者认为，以色列已经成为冷战中的主要战略资产，认为由于美国的慷慨援助所产生的利益，这种援助是一项交易。[1]就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华盛顿的代表海曼·布克班德在1984年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竭尽所能地帮助人们理解，对以色列的帮助也符合美国的利益。"[2]今天，最具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宣称，美国与以色列具有"深厚的战略伙伴关系，目标是针对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并且说美以在国防和国土安全上的合作被"证明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其重要性在日益增加"。[3]新保守派的美国新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称以色列"是美国反击国际恐怖主义最坚定的盟友"，而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JINSA）则说，"美以战略合作是美国全球安全平衡中至关重要的因素"。[4]根据以色列沙勒姆中心（Shalem Center）研究员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WINEP）研究员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的说法，美国之所以支持以色列，不是因为"对大屠杀的愧疚或共有的民主价值"，而是因为对以色列的援助"支撑着东地中海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并且"为维持中东部分的秩序"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方式"。[5]以色列战略家埃弗雷姆·因巴尔（Efraim Inbar）同意这种说法，并宣称："由于以色列的战略位置和政治稳

定，以及它的技术和军事资产，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作为重要战略盟友的原因非常充足。”[6]

美国对这个犹太国家进行广泛支持的战略理论，并非将这一政策描绘为慈善行为或道德责任，当然也不是国内游说的结果。[7]相反，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被说成是反映了美国的全面战略利益：美国之所以支持以色列，是因为这样做被认为使得全体美国人更加安全。

我们在本章中揭示，这种观点从最好的方面来说是过时的，而从最坏的方面来说则根本是错误的。对以色列的支持在过去可能产生过战略利益，但在最近这些年里，支持以色列的经济和外交成本增加了，而所带来的利益则大大减少。事实上，以色列不是美国的战略资产，相反，它已经成为战略负担。强烈地支持以色列使得美国更加脆弱，使美国在取得重要而紧迫的外交目标方面更加艰难。对于美国来说，虽然有着引人注目的理由来支持以色列的生存和保持对以色列生存的承诺，但是，美国目前对以色列支持的程度，以及这种基本上无条件进行支持的特性，却不能够以战略理由来使之正当化。

一开始，我们来评估一下以色列在冷战期间的作用，因为认为以色列是战略资产的说法在这一时期最具说服力。然后我们来考虑一下苏联解体后所沿用的这种观点——具体而言，使得支持以色列正当化的这种观点，是因为两个国家共同面临国际恐怖主义和一伙“流氓国家”的威胁。我们的研究显示，这种观点并不能够为给予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提供可信的战略理论。

帮助遏制苏联熊

当以色列于1948年成立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它当作战略资产。这个新的国家被认为是弱小的，并且可能是易遭受攻击的；而且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承认，把以色列抱得太紧将削弱美国在中东其他地方的地位。杜鲁门总统之所以支持联合国的分治计划并承认以色列的地位，不是出于战略动机，而是出于他对犹太人遭遇的真切同情，出于他的宗教信念——允许犹太人回到他们古代的家园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出于他意识到对以色列的承认会得到美国犹太人强烈的支持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国内政治利益。[8]与此同时，包括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内的几位高级顾问则反对杜鲁门的这一决定，因为他们相信这将危及美国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推动苏联对这一地区进行渗透。就像凯南在1948年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所指出的那样，“支持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极端目标”将在中东地区“损害美国的总体安全目标”。具体而言，他认为这种支持将为苏联增加机会，危害石油特许权，危及美国在该地区的

基本权利。[9]

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种观点已经遭到销蚀。肯尼迪政府的结论是，由于苏联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援助不断增加，因此以色列理应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10]以色列领导人反复强调其作为潜在盟国的价值，而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所取得的令人震惊的胜利，则通过生动地展现以色列的军事威力来使这些观点得到强化。就像在前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尼克松和基辛格将增加对以色列的支持看作抗衡苏联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有效方式。[11]在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作为美国“战略资产”的形象开始扎根；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形象则成为了信条。

在1967年至1989年期间，以色列的战略价值理由是容易让人理解的。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以色列帮助美国在那一重要地区遏制苏联的扩张，偶尔也帮助美国处理其他的地区危机。[12]通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十月战争使得像埃及和叙利亚这样的苏联附庸国在军事上失败、蒙羞，以色列也毁坏了苏联作为盟国的声誉，但却提升了美国的声望。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冷战战略的核心要素：完全支持以色列将使得埃及或叙利亚不可能重新获得1967年丧失的领土，从而表明得到苏联的支持在价值上是有限的。这一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结出了果实，当时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断绝了与莫斯科的关系，转而重新与美国结盟——这是为1979年埃以和平条约进行铺垫的突破性发展。以色列不断取得胜利，也迫使苏联在每次失败后花费宝贵的资源来重新武装它的附庸国——这是一项使得超负荷运转的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任务。

通过向美国提供有关苏联的实力、苏联的附庸国以及范围更广的中东地区的情报，以色列促使美国进行更广泛反对苏联的活动。例如，1956年以色列间谍得到了一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S.赫鲁晓夫（Nikita S.Khrushchev）谴责斯大林的“秘密讲话”稿件后，就立即将它交给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允许美国国防专家进入一架由伊拉克叛逃者获得的米格21飞机中，让这些专家接触那些在1967年和1973年战争中缴获的类似的苏联装备。[13]最后，美国还可以进入以色列的训练设施，接触以色列国防公司开发的先进技术，并同以色列专家协商反恐和其他安全问题，因而从中获益。为支持以色列而进行辩解事实上是正确的，而且在这一时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净资产。然而，情形并非像以色列的辩护者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明显，而且在这一时期有些美国专家还曾对此质疑。[14]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直接的经济负担之外，同以色列不断增进的伙伴关系使美国承受了巨大的代价；而且因为以色列帮助远远比它更加强

大的伙伴的能力，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性。

第一，虽然以色列的军事力量确实帮助美国制衡像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那些苏联的附庸国，但是，在将那些国家推向莫斯科的怀抱方面，首先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埃及和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一直都很激烈；尽管这些国家数度发出请求，但它们却不能够从华盛顿那里得到帮助。虽然那时候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慷慨度不可与现时同日而语，但是美国依然对以色列的生存作出了承诺，并且不会做任何会削弱其安全的事情——美国尤其不愿意向埃及或叙利亚提供可能用于反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武器。结果，当以色列1955年2月对加沙地带的埃及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并导致37名埃及军人丧命，以及另外31人受伤的时候，埃及总统纳赛尔被迫转而向苏联寻求武器。纳赛尔反复称对加沙的攻击是个"转折点"，促成了阿拉伯世界与莫斯科的第一笔武器交易——这使得苏联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中东事务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对加沙的攻击也导致纳赛尔关闭了同以色列政府进行秘密谈判的一个管道，从努力限制阿拉伯渗透的温和立场转向积极支持的立场。[15]由于同以色列之间的不断冲突，美国又不愿意向这些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因此它们除了向苏联人寻求帮助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虽然它们自己对更接近莫斯科也是满怀疑虑。[16]

第二，虽然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给苏联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但这也给阿以冲突火上浇油，阻止了和解的进展——这是一个依然缠绕着以色列和美国的结果。虽然尼克松-基辛格战略最终成功地将埃及拉出了苏联的轨道，但是，主要通过冷战的多棱镜来看待中东问题的倾向——因此无论如何都是支持以色列，却也导致美国对数次有希望的和平机会视而不见，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不断发出的信号，显示他有意在1971—1972年间达成协议。[17]当基辛格在1975年对一个私人团体进行讲话的时候，他回顾道，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在1971年达成临时协议的努力，"由于1000名埃及士兵是否被允许跨越苏伊士运河"的问题而破裂了，"那个协议将阻止1973年那场战争的爆发。我现在必须说，由于我本应该更加支持罗杰斯的努力而却没有那样做，因而对此感到抱歉"。[18]

第三，对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兴起的反美主义浪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以关系的扩大和深化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赖斯大学的乌萨玛·马科蒂希（Ussama Makdisi）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奥斯曼帝国那些阿拉伯省份中的形象一般来说都是正面的；那些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将美国看作一个大国，一个不像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帝国主义大国。"[19]即使在以色列成

立之后，由于美国努力在中东扮演平衡的角色，由于直到1967年以色列的主要武器供应国还是法国而非美国这一事实，因此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敌意依然有限。美国与像纳赛尔的埃及那样的“进步”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的冲突，部分反映了有关以色列的分歧，但也是源于美国对那些保守的中东君主——伊朗国王、约旦国王侯赛因、沙特王室——的支持，这些君主也都对纳赛尔满怀敌意。对于美国来说不幸的是，它对这些政权——华盛顿将他们看作“温和的”，而其对手则被认为是“反动的”——以及以色列的支持，使得许多阿拉伯人的愤怒倾向不断加强，他们将美国看作前英帝国角色的继承者。[20]

随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与日俱增，阿拉伯人对美国的仇恨也随之增加；由于以色列对西岸地区、加沙地带、1967年对戈兰高地的占领，以及由于以色列随后对生活在逐渐为人们所知道的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镇压，这种仇恨进一步得到加强。在冷战期间，这种情形使得一些中东的政权更有兴趣与苏联维持紧密关系，并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就像有些具有先见之明的分析家在20年前所预测的那样，它也同样有助于阿拉伯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美国预算管理局军事援助处的前负责人哈里·肖（Harry Shaw）曾发出警告：“以色列在西岸地区的定居点政策与美国的利益目标相左，且与美国的政策相反。缺乏一项朝向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共同承担责任的和平协议的进展，削弱了那些愿意生活在和平中的阿拉伯人的地位，强化了伊斯兰激进组织和其他对稳定的中东——这将符合美国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安全——缺乏兴趣的阿拉伯人的影响力。”[21]如果以色列不是美国的盟国，那么美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虽然几乎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美国更为平衡的方法将使一个重要的摩擦源得以消除。以色列的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家摩西·达扬（Moshe Dayan）明白这一基本事实。在他的回忆录中包含了1973年十月战争时他与基辛格进行会谈的一次富有启迪性的叙述。达扬写道：“虽然我偶尔发表评论说美国是唯一一个打算支持我们的国家，但是我的沉思默想则告诉我，美国实际上宁可支持阿拉伯国家。”[22]

对以色列的支持使得美国增加了额外的成本，如十月战争期间阿拉伯的石油禁运和减产。决定使用“石油武器”是对战争期间尼克松决定提供以色列22亿美元紧急军事援助的直接回应，这一回应最终对美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伤害。由于更高的石油成本和国民生产总值约两个百分点的降低，石油禁运和石油减产单单在1974年就使美国多花费了485亿美元——大致相当于2000年的1400亿美元。石油危机也导致美国与其关键的欧洲和亚洲盟国之间严重的紧张关系。[23]就美国所关注的更为广泛的冷战事态而言，打败苏联的两个附庸国可能是正面的发展，但是美国为这一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虽然以色列对冷战作出的其他贡献是有益的，但是却不应夸大这些贡献的战略价值。例如，以色列确实向美国提供过有益的情报，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耶路撒冷提供给华盛顿的情报决定性地改变了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进程，或者使美国能够给予其共产主义对手以致命性的一击。美国从中得到的主要好处是可获取以色列缴获的苏联武器、有关他们的战场行动数据，以及移民到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带来的情报。美国利用这些信息来开发武器和发展自己的战术，这些东西在两个超级大国就要相互厮杀的时候是会有价值的，在它（美国）已经进行的与像伊拉克这样的苏联附庸国战斗时，其对于美国的帮助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是三流的，而在1991年打败萨达姆或者在2003年推翻他的时候，美国几乎不需要很多帮助。进入以色列的训练设施和同以色列专家进行协商也是有益的和值得称赞的，但是这些安排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或者对它最终赢得对苏联的胜利来说，从来就不是根本性的。

事实上，对于以色列所给予的“帮助”来说，其价值有时候是令人怀疑的。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报告说，虽然“对（以色列）有关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情报缺乏质量感到震惊……但他们的战术性军事情报却是一流的。可是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敌人。我见过这种政治情报，它很糟糕、离谱得可笑……基本上都是流言蜚语式的材料”[24]。有几次以色列也向美国提供了错误或者误导性的情报，目的可能是为了鼓励美国采取以色列想要的行动。例如，在六日战争爆发前夕，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将埃及的实力和企图描绘得十分恐怖可怕，而美国的情报官员则相信，以色列所描绘的这种图景既不正确，又带有政治动机。就像国家安全顾问W.W.罗斯托（W.W.Rostow）告知约翰逊总统的那样：“我们不相信以色列人提交给我们的评估……会像他们呈交给他们自己的高级官员的评估那样严肃。我们相信这可能是以色列企图影响以下一个或多个事件而精心策划的棋招：（1）向以色列提供军事装备；（2）对以色列作出更多的公开承诺；（3）赞成以色列的军事主动权；（4）向纳赛尔施加更多的压力。”[25]就像我们在第八章中将更为详细讨论的那样，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前，以色列也向美国提供了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最为令人吃惊的报告，从而对美国误判萨达姆·侯赛因的真正危险起了作用。[26]

以色列也不是在该地区保护美国利益的可靠代理人。当马丁·克雷默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支撑着东地中海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是“部分地维持中东地区秩序的一种低成本方式”的时候，他都夸大了这一关系所带来的收益而有意对其中的成本轻描淡写。[27]虽然东地中海地区的稳定是理想的，但与石油丰富的波斯湾形成尖锐对照的是，那一地区并不是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所在。而如果以色列

的战略价值是源于它在该地区执行“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角色的话，那么它一直做得不那么出色。1982年它对黎巴嫩的入侵使得该地区更加不稳定，并且直接导致了黎巴嫩真主党的建立。真主党是一个民兵组织，许多人相信它应该对美国使馆和海军陆战队军营遭受的毁灭性袭击负责，那两次袭击使美国付出了250多条生命的代价。虽然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要为这些死去的人负责，但是为了打理以色列所形成的那种局面，生命的损失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中的一部分而已。以色列对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长期殖民活动——以色列用美国的援助间接资助这一活动，部分地用美国武器进行这一活动——也导致了两次起义：其中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被杀。因此，克雷默严重高估了以色列作为低成本“区域稳定者”的价值。

以色列战略价值的局限性，因其无力对美国无可争辩的利益——获取波斯湾的石油——起到作用而进一步得以凸显。尽管以色列有着自负的军事威力，但是冷战期间，在吓阻苏联直接攻击西方的石油供应，或者如果发生区域战争对石油供应进行保护方面，美国并不能够依靠以色列的帮助。就像哈里·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以色列官员明确拒绝以色列在超出其国家的近距离防御地区之外与苏联地面部队进行接触……这些以色列人承认，那些认为以色列部队会推到自己的国界之外去与插入波斯湾的苏联军队进行遭遇的想法，是牵强附会的。”[28]根据美国五角大楼一位前官员的说法：“以色列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总是被夸大得荒腔走板。在20世纪80年代，当我们在为中东地区规划应急计划的时候，却发现以色列人在95%的情况下对我们几乎都是没有价值的。”[29]

结果，当1979年伊朗国王倒台的时候，人们关心的苏联可能入侵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而美国不得不创建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来抗衡那一威胁，不得不在各种各样的阿拉伯国家安排基地驻扎和作战物资的提前部署。五角大楼并不能够依靠以色列本身来吓阻苏联，也不能把以色列当作一个前沿基地——虽然以色列愿意美国这样做，因为如果美国那样做的话，将在阿拉伯世界引起政治问题，使得防止苏联介入该地区甚至变得更加困难。就像肖在1986年所评论的那样：“利用以色列作为平台来将美国军队投送到阿拉伯国家的想法……在以色列之外并未得到广泛的支持。阿拉伯分析家认为，接受穿过以色列国土的美国帮助的阿拉伯政权，将不会得到自己人民的信任，因而就更加可能倒台……美国官员也对利用以色列作为基地的可信性保持怀疑。以色列这样做的基本用意，可能是诱使美国与以色列结成更紧密的关系，并在不用对以色列提出特别承诺要求的情况下来强化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逻辑。”[30]以色列对美国进行帮助在实力上的局限性，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波斯湾显现出来了，当时两伊威胁到波斯湾石油运输

的安全。美国及其数个欧洲盟国加强了在该地区的海军力量，开始为油轮护航，并最终向一些伊朗巡逻艇发起了攻击，但是在这些行动中，以色列未起到任何作用。[31]

最后，虽然在冷战期间以色列作为战略价值的理由是有限的，但是人们并没有对美国为什么向以色列提供如此多的经济、军事和外交支持，作出完整的解释。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花上数十亿美元来捍卫它的北约盟国——欧洲是一个主要的工业权力中心，必须使之避免苏联的控制；同样容易理解的是美国支持像沙特阿拉伯那样的富油国背后的战略动机，虽然它们之间的政治价值存在着尖锐的反差。然而，在以色列这个例子中，此类显而易见的战略动机从来就没有像上面的例子中那样表现得清楚明显。虽然亨利·基辛格可能使用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方式在莫斯科与开罗之间打下楔子，但是他私底下承认："以色列的力量没有阻止共产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扩散……因此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即因为以色列防止共产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扩散，因此一个强大的以色列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以色列的强大是为其生存而提供的。"[32]当他在1980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罗纳德·里根可以称以色列为一项"战略资产"，但是他却没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以色列的战略价值，而相反却提到各种各样的道德考虑来解释他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支持。[33]

富有创见的以色列分析家早就承认了这一基本现实。就像以色列专家、特拉维夫大学贾菲战略研究所前所长夏伊·费尔德曼在他自己的美以安全合作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对以色列支持动机的战略维度方面，从来就没有包括这些关系的核心内容。相反，由于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寻求的目标是使得美以关系建立在对共和党政府更具吸引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战略维度得到不断地强调。然而，美以战略合作的意义，以及以色列被视为一项美国战略资产的程度，却从来没有达到美以关系中其他因素的高度。"根据费尔德曼的说法，那些"其他因素"是大屠杀后对以色列的同情、共有的政治价值、以色列受欺压的形象、共同的文化联系，以及"犹太人团体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34]

从冷战到"9·11"事件

即使以色列在冷战期间是一个有价值的战略盟友，当苏联解体的时候那个理由也不存在了。根据中东方面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他自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以色列支持者——的说法："在冷战期间无论以色列具有什么样的战略价值，当冷战本身走向终结的时候，那一价值也就明显不存在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

政治学家伯纳德·赖克（Bernard Reich）是好几部美以关系著作的作者，他在1995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指出："以色列对美国的军事或经济重要性是有限的。"布兰代斯大学国防专家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rt）在2003年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以色列对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而且在许多方面是一项负资产。"[35]随着冷战走入历史，很难不使人想到以色列战略价值的衰落。

事实上，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证明了以色列正在成为一项战略负担。虽然美国及其盟国最终集结了40多万军队来解放科威特，但是却并不能够将以色列当作基地，或者让以色列国防军参战而不会危及脆弱的反伊联盟。而当萨达姆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以希望激怒以色列作出将导致联盟分裂的回应的时候，华盛顿却不得不分出资源——爱国者导弹群——来防卫以色列，使以色列成为局外人。当然，以色列虽然并不要为这种情形负责，但这却说明了以色列正成为一项负资产而非资产所达到的程度。就像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威廉·沃尔德格雷夫（William Waldegrave）告知下议院的那样，美国现在可能正意识到，同以色列的战略联盟"如果在这样的危机中都不能派上用场，那么以色列就不是特别有用的"。伯纳德·刘易斯也明白这一点，他写道："（以色列战略价值的）变化在波斯湾战争中清楚明白地显示了出来……当美国最希望的是以色列置身冲突之外——默不作声、无所作为，以及尽可能不为人所关注——的时候……以色列就不是一项资产了，而是毫无关联——有的人甚至说是一个麻烦。"[36]

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共同面临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立即为冷战结束后的美以合作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但是情形并非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奥斯陆和平进程一直在进行之中，而且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正在下降：从1994年的67人死亡和167人受伤，降低到2000年只有1人死亡和12人受伤——奥斯陆和平进程失败后，以色列的伤亡人数又上升了，2001年和2002年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分别为110人、918人和320人、1498人。[37]美国决策者更加关注伊斯兰恐怖主义——包括基地组织，特别是在这一系列的攻击之后：1993年炸毁世界贸易中心的企图失败、1996年对沙特阿拉伯霍巴塔（the Khobar Towers）综合住宅区的袭击、1998年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炸弹攻击、2000年在也门对美国巡洋舰科尔号的攻击。虽然许多应对这些问题的新计划在进行之中，但是恐怖主义还没有被广泛地看作对美国的致命威胁。"全球反恐战"直到2001年9月11日才开始认真地进行。[38]

类似地，虽然在这一时期里以色列和美国都担心像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这样的"流氓国家"，但这些国家都太弱小，以至

于构不成对美国本身的严重威胁。人们认为，这4个国家在2000年的人口加在一起还不到美国的40%，国内生产总值加到一起只有美国的5%多一点，而它们的军事开支加在一起则还不足美国国防预算的3%。[39]伊拉克正遭受联合国的惩罚性制裁，武器检查人员忙于摧毁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伊朗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的努力走得并不是太远；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相互间经常龃龉不断，因而使得对这些国家的遏制甚至更加容易，并降低了试图推翻它们的需要。

相反，美国对伊朗和伊拉克采取了一项“双重遏制”的政策，为调解叙以之间的最终和平条约作出了严肃但却并不成功的尝试。[40]美国也进行着那一拖延不决但最终成功的努力，说服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补偿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爆炸遇难者家属，这是一次经济制裁与耐心的多边外交相结合的活动。[41]由于美国本身就能够应对这些问题，因此用不着以色列的实力来完成这些目标。

换言之，以色列并不被看作一个值得珍视的盟国，因为美国的决策者相信，对付这些所谓的“流氓国家”来说，它的帮助并非至关重要。相反，华盛顿之所以担心这些国家，是因为它已经承诺过保护以色列。例如，关于伊朗，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主要争论点是伊朗反对戴维营和平进程、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以及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企图。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由于现有的美以之间的关系而被扩大了。[42]当然，华盛顿在该地区确实存在着同以色列并无关联的利益——例如它阻止任何单个国家控制波斯湾，从而使自己能够获得石油的愿望，而它对这些利益的追求偶尔会与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产生摩擦。尤其要说的是，即便以色列这个国家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美国也会毫无疑问地反对伊朗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觊觎。但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使得这些问题似乎更加紧迫，而不是使之更加容易处理。

直到2001年9月11日，来自恐怖主义的危险以及由各种“流氓国家”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为华盛顿无条件地支持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引人注目的战略理论。这些关注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需要美国的帮助，却不能够解释美国为什么愿意如此慷慨地提供这样的帮助。

“反恐伙伴”：新的理论

紧随“9·11”恐怖袭击而来的是，美国支持以色列背后的主要战略理由变成了这样一种主张，即这两个国家现在是“反恐伙伴”。这一新的理论将美国和以色列描述为受到同样的恐怖主义团体和一伙支持这些团体寻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的威胁。它们对以色

列和美国的敌意被说成是起因于它们从根本上憎恨西方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换言之，它们仇恨美国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以同样的方式，它们憎恨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也是西方的、现代的和民主的，而不是因为它占领了阿拉伯的土地——包括伊斯兰的圣地，压迫阿拉伯的民众。

新理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以色列的支持在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和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不断高涨的反美主义中没有起到作用，结束以巴冲突，或更加有选择性地或有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将不会管用。华盛顿因此应该放手让以色列去对付巴勒斯坦人或者像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团体。此外，在所有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被关押、悔改或死亡之前，华盛顿不应该向以色列施压——如拆除被占领土地的定居点。相反，美国应该继续给以色列提供广泛的支持，并且仍然使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去攻击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以及巴沙尔·艾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叙利亚这样的国家，还有据信那些其他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

这一新的理论不是将以色列看作美国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主要麻烦根源，而是将以色列描绘成全球“反恐战争”的主要盟友。为什么？因为据说它的敌人就是美国的敌人。就像2001年末阿里埃勒·沙龙访问美国期间所提出的那样，在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攻击之后，“你们在美国进行反恐战。我们在以色列进行反恐战。这是一场同样的战争”。根据第一届（小）布什政府高级官员的说法：“沙龙就像小提琴一样在耍弄总统：‘我在为你进行战争，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等等。”[43]前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2002年告诉美国参议院说：“如果我们不即刻关闭阿拉法特正在制造人体炸弹的恐怖工厂，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使你们的城市陷入恐怖只是迟早的事情。如果不对其加以摧毁，这种疯狂将打击你们的公交车、超市、比萨店、咖啡馆。”内塔尼亚胡还在《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上发表一篇社论版文章称：“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无论什么都不能够使恐怖活动正当化……美国的力量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而那里的基地组织网络自身也崩溃了。美国现在也必须以类似的行动来反对那些其他的政权——伊朗、伊拉克、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独裁、叙利亚，还有其他几个政权。”[44]他的继任者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在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上发表的社论文章重复了这一主题，宣称：“世界各国政府确实知道谁是恐怖分子，确实知道是哪些‘流氓国家’支持并推动恐怖活动。像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苏丹和朝鲜那样的国家，已证实具有有案可查的支持恐怖主义的记录，而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杰哈德，甚至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本身的恐怖主义凶徒所进行的屠杀则用不着提醒人们。”[45]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在2006年向美国国会的讲话中谈的是同样的老调，他宣称说：“我们两个国家有着同样遭受恐怖主义的经历和痛苦。我们有着相同的义务来决定抗击这些残忍的恐怖分子——他们从我们身边夺走了那些无辜者的生命。”[46]

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从根本上来说用的是同样的辩护理由。2001年10月，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执行主任罗伯特·萨特洛甫（Robert Satloff）解释了在“9·11”之后为什么美国要继续支持以色列：“答案应该是明白无误的，由于我们共有的民主价值以及面对的共同敌人……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遭受到以色列同样类型的恐怖袭击——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主义袭击。”[47]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在2001年12月宣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像塔利班一样，它资助、唆使恐怖分子，并向恐怖分子提供安全的避难所。而以色列就像美国一样，只是在努力保护自己的后方……阿拉法特对于以色列，就像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Mullah Mohammed Omar）对于美国一样。”[48]2002年4月和5月，美国国会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两个几乎相同的决议（众议院352票对21票、参议院94票对2票），宣称“美国和以色列现在致力于共同的反恐斗争”[49]。2002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年会的正式主题是“美以并肩反恐”，而那些会议发言则强调两国共同面临来自亚西尔·阿拉法特、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萨达姆·侯赛因、塔利班、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和叙利亚的威胁。[50]2002年4月，美国新世纪计划给布什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持相同的论调。这封信的签名者包括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丹尼尔·派普斯、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诺曼·波多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其他28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著名的新保守派。该信宣称：“不应该有人怀疑美以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两个国家都是您（布什）所正确命名的‘邪恶轴心’所针对的目标……就像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指出的那样，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全部都从事‘鼓励和资助政治谋杀及自杀式炸弹的文化’来反对以色列，就像它们曾资助反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一样。……总统先生，您已经向国际恐怖主义宣战了。以色列正在进行同样的战争。”[51]

这个新的理由乍看起来似乎有理，而且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许多美国人将“9·11”事件等同于那些对以色列的袭击。然而，如果进一步审视就会发现，“反恐伙伴”的理论是完全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作为美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理由。客观地看，以色列在“反恐

战”和更广泛的对付所谓的“流氓国家”的努力中都是负资产。

首先，这一新的战略理论将“恐怖主义”描述为一个单一的整体现象，因此认为巴勒斯坦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就像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一样，并且认为“9·11”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是组织良好的全球恐怖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也针对以色列进行袭击。但是，这种主张是建立在对何为恐怖主义的根本错误认识基础之上的。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个组织、一场运动甚或一个可以对之宣战的“敌人”，恐怖主义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敌人的目标——特别是平民——进行攻击的战术而已，目的是为了制造恐怖、削弱士气，激起敌手的相应反应。这是一种许多不同团体有时候都使用的战术，通常情况下是他们比对手弱小得多，并且没有其他选择来反击军事上优于他们的对手。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并建立自己的国家时，他们使用的是恐怖主义手段：例如，在其他的行动之中，他们于1946年在耶路撒冷用炸弹袭击了大卫王宾馆，在1948年暗杀了联合国协调员福克·伯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而美国在过去也支持过大量的“恐怖”组织，包括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人员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 UNITA）的游击队。美国的总统们也曾在白宫欢迎过许多前恐怖分子。美国总统们的这种做法只是凸显了恐怖主义作为战术而非统一运动这一事实。阐明这一问题丝毫不是要为攻击无辜的人的行径进行辩护——这种攻击在道德上总是要受到谴责的，但是它提醒我们，使用这一斗争手段的团体并不总是要威胁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美国有时候还积极地支持这样的团体。

事实上，与基地组织形成对照的是，威胁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如哈马斯、伊斯兰杰哈德和黎巴嫩真主党——既没有攻击美国，也不构成对美国核心安全利益的致命威胁。例如，关于黎巴嫩真主党，希伯来大学历史学家摩西·梅佐（Moshe Maoz）的观察结果是，它“主要是对以色列的威胁。当黎巴嫩有美国军队的时候，他们确实攻击美国的目标，但是他们是在为从黎巴嫩赶走外国军队而杀戮。我怀疑他们会疯狂到袭击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帕特里克·西尔（Patrick Seale）同意这种观点：“黎巴嫩真主党纯粹是一种完全针对以色列人的本地现象。”而反恐专家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和斯蒂文·西蒙（Steven Simon）则对有关哈马斯的问题作出了类似的回应，指出“至今为止，哈马斯还没有将目标对准美国”。[52]我们可能会相信所有的恐怖主义行径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但是从美国战略利益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相同的。

将奥萨马·本·拉登及其核心成员与各种巴勒斯坦恐怖团伙联系在

一起，不存在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且大多数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不像基地组织一样，渴望发起一场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或者复兴哈里发制度。事实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个世俗的民族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伊斯兰组织。只是在过去的10多年间，由于被占领的原因，伊斯兰思想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才变得具有吸引力。然而，无论怎样十恶不赦和令人遗憾，他们的活动也仅仅是无目标地针对以色列或西方的暴力。相反，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总是只针对他们所认为的以色列给自己造成的冤屈苦难，一开始他们是抵抗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涌入，继而是抵抗1948年战争之后大量驱赶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今天，这些行动大多数是对以色列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进行的长期殖民活动的回应，并且反映了巴勒斯坦人自己的软弱。1967年以色列占领这些领土的时候，那里几乎没有犹太人，但是在随后的40年之中，以色列通过定居点、道路网络和军事基地来对这些地方殖民，并血腥镇压巴勒斯坦人对这些侵犯试图进行的反抗。[53]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巴勒斯坦人进行的抵抗通常使用恐怖主义手段，这常常是受到压制的人民反击占领者所使用的手段。[54]而当像哈马斯那样的团体还没有公开接受以色列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要忘记，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其他人，以及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都在无数场合下反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宣称以色列和美国因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而结合到一起的说法，有着相反的因果关系。美国并不是因为突然意识到自己面临来自“全球恐怖主义”的严重危险，迫切需要以色列的帮助来打败恐怖主义，而同以色列结成同盟。事实上，美国之所以有恐怖主义问题，主要是因为它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以色列所致。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在中东各个地方不受欢迎，早就不是什么头条新闻，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的“一边倒”政策在这些年里使其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这些政策不仅激发了基地组织，而且有利于基地组织的招募活动和整个地区的反美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当然，那些相信以色列依然是一份有价值的战略资产的人，经常否认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与恐怖主义问题之间存在联系，特别是与“9·11”恐怖袭击之间存在联系。他们认为奥萨马·本·拉登只是最近才抓住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这一问题，只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有利于他的招募活动。因此，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萨特洛甫才会宣称说，拉登认同巴勒斯坦只是“近来的——几乎肯定是机会主义的——现象”。艾伦·德肖维茨则宣称，“9·11”之前，以色列几乎不是本·拉登雷达屏幕上的目标。丹尼斯·罗斯认为，本·拉登只是“企图通过暗示他对美国的攻击是由有关巴勒斯坦人的处境问题所导致的，从而使之获

得合法性”。马丁·克雷默说，他知道任何“没有偏见的反恐专家”都不会相信，“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美国遭到普遍敌意的根源，并为基地组织的招募工作推波助澜”。《评论》（*Commentary*）杂志前编辑诺曼·波多雷茨同样认为：“如果以色列从未存在过，又或者它将魔术般地消失了，美国依然会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认为的一切邪恶东西的集中体现者。”[55]

有些以色列的捍卫者提出这样的观点主张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承认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激怒了反美的恐怖主义，不断鼓励增长的反美主义将要求他们承认，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事实上使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样的承认将使人怀疑以色列的净战略价值，意味着华盛顿应该有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使之采取一种不同的对巴勒斯坦人的方法。

与这些观点相反，事实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在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起到了鼓励反美主义的作用，激起了反美恐怖分子的愤怒。当然，虽然这并不是他们唯一不满的地方，但却是一个导致他们不满的核心问题。[56]虽然一些伊斯兰激进分子对他们所认为的西方物质主义和金钱主义、对他们声称的西方“盗窃”阿拉伯石油、对西方支持那些腐败的阿拉伯王权，以及对西方反复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干涉等行为发自内心地感到不快，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严厉对待，也同样使他们感到愤怒。因此，埃及的持不同政见者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他的作品是当代伊斯兰宗教激进分子重要的灵感来源——对美国的敌意，既是因为他把美国看作一个腐败放荡的社会，又是因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57]或者像黎巴嫩真主党精神领袖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Sayyid Muhammed Husayn Fadlallah）在2002年所指出的那样：“我相信美国要对以色列的所有一切行为承担责任，既要对以色列1948年占领的土地，或者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的全部定居点政策承担责任，尽管美国偶尔发出一些令以色列尴尬、不赞成其定居点的微弱的反对声音……美国是一个虚伪的国家……因为它向以色列人提供坚定的支持和毁灭性的武器，但是许诺给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却（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言词。”[58]人们不一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认可此种观点在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力量，了解美国如此毫无疑问地支持以色列所激起的（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怒火和仇恨。

更清楚地显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与反美的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的，是拉姆齐·优素福（Ramzi Yousef）这个例子——他策划了1993年对世界贸易中心的第一次袭击，现在在美国的监狱被终身监禁。优

素福不仅给数家纽约报纸寄信说他会因袭击而得到褒扬，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援助，而且他还在1995年被捕后在飞机上告诉押解他到美国的特工说，他对导致美国人的死亡感到罪过。但是就像斯蒂夫·科尔（Steve Coll）在他受到赞誉的作品《灵魂战争》（*Ghost Wars*）一书中所叙述的那样，“优素福渴望制止以色列军队杀戮阿拉伯人的力量胜过了”他在良心上受到的责备；而按照他的信仰，“轰炸美国的目标是‘唯一引起变化的途径’”。据报道，优素福也曾说：“在追求改变美国的以色列政策方面，他真的相信自己的行为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根据科尔的描述，优素福“在飞行途中没有提及任何其他的动机，而且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任何其他问题都不是他所关心的”。进一步的证据是来自优素福的副手阿卜杜尔·拉赫曼·亚辛（Abdul Rahman Yasin），他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说，优素福招募他的方式，是告诉他恐怖主义行动将是“为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和沙特阿拉伯兄弟进行复仇”，并且补充说优素福“给我讲了许多有关这类的事情”。[59]

或者考虑一下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与萨特洛甫、德肖维茨、克雷默以及其他人所宣称的相反，有相当的证据确定，本·拉登从青年时期开始就一直对巴勒斯坦人的事业抱有深深的同情，长期以来对美国如此强烈地支持以色列感到愤怒。根据中央情报局情报单位管理有关基地组织及其创始人的迈克尔·舒尔（Michael Scheuer）的说法，年轻的本·拉登大体上是温文尔雅、举止得体的，但是“奥萨马举止得体、不带敌意的行为中的例外之处，是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以及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负面态度”[60]。“9·11”之后，本·拉登的母亲告诉一位采访人员说：“在少年时代，他也一样是个好孩子……但是他对巴勒斯坦的局势表现得尤为关心、悲哀和愤怒，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整体局势也是表现得如此。”[61]

进而言之，本·拉登于1994年12月29日为更广大的听众准备的第一个公开声明，直接讲的就是巴勒斯坦问题。本·拉登公开声明的编辑者布鲁斯·劳伦斯（Bruce Lawrence）解释道：“声明信清楚地表明，从一开始的时候，巴勒斯坦就是本·拉登议程上的中心议题，这一议程根本不是后来才加上去的。”[62]

“9·11”事件之前，本·拉登也有数次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人，并呼吁以“圣战”为基础来反抗美国。根据本杰明和西蒙的说法，在1996年本·拉登所作出的裁决——裁决的标题是《向占领两大圣地的美国人宣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愤恨”是“本·拉登所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十字军同盟’标签”。本·拉登毫不含糊地宣称，穆

斯林的血正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流淌，并且将这一切归罪于“美国-以色列的阴谋”。[63]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在1997年3月问他为什么要宣布向美国进行“圣战”的时候，本·拉登回答道：“我们之所以宣布对美国政府进行‘圣战’，是因为美国政府是非正义的、犯罪的、残暴的。它的行为是极其不正义的、可怕的、犯罪的，它们或者是美国政府直接所为，或者是通过支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而且我们相信，美国要直接对那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伊拉克被杀害的人负责。”[64]这些评论几乎没有什么奇怪的。就像《经济学人》杂志的中东记者马克斯·罗登贝克（Max Rodenbeck）对两本有关本·拉登的著作写的出色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在所有的声明主题中，有关偿还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主张，或许是本·拉登的讲话中反复出现的最强有力的内容”[65]。

“9·11”委员会[66]。（the 9/11 Commission）确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两者都对本·拉登和其他主要的基地组织成员产生了刺激作用。该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一份背景研究注意到，在以色列反对党领袖阿里埃勒·沙龙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伊斯兰三大最为神圣的圣地之一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所在地——进行挑衅性的访问（由数以百计的以色列防暴警察陪同）之后，本·拉登试图将攻击的日期提前到2000年秋天。根据该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声明，“虽然本·拉登承认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和其他的飞行员才刚刚抵达美国开始其飞行训练，但是基地组织要惩罚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67]。在下一年里，“当本·拉登从媒体上得知沙龙将在2001年6月至7月间访问白宫的时候，他再次试图将行动提前”[68]。除了将攻击的时间定在“9·11”之外，本·拉登对攻击目标选择的偏好，也蕴含了他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愤怒。在1999年末进行的攻击任务负责人阿塔与本·拉登的首次会面中，最初的计划是要求打击美国的国会山，因为它被“看作美国支持以色列政策的根源”[69]。简而言之，本·拉登及其副手显然将巴勒斯坦问题看作他们的议程核心。

“9·11”委员会也注意到，被该委员会描述为“‘9·11’袭击主要设计者”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主要是受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刺激。用该委员会的话来说：“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对美国的敌意并非源于他作为一个学生的经历，而是源于他强烈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外交政策。”[70]在激起“9·11”的袭击行为中，难以想象还有比美国支持以色列更为引人注目的证据。

即使本·拉登没有亲自卷入巴勒斯坦问题，但是巴勒斯坦问题依然

为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招募工具。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爆发以来——起义爆发的部分原因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程度更为严重和明显，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愤怒已经在明显地增强。[71]巴勒斯坦人第一次起义（1987—1992年）的暴力程度要远远比这一次低得多，而且在奥斯陆和平进程的那些年里（1993—2000年），被占领土也显得相对平静。由于因特网的发展和替代性媒体新闻发布的出现，如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h），因此现在对大屠杀的报道是全天候的。以色列不仅对巴勒斯坦国民施加了更多的暴力，而且全世界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能够目睹以色列所施加的暴力。他们也能够看到，以色列的暴力是用美制武器来进行的，并且得到美国心照不宣的支持。这种情形为那些批评美国的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弹药。这就是为什么黎巴嫩真主党副领导人谢克·奈姆·盖瑟姆（Sheik Naim Qassem）在2006年12月告诉一群黎巴嫩人说："在黎巴嫩不再有美国的政治空间。你们难道想不起那些向黎巴嫩人开火的武器是美国造的吗？"[72]

这些政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对美国会如此愤怒，并满怀同情地看待基地组织，有些人甚至愿意支持基地组织——直接地或者不事声张地这样做。2004年一份对摩洛哥人的调查报告显示，对布什总统持"正面"或"非常正面"看法的人是8%，与之相比，对本·拉登持这种看法的人却达到了45%。 在美国的一个主要盟国约旦，对布什和本·拉登持这种看法的人分别是3%和55%。而在巴基斯坦——其政府同样与美国结成紧密的联盟，对本·拉登持这种看法的人以多出58%的优势超过了布什。[73]在入侵伊拉克之前的2002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报告说："有关美国在中东/冲突地区的负面性公众舆论是压倒性的"，而这种不受欢迎的许多部分，则是源于巴勒斯坦问题。[74]根据中东问题专家希伯利·泰尔哈米（Shibley Telhami）的说法，"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比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以及穆斯林世界的其他许多地方的公众当中，产生了这样强烈的共鸣。没有什么问题比巴勒斯坦问题，在这一地区形成对美国的看法中起到更加根本性的作用"[75]。乌萨玛·马科蒂希同意这种说法，并写道："没有哪个问题比巴勒斯坦问题，令人感到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愤怒会更加普遍和激烈……正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使得本来对阿拉伯历史进行世俗主义解释和伊斯兰主义解释的相互对立双方之间，有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即美国官方所宣扬的对自由的支持与歧视及政策之间的巨大差距。"[76]当然，虽然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唯一的反美主义根源，但却是重要的根源，它使得赢得反恐战争和推进美国的其他利益更为困难。

其他的政府研究和无数的民意调查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阿拉伯民

众深深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所激怒，他们认为这是对阿拉伯人所关心的问题麻木不仁，美国所声称的价值也不相一致。虽然许多阿拉伯人对美国的科学和技术观点、美国的产品、美国的影视有点喜欢，甚至令人吃惊地对美国的人民和美国的民主持有正面的看法，但是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却是持强烈的否定态度。[77]正如一位来访的也门物理学家在2001年所评论的那样，“当你去那里的时候，你确实热爱美国这个国家；但是当你回到你自己国家的时候，你却发现美国只是将公正和公平施于它自己的人民，而不是施于国外的人民”[78]。五角大楼科学委员会（Pentagon's Defense Science Board）2004年的一份报告所作出的结论说，“穆斯林并不‘仇恨我们的自由’，而是仇恨我们的政策”。而“9·11”委员会则承认：“一个肯定的事实是，有关美国的以巴冲突政策和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成了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广受评论的主导因素。”[79]

类似地，当受人尊敬的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公司（Zogby International）询问六个阿拉伯国家的公民，问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是由自己对美国价值还是美国政策的感受而形成的时候，“作出回应的人里面，占绝对多数的人表明政策的作用更加重要”。在进行自由问答式的提问的时候，当问及他们想到美国的时候“最先的想法”是什么，最普遍的回答是“不公平的外交政策”。而当问及美国可以做什么来改善它的形象的时候，最常听到的回答是“改变中东政策”和“停止支持以色列”。[80]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当国会在2003年下令国务院设立一个“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公共外交顾问小组”的时候，该小组的报告发现，“这些国家的人们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以及他们认为的美国正在扮演的角色，发自内心地感到难过和痛苦”[81]。

著名的阿拉伯领导人和学识渊博的公共评论家确信，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已经使得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越来越不受欢迎。拉赫达尔·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是布什政府所支持的、帮助在2004年6月建立伊拉克过渡政府的联合国特使，他说道：“这一地区的一大毒害就是以色列的支配政策和强加给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另外他还说，整个中东地区都看出了“这一政策的不公正性，以及同样不公正的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2004年，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警告道：“这一地区现在存在着未曾有过的（对美国的）如此仇恨，”部分是因为阿拉伯人“认为（以色列总理）沙龙想要什么就做什么，而美国人却对此不置一词。”[82]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 II of Jordan）在2007年3月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告诉美国国会的两院联席会议说：“在巴勒斯坦拒绝公正与和平……是核心问题。而这一问题不仅给我们的地区产生了严重的后

果，而且给我们的世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83]并不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亲美政权之所以要求美国改变政策，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增加了民众对他们自己与美国保持联系的不满。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很难说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的唯一根源，而如果对以色列的支持附加更多的条件，也不会消除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发生摩擦的根源。考察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后果，以及美国对这些政策心照不宣的支持，不是要否认在各种阿拉伯国家存在真正的反犹主义，或者要否认这样的事实——即这些社会中的团体和政府有时候煽动这些情绪性的态度和利用以巴之间的冲突，是为了分散人们对他们自己所犯错误的注意力。相反，我们只是要表达这样的观点——美国如此一以贯之地支持以色列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这种态度给中东地区对美国的敌意火上浇油，刺激了反美主义的极端分子，为他们的招募活动助一臂之力，给该地区的独裁政府因自己的失败再方便不过地提供了替罪羊，并且使得华盛顿在说服可能的支持者打击它们国内的极端分子方面更加困难。简而言之，当涉及打击恐怖主义问题的时候，美国与以色列的利益并不一致。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人使得打赢反恐战争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而且“反恐伙伴”理论没有为美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提供引人注目的理由。

与“流氓国家”的对抗

在反对那些支持恐怖主义和企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流氓国家”的行动中，新的战略理论也将以色列描绘成美国的一个关键盟国。就像“反恐伙伴”的观点一样，乍听起来，这一熟悉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像叙利亚、伊朗，或者萨达姆·侯赛因那些独裁政权，他们既对美国，也对以色列充满敌意，这种情形难道不是再明显不过的吗？难道这样的政权不可能会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勒索美国，或者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给恐怖分子吗？由于这些危险，难道美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慷慨的援助没有意义吗？这些援助既可以保护以色列不受这些危险邻国的威胁，又可以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从而加速这些血腥政权的垮台或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事实上，这一理论经不起仔细的审查。虽然美国同这些政权中的每一个都有重大的分歧——其中最明显的分歧就是它们对某些恐怖组织的支持，以及它们对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表露出来的明显兴趣，但是除了美国对以色列本身的承诺外，它们并不构成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的严重威胁。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战略利益是石油，而保护其自身获准进入这一商品主要依靠的是防止任何单个的国家控制整个地区。如果这些国家中的某一个变得太强大、太具侵略性的话，这就

会成为美国对其进行攻击的正当理由——就像在1991年至1992年期间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时所做的那样——但是却不能够成为同时攻击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正当理由。

另外，那些被经常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应该支持以色列来反对这些“流氓国家”的因素，在战略理由上甚至更加不为人所接受。因为它们是独裁政权这一事实，就成了它们不懈地对美国充满敌意的理由吗？不，因为当与独裁政权结盟能够推进自己利益的时候，美国本身就是这样做的，并且今天的做法依然如故。它们对恐怖团体的支持是一个充分的根据吗？并非真的如此，因为这些国家和恐怖团体曾克制自己对美国发动攻击的欲望，因为美国过去对恐怖主义——包括这些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的推广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当这样做可以推进自己利益的时候，美国曾愿意同自己不一定喜欢的政权合作。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同伊朗的战争期间，美国就对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拉克进行过支持。而今天，它依然在支持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政权，尽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那个政府在克什米尔和其他地方支持恐怖主义。在对付塔利班的时候，美国领导人也乐意接受伊朗的帮助，并乐意从叙利亚那里得到有关基地组织的情报信息。无可否认，这些合作的例子是有限的，但是它们确实显示，这两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构成了对美国至关重要利益的致命威胁。

有关叙利亚干涉黎巴嫩，或者伊朗可能挑战美国在波斯湾的盟国这个问题又如何呢？尽管这些并非不重要的小问题，但是它们都不能够成为美国如此强烈地支持以色列的理由。以色列自身对黎巴嫩的干涉已经不断使得美国在那里所作出的努力变得复杂化，而且它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经常愿意使用武力，已经鼓励其他的中东国家渴望拥有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像此前所指出的那样，当涉及维持黎巴嫩的稳定，或者保持海湾均势的问题时，以色列算不上是一份战略资产。就像我们在第二部分所详细讨论的那样，以色列及其游说集团使得美国更有效地对付这些无可否认的问题政权的努力不断遭受挫折。

事实上，作为帮助以色列的理由，这一具体的战略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环环相扣的。虽然以色列被描绘成对付自己危险邻国的关键盟国，但是对以色列的承诺首先是美国为什么视这些国家为威胁的重要原因。确实，如果华盛顿的政策不是被其先前对以色列的承诺所局限，那么它可能发现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各种冲突时会容易得多。无论如何，这些国家现在都太弱小，不能够对美国造成重大的伤害——虽然它们肯定能够使美国的某些行动困难得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伊拉克的行动；而且当美国被迫采取行动来反对这些国家的时候，以色

列谈不上是一笔资产。

甚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威胁，也不能够为美国目前如此强烈支持以色列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虽然美国有其自身的理由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以及其他地方）的扩散，但是，即使在我们作出最大努力的情况下，如果该地区的某些国家最终还是获得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也不会是对美国的战略灾难。相反，美国之所以关注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或伊朗目前的核野心，主要是源于据称它们构成的对以色列的威胁。布什总统在2006年3月也承认说："当然，来自伊朗的威胁，是他们明言要摧毁我们强大的盟国以色列。"[84]

然而，考虑到以色列和美国都有自己强大的核武装，这种危险被夸大了。直接攻击以色列是不可能的，因为以色列有数百件核武器，而美国则有数千件这样的武器。如果它们中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作恶者将立即面临毁灭性的报复。没有哪个核武装的"流氓国家"能够勒索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勒索者在实施威胁以后都将面临同样的厄运。冷战期间，苏联拥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信守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受此指导，被那些轻视生命价值的残暴之人统治。然而，莫斯科却不能够利用其庞大的核武库来"勒索"美国，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从未有过这样的企图。原因是不言而喻的：美国拥有自己的武器，能够（也会）进行相同的报复。

"流氓国家"可能决定将一件核武器交给恐怖团体的可能性同样是微乎其微的，因为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决不能够肯定武器的转让不会被发现，或者说他们不会在事后遭到谴责和惩罚。事实上，放弃它们冒险得到的核武器是这些政权最不会去做的事情。它们将再也不能够控制这些武器可能怎样使用，美国（或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只要怀疑某个"流氓国家"具有向恐怖分子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它们就绝对不能肯定这两个国家不会使其遭受毁灭的命运。如果美国能够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苏联或中国相处，如果美国能够容忍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拥抱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印度，那么无论多么地不情愿，美国也能够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相处。

人们有时候说，威慑对这些政权并不管用，因为它们的领导人——如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是没有理性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欢迎殉道，因此对他们的威慑是无效的。用《华盛顿邮报》的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的话来说，"威慑对于反对千禧年和平、以献身祭拜为荣的宗教狂热分子来说，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而已"[85]。当然，不赞成这样的主张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地肯定说，某个世界上的领导人不可能屈服于自杀

式的疯狂。然而，有很好的理由来怀疑如此耸人听闻的观点。这些被指称为缺乏理性的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亲自发动一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准备一次真正的打击将要求许多其他人的积极帮助和赞同，而所有这些人都必须欣然接受殉道。例如，在伊朗，军事权力甚至不在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的掌握之中。进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领导人曾经寻求殉道——萨达姆·侯赛因当然没有，直到绞索套到他脖子上的时候也没有。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观点曾被提起过，并且被证明是错误的。美国的强硬派曾经认为，苏联领导人由于受意识形态驱动，蔑视人的生命，因而可能不能够对其进行威慑；而其他的美国领导人则害怕中国获得核武器，但是，中国的核行为却被证明是非常精明审慎的。[86]虽然美国领导人不应该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地区的扩散情形感到自鸣得意，但这一问题却也不能够成为美国目前如此强烈地支持以色列的战略理由。

即便叙利亚或者伊朗在像黎巴嫩和伊拉克那样的地方确实构成了对美国的挑战，或者如果它们也拥有或者想要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实际上也使得美国有效地对付它们变得更加困难。以色列的核武器库是其某些邻国为什么想要获得核武器的原因之一，而威胁对它们进行政权更迭只是强化了它们的这种愿望。尽管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美国却愿意支持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这两个原因，也使得美国在试图对付那些意欲进行核武器扩散者的时候，显得十分虚伪。然而，当华盛顿打算使用武力来打击这些政权的时候——正如两度在伊拉克所做的那样，以色列却谈不上是一笔资产，因为以色列不能够参加战斗。

进而言之，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继续压迫这两个因素，一道削弱了美国在许多其他地区的主张，使得美国在像反恐战争或者使中东民主化的相关问题上，更难以寻求有意义的合作。就像在本书的第一章所指出的那样，外国人普遍认为美国“太过于支持”以色列，而且许多外国精英认为，美国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土政策心照不宣的支持，在道德上是哑口无言的。例如，2004年4月，52名前英国外交人员联名寄给托尼·布莱尔首相一封信，说以巴冲突已经“毒化了西方同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并警告说，布什和沙龙的政策是“片面的和非法的”，将使得“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还要付出更多血的代价”。然而，实际上布莱尔并不要别人来告诉他，因为他反复——虽然不成功——试图使布什政府严肃地处理这一问题。而一个由88名美国前外交官组成的团体立即跟进的做法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们将一封类似的信件寄给了布什总统。[87]甚至像

老资格的军事记者泽厄夫·希夫（Ze'ev Schiff）这样著名的以色列人都明白："这一冲突的继续，包括以色列的占领，最终必将导致新一波的恐怖浪潮；美国非常担心的国际恐怖主义将会蔓延。"[88]2006年，这一切后果变得清晰明显了，当时美国正努力铸就一个逊尼派联盟，以帮助对付伊拉克正在恶化的局势和平衡伊朗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但是逊尼派所关心的问题——美国在以巴冲突中一以贯之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以及他们意识到的事情——与美国人走得太近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却削弱了美国为此所作出的努力。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说法："阿拉伯外交官说，像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科威特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国家将发现，在伊朗问题以及广泛的中东地区稳定问题上公开同美国站在一起将是困难的，除非华盛顿向以色列施加和平倡议的压力。"或者像一位阿拉伯外交官所说的那样："通往巴格达的路要经过耶路撒冷，而不是绕道而行。"[89]而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两党的跨党派伊拉克研究小组会在2006年12月得出结论说："除非美国直接处理阿以冲突问题，否则美国在中东将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90]

简而言之，将以色列看作美国最重要的反恐盟友以及反对各色各样的中东独裁政权的盟国，夸大了以色列在这些问题上能够提供帮助的能力，无视这一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负面作用，忽视了以色列的政策使得美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努力更加困难。自冷战结束以来，以色列的战略价值已经稳步下降。认为以色列正帮助我们打败一个权力巨大的对手这种说法，再也不能够成为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理由了；相反，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促成了美国成为激进的极端分子的攻击目标，使得美国在许多第三方——包括美国的欧洲和阿拉伯盟国——的眼中显得无情和虚伪。虽然美国从同以色列的各种战略合作行为中获益，但是以色列更多的是一笔负资产而非资产。

一个令人怀疑的盟国

质疑以色列战略价值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以色列有时候的行为并不像是一个忠诚的盟国。就像大多数国家一样，以色列首先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且当它相信——或错误地或正确地——那样做将促进自己的国家目标的时候，以色列一直愿意做那些与美国利益相反的事情。例如，在1954年臭名昭著的"拉冯事件"（Lavon affair）中，以色列特工试图炸毁美国在埃及的几个政府办公室，这是一次试图在华盛顿和开罗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拙劣行动。在1979年至1980年期间，正当美国的外交人员在伊朗被扣为人质的时候，以色列却向伊朗出售军事装备；而且在两伊战争期间，以色列还是伊朗的一个主要军事供应商，尽管美国对伊朗怀有担忧，并且心照不宣地支持伊拉克。

以色列后来在1989年从伊朗购买了3600万美元的石油，企图使在黎巴嫩被扣为人质的以色列人获释。虽然所有这些行为从以色列的立场来看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们却与美国的政策相左，对美国的总体利益造成了伤害。[91]

除了向美国的敌人销售武器，以色列还将美国的技术转让给第三国，包括像中国这样的美国潜在对手，这些行为违背美国的法律，威胁美国的利益。1992年，美国国务院的监察长报告说，从1983年开始，有证据表明以色列存在一种“不断增加的、未经授权的系统性武器转让模式”[92]。大约在同一时期，调查“道顿事件”（Dotan affair）——这是一起由以色列空军采购部门前负责人挪用或非法转移美国军事援助款项达数百万美元的事件——的美国审计总署官员不断努力同以色列官员来商讨这一事件。根据美国审计总署的说法：“以色列政府或者拒绝讨论这一问题，或者拒绝让（美国）调查人员向以色列的人员发问。”[93]

在近几年里，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据报道，当2004年以色列同意给它在1993年卖给中国的雄蜂猎杀者无人驾驶飞机进行升级的时候，甚至连一直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Douglas Feith）都愤怒了。[94]另一位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说：“在（美以）军事关系中正在发生严重的问题。”[95]

加剧这些紧张情形的是，以色列进行的那些反对美国的广泛间谍活动。根据美国审计总署的说法，这个犹太国家“比任何美国的盟国所进行的反对美国的间谍活动都要更加咄咄逼人”[96]。偷窃美国的经济秘密，使得以色列的公司在全球市场上比美国企业享有重大的优势，从而给美国的公民增加了额外的成本。

然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以色列持续努力偷窃美国军事秘密的行为。这一问题由于臭名昭著的江奈生·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案而显得更加突出了。波拉德是一位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1984年至1985年期间，他提供给以色列大量高度机密的材料。在波拉德被抓获后，以色列拒绝告诉美国波拉德提供了什么东西给他们。[97]波拉德案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1986年，以色列间谍人员从一家美国公司偷窃间谍照相机技术，一个美国的裁决小组后来指控以色列的行为“背信弃义”、“违反法律”和“鬼鬼祟祟”，并下令以色列向那家公司——侦查/光学公司（Recon/Optical Inc.）——赔付大约300万美元的损失。以色列的间谍也进入到有关五角大楼电子情报计划的美国机密信息中，并企图招募国防部的高级反恐官员诺尔·科奇（Noel Koch），虽然结果并不成功。《华尔街日报》引用司法部内务安全处的前负责人约翰·达维特（John Davitt）的话说：“我们这些在谍报领

域做事的人，将以色列看作外国在美国从事情报活动第二活跃的国家。”[98]

2004年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议，当时五角大楼的一位主要官员拉里·富兰克林（Larry Franklin）因被控将有关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机密情报给一名以色列外交官而被逮捕，据说他得到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两名高级官员斯蒂文·罗森和凯斯·维斯曼（Keith Weissman）的帮助。富兰克林最后接受了法庭的判决（plea bargain），因他在这起事件中的角色而被判入狱12年，罗森和维斯曼则按计划在2007年秋天接受审判。[99]

以色列当然不是唯一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国家，而且华盛顿也针对盟国和对手进行广泛的间谍活动。这样的行为既不令人吃惊，也没有什么好特别指责的，因为国际政治大致就是这样的勾当，而且一个国家经常肆无忌惮地尽力获得压倒他国的优势。然而，华盛顿与耶路撒冷的紧密关系，却使得以色列更容易偷窃到美国的秘密，而以色列也毫不犹豫地在那样做。至少，以色列愿意对它的主要保护者进行间谍活动，进一步使人怀疑其全面的战略价值，尤其是在冷战已经结束的此刻。

结论

毫无疑问，以色列从美国的支持中获益巨大，虽然有人也会说这种支持被以色列利用来追求那些并不符合其长远利益的政策——例如定居点的修建。同样清楚的是，美国从对以色列的援助中获得了一些战略价值，特别是在冷战期间。然而，这些好处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美国为什么会在如此漫长的时期里一直愿意支持以色列，并且使之合理化。在冷战高峰的时候，虽然资助和保护以色列对于美国来说可能曾经是净资产——尽管这一观点并非一目了然，但是，当苏联解体和超级大国在中东的竞逐结束的时候，那一理论就消失了。今天，美国紧密地拥抱以色列——尤其是无论以色列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美国都愿意资助它——不是使得美国人更加安全或更加繁荣。相反，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正破坏美国同其他盟国之间的关系，使世人怀疑美国的智慧和道德观，帮助鼓励新一代的反美极端分子，使美国应对这个反复无常但至关重要地区所作出的努力复杂化。简而言之，美以之间基本上无条件的“特殊关系”，在战略理由上已不再站得住脚了。如果要找到令人信服的理论，我们必须将眼光投向他处。在下一章里，我们考察的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道德理由。

---

[1] A.F.K.Organski， *The $ 36 Billion Bargain*： *Strategy and Politics in U.S.Assistance to Israel*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Steven L.Spiegel， “Israel as a Strategic Asset，” *Commentary*， June

1983； Steven L.Spiegel， *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Making America's Middle East Policy from Truman to Reag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以及Steven L.Spiegel， “U.S.-Israel Relations after the Gulf War，” *Jerusalem Letter/Viewpoints 117*，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July 15， 1991。也可参见Steven Rosen， “The Strategic Value of Israel，” *AIPAC Papers on U.S.-Israel Relations* （Washington， DC：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1982）。

[2] 引自Ben Bradlee Jr.， “Israel's Lobby，” *Boston Globe*， April 29， 1984。

[3] 参见http：//aipac.org/Publications/AIPACAnalysesIssueBriefs/The_U.S.-Israel_Strategic_Partnership.pdf，以及http：//aipac.org/Publications/AIPACAnalysesIssueBriefs/The_U.S.Israel_Relationship.pdf。

[4]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Letter to President Bush on the War on Terrorism，” September 20， 2001，登录www.newamericancentury.org/Bushletter.htm，以及“Mission Statement，” 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ity Affairs，登录www.jinsa.org/about/agenda/agenda.html。

[5] Martin Kramer， “The American Interest，” *Azure 5767*， no.26（Fall 2006）： 24—25.

[6] Efraim Inbar， “Still a Strategic Asset for the US，” *Jerusalem Post*， October 8， 2006.

[7] 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像施皮格尔、奥根斯基和克雷默这样的学者，他们对国内政治或游说集团影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方面不予重视或加以理睬。奥根斯基认为：“美国关于以色列的政策决定，主要都是由总统和外交政策精英自行作出的，或者完全出于其自身的理由而作出的。”克雷默认为：“如果（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机构明天就消失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将依然不会减弱。”施皮格尔将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想法，描述为一个“神话”。尽管存在这些主张，但是施皮格尔的研究却包含了大量以色列游说集团塑造关键决策者的认知和行为的例子。克雷默本身的职业生涯显示，他并不相信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为美国支持以色列而进行辩护，并且攻击那些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参见Organski， ＄ *36 Billion Bargain*， 27； Spiegel，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p.386， p.388，以及Kramer， “American Interest，” p.31。

[8] 学者们已经对杜鲁门的决定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从而在关于国内政治的重要性和他对犹太人想法的敏感性方面得出了各种结论。显然，在他寻求掌控巴勒斯坦的复杂局势时，虽然这并非影响他行为的唯一因素，但几乎所有的叙述都认为，在他的考虑中，美国犹太人的政治偏好——即将来临的1948年选举加大了这种偏好的分量——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参见Spiegel，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pp.47—48； Kenneth Ray Bain， *The March to Zion*： *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the Founding of Israel*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Press， 1979）， pp.195—197， p.202； Zvi Ganin， *Truman*， *American Jewry*， *and Israel*， *1945—1948*（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9），以及Michael B.Oren， *Power*， *Faith and Fantasy*：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orton， 2007）， p.484， pp.488—489， 499。

[9] 引自Jerome Slater， “Ideology vs.the National Interest： Bush， Sharon， and U.S.Policy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12*， no.1（Autumn 2002）： 167。

[10] Warren Bass， *Support Any Friend*： *Kennedy's Middle East and the Making of the U.S.-Israel Alli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48—149，以及David Schoenba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36—137。

[11] 尼克松/基辛格战略的归纳总结参见William B.Quandt， *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1967*， 3rd ed.（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p.69—70， 92—94；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1279， 1289—1291， chap.10，以及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Little， Brown， 1982）， pp.195—205。

[12] 以色列同意西方国家的飞机在1958年约旦危机期间飞越其领空；在叙利亚于1970年干预侯赛因国王同巴解组织的冲突后，以色列同意美国的请求而出面干预支持侯赛因国王。最后，约旦航空兵部队依靠自己的力量对叙利亚人进行了攻击，而叙利亚则在以色列用不着必须作出反应的情况下撤军。虽然美国官员感激以色列在这两件事情上的支持，但是艾伦·道蒂（Alan Dowty）却指出，以色列在解决1970年危机问题上的贡献，“最多只能算是次要的作用”。奈杰尔·艾什顿（Nigel Ashton）也认为，危机期间侯赛因将以色列看作潜在的威胁，美国官员错误地相信以色列是在帮助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而事实上这只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一次斗争。Alan Dowty， *Middle East Crisis*： *Decisionmaking in 1958*， *1970*， *and 1973*（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177； Nigel J.Ashton， “Pulling the Strings： King Hussein's Role During the Crisis of 1970 in Jor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8*， no.1（March 2006）： 109，以及Quandt， *Peace Process*， pp.79—83。

[13] Dan Raviv and Yossi Melman， *Friends in Deed*： *Inside the U.S.-Israel Alliance* （New York：Hyperion， 1994）， pp.66—68， 114—115.

[14] 担任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军事援助科的长期负责人，有一个关于“战略资产”观点方面富有同情心但却持怀疑态度的分析，参见Harry Shaw， “Strategic Dissensus，” *Foreign Policy* 61（Winter 1985—1986）。

[15] 据报道，作为对来自埃及的潜入者杀害一名骑自行车的以色列人这一事件的回应，本-古里安也把对加沙的袭击解释为鼓舞以色列士气、渲染他重新掌权，以及削弱纳赛尔不断增加的声望的一种方式。但是就像施罗姆·本-阿米所观察的那样：“（加沙袭击行动）加强了埃及致力于战争的战略，而不是相反。”*Scars of War*， *Wounds of Peace*： *The Israeli-Arab Trage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77；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Norton， 2001）， pp.123—129； Michael Brecher， *Decisions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54—255，特别是注解1，以及E.L.M.Burns， *Between Arab and Israeli* （New York： Ivan Obolensky， 1963）， p.20。在这一时期，叙利亚也有类似寻求得到苏联武器的动机，而且1955年12月发生的以色列的超强袭击，使叙利亚对援助更加渴望。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62，特别是注释36。

[16] 关于苏联同阿拉伯联盟之间吵吵闹闹的关系，参见Mohamed Heikal， *The Sphinx and the Commissar*：*The Rise and Fall of Soviet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arper， 1976）； Alvin Z.Rubinstein， *Red Star on the Nile*： *The Soviet-Egyptian Influence Relationship Since the June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以及Ya'acov Roi， ed.， *From Encroachment to Involvement*： *A Documentary Stud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73*（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74）。

[17] 关于这一结果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参见Jerome Slater， "The Superpowers and an Arab-Israeli Political Settlement： The Cold War Year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5*， no.4（Winter 1990—1991）。

[18] "Kissinger Memorandum： 'To Isolate the Palestinians，'" MERIP Reports no.96（May 1981）： 24.这篇文章是有关1975年6月基辛格与所谓的克卢茨尼克团体（Klutznick Group）之间进行对话的一份备忘录，这个团体是一个由菲利普·克卢茨尼克（Philip Klutznick）组织起来的美国犹太裔领导人的集会，而菲利普·克卢茨尼克则是国际圣约信徒会的前主席和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参见Quandt， *Peace Process*， pp.103—104。

[19] Ussama Makdisi， "'Anti-Americanism' in the Arab World： An Interpretation of a Brief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9*， no.2（September 2002）： 538—539.国会研究服务处的艾尔弗雷德·普拉多斯（Alfred Prados）同意这一观点，他指出："作为中东地区迟到者的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该地区享有比欧洲国家更好的形象。""Middle East： Attitud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cember 31， 2001， p.2.

[20] Shibley Telhami， *The Stakes*：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CO： Westview， 2002）， pp.50—59，以及Makdisi， "'Anti-Americanism' in the Arab World，" pp.548—550。

[21] Shaw， "Strategic Dissensus，" p.137.

[22] Moshe Dayan： *Story of My Lif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6）， pp.512—513.

[23] 虽然"石油武器"所造成的总成本几乎肯定比这更高，因为它对通货膨胀、实际收入和生产力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并且也对投资、货币价格波动，以及其他因素产生了间接影响，但经济学家对这些影响的大小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关于石油进口，参见Dominick Salvatore， "Petroleum Pric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G-7 Countries，" in Siamack Shojai and Bernard S.Katz， eds.， *The Oil Market in the 1980s*： *A Decade of Decline* （New York： Praeger， 1992）， p.94，以及Mancur Olson，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the Oil Shocks and the Real Cycl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 no.4（Fall 1988）： pp.43—6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它们的净进口石油账单由1973年的35亿美元推升到1974年的1000多亿美元。参见Robert J.Lieber， *The Oil Decade*： *Conflict and Co operation in the West* （New York： Praeger， 1983）， p.21。国内生产总值是由联邦能源署和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估算的。参见Edward N.Krapels， *Oil Crisis Management*： *Strategic Stockpiling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4，以及Fiona Venn， *The Oil Crisis* （London：Longman， 2002）， pp.154—155。2000年的美元计算所利用的数据来自Louis D.Johnston and Samuel H.Williamson， "The Annual Real and Nominal GDP for the United States， 1790-Present，" *Economic History Services*， October 2005。

[24] 引自Jeffrey Richelson， *The U.S.Intelligence Community*， 2nd ed.（Cambridge， MA： Ballinger， 1989）， p.277。

[25] 引自Roland Popp， "Stumbling Decidedly into the Six Day War，" *Middle East Journal 60*， no.2（Spring 2006）： 300。汤姆·塞戈夫已确认，罗斯托的评估基本上是正确的。参见他的作品*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trans.Jessica Cohen（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pp.256—258。

[26] Shlomo Brom， "The War in Iraq： An Intelligence Failure，" *Strategic Assessment* （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Tel Aviv University）6， no.3（November 2003）； "Selections from the Media， 1998—2003，" ibid.， pp.17—19， Gideon Alon， "Report Slams Assessment of Dangers Posed by Libya， Iraq，" *Ha'aretz*， March 28， 2004； Dan Baron， "Israeli Report Blasts Intelligence for Exaggerating the Iraqi Threat，" *JTA.org*， March 28， 2004； Greg Myre， "Lawmakers Rebuke Israeli Intelligence Services over Iraq，"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2004，以及James Risen， *State of Wa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pp.72—73。

[27] Kramer， "American Interest，" pp.24—25.

[28] 肖还指出："所有的以色列人十分清楚，即使在短暂而成功的战争中，一个只有400万人口的国家，其人口损失对这个国家所造成的负担。以色列根本缺乏人员来为超越其紧邻之外的代价高昂的军事冒险而作出牺牲。""Strategic Dis-sensus，" p.130。

[29] 引自Duncan L.Clarke， Daniel B.O'Connor， and Jason D.Ellis， *Send Guns and Money*：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U.S.Foreign Policy* （Westport， CT： Praeger， 1997）， p.173。另外一名国防部官员指出，除了形式上的作用外，以色列“邻近波斯湾并不足以成为那里真正有用的战斗基地。如果发生任何真正的军事意外事件，我们需要依靠更加接近那里的地方，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努力要在阿曼设立基地的原因”。以色列的贡献将局限在维修和可能的医院设施上。参见Joe Stork，“Israel as a Strategic Asset，” in MERIP Reports no.105， *Reagan Targets the Middle East* （May 1982）， p.12。

[30] Shaw，“Strategic Dissensus，” p.133.

[31] 参见最渴望意志行动（Operation Earnest Will）的讨论，登录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earnest_will.htm，以及Dilip Hiro， *The Longest War*： *The Iran-Iraq Military Conflict*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129—132， 166， 186—191， 202—204。

[32] “Kissinger Memorandum，” p.25.

[33] 1980年竞选期间，里根曾告诉美国犹太人报业协会说：“以色列对美国来说是战略性的资产，（而且）我相信我们必须有具体表达这一立场的政策。”参见Stork，“Israel as a Strategic Asset，” p.3，以及Ronald Reaga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0）， p.410。

[34] 关于后一个因素，费尔德曼说道：“这种现象最明显的表现是有影响力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独特作用。”参见费尔德曼的作品*The Future of U.S.-Israel Strategic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1996）， pp.5—6。

[35] Bernard Lewis，“Rethinking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71*， no.4（Fall 1992）： pp.110—111； Bernard Reich， *Securing the Covenant*： *United States-Israeli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Westport， CT： Praeger， 1995）， p.123，以及Robert J.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37。

[36] 所引用的沃尔德格雷夫的话参见David Kimche， *The Last Option*： *After Nasser*， *Arafat*， *and Saddam Hussein*， *the Quest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cribner， 1991）， p.236； Lewis，“Rethinking the Middle East，” pp.110—111。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历史得以重演。美国需要召集一个大联盟，以便使其预防性战争显得合法，因此，它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说服一系列国家向“志愿者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派军队。但以色列却不在这些国家的行列之中，即使以色列领导人及其民众坚决支持这场战争。我们在第八章中花了更长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

[37] 根据来自美国国家防止恐怖主义纪念协会（Memorial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数据库的数据，登录www.tkb.org。

[38] 虽然丹尼尔·本杰明和史蒂文·西蒙已表明，克林顿政府中的部分成员将反恐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但他们也证明在20世纪90年代要优先进行反恐是多么困难。用他们的话来说：“这项工作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一个从未将恐怖主义看作是最高级别威胁的政府，既没有以那种方式来对付恐怖主义的组织机构，也没有以那种方式来对付恐怖主义的法律。在许多机构中，对付恐怖主义问题的办公室是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场所，其负责人根本不具备与他们级别相同的那些同事一样的分量，因为那些同事处理的以地理区域为单位的问题或像军备控制这样引人注目的问题。”布什政府上任之初并没有把恐怖主义置于高度优先地位这件事情也是具有启迪性的。参见Daniel Benjamin and Steven Simon， *The Age of Sacred Terr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p.221， pp.327—329，以及Richard A.Clarke， *Against All Enemies*： *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pp.227—236。

[39] 换言之，美国国防预算超过这四个国家合起来的经济规模的一半（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进行衡量）。这些数字来自*The Military Balance 2000—2001*（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1），以及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orld Factbook 2000*（online）。

[40] 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和伊朗政策，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美国对“无赖国家”政策的精彩分析，参见Robert Litwak， *Rogue States and U.S.Foreign Policy*： *Containment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0）。虽然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基本上支持更为咄咄逼人的伊朗政策和伊拉克政策，并且偶尔投票支持严厉制裁和各种反对这些政权的流亡者，但是克林顿政府却从未对政权更迭作出过严肃的努力。

[41] Bruce W.Jentleson and Christopher A.Whytock，“Who ‘Won’ Libya？ The Force-Diplomacy Debat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no.3（Winter 2005—2006）； Ronald Bruce St.John，“Libya Is Not Iraq： Preemptive Strikes， WMD， and Diplomacy，” *Middle East Journal 58*， no.3（Summer 2004），以及Flynt Leverett，“Why Libya Gave Up on the Bomb，”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04。

[42] Litwak， *Rogue States and U.S.Foreign Policy*， pp.168—169.

[43] 沙龙的话引自William Safire，“Israel or Arafa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2001；不具名官员的话引自Robert G.Kaiser，“Bush and Sharon Nearly Identical on Mideast Policy，”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9， 2003。也可参见Nathan Guttman，“A Marriage Cemented by Terror，” *Salon.com*， January 24， 2006。

[44] “Netanyahu Speech Before the U.S.Senate，” April 10， 2002，登录www.netanyahu.org/netspeacinse.html，以及Benjamin Netanyahu，“Three Principles Key to Defeat of Terrorism，” *Chicago Sun-Times*， January 7， 2002。

[45] Ehud Barak，“Democratic Unity Is the Only Answer to Terrorism，” *Times* （London）， September 13， 2001.

[46] “Entire Text of Olmert Speech to Congress，” *Jerusalem Post*， May 24， 2006.

[47] Robert Satloff，“Israel's Not the Issue， Pass It On，”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0， 2001.

[48] “Peace Can Only Come Once the US Gives Israel the Green Light to Eliminate Hamas and the Hezbollah，” 2001年12月3日美国参议院查尔斯·舒默办公室新闻稿，登录www.senate.gov/~schumer/1-Senator%20Schumer%20Website%20Files/pressroom/press_releases/PR00766.html。

[49] 众议院392号决议（2002年5月2日），以及参议院247号决议（2002年4月22日）。

[50] 根据一份报告的说法：“即使发言者把阿拉法特挑出来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也只是将他描述为一个广泛得多的‘力量联盟’——其中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中的一个伙伴而已……关于平衡这些威胁的问题，政权更迭则是优先的选择。”参见Dana Hearn，“AIPAC Policy Conference， 21—23 April 2002，”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1*， no.4（Summer 2002）： pp.67—68。

[51] “Letter to President Bush on Israel， Arafat，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April 3， 2002，登录www.newamericancentury.org/Bushletter-040302.htm。公开信的主要作者威廉·克里斯托尔，在2006年以色列进行的黎巴嫩战争期间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叙利亚和伊朗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们也是美国的敌人，”并得出结论说，“这也是我们的战争。” William Kristol，“It's Our War，” *Weekly Standard*， July 24， 2006.

[52] 梅佐和西尔的话引自Susan Taylor Martin，“Experts Disagree on Dangers of Syria，” *St.Petersburg Times*（online）， November 3， 2002。也可参见Benjamin and Simon， *Age of Sacred Terror*， p.194。

[53] 在其他的许多研究中，可参见Tanya Reinhart， *Israel/Palestine*： *How to End the War of 1948*， expanded 2nd ed.（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5），以及Tanya Reinhart， *The Road Map to Nowhere*： *Israel/Palestine Since 2003*（London： Verso， 2006）。

[54] 就像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令人信服地表明的那样，自杀式恐怖主义是为一系列各种不同的政治运动所采取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通常是在他们居于弱势地位，并试图击败恐怖分子认为从事非法占领的民主敌手的情况下而采用的。参见Robert A.Pa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55] Satloff，“Israel's Not the Issue”； Kramer，“American Interest，” p.29； Norman Podhoretz，“Israel Isn't the Issu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0， 2001； Norman Podhoretz，“World War IV： How It Started， What It Means， and Why We Have to Win，” *Commentary*， September 2004； Andrea Levin，“Don't Scapegoat Israel，” *Boston Globe*， October 6， 2001，以及Dennis Ross，“Bin Laden's Terrorism Isn't About the Palestinian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2001。其他在这一点上对我们最初的文章作出回应的有Alan Dershowitz，“Debunking the Newest—and Oldest—Jewish Conspiracy： A Reply to the Mearsheimer-Walt ‘Working Paper，’” 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2006， 29； Marc Landy，“Zealous Realism： Comments on Mearsheimer and Walt，” *Forum* （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4， issue 1， article 6（2006），以及Steven Simon，“Here's Where ‘The Israel Lobby’ Is Wrong，” *Daily Star*， May 4， 2006。

[56] Abdel Mahdi Abdallah，“Causes of Anti-Americanism in the Arab World： A Socio-Political Perspective，”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7*， no.4（December 2003）.

[57] 1948年访问美国期间，库特布形成了他对美国的印象，他后来被埃及政府于1966年处决。参见Y.Haddad，“Sayyid Qutb： Ideologue of Islamic Revival，” in *Voices of Resurgent Islam*， ed.John Esposito（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67—98。

[58] 引自Makdisi，“‘Anti-Americanism’ in the Arab World，” p.555。

[59] Steve Coll，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pp.250—251， 273，以及“Transcript： The Yasin Interview，” *60 Minutes*， June 2， 2002，登录www.cbsnews.com/stories/2002/06/02/60minutes/printable510847.shtml。

[60] Anonymous[Michael Scheuer]， *Through Our Enemies' Eyes*： *Osama bin Laden*， *Radical Islam*，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assey's， 2002）， p.87.

[61] 引自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 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New York： Knopf， 2006）， pp.75—76。

[62] *Messages to the World*： *The Statements of Osama bin Laden*， ed.Bruce Lawrence（London： Verso，2005）， p.4.

[63] Benjamin and Simon， *Age of Sacred Terror*， pp.140—141.

[64] Osama bin Laden， “From Somalia to Afghanistan”（March 1997）， in Lawrence， *Messages to the World*， p.46.至于其他“9·11”以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谴责，以及对美国与以色列沆瀣一气的指责，参见同一卷中的以下节选：“Declaration of Jihad”（August 23， 1996）， p.30；“World Islamic Front”（February 23，1998）， pp.60—61，以及“A Muslim Bomb”（December 1998）， pp.66—70。也可参见“Jihad against Jews and Crusaders”和“New Osama bin Laden Video Contains Anti-Israel and Anti-American Statements，” on 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 website，登录www.adl.org/terrorism_america/bin_l_print.asp。

[65] Max Rodenbeck， “Their Master's Voic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9， 2006， p.8.被评论的书包括Peter L.Bergen， *The Osama bin Laden I Know*： *An Oral History of al Qaeda's Leader*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以及Lawrence， *Messages to the World*。

[66] “9·11”委员会也称“有关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该委员会于2002年11月27日通过国会立法和布什总统签署该项立法而得以成立。委员会各包括5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主席是新泽西州前州长、共和党人托马斯·基恩（Thomas Kean），副主席是前众议院议员、民主党人李·H.汉密尔顿（Lee H.Hamilton）。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对有关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情形进行全面彻底的描述”。在有关这次袭击的最终报告发表之后，该委员会于2004年8月21日解散。——译者注

[67] “Outline of the 9/11 Plot，” Staff Statement no.16，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June 16， 2004， p.18.也可参见Nathan Guttman， “Al-Qaida Planned Attacks during PM's Visit to White House，” *Ha'aretz*， June 17， 2004，以及Marc Perelman， “Bin Laden Aimed to Link Plot to Israel，” *Forward*， June 25， 2004。

[68] “Outline of the 9/11 Plot，” p.18.

[69] Ibid.， 4.

[70]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Norton， 2004）， p.145， p.147.

[71] 关于巴勒斯坦人的第一次起义，参见Joost R.Hiltermann， *Behind the Intifada*： *Labor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Intifada*：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Against Israeli Occupation*， ed.Zachary Lockman and Joel Beinin（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9）；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New York：Vintage， 2001）， chap.12，以及Ze'ev Schiff and Ehud Ya'ari， *Intifada*：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Israel's Third Front*， ed.and trans.Ina Friedmann（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72] 引自Michael Slackman， “As Crowds Demand Change， Lebanese Premier Is Puzzle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06。

[73]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A Year After Iraq War*： *Mistrust of America in Europe Even Higher*， *Muslim Anger Persists*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March 16，2004）， p.21.

[74]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What the World Thinks in 2002*（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December 2002）， p.54.

[75] Shibley Telhami， *The Stakes*：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2002）， p.96.也可参见Ami Eden， “9/11 Commission Finds Anger at Israel Fueling Islamic Terrorism Wave，” *Forward*， July 30， 2004。

[76] 马科蒂希继续写道：“有关阿拉伯世界中的反美主义的叙述，甚至连开始传达出阿拉伯人对美国愤怒的本质、深度，以及绝对的强度都不能够做到，因为此类叙述并没有诚实地表达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理解。”“‘Anti-Americanism’ in the Arab World，” p.552。

[77] “Impressions of America 2004： How Arabs View America， How Arabs Learn About America”（Washington， DC： Zogby International， June 2004）， pp.3—5；“Five Nation Survey of the Middle East”（Washington， DC： Arab-American Institute/Zogby International， December 2006）， p.4，以及Prados， “Middle East： Attitud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p.8。

[78] 引自Peter Ford， “Why Do They Hate U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27， 2001。

[79] *Report of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 Technology， and Logistics， September 2004）， p.40，以及*9/11 Commission Report*， p.376。

[80] “Impressions of America 2004： A Six Nation Survey”（Washington， DC： Zogby International， 2004）； Shibley Telhami， “Arab Public Opinion： A Survey in Six Countries，” *San Jose Mercury*（online）， March 16， 2003； John Zogby， *The Ten Nation Impressions of America Poll*（Utica， NY： Zogby International， April 11， 2002），以及Shibley Telhami， “Arab Attitudes Towards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edia，” a public opinion poll by the Anwar Sadat Chair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nd Zogby International， October 2005，登录www.bsos.umd.edu/sadat/pub/survey-2005.htm。

[81] *Changing Minds*， *Winning Peace*： *A New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U.S.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这是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顾问小组的报告中的第18页，该报告于2003年10月1日提交给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也可参见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 *War with Iraq Further Divides Global Publics*（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June 3， 2003）。

[82] Warren Hoge， “U.N.Distances Itself from an Envoy's Rebuke of Israel and the U.S.，”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04； “Brahimi's Israel Comments Draw Annan， Israeli Fire，” *Ha'aretz*， April 23， 2004，以及“Egyptian Prez： Arabs Hate US，”登录www.cbsnews.com/stories/2004/04/20/world/printable612831.shtml。

[83] David Shelby， “Jordan's King Abdullah Stresses Urgency of Mideast Peace Process，” March 7， 2007，登录www.usinfo.state.gov。

[84] “President Discusses War on Terror and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Cleveland， Ohio（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March 20， 2006）.

[85]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Tehran Calculus，”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5， 2006.也可参见Bernard Lewis， “August 22，”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8， 2006。关于两位以色列学者的类似观点，参见Yossi Klein Halevi and Michael B.Oren， “Contra Iran，” *New Republic*， February 5， 2007。关于萨达姆·侯赛因也是失去理智和不受威吓的观点，参见Kenneth M.Pollack， *The Threatening Storm*： *The Case for Invading Iraq*（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86] 虽然中国在获得核弹之前，毛泽东确实说了一些不在乎核武器的言论，但是这些声明几乎肯定是想要阻止其他核大国试图向北京施压。参见Alice Langly Hsieh， *Communist China's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Era*（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2）。腊斯克的观点见诸*The China Reader*， Vol.3： *Communist China*， ed.Franz Schurmann and Orville Schell（New York： Vintage， 1967）， p.508。关于苏联，经典的陈述是Richard Pipes， “Why the Soviet Union Thinks It Can Fight and Win a Nuclear War，” *Commentary*， July 1977。

[87] 关于英国外交官的信件，参见“Doomed to Failure in the Middle East，” *Guardian*， April 27， 2004。也可参见Nicholas Blanford， “US Moves Inflame Arab Moderat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26， 2004； Rupert Cornwell， “Allies Warn Bush That Stability in Iraq Demands Arab-Israeli Deal，” *Independent*， June 10， 2004； Glenn Kessler and Robin Wright， “Arabs and Europeans Question ‘Greater Middle East’ Pla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2， 2004，以及Robin Wright and Glenn Kessler， “U.S.Goals for Middle East Falter，” *Washington Post*， April 21， 2004。查看美国的信函可登录www.wrmea.com/letter_to_bush.html。

[88] Ze'ev Schiff， “Fitting into America's Strategy，” *Ha'aretz*， August 1， 2003.

[89] Jay Solomon， “Religious Divide： To Contain Iran， U.S.Seeks Help from Arab Allie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4， 2006.

[90] James A.Baker III and Lee H.Hamilton， co-chairs， *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Washington， DC： U.S.Institute of Peace， December 2006）， p.39.

[91] 关于“拉冯事件”，参见Schoenba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pp.107—108。关于以色列与伊朗进行的各种交易，参见“Israel-Iran Oil Deal Disclosed and Tied to Captiv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1989； Youssef M.Ibrahim， “Oil Sale Disclosure Upsets Israeli-Iranian Contact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1989； Bishara Bahbah， “Arms Sales： Israel's Link to the Khomeini Regime，”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online）， January 1987，以及Benjamin Beit-Hallahmi， *The Israeli Connection*： *Who Israel Arms and Why*（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pp.3—22， 108—175。虽然作为臭名昭著的伊朗门武器丑闻事件的一部分，里根政府确实曾向伊朗提供过武器，但这一秘密行动基本上是试图争取释放美国在黎巴嫩的人质；而一旦曝光，这一行动就被广泛地认为与范围更广的美国利益相左。

[92] 引自Duncan L.Clarke， “Israel's Unauthorized Arms Transfers，” *Foreign Policy 99*（Summer 1995）： 94。

[93] Richard C.Stiener， “Foreign Military Aid to Israel： Diversion of U.S.Funds and Circumvention of U.S.Program Restrictions，”在众议院能源商务委员会监控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上的作证（Washington， DC： 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October 1993）， p.22。也可参见Edward T.Pound， “Israel Is Impeding U.S.Dotan Probe， Documents Show，”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9， 1992，以及Edward T.Pound， “U.S.Says Israel Withheld Help in Dotan Prob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5， 1992。

[94] 关于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参见Aluf Benn and Amnon Barzilai，“Pentagon Official Wants Yaron Fired，” *Ha'aretz*， December 16， 2004； Caroline B.Glick and Arieh O'Sullivan，“Pentagon Denies It Wants Yaron Dismissed，”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16， 2004； Nina Gilbert，“Yaron Won't Give Info on Arms Sales to China，”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30， 2004；“Israeli， U.S.Talks on Weapons Deals with China End Without Result，” *Ha'aretz*， June 29， 2005； Marc Perelman，“Spat Over Sales of Weapons Chilling Ties Between Jerusalem and Beijing，” *Forward*， December 24， 2004； Marc Perelman，“China Crisis Straining U.S.-Israel Ties，” *Forward*， August 5， 2005； Marc Perelman，“Israel Miffed over Lingering China Flap，” *Forward*， October 7， 2005； Ze'ev Schiff，“U.S.-Israel Crisis Deepens over Defense Exports to China，” *Ha'aretz*， July 27， 2005，以及Janine Zacharia，“‘Something Wrong’ in US-Israeli Military Ties as Split Deepens on China，”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26， 2004。

[95] 引自Zacharia，“US-Israeli Military Ties”。

[96] 引自Duncan L.Clarke，“Israel's Economic Espion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7*， no.4（Summer 1998）： 21。也可参见Bob Drogin and Greg Miller，“Israel Has Long Spied on U.S.Say Officials，”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3， 2004；“FBI Says Israel a Major Player in Industrial Espionage，” *Jewish Bulletin*（online）， January 16， 1998； Mark，“Israeli-United States Relations，” November 9， 2004， pp.14—15，以及Joshua Mitnick，“U.S.Accuses Officials of Spying，” *Washington Times*， December 16， 2004。

[97] 新闻记者西摩·赫什声称，为了使苏联犹太人获得出境签证，以色列将一些窃取到的情报给了苏联。虽然其他人曾对这种看法提出挑战，但是赫什却坚持自己的看法。Seymour M.Hersh， *The Samson Option*： *Israel's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p.285—305，以及Seymour M.Hersh，“Why Pollard Should Never Be Released，” *New Yorker*， January 18， 1999.

[98] 关于这些事件，参见Edward T.Pound and David Rogers，“Inquiring Eyes： An Israeli Contract with a U.S.Company Leads to Espionag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7， 1992。

[99] 关于富兰克林事件的总体概述，参见Jeffrey Goldberg，“Real Insiders： A Pro-Israel Lobby and an F.B.I.Sting，” *New Yorker*， July 4， 2005。罗森和维斯曼否认了这些指控，而且这个案子依然悬而未决。

第三章 越来越站不住脚的道德理由

当乔治·W.布什于2004年5月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政策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他援用了一套道德主题来解释为什么美国支持以色列。总统的讲话一开始就鼓掌称赞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增强我们国家之间联系的纽带——我们共有的价值、我们对自由的坚强承诺”所作出的努力。他继续强调说，以色列同美国“有许多共同点。我们都是……为斗争和牺牲而生的国家。我们都是由那些在其他地方逃离宗教迫害的移民所建成的国家。我们都是已经建立了充满生机、以法治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的国家，而且我们都是以某些基本信仰为基础的国家，即上帝关注着人类的事务，珍重每一个生命。这些纽带使我们成为天然的盟国，而且这些纽带永远都不会断裂”。

布什也注意到两国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并且从中得出一个道德结论。由于美国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美国在过去相对比较安全，而“以色列作为一个四面都是由强硬的邻国所环伺的小国，其面临的局面迥然不同。以色列人民在自己的边境上总是有敌人存在，而且恐怖分子总是近在咫尺。以色列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用技巧和英雄主义捍卫自己。而作为以色列人民勇敢行为的结果，以色列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尊敬”[1]。

布什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强调，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正当理由通常不是出于战略考虑，而是以根本的道德主张为基础的。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道德理论是以几种不同的观点为基础的，而以色列的支持者则经常援引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观点，来证明这种“特殊关系”的正当性。具体而言，有人说以色列之所以值得美国慷慨而且近乎无条件的支持，是因为以色列是个弱小的国家，是一个被敌国环伺并致力于摧毁它的国家；是因为它是个民主国家，它的政府形式在道德上是更好的；是因为犹太人民在过去的罪恶中蒙受极端的苦难；是因为以色列的行为在道德上优于其对手，尤其与巴勒斯坦相比更是如此；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拒绝了2000年7月以色列在戴维营慷慨给予的和平，相反却选择了战争；是因为《圣经》中清楚地表明，以色列是上帝意志的创造物。归结到一起，这些观点支持的是这样一个更为普遍的主张，即以色列是在中东与美国享有共同价值的国家，因此在美国人民中间享有广泛的支持。虽然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接受这些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即便情形并非如此，美国人民也被认为要求他们支持以色列，理所当然地不会向这个犹太国家施加任何的压力。

如果就近进行审视的话，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理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虽然存在着支持以色列生存的强大道德理由，但幸运的是，以色列的生存目前并不存在危险。客观地看，以色列过去和现在的行为，几乎没有为其比巴勒斯坦人在享有更多特权方面，或者为其在该地区采取不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政策，提供什么道德基础。

这一道德理论深深依赖于对以色列历史的特定理解——许多美国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两者）都普遍持有那种理解。在这种对历史的理解中，中东的犹太人长期以来都是受害者，就像他们过去在欧洲曾是受害者一样。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从来没有充当过刽子手；他几乎总是受害者的角色。"[2]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则是加害者，他们明显具有欧洲那些迫害犹太人的反犹主义者相类似的特性。这种观点在列昂·尤里斯（Leon Uris）1958年的小说《出埃及记》（*Exodus*）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部小说既把犹太人描述为受害者和英雄，又将巴勒斯坦人描述成暴徒和懦夫。在1958年至1980年期间，这本书的销售量达到2000万册，在1960年被拍成了流行电影。学者们揭示，《出埃及记》的叙述对于美国人如何看待阿以冲突，已经产生了经久不息的影响力。[3]

以传统的智慧来理解以色列是如何建国的，以及随后它对巴勒斯坦人及其相邻国家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这种理解是建立在一套过去所发生事件的神话基础之上的，而在过去的20年里，以色列的学者们已经系统性地对这些事件进行了摧毁性的加工。[4]虽然犹太人过去在欧洲毫无疑问屡次受到迫害，但是在过去的100年间，犹太人在中东却经常都是加害者，而他们所加害的人过去是，今天依然是巴勒斯坦人。这一基本观点不仅得到大量证据的支持，而且从直觉上来说似乎也是合理的。毕竟犹太人怎么能够在不采取严厉措施针对已经居住在这片土地——而犹太人要夺取这片土地作为自己的新国家——上的阿拉伯人的情况下，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呢？就像那些欧洲人一样，他们如果不针对土著居民犯下严重罪行的话，就建立不了美国和加拿大；如果不对当地的居民——他们注定是要憎恨这些侵略并试图进行反抗——犯下类似的罪行，犹太复国主义者几乎没有可能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犹太国家。不幸的是，这种"新的历史"——就像在以色列所称呼的那样——在美国却还未得到足够的认可，这正是道德理论依然对许多美国人有着重大影响的一个原因。[5]

然而，以色列更近的所作所为则是另外一回事。随着因特网覆盖到全球，以及有线电视新闻网全天候的播报，许多美国人已经目睹了以色列血腥对待其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国民的大量证据。他们也目睹了在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全境打击平民目标，然后在南黎巴嫩的村村镇镇扔下了数以百万计的集束炸弹。[6]

虽然这些行动玷污了以色列在美国的公众形象，但是它的支持者们却依然不气馁，继续以道德的理由来维持这两个国家目前的关系。事实上，可以提出充分的论据来说明，当前的美国政策与美国的基本价值是相冲突的，而且如果美国仅仅基于道德考虑的话，它支持的将是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毕竟以色列是个繁荣的国家，在中东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今天没有哪个国家会蓄意对它开始发动一场战争。虽然以色列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恐怖主义问题，但是那主要是由其在被占领土的殖民行为所导致的后果。相反，巴勒斯坦人没有自己的国家，贫困不堪，而且面临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即便考虑到巴勒斯坦人的种种缺点，又有哪一个团体有更加强大的道德理由来得到美国的同情呢？

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明白，就要求我们更加详细地关注那些构成这一道德理论的具体观点。我们主要的关注点将集中在以色列的行为上，并且不打算将它的行为与该地区或世界其他地区别的国家的行为进行比较。我们之所以集中关注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犹太国家怀有敌意，或者因为我们认为它的行为特别应该受到责难。相反，我们承认，几乎所有的国家在历史上的此时或彼时都犯下过严重的罪行；而且我们还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的建立经常都是一件暴力性的事情。我们也意识到，有些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不时有十分血腥的行为。我们之所以集中关注以色列的行为，是因为美国对以色列提供的物质和外交支持所达到的水平，大大超过美国给予其他国家所达到的水平，而且美国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代价的。我们的目的是要确认，以色列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特殊款待，是否就像它的许多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是因为它的行为格外地符合美德之故？难道以色列的行为大大好过其他国家吗？历史记录显示，以色列并非如此。

支持受害者

以色列经常被描述为弱小的和遭到包围的国家，是一个被充满敌意的阿拉伯歌利亚所包围的以色列大卫。虽然以色列领导人和同情以色列的作家精心地培育了这一形象，但是与真相更接近的事实与此却是相反的。以色列在军事上一直是比它的阿拉伯对手更加强大。让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的1948年独立战争，普遍的观点是相信其对手在人数和武器上大大超过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要同5支阿拉伯军队以及巴勒斯坦人进行战斗。著名的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将这种对均势的描述称之为“与1948年相关的最顽固的神话之一”[7]。

人们可能会认为，1948年以色列军队在人数上和质量上都大为不利，因为它是一个被阿拉伯国家包围的新建的小国，那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口和物质资源要远远比以色列多得多。事实上，比较以色列同阿拉伯世界的人口规模和资源，将使人几乎弄不清楚它们之间在军事上的均势状况。就像莫里斯所指出的那样：“地图集上显示的丁点大小的以色列和那个包围它的巨大的阿拉伯世界海洋，过去没有准确地反映出该地区真正的军事权力均衡，而且事实上目前也依然如此。对人口数量比较的结果也是如此。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在巴勒斯坦的伊休夫（Yishuv）的人口数量是65万，而与之相对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环绕在它四周那些国家——其中包括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则分别是120万和大约3000万。”[8]原因很简单：阿拉伯国家在将这些潜在的资源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力量方面，效率十分低下；而相反，以色列在这方面却特别擅长。

独立战争实际上是由两次分开的冲突组成的。第一次冲突是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内战，这场战争始于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在这一天决定将托管地巴勒斯坦分治，战争一直持续到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在这一天宣布独立；第二次冲突是以色列同5支阿拉伯军队之间的国际战争，战争始于1948年5月15日，并于1949年1月17日结束。

由于在士兵和武器的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享有决定性的优势，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内战中赢得了对巴勒斯坦人的压倒性胜利。[9]犹太人的战斗单位，其组织和训练都远远好于巴勒斯坦军队——英国人已经在1936年至1939年的巴勒斯坦反叛中摧毁了这支军队的大部分，而且这支军队直到1948年都没有恢复过来。就像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兰·帕普（Ilan Pappe）所指出的那样：“数千并非正规军的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面对的是数万训练有素的犹太军队。”[10]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以色列领导人完全清楚这一权力的不平衡，且试图利用这一点。事实上，1948年战争以色列军队的高级司令官和以色列国防军的第二参谋长伊果·亚丁（Yigal Yadin）坚持认为，如果不是英国人在巴勒斯坦一直存在到1948年5月，“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即能够平定阿拉伯人的暴乱”[11]。

在同5支阿拉伯军队作战的整个战争过程中，以色列也明显具有人力上的优势。莫里斯注意到，当战斗于5月中旬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上场的军队是3.5万人，与之相比，阿拉伯入侵部队的人数是2.5万至3万人。到7月达奈行动（Operation Dani）的时候，武装起来的以

色列国防军人数达到了6.5万人，在12月的时候接近9万人：在每一阶段，以色列军队的人数都大大超过在巴勒斯坦反击他们的阿拉伯军队力量的总和”[12]。除了在冲突开始的最初25天那段短暂的时间（1948年5月15日至6月10日）之外，以色列在武器上也享有优势。更有甚者，除了外约旦（Transjordan）小规模的阿拉伯军队这一可能的例外，以色列战斗部队的质量要大大优于其阿拉伯对手，而且他们的组织也要比对方好得多。简而言之，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比对手更加强大——尽管其阿拉伯敌人拥有在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因此他们既赢得了对巴勒斯坦人的内战的胜利，又赢得了对入侵的阿拉伯军队的国际战争的胜利。就像莫里斯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犹太人在火力、人力、组织、指挥和控制上的优势，才决定了战斗的最终结果。”[13]

在美国的大规模援助开始流入以色列之前，以色列国防军在1956年迅速而决定性地战胜了埃及，又在1967年战胜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1973年10月，以色列是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出奇制胜的进攻的牺牲品。虽然数量上占优的以色列国防军在战斗的最初几天遭到严重的挫折，但是它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当美国和苏联介入进来阻止战斗继续进行的时候，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几乎被摧毁殆尽了。按照莫里斯的观点，导致这种引人注目的转折的原因，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的“机械化在空中和地面都完全占有优势。在人力上也是如此：以色列的飞行员、维护和地面控制人员、坦克军官，以及士兵，都要远远比其阿拉伯对手更加训练有素，更加领导有方”[14]。这些胜利雄辩地证明了以色列人的爱国主义、组织能力和军队的勇敢超凡，但是这些胜利也显示，甚至在最初的那些岁月里，以色列也远远不是那么地无助和绝望。[15]

今天，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是一个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常规武装力量要远远优于它的那些邻国，是该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埃及和约旦已经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而沙特阿拉伯也表示了这样的意愿。叙利亚已经丧失了它的苏联庇护人，伊拉克已经被三次灾难性的战争给摧毁了，而伊朗则在几百英里之外，并且也从未直接攻击过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几乎没有管用的政策，而且他们被内部的深刻分裂所削弱。由巴勒斯坦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虽然是悲剧性的，引起所有以色列人心中的恐惧，但是却几乎对以色列的经济没有什么伤害，更不用说对其领土完整构成威胁了。[16]虽然像真主党那样的团体能够向以色列发射有限的导弹和火箭袭击，可能在经年累月中杀害数以百计的以色列人，但是这些攻击并不构成关乎以色列生存的威胁。根据享有盛誉的特拉维夫大学贾菲战略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项评估：“战略平衡对以色列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

种优势还将在质量上使得其邻国同以色列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威慑力量的差距继续扩大。”[17]如果支持受害者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那么美国支持的将会是以色列的对手。

当然，这一观点的另一个方面是，以色列长期遭到包围，总是个受害者。这种观点认为，尽管以色列享有军事优势，但是那些阿拉伯邻国决心要摧毁它。事实上，有人认为阿拉伯人在1948年、1967年和1973年采取战争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将犹太人赶到大海里去”[18]。

毫无疑问，虽然以色列在早年面临严重的威胁，但是在那三场战争中，阿拉伯人没有一次企图毁灭以色列。这并不是因为阿拉伯人对这个犹太国家在他们中间的存在感到高兴——他们显然并非如此，而是相反，因为他们没有打赢以色列的能力，更不用说彻底打败以色列。毫无疑问，虽然有些阿拉伯领导人在1948年的战争期间谈论过“将犹太人赶到大海里去”，但这只是用来平息他们国内公众的言词而已。事实上，阿拉伯领导人主要关心的是，以巴勒斯坦人为代价来为他们自己获取领土，这是那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巴勒斯坦人的福利之前的众多理由之一。例如，莫里斯写道：

一旦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宣布独立和阿拉伯国家在5月15日进行入侵，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普遍的领土掠夺”，以色列、外约旦、叙利亚甚至黎巴嫩，每一方都决心要阻止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国家诞生，每一方都想把巴勒斯坦的大块土地划归己有。与旧的历史文献相反，（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对东巴勒斯坦的入侵，其目的明显是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为代价，来为他的王国进行领土征服，而不是要摧毁这个犹太人国家。事实上，阿拉伯军团对于伊休夫和这个犹太国家的领土，在整个战争期间坚持的都是胆怯的非侵略立场……对于这个羽翼未丰的犹太共和国的垮台，一点也不清楚阿卜杜拉和当时指挥外约旦阿拉伯军团的英国将军（约翰·巴高特·格拉布）（John Bagot Glubb）会高兴看到这一结果。当然，对于出现一个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在其边界上出现一个扩张性的叙利亚和扩张性的埃及，阿卜杜拉当然要比看到出现一个小小的犹太国家更忧心。[19]

而就像莫里斯所指出的那样，阿卜杜拉是唯一一位“承诺全力”用自己的军队向以色列进攻的阿拉伯领导人，“这意味着要么是缺乏效率，要么对所宣称的将犹太人赶到大海里去这一严肃目的有可能只是三心二意”。著名历史学家、以色列前外长施洛姆·本-阿米对1948年阿拉伯人的目标也有类似的观点：“由于受到来自他们国家公众的压力，也由于那些阿拉伯领导人都有各自的领土扩张议程，准备不足、

协调不全的阿拉伯军队被拖进了战争。确保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与确立他们自己的领土主张，或者对抗他们在阿拉伯联盟中的那些对手相比，对于那些将军队派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次要的目的。”[20]

以色列作为受害者的神话也反映在有关1967年战争的传统思想中，认为埃及和叙利亚要为战争的开始负主要的责任。具体而言，人们说阿拉伯人一直在准备进攻以色列，而此时以色列国防军先出手了，而且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21]然而，在新公开的有关这场战争的文件中，显而易见，阿拉伯人在1967年春末并未打算发动一场针对以色列的战争，更不用说企图摧毁这个犹太国家了。[22]著名的以色列“新历史学家”艾威·施雷姆（Avi Shlaim）写道：“在评论家中间存在一种普遍相同的看法，即（埃及总统）纳赛尔既不想也不打算向以色列开战。”[23]事实上，以色列要对战争的爆发承担相当的责任。施雷姆写道：“以色列在叙利亚前线的升级战略，或许是在1967年6月将中东拖向战争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尽管公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选择将叙利亚的侵略作为战争的主因。”[24]本-阿米甚至走得更远，他在写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的时候说，他“故意将以色列导向与叙利亚的战争。拉宾决心挑起一场同叙利亚的战争……因为他认为，这是唯一阻止叙利亚人支持法塔赫进攻以色列的办法”[25]。

这一点也不是要否认埃及决定在1967年5月关闭提蓝海峡是向以色列表达关注的合法原因。但这并不是埃及要马上发动进攻的先兆，而且美国决策者和以色列领导人也承认这一点。和平解决这一危机的严肃外交努力也正在进行之中。但无论如何，以色列选择了进攻，因为它的那些领导人最终更喜欢的是战争，而非解决危机的和平决议。具体来说，以色列的军事指挥官们要对他们的两个主要敌人——埃及和叙利亚——进行打击，使之在军事上遭受失败，目的是要长期地加强以色列的威慑。[26]有些人也怀有领土野心。以色列国防军作战处处长埃泽尔·魏茨曼（Ezer Weizman）将军在战争前夜所说的话反映了这种情绪：“我们正处在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边缘，因为其具备独立战争的所有特点。”[27]简而言之，当它在1967年6月5日进行第一击的时候，以色列并没有即刻抢先进行紧急攻击。相反，它发起的是预防性战争——一场其目标为随着时间流逝而影响均势的战争，或者像梅纳赫姆·贝京所指出的那样，一场“进行选择的战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我们决定攻击他（埃及总统纳赛尔）”[28]。

当然，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确实在1973年10月攻击了以色列，但

是公认的事实是，两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追求的都是有限的战略目标。埃及人希望征服西奈半岛上的一小片领土，然后开始同以色列讨价还价归还西奈半岛上的其他领土；而叙利亚则希望重新夺回戈兰高地。埃及人和叙利亚人都不打算入侵以色列，更不用说威胁它的生存了。以色列不仅在该地区拥有最令人生畏的军队，而且它还拥有核武器——这使得任何对它进行征服的企图等同于自杀。本尼·莫里斯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很好的表述："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哈菲茨·阿萨德（Hafez Assad）企图重新得到1967年丧失的领土。他们没有一个人的目标是要摧毁以色列。"[29]事实上，开罗和大马士革的主要决策者都承认，通过挑起与强大的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冲突，他们所追求的政策是一项特别具有风险的战略。帮助制定埃及攻击计划的哈桑·厄尔·巴德里（Hassan el Badri）将军评论道："要取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30]而这些怀疑是正确的，因为从最初的攻击中恢复过来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两次大败阿拉伯军队。

除了伊朗这一可能的例外，难以有理由说今天以色列的邻国决心要摧毁它。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已经同埃及和约旦签署了和平条约；而且就像在第九章中要讨论的那样，以色列在2000年与叙利亚之间一项可能的和平条约擦肩而过。在2000年3月的阿拉伯峰会上，通过一项建议呼吁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都完全承认以色列，同这个犹太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提案，沙特王储试图缓和巴以之间的冲突。作为回报，以色列将必须从被占领土撤离，出台一项解决阿拉伯难民问题的公平决议。这一倡议得到了阿拉伯联盟的一致支持。甚至连萨达姆·侯赛因都支持这一倡议。[31]虽然此时此际这一建议并无进展，但是沙特人还是在2007年重提这一倡议。当然也不存在什么证据表明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对摧毁以色列有兴趣。而虽然哈马斯和真主党可能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生存，使以色列遭受困难，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却没有能力构成致命的危险。虽然如果伊朗获得了核武器就明显将成为以色列的严重威胁，但是只要以色列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伊朗就不可能在自己被摧毁时进攻以色列。

帮助作为伙伴的民主国家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经常以这样一种观点——即以色列是作为一个美国伙伴的民主国家——来使之合理化。事实上，以色列的捍卫者经常提醒美国人说，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为满怀敌意的独裁政权所包围。虽然这一理论听起来叫人觉得信服，但是它却不能够解释美国当前对以色列的支持所达到的程度。毕竟在世界上有许多的民主国家，但是却没有一个像以色列那样得到那种程度的无条件支持。

事实上，一个国家民主与否并不是华盛顿如何与之发生关系的可靠指标。美国在过去推翻过数个民主政府，而且美国支持过无数的独裁者，只要当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推动美国的利益即可。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3年推翻过伊朗通过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政府，而里根政府则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今天，布什政府与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和巴基斯坦的珀维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此同时却在削弱被占领土上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哈马斯政府。它还同委内瑞拉选举出来的领导人胡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关系尖锐。是否民主既不能使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所达到的程度合理化，也不能够完全解释这一支持的程度。

以色列民主与美国核心价值相左的那些方面，也削弱了“共有的民主”理论。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无论什么种族、宗教或族裔，都被认为享有平等的权利。以色列的公民背景多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包括阿拉伯人、穆斯林、基督徒，但它明显是作为一个犹太国家而建立的，而一位公民是否被当作犹太人，一般来说是以血缘关系——能够证实的犹太祖先——为依据的。[32]以色列的犹太特点清清楚楚地反映在《以色列建国宣言》之中，这一宣言是在1948年5月14日宣布的。它明白无误地参照了联合国对“犹太人建立他们自己国家权利的”认可，公开宣称“在以色列的土地（Eretz-Israel）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并且在后来将这个新的国家描述为“具有主权的犹太人民定居在自己的土地上”。[33]

考虑到它的犹太人特性，以色列领导人长期以来强调在其边界内维持犹太人多数地位不受挑战的重要性。以色列非常担忧从以色列流进流出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非常担忧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出生率，非常担忧以色列在1967年之前的边界线之外所进行的扩张可能导致更多的阿拉伯人生活在他们当中的可能性。例如，戴维·本-古里安就曾宣称：“任何犹太妇女就自己的情况而言，只要没有生养至少4个健康的孩子到这个世界上，她就没有为自己的民族尽责，就像士兵逃避兵役一样。”[34]现在大约有530万犹太人和136万阿拉伯人生活在以色列，包括有争议的东耶路撒冷。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地区生活着另外380万巴勒斯坦人，这意味着现在生活在过去常被称为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犹太人，只比巴勒斯坦人多了14万人，而按照几乎所有的计算方式，巴勒斯坦人的出生率都高于犹太人。[35]根据这些数字，如今以色列的犹太人在谈论他们的阿拉伯公民同伴和巴勒斯坦国民时，将其看作“人口统计学的威胁”[36]就并不令人惊奇了。

有人可能会认为，虽然以色列的核心是个犹太国家，但它的基本

法（11条）却依然保证它的所有公民——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平等权利。但情形并非如此。基本法有关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初稿——大致相当于美国的《权利法案》，包括了许诺给所有以色列人的语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不会存在基于性别、宗教、民族、种族、族裔团体、来源国或者任何其他不相关因素等理由的歧视。"[37]然而，一个以色列议会委员会（Knesset committee）却从1992年成为最终法律文本的内容中删除了那一条款。自那以来，以色列议会中的阿拉伯议员曾无数次地试图通过增加提供法律面前的平等的语言，来修正以色列的基本法。但是他们的犹太同僚拒绝进行修正，这种情形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平等原则记载在美国的法律之中。[38]

除了以色列承诺维持犹太人的身份和拒绝保证非犹太人的平等权利之外，以色列的136万阿拉伯人事实上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例如，以色列的一个政府委员会在2003年发现，以色列以一种"漫不经心和歧视性的"方式对待他们。[39]事实上，对于这种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不平等对待，在以色列犹太人中间存在普遍的支持。2007年3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5%的以色列犹太人要求有种族隔离的娱乐设施；超过75%的人说，他们不会同以色列阿拉伯人住在同一栋楼里。超过一半的回答者说，作为一名犹太妇女，与阿拉伯人结婚等同叛国罪；50%的人说，如果他们的直接监工是阿拉伯人的话，他们将拒绝受雇佣。[40]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在2003年5月报告说，53%的以色列犹太人"反对给予阿拉伯人完全平等"；而77%的以色列犹太人相信，"犹太人在关键的政治决策上应该占有多数"。只有31%的人"支持在政府中有阿拉伯政党的存在"[41]。这种情绪同这一事实是相符合的，即以色列直到2007年1月，才任命了首位穆斯林内阁部长，这几乎是以色列建国60年以后的事情。而即使是这一任命也富有高度的争议性——它只是对一项掌管科学、体育和文化事务负责人的次要任命。[42]

以色列对待它的阿拉伯公民还不仅仅只是歧视。例如，为了限制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数，它不允许同以色列公民结婚的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公民，不给他们的配偶在以色列居住的权利。以色列人权组织贝泽雷姆（B'Tselem）称这种限制为"根据种族标准来决定谁能够在这里居住的种族主义法律"[43]。同样地，奥尔默特政府正在推动一项允许法庭取消"不爱国"公民资格的法律，而且以色列议会的内阁立法委员会在2007年1月10日已经批准了这一法律。以色列总检察长给这项明显针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立法，贴上了"损害公民自由的极端严厉的步骤"的标签。[44]虽然按照以色列的建国原则——明显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目的，这样的法律可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这样的法

律与美国多种族民主国家的形象是不相一致的。在美国，无论先祖是从哪里来的，所有公民被认为都要得到平等的对待。

2007年初，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向极端正统的以色列人道歉，因为他在2002年担任财政部长时采取的削减福利的决定，使得那些有着一大家子的以色列人生活艰难。然而，他却指出说，这些削减措施至少有一个没有意料到的好处：在“非犹太人公众内”，“出生率大大降低了”。[45]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就像众多深深担忧所谓的阿拉伯人口威胁的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裔阿拉伯人的出生越少越好。

内塔尼亚胡的评论如果是发生在美国的话，他将几乎肯定要受到谴责。想象一下如果一位美国内阁成员说，一项降低非洲裔美国人或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出生率，从而维持白人多数的政策所带来的好处，将会引起怎样的愤怒抗议！但是这样的狂言在以色列却并不鲜见，以色列重要的领导人有着贬损巴勒斯坦人的历史，而且他们几乎不会因此而受到制裁。梅纳赫姆·贝京有一次曾经说道：“巴勒斯坦人是长着两条腿的畜生”；而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尔坦（Rafael Eitan）则将巴勒斯坦人称之为“瓶子里面麻醉的蟑螂”，还说“一个好的阿拉伯人即一个阿拉伯死人”。另外一名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摩西·亚阿隆（Moshe Ya'alon）声称，巴勒斯坦人的威胁就像“癌症”一样，而他则在上面进行“化学疗法”。[46]

如此歧视性的观点并不只限于以色列领导人。在最近一项对以色列犹太高中学生进行的调查中，75%的回应者说阿拉伯人“没有教养”。有同样高百分比的人说阿拉伯人是“未开化的”，而那些接受调查的74%的人说阿拉伯人是“肮脏的”。拉里·德福纳尔（Larry Derfner）就上述民意调查中的最后一点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文章评论道：“说阿拉伯人是肮脏的，并不是强硬派的政治声明。它不是对阿拉伯人行为过度严厉的评论。说阿拉伯人是肮脏的，是要表明对整个族裔群体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的、不可理喻的、完全绝对的仇恨。而这个群体碰巧并非肮脏的——犹太人不比他们干净。说阿拉伯人是肮脏的，乃是一种最纯粹、最充满敌意的种族主义的表达形式。”监督这一调查的人说：“研究结果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虽然任何对这一领域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些歪曲的观点是存在的，但是这些发现是这一令人不安的现象最为严重的极端表现。”引人注目的是，同一调查还在以色列阿拉伯裔年轻人中进行，而德福纳尔报道说：“虽然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极坏，但是其程度远不及犹太学生对他们的恶劣态度。”[47]

这些对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充满敌意的态度，加上对有关“人口威胁”和维持犹太人多数地位的担心，导致了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中间非

常支持从以色列驱逐或“迁移”大量的阿拉伯人口。事实上，因2006年的战略威胁而被任命为副总理的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已经清楚地表明他赞成驱逐，以便使以色列“尽可能”成为一个同质性的国家。具体而言，他主张将那些居住着密集阿拉伯人口的土地，用来交换西岸地区居住着犹太定居者的那些地区。他并不是第一位主张驱逐的以色列内阁部长。[48]

虽然利伯曼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人物，但他在以色列的问题上却并不是个特别的局外人。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在2003年5月报告说，57%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应该鼓励阿拉伯人向外移民”。海法大学国家安全研究中心200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了63.7%。一年后的2005年，巴勒斯坦以色列研究中心发现，42%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他们的政府应该让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离开，而另外17%的人则倾向于同意这种想法。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反对种族主义中心发现，40%的以色列犹太人要求他们的领导人鼓励阿拉伯人口向外移民，而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则发现这一数字为62%。[49]如果有40%或者更多的美国白人宣称黑人、西班牙裔和亚裔“应该被鼓励”离开美国的话，那将肯定激起猛烈的挞伐。

由于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长期的冲突，以及双方所遭受的巨大苦难，这些态度或许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这些态度比整个美国历史上许多美国人对不同的少数族裔群体——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态度也更加糟糕。然而，无论这些态度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更加广为人知的话，在今天的美国它们显然将会遭到广泛的谴责，它们构成了对“我们共有的价值、我们对自由的坚定承诺”这样的陈词滥调的严重挑战。

最后，以色列拒绝保证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的能够生存下来的国家，以及在被占领土上对他们强加一个在法律上、行政上和军事上否认其基本人权的政权，削弱了以色列的民主地位。以色列目前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地区控制着大约38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而他们长期以来居住的这些土地正在被殖民化。以色列虽然在2005年夏天正式从加沙地带撤离，但是却继续维持对其居民的实质性控制。[50]具体来说，以色列控制着海、陆、空的进入通道，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是加沙地带的囚徒，只有得到以色列的批准才能够出入。联合国高级工作人员让·埃格兰（Jan Egeland）和瑞典外交部长让·埃利亚松（Jan Eliasson）在2006年9月写道，巴勒斯坦人正“生活在牢笼之中”，这自然会对他们的经济、身心安宁产生毁灭性的影响。[51]

在西岸地区，以色列继续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修建定居点。《国土报》2006年12月末的社论对这种情形进行了简略的描述：“几

乎每一个星期的度过，都伴有新的揭露有关西岸地区定居点上修建楼房、明显违法、并与政府的官方政策完全矛盾的狂热行为。”[52]事实上，以色列的“现在就要和平”（Peace Now）组织最近发布了一项基于以色列政府记录而进行的研究，显示以色列所持有的用于修建定居点的土地，有超过32%是巴勒斯坦人的私有土地。以色列打算永远持有几乎所有这些土地。这种对巴勒斯坦人财产的剥夺，不仅违反了以色列自己的法律，而且违反了民主的根本原则：对私有财产的保护。[53]

总之，对于以色列的犹太公民来说，以色列的民主秩序充满活力，因为犹太公民能够而且确实批评他们的政府，并且在公开自由的选举中选择他们的领导人。以色列的新闻自由也很热闹，而令人觉得矛盾的是，在以色列要比在美国批评以色列的政策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此项研究中有如此多的论据要从以色列的新闻中引用的原因所在。尽管存在这些正面特点，但是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却被系统性地边缘化了，数百万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全面政治权利被拒绝了，“共有民主”的理论因而相应地被削弱了。

为过去的罪行进行补偿

第三个道德理由是历史上犹太人在基督教的西方所遭受的苦难，特别是悲剧性的大屠杀经历。由于犹太人好几百年都遭受迫害，许多人相信只有在自己的家园犹太人才会安全，因此人们说以色列值得得到特殊的对待。这种观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最初的基础，在说服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以色列建国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今天依然令人产生共鸣。

毫无疑问，犹太人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卑鄙的反犹主义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而以色列国的建立则是对这一长期犯罪历史记录的一种适当回应。这一历史为支持以色列国的建立和继续存在提供了强大的道德理由。这种对以色列的支持，也与美国对民族自决的普遍承诺相符合。但是人们却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国的建立涉及针对基本上无辜的第三方——巴勒斯坦人——的新罪行。虽然针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使得支持以色列的生存合理化，但是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所犯的罪行却削弱了它要求得到特殊对待的主张。

这些历史事件的档案保存完好。当19世纪末的犹太复国主义在政治上郑重其事地开始进行的时候，只有大约1.5万至1.7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54]例如在1893年，该地大约95%的人口由阿拉伯人构成，虽然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但是阿拉伯人却一直拥有这片领土长达1300年之久。[55]古老的犹太复国主义格言——巴勒斯坦

是“为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准备的一片没人居住的土地”，是有关这片土地完全错误的一种说法；这片土地为另外一个民族所占有。[56]

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19世纪最后10年开始浪潮般地离开欧洲的犹太人将会来到巴勒斯坦，从而使得犹太人在那里的人口在数量上获得对阿拉伯人的决定性优势。但是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主要是因为这些犹太人大多数更喜欢到美国去。在1880年至1920年期间，在离开欧洲的400万犹太人当中，只有10万人去了巴勒斯坦。[57]事实上，直到希特勒上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完不成“英国人所允许的慷慨移民配额”[58]。1948年，当以色列国建立的时候，以色列的65万犹太人只占巴勒斯坦人口的35%，而这些犹太人所拥有的土地也只有以色列的7%。[59]

从一开始，那些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决心要创建一个几乎覆盖整个巴勒斯坦，甚至部分包括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犹太国家。[60]当然，在关于理想世界中的边界应该划在什么地方这一问题的看法上，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差别，而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实现他们全部的领土野心可能是做不到的。应该强调的是，犹太复国主义领导的主流，从来就没有兴趣建立一个阿拉伯人同犹太人在同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没有宗教认同，并且阿拉伯人有可能比犹太人还多——中并肩生活，由两个民族构成的国家。相反，他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犹太人至少占人口数85%的国家。[61]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野心也不仅仅限于巴勒斯坦的永久分割。在美国，人们普遍地相信，特别是在以色列的支持者中间，犹太复国主义者愿意赞同对巴勒斯坦的永久分割，而且事实上他们同意了1937年由英国皮尔委员会（Britain's Peel Commission）和1947年由联合国提出的分割计划。但是他们接受这些计划，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永远只接受巴勒斯坦部分的领土，或者愿意支持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就像最近的学术研究所充分表明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有时候愿意接受对巴勒斯坦的分割作为第一步，但这只是他们的权宜之计，而非其真正的目标所在。他们不打算同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巴勒斯坦国长期相处和共存，因为那一结果同他们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梦想存在直接的冲突。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间，存在着对皮尔委员会分割计划的激烈反对，而他们的领导人戴维·本-古里安，也只是勉强使他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同路人接受了这一计划。然而，他们之所以最终同意了这个计划，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本-古里安打算最终夺取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在1937年夏天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时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党行政部（Zionist Executive）说：“紧接着国家的建

立，在创建一支大军之后，我们将废除分割，并扩张到整个的巴勒斯坦。”类似地，他在同一年告诉自己的儿子阿摩司（Amos）说：“立即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不是在整个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其他的土地经过一段时间将归到我们手中。必须归到我们手中。”[62]

皮尔委员会计划在1937年毫无进展，而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表示要将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包括在未来的犹太国家之中。本-古里安在1947年的上半年发表了大量的评论，表明他依然要整个巴勒斯坦。例如，以色列学者尤里·本-厄里泽（Uri Ben-Eliezer）报告说：

在1947年5月13日，本-古里安对在美国举行的犹太人行政局（Jewish Agency Executive）说：“我们要以色列的整个土地。那是最初的打算。”一个星期之后，在对耶路撒冷的选举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伊休夫领导人纳闷地问道：“我们当中会有哪个人不同意这一点，即《贝尔弗宣言》和托管地的最初打算，一代代的犹太人民心怀希望的最初打算，是最终在整个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呢？”在6月对以色列工党秘书处发表讲话的时候，本-古里安声明道，放弃任何一部分土地都将是错误的。我们没有权利那样做，也没有必要那样做。[63]

那一年年末的11月，联合国设计出一个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分割巴勒斯坦的新计划。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公开地接受了这一计划。但事实上，本-古里安已经同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谈判协商了一项以色列与外约旦进行分割巴勒斯坦的协定，并且拒绝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出现。[64]这一受到英国支持的秘密安排，允许外约旦得到西岸地区，而以色列则占有巴勒斯坦剩余的土地。这项协定最终在1948年的战争期间得到实施，虽然实施的方式有点杂乱脱节。并不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以色列领导人在战争期间认真地考虑过征服西岸地区，谈论着将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作为他们的新国家，但他们的判断是可能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后来成为约旦的外约旦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都控制着西岸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在六日战争期间征服了该地区。简而言之，以色列的建国者们从一开始就决心要建立一个“大以色列”。这个“大以色列”将没有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存在空间；而且在这个犹太国家之内，留给巴勒斯坦人的空间也是几乎不存在的。

考虑到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人口数量大大超过犹太人，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下决心要尽可能多地征服土地，因此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只有从最终将变成以色列的领土上驱逐大量的阿拉伯人。由于阿拉伯人几乎不可能自愿放弃他们的土地，因此犹太人如果要完成他们

的目标，就几乎别无其他途径可以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皮尔委员会的分割计划明确呼吁进行人口迁移的原因所在。这同样是为什么联合国的分割计划——该计划呼吁建立一个由55%的犹太人和45%的阿拉伯人组成的以色列——不可行的原因所在。[65]如果不说服大量的阿拉伯人离开巴勒斯坦，一个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起来的犹太国家当然没有可能。

考虑到这些现实因素，自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初开始的时候，驱逐阿拉伯人就经常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互之间对话交流的一个主题，他们普遍认可这是唯一解决这个横亘在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道路上的人口问题的现实途径。[66]本-古里安清楚地明白这个问题，他在1941年写道："如果不进行驱逐，而且是野蛮的驱逐，难以想象能够使（阿拉伯人）全部撤离。"[67]或者像他在1937年10月写给他儿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将组织现代国防力量……然后我确信，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定居不会受到阻挠，既不会受到我们与阿拉伯邻国之间双边协议的阻挠，也不会受到其他方式的阻挠。"[68]毫无疑问，虽然本-古里安更喜欢的是经由"双边协议"来这样做，但是他明白，这种可能性很渺茫，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将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莫里斯对此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当然，本-古里安是个人口迁移论者（transferist）。他明白，如果在其间存在一个充满敌意、人口巨大的阿拉伯少数民族，就不会出现一个犹太国家。……本-古里安是正确的。如果他不曾做自己做过的事情，一个犹太国家就不会存在。如果不对巴勒斯坦人连根拔起，一个犹太国家就不会在此出现。"[69]

驱逐是一项可怕且充满争议性的战略，而任何一个打算要将敌对人口迁移的群体向世界宣布自己的打算都是说不通的。因此，在发表1941年的评论——如果没有"野蛮的"驱逐，他不能想象如何能够完成迁移——之后，本-古里安继续说道，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应该"使那些赞成迁移的其他人——英国人或美国人——因气馁而不拥护这一事业，但是我们决不会使之成为我们计划的一部分"[70]。然而，他不是在拒绝这一政策，他只是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应该公开宣称这一政策。在进一步思考了迁移的话题对以色列的建国者们是多么地"高度敏感"之后，本尼·莫里斯指出："在犹太复国主义机构当中，通常的做法是下令速记员'中断一下'，这样就可以排除掉讨论此类事情的纪录。"进而言之，他指出道："犹太人的新闻报道"在描述本-古里安以及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如何对皮尔委员会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作出反应的时候，"总体上没有提到本-古里安或其他任何人显示出强烈赞成迁移，或实际上曾经提出过这一话题"[71]。

驱逐巴勒斯坦人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机会在1948年来了，当时的犹太武装力量将70万巴勒斯坦人驱赶上了流亡之路。[72]以色列人及其美国的支持者长期宣称，阿拉伯人的逃离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叫他们这样做的，但是学者们已经粉碎了这个神话。事实上，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敦促巴勒斯坦人留在家园，但是对暴死于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力量之手的恐惧，导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逃离家园。[73]就像本-古里安在1948年6月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竭尽所能阻止他们回来。"[74]到1962年，以色列在其境内拥有了几乎93%的土地。[75]为了得到这一结果，有531个村庄被毁，"11个城市街区的居民被清空了"。[76]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讲话，成功地捕捉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为建立以色列国给巴勒斯坦人所带来的灾难场景："犹太人的村庄在曾经的阿拉伯人村庄所在地建立起来了。你甚至不知道这些阿拉伯村庄的名字，而我也不会责怪你，因为地理书上不再存在了，不仅地理书上不存在了，而且阿拉伯人的村庄也不存在了。……在这个国家进行建设的任何一个地方，此前都曾有过阿拉伯人的存在。"[77]

以色列领导人完全明白，创建一个以色列国给巴勒斯坦人民所带来严重的不公正这一事实。就像本-古里安在1956年告诉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主席纳胡姆·古德曼（Nahum Goldmann）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是阿拉伯领导人，我决不会同以色列达成协议。那是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夺走了他们的国家。无疑，上帝许诺给了我们这片土地，但那跟他们有什么相干？我们的上帝不是他们的上帝。我们来自以色列，的的确确，但那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了，而那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曾有过反犹主义、纳粹、希特勒、奥斯威辛集中营，但那是他们的过错吗？他们只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来到这里，偷走了他们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个结果？"[78]

以色列右翼创始人泽夫·雅勃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在1923年的观点本质上与此是一样的，他写道："殖民即自我扩张，每个有判断力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殖民中只能有一个目的。对于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来说，这一目的根本不能接受。这是自然的反应，没有什么会改变这一点。"[79]伯尔·卡茨内尔森（Berl Katznelson）是本-古里安的密切盟友，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间一位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他毫不掩饰地指出："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即征服事业。"[80]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的60年里，以色列领导人反复企图否定巴勒斯坦人建立国家的抱负。[81]例如，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曾有过这样

著名的评论：“不存在像巴勒斯坦这样的一回事情。”[82]许多以色列领导人也坚持对将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并入以色列怀有浓厚的兴趣。例如，摩西·达扬就在1949年宣称，以色列的边界“从任何观点看都是荒谬的”。他感觉以色列的东部边界应该是约旦河。在这一方面，达扬并不是一个例外；他的许多将军同僚们以及本-古里安本人，都对为以色列获取西岸地区感兴趣。[83]当本尼·莫里斯指出“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终极目标的‘大以色列’前景并没有随1948年战争的结束而结束”[84]的时候，他是正确的。

在1987年12月的巴勒斯坦人第一次起义之后，有些以色列领导人开始支持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特定区域给予巴勒斯坦人有限的自治。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的伊扎克·拉宾总理，经常被说成是个允许巴勒斯坦人在整个被占领土拥有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国家的人。但是这种观点不正确；拉宾事实上反对建立一个有充分资格的巴勒斯坦国。以拉宾遇刺的1995年为例，他曾说道：“我寻求作为犹太国家的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不是全部或大部分以色列土地上的和平共处；我寻求统一的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我寻求与重建的约旦之间的安全边界；我寻求紧挨以色列的是一个巴勒斯坦实体——它够不上是一个国家，管理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目标，不是回到六日战争之前的界限，而是建立两个实体，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分隔开来，后者居住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85]

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色列反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程度之深，也在涉及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事件中得到了反映。1998年春，以色列人及其美国支持者对她所说的下面这番话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即“一个其地位与别的国家一样、智能有效的现代巴勒斯坦国的存在，长期而言是符合中东地区的和平利益的”。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白宫官员立即“否认”她的评论，“坚持她只代表自己发言”。白宫新闻秘书说，她的观点“并不是总统的观点”[86]。

然而，到了2000年，美国政治家公开说希望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终于变得可以接受了。与此同时，来自极端主义者的暴力和不断增长的巴勒斯坦人口所形成的压力，已经迫使最近的以色列领导人拆除加沙地带的定居点，探究涉及西岸地区的领土妥协。然而，没有一个以色列政府愿意给予巴勒斯坦人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国家。就像在下面要讨论的那样，甚至连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据称于2000年7月在戴维营慷慨给予巴勒斯坦人的，也只是在以色列实际控制下的一个解除武装、领土分割的国家。2002年，前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反复说他反对给予巴勒斯坦人任何类型的国家，而前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则在第二年清楚表明，他赞成的只是一个拥有半主权的巴勒斯坦国。[87]

欧洲的反犹罪行为为以色列的生存权利提供了强大的道德理由。虽然没有哪个新定居者的国家在没有一定程度的暴力情况下能够希望生存下来，但数十年来，以色列却在持续不断地对巴勒斯坦人施加恐怖暴力和歧视。这些政策再也不能够用以色列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的理由来进行辩解了。以色列的生存是没有疑问的，即便某些伊斯兰极端分子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即便伊朗现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说以色列“应该从历史上消失”[88]。更为重要的是，犹太人民过去的遭遇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今天无论做什么，美国都有义务帮助它。

“善良的以色列人”与“邪恶的阿拉伯人”

这是另外一个将以色列这个国家描绘为经常追求和平，表现出伟大而崇高的克制——即便在被挑衅的时候也是如此——的道德观点。相反，据说阿拉伯人则以十分邪恶、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方式行事。以色列领导人及其美国的辩护士，如艾伦·德肖维茨和《新共和》杂志的编辑马丁·佩雷兹（Martin Peretz），没完没了地反复进行这种叙述。根据佩雷兹的说法，以色列严密地坚持“纯粹武力”的理论——即“必须要做一切合理的事情来避免伤害到平民，即便那给以色列士兵带来了额外的风险”。进而言之，他坚持认为：“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或者以精准的武力对恐怖活动作出反应，或者通过给予恐怖分子某些需求而使之平息。”而以色列的阿拉伯敌人“恰恰是对我们发动的‘9·11’恐怖袭击”的组成部分。[89]按照阿里埃勒·沙龙和埃胡德·奥尔默特，以及他们中其他人的观点，以色列国防军“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军队”[90]。这种对以色列行为的描述依旧是又一个神话、又一个耶路撒冷前副市长梅隆·本维尼斯提（Meron Benvenisti）所称的以色列“神圣叙述”中的构成因素。[91]

以色列的学术研究表明，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远不是那么心地仁慈。[92]阿拉伯居民确实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侵犯进行了抵抗，他们有时候杀死犹太人并摧毁其家园。但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企图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因此这种抵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本-古里安在1937年6月毫不掩饰地评论道：“如果我是阿拉伯人的话，我甚至会更加凶猛、更加激烈、更加绝望地反抗（犹太人的）移民，因为犹太移民有一天将使得巴勒斯坦及其全部居民置于犹太人的统治之下。”[93]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作出了猛烈并且经常十分残忍的反应，因此这一时期双方都不具有高度的道德基础。

同一学术研究还表明，以色列在1948年的建国牵涉明显的种族清

洗行为，包括犹太人所进行的处决、大屠杀和强奸行为。[94]当然，虽然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并没有叫他们的军队去谋杀、强奸巴勒斯坦人，但是他们确实主张用残忍的手段，从这片马上就要成为新的犹太国家的土地上大量地清除掉巴勒斯坦人。我们来看看本-古里安在1948年1月1日——当时他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如何对付巴勒斯坦人的重要会议——的日记中写了什么："现在需要作出强有力而残酷的反应。我们需要对时机的选择、地点以及我们打击的那些人有精确的把握。如果我们控告一个家庭——我们就需要毫不怜悯地伤害他们，包括妇女和儿童。否则的话就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反应……没有必要对有罪无罪进行区分。"[95]由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发出此类指导命令——本-古里安那时正在对该项新的政策进行归纳总结，因此导致犹太士兵犯下这些暴行几乎不会令人感到吃惊。毕竟，我们在许许多多的战争中见过这种行为模式，许许多多的不同民族进行过这种战斗行为模式。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出现的那些暴行，削弱了以色列所宣称拥有特殊道德地位的观点。

以色列随后对其阿拉伯对手和巴勒斯坦国民的所作所为经常是严厉苛刻的，因而与任何在行为上具有道德优势的说法不符。例如，在1949年至1956年期间，莫里斯估计"以色列的安全力量、平民卫队，以及地雷和陷阱，杀死了大约2700至5000名阿拉伯渗透者"。虽然这些被杀者中间无疑有一些人致力于杀死以色列人，但是根据可以得到的证据，"这些被杀者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非武装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经济或社会原因而进行渗透的"。莫里斯指出，这种"任意射击"政策导致对渗透者犯下了"一系列的暴行"。[96]

这些并不是鲜有发生的行为。在1956年和1967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谋杀了数以百计的埃及囚犯。[97]1967年，以色列国防军从新近征服的西岸地区驱逐了10万至26万巴勒斯坦人，从戈兰高地驱逐了8万叙利亚人。[98]当这些种族清洗的受害者试图偷偷回到家园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没有武装的，而以色列人有时候一见到他们就开枪杀死他们。[99]大赦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估计，在1967年至2003年期间，以色列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摧毁了超过一万户人家。[100]以色列还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之后，伙同基督教民兵在萨巴拉（Sabra）和沙提拉（Shatila）难民营，对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进行大屠杀。以色列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发现，由于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允许基督教长枪党人（Phalangist）进入难民营，因而要对这些暴行承担"个人责任"。[101]虽然该调查委员会愿意要一位像沙龙那样的高官来承担责任的做法令人钦佩，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以色列选民最后却选举他担任总理。

正如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现已控制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达40年之久，从而使之成为“现代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正式军事占领”[102]。本尼·莫里斯解释道，当占领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喜欢相信，并且告诉世界说，他们正在进行‘启蒙’和‘仁慈’的占领，在本质上与世界上见过的其他军事占领存在区别。真相却与此截然不同。就像所有的占领一样，以色列的占领基础是血腥的武力、镇压和恐惧、勾结和欺骗、拷打和酷刑室，以及每天的恫吓、羞辱和操纵”[103]。例如，在巴勒斯坦人第一次起义期间（1987—1991年），以色列国防军给自己的军队发放警棍，怂恿他们打碎那些巴勒斯坦抗议者的骨头。拯救儿童组织的瑞典分部在1990年5月散发了一份长达1000页的报告，报告详述了冲突对被占领土上的儿童所产生的影响。该报告估计：“在（第一次）起义的头两年里，2.36万至2.99万儿童因为被打伤需要得到医治。”进而言之，该报告估计，几乎1/3的儿童年龄都在10岁或10岁以下；1/5的儿童在5岁或5岁以下；4/5以上的儿童“头部和上半身，以及身上多处挨过打”；而且几乎有1/3的儿童“遭受骨头断裂，包括多处挫伤”。[104]

在巴勒斯坦人第一次起义期间，埃胡德·巴拉克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副总参谋长，他在那时候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希望儿童被射杀……当看到儿童的时候就不要射击。”然而，拯救儿童组织却估计，在巴勒斯坦人第一次起义的头两年期间，有6500至8500个儿童受到枪伤。关于记录下的106起“儿童被射杀”的案子，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几乎“都是被直接而非偶然或跳弹的枪火所击中”；这些儿童几乎有20%受过多次枪伤；他们大约有12%是从背后被射杀的；15%的儿童年龄在10岁或10岁以下；而且“几乎有1/5的儿童是在家中或离家10米之内的地方被射杀的”。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2000—2005年）作出的反应甚至更加暴力，从而使以色列的报纸《国土报》声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成为一台杀人机器，它的效率虽然令人惊叹，但却也令人感到震惊。”[105]以色列国防军在起义的第一天就射出了百万颗子弹，这几乎谈不上是一种谨慎的反应。[106]在那次起义期间，以色列杀死了3386名巴勒斯坦人，而被巴勒斯坦人杀死的以色列人是992名。这意味着以色列每死1人，就要杀死3.4个巴勒斯坦人。在那些被杀的人当中，有676名巴勒斯坦儿童和118名以色列儿童，因此，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被杀儿童的比例是5.7比1。在那3386名巴勒斯坦死亡者当中，据信有1815人是旁观者，1008人是在同以色列战斗的时候被杀的，而563起死亡的情况则是未知原因。换言之，远远超过一半的巴勒斯坦死亡者似乎是非战斗人员。以色列一方也是类似的死亡模式，在992名死亡者当中，有683人是平民，剩下的309人为军事人

员。[107]以色列武装力量也杀死了数位外国和平活动分子，包括以色列推土机在2003年3月碾压致死的一名23岁美国妇女。[108]然而，以色列政府却很少调查这些平民死亡事件，对犯罪者进行惩罚更是少之又少。[109]

许多人权组织——包括著名的以色列人权团体——对以色列的这些行为事实进行了详细的记录，立场公平的观察者不会对此存有争议。[110]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的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Shin Bet）的4名前高级官员，要在2003年11月的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期间谴责以色列的所作所为的原因。他们当中有一人声称，“我们在进行可耻的行为”，而另一人则称以色列的行为“明显地不道德”。[111]

类似的模式可以在2006年以色列应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暴力升级中见到。2006年6月哈马斯杀死2名并捕俘1名以色列士兵，导致以色列重新占领加沙地带，进行空袭与炮击。以色列的空袭和炮击摧毁了那些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向加沙地带居民提供一半电力的发电站。自重新进入加沙地带以来，以色列国防军还杀死了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儿童。[112]这种悲惨情形导致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露易丝·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在2006年11月发表声明说：“对人权的违反在该地区……是大规模的。”[113]与此类似，当2006年7月黎巴嫩真主党的部队越过以黎边境抓获两名以色列士兵，杀死更多的以色列士兵时，以色列通过摧毁像道路、桥梁、加油站和楼房那样关键的基础设施，发起了针对黎巴嫩平民的大规模惩罚性轰炸。轰炸中有1000多黎巴嫩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无辜的平民。就像我们将要在第十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种反应既是战略上的愚蠢行为，也是对战争法的违反。简而言之，对于那种时常听到的以色列在对付敌人时一直表现出极大克制的情形，几乎根本就不存在。

对此进行的明显挑战是，认为以色列在其整个历史上都面临致命威胁的观点。这种威胁既来自那些“拒不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政府，又来自那些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难道以色列没有权利采取无论什么措施来保护它的公民吗？而且恐怖主义独有的邪恶难道不是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的理由吗——即便以色列经常对此作出严厉的反应？

事实上，这种观点也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道德理由。巴勒斯坦人既用恐怖主义来反对他们的以色列占领者，也用恐怖主义来反对无辜的第三方；他们攻击平民的意愿是错误的，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然而，巴勒斯坦人的这种行为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他们的基本政治权利长期以来一直遭到否定，他们相信没有任何其他迫使以色列作出让步的途径。就像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曾经承认的那样，如果一个人生而

为巴勒斯坦人，他“就会加入到恐怖组织之中去”[114]。如果情形倒转过来，以色列人生活在阿拉伯人的占领之下，他们几乎肯定也在采用类似的策略反对他们的压迫者，就像在世界上其他的抵抗运动中曾经做过的那样。[115]

事实上，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处于类似的弱势地位，并试图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恐怖主义即是其主要策略之一。正是来自臭名昭著的伊尔根（Irgun）——一个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那些犹太恐怖分子，在1937年末将现在人们熟知的那些做法——在公共汽车和大型人群中安放炸弹——带到了巴勒斯坦。本尼·莫里斯推测道：“阿拉伯人有充分理由从犹太人那里学到恐怖爆炸的价值所在。”[116]在1944年至1947年期间，数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使用恐怖袭击将英国人从巴勒斯坦赶走，这种做法一路上夺走了许多无辜平民的生命。[117]以色列恐怖分子还在1948年谋杀了福克·伯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因为他们反对伯纳多特伯爵使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建议。[118]作出这些行为的犯罪者并非是孤立的极端分子：那些谋杀阴谋中的领导者最后被以色列政府给予大赦，而且其中有一个人后来还被选为议员。另一个赞成谋杀伯纳多特伯爵但却并未被审判的恐怖主义领导人，是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他公开主张说：“犹太道德和犹太传统都没有放弃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战斗手段。”相反，恐怖主义“在我们反对（英国）占领者的战争中……有着巨大的作用”。沙米尔也不对自己过去的恐怖主义经历表示出遗憾，因为他在1998年曾告诉一位访问者说：“如果我不曾像我做过的那样行事，那么我们将怀疑能够建立一个自己独立的犹太国家。”[119]

当然，领导伊尔根并在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在以色列独立之前的那些年里，是最引人注目的犹太恐怖主义分子之一。谈及贝京的时候，以色列前总理列维·艾希科尔经常直接称他为“恐怖分子”。[120]虽然巴勒斯坦人所使用的恐怖主义在今天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过去也在依赖恐怖主义。因此，人们不能够因为以色列过去或现在的行为在道德上所具有的优势，而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进行辩护。

为以色列进行辩护的另一条防线是，以色列没有特意将目标针对非战斗人员，而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人则确实有目标地杀死以色列平民。进而言之，攻击以色列的恐怖分子使用平民作为人体盾牌，这种做法使得以色列国防军在打击它的致命敌人时，除了令人遗憾地杀死无辜的平民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些理论也是不能够令人信服的。就像要在本书的第十一章当中所讨论的那样，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将目标对准平民区，而在那些地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黎巴嫩真主

党使用平民做盾牌。尽管也没有证据表明杀死巴勒斯坦平民是以色列的官方政策，但是以色列国防军在打击像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那样的团体的时候，却经常不能够做到小心避免平民的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人将目标对准平民的事实，不能够使以色列有权利通过使用不对称的武力来危及平民的生命。

毫无疑问，以色列有权利使用武力来对像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团体的暴力行为作出反应，但是它使用优势军力来使无辜平民大规模遭受苦难的意愿，却令人怀疑它所一再声称享有的特殊道德地位。以色列的行为虽然可能不比其他许多国家更加恶劣，但是它也不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好。

戴维营神话

对克林顿政府没有努力完成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标准解释，强化了这样的一种描述，即把以色列描述为预先准备好和平、将巴勒斯坦人描述为专心于战争。根据这样的故事，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在2000年7月的戴维营给予了巴勒斯坦人“几乎一切”他们所想要的东西。[121]但是，阿拉法特毅然决定使和平进程脱离轨道并摧毁以色列，他拒绝了以色列慷慨给予的机遇，代之以在2000年9月末发动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以色列接受了，而阿拉法特却拒绝了这样一项甚至更加慷慨的建议，即由克林顿总统于2000年12月23日所提出的克林顿参数[122]（Clinton parameters），从而进一步提供了阿拉法特对和平不感兴趣的证据。

在这个故事中，和平进程的失败几乎全部是阿拉法特的过错。以色列渴望达成和平，但是却发现对方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伙伴，从而证实了以色列前外长阿巴·伊班（Abba Eban）的那句讽刺性名言：“阿拉伯人从来不会为了失去一个机会而失去一个机会。”这种描述也意味着以色列和美国都不对持续的冲突承担责任，并且对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阿拉法特掌权，以色列就不作出让步是正确的——提供了支持。

这种人们广泛持有的相关事件观点的版本只存在一个问题：不正确。[123]尽管由于巴拉克是第一位——事实上是唯一的一位——给予巴勒斯坦人自己国家的以色列领导人而值得称许，但是他在戴维营所给的条件远不是慷慨大方那么一回事情。一开始似乎清楚的是，巴拉克在戴维营给出的最好的东西，是允诺巴勒斯坦人即刻控制加沙地带，并最终控制91%的西岸地区。[124]即便如此，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所给的东西中也存在着一些重大问题。以色列计划控制约旦河谷——大约占西岸地区的10%——6年至21年（在这一点上

对谈判叙述的表述各自不同），那意味着巴勒斯坦人不是即刻控制91%的西岸地区，而是81%。当然，巴勒斯坦人不能肯定以色列曾打算放弃对约旦河谷的控制。

此外，巴勒斯坦人对于构成西岸地区的定义要比以色列的稍微大一些。这一对西岸地区定义的差异，总计包含大约占争议领土的5%。巴勒斯坦人明白，那意味着他们即刻控制的西岸地区是76%；而如果以色列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愿意让出约旦河谷，他们可能可以控制86%的西岸地区。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一协定的特别困难之处是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已经在1993年的《奥斯陆和平协议》中同意承认以色列在原英国托管地超过78%的领土主权。[125]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在被要求作出另一次重大让步，接受所剩余22%土地中的86%。

更加糟糕的是，2000年夏天以色列在戴维营的最后建议，将不会在西岸地区给予巴勒斯坦人一片拥有主权的连贯性领土。巴勒斯坦人坚持认为，如果那样的话，西岸地区就将被以色列的领土分割成三小块。虽然以色列人对这一主张存有异议，但是巴拉克自己承认，以色列将维持对从耶路撒冷到约旦河谷楔入到其领土之中的"细长"地带的控制。[126]这一彻底将西岸地区一分为二的楔入地带，对于维持以色列对约旦河谷的控制计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戴维营所建议的巴勒斯坦国，将是由西岸地区明显不同的两个或三个行政区，以及加沙地带所组成，因为加沙地带本身即为以色列的领土所分隔开来。巴拉克后来说道，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领土本可以由"隧道或桥梁"连接起来，而加沙地带和西岸地区则本可以由旅行通道连接起来。[127]

至于棘手的耶路撒冷问题，巴拉克将该市一分为二的建议则是朝着正确方向的一个主要步骤。然而，在东耶路撒冷的许多阿拉伯人街区，巴勒斯坦人并未被赋予完整的主权，从而使得这一建议对他们的吸引力大打折扣。以色列还将控制巴勒斯坦国的边界、领空以及水资源，而且巴勒斯坦人永远被禁止建立一支捍卫自己的军队。[128]很难想象有任何领导人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当然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主权受到这样的剥夺，或者为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经济和社会而面临如此多的障碍。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戴维营会议的主要参与者、巴拉克的前外交部长施洛姆·本-阿米在接受一位采访者时说出这样的话就并不令人吃惊，他说道："如果我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我也会拒绝戴维营建议。"[129]

阿拉法特在2000年9月末发起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目的是要在谈判中提高他的筹码或者摧毁和平协议本身，这种普遍的看法也经不起证据的检验。[130]在戴维营会谈之后，他继续同以色列人和美

国人谈判，而且在暴力开始的几个晚上之前，他甚至到访过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的家。根据曾撰写过一部有关这些谈判失败专著的法国著名新闻记者查尔斯·恩德林（Charles Enderlin）的观点，两位领导人显然很友好，对那天晚上的谈判很乐观。[131]进而言之，辛贝特前负责人阿米·阿亚龙（Ami Ayalon）曾声明说："阿拉法特既没有准备也没有引发这次起义。"[132]由前美国参议员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领导的所谓"米切尔委员会"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该委员会负责对和平进程的重新启动。[133]

2000年9月28日，阿里埃勒·沙龙对犹太教最神圣的场所圣殿山进行了参观，随后旋即爆发了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起义。由于穆斯林将同一场所看作伊斯兰第三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的所在地，因此沙龙必须由1000多名警察陪同前往。但是沙龙的挑衅举动只是使得暴力加剧的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早在沙龙参观之前，动乱就一直在巴勒斯坦人当中酝酿着，而且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承认这种危险。事实上，巴勒斯坦领导人要求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禁止沙龙前往参观，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预见到由此引起的暴力反应，并试图阻止这一暴力的发生。[134]

问题部分是巴勒斯坦人日益增加的对阿拉法特的不满，他的腐败领导对改善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帮助，更不用说给予他们一个国家。但是主要原因则是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挑衅性政策。紧随沙龙参观之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示威所作出的严厉反应使这种政策得以强化。[135]本-阿米的看法完全正确，他认为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起义"不仅仅只是作为战术性步骤而开始的。它是巴勒斯坦民众日积月累的愤怒和挫折的大爆发，而这种愤怒和挫折则是由和平进程所遭受的巨大失败——因为奥斯陆协议和平进程的初期曾给予他们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福祉——和他们的巴勒斯坦当局领导人的无能和腐败所带来的"[136]。

巴勒斯坦人的那些挫折感并不难理解。在1993年9月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开始，到7年后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的爆发之间，以色列没收了4万多英亩的巴勒斯坦人土地，修建了250英里的小道和安全道路，建立了30个新的定居点，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增加了几乎10万定居人口——这实际上使定居人口的数量翻了一番。[137]以色列还违背了将土地交还给巴勒斯坦人的承诺，建立了大大限制巴勒斯坦人自由移动、严重伤害其经济的关卡系统。到2000年的时候，巴勒斯坦人起义的爆发已经准备好了，而当起义爆发的时候，以色列进行了毫无约束的优势火力攻击。[138]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样，以色列国防军在起义的最初几天里射出了100多万发子弹。

虽然阿拉法特并没有发动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起义，但是他愚蠢地试图利用其所导致的暴力结果来提高自己讨价还价的地位。这种举措不仅使巴拉克达成协议的意愿降低了，而且还伤害到巴拉克同以色列选民之间的立场，为沙龙在2001年2月的选举铺平了道路。阿拉法特企图利用起义使得谈判被延期，这意味着已是跛脚鸭的克林顿政府完成这一进程的时间甚至更加少了。

有人认为阿拉法特操纵暴力的最终目标是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他刚刚出现在世界舞台的时候，那肯定是他的目标，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他已承认，巴勒斯坦人无法使以色列人离开。20世纪90年代，阿拉法特详细而清楚地表明——当然是通过参加奥斯陆的和平进程，他接受以色列的存在，而他同以色列的斗争是在被占领土的控制上面，并非历史上的整个巴勒斯坦。[139]当戴维营会谈失败和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以色列主要情报人员都相信，阿拉法特接受了以色列的存在，他只是要寻求在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140]进而言之，就像中东问题专家杰里米·普莱斯曼（Jeremy Pressman）所指出的那样，如果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人决心要消灭以色列，那么他们就会接受巴拉克给出的谈判条件，并利用这个新的国家作为“消灭以色列的平台”。而与此相反，他们进行谈判，“似乎他们期待着遵守任何协议，长期在两个国家的解决框架中生存”[141]。

最后，阿拉法特拒绝了2000年12月的克林顿参数这种经常被人重复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克林顿参数确实在巴拉克戴维营给出的条件基础上得到了改进。巴勒斯坦的官方反应是感谢克林顿所作出的持续努力，宣称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要求澄清某点内容，并表达对其他内容的保留意见。[142]以色列政府也对该建议有自己的保留意见，巴拉克在一个长达22页单倍行距的文件中概要地说明了这些意见。因此，虽然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接受了克林顿参数，将其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但是没有一方完全接受克林顿参数。白宫发言人杰克·西尔沃特（Jake Siewert）在2001年1月3日说明的正是这一点。他当时说道，“双方都有保留地接受了总统的想法”，而且克林顿4天后在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上的演说中也肯定了这一点。[143]以巴之间的谈判继续在埃及的塔巴（Taba）一直进行到2001年1月底，当时是埃胡德·巴拉克而非阿拉法特中断了谈判。随着以色列的选举近在眼前，以及以色列公众舆论强烈反对那些会谈，巴拉克感到他已经没有剩余的时间了。[144]他的继任者阿里埃勒·沙龙固执地反对奥斯陆和平进程和克林顿参数，因此拒绝恢复谈判，尽管巴勒斯坦人反复提出要求。虽然我们决不会知道2001年初和平是否就在眼前，但指责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人拒绝了最后的和平机会，并选择了暴力而非和解则是

错误的。

假定以色列是上帝的意志

还有最后的这样一个道德观点——有人说这种观点使美以之间的紧密拥抱合理化。就像在第四章中要更加详尽地讨论的那样，有些福音派基督徒——尤其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将这个犹太国家的建立，看作《圣经》中预言的实现。《创世纪》说上帝将以色列这片土地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通过使西岸地区殖民化，犹太人只是拿回了上帝给他们的东西。有些基督徒也把大以色列的建立，看作《新约全书》中《启示录》所描述的、导致世界末日“最后战斗”的主要事件。这两种观点都意味着以色列值得得到美国的支持，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是个弱者，或者是一个具有道德优势的社会，而是因为支持以色列乃是上帝的意志。

虽然这一观点无疑对一些宗教狂热者具有吸引力，但是预测世界末日的善恶大战，不是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正确理由。在美国，政教是分离的，而且任何一个群体的宗教观点，都不应该决定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支持强大的以色列虐待被剥夺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并压制他们的权利，这也是一种对基督教道德的奇怪解释。

美国人民要的是什么？

我们刚刚考察过的这六个道德观点，支撑着一个更为宏大的观点，即美国对以色列进行支持的真正基础，是美国人民对这个犹太国家的长期认同。《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专栏作家杰夫·雅各比（Jeff Jacoby）写道：“同以色列的团结是美国公众舆论的持久特点。因为美国人民是亲以色列的，所以美国政府亲以色列。而且因为美国人民在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发生冲突时是如此强烈地支持以色列，所以美国的中东政策承诺保护以色列。”就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发言人乔什·布洛克（Josh Block）在其2007年政策大会的前夜所说的那样：“有一个问题将所有人聚集到一起，那就是支持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认为“所有趋势显示，美国人……非常清楚明白，我们所颂扬的基本价值在中东只在一个国家——我们的盟友以色列——得到了反映”[145]。

然而，这种广为人们所信奉的主张却经不起严格的检查。由于美国同以色列部分地以共有的犹太-基督教传统为基础，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化类似性。由于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由于反犹主义的历史缘故，由于美国人同情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战

斗，因此毫无疑问，美国人对以色列怀有好感。但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共同根源，在过去几乎谈不上是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和睦相处的可靠起因。[146]不仅基督教徒相互之间发动血腥的战争，而且他们还是过去几百年间残暴的反犹主义的主要作恶者。而有的宗教激进主义者——其中包括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依然将使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看作重要的福音派基督教的目标。因此，根据这种“文化的类似性”本身，不能够解释美国对以色列一以贯之的支持所达到的程度，甚或也不能够解释许多美国人对这个犹太国家所表达的普遍喜欢的态度。

就像在下面的篇章中清楚显示的那样，美国人民之所以倾向于支持以色列，部分地是因为累积起来的对以色列的同情，这种同情的累积一方面是通过抑制对以色列的批评，而与此同时则按照对它有利的方式来描述它而实现的。事实上，在以色列本国对以色列行为的批评，要比在美国对它的批评多得多。如果有关以色列人在被占领土的行为，以及以色列作为美国盟国的实际战略价值的讨论更加开诚布公，那么在美国公众当中对以色列的同情就会少得多。

然而，不应该夸大公众对以色列——以及具体的以色列政策——的支持程度。虽然美国人民对以色列存有好感，明确支持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但是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不会如此特别地深厚。大多数美国人也承认，美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付出了代价。例如，皮尤大众与媒体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多年来一直问美国人他们是否更同情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人这个问题。对以色列的同情一直以来总比对巴勒斯坦人要高得多，但是从1993年至2006年，对以色列持同情态度的人数超过50%只有一次——即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的52%，而且2005年7月更是低到37%。[147]

关于美国对以色列支持所产生的后果的问题，皮尤中心2005年11月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39%的美国公众说那是“全球对美国不满的主要原因”。在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当中，这些数字实质上要更高。事实上，分别有78%的新闻媒体成员、72%的安全专家、69%的外交事务专家相信，支持以色列严重地损害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148]“9·11”袭击发生数周之后，美国的《新闻周刊》（*Newsweek*）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8%的记者相信，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奥萨马·本·拉登决定袭击美国的一个因素。[149]

相对于政治家们，美国人民对以色列某些行为的批评要多得多，而且美国公众明显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当他们认为是出于国家利益而对以色列采取实用主义的手段时，美国就应该这样做。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所解释的那样，2003年春天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以色列抵制

美国对其施加的解决与巴勒斯坦人冲突的压力，60%的美国人愿意拒绝对以色列的援助。事实上，73%的人说，美国不应该偏向冲突中的任何一方。[150]两年后，反诽谤联盟发现，78%的美国人相信，华盛顿既不应该偏向以色列，也不应该偏向巴勒斯坦人。[151]皮尤大众与媒体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克胡特（Andrew Kohut）指出："一般的美国人明白中东冲突前景的灰暗，尽管他们有这样的同情，但他们还是赞成美国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152]

与他们的领导人不同，美国人民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期间，显示的是强硬对付以色列的方法。就像在第十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那些民意调查显示，只有略微超过一半的公众认为，以色列对战争应负同样或者更多的责任，而且至少在两次民意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回应者说，美国不应该偏向哪一边。[153]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则有力地偏向以色列一边，就像在涉及以色列近来每次冲突时所表现的一样。这种对以色列充满热情的无条件支持，是不能够以大多数美国人普遍对以色列持有好感的理由来进行解释的。

结论

以色列的支持者通常提出的道德和战略观点，都不能够解释过去30年间美国与这个犹太国家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在后冷战时期尤其如此，此时，对以色列支持的战略理论基本上已经消失了，而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所作所为则严重地削弱了支持以色列的道德理论。然而，美以之间的关系却在继续增进和深化。

有些美国人肯定没有发现这种情形是反常的，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在美国对以色列进行支持的背后，有着强大的道德和战略理由。由于在这个故事中的根本事实与这一观点是如此相左，因此很难想象真正相信这一观点的人，其人数足以多到能够解释美国与这个犹太国家之间的例外关系。留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要么是人数相对少的一些真正相信这一观点的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施加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要么是他们已经设法说服了许多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关键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相信，这些错误的理论实际上是正确的。因为战略和道德理由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因此在美国不断增加对以色列支持的这一引人注目的模式背后，必定存在着其他东西。

我们在下面的一章里对此问题加以讨论。

---

[1] "President Speaks to 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Washington Convention Center,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May 18, 2004).

[2] 引自Mark Chmiel，“Elie Wiesel an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Tikkun.org*，November/December 2002。

[3] Paul Breines，*Tough Jews*：*Political Fantasies and the Moral Dilemma of American Jewry*（New York：Basic Books，1990），pp.54—59；Michelle Mart，*Eye on Israel*：*How America Came to View Israel as an All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pp.169—174；Melani McAlister，*Epic Encounters*：*Culture*，*Media*，*and U.S.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1945—20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pp.159—165；Edward Tivnan，*The Lobby*：*Jewish Political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pp.50—51，以及 David Twersky，“Novelist Leon Uris Taught Jewish Readers to Stand Tall，”*Forward*，June 27，2003。

[4] （以色列建国的）主要神话在以下这部作品中被呈现并被加以驳斥：Simha Flapan，*The Birth of Israel*：*Myths and Realitie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7）。

[5] 关于以色列“新历史”简短而精彩的归纳，参见Avi Shlaim，“The New History of 1948 and the Palestinian Nakba，”*Miftah.org*，March 18，2004。

[6] Meron Rappaport，“IDF Commander：We Fired More Than a Million Cluster Bombs in Lebanon，”*Ha'aretz*，September 12，2006，以及“Shooting Without a Target，”*Ha'aretz* editorial，September 14，2006。

[7] Benny Morris，*1948 and After*：*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3.也可参见Flapan，*Birth of Israel*，pp.187—199。

[8] Morris，*1948 and After*，p.14.莫里斯在一篇长文（“And Now for Some Facts：The Ignorance at the Heart of an Innuendo，”*New Republic*，May 8，2006）中，尖锐地批评了我们最初的那篇文章《以色列游说集团》，他声称我们犯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知识错误。具体而言，他对我们提出的挑战，有关于1948年独立战争军事平衡的解释，以及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历史的其他几个关键事件的解释。莫里斯对我们的批评，使他与自己早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和其他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产生矛盾。这一学术成果为阐释以色列的建国与它的阿拉伯邻国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相信，这一学术成果证实了我们对以色列军事优势和领土野心的叙述，以及它的难民政策。关于我们对莫里斯的指控所进行的讨论，参见John J.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Walt，“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A Response to Critics of ‘The Israel Lobby，’” December 12，2006，pp.26—46，登录www.israellobbybook.com。

[9] 关于1948年的军事平衡，参见Trevor N.Dupuy，*Elusive Victory*：*The Arab-Israeli Wars*，*1947—1974*（New York：Harper，1978），pp.3—19，pp.121—125；Rashid Khalidi，“The Palestinians and 1948：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Failure，”in *The War for Palestine*：*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ed.Eugene L.Rogan and Avi Shlai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2—36；Rashid Khalidi，*The Iron Cage*：*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Boston：Beacon Press，2006），chap.4；Haim Levenberg，*Military Preparations of the Arab Community in Palestine*，*1945—1948*（Portland，OR：Frank Cass，1993）；Benny Morris，*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Revisit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chaps.1，3；Benny Morris，*Righteous Victims*：*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1881—1999*（New York：Knopf，1999），pp.187—189，191—196，215—223，235—236，241—242；Morris，*1948 and After*，pp.13—16，以及Martin Van Creveld，*The Sword and the Olive*：*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Israeli Defense Forces*（New York：Public Affairs，1998），pp.77—82。

[10] Ilan Papp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Oxford：Oneworld Publications，2006），p.45.

[11] Ibid，p.22.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明白其作战部队相对于巴勒斯坦人具有决定性优势，以及这种情形使得他们能够寻求对巴勒斯坦人侵略性政策的证据，参见注解10，尤其是pp.22—23，26，41，44—46，70，79，84。

[12] Morris，*1948 and After*，p.15.

[13] Ibid.

[14] Morris，*Righteous Victims*，p.393.

[15] 关于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战争的军事平衡，参见Dupuy，*Elusive Victory*，pp.146—147，212—214，231—244，333—340，388—390，597—605，623—633；Morris，*Righteous Victims*，pp.286—291，311—313，393—395，以及Van Creveld，*The Sword and the Olive*，pp.137—138，179—182，239—243。

[16] 在2000年10月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开始之后，以色列在2001年至2002年遭受了经济低迷期。然而，大多数专家却认为，这一经济低迷的责任基本上要归咎于全球经济衰退。《福布斯》杂志2002年5月底那一期上的一篇文章，对一般人的看法进行了归纳：“以色列政府和民间经济学家估计，以色列2/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重挫，即从2000年6.4%的增长率下降到当前的零增长率，不是缘于恐怖主义，而是缘于高科技所导致的全球不景气。”参见David Simons，“Cold Calculation of Terror，”*Forbes*，May 28，2002。即便巴勒斯坦人的起义还在继续，但是2003年至2005年的以色列经济却得以反弹。参见Emma Clark，“Israel's Neglected Economy，”*BBC News*

（online），September 2，2002；Nadav Morag，“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Intensive Terrorism：Israel，2000—2004，”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0*，no.3（September 2006）；Neal Sandler，“Israel's Economy：As if the Intifada Weren't Enough，” *BusinessWeek* ，June 18，2001，以及 Linda Sharaby，“Israel's Economic Growth：Success Without Security，”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no.3（September 2002）。

[17] Amos Harel，“Israel Maintains Its Strategic Advantage，Says Jaffee Center，” *Ha'aretz* ，November 23，2005.也可参见Uri Bar-Joseph，“The Paradox of Israeli Power，” *Survival 46*，no.4（Winter 2004—2005），以及Martin Van Creveld，“Opportunity Beckons，” *Jerusalem Post* ，May 16，2003。贾菲战略研究中心现已并入国家战略研究所这一新的机构。

[18] Alan Dershowitz，“Debunking the Newest—and Oldest—Jewish Conspiracy：A Reply to the Mearsheimer-Walt ‘Working Paper，'” 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Harvard University，April 2006，p.22，以及Martin Peretz，“Killer Angels：Murdering Jews，Then and Now，” *New Republic* ，April 15，2002，pp.17—18。

[19] Morris，*1948 and After*，pp.11—12.这一段落中接下来所引用的莫里斯的内容参见该书第13页。

[20] Shlomo Ben-Ami，*Scars of War*，*Wounds of Peace*：*The Israeli-Arab Traged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35—36.也可参见Flapan，Birth of Israel，pp.119—152。

[21] 一般人的这一观点在以下作品中得到了反映：Michael B.Oren，“Did Israel Want the Six-Day War？” *Azure5759*，no.7（Spring 1999），以及 Michael B.Oren，*Six Days of War*：*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2] 关于1967年战争起源的最佳新作包括Ben-Ami，*Scars of War* ，pp.96—114；Norman G.Finkelstein，“Abba Eban with Footnote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2*，no.3（Spring 2003）；Roland Popp，“Stumbling Decidedly into the Six-Day War，” *Middle East Journal 60*，no.2（Spring 2006），以及Tom Segev，*1967*：*Israel*，*the War*，*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trans.Jessica Cohen（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7）。

[23] Avi Shlaim，*The Iron Wall*：*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New York：Norton，2000），p.237.

[24] Ibid.，p.235.也可参见Stephen S.Rosenfeld，“Israel and Syria：Correcting the Record，”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4，1999。

[25] Ben-Ami，*Scars of War* ，p.100.

[26] Segev，*1967*，pp.202—212，295—296.

[27] 引自注解26，p.300。也可参见注解26，pp.387—388。

[28] Ben-Ami，*Scars of War* ，pp.76—77.

[29] Morris，*Righteous Victims* ，p.387.也可参见John J.Mearsheimer，*Conventional Deterr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p.155—162。

[30] 引自Mearsheimer，*Conventional Deterrence* ，p.159。

[31] Yoram Meital，*Peace in Tatters*：*Israel*，*Palestine*，*and the Middle East*（Boulder，CO：Lynne Rienner，2006），pp.148—152；Charles A.Radin，“Arabs Offer to Accept Israel with Conditions，” *Boston Globe* ，March 29，2002，以及Howard Schneider，“Arab Countries Unanimously Endorse Saudi Peace Plan，” *Washington Post* ，March 29，2002。

[32] 根据《回归法》（Law of Return），“犹太人”被定义为“由犹太母亲所生者，或已皈依犹太教、且非其他宗教成员者”。实际的法律和相关的修订内容，可登录以色列外交部网站www.mfa.gov.il/mfa/mfaarchive/1950_1959/Law%20Return%2057101950。最近在以色列已在讨论通过立法，以便承认那些父亲为犹太人，而母亲为非犹太人的个人为犹太人。参见Shahar Ilan，“Bill Would Recognize Judaism Through Father，” *Ha'aretz* ，March 12，2006。

[33] 《以色列国建国宣言》可在以下文献中找到：John Norton Moore，ed.，*The Arab-Israeli Conflict*：*Readings and Docu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934—937。

[34] David Ben-Gurion，*Israel*：*A Personal History* ，trans.Nechemia Meyers and Uzy Nystar（New York：Funk and Wagnalls，1971），p.839.

[35] 这些数字基于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 ，2006，Table 2.1，www1.cbs.gov.il/reader/，以及 Palestinian Academic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Palestine Facts and Info* ，“Population，” www.passia.org/galesting_facts/facts and figures/0 facts and figures.htm。以色列中央统计局（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CBS）将大约30万居住在以色列的人定义为“其他人”。他们大多是

犹太移民的家庭成员，或是那些祖先为犹太人而母亲为非犹太人的个人，以色列政府因此没有将他们归类为犹太人。如果把他们也归类犹太人，那么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总数就将是大约560万人，而不是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字530万。

[36] 一项在2007年2月至3月进行的关于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意调查得出结论认为："人口统计上的挑战对大部分犹太人来说是日益紧迫的问题，并且对界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集体方法起到了作用。" Yehuda Ben Meir and Dafna Shaked，"The People Speak： Israeli Public Opinion on National Security，2005—2007，" Memorandum no.90（Tel Aviv：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May 2007），p.10，pp.64—65.也可参见Aluf Benn，"Israel's Identity Crisis，" *Salon.com*，May 16，2005；Larry Derfner，"Sounding the Alarm About Israel's Demographic Crisis，" *Forward*，January 9，2004；Jon E.Dougherty，"Will Israel Become an Arab State？" *NewsMax.com*，January 12，2004；Lily Galili，"A Jewish Demographic State，" *Ha'aretz*，June 28，2002，以及 Gideon Levy，"Wombs in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Ha'aretz*，September 9，2002。

[37] Shulamit Aloni，"A Country for Some of Its Citizens？" *Ha'aretz*，February 24，2007.《人的尊严和自由基本法》可登录以色列议会网站，www .knesset.gov.il/laws/special/eng/basic3_eng.htm。

[38] Jonathan Cook，*Blood and Religion*：*The Unmasking of the Jewish and Democratic State*（Ann Arbor，MI： Pluto Press，2006），pp.17—18.也可参见Adalah and the Arab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Equal Rights and Minority Rights for the Palestinian Arab Minority in Israel，" 关于以色列执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和27条而于1998年7月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As'ad Ghanem，Nadim Rouhana，and Oren Yiftachel，"Questioning Ethnic Democracy'： A Response to Sammy Smooha，" *Israel Studies 3*，no.2（Fall 1998）；David B.Green，"The Other Israelis，" *Boston Globe*，February 25，2007；Human Rights Watch，*Second Class*：*Discrimination Against Palestinian Arab Children in Israel's Schools*（New York，September 2001），chap.8；Frances Raday，"Religion，Multiculturalism and Equality： The Israeli Case，" in *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Vol.25（1995），ed.Yoram Dinstein（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96），pp.193—241；Ahmad H.Sa'di，"Israel as Ethnic Democracy：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Palestinian Minority？" *Arab Studies Quarterly22*，no.1（Winter 2000），以及 Sammy Smooha，"Ethnic Democracy： Israel as an Archetype，" *Israel Studies2*，no.2（Fall 1997）。

[39] "The Official Summation of the Or Commission Report，" published in *Ha'aretz*，September 2，2003. 关于许多以色列人对该报告的结果和建议抱以怎样敌对态度的证据，参见"No Avoiding the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s，" *Ha'aretz*editorial，September 4，2003，以及Molly Moore，"Israelis Look Inward After Critical Report，"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3，2003。也可参见 Bernard Avishai，"Saving Israel from Itself： A Secular Future for the Jewish State，" *Harper's*，January 2005；Ian Lustick，*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Israel's Control of a National Minority*（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0），以及 Chris McGreal，"Worlds Apart，" *Guardian*，February 6，2006。

[40] Roee Nahmias，"Marriage to an Arab Is National Treason，" *Ynetnews.com*，March 27，2007，以及 Yoav Stern，"Poll： 50% of Israeli Jews Support State-Backed Arab Emigration，" *Ha'aretz*，March 27，2007。关于2006年一份调查的类似结果，参见Eli Ashkenazi and Jack Khoury，"Poll： 68% of Jews Would Refuse to Live in Same Building as an Arab，" *Ha'aretz*，March 22，2006；Chris McGreal，"41% of Israel's Jews Favor Segregation，" *Guardian*，March 24，2006；Sharon Roffe-Ofir，"Poll： Israeli Jews Shun Arabs，" *Ynetnews.com*，March 22，2006，以及 Kenneth J.Theisen，"Racism Alive and Well in Israel？" Pittsburgh Independent Media Center（online），June 1，2006。

[41] Israeli Democracy Institute，"The Democracy Index： Major Findings 2003." 此报告的摘要可登录www.idi.org.il/english/article.asp？id＝1466。

[42] 根据一份2007年的民意调查，63%的以色列犹太人反对在内阁中存在一名阿拉伯裔部长。2004年，75%的以色列犹太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而2005年和2006年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以色列犹太人则是60%。参见Ben Meir and Shaked，"The People Speak，" p.80。也可参见ibid.，p.22，pp.79—82；Orly Halpern，"Arab Cabinet Pick Stirs Zionism-Racism' Debate，" *Forward*，January 19，2007；Gil Hoffman，" Majadleh Slot the End of Zionism，'" *Jerusalem Post*，January 10，2007；Ronny Sofer，"Cabinet Approves First Arab Minister，" *Ynetnews.com*，January 28，2007，以及Scott Wilson，"In First，Arab Muslim Joins Israeli Cabinet，" *Washington Post*，January 29，2007。

[43] 引自Justin Huggler，"Israel Imposes 'Racist' Marriage Law，" *Independent*，August 1，2003。也可参见James Bennet，"Israel Blocks Palestinians from Marrying into Residency，" *New York Times*，July 31，2003；"Racist Legislation，" *Ha'aretz*editorial，July，19，2004；"Racist Legislation，" *Ha'aretz* editorial，January 18，2005，以及Shahar Ilan，"Law Denying Family Unification to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Extended，" *Ha'aretz*，March 21，2007。即便是反诽谤联盟也批评这项立法，尽管是温和的批评。Nathan Guttman，Yair Ettinger，and Sharon Sadeh，"ADL Criticizes Law Denying Citizenship to Palestinians Who Marry Israelis，" *Ha'aretz*，August 5，2003.

[44] 引自Tovah Tzimuki，"Government Supports Revocation of Citizenship，" *Ynetnews.com*，January 8，2007。也可参见 Saed Bannoura，"Israeli Knesset Passes Law to Revoke Citizenship of 'Unpatriotic' Israelis，" International Middle East Media Center（online），January 10，2007；Sheera Claire Frenkel，"'Disloyalty' Bill Passes First Hurdle，" *Jerusalem Post*，January 10，2007；Tom Segev，"Conditional

Citizenship，” *Ha'aretz* ，January 11，2007，以及Yuval Yoaz，“Government to Back Bill Allowing Court to Rescind Traitors' Citizenship，” *Ha'aretz* ，January 7，2007。

[45] 引自Larry Derfner，“Rattling the Cage：A Bigot Called Bibi，” *Jerusalem Post* ，January 3，2007。也可参见Aluf Benn and Gideon Alon，“Netanyahu：Israel's Arabs Are the Real Demographic Threat，” *Ha'aretz* ，December 18，2003；Ron Dermer，“The Nerve of Bibi，” *Jerusalem Post* ，January 9，2007；Karina's Kolumn（Karina Robinson），“Benjamin Netanyahu：Israel's Prime Minister in Waiting，” *Banker* （online），July 1，2004，以及 Neta Sela，“Netanyahu：Pensions Cut-Arabs' Birth Rate Declined，” *Ynetnews.com* ，January 3，2007。

[46] 这些声明并非孤立性的例子。比如在2004年初，以色列国防部副部长泽厄夫·博伊姆即认为，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是由于其“遗传的缺陷”。另一名以色列议员支持他的观点，他说恐怖主义“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之中”，而这就是如果你“转过身去”的话，为什么阿拉伯人“将在你背后捅刀子”的原因。即便是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也仍然将巴勒斯坦人称之为应该像“连环杀手”一样加以对待的“野蛮人”，尽管他在更早的学术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揭示以色列真正的巴勒斯坦政策。贝京的评论引自 Amnon Kapeliuk，“Begin and the ‘Beasts，’” *New Statesman* ，June 25，1982，p.12。埃尔坦的评论引自David K.Shipler，“Most West Bank Arabs Blaming U.S.for Impasse，” *New York Times* ，April 14，1983，以及Uzi Benziman，Sharon：An Israeli Caesar（New York：Adama Books，1985），p.264。亚阿隆的评论引自Ari Shavit，“The Enemy Within，” *Ha'aretz* ，August 27，2002。博伊姆及其支持者的评论引自Yuval Yoaz，“AG：Ethics Committee to Probe Racist Comments Made by MKs，” *Ha'aretz* ，August 10，2004。莫里斯的评论引自Ari Shavit，“Survival of the Fittest，” *Ha'aretz* ，January 9，2004。

[47] Larry Derfner，“Rattling the Cage：The Racism of Israeli Youth，”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7，2007.也可参见 Ahiya Raved，“Youth Believe Arabs Dirty，Uneducated，” *Ynetnews.com* ，January 9，2007。

[48] 引自Ben Lynfield，“The Rise of Avigdor Lieberman，” *Nation* ，December 14，2006。也可参见Uri Avnery，“The Lovable Man？Lieberman and the Decline of Israeli Democracy，” *Antiwar.com* ，November 3，2006；Akiva Eldar，“Let's Hear It for the Haiders，” *Ha'aretz* ，October 30，2006；Leonard Fein，“The Fantasies of Avigdor Lieberman，” *Forward* ，October 20，2006；Gershom Gorenberg，“The Minister for National Fears，” *Atlantic* ，May 2007，以及Henry Siegman，“Hurricane Carter，” *Nation* ，January 22，2007。以色列国家宗教党前领导人埃菲·艾塔姆（Effi Eitam）与创立右翼政党祖国党的以色列将军雷哈瓦姆·泽厄维（Rehavam Ze'evi），是公开支持人口迁移的前政府部长。

[49] “The Democracy Index：Major Findings 2003”；Yulie Khromchenko，“Survey：Most Jewish Israelis Support Transfer of Arabs，” *Ha'aretz* ，June 22，2004；Yoav Stern，“Poll：Most Israeli Jews Say Israeli Arabs Should Emigrate，” *Ha'aretz* ，April 4，2005；McGreal，“41% of Israel's Jews”；Amiram Barkat and Jack Khoury，“Poll：Gov't Should Help Arab Citizens Emigrate，” *Ha'aretz* ，May 10，2006，以及 Roffe-Ofir，“Poll”。也可参见 Uzi Arad，“Swap Meet：Trading Land for Peace，” *New Republic* ，November 28 和 December 5，2005；Amnon Barzilai，“More Israeli Jews Favor Transfer of Palestinians，Israeli Arabs—Poll Finds，” *Ha'aretz* ，October 10，2005；Arik Carmon，“A Blot on Israeli Democracy，” *Ha'aretz* ，December 12，2005；Evelyn Gordon，“No Longer the Political Fringe，”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14，2006；Ben Lynfield，“Israeli Expulsion Idea Gains Stea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6，2002；Stern，“Poll：50% of Israeli Jews”；Matthew Wagner，“New Proposal：Transfer-for-Cash Plan，” *Jerusalem Post* ，January 21，2007，以及 Steven I.Weiss，“Israeli Rightist Calls for Transfer of Arabs，” *Forward* ，September 15，2006。

[50] B'Tselem，“The Scope of Israeli Control in the Gaza Strip，” www.btselem.org/english/Gaza_Strip/Gaza_Status.asp；David Sharrock，“Israel's ‘Invisible Hand’ Still Controls Gaza，Says Report，” *Times* （London），January 15，2007，以及 Scott Wilson，“For Gaza，a Question of Responsibility，” *Washington Post* ，March 21，2007。

[51] Jan Egeland and Jan Eliasson，“La catastrophe humaine de Gaza est une bombe à retardement，” *Figaro* （online），September 28，2006.也可参见 Steven Erlanger，“As Parents Go Unpaid，Gaza Children Go Hungr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4，2006；Steven Erlanger，“Years of Strife and Lost Hope Scar Young Palestinians，” *New York Times* ，March 12，2007；Donald Macintyre，“Gaza in Danger of Turning into a Giant Prison，' Says Mideast Envoy，” *Independent* ，November 14，2005；Rory McCarthy，“Occupied Gaza Like Apartheid South Africa，Says UN Report，” *Guardian* ，February 23，2007；Sara Roy，“The Economy of Gaza，” *Znet* （online），October 9，2006；Mohammed Samhouri，“Looking Beyond the Numbers：The Palestinian Socioeconomic Crisis of 2006，” *Middle East Brief*no.16，Crow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Brandeis University，February 2007；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OCHA），“Statement on Gaza by United Nations Humanitarian Agencies Working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August 3，2006，以及OCHA，“The Humanitarian Monitor：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no.10，February 2007。

[52] “Making the Law a Laughingstock，” *Ha'aretz*editorial，December 31，2006.

[53] Steven Erlanger，“West Bank Sites on Private Land，Data Shows，” *New York Times* ，March 14，2007；Nadav Shragai，“Peace Now：32% of Land Held for Settlements Is Private Property，” *Ha'aretz* ，March 14，2007.也可参见Greg Myre，“For West Bank，It's a Highway to Frustration，”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18， 2006，以及 “Legitimization of Land Theft，” *Ha'aretz*editorial， February 27， 2007。

[54] 第一波来到巴勒斯坦的欧洲犹太人即人们所知道的第一次犹太人移民（the First Aliyah），移民的年份涵盖从1882年至1903年。根据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普查，1882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略多于1.5万人。在贾斯廷·麦卡锡（Justin McCarthy）的作品 [*The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Population History and Statistics of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and the Mand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0—13.]中，有从1850年至1915年的详尽数据。然而，由于麦卡锡的数据是以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普查数字为基础的，因此排除了“数目不详的维持原有公民身份的犹太移民”。他进一步指出：“早期的非公民身份的犹太人本来就是相对不值一提的”，估计的数目“可能为1000至2000人”。因此，1882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上限可能是1.7万人。也可参见Mark Tessler， *A History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24。

[55] 1893年，巴勒斯坦的总人口约为53万，其中约1.9万人（3.6%）是犹太人，绝大多数的其余人口则是由阿拉伯人组成。McCarthy，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 p.10.

[56]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琼·彼得斯（Joan Peters）的作品*From Time Immemorial*： *The Origins of the Arab-Jewish Conflict over Palestine* （New York： Harper， 1984）出版时，这一问题得到重新关注。她认为，当犹太人开始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的时候，那里的阿拉伯人比一般观点所认为的要少得多；而只是在犹太人开始开发这片土地之后，阿拉伯人才大量迁移到巴勒斯坦。一大批著名的美国犹太人满腔热情地支持彼得斯书中的观点。然而，就在此书出版后不久，许多学者表明，彼得斯的作品不仅是以“高度的倾向性来使用或忽略能够得到的原始资料”为基础的，而且其核心观点也是极其错误的。Yehoshua Porath， “Mrs.Peters's Palestin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January 16， 1986.杰出的以色列历史学家波拉斯（Porath）在与《纽约时报》进行对话时说，彼得斯的书“纯属伪造”，而且在以色列，该书“除了可能作为宣传武器之外，几乎普遍被视为完全的垃圾品”。Colin Campbell， “Dispute Flares over Book on Claims to Palestine，”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8， 1985.也可参见Norman G.Finkelstein， *Image and Reality of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London： Verso， 2001）， chap.2.

[57] Laurence J.Silberstein， *The Postzionism Debate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Israeli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51.

[58] Ben-Ami， *Scars of War* ， p.9.

[59] 1948年，除了65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之外，还有大约120万巴勒斯坦人，转化为人口比例即65%的巴勒斯坦人和35% 的犹太人。参见Morris， 1948 *and After* ， p.14。弗拉番所使用的人口数字中，犹太人占33%的人口（*Birth of Israel* ， p.44），而莫里斯在*Righteous Victims* （p.186）一书中所使用的数字，犹太人占人口的百分比则是37%。

[60] 一些人相信，本-古里安及其追随者弗拉基米尔·雅勃廷斯基这样的修正主义者具有较少的领土目标野心。但正如阿维·施莱姆清楚表明的那样：“（本-古里安）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前者是领土最低限度的要求者、后者是领土最大限度的要求者，而是在于前者追求的是渐进主义战略、后者坚持的则是一种要么全部获得、要么就全部失去的方法。”Shlaim， *Iron Wall* ， p.21.犹太复国主义者小心谨慎地不在公开场合多说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最终目标，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会激怒阿拉伯人和英国人，并破坏他们的事业。然而，本-古里安却在一本合著的书中阐述了他有关以色列的边界将会是什么样子的观点，该书用意第绪语写成，1918年在美国出版。除了今天以色列的边界状况，在本-古里安有关以色列边界的观点中，还包括被占领土、南黎巴嫩至利塔尼河（Litani River）地区、叙利亚南部的一部分领土、约旦的大部，以及西奈半岛。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p.75.

[61] Flapan， *Birth of Israel* ， pp.103—104，以及Morris， *Birth Revisited* ， p.69。

[62] 这些话引自Flapan， *Birth of Israel* ， p.22，以及 Shlaim， *Iron Wall* ， p.21。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早期分治思想更详细的讨论，参见Mearsheimer and Walt，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pp.33—37。

[63] Uri Ben-Eliezer， *The Making of Israeli Militar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0.

[64] Avi Shlaim， *The Politics of Partitio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s*， *and Palestine*， *1921—1951*（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也可参见 Morris， 1948 *and After* ， p.10； Benny Morris， *The Road to Jerusalem*： *Glubb Pasha*， *Palestine and the Jews* （London： I.B.Tauris， 2002）； Ilan Pappe， *Britain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48—1951*（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88），以及 Mary C.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65] Benny Morris， “Revisiting the Palestinian Exodus of 1948，” in *The War for Palestin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 ed.Eugene L.Rogan and Avi Shlai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0.也可参见 Ben-Ami， *Scars of War* ， pp.33—34，以及Shlaim， *Iron Wall* ， p.25。

[66] Nur Masalha， *Expulsion of the Palestinians*： *The Concept of* “*Transfer*” *in Zionist Political Thought*， *1882—1948*（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92）； Morris， *Birth Revisited* ， chap.2，以及Morris， “Revisiting the Palestinian Exodus，” pp.39—48。

[67] 引自Masalha， *Expulsion of the Palestinians* ， p.128。也可参见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pp.140，142， 168—169。本-古里安的声明，引自他1942年5月在纽约巴尔的摩酒店举行的犹太复国主义特别大会之前所写的一份备忘录。

[68] 引自Michael Bar-Zohar，*Facing a Cruel Mirror*：*Israel's Moment of Truth*（New York：Scribner，1990），p.16。

[69] 引自Shavit，“Survival of the Fittest”。也可参见Benny Morris，“A New Exodus for the Middle East？” *Guardian*，October 3，2002。本-古里安在1947年12月30日对以色列总工会中央委员会说：“分配给这个犹太国家的地区内有不超过52万的犹太人和大约35万非犹太人——他们大多数为阿拉伯人。连同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这个犹太国家成立时，其总人口将会达到大约100万，其中包括近40%的非犹太人。这样的（人口）构成并未为一个犹太国家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必须毫不含糊而敏锐地看待这一（人口统计的）事实。以这样的（人口）构成，甚至不能够绝对有把握地说，控制权将掌握在占多数的犹太人手中……只要犹太人口仅仅占60%的多数，就不会有一个稳定而强大的犹太国家。引自Masalha，*Expulsion of the Palestinians*，p.176。

[70] 引自Morris，*Righteous Victims*，p.169。

[71] Morris，“Revisiting the Palestinian Exodus，” pp.43—44.

[72] 在Morris，*Birth Revisited* 和Pappe，*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的书中，提供了对这一事件的详细描述。也可参见Meron Benvenisti，*Sacred Landscape*：*The Buried History of the Holy Land Since 1948*，trans.Maxine Kaufman-Lacust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chaps.3—4，以及Masalha，*Expulsion of the Palestinians*，chap.5。莫里斯指出：“1937年之前对于人口迁移的偶然想法和1937年开始对支持这一想法的实际共识，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对1948年所发生的事情起到了作用，即这些想法决定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以及该领导层下面那些管理这个新国家民事和军事机构的官员和军官，进行后来所发生的人口迁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都是在1948年带着一种容易接受进行人口迁移和人口驱逐想法和做法的心态来到这里的，大部分原因要归因于连续不断地对阿拉伯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施行的暴力，这种暴力使中东欧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对离散犹太人的迫害显得逊色。而由于这一先决条件，人口迁移的发生得以大规模地顺利进行，因此这种人口迁移在伊休夫的任何地方几乎都没有遇到严重的反对。” Morris，“Revisiting the Palestinian Exodus，” p.48。

[73] Erskine Childers，“The Other Exodus，” *Spectator*，May 12，1961；Flapan，*Birth of Israel*，pp.81—118；Walid Khalidi，“Why Did the Palestinians Leave Revisited，”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4*，no.2（Winter 2005）；Walid Khalidi，“The Fall of Haifa，” *Middle East Forum 35*，no.10（December，1959）；Morris，*Birth Revisited*，以及Pappe，*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p.131。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为了确保巴勒斯坦人不陷于炮战之中，还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被对其进行种族清洗的犹太复国主义军队所杀害，战斗期间一些阿拉伯指挥官的确曾下令巴勒斯坦平民撤离家园。在臭名昭著的亚辛村大屠杀——1948年4月9日有100名至110名巴勒斯坦人在那里遭到谋杀——之后，对死于犹太人之手的恐惧成了他们撤离家园特别强大的动机。Morris，*Righteous Victims*，p.209.就像莫里斯所报道的那样：“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处称亚辛村大屠杀为一般的阿拉伯人大批离去的‘决定性加速因素’”。*Righteous Victims*，p.209.这种撤离家园的命令与自愿或精英引导的神话不相干。参见Ben-Ami，*Scars of War*，pp.43—44。

[74] 引自Morris，*Birth Revisited*，p.318。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反对巴勒斯坦难民回到家园的更多细节，参见Ibid.，chap.5。

[75] Baruch Kimmerling，*Zionism and Territory*：*The Socio-Territorial Dimensions of Zionist Politics*（Berkeley，CA：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83），p.143.

[76] Pappe，*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xiii.也可参见Walid Khalidi，ed.，*All That Remains*：*The Palestinian Villages Occupied and Depopulated by Israel in 1948*（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1992），该书确认被毁村庄数是418个，而非531个。数目上的差异是由于对巴勒斯坦村庄构成元素的定义有别所致。佩普和其他一些巴勒斯坦历史学界在计算村庄数量时把一些小的社区也包括在内，而卡里迪则没有将其包括在内。参见2007年5月15日本书的两位作者与伊兰·佩普之间的通信。

[77] 引自Khalidi，*All That Remains*，xxxi。

[78] 引自Nahum Goldmann，*The Jewish Paradox*，trans.Steve Cox（New York：Grosset and Dunlap，1978），p.99。

[79] 引自Ian Lustick，“To Build and to Be Built By：Israel and the Hidden Logic of the Iron Wall，” *Israel Studies 1*，no.1（Spring 1996）：200。

[80] 引自Ben-Ami，*Scars of War*，p.12。

[81] Geoffrey Aronson，*Israel*，*Palestinians*，*and the Intifada*：*Creating Facts on the West Bank*（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0）；Amnon Barzilai，“A Brief History of the Missed Opportunity，” *Ha'aretz*，June 5，2002；Amnon Barzilai，“Some Saw the Refugees as the Key to Peace，” *Ha'aretz*，June 11，2002；Moshe Behar，“The Peace Process and Israeli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1990s，”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6*，no.2（Summer—Fall 2002）；Jimmy Carter，*Palestine*：*Peace Not Apartheid*（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6）；Adam Hanieh and Catherine Cook，“A Road Map to the Oslo Cul-de-Sac，”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May 15，2003；“Israel's Interests Take Primacy：An Interview with Dore Gold，” in *bitterlemons.org*，“What Constitutes a Viable Palestinian State？” March 15，2004，edition 10；Baruch Kimmerling，*Politicide*：*The Real Legacy of Ariel Sharon*（London：Verso，2003）；Nur Masalha，*Imperial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The Politics of Expansion*（London：Pluto Press，2000）；Tanya Reinhart，*The*

Road Map to Nowhere： *Israel/Palestine Since 2003*（London： Verso， 2006）； Sara Roy，“Erasing the Optics' of Gaza，” *Daily Star* （online）， February 14， 2004，以及“36 Years， and Still Counting，” *Ha'aretz*， September 26， 2003。

[82] 引自Rashid Khalidi，*Palestinian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7。梅厄还说道：“问题并不是在巴勒斯坦似乎存在自认为是巴勒斯坦民族的巴勒斯坦民族，问题并不是我们来这里把他们赶走，并夺走了他们的国家。他们并不存在。”引用自Masalha，*Imperial Israel* ， p.47。

[83] 达扬的话引自Benny Morris，*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有关其他以色列将军的观点，参见Benny Morris，*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有关本-古里安的想法，参见Morris，*Righteous Victims* ， p.261， p.290。

[84] Morris，*Israel's Border Wars* ， p.11.

[85] 引自Hanieh and Cook，“Road Map”。也可参见Akiva Eldar，“On the Same Page， Ten Years On，” *Ha'aretz* ， November 5， 2005； David Grossman，“The Night Our Hope for Peace Died，” *Guardian* ， November 4， 2005，以及Michael Jansen，“A Practice That ‘Prevents the Emergence of a Palestinian State，'” *Jordan Times* （online）， November 10， 2005。施罗姆·本-阿米清楚地表明，不仅拉宾，而且他随后的继任者西蒙·佩雷斯都反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Scars of War* ， p.220.最后，在拉宾的总理任期（1992—1995年）中，明显多数的以色列人反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直到1997年，才有至少过半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的时候，35%的人支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Ben Meir and Shaked，“The People Speak，” pp.64—65.

[86] 希拉里·克林顿的话引自Tom Rhodes and Christopher Walker，“Congress Tells Israel to Reject Clinton's Pullout Plan，” *Times* （London）， May 8， 1998。关于白宫的反应，参见James Bennet，“Aides Disavow Mrs.Clinton on Mideast，” *New York Times* ， May 8， 1998。也可参见Robin Dorf，“News Analysis： What Motivated Hillary's Call for a Palestinian State？” *JTA.org* ， May 15， 1998；“Hillary's Folly，” *Jewish Week* editorial， May 15， 1998，以及 Brian Knowlton，“Mrs.Clinton Starts Storm by Backing ‘Palestin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May 8， 1998。

[87] “Ex-PM Shamir Objects to Palestinian State， but Still Supports Sharon，” *Ha'aretz* ， November 26， 2002； Benjamin Netanyahu，“A Limited Palestinian State，” *Washington Post* ， June 20， 2003.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沙米尔说道，以色列的边界“从约旦王国的边境一直到地中海”，他还说以色列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在以色列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参见“Yitzhak Shamir： A Lifetime of Activism，” *Middle East Quarterly 6*， no.2（June 1999）。

[88] 据报道，在2005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这一声明被广泛解释为威胁毁灭这个犹太国家及其居民的生存。对艾哈迈-迪内贾德声明的更精确翻译如下：“占领耶路撒冷的政权应该从历史中消失”（或者翻译为：“从历史中清除掉”）。艾哈迈-迪内贾德认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控制，被看作一个应该加以扭转的临时状况，就像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或伊朗的王权一样，而不是要求毁灭以色列的生存。虽然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此番话仍然具有挑衅性，并令人十分反感，但是要求在政治上分解巴勒斯坦的这个犹太国家，并不等同于要求毁灭以色列或其人口的生存。参见Ethan Bronner，“Just How Far Did They Go， Those Words Against Israel？” *New York Times* ， June 11， 2006； Jonathan Steele，“Lost in Translation，” *Guardian* ， June 14， 2006，以及“Iranian President at Tehran Conference： ‘Very Soon， This Stain of Disgrace [i.e.， Israel] Will Be Purged from the Center of the Islamic World-and This Is Attainabl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Special Dispatch Series no.1013， October 28， 2005。

[89] “Bombs，” *New Republic*editorial， August 27 & September 3， 2001； Martin Peretz，“Good Fight，” *New Republic* ， May 27， 2002，以及 Martin Peretz，“Blows to Israel Must Never Go Unanswered，” *Los Angeles Times* ， September 5， 2003。关于德肖维茨，其与此最相关的作品是*The Case for Israel* （Hoboken， NJ： John Wiley， 2003）。关于对此书的尖锐评论，参见 Norman G.Finkelstein，*Beyond Chutzpah*： *On the Misuse of Anti-Semitism and the Abuse of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也可参见Michael Desch，“The Chutzpah of Alan Dershowitz，” *American Conservative* ， December 5， 2005，以及“Dershowitz v.Desch，” *American Conservative* ， January 16， 2006。

[90] Yaakov Katz，“‘IDF the Most Moral Army in the World'，” *Jerusalem Post* ， June 11， 2006； Leslie Susser，“Israelis Question Army Morality，” *JewishJournal.com* ， December 17， 2004，以及“Cabinet Communique，” Israel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12， 2004， www.mfa，ogve.il/MFA/Government/Communiques/2004/Cabinet%20Communique%2012Dec-2004。也可参见Richard Cohen，“Truth Massacred，” *Washington Post* ， August 6， 2002，以及 Neve Gordon， Israel's Slippery Moral Slope，*In These Times* （online）， January 31， 2003。

[91] Meron Benvenisti，“The Model of the Mythological Sabra，” *Ha'aretz* ， September 12， 2002.

[92] Morris，*Righteous Victims* ， chaps.2—5.

[93] 引自Shabtai Teveth，*Ben-Gurion*： *The Burning Ground*， *1886—1948*（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7），p.544。

[94] Morris，*Birth Revisited* .许多有关1948年那些事件的以色列文件依然被指定为机密件；莫里斯预计："关于那些驱逐和暴行，随着时间的过去和更多能够获取到的以色列记录，我们期待着有另外的披露出现。"Morris，"Revisiting the Palestinian Exodus，" p.49.事实上，他坚持认为，他所知道的报道过的强奸案"只是冰山一角"。参见Shavit，"Survival of the Fittest"。

[95] 引自Pappe，*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p.69。关于本-古里安评论的背景，参见Pappe，*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pp.61—72。

[96] Morris，*Israel's Border Wars* ，p.432.也可参见Morris，*Israel's Border Wars* ，pp.126—153，178—184。

[97] Gabby Bron，"Egyptian POWs Ordered to Dig Graves，Then Shot by Israeli Army，" *Yedioth Ahronoth* ，August 17，1995；Ronal Fisher，"Mass Murder in the 1956 Sinai War，" *Ma'ariv* ，August 8，1995（这两篇文章的副本可在以下期刊上找到：*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5* ，no.3 [Spring 1996]：148—155）；Galal Bana，"Egypt：We Will Turn to the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 in the Hague If Israel Will Not Compensate Murdered Prisoners of War，" *Ha'aretz* ，July 24，2002；Zehavit Friedman，"Personal Reminiscence：Remembering Ami Kronfeld，" in Jewish Voice for Peace，*Jewish Peace News* （online），September 25，2005；Katherine M.Metres，"As Evidence Mounts，Toll of Israeli Prisoner of War Massacres Grows，"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online），February/March 1996；Roee Nahmias，"Egypt May Petition Hague over 'Murder of POWs，'" *Ynetnews.com* ，March 6，2007；Roee Nahmias，"Former Meretz Leader Decries 1967 War Crimes，" *Ynetnews.com* ，March 3，2007；Meron Rapoport，"Into the Valley of Death，" *Ha'aretz* ，February 13，2007，以及Segev，1967，pp.371—376。

[98] Avnery，"Crying Wolf？" *CounterPunch.org* ，March 15，2003；Robert Blecher，"Living on the Edge：The Threat of 'Transfer' in Israel and Palestine，" MERIP，*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 225*（Winter 2002）；Kimmerling，Politicide，p.28.也可参见 Noam Chomsky，*Fateful Triangle*：*The United States*，*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2nd ed.（Cambridge，MA：South End Press，1999），p.97；Morris，*Righteous Victims* ，pp.328—329；Tanya Reinhart，*Israel/Palestine*：*How to End the War of* 1948（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2），p.8；Tom Segev，"The Spirit of the King David Hotel，" *Ha'aretz* ，July 23，2006，以及Segev，1967，pp.400—412，523—542.莫里斯报道说，就在1967年的战争之后，虽然有12万巴勒斯坦人申请返回他们的家园，但是以色列却只允许1.7万人回来。*Righteous Victims* ，p.329.

[99] Avnery，"Crying Wolf？"；Ami Kronfeld，"Avnery on Ethnic Cleansing and a Personal Note，" in Jewish Voice for Peace，*Jewish Peace News* （online），March 17，2003，以及 Metres，"As Evidence Mounts"。

[100] Danny Rubinstein，"Roads，Fences and Outposts Maintain Control in the Territories，" *Ha'aretz* ，August 12，2003.

[101]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Events at the Refugee Camps in Beirut，" February 7，1983.这份报告一般以该委员会主席依茨哈克·卡亨（Yitzhak Kahan）的名字而被称为《卡亨委员会报告》。也可参见Morris，*Righteous Victims* ，pp.542—549，以及 Shlaim，*Iron Wall* ，pp.415—417。以色列士兵并未在萨巴拉和沙提拉难民营进行杀戮，杀戮行为是由同以色列结盟的黎巴嫩基督教民兵（长枪党人）进行的。在以色列国防军包围这两座巴勒斯坦难民营之后，沙龙"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允许长枪党人进入那……两个难民营"。黎巴嫩长枪党人和巴勒斯坦人不仅是死敌，而且长枪党人执意要报复，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刚刚被暗杀。他们肯定要屠杀巴勒斯坦人，卷入这次行动的以色列领导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一点。一旦杀戮开始，以色列士兵就立即明白大屠杀正在发生，"但却根本不加以制止"。Shlaim，*Iron Wall* ，p.416.虽然布什总统曾以"和平者"来欢呼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但关于对平民使用暴力的问题已困扰他多年。例如，在1953年，他指挥的部队袭击了约旦的凯比亚村，并杀害了69 位平民，其中2/3的人是妇女和儿童。根据本尼·莫里斯的说法："沙龙和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声称，村民们躲藏在地窖里和阁楼中，而当以色列军队炸毁这些建筑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事实上，以色列军队是挨家挨户朝窗户和门里开火的；而且约旦的法医报告说，大部分死者死于子弹和弹片，而不是死于正在倒下的建筑或爆炸。在任何情况下，由中央协调指挥向涉及的单位发出的行动命令……已明确下令'进行毁灭和最大限度的杀戮'。"*Righteous Victims* ，p.278.也可参见*Righteous Victims* ，pp.276—279，294—295，494—560；Benziman，*Sharon* ；Uzi Benziman，"The Cock's Arrogance，" *Ha'aretz* ，June 15，2003；Thomas L.Friedman，*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New York：Anchor Books，1990），chaps.6—7；Kimmerling，*Politicide*；*Ze'ev Schiff and Ehud Ya'ari*，*Israel's Lebanon War* ，trans.Ina Friedman（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4），pp.250—285，以及Shlaim，*Iron Wall* ，pp.90—92，149—150，384—423。

[102] Perry Anderson，"Scurrying Towards Bethlehem，" *New Left Review 10*（July—August 2001）：5.

[103] Morris，Righteous Victims，p.341.关于在被占领土上以色列如何对待巴勒斯坦人的详细交代，参见Amira Hass，*Reporting from Ramallah*：*An Israeli Journalist in an Occupied Land* ，ed.and trans.Rachel Leah Jones（Los Angeles：Semiotext（e），2003）。关于以色列使用酷刑，参见B'Tselem and Hamoked（Center for the Defense of the Individual），"Utterly Forbidden：The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of Palestinian Detainees，" draft report，Jerusalem，April 2007；Glenn Frankel，"Prison Tactics a Longtime Dilemma for Israel，" *Washington Post* ，June 16，2004；Ron Kampeas，"State Report Claims Israel Tortures Palestinian Detainees，" *JTA.org* ，March 8，2007；Public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in Israel，" Ticking Bombs'：

Testimonies of Torture Victims in Israel，” draft report， Jerusalem， May 2007； William F.Schulz，“An Israeli Interrogator， and a Tale of Torture，” letter to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27， 2004，以及 Aviram Zino，“Report： High Court Permits Torture of Palestinians，” *Ynetnews.com* ， May 30， 2007。以色列还被以色列人权组织贝泽雷姆指责利用巴勒斯坦儿童作为人体盾牌。参见“Israeli Soldiers Use Palestinian Minors and an Adult as Human Shields in the Operation in Nablus，” B'Tselem news release， Jerusalem， March 8， 2007。

[104] 本段落和下一段落中的数据和所引用的内容来自“The Status of Palestinian Children During the Uprising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Excerpted Summary Material， Jerusalem， January 1990， i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 no.4（Summer 1990）： 136—146。也可参见Joshua Brilliant，“Officer Tells Court Villagers Were Bound， Gagged and Beaten.‘Not Guilty’ Plea at ‘Break Bones’ Trial，” *Jerusalem Post* ， March 30， 1990； Joshua Brilliant，“‘Rabin Ordered Beatings，’ Meir Tells Military Court，” *Jerusalem Post* ， June 22， 1990； Jackson Diehl，“Rights Group Accuses Israel of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in Palestinian Uprising，” *Washington Post* ， May 17， 1990； James A.Graff，“Crippling a People： Palestinian Children and Israeli State Violence，” *Alif* 13（1993）；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 pp.586—595，以及 Ronald R.Stockton，“Intifada Death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 no.4（Summer 1990）。

[105] “Unbridled Force，” *Ha'aretz*editorial， March 16， 2003.关于其他证据，参见Jonathan Cook，“Impunity on Both Sides of the Green Line，” MERIP，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 ， November 23， 2005；“When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 *Ha'aretz*editorial， June 6， 2005；“It Can Happen Here，” *Ha'aretz*editorial， November 22， 2004； Chris McGreal，“Snipers with Children in Their Sights，” *Guardian* ， June 28， 2005； Chris McGreal，“Israel Shocked by Image of Soldiers Forcing Violinist to Play at Roadblock，” *Guardian* ， November 29， 2004； Greg Myre，“Former Israeli Soldiers Tell of Harassment of Palestinians，” *New York Times* ， June 24， 2004； Reuven Pedatzur，“The Message to the Soldiers Was Clear，” *Ha'aretz* ， December 13， 2004，以及 Conal Urquhart，“Israeli Soldiers Tell of Indiscriminate Killings by Army and a Culture of Impunity，” *Guardian* ， September 6， 2005。

[106] Reuvan Pedatzur，“More than a Million Bullets，” *Ha'aretz* ， June 29， 2004，以及Clayton E.Swisher， *The Truth About Camp David*： *The Untold Story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4）， pp.387—388。

[107] 这些数字涵盖的范围包括2000年9月29日至2005年12月31日，并且是取自以色列人权组织贝泽雷姆2006年1月4日的新闻稿。

[108] Nathan Guttman，“‘It's a Terrible Thing， Living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You Crushed Our Daughter，’” *Ha'aretz* ， April 30， 2004； Joshua Hammer，“The Death of Rachel Corrie，” *MotherJones.com* ， September/October 2003； Adam Shapiro，“Remembering Rachel Corrie，” *Nation* ， March 18， 2004，以及 Tsahar Rotem，“British Peace Activist Shot by IDF Troops in Gaza Strip，” *Ha'aretz* ， April 11， 2003。

[109] 大赦国际报告说，自2000年秋季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开始以来，“以色列当局通常没能成功地调查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所进行的非法杀戮和对巴勒斯坦人其他杀戮的指控……虽然以色列军队已经杀死了数千巴勒斯坦人，其中许多都是非法杀戮，然而却几乎没有任何此类事件得到妥善的调查，而导致肇事者被绳之以法的此类事件则更少……在极少数案件中，虽然以色列当局对杀害巴勒斯坦人进行了严肃的调查，但随之进行的起诉一般却都不成功，或施行的刑罚与犯罪的严重程度不相称”。Amnesty International，“Road to Nowhere，” December 2006，pp.27—28.

[110] 关于广泛使用不同人权团体报告来详细讨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问题，参见Finkelstein， *Beyond Chutzpah* ， chaps.4—9。

[111] 引自Molly Moore，“Ex-Security Chiefs Turn on Sharon，” *Washington Post* ， November 15， 2003；“Ex-Shin Bet Heads Warn of ‘Catastrophe’ Without Peace Deal，” *Ha'aretz* ， November 15， 2003。这些评论以以色列报纸《希伯来文报》2003年11月14日的一则采访为基础。标题为《我们严重关切以色列国命运》的采访副本，可登录全球政策论坛的网站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issues/israel-palestine/2003/1118fate.htm。

[112] 例如，以色列人权组织贝泽雷姆报告说：“（2006年）7月，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杀害了163名巴勒斯坦人，其中73人（48%）在被杀时并没有参与敌对行动。36名受害者是未成年人，20名受害者是妇女。以色列军队7月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15名巴勒斯坦人。自从2002年4月以来，7月是巴勒斯坦受害者人数最高的一个月。”参见2006年8月3日的新闻稿，www.btselem.org/english/Press Releases/20060803.sap。大赦国际报告说，从2006年6月27日以色列国防军回到加沙的日子算起，一直到2006年11月底，以色列军队“杀害了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并在加沙地带使150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包括许多没有武装的平民。被害者中约80人是儿童，并有300多名儿童受伤。在同一时期，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伙发射的火箭，在以色列南部打死打伤的以色列平民为2人和大约20人。” “Road to Nowhere，” pp.8—9.

[113] 引自Rory McCarthy，“UN Condemns Massive Human Rights Abuses in Gaza Strip，” *Guardian* ， November 21， 2006。关于以色列国防军对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所造成的痛苦的描述，参见Amnesty International，“Road to Nowhere，” pp.7—13； Gideon Levy，“Gaza's Darkness，” *Ha'aretz* ， September 3，2006，以及OCHA，“The Humanitarian Monitor”。

[114] 引自Bill Maxwell，“U.S.Should Reconsider Aid to Israel，” *St.Petersburg Times* （online）， December 16， 2001。也可参见Ron Pundak，“From Oslo to Taba： What Went Wrong？” *Survival 43*， no.3（Autumn

2001）：37。

[115] 事实上，如果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失败，并且一些阿拉伯统治者将其人口稳定在巴勒斯坦人所能接受的相同条件下，以色列人几乎肯定会用恐怖主义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一些散居的犹太人肯定会被动员起来去帮助他们，正如爱尔兰美国人和海外泰米尔人都支持他们祖先的家园的恐怖团体一样。

[116] Morris，*Righteous Victims*，p.147，p.201.也可参见Lenni Brenner，*The Iron Wall*：*Zionist Revisionism from Jabotinsky to Shamir*（London：Zed Books，1984），p.100，以及 Yehoshua Porath，*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From Riots to Rebellion*，Vol.2，1929—1939（London：Frank Cass，1977），p.238.莫里斯指出，在1948年的战争期间，主要的犹太恐怖主义团体"狡黠地在公交车站安置炸弹，其目的是杀害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和儿童"。*Birth Revisited*，p.80.

[117] J.Bowyer Bell，*Terror Out of Zion*：*The Fight for Israeli Independence 1929—1949*（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6），pp.103—253；Johann Hari，"Israel Should Remember Its Own Terrorist' Origins，" *Independent*，July 24，2006；Joseph Heller，*The Stern Gang*：*Ideology*，*Politics and Terror*，*1940—1949*（Portland，OR：Frank Cass，1995）；Bruce Hoffmann，*The Failure of British Military Strategy Within Palestine*，*1939—1947*（Israel：Bar-Ilan University，1983）；Morris，*Righteous Victims*，pp.173—180，以及Tom Segev，*One Palestine*，*Complete*：*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trans.Haim Watzman（New York：Henry Holt，2000），chap.22。根据海姆·利文伯格（Haim Levenberg）的说法，犹太恐怖主义1946年期间在巴勒斯坦导致了210名至429名平民的伤亡，其他219名伤亡者是警察和士兵。参见Levenberg，*Military Preparations*，p.72.

[118] Bell，*Terror Out of Zion*，pp.336—340.

[119] 引自Chomsky，*Fateful Triangle*，pp.485—486，以及 Bell，*Terror Out of Zion*，p.340。关于沙米尔，参见Avishai Margalit，"The Violent Life of Yitzhak Shami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y 14，1992。沙米尔还说，他"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是，"在我们的努力下，当我们能够充分团结一切地下团体来争取以色列解放的时候"。参见"Shamir：Lifetime of Activism"。

[120] Barzilai，"Brief History."

[121] "Palestinian Authority，" *New Republic*editorial，February 18，2002，p.7.

[122] 所谓的"克林顿参数"，其要点包括：（1）在领土问题上，巴勒斯坦人将得到加沙的100%、约旦河西岸的97%，以及从加沙到约旦河西岸的安全通道，这样可以使他们的国家正常生存。这里的97%涉及的是领土交换，剩余的3%他们将从以色列一边获得，这样以色列就将保留那些定居点，而他们可以将难民安置到从以色列获得的土地上。（2）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犹太区归以色列，阿拉伯区归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将对圣殿山和阿克萨清真寺拥有完全主权。（3）在难民问题上，难民将回到历史上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将维持其决定是否接收的主权。也就是说，以色列将吸收部分难民，但还要有限制，双方将就此限制进一步协商。但大部分难民将被允许回到巴勒斯坦。——译者注

[123] 对戴维营以及随后6个月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最客观描述的作品包括Charles Enderlin，*Shattered Dreams*：*The Failure of the Peace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1995—2002*，trans.Susan Fairfield（New York：Other Press，2003）；Jeremy Pressman，"Visions in Collision：What Happened at Camp David and Tab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no.2（Fall 2003）；Pundak，"From Oslo to Taba"；Jerome Slater，"What Went Wrong？The Collapse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Proces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6*，no.2（July 2001）；Deborah Sontag，"Quest for Mideast Peace：How and Why It Failed，" *New York Times*，July 26，2001，以及Swisher，*Truth About Camp David*。

[124] 本段落以及下一段落中的数字取自Pressman，"Visions in Collision，" pp.16—18。由于巴拉克的提议还包括西岸地区之外1%的土地交换，因此一些评论家将他的提议描述为巴勒斯坦人对西岸地区92%而非91%的控制。

[125] 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条约中，原来分配给英国的领土包括约旦河西岸和东岸。但英国1922年在东岸地区成立了外约旦（后来成为约旦）。此后，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托管地包括构成今天以色列、加沙地带和西岸地区的领土。当我们指巴勒斯坦托管地的时候，我们所意指的是1922年之后的领土，其中以色列占78%，被占领土占22%。

[126] 在对埃胡德·巴拉克有关戴维营所发生的事情的一次冗长采访进行描述的时候，本尼·莫里斯写道："巴拉克说，但在西岸地区，除了从耶路撒冷通过马阿里·阿杜米姆定居点到约旦河狭长的以色列楔形地带外，巴勒斯坦人被许诺拥有一片相连贯的主权领土。" Benny Morris，"Camp David and After：An Exchange（1.An Interview with Ehud Bara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une 13，2002，p.44.也可参见一下作品中的地图Pundak，"From Oslo to Taba，" p.46。关于巴勒斯坦版本地图的样子，参见Orient House（Jerusalem），"Israel's Concessions，" *Le Monde Diplomatique*，December 2000，以及标题为"Palestinian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Final Proposal at Camp David，" in Dennis Ross，*The Missing Peace*：*The Inside Story of the Fight for Middle East Peac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4）。与巴拉克和巴勒斯坦人的说法相反，罗斯认为，戴维营的最终地图给予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地区对一块相连贯领土的控制权。 参见"Map Reflecting Actual Proposal at Camp David"，Ibid.然而，罗斯的说法似乎并不是真实的，因为甚至连巴拉克都承认，以色列对连接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谷道路的控制，将使西岸地区一分为二。只要以色列控制那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河谷，那么它需要到达那里的话就至少

要有一条防护良好的连接道路。虽然巴拉克所设想的是一条从耶路撒冷向东的连接道路，但巴勒斯坦人所设想的显然是另一条从阿里埃勒定居点向东延伸到约旦河谷的连接道路。人们可能认为，当以色列人交出约旦河谷的时候，他们最终将放弃那些连接道路。然而，就像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并不存在以色列人将永远离开约旦河谷的保证；而即便他们曾经离开过约旦河谷，也不存在他们将放弃那些连接道路的保证。关于戴维营最终地图究竟为何持续混乱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因为从来就没有画出过正式的地图，而且“在巴拉克的坚持下，任何书面记录都不被保存下来”。Jerome Slater，“The Missing Pieces in the Missing Peace，” *Tikkun.org* ，May/June 2005.

[127] Pressman，“Visions in Collision，” p.18.

[128] Enderlin，*Shattered Dreams* ，pp.243—251；Slater，“What Went Wrong？”，以及Sontag，“Quest for Mideast Peace”。

[129] 引自“Norman Finkelstein & Former Israeli Foreign Minister Shlomo Ben-Ami Debate：Complete Transcript，” *Democracy Now*！ radio and TV broadcast，February 14，2006。

[130] 也不存在任何有关阿拉法特发动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的证据。参见Morris，*Righteous Victims* ，p.561。莫里斯写道：“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的主要活力，是加沙地带65万居民、西岸地区 90万居民，以及东耶路撒冷13万居民的民族愿望所遭受的挫折，因为这些人希望生活在一个巴勒斯坦国，而不是作为外国军队残酷统治下、不拥有自己国家的居民。” Ibid.，p.562.

[131] Enderlin，*Shattered Dreams* ，pp.284—285.

[132] 引自Jeremy Pressman，“The Second Intifada：Background and Cause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22*，no.2（Fall 2003）：116。也可参见Yezid Sayigh，“Arafat and the Anatomy of a Revolt，” *Survival 43*，no.3（Autumn 2001）；Henry Siegman，“Partners for Wa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16，2003，p.24；Henry Siegman，“Sharon and the Future of Palestin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2，2004，p.12，以及 Slater，“Missing Pieces”。

[133] Sharm El-Sheikh Fact-Finding Committee，*Final Report* ，April 30，2001，p.7.

[134] Ibid.，p.5.

[135] Ian S.Lustick，“Through Blood and Fire Shall Peace Arise，” *Tikkun.org* ，May/June 2002；Pressman，“The Second Intifada”；Mouin Rabbani，“A Smorgasbord of Failure：Oslo and the Al-Aqsa Intifada，” in *The New Intifada*：*Resisting Israel's Apartheid* ，ed.Roane Carey（London：Verso，2001），pp.69—89；Sara Roy，“Why Peace Failed：An Oslo Autopsy，” *Current History 101*，no.651（January 2002），以及Sara Roy，“Ending the Palestinian Economy，” *Middle East Policy 9*，no.4（December 2002）.

[136] Ben-Ami，*Scars of War* ，p.264.

[137] Roy，“Why Peace Failed，” p.9.

[138] Ron Dudai，“Trigger Happy：Unjustified Shooting and Violation of the Open-Fire Regulations During the al-Aqsa Intifada，” B'Tselem draft report，March 2002.

[139] Yasser Arafat，“The Palestinian Vision of Peac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2002；Yasser Arafat，text of press conference，Geneva，December 14，1988，i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8*，no.3（Spring 1989）：180—181；“Palestinians Affirm Israel's Right to Exist，” *CNN.com* ，December 14，1998；Pressman，“Visions in Collision，” pp.24—27；Yezid Sayigh，*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1949—1993*（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以及Jerome M.Segal，*Creating the Palestinian State*：*A Strategy for Peace* （Chicago：Lawrence Hill Books，1989），chap.1.有人可能认为，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权利的承诺，表明他依然在致力于摧毁以色列。但阿拉法特的确承认，以色列领导人绝对不会同意一项大量巴勒斯坦人回到以色列的和平决议。然而，与此同时，对阿拉法特来说，他却有充分的理由不在谈判开始之前就软化自己在巴勒斯坦人回归权问题上的立场，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这个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巴勒斯坦领导人（包括去世之前的阿拉法特）承认，为了达成最终协议，他们将不得不在此重要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参见Akiva Eldar and David Landau，“Arafat：Israel Is Jewish；Won't Cite Figure on Refugees，” *Ha'aretz* ，June 18，2004；Associated Press，“PA Minister Sha'ath：Palestinian Right of Return Is Negotiable，” *Ha'aretz* ，August 20，2003；Pressman，“Visions in Collision，” pp.28—33，以及M.J.Rosenberg，“Intractable Issue？” Weekly Opinion Column，Issue #144，Israel Policy Forum，Washington，DC，July 18，2003。

[140] Akiva Eldar，“Popular Misconceptions，” *Ha'aretz* ，June 11，2004；Akiva Eldar，“While They Were Sleeping，” *Ha'aretz* ，September 17，2001；Danny Rubenstein，“The Stronger Side Creates Reality，” *Ha'aretz* ，June 16，2004，以及 Emmanuel Sivan，“What the General Is Allowed，” *Ha'aretz* ，June 14，2004。

[141] Pressman，“Visions in Collision，” p.25.

[142] “Official Palestinian Response to the Clinton Parameters（and letter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January 1，2001，www.robat.scl.net/content/NAD/negotiations/clinton parameters/ param2.php.

[143] 2001年1月3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新闻处发表的“Excerpts： White House Spokesman on Clinton-Arafat Talks”； 2001年1月8日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的副本“Clinton Speech on Mideast Peace Parameters（January 7， 2001）”，以及 Enderlin， *Shattered Dreams* ， p.344。也可参见 Akiva Eldar，“The Battle for Public Opinion，” *Ha'aretz* ， June 24， 2002， 以及Pressman，“Visions in Collision，” p.20，两者都明确表明，以色列对克林顿参数持严重的保留态度。

[144] Sontag，“Quest for Mideast Peace”，以及Enderlin， *Shattered Dreams* ， pp.349—350。

[145] Jeff Jacoby，“America Takes Side of Israel，” *Boston Globe* ， March 26， 2006.布洛克的话引自Tony Czuczka，“Under Fire， Israel Lobby Rallies US Backers，” *EUX.TV*： *The Europe Channel* （online）， March 10， 2007。也可参见 Mart， *Eye on Israel* ，以及Martin Peretz，“Oil and Vinegar： Surveying the Israel Lobby，” *New Republic* ， April 10， 2006。

[146] 据历史学家米歇尔·马特（Michelle Mart）的观点，在冷战时期，“以色列人变得‘美国化’了”，而这种转变主要是出于“犹太-基督教一体”的意识。“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the US/Israel Alliance，” *Tikkun.org* ， November 11， 2006.

[147] Jodie T.Allen and Alec Tyson，“The U.S.Public's Pro-Israel History，” 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19， 2006；“Americans' Support for Israel Unchanged by Recent Hostilities，” Pew Research Center press release， July 26， 2006，以及 Robert Ruby，“A Six-Day War： Its Aftermath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30， 2007。

[148] Allen and Tyson，“The U.S.Public's Pro-Israel History”；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2005：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ttitudes of American Opinion Leader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About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vember 2005， pp.11—12.

[149]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Criticism of Israel in Aftermath of Sept.11 Attacks，” Anti-Defamation League press release， November 1， 2001.

[150] Steven Kull（principal investigator），“Americans on the Middle East Road Map”（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ay 30， 2003）， pp.9—11， 18—19.

[151] 马提拉通讯集团（Marttila Communications Group）于2005年3月18日至25日、6月19日至23日为反诽谤联盟进行的调查，“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Israel and the Middle East”。

[152] Andrew Kohut，“American Views of the Mideast Conflict，” *New York Times* ， May 14， 2002.

[153] 关于以色列对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责任，参见2006年8月3日至6日由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华盛顿邮报》进行的民意调查，以及2006年7月21日至25日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纽约时报》进行的民意调查，这两项民意调查都能够在以下文献中找到“Israel， the Palestinians，” *Polling Report.com* .关于美国没有偏袒任何一方的问题，参见《今日美国报》和盖洛普共同进行的民意调查，Ibid，以及2006年8月11日至15日由左格比进行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的描述参见“Zogby Poll： U.S.Should Be Neutral in Lebanon War，” Zogby International press release， August 17， 2006。

第四章 何为“以色列游说集团”？

在美国，利益集团一以贯之地塑造着美国的国家利益观，说服立法人员和总统采纳它们所偏好的政策。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的第10篇中对竞争性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称许众所周知，而且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力长期塑就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包括对战争的决定。

当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特别强大，或者在政治上精通老练的时候，它就可能以在总体上对国家不利的方式影响美国的政策。保护某个特定行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关税将使得某些公司获益，但是为那一行业的物品支付更多的消费者却不会从中获益。美国枪支协会成功地阻碍枪支控制的立法，毫无疑问使枪支生产商和交易商获益，但是却使得美国社会的其他人面对与枪支相关的暴力时更加脆弱。当美国石油研究所的一位前说客成为白宫的环境质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并且利用这一职务来淡化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变暖之间关联的报告时，人们有理由担心，石油业正以伤害我们大家的方式保护着它自己的利益。[1]

就像能源利益集团对环境规范的影响，或医药公司在塑造处方药政策时需要受到审查一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应如此。我们相信，构成这一游说集团的公司和个人的活动，是美国在中东追求的政策几乎没有什么战略基础和道德基础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是利益集团费尽心思，那么通常为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提出的战略和道德理由，就会更加频繁地受到质疑，而美国的中东政策也会与今天的大不一样。亲以色列的力量当然相信，他们正推动的政策同时符合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利益。我们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所推动的大多数政策都不符合美国或以色列的利益，而如果美国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那么对美以两国都会更好。

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是质疑以色列生存的权利，因为那一权利无疑是合理的，并且现在得到了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支持。我们所质疑的——也需要解释的，乃是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幅度和这种支持基本上是无条件的本质——就像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以及美国执行中东政策时心中所虑及的以色列福利的程度——就像在第二部分中将要详细研究的那样。作为完成这一任务的开端，这一章要弄清楚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核心组成部分，描述它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也要讨论它为什么变得如此具有影响力，特别是在将它与像“阿拉伯游说集团”和“石油游说集团”那样的潜

在竞争对手进行比较的时候。接下来的几章描述不同的战略，这些战略使以色列游说集团成为如此强大的利益集团，并在美国的中东政策制定中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定义游说集团

我们以“以色列游说集团”作为一个速记式的便捷术语，来指那些通过积极活动塑造美国亲以方向外交政策的个人和组织所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然而，这一游说集团并不是一场由中央领导的单一统一运动，而且组成这一宽泛联盟的个人和团体有时候在具体政策议题上意见不一。它也不是一个阴谋集团或阴谋诡计。相反，组成这一游说集团的组织和个人，以与其他利益集团同样的方式进行公开运作。

使用“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一术语本身具有一些误导性，因为这一松散联盟中的许多个人和某些团体，并未涉及正式的游说活动——直接力劝当选官员。相反，这一游说集团的各种不同组成部分，以各种不同方式的活动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完全就像其他的利益集团所做的那样。人们给它起上一个“亲以共同体”，甚或“帮助以色列运动”的名号可能会更加准确，因为不同团体所从事的活动超越了简单的游说活动范围。然而，由于这些主要团体中的许多团体确实进行了游说，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一术语，同“农场游说集团”、“保险游说集团”、“枪支游说集团”，或者其他的族裔游说集团那样的标签一道，都是通俗的用法，因此我们在此选用了这一术语。[2]

就像其他的特殊利益集团一样，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界限也不能够准确地辨别清楚，总是存在一些介乎两者之间的个人或组织，因而难以分清其立场。[3]要分清楚显而易见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组成部分的团体以及作为其核心成员的个人是容易的。前者如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 ZOA），后者如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执行副主席马尔科姆·霍恩莱因（Malcolm Hoenlein）。也有许多团体和个人明显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组成部分，并显然应该从中被排除，前者如阿拉伯裔美国人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rab-Americans），后者如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拉希德·卡里迪（Rashid Khalidi）。然而，总是存在这样的一些团体和个人，他们的立场更加模糊不清。就像其他的社会政治运动一样，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界限也有点模糊不清。

这种情形所凸显的，乃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并非一个有着规定成员的集权化等级组织。该游说集团没有会员卡或入会仪式。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核心包括这些组织——他们公开宣称的目标就是要鼓励美国政府和美国公众向以色列提供物资支持，并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以

及有影响力的个人——上述那些组织的目标也是他们最为优先考虑的。然而，以色列游说集团也吸引那些半边缘团体和个人的支持，虽然他们正致力于以色列这个国家，要求美国政府继续支持它，但是他们的活跃程度却不像组成以色列游说集团核心的那些团体和个人那样精力充沛，一以贯之。因此，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名游说人员、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或者像反诽谤联盟和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合会（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 CUFI）的那些领导人，他们都是该游说集团的核心组成者；而那些偶尔给本地报纸写信支持以色列，或者将支票寄给亲以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个人，则应该被看作该游说集团更广泛的支持者网络中的组成部分。

这一定义并不意味着对以色列持赞成态度的每个美国人都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成员。以个人为例，本书的两位作者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亲以的”——即我们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利，称赞它所取得的许多成就，希望它的公民生活安全和繁荣兴旺，相信如果它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时美国应该来援助以色列。但是我们显然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组成部分。这一定义也不意味着每个支持以色列的官员都是该游说集团的组成部分。一位一直投票支持援助以色列的参议员，不一定就是该游说集团的组成部分，因为他或者她可以仅仅只是对来自亲以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作出反应而已。

换言之，如果某人要成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组成部分，就必须积极地活动来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朝亲以方向前进。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这一追求必须是其使命的重要部分，耗去其资源的相当比例并占据其议事日程的相当部分。对于一个个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将其一部分的职业生活或个人生活——或在有些情况下还要花费相当的钱财——致力于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当新闻记者或学者有时候涉及中东问题或偶尔报道那些对以色列持赞成态度的事件时，他们不应该被看作该游说集团的组成部分，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戴维·桑格（David Sanger）和杜克大学的布鲁斯·简特森（Bruce Jentleson）教授。但是一位可以预知其会站在以色列一边，将其相当的写作用来捍卫美国对以色列坚定支持的新闻记者或学者，则显然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成员，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或前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

当然，在每个例子中，各种不同的团体和个人所作出的努力程度和具体活动都会不同，而且他们并不会在每个影响到以色列的议题上都意见一致。有些个人——如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莫顿·克莱因（Morton Klein）、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合会的约翰·哈吉（John Hagee）以及“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的雷尔·琼·艾萨克（Rael

Jean Isaac）——反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两个国家解决方案，但却反过来相信以色列应该保留全部或大部分的被占领土。像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丹尼斯·罗斯和布鲁金斯协会的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这些人，则赞成经由谈判来解决问题，并偶尔对以色列的具体行为进行批评。然而，尽管他们之间有这些不同之处，但是他们每个人都相信，即使当以色列采取美国所反对的行动时，美国也应该给予以色列大量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将大量的职业生活致力于鼓励美国的这种支持。因此，虽然认为这个游说集团是一个志同道合的整体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更不用说把它描绘为一个阴谋集团或者阴谋诡计，但是将任何一个通过积极活动来维持美国与这个犹太国家特殊关系的人排除在这一游说集团之外的做法，也同样是错误的。

美国犹太人的角色

这个游说集团的主体是由美国犹太人组成的，他们深深地致力于要确保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推进他们所认为的以色列的利益。根据历史学家梅尔文·I.尤罗夫斯基（Melvin I.Urofsky）的说法："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族裔曾如此广泛地卷入到一个外国的事务之中。"斯蒂文·T.罗森塔尔（Steven T.Rosenthal）同意此说，他写道："自从1967年以来……没有任何别的国家的公民，曾经像美国犹太人致力于以色列的成功那样，致力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成功。"[4]1981年，政治学家罗伯特·H.特赖斯（Robert H.Trice）将亲以色列游说集团描述为"由至少75个分开的不同组织——大部分是犹太人组织——所组成的团体，他们积极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大部分行动和政策立场"[5]。这些团体和个人的活动不仅仅只是投票支持亲以色列的候选人，它们还包括写信给政治家或新闻组织，向亲以色列的政治候选人进行经济捐赠，积极支持一个或多个亲以色列的组织——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经常直接与这些团体或个人接触，传达他们的议事日程。

然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是美国犹太人的同义词，而"犹太人游说集团"也不是用来描述那些积极推动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不同个人和团体的恰当术语。首先，美国犹太人在致力于以色列的程度深浅上有着重大的差别。事实上，他们中大约有1/3的人不将以色列看作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例如，在2004年，一项备受关注的调查发现，36%的犹太裔美国人"不是非常"，或者"不是全部"在感情上同以色列联系在一起。[6]进而言之，许多非常关心以色列的犹太裔美国人不支持控制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那些组织所支持的政策，就像许多枪支拥有者并不支持美国枪支协会所倡导的每项政策，并非所有的退休人员

都赞成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所支持的每一立场一样。例如，相对于整体的美国人，美国犹太人对伊拉克战争的热情更低，即便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核心组织支持这一战争。如今他们更加反对这一战争。最后，有些代表以色列发出特别呼声的个人和团体并不是犹太人组织，例如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因此，虽然犹太人是这一游说集团的主要组成者，但是将这一松散的联盟称为以色列游说集团则更加准确。界定这一游说集团的是具体的政治议程，而不是宗教议程或那些推动这一游说集团的族裔身份。

就像在本书的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美国犹太人感到同以色列的联系并不难理解，这与那些生活在异乡的其他族裔团体，同与自己有着类似背景的其他国家或民族维持亲密关系相类似。[7]虽然许多美国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早年对其怀有矛盾的心理，但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施加的恐怖行为广为人知之后，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大大增加了。[8]

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相对而言只有少数犹太人选择离开美国移居以色列，戴维·本-古里安总理和其他的以色列领导人已经开始对这种模式进行了批评。然而，对以色列的强烈承诺不久就成为了许多美国犹太人重要的认同因素。[9]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本身似乎就是很神奇的，特别是在纳粹的大屠杀之后。以色列“使沙漠发展繁盛”的成就显然是其自豪的根源，而同以色列的密切认同，则为正在迅速同化于美国社会并同时正日益世俗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共同体基础。就像罗森塔尔所指出的那样：

通过把一个人的犹太性集中在离家8000英里之遥的一个世俗国家身上，将以色列等同于犹太教因而是一种避免宗教障碍的令人鼓舞的方法……作为战后美国犹太人新生活支柱的犹太教会堂，成了以以色列为中心的场所。一个新的犹太专业人士阶级……在郊区出现。他们即刻发现，以色列是抗衡他们中日益增加的宗教冷漠的最有效手段。主要是为了回应以色列对财政和政治的压倒性支持的需求，新的机构……出现了，而资金募集和游说则日益界定着美国犹太人同以色列的关系。[10]

美国犹太人建立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公民组织，这些组织的议程包括通过其活动使以色列受益，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而做到这一点的。这些主要的组织包括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大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犹太教改革宗教行动中心、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美国利库德之友、梅尔卡兹-美国组织[11]（Mercaz-USA）、哈达萨组织[12]（Hadassah），以及许多其他

组织。事实上，社会学家蔡姆·I.瓦克西曼（Chaim I.Waxman）在1992年报告说，《美国犹太人年鉴》列出了80多个全国性的犹太组织，“它们专注于犹太复国主义和亲以色列的活动……而对于其他许多组织来说，像‘推进以色列福利’、‘支持以色列国’、‘增进对以色列的了解’这样的目标和活动，出现的频率给人印象深刻”[13]。51个最大且最重要的组织一起组成了“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其自己描述的使命包括“将各种各样的不同团体打造成一股为以色列谋福利的力量”，并从事“增强和促进特殊的美以关系”活动。[14]

该游说集团也包括了像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中东论坛以及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这样的智库，还包括在大学和其他研究组织中工作的个人。数十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准备为亲以色列的政治候选人，或者那些其对手肯定不会充分支持以色列或敌视以色列的候选人募集钱款。追踪竞选捐赠的非党派团体“政治反应中心”确定了大约36个这样的“亲以”政治行动委员会，它们中许多是“秘密行动的政治行动委员会”（stealth PACs），因为其名称并未显示出亲以的倾向；该中心还报告说，这些组织在200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期间，向国会候选人捐赠了大约300万美元。[15]

在这些包括以外交政策作为其核心议程的各种犹太人组织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显然是最重要也是最为著名的一个。1997年，当《财富》杂志要求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列举出在华盛顿最强大的游说集团的时候，虽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排名仅次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但是却位列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和美国全国枪支协会那样的重量级游说集团之前。[16]《国民月刊》（*National Journal*）2005年3月的一项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为在华盛顿的“力量排名”（muscle rankings）中，它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放在了第二位——位次紧靠着美国退休人员协会。[17]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前民主党国会议员默文·迪马利（Mervyn Dymally）有一次曾经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称之为“在国会中毫无疑问最有影响的游说集团”；而在国会效力达34年之久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主席李·汉密尔顿则在1991年说：“没有哪个游说集团能够与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匹敌……他们（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是独一无二的。”[18]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现在所享有的影响力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早年期间，而且即使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后，代表以色列进行游说总是在幕后静悄悄地进行，通常依靠的是个人与具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特别是总统，以及少数犹太领袖、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顾问，或者犹太朋友之间的接触。例如，1917年伍

德罗·威尔逊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部分要归因于他的犹太朋友、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和拉比·斯蒂芬·怀斯（Rabbi Stephen Wise）的影响。类似地，哈里·S.杜鲁门支持以色列建国并承认这个新的国家的决定，也是受到来自犹太朋友和顾问代为求情的影响——虽然不是由此决定——所致。[19]

以色列支持者保持低调的倾向，反映了对在美国挥之不去的反犹主义的关注，以及担心公开代表以色列进行游说将使美国犹太人面临双重忠诚的指控。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本身明显具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源：它的创始人I.L.“Si”凯南（I.L.“Si” Kenen）在1951年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负责人，该委员会是一个注册为外国游说团体的组织。1953年至1954年，凯南承认它是一个美国的游说组织——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公共事务委员会；1959年，这一新的组织更名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凯南依赖的是与主要立法人员的个人接触，而非公开竞选或群众动员，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则在总体上遵循“凯南规则”来促进以色列的事业。“凯南规则”的第一条规则是：“隐身立法之后，而非跳到立法之前——也就是说要保持低调。”[20]

按照犹太人周报《前沿》编辑J.J.戈德堡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力之所以“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期间呈指数级增加，不仅是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富裕度和影响力都增加了”，而且还因为肯尼迪和约翰逊“在他们的亲密顾问、捐赠人和私人朋友中有许多的犹太人”[21]。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时候依然是个小规模运作、工作人员和预算有限的组织；而且正如斯图亚特·埃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所指出的那样：“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代表以色列的有组织的公开性犹太人政治活动还没有盛行起来。”[22]

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规模、财富和影响力都有了实质性的增加。根据埃森斯塔特的说法，那场冲突“对美国犹太公众的刺激，不像以色列独立以来的任何其他一个事件……自豪、强大、能够保卫自己的‘新犹太人’自豪感，对美国犹太人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力”。成功地反击反犹主义，加上人们普遍意识到的纳粹大屠杀恐怖行为，有助于消除挥之不去的歧视性障碍，而犹太裔美国人则“没有了那种早年阻碍其政治意志的恐惧了”。而且由于在一个同化日益活跃和普遍的世界里，以色列正成为犹太人身份的中心焦点，因此几乎就不存在什么理由不在政治上表达这种联系。[23]

在1969年至1970年的消耗战（War of Attrition）和1973年的十月战争期间，犹太人组织内部这种对以色列福祉关注的加深在继续。虽然这些冲突提高了以色列军队的士气，但是也提出了对以色列安全

担心的问题，因而强化了许多犹太人社会关系团体以以色列为中心的关注。[24]犹太人全国社会关系顾问委员会（National 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Advisory Council ， NJCRAC）——后更名为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阿尔伯特·切尔宁（Albert Chernin）在1978年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在当时说道，我们“首要的优先关注当然是以色列，因为它反映了美国犹太人领袖完全认同草根阶层所关心的问题”。历史学家杰克·沃特海默（Jack Wertheimer）称这一评论是“令人震惊地承认了支持以色列的政治努力，已经取代了美国犹太人社会关系组织所关心的所有其他问题”[25]。

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外援开始超过私人捐赠，所以亲以组织日益集中在那些试图维持或增加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支持的政治活动上。按照韦塞莫尔的说法：“为以色列进行游说的总体责任由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来承担。这两个组织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而且在1967年之前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对以色列政治支持的需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将这两个组织猛力推上了引人注目的位置。”[26]

这种努力的加大反映了这样的认识，即支持以色列对美国来说是代价高昂的，因此就必须在政治领域使之合理化并捍卫之。就像在1975年取代凯南担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的莫里斯·阿米塔伊（Morris Amitay）所表达的那样：“如果你要帮助以色列的话，那么游戏的名字就是政治行动。”[27]在阿米塔伊和他的继任者汤姆·戴恩（Tom Dine）的领导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由一个低预算的私人活动组织，转变成了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大型组织——其工作人员超过150位雇员，单单源于私人捐赠的年度预算就由1973年的大约30万美元增加到今天的大约4000万至6000万美元。[28]在凯南的领导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做法并不是避开镁光灯的关注，相反，它却在不断努力地张扬自己的权力。根据该组织的一位前工作人员的说法：“其理论是，如果不了解你，就没有人怕你。”[29]与早期由代表犹太人的顾问和对犹太人怀有同情的非犹太人私人游说模式相反，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团体，并不将他们的公共议程限定为对以色列犹太人的人道主义支持。相反，该游说集团的演化却日益涉及塑造和推广那些有关美以战略利益和道德价值进行结盟合作的复杂观点。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金钱充足，在冷战的政治背景中处于有利位置。由于新的联邦竞选资金规则引发政治行动委员会成立，使得金钱更容易流向亲以候选人，因此它发现自己的政治力量加强了。沃伦·巴斯（Warren Bass）注意到，虽然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色列公

共事务委员会可能还不那么可怕，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已俨然“华盛顿的权力之源”。[30]

多样性中的一致性和反对异见者的准则

就像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是一场权力集中的等级化运动。即使是在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犹太分子之间，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在近些年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已经向以色列的利库德集团以及其他的强硬派政党倾斜，怀疑奥斯陆和平进程——我们在下面将花更长的篇幅来讨论这一现象，而其他许多更小的团体——如阿梅纽组织[31]（Ameinu）、“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布里特·泽德克和舍拉姆（即犹太人正义和平联盟）、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犹太人和平之音（Jewish Voice for Peace，JVP）、梅尔卡兹-美国组织，以及恢复和谐社会（Tikkun[32] Community）——则强烈支持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并相信以色列需要作出重大让步来实现这一方案。[33]

这些差别偶尔会导致这些组织内部或这些组织之间的不和。例如在2006年，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犹太人和平之音、布里特·泽德克和舍拉姆就公开反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所发起的国会决议——众议院4681号，该决议将对给予巴勒斯坦人的援助施加比以色列政府所寻求的更为严苛的限制。[34]虽然被打了折扣的这一决议的版本以相当不错的优势获得通过，但是这一事件却提醒我们，亲以团体并没有形成具有单一政党路线的整体。

虽然存在这些分歧，但是美国犹太人社会中那些有组织的团体中的多数——尤其是它们中那些最大、最富有的团体，则继续赞成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无论这个犹太国家追求什么样的政策。就像在2000年6月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所解释的那样，当有关以色列向中国销售武器的关注导致减少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呼吁时，“我们反对在任何情形下将对以色列的援助与此相联系，因为一旦开了头就不会再停下来”[35]。即使是属于鸽派的“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也支持“美国对以色列坚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反对“削减或附加条件”的呼吁，只是寻求防止美国的援助用于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36]类似地，立场温和的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不是主张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要附加更多的条件，而是集中努力来说服美国政府更积极有效地做好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工作。[37]简而言之，尽管在和平进程和相关议题上存有分歧，但是几乎每个亲以团体都保持这一“特殊关系”完好无损。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犹太人和平之音，该组织呼吁美国政府取消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直到以色列结束在西岸

地区、加沙地带以及东耶路撒冷的占领为止。[38]事实上，考虑到它的这一立场，人们可能会认为犹太人和平之因根本就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考虑到他们要使美国支持最大化的欲望，以色列官员经常与美国犹太领袖接触，并请求他们在美国帮助动员对以色列具体政策的支持。就像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前主席拉比·亚历山大·辛德勒（Rabbi Alexander Schindler）在1976年告诉一家以色列杂志的那样："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已经成了以色列政府官方政策的工具。接受以色列政府圈子的指令，并无论如何地尽力来影响犹太人社会，被看作我们的任务"。辛德勒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他告诉访问者说："美国犹太人不想被任何人利用"[39]。然而，犹太人全国社会关系顾问委员会的阿尔伯特·切尔宁在20世纪70年代给出了类似的评价，他说道："我们在国内领域制定政策，但是在以色列事务中政策则是给定的……实际上，（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是一个以色列将其政策传达给犹太人社会的管道。"[40]犹太人周报《前沿》的奥瑞·尼尔（Ori Nir）在2005年引用一个主要犹太人组织中一位不具名的活动家的观点说："我们总是按常规说，'这是我们在某个问题上的政策，但是我们必须核实一下以色列人是怎么想的。'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一直做这件事情。"或者就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高层官员海曼·布克班德曾经承认的那样："如果不是正受到实在关键和根本性的可怕压力，你就是以色列路线的传声筒，目的是维持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作为美国犹太人，我们不会到处去说以色列的有关政策是错误的。"[41]

以色列在美国国内激励对自己支持的能力，已经在无数的事例中得到了体现。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官员鼓励美国的犹太领袖争取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方案和美国1948年对以色列的承认，游说反对由联合国协调员福克·伯纳多特于1948年设计的那个流产了的和平计划。像这样的协同努力，也有助于说服杜鲁门政府在1952年大量增加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放弃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一项赠予埃及的1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42]在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危机期间，以色列政府指令它的华盛顿大使"创造一种构成对（约翰逊）政府压力的公众氛围……但是不要太明显地露出我们是这场公众运动背后操纵者的痕迹"。这种努力涉及让对以色列怀有同情的美国人写信、发表社论、发电报、发表公开声明等。"用各种格言的风格进行"——按照以色列外交部的说法，其目的是要"形成一种公众氛围……这种氛围将加强我们在政府部门中那些朋友的地位"。虽然白宫官员最后要求他们的以色列对手停止写信运动，但是以色列大使向耶路撒冷汇报说："当然我们还在继续写信运动。"根据历史学家汤姆·

塞戈夫的说法，白宫被“呼吁总统站在以色列一边的公民的信件给淹没了”[43]。

虽然这种支持以色列行动的倾向今天反过来可能没有那么普遍，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组织在许多情况下依然遵从以色列领导人的偏好。例如，紧接着2003年3月发布布什政府的中东和平“路线图”，据报道，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马尔科姆·霍恩莱因即告诉《国土报》说，如果以色列政府表达对路线图的保留，那将会得到美国犹太人社会的支持。而且霍恩莱因强调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发出我们的声音。”[44]

尽管在以色列政府和美国一些犹太人团体之间出现了分歧，但是这个犹太人社会“基本上接受了这一原则，即在关乎根本安全方面的事情，不应该对以色列进行公开的批评”[45]。斯蒂文·罗森塔尔的说法是：“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犹太人来说，批评以色列是比违背信仰而结婚更大的罪恶。”或者就像布克班德曾经承认的那样：“在犹太人是否要对以色列政府进行制止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一种负疚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自动整齐划一地不这样做。”[46]最近对美国公众舆论的调查显示，大约2/3的回应者同意：“无论他们对同阿拉伯人的和平谈判持什么样的个人观点，美国犹太人都应该支持由正式选举产生的以色列政府的政策。”[47]因此，即使是当重要犹太人美国组织的领导人和民众对以色列政策持严厉保留态度的时候，他们也几乎不会呼吁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反对公开批评以色列的准则在无数的事例中得到了说明。例如，一群美国进步的犹太人在1973年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布雷拉（Breira）——即选择（Alternative），它呼吁在以色列和海外犹太人之间进行更加开放性的讨论，并寻求动员支持从被占领土撤离以及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解决协议。除了在美国主要报纸上通过广告使公众知道他们的观点外，有几位布雷拉领导人还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代表团的成员，该代表团在美国教友会的赞助下，以私人身份同一群巴勒斯坦代表进行了会见。

虽然有几位犹太领袖为布雷拉进行辩护，但是一股强大的反击力量不久就出现在主要的犹太组织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近东报道》指责布雷拉削弱了对以色列的支持，而改革犹太教（Reform）的犹太教士亚瑟·勒利维尔德（Arthur Lelyveld）则说道，像布雷拉那样的团体“帮助和取悦的是……那些想削减对以色列援助，使以色列在凶手和恐怖分子面前毫无防卫的人”。哈达萨组织的时事通讯给布雷拉成员贴的标签，则是“失败主义的拉拉队”，并且警告它的成员“要拒绝这些组织所推动的信条，因为这同以色列的安

全和犹太人的生存相抵触”。保守的犹太教士大会（Rabbinical Assembly）主席宣称，布雷拉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办的”，而且有47位犹太教士发表一项声明，称布雷拉的立场“实际上与阿拉伯人的观点一致”。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则散发一本30页的小册子，诬称布雷拉的领导人卷入到其他左派事业中，并称他们是“为法塔赫效力的犹太人”。无出其右者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杂志《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American Zionist*），它指责布雷拉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告“那些公开出言‘污秽’的犹太人必须认识到他们进行背叛努力的后果……那些后果他们感受不到，而数千英里外的犹太同胞却感受得到”。

面对这样的攻击，布雷拉几乎没有机会来形成自己的一批拥护者，或者形成一种更加开放的讨论气候。地方性社会团体将布雷拉的代表排除在外，而纽黑文的犹太人社会委员会承认当地的布雷拉分支的前提条件，则是它在该社会中限制自己对以色列的批评。虽然一份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准备的内部备忘录推荐吸收该团体，但只是在它同意“将有关敏感的以色列海外犹太人问题的不同观点直接告诉犹太人社会本身，而不诉诸公众的条件下才可行”。由于不能吸引到持续的资金资助以及遭受领导人变节的削弱，布雷拉在5年后解散了。[48]

为回应布雷拉引起的争议，像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美国犹太教堂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以及犹太人全国社会关系顾问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对持异见者的适当地位进行内部研究或公开研究。根据J.J.戈德堡的说法：“所有这些组织都达成了同一个结论：虽然美国犹太人有自由讨论问题的权利，但那只是在公众视线之外的论坛内部谨言慎行地进行。”1976年，以色列驻美大使施穆察·迪尼兹（Simcha Dinitz）与来自犹太人全国社会关系顾问委员会的代表一道工作，发展出了一套在犹太人社会内的行为指导原则。戈德堡指出：第一条原则是“以色列人才是那些有权决定以色列政策的人”，而第二条原则则是“美国犹太人的公开立场应该同以色列保持一致，只有在私下里才可以宣扬不同的观点”。[49]爱德华·蒂夫南（Edward Tivnan）写道，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对以色列的全体支持已经成了对整个美国的地方性犹太人社会进行领导的要求”[50]。

反对公开批评以色列政策的准则今天大部分依然完好无损。[51]例如，1996年10月，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莫顿·克莱因寄了一封信给反诽谤联盟的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Abraham Foxman），抗议邀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在反诽谤联盟的餐会上发表讲话，指控弗里德曼“总是诽谤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克莱因然后将这封信

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一系列官员间流传，从而导致福克斯曼谴责他是“思想警察”。当内塔尼亚胡的公关传媒总监戴维·巴尔-伊兰（David Bar-Illan）加入到辩论中宣称“任何声称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组织”都不应该给予弗里德曼平台的时候，这种争议加剧了。虽然弗里德曼有时候对以色列的某些政策持批评意见，但是他几乎谈不上是什么反以色列者，而且福克斯曼本身就是以色列的一位狂热的辩护者。但是，克莱因的反应表明，对公开讨论的反对有多么强烈！[52]

数年之后，时任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的老埃德加·布隆福曼（Edgar Bronfman Sr.）在他写信给布什总统，敦促他向以色列施压，以约束它建立有争议的“安全栅栏”的时候，他被指控为“不忠”。世界犹太人大会执行副主席埃希·利伯勒（Isi Liebler）宣称：“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在任何时候游说总统来反对以色列政府正在推动的政策，都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53]利伯勒和其他人两年后被激怒了，因为当时温和的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主席西莫尔·雷克（Seymour Reich），建议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向以色列施压，要以色列在2005年11月重新开放加沙地带一个关键的边界路口。虽然雷克给赖斯的建议合情合理、满怀好意，但是利伯勒却谴责他进行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正统犹太教联盟（Orthodox Union）主席斯蒂芬·萨维茨基（Stephen Savitzky）则说道，他的行为“不仅对以色列政府不敬，而且是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犹太人的冒犯，他们绝对反对这种方法”。利伯勒还警告道：“当据称是世界犹太人大会主流领导人感到他们能够自由地游说反对以色列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的安全政策的时候，该大会显然是有些叫人恶心。如果此种行为得到容忍，那么我们最好一笔勾销我们余下来的一个盟友——以色列海外犹太人组织（Diaspora Jewry）。”由于面对这些攻击畏缩不前，因此雷克宣布：“当涉及以色列的时候，我的词汇里不存在压力这个词。”[54]

不难领会不愿意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公开的批评。除了明显希望不说任何可能帮助以色列敌人的事情，那些批评以色列政策或美以关系的团体或个人，可能会发现在犹太人社会内部维持自己的支持和募集资金将更加困难。它们也冒着被更大的主流组织摒除的风险。虽然像“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恢复和谐社会、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以及新以色列基金会（New Israel Fund）这样的团体在布雷拉没有持续茁壮成长的地方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像新以色列议程（New Jewish Agenda）这样的其他犹太人进步团体，则遭到了像布雷拉曾面临过的那样的反对，该团体持续下来的时间只不过10年多一点而已。[55]类似地，虽然“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经过激烈斗争，最后在1993年被

接纳进入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但是像美国活力党（Meretz USA）和自由主义的重建主义希伯来语联合会（Reconstructionist Rabbinical Association）这样的团体，则在2002年被拒绝入会，尽管它们得到了像世界犹太人大会这样的温和团体的支持。在更小规模的范围里，犹太人和平之音没有在旧金山的主要犹太人社会获得自己的位置，理由是它没有充分地支持以色列；而希勒尔[56]（Hillel）则拒绝给一个名为“为了巴勒斯坦人权力的犹太学生”组织提供场所来进行一次学习研讨会。[57]

使持不同意见的犹太人的声音被边缘化的努力今天还在继续。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进步联盟（Union of Progressive Zionists， UPZ）在2006年通过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一个对以色列国防军在被占领土行动持批评态度的前以色列士兵组织——来主办校园演出的时候，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进步联盟进行了谴责，要求将其驱除出以色列校园联盟（Israel on Campus Coalition， ICC）——一个包含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反诽谤联盟的亲以色列团体组织网络。根据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克莱因的说法，发起批评以色列的组织“不是以色列校园联盟的使命”。犹太复国主义者进步联盟的主任强调该团体“热爱以色列”，其他团体集会捍卫它，而且以色列校园联盟指导委员会一直拒绝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要求。克莱因并未受到威胁，他谴责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们说：“他们的使命包括力图打击煽动行为，然而让我们感到吃惊不已的是，他们对通过以色列人反对以色列的煽动却视而不见。”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还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敦促以色列校园联盟的成员组织改变它们的投票。这份新闻稿引用以色列外交部报告中的话说：“犹太人社会招呼这些组织，而且甚至赞助它们的意愿是不幸的……必须阻止它们对以色列形象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一个以色列校园联盟指导委员会的正统团体随后宣布，它现在赞成清除犹太复国主义者进步联盟。[58]

以色列游说集团向右转

大多数美国犹太人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自由主义和民主党的事业，而且他们中的多数赞成一个有关以巴冲突的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59]然而，该游说集团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团体，包括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变得越来越保守。而现在领导这些团体的，是那些支持他们在以色列国内鹰派搭档立场的人。就像J.J.戈德堡在他那本重要的著作《犹太人的权力》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六日战争及其随后发生的事情使得一群“新犹太人”引人注目，他们绝大多数是从强硬的犹太复国主义、正

统派和新保守派圈子招徕的。他写道："他们发出的挑衅是如此刺耳、他们的愤怒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犹太人社会的其他人全都谦恭地退避三舍，让这些新犹太人来领头。少数人得到允许来代表大众说话，并且成了犹太人的主要政治声音。"[60]

以下这些因素强化了这一趋势：代表1974年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该修正案将苏联的最惠国地位与莫斯科愿意让更多犹太人向外移民联系在一起——运动，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出现和发展（见下文），利库德党在那些年里在主要亲以组织中培养和加强对强硬派支持的成功努力——当时利库德正与以色列工党分享权力。按照戈德堡的说法："沙米尔在战略上的天赋……是控制犹太代表的中心机构，这样一来，它们用不着偏袒哪一方就变成了半个利库德政府的声音。"利库德党的官员——包括沙米尔总理的办公厅主任亚西·本-阿哈龙（Yossi Ben-Aharon）——进行活动，以确保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由更加保守的官员担任主席，帮助策划挑选马尔科姆·霍恩莱因担任1986年会议的执行副主席。由于越强硬的团体越能够得到以色列领导人的赏识，因而加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它们是犹太人社会的权威声音。正如工党领导人、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的一位顾问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忽视美国犹太人是我们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我们让沙米尔的人为所欲为。"[61]

这种向右转的情形，也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中一些主要组织的决策方式，以及在日益控制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样的一小部分富裕保守派不断增加的影响力中得到了反映。例如，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当中，有50多个代表组织，每个组织无论大小都有一票。但是正如迈克尔·马辛所指出的那样："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当中，规模更小的保守派团体，其数量绝对超过了规模更大的自由派团体的数量，因此这些小团体能够压制那些大团体的影响力。而那一职务（执行副主席）使得马尔科姆·霍恩莱因手中拥有了相当的任意决定权。"霍恩莱因是以色列定居点运动的长期支持者，对奥斯陆和平进程持深刻的怀疑态度。[62]

类似地，根据马辛的观察，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是以每个董事的财政贡献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他们如何很好地代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为基础的。[63]愿意给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及对以色列怀有同情的政治家）最大数量金钱的个人，总是以色列最狂热的辩护者，而且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高层领导人（由该组织的那些前主席所组成），在中东问题上要比多数犹太裔美国人具有更多的鹰派色彩。虽然美国以色列共事务

委员会正式支持1993年的奥斯陆和平进程，但是它却几乎没有行动，只是在1999年埃胡德·巴拉克成为总理后，它才扔下了反对一个巴勒斯坦国的想法——但是并没有支持巴勒斯坦国的想法。[64]

事实上，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的强硬派团体，偶尔还会支持比以色列政府所赞成的更为极端的主张。例如在1994年，鹰派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一项对外援助修正案进行了成功的游说，该修正案对美国提供给巴勒斯坦当局的援助进行了额外的限制，尽管克林顿政府和以色列的拉宾政府都反对这一法案。[65]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从未支持过奥斯陆和平进程，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则帮助发起了1995年的《耶路撒冷使馆法案》（Jerusalem Embassy Act），由于该法案通过要求美国将它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因此它显然是在企图破坏和平进程。[66]事实上，据报道，由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汤姆·戴恩的观点不具足够的鹰派色彩和太过于独立，因此组成该委员会内部圈子的主要捐款人将他撵走了。[67]

除了倾向于那些以色列游说集团中对支持以色列和控制主要组织观点更极端的人，许多亲以团体朝右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捐款源源不断进来。正如瓦克西曼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美国犹太组织现在需要以色列使它们自己的存在合法化。虽然这些组织成立的目的可能是要提高和加强以色列的地位，但如今以色列已是它们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68]将以色列描述成受到包围、脆弱不堪，并发布持续不断的或正在增强的反犹主义的可怕警告，有助于在潜在支持者中保持一种高度的关注，从而有助于确保这些组织的继续生存。北美犹太人教育服务处的江奈生·武彻尔（Jonathan Woocher）在1992年精确地阐明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美国看到一个全新行业的出现，看到那些操控和旨在同全世界各地反犹主义进行战斗的组织的出现……犹太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成功尤其引人注目。由于它通过在打击反犹主义对犹太人构成的安全威胁方面甚至比反诽谤联盟计胜一筹，因此该组织已经变成了一个通过直接邮件进行募集资金的主要企业。在犹太媒体和接二连三的直接邮件捐款请求之中，发起了一场决定谁在打击反犹主义中最'强硬'的战斗，在这样的背景里，如今见到那些组织运用手段来取得自己的地位，就并非是什么（令人悲哀的）非同寻常的事情。"[69]或者就像《纽约时报》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3年前评论的那样："自从拉宾先生和阿拉法特先生握手以来，他们从美国主流的犹太人团体——如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得到的只是最缺乏热情的支持，以及来自正统和边缘犹太团体的直接敌视。这些组织似乎只有在有个敌人、有某个人同其战斗的情况下，才能够兴旺发达。"[70]

对这一情况重复一遍是合适的，即在美国的犹太人社会中，有许多团体对以色列的某些政策，尤其是它在被占领土上的继续存在，是持批评意见的。一些这样的组织，如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或布里特·泽德克和舍拉姆，它们积极推进美国参与到和平进程之中，并且在近年已经在立法方面赢得了一些小小的胜利。然而，这样的组织缺乏财政资源，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或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影响力，以及它们那些中间偏右的观点，却被政治家、决策者和媒体当作代表着美国犹太人的声音。[71]因此，此刻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组织将继续推动与它们声称所代表的许多人意见相左的政策主张。

新保守派的角色

新保守派的出现加强了以色列游说集团向右转。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运动就是美国知识和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9·11”之后它却尤其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个团体因制定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特别是作出注定要受到惩罚的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的决定——而著名。

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有自己鲜明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观点，虽然此处与之相关的只是对外政策观点。[72]大多数新保守派颂扬美国霸权——有时候甚至是美国帝国的想法——的优点，而且他们相信，美国的权力应该用于推广民主、阻止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不要有同美国进行竞争的企图。[73]按照这种观点，传播民主和保持美国的支配地位，是长期和平的最佳途径。新保守派也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保证它会被其他国家看作仁慈的霸主，美国只要果断地行使其领导权，人们就会欢迎美国的领导。他们总是对国际机构持怀疑态度——尤其是联合国，他们视其为反以色列的，是美国自由行动的羁绊；他们总是对许多盟友保持警觉——特别是对欧洲人，因为他们视其为美国治下的和平进行“搭便车”的理想主义和平主义者。[74]引用新保守派的新美国世纪计划网站上的话说，由于把美国的领导看作“对美国和世界都有利的”，因此新保守派一般赞成单边地行使美国的权力。

非常重要的是，新保守派相信，军事力量对于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塑造世界是极其有用的工具。如果美国展示它的军事威力，愿意由其支配来使用权力，那么盟友们就会追随美国的领导，潜在的敌手就会意识到进行抵抗的无济于事，并且决定对美国“趋炎附势”。[75]简而言之，新保守主义是一种鹰派色彩特别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

新保守派在各种组织和机构中占据着有影响力的位置。著名的新

保守派包括此前和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如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肯尼思·阿德尔曼（Kenneth Adelman）、威廉·贝内特、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道格拉斯·费思（Douglas Feith）、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I.刘易斯·“喷水炮”·利比（I.Lewis “Scooter” Libby）、理查德·珀尔、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詹姆斯·伍尔西、戴维·乌姆瑟尔（David Wurmser）；新闻记者中有已过世的罗伯特·巴特利（Robert Bartley）、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查尔斯·克劳萨默、威廉·克里斯托尔、布赖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和诺曼·波德霍雷茨；学者有福阿德·阿杰米（Fouad Ajami）、埃里奥特·科恩、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伯纳德·刘易斯、卢斯·维奇伍德（Ruth Wedgwood）；而思想库的专家有马克斯·布特（Max Boot）、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雷欧尔·马克·格拉齐特（Reuel Marc Gerecht）、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迈克尔·雷丁（Michael Ledeen）、耶和华·穆拉维奇科（Joshua Muravchik）、丹尼尔·派普斯、丹妮拉·普雷特卡（Danielle Pletka）、迈克尔·鲁宾（Michael Rubin）、梅拉夫·乌姆瑟尔（Meyrav Wurmser）；著名的新保守派杂志和报纸有《评论》、《纽约太阳报》、《华尔街日报》社论版、《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与这些新保守派关系最紧密的思想和辩护团体有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CSP）、赫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民主捍卫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FDD）、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中东论坛（Middle East Forum， MEF）、美国新世纪计划、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几乎所有的新保守派都强烈地致力于以色列的事业，这是他们公开强调而且并不讳言的一点。根据著名的新保守派专家马克斯·布特的说法，支持以色列是“新保守主义的主要原则之一”，他将这种立场归因于“共享的自由民主价值”。[76]

政治学家本杰明·金斯堡（Benjamin Ginsberg）对美国政治和反犹主义进行过广泛的写作，他令人信服地认为，新保守派向右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同以色列连接在一起，以及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对民主党不断加强的挫折感，因为民主党日益反对美国的军事扩张，不断迷恋第三世界的事业。”金斯堡写道，具体而言，他们拥抱罗纳德·里根“强硬的反共主义”，因为他们将此看作一场“保证以色列安全的政治运动”。[77]

考虑到他们的鹰派倾向，新保守派总是同以色列本国的右翼分子

结盟就并不令人诧异。例如，正是由8名新保守派组成的一个小组——该小组由理查德·珀尔领导，成员包括道格拉斯·费思和戴维·乌姆瑟尔——为即将上台的利库德党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起草了1996年的《干净了结》（Clean Break）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主张以色列放弃奥斯陆和平进程，使用大胆的措施——包括军事力量——来推翻中东的不友好政权，从而“超越”阿以冲突。[78]

许多新保守派以一种交叉重叠的模式与华盛顿的思想库、委员会和出版物——它们的议程包括推进美国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发生联系。以最著名的保守派之一理查德·珀尔为例，他既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又挂靠在右翼的安全政策中心、赫德森研究所、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中东论坛和民主捍卫基金会，并且还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供职。他的那些新保守派同道也很好地以类似方式同那些机构发生联系：威廉·克里斯托尔是《旗帜周刊》的编辑、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共同成立者，先前还挂靠在民主捍卫基金会、中东论坛以及美国企业研究所。《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欧文·克里斯托尔奖（Irving Kristol Award）——该奖以威廉·克里斯托尔之父、新保守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名字命名——一位过去的获奖者、美国新世纪计划数封公开信的签名者、《旗帜周刊》的特约编辑，也在民主捍卫基金会挂靠。他们这种过去和现在的联系，将会使网络理论家都感到其乐无穷：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安全政策中心、赫德森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威廉·贝内特（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美国新世纪计划）、约翰·博尔顿（美国企业研究所、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道格拉斯·费思（安全政策中心、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戴维·弗鲁姆（美国企业研究所、《旗帜周刊》）、雷欧尔·马克·格拉齐特（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旗帜周刊》）、迈克尔·雷丁（美国企业研究所、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民主捍卫基金会、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耶和华·穆拉维奇科（美国企业研究所、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丹尼尔·派普斯（新美国世纪计划、中东论坛）和诺曼·波德霍雷茨（赫德森研究所、《评论》、美国新世纪计划）、迈克尔·鲁宾（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中东论坛）、保罗·沃尔福威茨（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戴维·乌姆瑟尔（美国企业研究所、中东论坛、民主捍卫基金会）、詹姆斯·伍尔西（安全政策中心、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民主捍卫基金会）。

虽然这一归纳绝没有穷尽新保守主义运动内部相互交叉的挂靠情况，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见不得人的阴谋——甚或是一个“右翼阴谋”——的想法，则根本不成立。相反，曾经滋养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各种思想库、委员会、基金会和出版物，其运作方式完全像其他的政策网络一样。这些团体为了塑造公众舆论和精英舆论的明显目的而积极地取悦公众，从而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朝他们赞成的方向发展。新保守派网络既不可否认地给人深刻的印象，又同在其他政策领域——如税收改革、环境，或移民领域——中出现的网络相类似。

当然，新保守派同时关心美国和以色列的安全，而且他们相信他们开出的政策处方将对这两个国家都有利。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传统的保守派——有时被称为“旧保守派”——宣称，新保守派关心以色列胜于关心美国。例如，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坚持认为：“真正鼓舞新保守派的……是维护以色列。那才是一切的一切理由。”[79]新保守派强烈地否认这些指责，从而导致了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保守主义派别之间激烈的口角。虽然冲突最终平息下来了，但是保守主义运动这两个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却依然存在。[80]

许多评论家强调了新保守主义的犹太根源，即便这一运动的许多主要信条同依然支配美国犹太人社会的自由主义态度相左。在《新保守主义革命：犹太知识分子和公众舆论的形成》这本将其主题描绘成具有同情心的形象的书中，默里·弗里德曼（Murray Friedman）甚至极端到将新保守主义描述成“美国的犹太保守主义”[81]。但是并非所有的新保守派都是犹太人，这提醒我们记住，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是根据种族或宗教，而是根据政治议程来界定的。有许多著名的非犹太人接受了新保守主义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基本信条，其中包括对以色列的踊跃支持以及赞成以色列强硬分子的倾向。这些非犹太人的级别范围涵盖《华尔街日报》的编辑罗伯特·巴特利、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前美国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虽然这些非犹太人对于推进新保守主义的议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犹太人却构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是更大规模的亲以色列运动的缩影。虽然犹太裔美国人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就像他们构成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主体一样，但是非犹太人却在新保守主义运动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都很活跃。在新保守派的许多政治议程与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传统政治观点相左的情况下，他们是具有象征性的。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

以色列游说集团还包括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非犹太人团体——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它是在政治上范围定位更广的基督教右翼的一个下属分支。这批人中的赫赫有名者包括像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加里·鲍尔（Gary Bauer）、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和约翰·哈吉（John Hagee）这样的宗教人士，以及像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前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前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尔梅（Richard Armey）、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James Inhofe）这样的政治家。虽然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但是在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支持中，已经越来越能够看到许多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身影、听到他们越来越大的声音了，而且他们最近在政治体制之内成立了一系列组织来推动他们的承诺。[82]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看作美国犹太人社会中各种亲以团体的重要“年轻朋友”（junior partner）。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在于神学时代主义（theology of dispensationalism），这是一种在19世纪英格兰出现的、对《圣经》进行阐释的方法，英国国教牧师路易斯·魏（Louis Way）和约翰·尼尔森·达尔比（John Nelson Darby）是主要人物。时代主义是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的一种形式，它断言世界将经历一个灾难加剧的时期，直到耶稣重新归来。就像许多其他的基督徒一样，时代主义者相信，基督重新归来在《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预言中已经被预言过了，而犹太人重新回到巴勒斯坦这一关键事件，则是导致基督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预先注定的过程。达尔比、魏及其追随者的神学影响了许多著名的英国政治家，使得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弗（Arthur Balfour）更可能接受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思想。[83]

时代主义神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得到流行，它是由许多新教神学家促成的，这些神学家包括福音派的芝加哥穆迪圣经研究所创办人德怀特·穆迪（Dwight Moody）、C.I.肖菲尔德（C.I.Schofield）和威廉·E.布莱克斯通（William E.Blackstone）。最近流行的对此进行表述的书籍包括哈尔·林赛（Hal Lindsey）的畅销书《消失的伟大地球》、蒂莫西·拉哈耶（Timothy LaHaye）的《身后遗留》系列——该系列书是对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进行描述的虚构作品，据报道它的组合销售总数已经超过了5000万册。[84]

虽然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给时代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但是对于它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出现，1967年的六日战争——时代主义运动领导人视其为“上帝的奇迹”——甚至更加重要。[85]时代主义者

将以色列夺取整个耶路撒冷和西岸地区——这种主张就像利库德党人一样，他们将这两个地方称为犹太（Judea）和撒马利亚（Samaria）——解释为《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预言的实现，而且这些“迹象”鼓励他们和其他的福音派基督徒开始活动，以确保《圣经》中的世界末日计划展开的时候，美国站在“正确的一边”。[86]根据孟菲斯神学讲习会前主席蒂莫西·韦伯（Timothy Weber）的说法：“在六日战争之前，时代主义者满足于坐在历史的露天看台上，因而是在运动场地之外的看台上来解释历史……但是在以色列扩张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之后，他们开始从看台上走进运动场地，并且肯定已经列队站好，以他们此前从未有过的政治方式、金钱方式和宗教方式参与进来。”[87]他们进行的努力，是更大范围的所谓基督教右翼——基督教右翼并非全部都强烈地致力于以色列的事业——崛起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显然得到了政治上不断崛起的福音派运动的声援。

考虑到这些信仰，丹尼尔·派普斯相信这种说法就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即“美国基督教复国主义者，而非以色列国防军，是这个犹太国家根本的战略资产”。或者就像内塔尼亚胡的前公关传媒总监迈克尔·弗隆德（Michael Freund）在2006年所写的那样：“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感谢上帝。无论喜欢与否，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的未来对美国犹太人的依赖，可能远小于对美国基督徒的依赖。”[88]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成立了大量组织，其声称的目的是要鼓励对以色列的支持。这些团体包括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而联合组织——其创始人约翰·哈吉将其描述为“基督教版本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了以色列的全国基督教领导大会组织、为了以色列的统一联盟组织、以色列社会基督教之友、基督教以色列公共行动委员会、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使馆组织，以及许多更小的团体”。[89]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也是国际基督徒和犹太人伙伴组织的重要成员，这是一个由拉比·叶奇尔·埃克斯坦（Rabbi Yechiel Eckstein）领导、在芝加哥立足的组织，其使命是“促进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理解、并建立对以色列的广泛支持”。2002年，国际基督徒和犹太人伙伴组织与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前主任及老大党战略家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结盟，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支持以色列（Stand for Israel），寻求“与代表以色列利益的精神和政治人物进行接触”，并主办一个代表以色列利益的年度“国际祈祷和稳定日”活动。[90]

在这个现代活动分子的时期，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信仰，自然地与美国犹太人社会和以色列那些支持定居点运动、反对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团体结盟了。按照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而联合组织”的创始人哈吉的说法：“我们之所以支持以色列，是因为所有其他国家都

是由人的行动所创造的，而以色列则是由上帝的行动所创造的”！哈吉也告诉其追随者说：“上帝反对放弃这片土地”，声称他的运动募集到了1200万美元，以帮助那些在以色列新定居的移民，其中包括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者。[91]

哈吉代表的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典型观点。已过世的埃德·麦卡惕尔（Ed McAteer）是福音派宗教圆桌（Religious Roundtable）的创办人，是基督教右翼的主要组织力量之一，他曾经宣称：“死海、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每一颗沙子都属于犹太人。这其中包括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92]根据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使馆组织的主任马尔科姆·赫丁（Malcolm Hedding）的说法：“我们支持这一权利，即根据4000年前亚伯拉罕文约（Abrahamic covenant）中上帝所赋予的所有土地都是以色列的……不存在像巴勒斯坦此类的事情。”[93]类似地，以色列社会基督教之友的创始人特德·贝克特（Ted Beckett），将以色列社会基督教之友的使命描述为向在“犹太、撒马利亚和加沙”的定居者提供“稳定、安乐和帮助”；该组织使美国的教会与单个的以色列定居点结成对子，这样前者就能对后者进行支持。在一个著名的例子中，科罗拉多州阿尔瓦达的“信仰圣经礼拜堂”（Faith Bible Chapel），“收养”了西岸地区的阿里埃勒定居点，据报道，它向该定居点提供了一个图书馆、一个医疗保健站，以及其他所需物品的资金。[94]

就像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反对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以及任何形式的向巴勒斯坦人的领土让步。1977年，在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到耶路撒冷进行突破性访问的前夕，福音派团体在美国的主要报纸上刊登广告，说他们“严重关注任何从犹太人的家园中切割出另外一个国家或政治实体的企图”[95]。1996年，第三届国际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决定：“上帝许诺给他的子民的土地是不能够被分割的……而在以色列圣地承认巴勒斯坦国的那些国家是更加错误的。”[96]如此狂热的信仰导致了基督教右翼领导人帕特·罗伯逊——而且是信心十足的老大党前主席——主张认为，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在2006年1月的中风，是对沙龙决定从加沙地带撤出的神罚。用罗伯逊的话来说：“他分割上帝的土地，而且我将诅咒那些用类似方法对（欧洲联盟）、联合国或美国采取绥靖政策的任何以色列总理……上帝说：‘这片土地属于我。你最好让它留下’。”虽然罗伯逊后来为他“不当和不得体的”评论进行了道歉，但是这些评论却使人明显地洞察到，有些福音派基督徒是如何为一个大以色列而进行辩护的。[97]

这些相同的信仰似乎影响到一些著名的美国政治家。2002年，众

议院多数党督导员——后来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会上说，他反对给予巴勒斯坦人土地。他说道："我巡游过犹太和撒马利亚。我在戈兰高地上伫立过。我没有看到被占领土。我看到的是以色列。"[98] 迪莱的前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尔梅在2002年5月告诉微软-美国广播公司的"与克里斯·马修斯硬碰硬"节目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说，"他对以色列夺取整个西岸地区感到满意"，而且他"恰巧相信巴勒斯坦人应该离开此地"。[99]或者就像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在解释为什么以色列有权得到整个巴勒斯坦的参议院发言中告诉他的同事时所说的那样："这是最重要的理由：因为上帝这样说……上帝就是在这个地方——希布伦（Hebron）（即哈利勒），向亚伯拉罕显灵并且对他说道，'我授予你这片土地'，即西岸地区。"[100]

考虑到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支持，特别是考虑到传统基督教会内部日益增强的反对声，以色列强硬派渴望同他们携手进行共同的事业就不足令人惊奇了。就像科林·辛德勒（Colin Shindler）所注意到的那样："1977年之后，一种象征性的关系因此得以形成，这种关系同时可以为以色列右翼和基督教右翼的意识形态服务"[101]。梅纳赫姆·贝京的利库德政府在这一时期积极地奉承福音派基督教徒，在1979年给了福尔韦尔一架喷气式私人飞机，使他在1980年成为唯一因"杰出成就"而获得雅布廷斯基奖（Jabotinsky Medal）的非犹太人，其他的获奖者包括像列昂·尤里斯和埃利·维瑟尔这样的作家。当以色列在1981年轰炸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时候，据报道，贝京在打电话给里根之前先打了电话给福尔韦尔，要求福尔韦尔"开始为我效力"，并向美国公众解释以色列的行动。[102]在以色列基督教拥护委员会的赞助下，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在1996年将一群福音派基督教领袖带到了以色列，由帕特·罗伯逊和时任耶路撒冷市市长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担任2002年为耶路撒冷祈祷运动的共同主席。[103]

以色列政府鼓励基督教旅游团访问以色列，这既可以作为旅游收入的来源，又可以加强福音派基督徒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因此，在2002年，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告诉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使馆组织的年度住棚节（Feast of Tabernacles）——据报道这是在以色列最大的外国宗教聚会——会议说："我们需要你们，而且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我还有一个希望你们愿意带回家的任务：派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来访问以色列。"[104]沙龙的继任者埃胡德·奥尔默特在担任耶路撒冷市长的时候，也给了类似的任务，他告诉聚会的人说："你们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权力、我们的防卫的组成部分。"[105]

在其他的中东问题上，也可见到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那些组织的影响力。在2006年夏季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而联合组织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亲以色列的会议，而杰里·福尔韦尔则选择这个时刻警告说："我们濒临一场没有边界的战争"，那"将是未来世界善恶大决战战役以及耶稣基督光荣归来的序曲或前兆"。[106]千禧年畅销书的作者哈尔·林赛在2007年1月写道，对伊朗的预防性核打击是"以色列可以进行的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而约翰·哈吉在他2006年的《耶路撒冷倒计时》一书中则警告说："同伊朗即将到来的核摊牌是必定要发生的。在本书出版之前，《以西结书》之38—39（war of Ezekiel 38—39）[107]战争就可以开始。"[108]哈吉也对2006年12月的美国两党伊拉克研究小组报告进行了谴责，说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又在以色列的背后捅刀子"，并且宣称"要是我父亲那代人的话……这时候就已经轰炸伊朗了"。[109]

有些犹太人美国组织欢迎同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一结盟，尽管他们对这些团体试图在美国推进一项基督教议程，使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存有疑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设立了自己的联络办公室，以便同福音派运动进行工作；像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这样的亲以组织，同福尔韦尔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同基督教福音派的合作，甚至都在《评论》杂志上受到了新保守主义运动奠基人之一的欧文·克里斯托尔的祝福。[110]根据反诽谤联盟前主任内森·珀尔姆特（Nathan Perlmutter）的说法："犹太人可以承认基督教右翼在国内的所有优先议题——自由派犹太人对此的观点则大异其趣，因为没有什么关注像以色列那样重要。"虽然珀尔姆特的继任者亚伯拉罕·福克斯曼总是批评基督教右翼的国内政治议程，但是却在2007年初回应这种观点时说："值此犹太国家存在严重威胁之际，反诽谤联盟欢迎福音派的支持。"[111]根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执行主任戴维·哈里斯（David Harris）的说法，同基督教右翼进行结盟的意愿，从根本上来说是实用主义的，"虽然明天世界末日可能就到了，但以色列今天还安危未定"[112]。

在2007年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政策会议上，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两个主要支派之间的联系得以显现，约翰·哈吉在会议餐会开幕时的演讲，得到了参加者极度热情的欢迎。考虑到哈吉最近才这样写道——犹太人"除了精神生活，什么都拥有"，反犹主义是犹太人"反叛（上帝）的"结果，以及上帝正将"反犹国家拖到以色列身边，以使以色列民族受到挤压，从而使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将承认他（He）是上帝"——因此对哈吉作出的这种热烈反应有点叫人觉得吃惊，[113]尽管哈吉的陈述有些叫人忧虑，但是反诽谤联盟的福克斯曼却宣称："有他扮演的角色……因为他支持以色列。"[114]

对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议程的认识，已经使得更温和的以色列人和犹太裔美国人对他们之间的相互拥抱心生警惕。历史学家瑙米·科恩（Naomi Cohen）注意到："如果不是为了以色列的需要，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会立即拒绝同新基督教右翼的任何交易"[115]。他们担心，使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依然是许多福音派团体的长期目标，并且他们担忧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毫不妥协的观点，将使得同巴勒斯坦人达成持久的和平更加困难。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的乔-安·默特（Jo-Ann Mort）将美国犹太人与基督教右翼之间的勾结，称之为"邪恶联盟"；而以色列的温和派约西·阿尔菲（Yossi Alpher）则警告说，基督徒对继续定居点扩张的支持，正"使我们陷入一场彻底的灾难之中"。正如他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所说的那样："愿上帝把我们从这些人当中拯救出来。"类似地，以色列-美国学者格肖姆·戈伦伯格（Gershom Gorenberg）指出，时代主义神学没有为犹太人预见一种幸福的命运：在世界末日之时，"犹太人或者死去或者皈依"。他特别警告道，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不喜欢真正的犹太人。他们喜欢的是我们在他们的故事中、剧本中的人物形象……（而且）它是一部五幕剧，犹太人在其中的第四幕中消失"[116]。

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支派有多重要？通过向定居者运动提供财政支持，通过猛烈抨击领土让步，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加强了以色列和美国的强硬态度，使美国领导人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更加困难。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以色列定居者的数字就不会这么大，而定居者在被占领土的存在和政治活动，对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的约束也就更小。基督教旅游——实质上是福音派赞助的一个部分——已经成为以色列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据报道，它在邻近地区产生的收入每年有10亿美元。[117]

一种人们听得见、但却是非犹太人支持以色列的声音的存在，也使得美国支持的不仅仅是对美国犹太人发出呼吁的回应，还可能对那些没有获得很多犹太选民支持的政治家的政治算计产生影响。欧文·安德森（Irvine Anderson）认为，时代主义思想加强了"美国支持以色列国的文化倾向，部分是基于基督教圣经的影响"。尤其是由于"听着圣经故事长大……或者读过……将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收复作为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序幕而长大的许多美国人，他们简单地接受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是正确而恰当的观点，就并不令人惊奇了，尽管肯定完全不是这么回事。"[118]

然而，不应该高估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影响力。他们对"大以色列国"的承诺，以及由此导致的反对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没有阻止克林顿政府于2000年在戴维营追求一个两个国家解决的方

案，没有中止1998年命令以色列从西岸地区的一些地方重新部署的《怀伊河协议》。而或许最具启发性的则是，这种承诺没有阻止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宣布他对巴勒斯坦国的支持，尽管小布什同基督教右翼关系密切。

在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施加影响力方面，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之所以比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其他组成部分要小，是因为有几个原因存在。虽然基督教右翼是小布什总统一个关键的政治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这扩大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一范围更广的运动中的能见度，但是这一联盟因包括一系列广泛的社会议题而远远超越了单一的以色列问题。支持以色列只是同罗伯逊、鲍尔和福尔韦尔这样的福音派相关联的众多问题之一，它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虽然基督教右翼领导人经常宣称自己代表4000万乃至更多公开承认的福音派基督徒，但是深切地关心以色列的追随者人数却无疑要更少。此外，与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样的团体形成尖锐对照的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缺乏组织能力来分析国家安全主题，或者在具体的外交政策问题上提供具体的立法指导。鲁思·莫利（Ruth Mouly）在20世纪80年代和欧文·安德森在1999年对国会助手所作的调查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福尔韦尔或其他的宗教右翼，在以色列问题上对国会进行过直接广泛的游说。"[119]类似地，国际基督徒和犹太人伙伴组织的创立者拉比·叶奇尔·埃克斯坦告诉以色列作家泽夫·查夫茨（Zev Chafets）说，他在2003年带去参访那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一个福音派代表团，"是唯一一个曾特别代表以色列游说过白宫的基督教团体"[120]。即便埃克斯坦有点夸大其词，但很清楚的是，以色列只是福音派所关注的一大串问题之一。相反，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这样的团体，则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放在它们议程的最优先考虑位置，而且它们通过像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这样的思想库加强了其外交政策。

进而言之，基督教包括一套复杂的道德宗教教义，而且它的许多规则既没有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进行辩护，也没有鼓励这种支持。虽然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可能相信，圣经预言使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合理化，但是其他的基督教原则——例如基督命令"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同以色列对待其巴勒斯坦国民的做法尖锐对立。基于他们自己对基督教和平正义原则的承诺，对《旧约全书》上的故事以及犹太-基督教传统其他方面内容的精通，故而并没有防止许多主流的基督教教会公开支持一个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和对以色列政策各个方面的批评。[121]就像许多美国犹太人并不支持以色列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样，许多基督教徒——其中包括福音派教徒——也非如

此。

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也缺乏主流亲以犹太团体那样的经济实力，而且在涉及中东问题的时候，他们在媒体存在的影响力也是如此。[122]像罗伯逊和鲍尔这样的领导人，在说到道德和宗教问题的时候，他们虽然可能会得到媒体的许多关注，但是在讨论当前以色列或中东所发生的事件的时候，媒体组织更可能转向布鲁金斯协会或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最好是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看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犹太成分的重要附属，但却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权力之源

为什么以色列的游说如此有效力？一个原因是美国政治制度完全的开放性本质。美国拥有一个分权政府、一个言论自由的完好传统，以及一个选举费用高昂、竞选捐赠受到很小约束的制度。这种环境使得不同的团体有许多不同的方法进入到政策领域或对政策产生影响。利益集团能够直接为自己所喜欢的候选人进行竞选捐赠，试图击败那些观点令其怀疑的候选人。他们也能够对当选的议员或行政部门的官员进行游说，并且他们还能够让自己的支持者得到关键的决策位置的任命。进而言之，利益集团有无数的方式来塑造公众舆论，包括通过培养对其怀有同情的新闻记者，撰写专著、文章和社论，使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人失去信用或边缘化。对于一个怀有高度动机并拥有充分资源的团体来说，不存在缺乏影响政策手段的问题。[123]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有效性也反映了多元社会中利益集团政治的活力。在民主国家中，即使相对较小的团体，如果它坚定地致力于某个问题，而且其他的人对此问题漠不关心的话，也能够施加相当的影响力。即使是该团体的绝对人数不多，决策者——特别是国会议员——也总是迁就他们，因为他们肯定其他人不会因为他们这样做了而惩罚他们。当一位参议员被问到他以及他的同侪为什么签署了一项由利益集团推动的具有争议性的立法时，就像他所指出的那样："不签署的话就没有政治好处。如果你确实签署了，你就不会触怒任何人。如果你不签署的话，你就可能触怒你国家的一些犹太人"[124]。

当反对团体弱小或不存在的时候，规模不大但是关注集中议题的利益集团，其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甚至增加得更多，因为政治家不得不迁就一种利益，而公众则有可能只听到一面之词。无论是农业补贴问题还是外交政策问题，特殊利益集团经常拥有远远超过其绝对人口数量的政治权力。

就像在下一章中清楚显示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竞争影响力方面享有许多优势。美国犹太人相对富有，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有令人钦敬的慈善传统。他们向政党慷慨解囊，且政治参与率很高。虽然达到一定规模但却属于少数派的美国犹太人并不强烈地致力于以色列的事业，但是美国犹太人当中的明显多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这一事业，并且有极少数人对这一问题兴奋不已。当它同以色列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得到的支持进行联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有力的基础。

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主要犹太组织内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源和技术专业水平。根据政治学家罗伯特·特莱斯（Robert Trice）的说法："大多数犹太人团体的特点是会员人数宠大，专业志愿者训练有素，有充足财力支持的社会、福利和政治项目，针对具体问题的专业化工作团队，以及详细描述的内部交流网络。"进而言之，在地方层面和全国层面大量组织的存在，解释了"在重要外交政策问题出现时亲以色列运动以一种全国性协调方式进行迅速动员的能力"[125]。

以色列在美国普遍受到欢迎的形象促进了这些事业。就像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前参议员沃伦·卢德曼（Warren Rudman）曾评论过的那样："他们有很好的产品销售。"[126]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那一受欢迎的形象，主要是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自己决心要使以色列被描绘为一个受欢迎形象的努力所致，这就像那种存在的普遍感觉——即美国和以色列是共同的犹太-基督教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由各种非正式的联系结合在一起——一样。[127]

最后，以色列游说集团因有力的反对者的缺乏而获益。就像一位参议员解释的那样："并不存在敌对的情绪……如果你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巨大压力对着干来进行投票的话，就没有人对你说'了不起'的话。"[128]虽然阿拉伯裔美国人是重要的少数族裔，但是他们却并不像犹太裔美国人那么富有、组织良好、人数众多，或在政治上活跃。作为一个群体，阿拉伯裔美国人在学术界、工商界、媒体界，都没有成功地达到引人注目的地步，而且他们在政治中的可见度也更低。这部分是因为阿拉伯移民到美国的主要浪潮出现得相对晚近，因而第一代移民更加不富有，在重要的职业中更少具有代表性，对美国的道德观念和制度更不熟悉，政治上更不积极，因而影响力就总是不如下一代的移民。

亲阿拉伯组织也不能够同组成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主要团体相匹敌。虽然在美国有少量的亲阿拉伯和亲巴勒斯坦的利益集团，但是它们比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及其他的亲以组织更小，资金上不

像后者那么充足，影响力更是谈不上像后者那么有效。根据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近东报道》（*Near East Report*）前编辑米切尔·巴德（Mitchell Bard）的说法：“从一开始，阿拉伯游说集团就不仅面临选举政治上的劣势，而且面临组织上的劣势。虽然有几个以政治为目标的团体，但是许多这样的团体都是缺钱或缺人的单人运作。”即便有的话，美国政治家也很少抱怨来自“阿拉伯-美国游说集团”的压力，而且他们几乎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行为来迁就它。就像哈里·杜鲁门发表过的著名评论所说的那样：“在我的整个政治经历中，我从来就想不起阿拉伯人的投票曾左右过一次要紧的选举。”[129]

进而言之，因为阿拉伯人来自各种国家和各种背景，而且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因此他们不可能在中东问题上用统一的声音说话。事实上，他们有时候持有尖锐对立的观点。许多美国人存在一定程度的美以之间的文化亲近感，相信以色列人“像我们”，而阿拉伯人则经常被看作异（甚或敌对）文明的一部分。结果，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在美国赢得人心是一场以不同于美国犹太人或他们的基督教盟友的方式来进行的困难战斗。罗伯特·特莱斯1981年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团体的评估今天依然是事实：“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大多数方面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130]

石油（不大）的影响力

阿拉伯政府和自负的“石油游说集团”对以色列游说集团都没有构成重要的平衡作用。石油公司和/或富裕的石油酋长国对美国中东政策施加强大影响力的信念广为传播，并且经常在这样的一种观点中得到反映，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石油战争”和为了像哈利伯顿这样的相关公司利益的战争。[131]有趣的是，这种观点是由对以色列一贯进行批评的人——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斯蒂芬·朱恩斯（Stephen Zunes），以及像马丁·佩雷兹这样捍卫以色列的人一起提出来的。[132]更带有阴谋色彩版本的这种观点认为，布什家族与沙特王室之间的私人和经济联系，形成了有损于美国利益的美国中东政策。[133]这些各种各样的解释，将以色列游说集团描绘成仅仅是众多游说集团中的一个而已，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一个。

毫无疑问，美国在位于波斯湾的能源资源有着主要的战略利益。虽然目前美国从加拿大、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进口的能源多于中东地区，但是石油和天然气是在一个高度整合的世界市场上买卖，因此任何减少能源总体供应量事情的发生，都将会推高油价和伤害美国的经济。[134]就像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领导人将

波斯湾看作一个至关重要的利益，以及他们为什么采取措施在那里维持地区均势，并阻止敌对国家干涉石油从该地区流动的原因。这一基本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寻求与海湾地区许多不同国家维持良好关系的原因，尽管美国同这些国家在各种内政外交问题上立场并不相同。中东的重要性使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了沙特阿拉伯的紧密盟友，这也是为什么华盛顿多年支持伊朗的一个原因。[135]1979年伊朗国王的政权垮台以后，同样希望维持均势和保持石油流动的原因，令人信服地使里根政府在两伊战争期间（1980—1988年）向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倾斜。尔后在1990年伊拉克攻占这个酋长国之后，美国对此进行干涉，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这是美国的一项一以贯之的政策——防止任何单个国家在该地区建立霸权。用不着有一个强大的游说集团来鼓励这些政策，因为很少有人会对防止波斯湾石油由不友好方控制存在质疑。

然而，除了保持获取中东石油这一明显的利益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或强大的“石油游说集团”，对美国全面挺进中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毕竟，如果阿拉伯的石油美元或者能源公司正在驱动美国的政策，那么人们就将看到美国同以色列拉开距离，也不会长期费力地让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虽然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反复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它对以巴冲突采取一种更为平衡的立场，但是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而且甚至在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使用“石油武器”，也几乎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或美国在该地区的总体政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类似地，如果石油公司在驱动美国的政策，人们也将期待华盛顿向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穆阿马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的利比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拍马屁，这样美国公司就可以通过帮助它们开发能源资源和让它们进入市场，从而赚钱发财。相反，美国对所有这三个国家进行了制裁，这与石油公司所要求的完全相反。事实上，就像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将看到的那样，在有些情况下，美国政府故意干预威胁那些将使美国公司受益的商业交易。如果石油游说集团如某些批评者所相信的那么强大，这些行为就不会发生。

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富裕的石油生产国，已经雇用了公关公司和专业游说者来提高它们在美国的形象，并对具体的武器交易进行游说，而且它们的努力也偶有成果。它们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说服国会在1982年批准将预警飞机（AWACS aircraft）卖给沙特阿拉伯，尽管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对此强烈反对。虽然这一事件有时候被引用来表明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力的有限，以及“阿拉伯游说集团”的权力，但是后者在这一案例中的胜利，多归因于一组非同寻常的有利条件：沙特阿拉伯石油的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苏联在那时被看作

对海湾的一个严重军事威胁，罗纳德·里根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总统，而且里根政府全力以赴赢得了国会的批准。即便如此，这一军售也是勉强获得通过——参议院的最终投票结果是52票赞成、48票反对；而且面对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和国会的反对，里根被迫撤销了随后几个给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一揽子武器销售协议。[136]相反，以色列游说集团则是美国公民小集团政治参与的表现形式，因此它的活动被广泛而正确地看作一种合法的政治活动形式。

进而言之，由于大多数石油出口国政府依赖巨额的收入来维持它们自身的权力，威胁切断石油供应是难以置信的，因而它们的制衡力受到了削弱。许多这些政府在西方经济中也有规模巨大的投资，在发生持续经济下挫的情况下，它们会遭受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减少生产将推升价格，并且使可替代能源资源更加具有吸引力，强烈刺激美国和其他国家一劳永逸地脱离对石油的依赖。因为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主要石油出口国希望使工业大国与石油和天然气挂钩，因此它们明显缺乏动机来使用由其支配的那点可能几乎不存在的影响力。结果，美国对进口能源供应的依赖，并没有使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能源公司的情况如何呢？虽然这些公司确实涉入大量的游说活动当中，但是它们最近几十年的游说努力，几乎一直完全集中在它们的商业利益上，而非范围更广的各种外交政策方面。具体而言，能源公司集中关注的是税收政策、政府规则、环境问题、获取进入潜在的能源开采地，以及其他能源政策的可行性方面。对它们而言，外交政策通常是第二位的关注；根据罗伯特·特赖斯的说法，它们的“基本目标……是在中东形成一个政治经济环境，以便允许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同样地，公司行为体的政治利益普遍比那些亲阿拉伯团体的政治利益范围要狭窄得多”[137]。

当人们研究一下石油业交易协会的旗舰，美国石油研究所的网站时，这种相对狭窄的关注就显得非常明显。在“政策问题”总标题下面出现了五个主题：气候变化、勘探/生产、燃料、税收和贸易以及国土安全。网站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及“以色列”或“阿以冲突”，而且根本很少提及外交政策。相反，以色列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则是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以及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等网站首页的中心位置。[138]正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莫里斯·阿米塔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所指出的那样：“当石油利益集团或其他的公司利益集团进行游说的时候，它们进行游说行动的99%的时间，是花在它们认为是自己利益的事情上：它们对税收账单进行游说……我们很少看到它们游说外交政策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

们拥有的是我们自己的领域。”[139]

此外，由于害怕受到组织良好的亲以色列团体的报复，美国公司似乎没有试图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勇气。例如，1975年，由于发现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在美国支持大量的亲阿拉伯活动，因此遭到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和反诽谤联盟的公开谴责。作为回应，海湾石油公司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半个页面的广告为其行为道歉，并告诉该报的读者说：“你们可以肯定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就像特赖斯所指出的那样：“警惕、敏感和反动的亲以色列游说集团，乃是美国公司总是避免直接参与国内有关中东问题政治辩论的一个原因。”[140]

有的评论家相信，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正驱使美国或是在像伊拉克这样的地方获得有利的让步，或是通过煽动那里的不稳定来使石油价格抬高，并使它们能够收获意外的利润。[141]这种行为不仅几乎没有直接的证据，而且也与主要能源公司的长远利益相左。能源公司不喜欢在富油区发生战争、制裁，或者政权更迭——这些正是近年来美国中东政策的中心内容，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威胁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获取，从而威胁到它们的赚钱能力，而此类事件也鼓励美国人更严肃地考虑减少对石油公司主要产品的需求。因此，当副总统迪克·切尼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一家主要的石油服务商——哈利伯顿公司——的总裁时，他反对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正如在本书的第十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是一项由游说集团驱动的政策，并且切尼还抱怨美国公司正被美国的“制裁快乐”政策“弄得无法行动”。[142]切尼更早的主张认为，如果石油公司控制了美国的中东政策，那么美国就会在近些年里追求非常不一样的议程。

无论他们是多么好的资本家，这一点也不否认石油公司会从它们不鼓励的外交政策的倡议中寻求利益。石油公司从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获得有利的让步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就像它们会快快乐乐地同萨达姆本人做生意一样。总而言之，富裕的阿拉伯政府和石油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的影响，要比以色列游说集团小得多，因为石油利益集团较少有需要扭转它们赞成的外交政策方向，而且它们没有同样的影响力。[143]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前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写的文章中注意到：“显而易见，即便是最重因果关系的观察家（也会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该地区石油占统治性的绝对优势地位——的外交政策，更多地是对美国犹太人社会的压力所作出的反应，而且他们犹太人社会的自然愿望是支持以色列而非美国的石油利益集团。”在对以色列和阿拉伯游说集团进行比较时，米切尔·巴德承认，尽管像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

（Saudi Arabian Oil Co.，　Aramco）在过去进行过游说活动，但是其努力“对美国外交政策并未产生能够察觉得到的影响”。或者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前立法顾问道格拉斯·布鲁姆菲尔德（Douglas Bloomfield）在2003年告诉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时所说的那样：“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实际上没有对手。”[144]

“双重忠诚”问题

这幅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主要由美国犹太人组成，致力于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朝亲以色列方向发展——图景，肯定会使一些人感到不快，因为它似乎引发了“双重忠诚”的忧虑，而“双重忠诚”一度是老欧洲反犹主义的共同谣言。这种指控的最初体现是，海外犹太人是永远的异乡人，他们不能够被同化为良好的爱国者。根据这种现已不足为信的观点，犹太人被认为只会在他们之间相互忠诚。臭名昭著的《犹太长老秘密会议纪要》是一部被揭露的沙文主义伪作，并早已不足信了。该书声称犹太人在他们所生活的国家充当第五纵队，为秘密计划控制世界的一个犹太长老委员会效力。

在这一较早的反犹主义体现之中，双重效忠事实上是一个不当之词，因为这一指控暗示的乃是犹太人只是在相互之间进行忠诚，而并没有感到对他们居住国的真正忠诚。然而在今天，学者和评论家都是以一种中立和不含贬义的方式，使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个人感觉到不只是对一个国家的真正联系（或忠诚）。因此，在最近对不同族裔生活在海外的人进行比较的时候，以色列政治学家加布里尔·谢菲尔（Gabriel Sheffer）对“全部的”、“双重的”和“分裂的”忠诚进行了区分，并指出说，当一个特定族裔、民族或宗教团体散落在不同国家的时候，所有这样三种忠诚的反应都会发生。[145]就像在下面讨论的那样，虽然其他细心的犹太裔美国人已经使用“双重忠诚”来描述他们的态度和经历，但是他们使用这一术语，与过去反犹主义的恶毒诽谤使用这一术语已经大相径庭。

任何认为犹太裔美国人是不忠的公民的观念都是错误的。我们完全同意领导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马尔科姆·霍恩莱因的说法：“可以保险地说，美国犹太人位列最爱国和最忠诚的美国公民之中。”[146]就像我们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那些代表以色列利益进行游说的人的行事方式，是与美国长期的政治传统相一致的。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生活长期是以这样一种假定来进行的，即所有的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和忠诚——对国家、对宗教、对家庭、对雇主，等等，而且美国公民会创建反映那些忠诚和利益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协

会。例如，考虑到2006年的一项在13个国家进行的皮尤全球基督徒态度调查，其中42%的美国回应者首先是把他们自己看作基督徒，其次才是美国人。[147]这些不同的联系——有时候包括同一个外国的密切关系——可能反映的是与祖先的联系、宗教的关系、个人经历（海外学习或和平队任务），或者任何其他的许多根源。美国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表达这样的联系和密切关系是合法的；这实际上是民主理论蕴含的他们该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甚至美国公民持有双重国籍和在外国军队中服务——包括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务——都是被允许的，而且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

那些以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式来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人总是相信，他们所赞同的政策也将有利于美国。就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前执行主任汤姆·戴恩在告诉一位采访者时所说的那样："我继承这项工作想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如何加强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此同时，我对以色列考虑得很多，因为我是犹太人。"[148]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前负责人西奥多·曼（Theodore Mann）在2001年更为扼要地说道："杰出的美国犹太人实际上深深感到，美国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利益是相同的。"[149]

虽然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是普遍而根深蒂固的，但它却存在一个问题：没有哪两个国家总是拥有相同的利益。国际政治恰恰不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的。美国同以色列的利益相左，这在过去有这样的例子，将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例子。例如，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以色列来说获得核武器非常具有战略意义，但是让以色列获取核武器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当以色列杀伤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即便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时候，它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是在以色列使用美制武器这样做的时候更是如此。在以色列决定1982年入侵黎巴嫩的时候，以及它最近反对美国计划将先进武器销售给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海湾国家的时候，人们从中看到了类似的利益分歧。[150]

然而，许多以色列的支持者发现他们难以承认耶路撒冷与华盛顿之间会有根本不同的利益存在。换言之，他们完全接受了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列举并驳斥过的那些战略和道德理论，他们卖力地说服政策制定者相信那些理论的有效性。他们之所以可能坚持这些观点，是因为当重要的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通常是感到不快的。即使当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明显相左的时候，有些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也发现他们难以承认折中情况的存在。

然而，有思想见地的犹太裔美国人——包括一些著名的政策制定者——却公开承认，在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他们对以色列能够理解的福利利益，以及他们对美国的真正忠诚之间可能而且确实出现了冲

突。值得称赞的是，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坦率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尽管我没有进行我的宗教实践，但是我不能够忘记我那死在纳粹集中营的13个家庭成员……大多数以色列领导人都是我的私人朋友。然而……我必须使我的情感偏好服从我的国家利益观……它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偶尔它还被证明是令人痛苦的。"[151]

基辛格承认许多人会拒绝承认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美国与其他国家有强烈的密切关系，无论那些联系的根源是什么，无论他们怎样一以贯之地代表他们的祖国来解决它们，紧张关系注定是要出现的。或者就像比尔·克林顿的一位不具名的中东政策顾问承认的那样："虽然我们按美国的利益行事，但却是通过一面三棱镜来进行的。"另外一位老资格的犹太裔美国外交官表达了类似的感受，他说道："感谢上帝我不是在中东事务部门或联合国工作，因为在那你可能要投票谴责以色列。"[152]

这样的陈述一点也不是承认自己不忠诚；相反，他们令人钦佩地诚实思考了多重忠诚的问题，而这是整个人类都有的感受，有时候还会有冲突。新闻记者埃里克·奥尔特曼（Eric Alterman）同样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并指出他的"双重忠诚"是"由我的父母、我的祖辈、我的希伯来语学校教师拉比传授给我的，更不用说还有少年活动营的领队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大学生代表"。但是奥尔特曼并不是假装说可能的折中情况绝不会出现，相反，他承认说："我们应该足够诚实地至少想象一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利益的假设性冲突。在此，我非常寂寞地承认，偶尔我会同最有利于以色列的事情相配合。"[153]

然而，奥尔特曼事实上并不孤单。考虑一下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前国家事务主任斯蒂芬·斯坦因赖特（Stephen Steinlight）的评论。在叙述了他自己在美国作为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甚至准分离主义者"抚养长大后，斯坦因赖特评论道：

我的民族主义训练过程是灌输将世界基本分裂为"我们"与"他们"的信仰。当然，虽然我们通常是带着真情向美国和加拿大国旗敬礼、唱那些国歌，但我们的忠诚指的是在哪里则是很清楚的。我也对那个在任何时候对这一紧张关系进行的经典、精致的回答很熟悉，这被引证为：以色列和美国是民主国家；它们拥有共同的价值；它们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对一方的忠诚不能令人信服地认为是对另一方的不忠，等等。所有这些都回避了那些大问题……虽然事实上大部分时间是真实的，但是它根本就不是绝对的概念，完全缺乏各种可能的例外……在团体忠诚与更广意义上对美国归属之间的平衡行为，我们的困难不会更少。美国对这种双重忠诚的基本容忍——我怀疑，我们之

所以免费入场，基本上是因为基督教对大屠杀所怀有的罪恶感——使之依旧是一个现实。[154]

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即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犹太裔美国人；相反，这种紧张关系是一个从全世界吸引民众的熔炉社会不可避免的特点。[155]同样重要的是，要指出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将肯定拒绝任何这样的建议，即如果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出现明显冲突的时候，他们将把以色列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利益之前。

相信美国应继续给予以色列坚定而无条件支持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完全有权利推进他们的主张，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质疑他们的忠诚将是错误的。然而，批评者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也同样是合法的，即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是非中立的，管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以及类似组织的那些个人，他们是受到同以色列的联系所激发促动的，而那注定要塑造他们对有关许多外交政策问题的思维。否则的话，马尔科姆·霍恩莱因为什么要像下面这样来描述他的工作？——“我全身心致力于这个犹太国家的安全。”[156]或者为什么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而联合组织的约翰·哈吉说到他所支持的以色列定居点同美国官方反对这些定居点之间潜在的冲突时要这样说呢？——“上帝的法律超越美国政府和美国国务院的法律。”[157]如果不是受到同以色列联系的强烈关系的激励，为什么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前信息研究主任伦尼·本-戴维（Lenny Ben-David），要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充任以色列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副馆长呢？[158]

对由这些个人倡导的政策和他们所代表的组织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质疑，同样是合法的，就像对其他特殊利益游说集团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其他方面施加影响进行质疑一样。虽然他们的爱国主义不应受到责难，但是他们的建议可能正在促进这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对美国，以及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相当战略重要性的地区造成了大灾难。对这种建议的公正性进行质疑，同那种说犹太人不爱国的不足为信的“双重忠诚”老调子，是毫无关系的。

结论

以色列游说集团完全不是阴谋小集团或阴谋诡计；它是进行公开运作的，并且自豪地宣扬它的影响力。虽然组成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团体和个人处于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特别有利的位置，但是在基础运作方面，以色列游说集团与其他利益集团没有什么不同，如农业游说集团、钢铁和纺织工人游说集团以及许多族裔的游说集团，简而言之，使之与其他游说集团不同的，乃是它那非比寻常的效力。在下

面的两章中，我们将考察它为取得这些目标所使用的战略。

---

[1] Andrew C.Revkin，“Bush Aide Edited Climate Reports，” *New York Times*，June 8，2005； Andrew C.Revkin and Matthew Wald，“Material Shows Weakening of Climate Reports in Hundreds of Instances，” *New York Times*，March 20，2007.

[2] 关于那些族裔的游说集团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重要作品包括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Ethnicity and U.S.Foreign Policy*，2nd ed.，ed.A.A.Said（New York：Praeger，1981）；*Ethnic Groups and U.S.Foreign Policy*，ed.M.E.Ahrari（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7）；Paul Watanabe，*Ethnic Groups，Congres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Politics of the Turkish Arms Embargo*（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4），以及R.Hrair Dekmejian and Angelos Themelis，“Ethnic Lobbies in U.S.Foreign Policy：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Jewish，Greek，Armenian and Turkish Lobbies，” Occasional Research Paper no.13，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anteion Universi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Athens，Greece，October 1997。

[3] 这是政治分析中的常见问题。例如，虽然“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概念都很清楚明白且不具争议性，很容易想到每种类型的范例（例如，参议员特德·肯尼迪是“自由派”，而前众议员纽特·金里奇则是“保守派”）。然而，有的人却难以归类，例如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或已故的参议员亨利·“铲子”·杰克逊，他们两人在国内问题上是自由派，但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则是保守派。

[4] Melvin I.Urofsky，*American Zionism from Herzl to the Holocaust*（Garden City，NY：Anchor Press，1975），p.1； Steven T.Rosenthal，“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American Jews，Zionism，and Israel，”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Judaism*，ed.Dana Evan Kapla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09.

[5] Robert H.Trice，“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Said，*Ethnicity and U.S.Foreign Policy*，pp.121—122.

[6] Steven M.Cohen，*The 2004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Jews*，sponsored by the Jewish Agency for Israel's Department of Jewish-Zionist Education，February 24，2005.也可参见2006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Jewish Opinion*，conducted September 25-October 16，2006，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October 18，2006；Steven M.Cohen，“Poll：Attachment of U.S.Jews to Israel Falls in Past 2 Years，” *Forward*，March 4，2005，以及M.J.Rosenberg，“Letting Israel Sell Itself，” Weekly Opinion Column，Issue #218，Israel Policy Forum，Washington，DC，March 18，2005。最近一份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准备的报告指出：“在几项研究之间存在一个共识，即以色列对年轻人的犹太身份并不是核心问题。” Jacob B.Ukeles et al.，“Young Jewish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September 2006，p.34.也可参见Amiram Barkat，“Young American Jews Are More Ambivalent Toward Israel，Study Shows，” *Ha'aretz*，March 7，2005。

[7] 就像主要的犹太机构犹太人全国社会关系顾问委员会联合项目计划在1957年所说的那样：“美国公众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关注……作为一种自然正常的利益表现来接受，而这种利益表现则是以同情和许多美国人普遍都拥有的一种情感联系为基础的。”引自Jack Wertheimer，“Jewish Organizational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5，” *American Jewish Yearbook 1995*（New York：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1995），p.13。

[8] Rosenthal，“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 p.211；Thomas A.Kolsky，*Jews Against Zionism*：*The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1942—1948*（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0）.

[9] 立场在不断演变的犹太教革新派犹太法师机构美国拉比中央会议（Centr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 CCAR）很好地掌握了这种变化。1897年，美国拉比中央会议宣称：“我们完全不同意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任何尝试。这样的尝试显示出对以色列使命的误解。”而且它也不赞成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与此相对照，美国拉比中央会议在1967年却宣称：“自己同以色列国家和人民的团结。他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他们的磨难就是我们的磨难。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引自Chaim I.Waxman，“All in the Family：American Jewish Attachments to Israel，” in *A New Jewry？America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Studies in Contemporary Jewry：An Annual，Vol.VIII，ed.Peter Y.Meddi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Jewry，Hebrew University，1992），p.140。

[10] Rosenthal，“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 p.212.

[11] 位于纽约第5大街155号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译者注

[12] 犹太妇女于1912年成立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译者注

[13] Waxman，“All in the Family，” p.134.注意这样一个例子，列在美国犹太人大会核心议程声明中的第一项内容，是“以色列及世界犹太人社会的安全和保护”，登录www.ajcongress.org/site/PageServer？pagename＝about。今天的情形也与此相似，在2005年版的年鉴中，有90多个被认为是“同以色列有关的”独立的团体。

[14] “Who We Are”以及“What We Do，”登录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网址，www.conferenceofpresidents.org/content.asp？id＝52。作为对助理国务卿亨利·拜罗德（Henry Byroade）抱怨——他说他同许多独立的犹太组织打交道有困难，并且说这些组织用一个声音说话是有益的——的回应，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在1954年成立了。参见Edward Tivnan，*The Lobby*：*Jewish Political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pp.40—41。

[15] 这一数字忽略了个人捐赠，因而低估了亲以色列竞选资金捐赠的作用。登录www.crp.org/pacs/industry.asp？txt＝Q05&cycle＝2006。关于“秘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一般现象，参见Richard H.Curtiss，*Stealth PACs*：*Lobbying Congress for Control of U.S.Middle East Policy*，4th ed（Washington，DC：American Educational Trust，1996）。

[16] Jeffrey H.Birnbaum，“Washington's Power 25，” *Fortune*，December 8，1997.在一项2001年进行的类似研究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位列第4。参见Jeffrey H.Birnbaum and Russell Newell，“Fat and Happy in D.C.，” *Fortune*，May 28，2001。

[17] Richard E.Cohen and Peter Bell，“Congressional Insiders Poll，” *National Journal*，March 5，2005； James D.Besser，“Most Muscle？ It's NRA，Then AIPAC and AARP，” *Chicago Jewish Star*，March 11—24，2005.

[18] 迪马利的话引自Robert Pear with Richard L.Berke，“Pro-Israel Group Exerts Quiet Might as It Rallies Supporters in Congress，” *New York Times*，July 7，1987；汉密尔顿的话引自George D.Moffett III，“Israeli Lobby Virtually Unmatche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une 28，1991。

[19] 关于布兰代斯、怀斯等人所起的作用，参见Irvine Anderson，*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Middle East Policy*：*The Promised Land*，*America and Israel*，*1917—2002*（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5），pp.61—62；以及Peter Grose，*Israel in the Mind of America*（New York：Knopf，1983），pp.67—71.杜鲁门的前商业伙伴埃迪·雅各布森（Eddie Jacobson）说服他在1948年会见蔡姆·韦茨曼（Chaim Weizmann），而像戴维·奈尔斯（David Niles）和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这样的亲犹太复国主义顾问，则帮助说服杜鲁门支持1947的分治计划，并在1948年承认这个新的国家。关于各种影响杜鲁门作出决定的不同观点，参见Peter L.Hahn，*Caught in the Middle East*：*U.S.Policy Towar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1948—1961*（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6），pp.26—31 and chaps.2—3；Zvi Ganin，*Truman*，*American Jewry*，*and Israel*，*1945—1948*（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79）；Steven L.Spiegel，*The Other Arab-Israel Conflict*：*Making America's Middle East Policy from Truman to Reag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chap.2；Kenneth Ray Bain，*The March to Zion*：*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the Founding of Israel*（College Station：Texas A & M Press，1979），以及Warren Bass，*Support Any Friend*：*Kennedy's Middle East and the Making of the U.S.-Israeli Alli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23—34。

[20] Lloyd Grove，“The Men with Muscle：The AIPAC Leaders，Battling for Israel and Among Themselves，” *Washington Post*，June 14，1991.

[21] J.J.Goldberg，*Jewish Power*：*Inside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96），p.158.

[22] Stuart Eizenstat，“Loving Israel，Warts and All，” *Foreign Policy 81*（Winter 1990—1991）：92.

[23] Ibid.， Melvin I.Urofsky，*We Are One*！*American Jewry and Israel*（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8）.

[24] 杰克·沃特海默说：“几乎没有什么疑问，作为六日战争的结果，有组织的犹太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犹太人完全认同以色列，这种认同激励犹太人社会提供前所未有的慈善捐助和志愿活动。”参见“Jewish Organizational Life，” p.32；Menahem Kaufman，“Envisaging Israel：The Case of the United Jewish Appeal，” in *Envisioning Israel*：*The Changing Ideals and Images of North American Jews*，ed.Allon Gal（Jerusalem：Magnes Press/Hebrew University，1996），pp.232—234。

[25] Wertheimer，“Jewish Organizational Life，” pp.32—33.

[26] Ibid.，p.55.

[27] 引自Wolf Blitzer，“The AIPAC Formula，” *Moment*，November 1981，p.23。

[28]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并没有披露其年度预算；此处报道的数字来自Blitzer，“AIPAC Formula，” p.23；Lloyd Grove，“On the March for Israel；The Lobbyists from AIPAC，Girding for Battl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ashington Post*，June 13，1991；Jeffrey H.Birnbaum，“Pro-Israel Lobby Holds Meeting Amid Worries，” *Washington Post*，May 19，2005；Thomas B.Edsall and Molly Moore，“Pro-Israel Lobby Has Strong Voic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5，2004，以及 James Petras，“AIPAC on Trial，” *CounterPunch.org*，January 7—8，2006。

[29] 引自Goldberg，*Jewish Power*，p.223。

[30] Bass， *Support Any Friend* ，p.147.也可参见Goldberg， *Jewish Power* ，pp.197—203。

[31] 一个成立于2003年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其前身是工党复国主义联盟。——译者注

[32] Tikkun，希伯来语，清除污渍、恢复和谐之意。——译者注

[33] Goldberg，“Old Friend， Shattered Dreams，” *Forward* ，December 24， 2004； Esther Kaplan，“The Jewish Divide on Israel，” *Nation* ，July 12， 2004； Michael Massing，“Conservative Jewish Groups Have Clout，”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0， 2002； Eric Yoffie，“Reform the Conference，” *Forward* ，August 2， 2002，以及William Fisher，“U.S.Jewish Groups Press Mideast Peace，” *Antiwar.com* ，November 25， 2004。

[34] Daniel Levy，“Is It Good for the Jews？” *American Prospect* ，July 5， 2006.

[35] 引自Sharon Samber，“Congress Urged Not to Link Israel Aid to China Arms，” *JTA.org* ，June 13， 2000.

[36] 例如可参见Americans for Peace Now，“Briefing for the 110th Congress： Securing Israel's Future Through Peace，” p.8，登录www.donteverstop.com/files/apn/upl/assets/APN110thBBook.pdf。

[37] 根据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网站的说法：“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相信，经由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到以巴之间的冲突，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还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东地区，都将变得更加安全、繁荣和稳定。”登录www.ipforum.org/display.cfm？id＝1。

[38] Jewish Voice for Peace，“U.S.Military Aid to Israel，”登录www.jewishvoiceforpeace/org/publish/printer_17.shtml。

[39] 引自Tivnan， *The Lobby* ，p.93。

[40] 引自Goldberg， *Jewish Power* ，p.206。

[41] Ori Nir，“FBI Probe：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Forward* ，May 13， 2005； 布克班德的话引自Wolf Blitzer， *Between Washington and Jerusalem： A Reporter's Noteboo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48。

[42] 关于这些事件，参见Hahn， *Caught in the Middle East* ，pp.39—42， 46—51， 57—59， 79—82。

[43] 对这些活动（以及所引用的以色列通信）的描述，参见Tom Segev， *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trans.Jessica Cohen（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pp.254， 264—265， 304—305。

[44] 引自David Landau，“The Battle for Washington，” *Ha'aretz* ，March 28， 2003。

[45] Jonathan Marcus，“Discordant Voices： The U.S.Jewish Community and Israel During the 1980s，” *International Affairs 66* ，no.3（July 1990）： 546.也可参见 Sarah Bronson，“Orthodox Leader： U.S.Jews Have No Right to Criticize Israel，” *Ha'aretz* ，August 2， 2004，以及 Daniel Ben Simon，“Storm Warnings，” *Ha'aretz* ，November 14， 2003。

[46] Rosenthal，“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 p.214； 布克班德的话引自Blitzer， *Between Washington and Jerusalem* ，pp.147—148。历史学家戴维·比亚尔（David Biale）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段话注意到：“过去20年中犹太复国主义在有组织的犹太人社会中所取得的意识形态霸权，已经对使有关以色列政府许多具体政策的辩论缄默下来产生了影响。”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in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6）， p.189。

[47] *2004 Survey of American Jewish Opinion* ，conducted August 18—September 1， 2004，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September 21， 2004， question 16.以前的调查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果。

[48] 布雷拉组织的简明历史的描述基于Michael E.Staub， *Torn at the Roots： The Crisis of Jewish Liberalism in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8； Tivnan， *The Lobby* ，pp.90—96； Wertheimer，“Jewish Organizational Life，” pp.39—43，以及Goldberg， *Jewish Power* ，pp.207—208。

[49] Goldberg， *Jewish Power* ，p.208.

[50] Tivnan， *The Lobby* ，p.76.戴维·比亚尔在1986年提供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对于有组织的犹太人社会来说，缺乏对以色列的支持等同于通敌……以色列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缺乏对它的信仰就被当作异端来对待。”*Power and Powerlessness* ，p.188.

[51] 当伊扎克·沙米尔总理暂时支持一项修改《回归法》（Law of Return）——此法要求皈依犹太教需按照犹太法师法由正统派拉比来进行——的建议的时候，美国犹太人领袖对此公开表现出不快。就像美国改革犹太教运动的拉比埃里克·约菲（Eric Yoffie）所说的那样：“如果以色列的改革派拉比并非拉比、他们主持的皈依并非皈依，那

就意味着我们的犹太教并非犹太教，意味着我们是劣等犹太人”。引自Rosenthal，“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 p.218。 也可参见Goldberg，*Jewish Power* ，pp.337—342。

[52] Lawrence Grossman，“Jewish Communal Affairs，” *American Jewish Yearbook 1998*（New York：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1998），pp.110—111；Tom Tugend，“Talk by N.Y.Times' Friedman Spurs ADL-ZOA Political Fuss，” *JTA.org* ，December 6，1996，以及Tom Tugend，“N.Y.Times Columnist Applauds ADL for Not Caving in to ZOA，” *JTA.org* ，December 13，1996。

[53] Inigo Gilmore，“U.S.Jewish Leader Hit over Letter，” *Sunday Telegraph* （London），August 12，2003，以及Isi Liebler，“An Open Letter to Edgar Bronfman，” *Jerusalem Post* ，August 6，2003。

[54] 这些引用的内容来自Isi Liebler，“When Seymour Met Condi，”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24，2005；Ori Nir，“O.U.Chief Decries American Pressure on Israel，” *Forward* ，December 2，2005；Ori Nir，“Rice Trip Raises Concern over U.S.Pressure on Israel，” *Forward* ，November 18，2005，以及Seymour D.Reich，“Listen to America，”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13，2005。

[55] 攻击布雷拉组织的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小册子的作者雷尔·琼·艾萨克，写了一篇反对新以色列议程组织的类似论战文章，而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华盛顿分部则谴责新以色列议程为“亲阿拉伯而非亲以色列”的团体。由于经常性的预算赤字和其他挑战的阻碍，新犹太议程组织经过十二年的艰难维持之后在1992年关门了事。参见Jack Wertheimer，“Breaking the Taboo：Critics of Israel and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in Gal，*Envisioning Israel* ，pp.410—411，以及Emily Nepon，“New Jewish Agenda：The History of an Organization，1980—1992”（B.A.thesis，Goddard College，2006），登录www.newjewishagenda.org。

[56] 即犹太人校园生活基金会。——译者注

[57] 本段落中的资料基于Kaplan，“Jewish Divide on Israel”。在其他两起类似事件中，据报道，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的希勒尔项目主任和伊萨卡学院的希勒尔项目主任，在被谴责发表文章支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反对占领的文章后辞职。

[58] Ari Paul，“Zionist vs.Zionist，” *American Prospect* ，January 4，2007；Rebecca Spence，“Campus Coalition Split over Progressive Union，” *Forward* ，January 19，2007；Rebecca Spence，“Groups Flip Flop as Controversy over Liberal Zionists Continues，” *Forward* ，February 2，2007；Ben Harris，“Group That Criticized Israel to Stay in Campus Coalition Despite Protests，” *JTA.org* ，January 24，2007；“L.A.Israeli Consul General to Foreign Ministry：UPZ and Breaking the Silence Programs Harm Israel's Image and Must Be Stopped，”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2007年1月31日的新闻稿，登录www.zoa.org/2007/01/la_israeli_cons.htm。

[59] 当被问到“在当前局势中你支持还是反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个问题时，美国犹太人回答“同意”的在2006年占54%，2005年占56%，2004年占57%。“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Jewish Opinion，” 2006年、2005年和2004年，可登录www.ajc.org。

[60] Goldberg，*Jewish Power* ，p.161.

[61] Ibid.，p.217.也可参见pp.159—162，170—175，216—223。也可参见Eric Alterman，“AIPAC Runs Right，” *Nation* ，October 10，2006；Goldberg，“Old Friends”；Massing，“Conservative Jewish Groups”；Rosenthal，“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 p.217，以及Mark Seal，“Sitting on the Sidelines，” *Ha' aretz* ，December 24，2004.

[62] 具体地说，霍恩莱因多年担任为支持以色列定居点贝特·厄伊（Bet El）而募集资金的年度餐会的主席，该定居点位于拉马拉附近。参见Michael Massing，“Deal Breakers，” *American Prospect* ，March 11，2002，以及Michael Massing，“The Israel Lobby，” *Nation* ，June 10，2002。

[63] Massing，“Deal Breakers.”J.J.戈德堡提供了类似的分析，他写道：“根据（汤姆·）戴恩的说法，执政的执行委员规模扩大为三倍。以前，该委员会由以纽约为基础的犹太人组织那些负责人所控制。现在犹太人社会的领袖则是少数派，其人数被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自身的捐赠者所超过。执行委员会的膨胀……使得以色列游说集团不再是一个全国性的犹太人公共组织——而它以前却是如此的，并使之牢牢掌握在少数只忠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大捐赠者手中。” *Jewish Power* ，p.201.

[64] Michael Massing，“The Storm over the Israel Lobb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8，2006； Matthew Dorf，“After Barak Win，AIPAC Reverses Opposition to a Palestinian State，” *JTA.org* ，May 28，1999.

[65] 这段情节的叙述参见Goldberg，*Jewish Power* ，pp.54—57。

[66] Massing，“Deal Breakers”；and Levy，“Is It Good for the Jews？”

[67] Peter Beinart and Hanna Rosin，“AIPAC Unpacked，”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0，1993，pp.20—23； Goldberg，*Jewish Power*，pp.225—226.

[68] Waxman，“All in the Family，” pp.143—144.

[69] Jonathan Woocher，“The Geo-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unity，” *Jerusalem Letter/ Viewpoints*（online），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January 15，1992，3.

[70] Thomas L.Friedman，“Foreign Affairs：Mischief Makers，” *New York Times*，April 5，1995.

[71] 就像马辛所指出的那样，虽然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已“设法同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建立密切的联系，但是如果缺少正式的国会议员身份和强大的筹款机制，那么它就很难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影响力相匹敌。Massing，“Deal Breakers.”

[72] 有关新保守主义最优秀的作品包括Gary Dorrien，*The Neoconservative Mind*：*Politics*，*Culture*，*and the War of Ideolog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3）；Gary Dorrien，*Imperial Designs*：*Neoconservatism and the New Pax Americana*（New York：Routledge，2004）；John Ehrman，*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1945—1994*（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Murray Friedman，*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haping of Public Poli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Democracy*，*Power*，*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Mark Gerson，*The Neoconservative Vision*：*From the Cold Wars to the Culture Wars*（Lanham，MD：Madison Books，1996）；Goldberg，*Jewish Power*，pp.159—161；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America Alone*：*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以及Irving Kristol，*Neoconservatism*：*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New York：Free Press，1995）。

[73] 新保守派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概貌，参见John J.Mearsheimer，“Hans Morgenthau and the Iraq War：Realism Versus Neo-Conservatism，” posted May 19，2005，*opendemocracy.com*。新保守派对外政策作品的说明文集，参见*Present Dangers*：*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ed.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San Francisco：Encounter Books，2000）；对新保守派及其外交政策观点具有洞察力的描述，参见Ian Lustick，*Trapped in the War on Terro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chap.4。

[74] 新保守派关于多边主义和制度的典型的声明，参见Charles Krauthammer，“Democratic Realism：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 2004 Irving Kristol Lecture，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Washington，DC，February 10，2004，p.3。新保守派对欧洲观点的例证是Robert Kagan，*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New York：Knopf，2003）。

[75] 关于趋炎附势的讨论，参见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76] Max Boot，“What the Heck Is a ‘Neocon’？” *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 30，2002； Max Boot，“Think Again：Neocons，” *Foreign Policy 140*（January—February 2004），p.22.也可参见Don Atapattu，“Interview with Middle East Scholar Avi Shlaim，” *Nation*，June 16，2004；Halper and Clarke，*America Alone*，pp.41，58—60，82，167—168；Irving Kristol，“The Political Dilemma of American Jews，” *Commentary*，July 1984，pp.23—29，以及 Jim Lobe，“Energized Neocons Say Israel's Fight Is Washington's，” *Antiwar.com*，July 18，2006。

[77] Benjamin Ginsberg，*The Fatal Embrace*：*Jews and the Stat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231.

[78] “A Clean Break：A New Strategy for Securing the Realm，” prepared by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Studies，1996，登录www.iasps.org/strat1.htm。催生该报告的研究小组由理查德·珀尔主持，其他成员有詹姆斯·科尔伯特（James Colbert）、小查尔斯·费尔班克斯（Charles Fairbanks Jr.）、道格拉斯·费思、罗伯特·洛温伯格（Robert Loewenberg）、乔纳森·托罗普（Jonathan Torop）、戴维·乌姆瑟尔和梅拉夫·乌姆瑟尔。

[79] 引自Dorrien，*Neoconservative Mind*，p.344。也可参见ibid.，pp.343—345；Ginsberg，*Fatal Embrace*，pp.231—236，以及John B.Judis，“The Conservative Wars，” *New Republic*，August 11 and 18，1986。

[80] Patrick J.Buchanan，“Whose War？” *American Conservative*，March 24，2003； Paul Craig Roberts，“Neocon Treason，” *Antiwar.com*，August 24，2004.

[81] Friedman，*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i.盖尔·贝克尔曼（Gal Beckerman）指出：“承认新保守主义的犹太特性总是触发反犹主义的警告……但对此反犹主义的怀疑也有一些真实性。如果在美国有那么一场犹太人能够独自宣称是其发明的思想运动的话，那就是新保守主义。”参见“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 *Forward*，January 6，2006。

[82] Max Blumenthal，“Born-Agains for Sharon，” *Salon.com*，October 30，2004；Darrell L.Bock，“Some Christians See a ‘Road Map' to End Times，” *Los Angeles Times*，June 18，2003；Nathan Guttman，“Wiping Out Terror，Bringing on Redemption，” *Ha'aretz*，April 29，2002；Tom Hamburger and Jim VandeHei，“Chosen People：How Israel Became a Favorite Cause of Christian Right，” *Wall Street Journal*，May 23，2002，以及 Paul Nussbaum，“Israel Finds an Ally in American Evangelicals，” *Philadelphia Inquirer*

（online），November 13，2005。

[83] 关于基督教的信念如何影响了贝尔福，参见Anderson，*Biblical Interpretation*，pp.60—62。有些作者认为，基督教的信念还影响了威尔逊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以及杜鲁门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虽然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时代论者。Ibid.，pp.87—89；Grose，*Israel in the Mind of America*，pp.67—71.

[84] Timothy P.Weber，*On the Road to Armageddon*：*How Evangelicals Became Israel's Best Friend*（Grand Rapids，MI：Baker Academic，2004），pp.188—196.

[85] Weber，*On the Road to Armageddon*，p.184.就像科林·辛德勒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基督教右翼的增加因此同以色列右翼的增加平行发生——而六日战争则对这两种现象都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参见"Likud and the Christian Dispensationalists：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Israel Studies 5*，no.1（Spring 2000）：163。

[86] 就像L.纳尔逊·贝尔（L.Nelson Bell）在《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中所写的那样："2000多年来耶路撒冷首度完全控制在犹太人手中，使学习《圣经》的人欣喜若狂，并且使他们对《圣经》的精准怀有新的信念。"引自Weber，*On the Road to Armageddon*，p.184。

[87] 引自Jane Lampman，"Mixing Prophecy and Politic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uly 7，2004。

[88] Daniel Pipes，"[Christian Zionism]：Israel's Best Weapon，" *New York Post*（online），July 15，2003；Michael Freund，"Christian Zionists Key to Continued U.S.Support for Israel，" *Jewish Press*（online），December 27，2006.

[89] 哈吉的话引自Bill Berkowitz，"Pastor John Hagee Spearheads 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 *Media Transparency*，March 19，2006，登录www.mediatransparency.org/story.php？storyID＝116。

[90] 引用的声明来自国际基督徒和犹太人伙伴组织的网站，登录www.ifcj.org。

[91] "The Apple of HIS Eye：Why Christians SHOULD Support Israel，" 登录约翰·哈吉牧师网站www.jhm.org/print-Israel.asp，以及Andrew Higgins，"A Texas Preacher Leads Campaign to Let Israel Fight，"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27，2006。

[92] "Zion's Christian Soldiers，" *60 Minutes*，June 8，2003，登录www.cbsnews.com/stories/2002/10/03/60minutes/printable524268/shtml。

[93] 引自Lampman，"Mixing Prophecy and Politics"。

[94] Weber，*On the Road to Armageddon*，pp.226—227；Brent Boyer，"Arvada Church Champions Israeli Cause，" *Denver Post*（online），November 22，2002，以及Danielle Haas，"U.S.Christians Find Cause to Aid Israel；Evangelicals Financing Immigrants，Settlement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online），July 10，2002。

[95] Donald Wagner，"For Zion's Sake，"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 223（Summer 2002）：55.

[96] 引自Shindler，"Likud and the Christian Dispensationalists，" p.175。

[97] "Robertson：God Punished Sharon，" *Ynetnews.com*，January 6，2006；"Robertson Suggests Stroke Is Divine Rebuke，" *New York Times*，January 6，2006，以及 "Robertson Apologizes to Sharon Family，" *New York Times*，January 13，2006。

[98] 引自Barbara Slavin，"Don't Give Up 1967 Lands，DeLay Tells Israel Lobby，" *USA Today*，April 23，2002。

[99] 马修斯要求阿尔梅确认这是他的观点，而阿尔梅则说"是的"。在被批评支持在西岸地区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之后，阿尔梅后来放弃了自己的这一声明。参见Matthew Engel，"Senior Republican Calls on Israel to Expel West Bank Arabs，" *Guardian*，May 4，2002，以及"Richard Armey Supports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ians，" *Media Monitors Network*，May 2，2002，登录www.mediamonitors.net/amr115.html。

[100] 参议员英霍夫2002年3月4日的议会陈述发言"Peace in the Middle East，"登录http：//inhofe.senate.gov/pressapp/record.cfm？id＝183110。

[101] Shindler，"Likud and the Christian Dispensationalists，" p.156.

[102] Grace Halsell，*Prophecy and Politics*：*Militant Evangelists on the Road to Nuclear War*（Westport，CT：Lawrence Hill，1986），pp.71—76.

[103] "Pat Robertson Forms Alliance with Mayor of Jerusalem，" *Baptist Standard*（online），November 11，2002，以及 "Israel Welcomes Christian Support in Battle for Survival，Sharon Aid[e] Says，" *Christian Examiner*（online），September 6，2002。

[104] 引自Weber，*On the Road to Armageddon*，pp.214—218。

[105] 引自Norton Mezvinsky，“The Impact of Christian Zionism o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thPosition.com* ，March 2005。

[106] Jerry Falwell，“On the Threshold of Armageddon，” *WorldNetDaily.com* ，July 22，2006；Sarah Posner，“Lobbying for Armageddon，” *AlterNet.org* ，August 3，2006.

[107] 《以西节书》之36和37中以及《以赛亚书》（Isaiah）之66对以色列的复兴进行了预言。——译者注

[108] Hal Lindsey，“Mushrooms over the Middle East，” *WorldNetDaily.com* ，January 12，2007；John Hagee，*Jerusalem Countdown*：*A Warning to the World* （Lake Mary，FL：Frontline，2006），pp.17.基于他对《圣经》零散段落的解释，哈吉说打击伊朗将驱使俄国领导一个阿拉伯联盟对将被美国抛弃的以色列发动战争。虽然上帝届时将干预进来摧毁以色列的入侵者，但是随后出现的真空将被反基督教的“未来欧盟首领”填补。在欧盟领袖的命令下，西方军队在以色列集结，对“东方之王”（中国）发动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届时耶稣重新降临打败反基督者，并且恢复了上帝的王国。哈吉总结道：“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末日很快就要到来。”（pp.113—122）

[109] 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CUFI Membership Weekly Update，” December 11，2006，登录www.cufima.com/id10.html。

[110] Shindler，“Likud and the Dispensationalists，” pp.165—166； Kristol，“The Political Dilemma of American Jews.”

[111] 珀尔姆特的话引自Weber，*On the Road to Armageddon* ，p.232；福克斯曼的评论引自“Jews and Evangelicals：Support for Israel Isn't Everything，” *Time* ，January 16，2007。

[112] 引自Bill Broadway，“The Evangelical-Israeli Connection：Scripture Inspires Many Christians to Support Zionism Politically，Financially，” *Washington Post* ，March 27，2004。

[113] 关于哈吉对犹太人令人烦扰不安的态度，参见*Jerusalem Countdown* ，pp.56—57，109。关于他出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政策大会，参见Gregory Levey，“Inside America's Powerful Israel Lobby，” *Salon.com* ，March 16，2007；“Christians for Israel，” *Jerusalem Post*editorial，March 14，2007，以及Sarah Posner，“The Goy Who Cried Wolf，” *American Prospect* ，March 12，2007。

[114] 引自James D.Besser，“Hardline Pastor Gets Prime AIPAC Spot，” *Jewish Week* ，March 9，2007。

[115] Naomi M.Cohen，“Dual Loyalties：Zionism and Liberalism，” in Gal，*Envisioning Israel* ，p.326.

[116] Jo-Ann Mort，“An Unholy Alliance in Support of Israel，” *Los Angeles Times* ，May 19，2002.所引用的阿尔菲和戈伦伯格的话来自“Zion's Christian Soldiers”。也可参见 Gershom Gorenberg，*The End of Days*：*Fundament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Temple Mount* （New York：Free Press，2000），以及 Weber，*On the Road to Armageddon* ，p.231。

[117] 虽然在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爆发和“9·11”之后旅游业衰退了，但自那时以来已经开始反弹。联合国统计处估计，以色列2004年得到28亿美元的旅游收益；而以色列官方则报告说，大约29%的游客是基督徒。参见United Nations，*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Statistical Database and Yearbook 2005*（New York：United Nations，2005）；Eric Silver，“Return of the Tourist，” *Jerusalem Report* （online），February 21，2005；Laurie Copans，“Israel：Tourism Surges as Christian Pilgrims Walk in the Footsteps of Jesus，” *USA Today* ，December 13，2004，以及 William A.Orme，“Fighting in Mideast Blocks Wave of Christian Tourism，”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1，2000。

[118] Anderson，*Biblical Interpretation* ，p.103，p.138.尽管迈克尔·B.奥伦过分强调了时代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决定的影响，但是这也是他的作品*Power*，*Faith and Fantasy*：*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Norton，2007）一书的核心主题。

[119] Anderson，*Biblical Interpretation* ，pp.111，114—115； Ruth W.Mouly，*The Religious Right and Israel*：*The Politics of Armageddon* （Cambridge，MA：Political Research Associates，1985）.

[120] Zev Chafets，“The Rabbi Who Loved Evangelicals（and Vice Vers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24，2005.

[121] 2006年8月，派驻圣地的梵蒂冈公使与圣公会、福音派路德教和叙利亚东正教的主教们在耶路撒冷签署了一项声明，该声明拒绝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教义，并指责这一运动鼓励“种族排外和永久战争”。参见Matthew Tostevin，“Holy Land Churches Attack Christian Zionism，” Reuters，August 31，2006。其他许多主流的新教教会则批评以色列的政策，并已认真考虑从在以色列经营的公司中“选择性剥离”（selective divestiture）。然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却努力挫败这些努力，并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参见James D.Besser，“Church Poised to Kill Divestment，” *Jewish Week* ，June 23，2006；Alan Cooperman，“Israel Divestiture Spurs Clash，”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9，2004；Michael Conlon，“US Presbyterians Consider Divesting over West Bank，”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7，2005；Laurie Goodstein，“Presbyterians Revise Israel Investing Policy，” *New York Times* ，June 22，2006；Nathan Guttman，“A Warning Signal from the Churches，” *Ha'aretz* ，November 26，2004；Chris Moore，“Mainline Protestants Challenge Israel Lobby，” *Antiwar.com*

，December 7， 2004； Marc Perelman，“Effort Eyed to Combat Divestment，” *Forward* ，July 15， 2006，以及 Rachel Pomerance，“Episcopal View on Mideast Conflict an Improvement， Jewish Groups Say，” *JTA.org* ，November 9， 2004。

[122] 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之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给以色列的相对有限的捐赠，说明了它的有限财力的作用。根据以色列《国土报》的说法，基督教团体捐赠了近2 000万美元用于以色列的重建和安置；相比之下，美国犹太人社会募集到的捐赠款则超过3.4亿美元。参见Daphna Berman，“Christians' Wartime Donations of ＄20m Went Largely Unheralded，” *Ha'aretz* ，November 3， 2006。

[123] 关于美国政治中利益集团的作用，参见Frank R.Baumgartner and Beth L.Leech， *Basic Interests： The Importance of Groups in Politics and in Political 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Richard L.Hall and Frank W.Wayman，“Buying Time： Moneyed Interest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Bias in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no.3（September 1990）； John Mark Hansen， *Gaining Access： Congress and the Farm Lobby， 1919—198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Ken Kollman， *Outside Lobbying： Public Opinion and Interest Group Strateg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Richard A.Smith，“Interest Group Influence in the U.S.Congres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0* ， no.1（February， 1995）； David B.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Knopf， 1951），以及James Q.Wils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124] 引自Mary A.Barberis，“The Arab-Israeli Battle on Capitol Hill，”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52* ，no.2（Spring 1976）：209。

[125] Trice，“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pp.125—126.

[126] 引自Ben Bradlee Jr.，“Israel's Lobby，” *Boston Globe* ，April 29， 1984。

[127] Shai Feldman， *The Future of U.S.-Israeli Strategic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1996）， pp.5—6.

[128] 引自Grove，“On the March for Israel”。

[129] 所引用的巴德和杜鲁门的话来自Mitchell Bard，“The Israeli and Arab Lobbies，”登录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也可参见Mark N.Katz，“Where Is the Arab Lobby？” *Middle East Times* （online）， July 3， 2006； Noam N.Levey，“In Politicians' Pro Israel Din， Arab Americans Go Unheard，” *Los Angeles Times* ，July 23， 2006； Ali A.Mazrui，“Between the Crescent and the Star-Spangled Banner：American Muslims and U.S.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72* ， no.3（July 1996）； Nabeel A.Khoury，“The Arab Lobb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Middle East Journal 41* ， no.3（Summer 1987），以及 Andrea Barron，“Jewish and Arab Diaspora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Impact on U.S.Middle East Policy，” i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Two Decades of Change* ，ed.Yehuda Lukacs and Abdalla M.Battah（Boulder， CO：Westview， 1988）， pp.238—259。“巴勒斯坦游说集团”的弱小尤其在以下作品中得到表达：Nora Boustany，“Palestinians' Lone Hand in Washington，” *Washington Post* ，April 19， 2002，以及 George Gedda，“PLO Loses D.C.Office Because of Unpaid Rent，” *Chicago Tribune* ，April 12， 2002。

[130] Trice，“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p.123.

[131] 至于典型的例子，参见Harold Siddiqui，“ ‘Oil Lobby Determined to Have Its War’ in Iraq，” *Toronto Star* （online）， January 19， 2003，登录www.commondreams.org。

[132] Stephen Zunes，“The Israel Lobby： How Powerful Is It Really？”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Special Report* ，May 16， 2006； Noam Chomsky，“The Israel Lobby，” *Znet* （online）， March 28， 2006，以及Martin Peretz，“Oil and Vinegar，” *New Republic* ，March 30， 2006。

[133] 尤其可参见Craig Unger， *House of Bush， House of Saud： The Secre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s Two Most Powerful Dynasties* （New York： Scribner， 2004）。这个主题也是迈克尔·穆尔那部充满争议的纪录片《华氏911》的关键部分。

[134] 2006年，大约40%的美国原油进口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只提供14%的美国原油进口。U.S.Department of Energy， *Petroleum Supply Monthly*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007）， p.58.

[135] Bernard Gwertzman，“U.S.Said to Drop Jordan Arms Sale，”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84.

[136] 引自Congressional Quarterly， *The Middle East* ，p.68。

[137] Trice，“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pp.137—138.

[138] 参见www.api.org/policy。埃克森美孚和英国石油公司的网站上对外交政策的讨论都同样罕见。

[139] 引自Tivnan， *The Lobby* ，p.194。

[140] Trice，“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p.137； William B.Quandt，“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Constraints and Choices，” in *Political Dynamics in the Middle East*， ed.Paul Hammond and Sidney Alexander（New York： Elsevier， 1972）， pp.529—530.

[141] Danny Fortson， Andrew Murray-Watson， and Tim Webb，“Future of Iraq： The Spoilsof War，” *Independent* ， January 7， 2007.

[142] “Cheney Pushed for More Trade with Iran，” *FOXnews.com* ， October 9， 2004， 登录www.foxnews.com/story/0，2933，134836，00.html。

[143] Trice，“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pp.137—138.

[144] 这些所引用的内容来自Roger Hilsman， *The Politics of Policy Making in Defense and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Harper， 1971）， p.149； Bard，“Israeli and Arab Lobbies”，以及“Pro-Israel Lobby on Capitol Hill，” *BBC Newsnight* （online）， May 8， 2003，登录http：//news.bbc.co.uk/1/hi/programmes/ newsnight/3010371.stm。

[145] 谢菲尔写道：“在那些自由民主的制度中，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和挪威，犹太人能够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会以及后来的以色列保持公开深入的关系……这些犹太人社会中的某些部分……对东道国社会和政府展现了全部的忠诚……这些公开认定自己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巴勒斯坦（伊休夫）犹太人社会，以及后来的以色列的支持者，发展出了双重的忠诚。最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以色列的支持者采取的是忠诚分割（divided-loyalties）的立场，也即是说，某些方面他们忠于他们的所在国，而在其他方面则忠于他们的祖国。” *Diaspora Politics*： *At Home Abroa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32—233.

[146] Malcolm Hoenlein，“Crossing the Line of the Acceptable，” *Ha'aretz* ， December 31， 2004.

[147]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Muslims in Europe： Economic Worries Top Concerns About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y”（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July 6， 2006）， p.3.

[148] 引自David K.Shipler，“On Middle East Policy， a Major Influence，” *New York Times* ， July 6，1987。

[149] 引自Kurt Eichenwald，“U.S.Jews Split on Washington's Shift on Palestinian State，”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5， 2001。

[150] David S.Cloud and Helene Cooper，“Israel's Protests Are Said to Stall Gulf Arms Sale，” *New York Times* ， April 5， 2007.

[151]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Little， Brown， 1982）， p.203.

[152] 两段引言均来自Goldberg， *Jewish Power* ， pp.232， 235。

[153] Eric Alterman，“Can We Talk？” *Nation* ， April 21， 2003.

[154] Stephen Steinlight，“The Jewish Stake in America's Changing Demography： Reconsidering a Misguided Immigration Policy，” Backgrounder，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01， pp.10—11.关于对此观点更早而同样具有启迪作用的表达，参见Nathan Glazer，“McGovern and the Jews： A Debate，” *Commentary* ， September 1972， p.44。

[155] Samuel P.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04）， pp.276—291.

[156] 引自Massing，“Deal Breakers”。

[157] Hagee，“The Apple of HIS Eye”； Wagner，“For Zion's Sake，” p.56.也可参见 Lee Underwood，“Israel's Right to the Land，” January 4， 2004，登录http：//christianactionforisrael.org.right.html。

[158] 有关伦尼·本-戴维的信息，登录www.israelunitycoalition.org/sbureau/ lbendavid.php。

第五章 操纵政策过程

构成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团体和个人追求两个广泛的战略目标，以鼓励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第一，他们对华盛顿的决策过程施加重大的影响力。第二，这些组织花了相当的气力来确保有关以色列的公众话语是于己有利的，并确保这一话语符合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讨论过的战略理论和道德理论。我们在本章中要考察这两个战略目标中的第一个；而在第六章中则探究以色列游说集团为塑造公众话语所作的努力。

由于美国的政治权力分属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因此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战术有时候依据所涉及的政府机构而不同。除了帮助对己怀有同情的个人当选或获得关键位置的任命，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团体，还努力对那些可能希望自己的路线更加具有独立性计划的官员们的政治考虑施加影响。无论立法人员或者政策制定者的个人观点可能如何，以色列游说集团要的是使对以色列不加批评的支持成为“精明的”政治选择。简而言之，就像其他权力巨大的利益集团一样，以色列游说集团通过这些措施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对主要官员愿意考虑的政策加以制约；向这些官员施压以使他们采取自己宁愿避免——但却假装赞成——的措施；使美国领导人更难维持那些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团体所反对的倡议；塑造观点和规定选择，以便使许多关键领导人愿意赞成这些团体所支持的政策。[1]

在国会山发号施令

以色列游说集团有效性的一个关键支柱是它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与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不同，以色列在国会山几乎是免受批评的。这种情形本身就引人注目，因为国会经常处理的是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而且通常很容易找到相互竞争的观点。无论堕胎问题、军控问题、积极区别对待问题（affirmative action）、同性恋权利问题、环境问题、贸易政策问题、卫生保健问题、移民问题或者福利问题，在国会山的讨论几乎总是异常活跃的。但是在牵涉以色列的时候，可能的批评者却归于沉寂，而且几乎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辩论。

这种涉及以色列时缺乏严肃评议的现象，在2007年2月14日举行的有关以巴和平进程的一个听证会上得到了体现，该听证会由众议院的中东和南亚小组委员会举行。由于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想重新开启濒临死亡的和平进程，因此该小组委员会寻求三位证人的作证。尽管这三位证人在某些政策问题上存有分歧，但是他们三人在以色列游说

集团中都是中心角色：马丁·因迪克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前官员和美国驻以色列前大使，现在是布鲁金斯协会萨本中东政策中心的负责人；戴维·马科夫斯基（David Makovsky）是亲以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丹尼尔·派普斯是新保守派的专家，领导着右翼的中东论坛。听证会上没有让一个批评以色列的人——更不用说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或阿拉伯裔美国人——来提供选择性的观点，或者建议美国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M.J.罗森伯格（M.J.Rosenberg）曾经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工作过，现在是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这是一个积极支持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亲以色列温和团体——的一位核心人物，他对此很好地进行了概括，“这是一个有关冲突双方的听证会，而被允许说话的却只有一方”，他并且补充说，“任何观看国会禁止阿拉伯人观点的正式听证会的人不是为这种景象所伤害，就是为它所激怒。而且它伤害到美国的利益，还有以色列的利益”。[2]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国会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某些国会的关键议员曾经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如国会前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尔梅，他在2002年9月说道：“我最最优先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保护以色列。”虽然人们可能会认为，任何一位美国众议员首要的优先考虑是“保护美国”，但是那却不是阿尔梅所说到的东西。至于阿尔梅的继任者、国会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莫顿·克莱因则说：“他浑身浸透的是对以色列关心的元素。”迪莱自己则说他“打心眼里是一个以色列人”[3]。

另外还有那些犹太裔参议员和众议员，他们勠力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支持以色列的利益。事实上，2006年有创纪录数量的犹太裔美国人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这一事实凸显了他们在美国社会所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以及他们很高的公民事务参与度和政治参与传统。[4]这些立法人员有的是以色列热情的捍卫者，如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和参议员查尔斯·舒默、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Jerrold Nadler）、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以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罗伯特·维克斯勒（Robert Wexler）。[5]事实上，就在2006年的选举之后，瓦克斯曼曾说道：“在以色列的问题上……将会有一些民主党的（国会委员会）主席可能与我观点不一样。”然而，他明确地表示说：“他们将不担任处理以色列和中东问题委员会的主席。”[6]他所说的当然是对的，担任举行上述那个听证会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加里·阿克曼（Gary Ackerman）——另一位以色列的热心支持者；而担任规模更大的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则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这是一

个在国会山上致力于以色列利益方面无出其右的人。就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位前领导人所指出的那样，兰托斯“是一个以色列的真正支持者”[7][8]

但是，可能使立法朝亲以色列方向倾斜的不仅仅只有国会议员。国会工作人员在立法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因为他们给外面的利益集团进行登记注册，为他们的上司分析不同的政策选择。正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前负责人莫里斯·阿米塔伊曾经指出的那样：“在（国会）山上有许多这样工作层面的人……他们正好是犹太人，他们愿意……按照他们的犹太属性来看待某些问题……这些全都是在这些领域处于为他们效力的参议员谋划决策地位的人……你可以使很多很多事情在国会工作人员的层面就被搞定。”[9]正如在下面所讨论的那样，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团体的代表，有时候直接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以帮助国会山的工作人员进行立法起草的工作，为他们提供立法人员在公开场合的谈话要点，帮助立法人员撰写互致“亲爱的同事”信函来确定自己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以及起草和散发用于国会向行政部门施压的公开信。

在构成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所有团体中，对国会施加关键影响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两党的政治家们都普遍承认这一事实。[10]比尔·克林顿曾经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描述为“效率令人吃惊”和“在这个城市进行游说无出其右”的组织，而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则将它称为“在整个地球上……最有效率的综合性利益集团”。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雷德（Harry Reid）同意道：“我想不起在这个国家有哪个政策组织（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样）组织良好、受人尊敬。”《纽约客》杂志的杰弗里·戈德堡称之为“游说集团中的巨人利维坦”，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自己的网站则自豪地引用《纽约时报》的评估，说它是“影响美国同以色列关系最重要的组织”[11]。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它有能力对那些支持或不支持其议程的立法人员和国会议员候选人进行奖励或惩罚，其方式主要依靠的是它影响竞选资金的能力。金钱对美国选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赢得选举正变得日益昂贵，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则保证对其朋友的资金支持，只要他们不脱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路线即可。

这一过程以数种方式来进行。一开始，许多同样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提供资金的个人，通常是凭自身实力而成为重要的政治捐献人。通过使用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FEC）的数据，新闻记者迈克尔·马辛发现：“在1997

年至2001年期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董事会的46名成员所捐的竞选资金远远超过300万美元”，而且他们中许多人今天依然是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候选人慷慨的捐款人。[12]《华盛顿邮报》在2004年报道说：“自2000年以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每人给竞选活动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所捐赠的资金，平均达到7.2万美元。”[13]

第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帮助政治候选人同其他的捐赠人和资金来源取得联系。尽管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有此名称，但它却不是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不会正式支持候选人或者直接为他们的竞选出钱。相反，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对可能的候选人进行筛选，并安排他们与可能的捐款人和资金募集者会面，向数量不断增加的亲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信息。按照历史学家戴维·比阿勒（David Biale）的说法：“自六日战争以来，美国犹太人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已经发展成在美国国会中最复杂和最有效的游说集团之一。它部分地是通过拓展出一个犹太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全国性网络而进行的，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根据对以色列进行支持的标准来向国会议员候选人提供捐赠资金。”[14]就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弗里德曼（Howard Friedman）在2006年告诉该组织的成员所说的那样：“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同每一位竞选国会议员的候选人会晤。这些候选人收到有深度的简报，以帮助他们完全理解以色列的艰难处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东的复杂性。我们甚至要求每位候选人写出一份他们有关美以关系观点的‘意见书’，这样他们在这一主题上的立场就清清楚楚了。”[15]

弗里德曼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做法的描述，同来自其他政治人物的证言是相一致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竞选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席位的反战人士汤姆·海登（Tom Hayden），解释了为什么他赢得了当地权力掮客迈克尔·伯曼（Michael Berman）——长期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国会议员的霍华德·伯曼（Howard Berman）的兄弟——的支持，条件是他常常要做“以色列的好朋友”。赢得那次选举的海登指出，他“必须证明得到了‘犹太认证’（kosher），不是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证明者是精英人士，范围从犹太拉比教师和多种主流的犹太组织开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一个同以色列官方团体联系密切的团体……也担任重要的审查角色。当需要的时候，以色列大使、总领事们以及其他的官员，将介入到宣布某人为‘以色列的朋友’的声明中来”。有人可能会指出，虽然海登在那一职务上的能见度异乎寻常，但是海登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担任的只是州一级的职务。[16]

1990年在选举中败于来自俄勒冈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Mark Hatfield）的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朗斯代尔（Harry Lonsdale），以同样的口吻描述了他自己在竞选期间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造访。他写道："亲以这个词在那里传开，在竞选很早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发现自己应邀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总部进行'讨论'。这是我决不会忘记的一种经历。我光是亲以还不够。有人给了我一串话题，测试（按照格子阅览）我对每个话题的意见。事实上，我被告知我的意见必须是什么样子，并且精确到在公开场合我要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表达那些意见……就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那次碰面之后，有人邮寄了一份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人的名单给我……我免费打电话要求竞选捐赠。电话我打了；钱他们给了——从佛罗里达到阿拉斯加。"[17]

前爱达荷州州长约翰·V.埃文斯（John V.Evans）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故事是有关1986年他与时任爱达荷州的参议员斯蒂文·西姆斯（Steven Symms）进行竞争参议院席位的事情。根据埃文斯的说法，他拜访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总部，在那里他们"虽然不断地强调自己不是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但是他们指出，犹太人组织在美国全国各地都有它们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而且如果我们能够与它们联系的话，它们将能够帮助我们"。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说法，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引导埃文斯先生接触一系列被认为是独立的组织——它们中的许多是由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有联系的人员来管理的，那些组织为那场败给共和党参议员斯蒂文·西姆斯的竞选，给了他20.495万美元"[18]。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也对国会议员的投票记录进行跟踪，使它的会员能够得到这些记录，这样他们就能够决定支持哪些候选人或者政治行动委员会。[19]另一方面，被认为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候选人或在位的议员，能够预料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将会把竞选捐赠引导到他们的对手那边去。1988年《华盛顿邮报》获取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内部文件显示，该组织的政治副主任正积极地"试图帮助1986年参议院竞选中的数位候选人募集资金"，而《华尔街日报》则在1987年报道说："尽管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宣称没有卷入到政治花销当中，但是有不少于51个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由该机构的官员和在它的两个决策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来管理的，大多数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从犹太捐赠人那里得到金钱，并且以听起来模糊不清的名字来运作。"[20]尽管联邦竞选委员会后来裁决，没有"充分的证据"得出结论，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控制了亲以色列的那些政治行动委员会，但是人们相信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帮助引导捐赠资金的看法却依然广为流传。[21]老资格的外交官

戴维·纽瑟姆（David Newsom）在尼克松政府和卡特政府中分别担任过助理国务卿和副国务卿的职务，他报告说："当有一位著名的国会议员有次被问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立法机构拥有权力的原因时，他回答道：'金钱。就那么简单。'"[22]

政治反应中心（Th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RP）是一个跟踪竞选资金捐赠的非党派研究团体，它已经弄清楚了大约有36个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最近的选举中表现活跃。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这些团体给来自两党的候选人的资金超过了300万美元。[23]《经济学家》报道说，在1990年至2004年期间，亲以色列的团体给候选人和政党捐赠了大约5700万美元的资金，而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所捐赠的资金，只是略多于80万美元而已。[24]如果将个人给特定的候选人的捐赠同捐赠给全国性政党本身的捐赠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亲以色列的势力就控制了相当的选举影响力。根据政治反应中心的斯蒂文·魏斯（Steven Weiss）的说法："如果你是一名候选人，得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给你所贴的亲以色列标签的话，那么金钱就会开始从美国全国各地的捐赠人那里捐赠过来。"[25]

对这些策略所具有的力量几乎不存在什么怀疑。例如，2006年，在民主党的初选中败给内德·拉蒙特（Ned Lamont）之后，通过以独立候选人进行竞选的方式，从亲以色列的团体和个人那里捐赠过来的金钱，就帮助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保住了他的位置。利伯曼从24个不同的亲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那里得到了总共超过14.5万美元的资金，而这些团体中没有一个向拉蒙特伸出过援手。在同一年里，亲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的价值7.6万美元的捐赠，帮助谢尔顿·怀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战胜了在任参议员、来自罗德岛州的共和党人林肯·查菲（Lincoln Chaffee）——因为他长期以来被认为对以色列很冷淡。[26]其他从亲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中获益的人包括那些成功的候选人，如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罗伯特·梅嫩德斯（Robert Menendez）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人布拉德·埃尔斯沃思（Brad Ellsworth）。根据犹太电讯社（Jewish Telegraph Agency）的罗恩·坎皮斯（Ron Kampeas）的说法，给这些人（以及其他候选人）的金钱，是"由一个松散的捐赠人网络所募集的，他们中很多人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有联系"[27]。

当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及其相关的网络并不能够影响每一次选举，而且甚至来自亲以色列团体的巨额捐赠，既不能够帮助隆斯代尔或者埃文斯当选，也不能够阻止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

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以及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时任参议员的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分别在2004年和2006年的重新选举中落败。[28]但是在过去的30年之中，该机构在帮助过许多成功的候选人赢得他们的竞选时，也致使许多被认为对以色列不友善的人离职。例如，2002年，通过将竞选资金输送给对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帮助对手击败了来自佐治亚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辛西娅·麦金尼（Cynthia McKinney）。麦金尼在2004年回到了国会议员的职位上，但是却在2006年的重新选举中再次落败。她的获胜对手汉克·约翰逊（Hank Johnson）在2006年的民主党初选中，从7个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收到了至少3.4万美元的资金。[29]在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中，富裕的芝加哥商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前主席罗伯特·阿舍（Robert Asher）帮助招募和审查一位伊利诺伊州的律师理查德·杜尔宾（Richard Durbin），使其在1982年同在任的国会议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进行竞选。杜尔宾从未担任过公职，而就像阿舍后来回顾的那样："我调查过（杜尔宾的）观点……我们要肯定我们正支持的是一个不仅反对保罗·芬德利的人，而且是一个对以色列友好的人。在州内和州外犹太人的帮助下，他击败了芬德利。那么，犹太人的金钱是怎样相中他的呢？我环游全国谈论我们如何有机会击败一个对以色列不友善的人。而那些竞选之门就因此打开了。"[30]阿舍用信函向可能的捐款人募集资金，宣称这次选举是从国会清除一个"以色列最危险敌人"的"最好机会"，而最后杜尔宾从31个不同的亲以色列政治行动会员会那里，收到了总计104325美元的竞选资金。通过进行比较的方法得知，在1982年的选举中，其他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候选人从同样的这些团体收到的竞选资金，平均大约是3700美元。[31]杜尔宾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此前担任过11届国会议员的芬德利——芬德利后来赢得了参议院的选举，目前担任多数党的议员督导员。

2002年，"四人帮"——即指导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政策制定的富裕捐赠者的一个团伙——中的另一名成员迈耶·"布巴"·米切尔（Mayer "Bubba" Mitchell），用类似的策略使来自亚拉巴马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厄尔·希利亚德（Earl Hilliard）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就像杜尔宾一样，希利亚德的对手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全国各地的支持者那里得到资金帮助。根据《纽约客》的杰弗里·戈德堡的说法，阿舍后来说他曾"问过布巴在（希利亚德的对手）获胜后的感受，而他则说道：'就像杜尔宾当选时你的感受一样'"[32]。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击败其他许多所持立场与它不同的政治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仅举几个例子，这些政治家包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皮特·麦克罗斯基（Pete McCloskey）、来自亚利桑

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和来自艾奥瓦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杰普森（Roger Jepson）。杰普森的例子尤其具有启迪作用：在他屈从于罗纳德·里根总统1981年的请求，同意将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卖给沙特阿拉伯之后，他就成为了被锁定的目标。在1984年的参议院选举中，他的对手、民主党人汤姆·哈尔金（Tom Harkin）从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收到了超过10万美元的金钱，而杰普森则丢掉了他的职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后来评论道，在“关于”中东问题的“投票方面”，杰普森的命运“已经将几分恐怖注入了参议员们的内心”。[33]

另外一个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选举能力的例子，涉及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前参议员阿德莱·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他在1982年竞选伊利诺伊州的州长职位。他首先在1980年同亲以色列的团体发生冲突，当时他向参议院提交了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如果以色列不停止修建定居点的话，就减少对它的外援。虽然斯蒂文森知道该修正案决不会获得通过，但是他想显示，即使以色列以同美国官方政策相反的方式行事，他的同事们也将支持以色列。这一法案被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只获得了7张支持票。该修正案的一位心不甘情不愿的反对者、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昆廷·伯迪克（Quentin Burdick）告诉这位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说：“抱歉，阿德莱，但是我要准备重新选举获得提名。”当斯蒂文森两年后竞选州长的时候，他很快发现，竞选资金开始枯竭，而且事实上在流向他的对手。根据这位前参议员的说法，他和他的妻子“被斥责为反犹分子。有人在媒体上对他充满敌意。犹太人民主党委员会的成员在压力下畏缩不前。犹太朋友和支持者也遭到斥责”。斯蒂文森以微弱劣势落败，而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屡次三番地使那次选举结果变得不同。”[34]

或许付出代价——这一代价落到了一位反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家头上——最著名的例子，是1984年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珀西（Charles Percy）的落败。尽管珀西有着总体上亲以色列的投票记录，但是由于拒绝签署由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所发起的“76人信函”——该信函抗议福特总统威胁要“重新评估”美国1975年的中东政策，珀西因此招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怒火。由于他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要比其他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更加“温和”，他因此也犯下了一个错误。在1984年的初选和决选中，珀西的对手都从那些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那里收到大笔的金钱；而一位来自另一个州（加利福尼亚州）的商人迈克尔·戈兰德（Michael Goland），则在伊利诺伊州花上110万美元来做

反对珀西的广告。戈兰德后来在1986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选举中被证明犯有进行非法竞选捐赠的罪行。[35]就像汤姆·戴恩在珀西以微弱劣势落败后所夸耀的那样："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美国所有的犹太人都集中力量来将珀西赶下台。而美国的政治家们——那些位列公职或渴望位列公职的政治家——则得到了这个信息。"[36]尽管戴恩的说法夸张，但是这些例子中的基本教训却难以忽略。就像《前沿》周报的编辑J.J.戈德堡在2002年所说的那样："在国会中存在这样一种印象，即你不要同这些人作对，否则他们会把你弄下台。"[37]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集中关注的，不仅仅是让对以色列友善的候选人当选。他们在使对以色列持批评意见的政治家转化为以色列坚定的支持者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前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在他大部分的生涯中，都是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一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这也意味着它反对给予以色列大量的援助。然而，1984年赫尔姆斯却处于一场艰难（而昂贵）的参议员重新选举战之中，对手是颇受欢迎的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由于感觉到有机会使一个强有力的敌手遭受重创，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使大量的竞选资金流向亨特——他差一点点就赢得了胜利。赫尔姆斯得到了这一信息：第二年他去了一趟以色列，拍了一张头戴（犹太男子所戴的）圆顶小帽、亲吻哭墙（the Western Wall）的照片。这一趟以色列之行还为他的办公室挂上了一张这位参议员同阿里埃勒·沙龙合影的照片。更加重要的是，赫尔姆斯成为了以色列的有力支持者，直到他2002年退休为止。[38]

人们也看到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的类似变化。她在1998年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及在1999年公开拥抱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妻子苏哈·阿拉法特（Suha Arafat）的行为，激起了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团体的强烈批评。一旦她自己成为公职的竞选者，克林顿即成为以色列的热心捍卫者，而且她现在得到亲以色列的组织和个人的坚强支持，包括财政支持。2006年7月，希拉里在一个亲以色列的集会上出现，并表示强烈支持以色列发动的那场对黎巴嫩的高度毁灭性战争之后，立场强硬的"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的执行主任海伦·弗里德曼（Helen Freedman）即宣称："我认为她所作的评论非常好，特别是根据她的历史情况来说更是如此，而且我们忘不了她对苏哈的亲吻。"[39]亲以色列的政治委员会为克林顿2006年再次竞选参议员捐赠了3万美元，而且《前沿》周报在2007年1月报道说，克林顿"被预期在2008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将得到犹太人社会大量政治捐赠中的最大份额"[40]。

如果选举压力和劝说都不奏效的话，人们知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

务委员会将威胁那些似乎不愿意跟随其领导的政治家。[41]例如在2006年，虽然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贝蒂·麦科勒姆（Betty McCollum）是一位有着坚定亲以投票记录的自由派，然而她却反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所支持的《巴勒斯坦人反恐法案》（Palestinian Anti-Terrorism Act）。该法案寻求在哈马斯赢得选举之后对巴勒斯坦当局实施严厉的制裁，它受到了美国国务院、天主教主教团，以及像“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那样的亲以色列团体的反对。然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却告诉麦科勒姆的办公室主任说，这位国会议员“对恐怖分子的支持将不会被容忍的”，这一威胁导致麦科勒姆要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霍华德·科尔（Howard Kohr）进行道歉，并且禁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代表进入她的办公室。[42]

这一基本信息很清楚：任何反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参议员或众议员都是在玩火。尽管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努力几乎很难说是这些被击败的候选人所要面对的挑战，并最终失去选举的唯一原因——例如广为公开化的辛西娅·麦金尼与国会山一位保安之间的冲突也损害到她的选举前景，林肯·查菲则由于2006年的反共和党情绪而面临一场困难的战斗，但是它影响政治家们选举前景的能力却是众所周知的。就像1991年的一个国会消息来源所指出的那样：“投以色列的反对票已经变得像在华盛顿州投票反对伐木一样了，只不过与华盛顿州不同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全国做这件事情。”[43]而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前主任莫里斯·阿米塔伊——他后来担任该机构的财务官——在2002年能够说“如今每个人似乎都非常地好”的原因；这也是吉米·卡特2007年2月说下面这番话的原因。卡特说：“我目前看不到任何这样的前景，即任何美国国会议员，无论是众议院议员或者参议院议员，会说出‘让我们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采取平衡立场、并谈出一个和平协议吧’这样的话来。”他继续说道：“对于任何想寻求连任的国会议员来说，采取一种可能被解读为反对保守的以色列政府的政策立场……在政治上就无异于自杀。”[44]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权势，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的年度政策会议已经成为著名政治家们的专场演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2007年度政策会议的发言者包括副总统迪克·切尼、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雷德（Harry Reid）、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内尔（Mitch McConnell）、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前一年的发言人则包括切尼、博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波尔顿、来自缅因州的共

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Evan Bayh）、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伊·布伦特（Roy Blunt）、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谢利·伯克利（Shelley Berkley）、来自亚拉巴马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阿瑟·戴维斯（Arthur Davis）、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比尔·帕斯克莱尔（Bill Pascrell）、众议员罗伯特·维克斯勒，以及前参议员、有望竞逐总统的约翰·爱德华兹。其他年份的发言者曾包括小布什总统、国务卿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康多莉扎·赖斯，前众议院议长、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丹尼斯·哈斯特尔特（Dennis Hastert）和纽特·金里奇，前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尔梅，以及一群亲以色列的著名专家。很难想到有任何其他游说组织受到两党政治家们如此竭尽全力的奉承。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影响选举的能力，有助于确保以色列每年得到慷慨的援助，使得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即使是对以色列的作为发出温和的批评也是危险的。但是这一组织在国会山的影响力甚至走得更远。各种类型的游说团体不仅仅只是通过直接的劝说和利用竞选捐赠来获得施加影响的能力，而且还通过向对己持同情态度的立法人员提供“立法补贴”，通过向过度辛劳的工作人员提供对问题分析和制定立法框架的直接帮助，通过提供向选举人演讲的发言要点来施加影响。[45]不仅每位国会议员都能够收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两周一次的《近东报道》新闻稿，而且当以色列问题出现的时候，它的工作人员还能够向国会议员的工作人员提供帮助。根据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一位前工作人员道格拉斯·布鲁姆菲尔德（Douglas Bloomfield）的说法：“当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需要情报的时候，在打电话给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处’、委员会工作人员或行政部门的专家之前，他们普遍地首先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求助。”他指出，更加重要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被“经常要求起草发言稿、进行立法准备工作、提供策略建议、进行研究工作、认定共同的发起人和汇集选票。”[46]换言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相当高的频率，亲自直接介入到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之中，就像我们在第二部分中将更为详细地探讨的那样。

为了促成一项协议，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姐妹机构美国以色列教育基金会（American Israel Education Foundation，AIEF）为国会议员到以色列的免费旅游提供资金。这些免费公费旅游不仅擦亮了立法人员亲以色列的信任状和促进其资金募集，而且使他或者她直接接触到以色列领导人的政策偏好和基本的世界观。这种情形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约有10%的国会海外旅行都是到以色列的原因，尽管以色列只是世界上差不多200个国家中的一个而已。公众诚

实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报告说，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以色列教育基金会为这些访问花费了大约100万美元。并不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的犹太人游说团体卖力——而且成功——地游说，以确保在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和汤姆·迪莱的丑闻发生之后，不会妨碍到这些访问。[47]

再次强调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即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活动同其他游说团体的活动是类似的，并且与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利益集团传统是相一致的。斯蒂芬·艾萨克斯（Stephen Isaacs）在他的《犹太人与美国政治》研究中，是这样来描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莫里斯·阿米塔伊的："重要的是……所有的都是恰如其分的……你利用传统的民主策略……信函、打电话。"[48]

这些影响国会的传统策略，也使得以色列游说集团在行政部门采取被认为不符合以色列利益政策的时候，能够向行政部门施压。当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总统或内阁成员有可能收到一封来自众议员或参议员，或者国会两院议员们签署的具有打击力的信函，就像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在1975年威胁要对美以关系进行重新评估时发生的情况那样。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4月收到一封类似的信函，当时他寻求对以色列进行暂时的施压，要求它结束对被占领土大规模的侵略。每封信上这些"一边倒"的签名者的百分比，雄辩地证明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扭转乾坤的能力。就像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伊努耶（Daniel Inouye）在1975年签署给福特的信函之后所评论的那样："在一封信函上签名比回复5 000封信函要更加容易。"或者就像来自艾奥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卡尔弗（John Culver）后来承认的那样："压力真的太大了。我投降了。"[49]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通过2007年3月对中东的访问寻求重启和平进程的时候，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就在动身之前，赖斯收到了一封由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发起的有79名参议员签署的信函，敦促她在巴勒斯坦新的"团结政府"在承认以色列、谴责恐怖活动并同意遵守以巴之间的那些协议之前，避免与之进行接触。[50]无怪乎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要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汤姆·戴恩说："戴恩，我之所以应付你，是因为你有能力伤害我。"[51]

归根结底，将自己宣传为"美国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国会几乎拥有不受挑战的地位。[52]美国政府三大部门之一的国会，对以色列支持的承诺坚定不移。有关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公开辩论在那里并未发生，尽管那一政策对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就像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Ernest Hollings）在2004年就要卸任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

里，除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所给的对以色列政策之外，别无其他的对以色列政策。”[53]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参议员在1991年告诉《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说：“我的同事们认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组织，它冷酷无情、机警活跃。有80%的议员对某些投票翻白眼。虽然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并不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为什么要为一种他们肯定会被推翻的情形进行战斗呢？”[54]

不足为奇的是，有一次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对美国听众说：“当人们问我如何对以色列进行帮助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帮助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吧。”他的继任者埃胡德·奥尔默特对此表示同意，并评论说：“感谢上帝我们有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个组织，它是我们在整个世界上最大的支持者和最伟大的朋友。”[55]

亲以色列总统的形成

无论是通过影响国会还是以更加直接的方式进行影响，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也对行政部门起到施加重要影响的作用。美国的总统们对压力并不像国会那样敏感，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所采取的立场不时遭到以色列或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反对。但是这样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稀少了，即使以色列的战略价值已经下降了，即使以色列的某些行为——例如不断对被占领土进行殖民化的努力——与美国所声明的政策相左。

以色列游说集团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力，部分源于犹太裔选民在总统选举中的影响力。尽管他们的人口数量很小——不到美国人口的3%，但是美国犹太人对两党的候选人进行大量的竞选资金捐赠。就像总统顾问、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写给吉米·卡特总统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之中所说的那样：“无论哪里有主要的政治资金募集，总会发现美国犹太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56]事实上，《华盛顿邮报》曾估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从私人募集的资金有高达60%依靠其犹太支持者来提供”[57]。虽然其他的估计比这要低，但是从犹太裔美国人那里来的捐赠，构成了给民主党及其总统候选人捐赠当中的一大部分——20%至50%之间。[58]当然，虽然以色列并不是促使这些捐赠的唯一问题，但是被认为对以色列持敌视（甚或冷漠）态度，则要冒这些资金跑到其对手那边的风险。

进而言之，犹太选民的投票率很高，而且集中在像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伊利诺伊、新泽西、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关键州里面——这增加了他们在决定谁能成为总统中的分量。虽然他们依然喜欢

民主党，但是他们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例如，1960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得到了82%的犹太人选票，但是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在1972年却只得到了64%的犹太人选票，而吉米·卡特在1980年得到的犹太人选票则仅仅只有42%。因此，在旗鼓相当的选举中，所谓的犹太人选票能够改变关键州中的平衡。当耶路撒冷公共事务研究中心（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的杰弗里·赫尔姆雷奇（Jeffrey Helmreich）写下像下面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只是稍稍有点夸张而已："美国犹太人选票保持全国大选结果决定性因素的可能性……美国犹太人通过他们高度集中在关键州里，通过他们摇摆不定的投票方式倾向——这使得他们与美国政治中的几乎所有其他团体都不同，来行使自己的权力。"[59]由于犹太人在旗鼓相当的选举中的重要性，因此那些总统候选人竭尽全力地争取他们的支持。事实上，2007年《耶路撒冷邮报》上的一则故事，将这种讨好犹太支持者的努力，称之为"在华盛顿像樱桃花绽放一样可靠的习惯仪式"[60]。那些候选人尤其渴望吸引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中其他组织的注意——而且不仅仅是吸引作为一个集团的犹太选民的注意，因为他们知道，得到这些著名组织的支持标记，将促进他们的资金募集，鼓励代表他们的更高投票率出现。

获得并维持那种支持意味着要彻底地支持以色列，这就是为什么像约翰·爱德华兹、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和约翰·麦凯恩这样的总统候选人，都对2007年的贺兹利亚会议（Herzliya conference）——由鹰派的政策与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and Strategy）组织的以色列年度安全会议——发表强调自己亲以色列的演讲的原因。他们要避免2004年总统竞选中降临在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身上的命运，当时他犯下了一个错误，即建议美国应该在阿以冲突中扮演更加"平衡的角色"。作为回应，迪安的一位争取提名的竞选对手约瑟夫·利伯曼，指责他出卖以色列，并给他的声明贴上"不负责任"的标签。[61]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几乎所有的众议院民主党高层都在一封给迪安的具有打击力的批评信函上签了名，而且《芝加哥犹太人星报》（*Chicago Jewish Star*）报道说："匿名的攻击者……正在全国各地使犹太领袖的电子信箱收件箱被塞爆，警告说——但没有许多证据——不知何故对以色列来说迪安将是糟糕的选择。"[62]

这种忧虑是荒诞的，因为迪安事实上是一名毫不掩饰的以色列支持者。[63]担任他竞选共同主席的，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前主席史蒂文·格罗斯曼（Steven Grossman）；而且迪安说，他自己有关中东的观点现在更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所反映的观点接近，而不是与立场更加温和的"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的观点更接

近。进而言之，迪安的妻子是犹太人，而且他的孩子们也是作为犹太人抚养的。迪安并不是在质疑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他只是建议，为了“使（阿以）双方走到一起”，华盛顿应该充当一个诚实的中间人。虽然这并非激进的想法，但是当涉及阿以冲突问题的时候，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团体并不欢迎这种平衡的想法。当然，虽然迪安没能够赢得民主党提名有众多原因，但是这一事件凸显了在总统竞选期间如果不尽力表现得亲以色列的可能代价。

使行政部门步调一致

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组织也直接将目标针对掌握权力的行政部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主要使命，就是在行政部门以国会反对的方式行事的时候，向行政部门施压，就像它曾经向这几位总统施压的那样：向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施压，因为他威胁说要重新评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向老布什总统施压，因为他在1992年暂时停止了对以色列的借款保证；向小布什总统施压，因为他紧接着在“9·11”事件之后呼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但是甚至还有一种塑造美国行政部门政策更加明显的方式：当那些与其观点相同的个人在行政部门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时候，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目标就能够达到。例如，在1992年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中，有位纽约商人海姆·卡茨（Haim Katz）以可能捐赠人的身份打电话给亲以色列的候选人的时候，对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戴维·斯坦纳（David Steiner）的一次电话进行了秘密录音。除了描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如何在竞选资金上直接帮助友好的政治家之外，斯坦纳还告诉卡茨说，他曾私下里为了一笔30亿美元的对以色列的外援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会面“达成协议”，外加“一笔人们甚至都不知道的10亿美元的其他奖励”。更有甚者，他告诉卡茨说：“我们在（克林顿的）竞选中，在他的竞选总部有十几个人……而他们都将得到重要职位。”虽然在卡茨将之公之于众之后，斯坦纳被迫辞职，而且他后来说，他向卡茨所陈述的事情并不是真的，但是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来怀疑他所作评论的推动力。[64]毕竟，难道任何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不是都希望与其观点相同的个人在行政部门中得到关键的任命吗？事实上，许多其他的游说集团也完全是那样做的。例如，前内政部部长盖尔·诺顿（Gale Norton）和副部长J.史蒂文·格里勒斯（J.Steven Griles）在布什政府中得到任命之前，曾分别是为石油业或矿产业进行游说的说客，而丹尼尔·A.特洛伊（Daniel A.Troy）在2001年被任命为美国食品与药品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首席法律顾问之前，则是一名经常代表烟草和药品公司的律师。[65]

以色列游说集团并无不同之处。就像我们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克林顿政府中东政策的制定，大大受到那些同以色列有联系的官员或那些著名的亲以色列组织的影响。就此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两个人，一个是前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副研究主任、亲以色列的“华盛顿近东研究所”共同创办人因迪克——他曾在克林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供职，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995—1997年， 2000—2001年）、助理国务卿（1997—2000年）；另一个是丹尼斯·罗斯，他担任克林顿的中东特使，在2001年离开政府后进入华盛顿近东研究所任职。[66]他们是2001年7月戴维营首脑会议克林顿总统最密切的顾问中的其中两人。

虽然因迪克和罗斯两人都支持奥斯陆和平进程，赞成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导致了强硬派谴责他们不公平地背叛了以色列，但他们只是在以色列领导人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才这样做的。[67]就像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戴维营，美国代表团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那里接受了大部分的提示，事先同以色列协调谈判立场，并没有针对平息冲突提出美国的独立建议。即便是2000年12月提出的“克林顿参数”，也更多地是克林顿对谈判立场的归纳，以及他对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谈判空间的评估，而较少地是美国的独立建议。巴勒斯坦谈判人员抱怨说，以色列人有时会向他们提出一个具体建议，而随后美国人给出的也是同样的想法，只有美国人会将之标榜为“弥合分歧的建议”。就像美国谈判团队的另一名成员后来所承认的那样，以色列人的建议经常是“作为美国的概念提交给（巴勒斯坦人）的，而不是以色列人的概念”，这种诡计谁也糊弄不了的，且加深了巴勒斯坦人的怀疑。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巴勒斯坦的谈判代表抗议说，他们“正与两个以色列团队进行谈判——一个团队展示的是以色列国旗，另一个团队展示的是美国国旗”[68]。

问题不在于像因迪克或罗斯这样的人，是不是以他们认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在行事的尽心尽力的公务员——他们肯定是这样的人。相反，问题是他们对以色列所持有的众所周知的同情，是否使得行政部门在谈判期间的运作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使得美国政府更加不倾向于对以色列政府施加影响，从而减少了确保和平协议的机会。我们相信，这种情形妨碍了整个的奥斯陆和平进程，包括无果而终的戴维营首脑峰会。

在第二届小布什政府中，这一问题甚至更加明显，里面的各阶级官员包括那些坚定的亲以色列新保守派，如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约翰·博尔顿、道格拉斯·费思、阿隆·弗里德伯格、约翰·汉纳（John Hannah）、I.刘易斯·利比、威廉·卢提（William Luti）、理查德·珀

尔、保罗·沃尔福威茨和戴维·乌姆瑟尔等。就像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所见到的那样，这些官员坚持不断地推动受到以色列赞成和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关键组织所支持的政策。况且，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也试图确保那些被视为对以色列持批评意见的人得不到重要的外交政策职位。1987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前负责人汤姆·戴恩告诉一位采访者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正在帮助审查总统的顾问人员。他说道："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1988年的）一位总统候选人打电话给我们说：'我将立即公开宣布，我将有兴趣雇用某某人担任一个高级竞选职位。告诉我你们对他是怎样看的。'"戴恩说他的回答是，对那个人他"竖起了大拇指"，但其他人却没这么幸运。[69]虽然吉米·卡特想要使乔治·鲍尔（George Ball）担任他的首位国务卿，但是他知道鲍尔被视为以色列的批评者，而且以色列游说集团会反对这一任命。[70]类似地，在1995年被雇用为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首席撰稿人的哈佛大学讲师理查德·马留斯（Richard Marius）曾说道，由于《新共和》杂志的发行人马丁·佩雷兹——他是戈尔的本科生导师和心腹——不实地指称马留斯是一个反犹分子，因此在他履新之前就被解雇了。而这一指称是基于马留斯1992年在《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上发表的一篇书评。[71]

数年之后的2001年，当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中东问题的职位时，《新共和》杂志报道说，国防部曾"阻止了里德尔指定的继任者、中东问题专家阿丽娜·罗曼诺夫斯基（Alina Romanowski）的任命，因为五角大楼的官员怀疑她并不充分支持这个犹太国家"[72]。代而被任命担任该职务的是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此人此前在"伊朗门"事务期间，曾被宣判犯有阻止从国会获得信息的罪行。艾布拉姆斯对以色列几乎谈不上什么客观性，因为他此前在1997年的一本书中写道："毫无疑问，为了忠实于上帝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协议，犹太人要与他们所生活其间的国家不同。犹太人的本质就是与世界其他的人——除了在以色列——不同。"[73]这一评论不同寻常，因为它出自一位在美国政府中的中东政策问题上占据至关重要职位的人之口。内森·格特曼（Nathan Guttman）在《国土报》上写道："对于以色列政府来说"，对他的任命是"上天赐予的礼物"。[74]

结论

就像其他的外交政策利益集团一样，以色列游说集团通过各种渠道来寻求影响美国政府。它这样做时的处境要比其他利益集团好得多，这就是它的努力为什么如此奏效的一个原因。但是以色列游说集

团并不仅限于在华盛顿圈内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它还努力塑造有关以色列和中东的公共话语，结果是美国公众普遍支持亲以色列的方向，对于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是非曲直不加质疑。这第二个战略正是下一章的主题。

---

[1] 20年前，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告诉《纽约时报》的戴维·希普勒（David Shipler）说，以色列游说集团“往往误解了所考虑的问题……人们对一些选项并不十分注意”。另一位前里根政府的白宫官员评论说，虽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一个因素”，但是他知道，“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它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至少在分析阶段”。可是这位官员却承认，用希普勒的话来说，“更大的影响力似乎是在政治层面和决策层面”。参见David K.Shipler，“On Middle East Policy， a Major Influence，” *New York Times*， July 6， 1987。

[2] M.J.Rosenberg，“Kangaroo Congressional Hearing，” *Weekly Opinion Column*， Issue #311， Israel Policy Forum，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6， 2007.也可参见Michael F.Brown，“Dems' Disdain for Palestine，” *TomPaine.com*， February 20， 2007，以及Daniel Levy，“Yikes—Warmonger Daniel Pipes Testifying to Congress—Do They Learn Nothing？” February 12， 2007，登录www.tpmcafe.com。

[3] 阿尔梅的话引自Jake Tapper，“Questions for Dick Armey： Retiring， Not Sh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 2002；克莱因的话引自Ron Kampeas，“On Somber Day， DeLay's Spirits Raised by Pro-Israeli Group's Support，” *JTA.org*， October 2， 2005；迪莱的话引自James Bennet，“DeLay Says Palestinians Bear Burden for Achieving Peace，” *New York Times*， July 30， 2003。

[4] 2006年的国会选举之后，100名参议员中有13名是犹太人，435名众议员中有30名是犹太人，比例远远高于犹太人在美国人口中3%左右的比例。Amiram Barkat，“Number of Jewish Parliamentarians Worldwide Reaches Record High，” *Ha'aretz*， November 9， 2006。

[5] Joseph Lieberman，“Speech to the AIPAC National Policy Conference，” March 2007，登录http：//lieberman.senate.gov/newsroom/release.cfm？id＝270526； Charles Schumer，“The Peace Process Has Been One-Sided”（interview）， *Middle East Quarterly 7*， no.4（December 2000）； Henry Waxman，“Israel Fights for Survival，” *Beverly Hills Weekly* （online）， April 19， 2002，以及Robert Wexler，“Israel and the Middle East，”登录http：//wexler.house.gov/issues.php？ID＝19。

[6] 引自Matthew E.Berger，“US Vote May Alter Stance on Middle East，”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7， 2006。

[7] 引自Janine Zacharia，“Lantos's List，” *Jerusalem Post*， April 13， 2001。也可参见Jeffrey Blankfort，“A Tale of Two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the Capitol Hill Police，” *CounterPunch.org*， April 17， 2006，以及Mark Simon，“Middle East Hits Home in House Rac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nline）， May 16， 2002。

[8] 之所以将Lantos “is true blue and white”一句翻译成兰托斯“是一个以色列的真正支持者”，是因为以色列的国旗颜色是由蓝、白两色所组成的。——译者注。

[9] 引自Mitchell Bard，“Israeli Lobby Power，” Midstream *33*， no.1（January 1987）：8。

[10] 关于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结构和运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该分析对此处提供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参见Michael Massing，“The Storm over the Israel Lobb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8， 2006。也可参见Paul Findley， *They Dare to Speak Out*：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Confront Israel's Lobby*， 3rd ed.（Chicago：Lawrence Hill， 2003），以及Michael Lind，“The Israel Lobby，” *Prospect 73*（April 2002）。

[11] 所引用的克林顿、金里奇、雷德和《纽约时报》的话，可进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网站，登录www.aipac.org/documents/whoweare.html#say， on January 14， 2005。 2007年5月，所引用的《纽约时报》的话还能在上述网站上找到；所引用的上述其他人的话则已被该网站撤下。Jeffrey Goldberg，“Real Insiders，” *New Yorker*， July 4， 2005.所引用的金里奇的声明也可参见Michael Kinsley，“J'accuse， Sort of，” *Slate.com*， March 12， 2003。

[12] Michael Massing，“Deal Breakers，” *American Prospect*， March 11， 2002，以及Massing，“Storm over the Israel Lobby.”

[13] 同一篇文章还指出，每5名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当中，就有1名是2004年总统候选人克里和乔治·W.布什的顶级资金募集人。Thomas B.Edsall and Molly Moore，“Pro-Israel Lobby Has Strong Voic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5， 2004.

[14] David Biale，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in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6）， pp.186—187.

[15] 弗里德曼的声明包含在一封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会员的信函中，该信函祝贺会员们在2006年的黎

巴嫩战争中成功帮助维持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引自John Walsh，“AIPAC Congratulates Itself on the Slaughter in Lebanon，” *CounterPunch.org*， August 16， 2006。这项政策成为标准的运作程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1987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负责人汤姆·戴恩告诉支持者说：“在1985年至1986年的竞选活动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要求其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与除1人之外的每一名打算重新参选的参议员会见，另外还要同49名竞逐参议员席位的人和205名竞逐众议员席位的人会见，其中包括任何一名新的竞逐者。”引自Robert Pear and Richard L.Berke，“Pro-Israel Group Exerts Quiet Might as It Rallies Supporters in Congress，” *New York Times*， July 7， 1987。

[16] 海登还说道，他甘愿为以色列1982年入侵黎巴嫩进行辩护，是“我在政治生涯中所犯下的错误”。Tom Hayden，“Things Come' Round in Mideast，” *truthdig.com*， July 18， 2006.

[17] 哈里·隆斯代尔与本书两位作者2006年5月16日的私人通信。哈里还指出道：“参议员哈特菲尔德所花费的竞选费依然超过了我，而我则败选了。”这一结果证明了这种显而易见的观点，即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并非在每次选举中都成功。

[18] 埃文斯的话引自John J.Fialka，“Linked Donations？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from Pro-Israel PACs Suggest Coordina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4， 1987。

[19] Goldberg，“Real Insiders.”

[20] Charles R.Babcock，“Papers Link Pro-Israel Lobby to Political Funding Effort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4， 1988，以及Fialka，“Political Contributions from Pro-Israel PACs”。

[21] 关于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裁决，参见John J.Fialka，“Pro-Israel Lobbying Group Is Accused of Breaking U.S.Campaign-Funds Law，”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3， 1989，以及Charles R.Babcock，“FEC Rules Pro-Israel Lobby， PACs Are Not ‘Affiliated，’”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2， 1990。

[22] David D.Newsom，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87.

[23] “Pro-Israel Contributions to Federal Candidates， 2005—2006，”登录www.opensecrets.org/pacs/industry.asp？txt＝Q05&cycle＝20006。

[24] Lexington，“Taming Leviathan，” *Economist*， March 15， 2007； 也可参见Kelley Beaucar Vlahos，“Pro-Israel Lobby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FOXnews.com*， May 28， 2002； Massing，“Deal Breakers”，以及Massing，“Storm over the Israel Lobby”。

[25] 引自Vlahos，“Pro-Israel Lobby”。

[26] 这些数字只包括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赠，而不包括个人捐赠。计算出自政治反应中心的网站，登录www.opensecrets.org。

[27] Ron Kampeas，“Pro-Israel Political Funds in U.S.Target Friendly Incumbents—and Challengers，” *JTA.org*， October 3， 2006.

[28] Janet McMahon，“Record Pro-Israel PAC Contributions Failed to Save Senate Minority Leader Tom Daschle's Seat，”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online）， July 2005.

[29] Jonathan Allen，“McKinney Opponent Rakes in Pro-Israel Cash，” *The Hill*， August 2， 2006，登录www.hillnews.com。根据政治反应中心的说法，麦金尼在其初选中大约花了36.5万美元，而胜选者汉克·约翰逊则在初选中总共花了80万美元。也可参见David Firestone，“A Nation Challenged： The Lawmaker； Call to Study U.S.Stance on Mideast Draws Ang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8， 2001； Nathan Guttman，“Lobbying for the Pro-Israel Candidates，” *Ha'aretz*， July 7， 2004；“Mideast Fuels 2 Democratic Primaries，” *Washington Post*， June 6， 2002，以及Jonathan Weisman，“House Incumbents McKinney， Schwarz Fall in Primarie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9， 2006。

[30] Goldberg，“Real Insiders.”

[31] John J.Fialka，“Pro-Israel Politics： Jewish Groups Increase Campaign Donations， Target Them Precisely，”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 1983，以及Richard H.Curtiss， *Stealth PACs： How Israel's American Lobby Seeks to Control U.S.Middle East Policy*， 4th ed.（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al Trust， 1996）， p.47.

[32] Goldberg，“Real Insiders.” 也可参见David M.Halbfinger，“Generational Battle Turns Nasty in Alabama Primary，” *New York Times*， June 3， 2002； Tom Hamburger，“Mideast Haunts Alabama Rac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31， 2002；“Money from Supporters of Israel Played Role in Alabama Upset，” *New York Times*， June 27， 2002； Juliet Eilperin，“Davis Ousts Rep.Hilliard in Alabama Runoff，” *Washington Post*， June 26， 2002，以及Benjamin Soskis，“Pro-Israel Lobby Backing Challenger in Alabama Race，” *Forward*， May 10， 2002。

[33] 引自Edward Walsh，“Jewish PACs Flex Muscle： On Hill， Being Viewed as Anti-Israel Can Be Risky，” *Washington Post*， May 10， 1986， Curtiss， *Stealth PACs*， pp.65—66。关于这些案例的另外细节，参见Findley， *They Dare to Speak Out*， chap.3。

[34] Adlai Stevenson III，“The Black Book，”日期不定的未出版书稿；以及与本书两位作者2007年3月22日的私人通信。

[35] “Californian Spent ＄1.1 Million on Illinois Rac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1985； Richard L.Berke， “Cranston Backer Guilty in Campaign Finance Case，” *New York Times*， May 8， 1990，以及Tom Tugend，“Israel Financial Backer Convicted on U.S.Election Law Charges，” *Jerusalem Post*， May 7， 1990.

[36] 引自Edward Tivnan， *The Lobby*： *Jewish Political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p.191。本段落中的细节来自Ibid.， pp.189—191。也可参见Charles R.Babcock，“Pro-Israel Political Activists Enforce ‘Percy Factor，’” *Washington Post*， August 7， 1986。

[37] 引自John Diamond and Brianna B.Piec，“Pro-Israel Groups Intensify Political Front in U.S.，” *Chicago Tribune*， April 16， 2002。

[38] Lucille Barnes，“Retiring Sen.Jesse Helms Caved to Pro-Israel Lobby Halfway Through His Career，”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March 2002， p.34； Tom Hamburger and Jim VandeHei，“Chosen People： How Israel Became a Favorite Cause of Christian Right，”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3， 2002.

[39] 所引用的弗里德曼的话参见Patrick Healy，“Clinton Vows to Back Israel in Latest Mideast Conflict，” *New York Times*， July 18， 2006。也可参见Adam Dickter，“Hillary： ‘I Had a Lot to Prove，’” *Jewish Week*， November 18， 2005； Joshua Frank，“Hillary Clinton and the Israel Lobby，” *Antiwar.com*， January 23， 2007； Rachel Z.Friedman，“Senator Israel，” *National Review Online*， May 25， 2005； Ron Kampeas，“Candidates for 2008 Courting Jewish Support，” *Jerusalem Post*， January 24， 2007； E.J.Kessler，“Hillary the Favorite in Race for Jewish Do nations，” *Forward*， January 26， 2007，以及Kristen Lombardi，“Hillary Calls Israel a ‘Beacon’ of Democracy，” *Village Voice* （online）， December 11， 2005。

[40] Kessler，“Hillary the Favorite in Race for Jewish Donations”；竞选资金数据来自政治反应中心，登录www.opensecrets.org。

[41] 有时候，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的亲以色列团体，仅仅只是鼓励潜在的敌人保持沉默而已，就像他们在2002年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竞选时对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所做的那样。苏努努有两项负资产：他是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后裔，而且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某些团体认为他的投票记录并不那么明朗。全国犹太人民主理事会（National Jewish Democratic Council）发表一份新闻稿说，他在同以色列有关问题上的投票记录“以一种最不坦率的方式而表现突出”，而且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清楚表明他是主要目标，因而派遣以色列前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去为苏努努的主要对手进行竞选。根据共和党犹太人联盟执行主任的说法，苏努努以“一份令人鼓舞的意见书”进行回应，因为该意见书强调了他对维持以色列军事优势的承诺。胜选之后，苏努努对以色列2006年夏天在黎巴嫩的轰炸行动的反应是保持缄默。参见National Jewish Democratic Council，“John Sununu： A Singular Voting Record，” press release， October 28， 2002； Matthew E.Berger，“New Republican Congress Retains Pro-Israel Bent，” *JTA.org*， November 8， 2002。另外的背景资料，参见Franklin Foer，“Foreign Aid： A Middle East Proxy War in New Hampshire，” *New Republic*， November 26， 2001； Ralph Z.Hallow，“Pro-Israel Lobby Looks for Deal with Sununu，”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4， 2002，以及Ori Nir，“Despite Hype， Israel Lobby Sits Out Tight New Hampshire Race，” *Forward*， November 8， 2002。

[42] “A Letter to AIPAC，”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8， 2006.

[43] 引自George D.Moffett III，“Israeli Lobby Virtually Unmatche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8， 1991。

[44] 所引用的阿米塔伊的话参见Berger，“New Republican Congress”； 所引用的卡特的话参见Yitzhak Benhorin，“Balanced Stand on ME Is Political Suicide， Says Carter，” *Ynetnews.com*， February 26， 2007。

[45] Richard L.Hall and Alan V.Deardorff，“Lobbying as Legislative Subsi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 no.1（February 2006）.

[46] 引自Camille Mansour， *Beyond Alliance*： *Israel in U.S.Foreign Policy*， trans.James A.Cohe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42.

[47] Jonathan Weisman and Jeffrey H.Birnbaum，“Senate Passes Ethics Packag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9， 2007； Nathan Guttman，“Jewish Groups to Challenge Ethics Reform，” *Forward*， December 1， 2006； Jim Abourezk，“The Hidden Cost of Free Congressional Trips to Israe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26， 2007，以及the AIEF entry at 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登录www.publicintegrity.org。

[48] Stephen Isaacs， *Jews and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1974）， pp.255—257.

[49] 引自Seth P.Tillma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ests and Obstacl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67。

[50] 致赖斯信函的文本登录www.aipac.org/Publications/SourceMaterials CongressionalAction/Nelson-Ensign-Letter-FINAL.pdf。也可参见Nathan Guttmann，“AIPAC Urges U.S.to End Contacts with Palestinian Authority，” *Forward*， March 14， 2007。

[51] 引自Lloyd Grove，“On the March for Israel； The Lobbyists from AIPAC， Girding for Battl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1991。

[52] 虽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已能够利用其政治力量以避免注册登记为另一个政府的代理者，但是由于拉里·富兰克林的间谍丑闻，故而它现在特别关心这个问题，而因此它正相当竭力地强调其“属于美国这边”。参见Ron Kampeas，“New Ruling in AIPAC Case Raises Questions about ‘Foreign Agents，’” *JTA.org*， August 23，2006； Ori Nir，“Leaders Fear Probe Will Force Pro-Israel Lobby to File as ‘Foreign Agent，’” *Forward*，December 31， 2004，以及Ori Nir，“Leaders Stress American Side of AIPAC，” *Forward*， May 27， 2005。

[53] “Sen.Hollings Floor Statement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on His Mideast Newspaper Column，” May 20， 2004， 虽然该文最初贴在这位前参议员的网页上（现已删除），但是依然可以登录www.shalomctr.org/node/620。

[54] 引自Grove，“On the March for Israel”。

[55] 沙龙的评论发表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于2003年8月29日至9月11日在《芝加哥犹太人星报》上所做的广告中；奥尔默特的声明引自“To Israel with Love，” *Economist*， August 5， 2006。

[56] 乔丹写道：“民主党全国财务委员会的125名成员中，70多人是犹太人；1976年，超过60%的民主党大捐助者是犹太人；1972年尼克松所募集的资金超过60%是来自犹太捐助者；汉弗莱1968年竞选所募集的资金超过75%是来自犹太捐助者； ‘铲子’·杰克逊在民主党初选时所募集的资金超过90%是来自犹太捐助者；尽管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你当选希望很小，并且来自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社会规模较小的地区，但是我们初选资金的大约35%是来自犹太支持者。” Hamilton Jordan， Confidential File， Box 34， File“Foreign Policy/Domestic Politics Memo，HJ Memo， 6/77，” Atlanta， Carter Library， declassified June 12， 1990.

[57] Thomas B.Edsall and Alan Cooperman，“GOP Uses Remarks to Court Jews，” *Washington Post*， March 13， 2003.也可参见James D.Besser， “Jews' Primary Role Expanding，” *Jewish Week*， January 23， 2004；Alexander Bolton，“Jewish Defections Irk Democrats，” *The Hill* （online）， March 30， 2004，以及E.J.Kessler，“Ancient Woes Resurfacing as Dean Eyes Top Dem Post，” *Forward*， January 28， 2005。

[58] Isaacs， *Jews and American Politics*， pp.115—139； Amy Keller，“Chasing Jewish Dollars： Can GOP Narrow Money Gap in 2004？” *Atlanta Jewish Times* （online）， January 17， 2003，以及Kessler，“Hillary the Favorite in Race for Jewish Donations”。

[59] Jeffrey S.Helmreich，“The Israel Swing Factor： How the American Jewish Vote Influences U.S.Elections，” *Jerusalem Letter/Viewpoints* （online）446（ January 15， 2001）：1.

[60] Kampeas，“Candidates for 2008.”

[61] E.J.Kessler，“Lieberman and Dean Spar over Israel，” *Forward*， September 12， 2003； Stephen Zunes，“Attacks on Dean Expose Democrats' Shift to the Right，” *Tikkun.org*， November/December 2003.

[62] Zunes，“Attacks on Dean”； and James D.Besser，“Dean's Jewish Problem，” *Chicago Jewish Star*，December 19， 2003-January 8， 2004.

[63] E.J.Kessler，“Dean Plans to Visit Israel， Political Baggage in Tow，” *Forward*， July 8， 2005；Zunes，“Attacks on Dean.”

[64] 斯坦纳-卡茨对话的副本可登录www.wrmea.com/backissues/1292/9212013.html。也可参见Thomas L.Friedman，“Pro-Israel Lobbyist Quits over Audio-taped Boast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1992，以及“Israeli Lobby President Resigns over Promises； Bragged to Contributor About Lies to Clinton，” *Washington Times*， November 4， 1992。

[65] John Heilprin，“Ex-Deputy Pleads Guilty in Abramoff Case，” *Boston Globe*， March 23， 2007；Stacey Schultz，“Mr.Outside Moves Inside，” *U.S.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16， 2003.

[66] Laura Blumenfeld，“Three Peace Suits； For These Passionate American Diplomats， a Middle East Settlement Is the Goal of a Lifetim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4， 1997； Clayton E.Swisher， *The Truth About Camp David*： *The Untold Story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4）， pp.35—38， 183—187.在对罗斯叙述有关中东和平进程失败的作品《错失的和平》进行评论时，以色列历史学家阿维·施莱姆把克林顿团队描绘成美国历史上“最热忱的亲以色列”政府之一，并且说“很难想到比丹尼斯·罗斯在心态上更典型地把以色列放在首位的美国官员”。Avi Shlaim，“The Lost Steps，” *Nation*， August 30， 2004.也可参见Michael C.Desch，“The Peace That Failed，” *American Conservative*， November 8， 2004；Jerome Slater，“The Missing Pieces in The Missing Peace，” *Tikkun.org*， May 2005。

[67] 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Samuel Berger）报告说，在戴维营谈判期间的某个时刻（2000

年7月），丹尼斯·罗斯曾评论道：“如果巴拉克给出的更多，我将反对这项协议。”未编辑过的手稿“Comments by Sandy Berger at the Launch of How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Negotiate（USIP Press， 2005），” U.S.Institute of Peace， Washington， DC， June 7， 2005，登录www.usip.org/events/2005/0607-beberger.pdf。

[68] 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The Tragedy of Error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9，2001.巴勒斯坦人的抱怨引自Blumenfeld，“Three Peace Suits”。

[69] David K.Shipler，“On Middle East Policy， a Major Influence，” *New York Times*， July 6， 1987.

[70] Douglas Brinkley，“The Lives They Lived； Out of the Loop，”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29， 2002.

[71] 当然，马留斯并不是一个反犹分子。他只是在有关评论中写道：“（这本书的）有关以色列秘密警察辛贝特残忍行为的叙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区盖世太保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 Lloyd Grove，“The Outspoken Speechwriter； Gore Reverses Hiring Decision After Review Critical of Israel，” *Washington Post*，July 19， 1995，以及Richard Marius，“Al Gore and Me， or How Marty Peretz Saved Me from Packing My Bags for Washingto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5*， no.2（Winter 1996）： 54—59。

[72] Lawrence Kaplan，“Torpedo Boat： How Bush Turned on Arafat，” *New Republic*， February 18，2002.

[73] Elliott Abrams， *Faith or Fear*： *How Jews Can Survive in a Christia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p.181.

[74] Nathan Guttmann，“From Clemency to a Senior Post，” *Ha'aretz*， December 16， 2002.

第六章 控制公共话语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中心关注之一，就是保证有关以色列的公共话语，对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剖析的那些战略理论和道德理论进行随声附和。通过不断地重申以色列的战略价值，通过对有关以色列及其成立的片面叙述，通过在政策辩论中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辩护，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各种团体做到了这一点。目标是使公众相信，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和价值是相同的。与此同时，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企图使任何对以色列政策进行批评的人或挑战这一美以“特殊关系”的人边缘化，并且企图在公共领域中阻止人们公平地听到那个人的观点。为做到这一点，以色列游说集团有时候使用严厉的策略——指责批评者反以色列或反犹——来使批评者三缄其口。按照亲以色列的方向来引导公共话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政策、以色列的历史，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制定美国中东政策中的作用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就可能容易导致更多的美国人质疑现行的对以政策，并呼吁建立一种更加有效地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美以关系。

相应地，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成员努力在媒体、思想库和学术界影响有关以色列的话语，因为这些机构是塑造大众舆论的关键。他们加大努力以正面的方式来描述以色列，并且相当程度地将任何质疑以色列过去和现在行为的批评者，或者试图对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价值产生怀疑的人边缘化。亲以色列的力量完全明白，控制有关这个犹太国家的讨论对他们的议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虽然这些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但是它们的效果却依然引人注目。

媒体即使命

维持公众对以色列正面态度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要保证主流媒体有关以色列和中东的报道总是有利于以色列，不会使人以任何方式质疑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虽然对以色列的严肃批评偶尔会在全美国进入大量观众、听众的视野，但美国媒体有关以色列的报道总是强烈地偏向以色列，特别是在把它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新闻报道进行比较时更是如此。

这一主张可能听起来有点像过去的反犹主义的责难——“犹太人控制媒体”。但这决不是反犹主义的主张。毫无疑问，有些犹太裔美国人，如马丁·佩雷斯和摩提默尔·祖克曼（Mortimer Zuckerman），利用他们在媒体中担任的职务来推广他们有关以色列和中东的观点。

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并不令人惊奇，就像所有的精英总是利用他们的优势地位来推进他们的各种利益一样。然而，进而言之，在主流媒体中，当然有些媒体拥有者、出版商、编辑人员、专栏作家和记者对以色列并无特殊感情，并且因批评以色列的政策以及美以关系而感到高兴。甚至肯定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个人，他们虽然可能强烈地亲以色列，但是却欢迎有关那个国家的话语更加公开、开放。

因此，认为犹太人或亲以色列的力量“控制”媒体，以及他们所说的有关以色列的事情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是应该反对的。事实上，以色列游说集团如此卖力地操控和影响主流媒体谈及以色列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以色列游说集团没有控制它们。如果按照媒体自己的设计，它们就不会如此一以贯之地提供亲以色列的报道和评论。相反，媒体上将会存在有关这个犹太国家以及美国对其政策更加开放和生动的讨论，就像在世界上几乎每个民主国家都存在的那样。事实上，这种讨论在以色列本国尤其生动活泼，而以色列是有关犹太人确实“控制媒体”的国家。

以色列游说集团有关以色列的观点之所以在主流媒体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部分是因为大量写作有关以色列的美国评论者本身是亲以色列的。在1976年的一次有关国内利益集团与美国中东政策的比较中，罗伯特·H.特赖斯发现：“在1966年至1974年期间，亲阿拉伯团体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之一，是他们不能够得到任何最知名的全国性联合专栏作家的支持。”特赖斯还发现：“亲以色列团体不仅能够依靠来自全国性专栏作家的媒体支持，而且还能够依靠来自一些美国阅读量最大的报纸媒体的支持。”亲以色列的团体比亲阿拉伯的团体在塑造媒体的报道内容方面更加积极；例如在1970年，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将宣传资料袋——连同照片和特写——派发给1 700多家报纸以及那些主要的通讯社。用特赖斯的话来说：“几乎在每个层面的媒体组织——从地方性的社区、联合专栏作家和主要的全国性报纸，到向这个国家提供信息的国际新闻社，亲以色列团体在使他们一方的故事传达给能说会道的公众和一般公众方面，都要比亲阿拉伯的团体做得成功。”[1]

打那以来，事情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媒体批评家埃里克·阿特曼在2002年写道，中东问题专家们之间的辩论，由“那些难以想象会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人所控制”。他列举了56位“专栏作家和评论家，他们可以被指望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相反，阿特曼确定只有5位专家一贯批评以色列的行为或者支持亲阿拉伯的立场。[2]虽然有些读者随后对阿特曼一些编码归类的少量例子提出了挑战，并且他列举的那些人当中现在有些已经亡故了，但是它们之间在比例上依然极为悬殊，而

那些挑战并没有削弱他的中心主张的可信度。[3]

看看那些近年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中东进行报道的专栏作家吧。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和已故的A.M.罗森塔尔（A.M.Rosenthal）都是以色列的热情捍卫者——而就萨菲尔的情况而言，他尤其对阿里埃勒·沙龙赞许有加；今天，戴维·布鲁克斯坚持不懈地捍卫以色列的立场。托马斯·L.弗里德曼虽然比较温和，他曾经对以色列的某些政策——偶尔还有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进行过批评，但是他却几乎从未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或者提倡美国应该同以色列保持距离。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Kristof）经常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进行批评，在2007年3月写了一篇有争议性的专栏文章，对美国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缺乏严肃的公开讨论进行谴责。但是中东并不是他评论内容中的常见主题，并且他当然没有采取亲巴勒斯坦的立场。[4]莫琳·多德（Maureen Dowd）虽然对亲以色列的新保守派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但是她却像克里斯托夫一样，很少撰写关于这个犹太国家或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文章。在《纽约时报》固定的专栏作家名录中，没有一个人是巴勒斯坦人坚定的捍卫者，甚至也没有一个人像前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他在2001年退休了——那样做到不偏不倚。

至于《华盛顿邮报》，近些年里曾有数位专栏作家坚定地支持以色列：他们是吉姆·霍格兰（Jim Hoagland）、罗伯特·卡根、查尔斯·克劳萨默和乔治·威尔（George Will）。它过去的专栏作家常常以另外两人为主角：已过世的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后者经营着《旗帜周刊》，在《纽约时报》上开辟了一个专栏。这些人不仅是坚定的亲以色列者，而且他们总是赞成鹰派的利库德党，而非以色列温和派的思想和政策。虽然理查德·科恩也为《华盛顿邮报》撰写关于中东的文章，但是他与《纽约时报》的弗里德曼的姿态相同：虽然使自己站在以色列的一边，但是却愿意提供有条件而聪明的批评。在这两份据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日报中，没有一家雇用坚决支持阿拉伯或巴勒斯坦一方的全职评论员。

在近年里，唯一经常批评以色列的著名专栏作家是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其专栏通过《芝加哥太阳报》得以发表，定期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面。然而，诺瓦克却几乎谈不上是巴勒斯坦事业的拥护者。就此而言，事实乃是，无论是在《纽约时报》还是《华盛顿邮报》，或者在任何其他主要的美国报纸，“另外一方”都没有与萨菲和克劳萨默，甚或弗里德曼和科恩旗鼓相当的人物。例如，《洛杉矶时报》定期发表三位坚定捍卫以色列的社论版专栏作家的文章，这三位专栏作家是：马克斯·布特、江奈森·蔡特（Jonathan Chait）和

杰弗里·戈德堡。《洛杉矶时报》所雇用的专栏作家没有一位是批评以色列的，更不用说有任何人来一以贯之地为捍卫巴勒斯坦人而反对以色列人。

虽然这些报纸偶尔安排发表挑战以色列政策，但却不代表报纸立场的社论版观点，但是舆论上的平衡则有利于以色列。在美国，不存在可与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和帕特立克·希尔（Patrick Seale）相比的评论员，他们经常定期在英国报纸上发表尖锐批评以色列的文章；也不存在像阿米拉·哈斯（Amira Hass）、阿基瓦·埃尔达尔（Akiva Eldar）、吉迪恩·利维（Gideon Levy）和布拉德利·伯斯顿（Bradley Burston）那样的以色列评论家，他们都对自己国家所追求的某些政策进行公开批评。此处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这些个人总是对的而亲以色列的评论家总是错的，而在于像他们那样的声音在美国的主要报纸上几乎完全没有。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这种亲以色列的偏见也反映在报纸的社论中。已故的《华尔街日报》编辑罗伯特·巴特利曾评论说："沙米尔、沙龙、比比——无论这些伙计需要什么，就我而言都是大捧特捧的东西。"[5]《华尔街日报》与其他著名报纸——如《芝加哥太阳报》、《纽约太阳报》、《华盛顿时报》——一样，定期登出读起来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撰写的社论。出于信用考虑，《纽约时报》的社论有时候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批评，并且近年来批评的措辞偶尔显得强硬。《纽约时报》承认，巴勒斯坦人有着合理、合法的冤情，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家园。然而，多年来，《纽约时报》对待双方并没有一碗水端平。[6]《纽约时报》前执行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自己的亲以色列态度对他选择社论的影响："我对以色列的忠诚，要比自己敢于声明的要强烈得多……受到我对以色列的了解和在那里所拥有的友谊的强化，我自己撰写我们的大部分中东评论。就像更多的阿拉伯而非犹太读者所认可的那样，我是从亲以色列的角度来撰写这些评论的。"[7]

像《评论》、《新共和》和《旗帜周刊》这样的杂志，也经常积极地捍卫以色列。事实上，《评论》杂志的前编辑诺曼·波多雷茨曾经在耶路撒冷一个记者集会上说："在犹太和普通的出版物上写文章的那些犹太人的作用就是要捍卫以色列，而不是加入到攻击以色列的行列之中。"[8]长期担任《新共和》杂志编辑的马丁·佩雷茨曾宣称道，"我恋上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并且承认道，他的杂志"存在一种以色列的政党路线"。[9]

虽然媒体有关以色列的新闻事件报道，要比它们的社论评论更少具有偏向性，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多数记者都努力做到客观，但同样也

是因为如果不承认以色列的实际行为，报道被占领土或南黎巴嫩的事件就是困难的。但是，为了打消对以色列的不利报道，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团体依然组织写信运动、示威，以及抵制那些他们认为反以色列的新闻发布。就像《前沿》杂志在2002年4月所报道的那样，“在媒体中发现那些被认为是反以色列的偏见，已经成了许多美国犹太人关乎那场6 000英里之外冲突最直接和最易动感情的发泄机会”[10]。有线电视新闻网一位行政主管曾说道，他有时候在一天当中收到6000封电子邮件，抱怨说一篇报道是反以色列的，而像《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迈阿密先驱报》、《纽约时报》、《费城问询者报》和《华盛顿邮报》那样的报纸，则曾因其有关中东的报道而面临顾客的抵制。[11]有位通信记者告诉新闻记者迈克尔·马辛说，那些报纸“害怕”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及其他的亲以色列团体，并且说“来自这些团体的压力是不留情面的。编辑们宁愿不去碰他们”[12]。就像以色列驻纽约领馆前发言人梅纳谢姆·谢勒夫（Menachem Shalev）曾经指出的那样：“当然，许多的自我审查在继续。新闻记者、编辑和政治家们如果知道将在几小时里面接到数以千计的愤怒的电话，那么他们就要三思而后行才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犹太游说集团拿手的就是组织压力活动。”[13]

美国的犹太出版物也不能免受压力的影响。例如，1989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媒体主任托比·德肖维茨（Toby Dershowitz），就曾要求《华盛顿犹太人星期周报》（*Washington Jewish Week*）的编辑安德鲁·卡洛尔（Andrew Carroll）不要委派记者拉里·科勒（Larry Cohler）开展一项有关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而进行的专题特写工作，因为科勒早先的报道——该报道对以色列有点持批评态度——被认为是“不准确的”。当科勒到底得到那项委派的时候，德肖维茨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律师戴维·伊夫欣（David Ifshin）打电话给卡洛尔。伊夫欣说，如果科勒继续接受这项委派，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将“以着眼诉讼”的方式来重新审查他早先的报道。虽然这种向卡洛尔进行不太精明的施压企图并未成功，但是在1991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外交政策主任史蒂芬·罗森，却给《华盛顿犹太人星期周报》的数位董事寄去了一份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内部备忘录，认为卡洛尔对政治左翼太过于同情，“试图打倒有组织的犹太人社会”。1992年4月，一位没有报纸专业经历的新编辑受雇取代卡洛尔，这位编辑3个月之后辞职，取代他的则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时事通讯《近东报道》的前编辑。[14]

以色列游说集团最具能量的媒体监督团体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一个团体——是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Committee for

Accuracy in Middle East Reporting in America， CAMERA）。它尤其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网进行了批评，并称其为“全国巴勒斯坦广播网”。[15]除了保留一个使该广播网被声称的媒体偏见例子的曝光网址外，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还于2003年5月在33个城市的全国公共广播网播放台的外面组织示威活动，它还试图说服捐赠者撤回对全国公共广播网的支持，直到其中东报道对以色列持更加同情的立场为止。据报道，由于它的这些努力，波士顿的公共广播电台之一WBUR失去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捐赠。2006年，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在《纽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上刊登整版广告，批评吉米·卡特的《巴勒斯坦：要和平而非种族隔离》一书，广告内容包括发行商的电话号码，并鼓励读者打电话进行抱怨。[16]

对全国公共广播网另外的压力来自以色列在国会的朋友。例如，在2003年3月，一群国会议员——位列其中的包括以色列的坚定捍卫者，如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汤姆·兰托斯、布拉德·谢尔曼（Brad Sherman）和亨利·韦克斯曼，他们写信给全国公共广播网总裁凯文·克罗斯（Kevin Klose），要求对它的中东报道进行内部审核。虽然克罗斯拒绝了，但是他也开始出去同各种犹太人团体进行接触，以努力扭转这种压力。[17]

以色列游说集团获得于己有利的报道也以其他的形式呈现。例如，在2003年8月，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如何谈论以色列》。他的明显观点是，在美国有时候很难“批判性和不带感情地”谈论以色列；并且指出：“即便对以色列或者犹太复国主义的合法批评，也经常被各种各样的监察人员谴责为反犹主义。”作为回应，那时的《耶路撒冷邮报》编辑、现在的《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和编委成员布赖特·斯蒂芬斯，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了一封措词辛辣的公开信，信的一开始就责问布鲁玛说：“您是一个犹太人吗？”两个段落过后，斯蒂芬斯宣称：“对我重要的是您说‘我是个犹太人。’”为什么这一点重要呢？因为在斯蒂芬斯看来，“一个人，至少必须是犹太人，必须告诉非犹太人他们如何可以或不可以谈论以色列”。简而言之，这封引人注目的信意味着非犹太人应该只能以犹太人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谈论这一主题。[18]这一敏感性也可解释，为什么《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会要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其所撰写的、为我们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最初那篇文章进行辩护的社评文章中，把自己看作一个犹太人。[19]

毫无疑问，虽然斯蒂芬斯的观点对许多人而言是令人厌恶的——包括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但是这种事实却依然存在着，即一些以色列

游说集团中的著名人物对于自由公开地讨论同以色列相关的问题感到不适。反诽谤联盟的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Abraham Foxman）告诉《纽约时报杂志》的作家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说，他认为“思想的自由市场最终去伪存真”的想法是“天真的”。就像特劳布所描述的那样：“经验……已经告诉（福克斯曼），真理不会因其本身的价值而赢得胜利；虚妄的市场太强大有力了。”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虚妄则是源于有关美以关系，以及对以色列战略道德立场的严重质疑的那些东西。像反诽谤联盟那样的团体确信，对以色列以及美国无条件支持这个犹太国家的批评者，依然是在公众话语的边缘，而且他们有关以色列的观点应被看作不合法的。[20]

鼓励有利于以色列报道的最后方法，是指派著名的评论家，这样他们就会传播亲以色列的观点。为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帮助建立了“以色列美国之声”，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团体。根据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网站的说法，“以色列美国之声”的目标是“促进美国对以色列的了解和支持，促进的方式是邀请以美国为基地的脱口秀电台节目主持人来了解以色列，并从耶路撒冷现场直播他们的节目”。以色列美国之声网站将它自己的这个组织描述为“以色列公共关系努力的中心”，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负责人马尔科姆·霍恩莱因——他也是“以色列美国之声”委员会的主席——还将这一组织称之为“最重要、最激动人心、最有效的公共关系倡议之一”。电台参与人员包括这些人，如奥里弗·诺思（Oliver North）、格伦·贝克（Glenn Beck）、莫尼卡·克劳利（Monica Crowley）、迈克尔·梅德韦德（Michael Medved）、阿姆斯特朗·威廉斯（Armstrong Williams）以及其他许多人。这一运动有助于保证一系列不断增加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向他们的听众提供亲以色列的信息。[21]

这些多样性的努力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使主流的媒体具有较小的可能性来组织报道负面描述以色列的信息或事件，使充当美国坚强支持以色列的战略和道德理论正当化的公开评论得到促进。当然，虽然这些努力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们还是非常管用的。

那些以一种方式思维的思想库

亲以色列的力量在思想库中掌握了重要的影响力，它们在关键问题上塑就公众辩论以及在实际的政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越来越依靠那些落脚在华盛顿的思想库中的专家，而不是依赖政府官员或大学教师来提供分析和评论，大部分这样的思想库拥有强有力的公共关系和媒体关系办公室，用于在公众领域中推广他们的专家

的观点。许多思想库也向立法人员和其他的政府官员派发简易的政策备忘录摘要；组织研讨会、工作早餐，以及给官员们及其助理的吹风会，并鼓励它们自己的分析人员公开发表社评和其他形式的有形评论，所有这一切的目标都是要塑造一种占优势的思想气候氛围。像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布鲁金斯协会这样的思想库，它们向总统竞选和到行政当局履新的官员们提供顾问人员，在这些人失去权力时向他们提供安全的栖身之所，并向他们提供继续影响华盛顿圈内圈外辩论的平台。它们是新的政策思想的孵化器，它们是华盛顿权力网的关键部分。[22]

由于认识到需要一种围绕以色列政策领域的重要而“客观的”声音，前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拉里·温伯格（Larry Weinberg）和他的妻子芭比·温伯格（Barbi Weinberg），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以及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副主任马丁·因迪克，于1985年成立了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23]虽然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减少了它同以色列的联系，声称它在中东问题上提供一种“平衡而现实主义的”观点，但是情形却并非如此。[24]事实上，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是由这些个人出资管理的，他们深深地承诺要推进以色列的议程。虽然它的顾问委员会包括像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马丁·佩雷斯、理查德·珀尔、詹姆斯·伍尔西和摩提默尔·祖克曼这样著名的亲以色列人物，但是却没有包括一个可能被认为有利于任何其他“近东”国家或团体观点的人。虽然它的许多人员是货真价实的学者或经验丰富的前官员，但是他们几乎说不上是中东问题中立的观察者，而且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行列之中几乎不存在多样性的观点。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思想库领域的影响力远不限于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就像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过去的25年间，亲以色列的那些人已经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赫德逊研究所、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和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确立了自己发号施令的地位。这些思想库全部都坚决地亲以色列；而对于美国支持这个犹太国家持批评意见的人，如果有的话，也很少。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思想库领域影响力的另外一个象征，是布鲁金斯协会的演变。多年以来，布鲁金斯协会中东问题的资深专家是威廉·B.匡特，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官员，在有关阿以冲突方面，他享有完全受之无愧、不偏不倚的声誉。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布鲁金斯协会发布了一份具有影响力的有关中

东问题的报告，报告强调以色列人需要撤离，巴勒斯坦人的自决——包括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不受阻拦地进入耶路撒冷的宗教场所，以及对以色列的安全保证。布鲁金斯协会的那份研究报告是由各种团体的专家完成的，如今它被普遍看作卡特政府进行埃以和平条约谈判成功努力背后的蓝图。[25]

然而，布鲁金斯协会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工作，如今是通过它的萨本中东政策中心来进行的，该中心因为一笔1300万美元的赠款而于2002年成立，而这笔赠款主要来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海姆·萨本（Haim Saban）。《纽约时报》将他描述为“或许是好莱坞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显要人物，他将自己的势力和金钱触须伸向华盛顿，并且越来越向全世界伸展，企图影响所有有关以色列的事情”。这位“永不疲倦的以色列拉拉队队长”告诉《纽约时报》说：“我是个关注单一问题的人，而我所关注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他所作出的努力致使阿里埃勒·沙龙将他描述为“一位伟大的美国公民、一个在需要的时候总是同以色列和犹太人民站在一起的人”[26]。被选择来管理萨本中东政策中心的人是马丁·因迪克，他是克林顿政府的前官员，此前曾担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副主任，帮助创建了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一个由萨本出资、因迪克管理的研究所，除了亲以色列外，难以想象它还会是其他的什么样子。固然，萨本中东政策中心偶尔也会接纳阿拉伯学者，并展示一些观点上的多样性。就像因迪克本人一样，萨本中东政策中心的成员经常支持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建立两个国家这一解决方案的想法。但是萨本中东政策中心的出版物，却从来不会质疑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对以色列的主要政策进行过重要的批评。进而言之，那些偏离该中心路线的个人在那里呆不长，就像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弗林特·莱弗里特（Flynt Leverett）在该中心的短暂任期所说明的那样。[27]

萨本中东政策中心的亲以色列倾向，在它的年度萨本论坛（Saban Forum）上得到了体现。在两天的会议中，该论坛或者在华盛顿，或者在耶路撒冷举行，它使那些著名的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聚集在一起。萨本论坛2006年的标题是“美国和以色列：面对一个混乱中的中东”；在出席者当中，引人注目的有以色列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比尔·克林顿、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西蒙·佩雷斯、威廉·克里斯托尔、众议员汤姆·兰托斯和简·哈曼（Jane Harman），以及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阿维格多尔·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亲阿拉伯的声音，或者说可能对美以关系清楚地表达一种不同的声音，显然是不存在的。[28]

考虑到这些机构在塑造观点和政策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华盛顿圈内的均势因而强烈地有利于以色列。虽然有一些较小的思想库——如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自身并非亲以色列的，但是华盛顿那些最大、最显著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却经常站在以色列一边，对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价值不加以质疑。

最后，轮到该说说落脚于纽约市的声望卓著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了。它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专家，其观点要比华盛顿那些著名的思想库专家更具多样性。多年以来，该委员会既接纳对以色列政策持显然批评态度的专家，如美国犹太人大会前负责人亨利·西格曼（Henry Siegman），也接纳坚定的亲以色列专家，如马克斯·布特。但是外交关系委员会并非没有受到压力，就像2006年9月它因邀请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而遭到的反应所说明的那样。著名的犹太组织愤怒地抗议这一邀请；只有当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同意将会议由餐会降格为“工作会议”的时候，这些犹太组织企图组织一系列高调辞职的活动才得以阻拦。就像反诽谤联盟的福克斯曼告诉《纽约时报杂志》所说的那样：“款待那个家伙……跨过了红线。”考虑到艾哈迈迪-内贾德对以色列和大屠杀的攻击性言论，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29]然而，这却再次说明了以色列游说集团为确保那些塑造公众话语的各种机构对它的反应保持敏感所作出的努力。

控制学术机构

以色列游说集团塑造有关以色列的辩论，在学术机构中面临最大的困难。许多教授不仅有任期——这使得他们免受许多形式的压力，而且他们也是在一个学术自由乃是核心价值、挑战主要学识乃是稀松平常和常常受到嘉勉的领域之中工作。在大学校园中，也存在一种对言论自由根深蒂固的承诺。在过去30年中，美国大学的国际化将大量外国出生的学者和教授带到了美国，而这些人对以色列行为的批评，经常比美国人更显得尖锐。

尽管如此，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团体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之所以并未花大气力来塑造校园中的讨论，主要是因为奥斯陆和平进程正在进行之中。在此期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暴力，很多人相信冲突就快要解决了。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对以色列只有温和的批评，而且几乎用不着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干预。

奥斯陆和平进程失败和阿里埃勒·沙龙在2001年2月上台以后，来

自大学院校的批评之声猛然升高，而且批评之声在2002年春天尤其紧张，当时以色列国防军重新占领了巴勒斯坦人控制的西岸地区，使用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来镇压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咄咄逼人地要“夺回校园”。像“民主大篷车”（Caravan for Democracy）这样的新团体纷纷出现，该团体将“来自以色列的发言人请来讨论作为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以色列所面临的挑战”[30]。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为那些要在校园中为以色列辩护的大学生开办了一系列的辩护培训课程，而且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以色列校园联盟（Israel on Campus Coalition），以协调现在在大学校园中寻求证明以色列有理的26个不同团体。

为了不使自己被其他组织超越，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合会最近同“戴维计划”（David Project）结成伙伴关系，后者是一个以波士顿为基地、集中关注校园问题的亲以色列团体。它们的目标是建立大学分支机构和培训项目——第一个这样的机构项目是在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建立的，以帮助基督教学生“为以色列进行辩护”。基督徒支持的以色列联合会的执行主任戴维·布罗格（David Brog）说，该项目的目标是“培养下一代”；而“戴维计划”的主任查尔斯·雅各布斯（Charles Jacobs）则说，该项目“将教导他们如何作出反应，这样他们能说的东西就不仅仅只是上帝赋予以色列那片土地。我们将教导他们如何理解这场冲突，这不是一场边界战争，而是一场阿拉伯人同犹太人之间的地区冲突，是一场全球战争的核心部分”[31]。

可以预测的是，试图重新赢回校园的最重要组织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该组织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在监控校园活动，训练以色列的年轻拥护者。由于以色列受到攻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花在校园项目上的支出多了两倍多。根据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领导发展项目的主任乔纳森·凯斯勒（Jonathan Kessler）的说法，这一努力目标是“极大地扩大涉及在校学生的数量、这些学生的竞争力，以及他们在全国性的亲以色列努力活动中的参与。”2003年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240位学生的全部旅程出资，将他们带到华盛顿特区进行为期4天的密集辩护培训。学生们被教导说，当他们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应该集中关注建立各种校园领导网络，赢得他们对以色列事业的支持。[32]2007年，来自将近400所院校的1200多名学生参加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政策会议，其中包括150名学生组织的主席。[33]

这种培养学生的活动，被佐之以影响大学教员及其雇用的做法。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招募学生，帮

助它们辨别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反以色列的教授和大学校园组织。学生们的这些发现在1984年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大学指南：揭露校园中的反以色列活动》一书中被公布。与此同时，负责编辑那些可疑个人和组织文件的反诽谤联盟组织，秘密地分发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包括“大学校园那些积极亲阿拉伯同情者的背景信息”，这些人“只是用他们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作幌子，来为他们极其迫切的反犹主义服务”。[34]

这种努力在2002年9月变本加厉了，当时丹尼尔·派普斯建立了校园观察（Campus Watch）网站，在上面张贴那些有嫌疑的学术机构的全部文件；该网站盗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页剧本，鼓励学生们报告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评论或行为。[35]这种一目了然地将学者们列入黑名单并进行威吓的做法，促使人们作出严厉的反应。虽然派普斯后来将这些文件从网站上撤了下来，但是该网站依然邀请学生报告美国大学中那些被认为是反以色列的行为。[36]

派普斯在校园中扑灭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行动并不只停留于此。他同马丁·克雷默和斯坦利·库尔茨（Stanley Kurtz）——前者是一位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和以色列沙勒姆中心都供职的以色列裔美国学者，后者是《国民评论》的特约编辑和保守的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一道，开始鼓励国会缩减或至少严密监控《民权法案》第六款（Title VI）[37]的那些联邦政府拨给主要大学进行中东或其他领域研究项目的资助。其目标是要使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人噤声，或至少直至这些批评者这样做为止，而结果是迫使大学聘用那些同派普斯、克雷默和库尔茨观点更加一致的学者。他们所支持的《众议院第3077号高等教育国际研究法案》（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ct， HR 3077），本来要设立一个政府任命的委员会来监视那些得到联邦款项的国际研究中心。委员会的权力将包括向教育部长和国会进行推荐，这将有助于确保那些收到资助的中心的活动“反映各种各样的观点，以及对世界各种宗教、外国语言和国际事务的全面观点”[38]。虽然所建议的该项立法的这一方面内容看似无害，但实际上它是对克雷默和库尔茨主张的一种回应，他们认为现有的中东研究项目是歧视性的，并在助长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态度。[39]

如果像上面写到的这项立法获得通过的话，那么需要得到政府支持的那些大学将明显地面对这样的激励——聘用那些因地区研究项目支持现有的美国政策和对以色列不加批评的个人。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团体支持这一立法倡议，因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人大会和其他5个组织向国会散发了一封信函，

该信函指责受《民权法案》第六款资助的那些研究中心“不加批评地宣传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伊斯兰世界的正面形象，而对以色列却不加理会或诋毁贬损”[40]。虽然众议院第3077号高等教育国际研究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却从来没有被参议院全体正式考虑过。[41]2005年重新进行了类似的立法，并且于2006年3月在众议院以微弱多数（221票对199票）获得通过，但是参议院却拒绝这项立法，因而该项立法在109届国会结束时到期终止了。[42]

然而，克雷默和库尔茨在2007年却宣称赢得了胜利，当时国会授权的对《民权法案》第六款项目进行研究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推荐成立一个由总统任命的行政级别的人员来监督国际研究和语言项目。[43]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为现有的地区研究项目进行了辩护，而且不支持克雷默和库尔茨的偏见性指责。事实上，该研究小组的一位成员、前美国人口调查局（Census Bureau）局长肯尼思·普鲁伊特（Kenneth Prewitt）告诉记者说，如果任其蔓延，偏见会是明显的；但是用他的话来说：“偏见这种东西在那里并不是公开的。”[44]有些支持现有的《民权法案》第六款资助的研究中心的人认为，将这些项目指派给一个由总统任命的高层官员来监督，将提高它们的地位，帮助它们获得更多的资源。然而，赋予一个单个的人如此广泛的监督权力，也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担忧——未来某位由总统任命的官员可能有一天会持有这样的立场，即实行派普斯/克雷默/库尔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计划。

进而言之，2007年4月版本的国际教育项目《民权法案》第六条款立法——参议院现正对此加以考虑，将为那些感到现有的《民权法案》第六条款没有充分包括多种观点的个人，建立一个控告程序。如果大学的回应没有使这些控告者感到满意的话，他们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充塞（教育）部，并由教育部长来进行审查”。立法草案也指导教育部长“在决定新的资金资助时考虑对这些控告进行审查”。[45]如果这一条款变成了法律，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将针对任何聘用批评以色列政策者的中东研究项目反复提出控告，以便说服教育部切断《民权法案》第六条款的支持，或鼓励有争议的大学通过亲以色列的方向来保证它的资金。

为进一步反击在学术界被认为是反以色列的偏见，许多慈善家在美国大学里设立了以色列研究项目——其中不包括已经存在的大约130个犹太研究项目，以便在大学校园里增加“对以色列友好”的学者数量。[46]纽约大学于2003年5月1日宣布建立陶布以色列研究中心（Taub Center for Israel Studies），类似的项目在其他学校也被建立起来，其中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兰代斯大学以及埃默里大

学。虽然学术机构管理者强调这些项目的教学价值，但是他们也倾向在校园中提升以色列的形象。陶布基金会（Taub Foundation）的负责人弗雷德·拉弗清楚地表明，他的基金会资助纽约大学的陶布以色列研究中心，以帮助反对“阿拉伯的（原文如此）观点”，他认为纽约大学的中东研究项目弥漫着这样的观点。[47]

据报道，赌博大王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所建议的数百万美元馈赠款的背后也有类似的动机存在，这笔馈赠款的目的是要扩大乔治敦大学现有的犹太文明项目，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集中关注“作为国际关系范式的犹太主题”研究中心。以色列《国土报》在2006年8月报道说：“阿德尔森和这个犹太研究中心的其他倡导者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减轻该大学存在的阿拉伯的影响力。”该项目的第一任主任约西·谢恩（Yossi Shain）——他也是特拉维夫大学哈托格政府学院的负责人——说道，在乔治敦大学设立这样的一个项目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一所耶稣会学校，因为它是在华盛顿，因为它是在一所驻外事务的学校之中”。类似的，该大学的犹太学者哈罗德·怀特（Harold White）也说道，建立这个新的中心将对乔治敦大学现有的阿拉伯研究中心形成制衡作用，由于“许多乔治敦的毕业生最终在美国国务院就职”[48]，因此这个项目显得尤其重要。

以色列游说集团对控制学术机构的渴望，导致它进行数次引人注目地向行政官员施压或影响人事决定的努力。例如，2002年夏，芝加哥大学亲以色列的团体宣称，“校园里”存在“威吓仇视犹太学生的氛围”；并指控说，该大学的教员和行政管理者对这一问题坐视不管。事实上，据说教员和行政管理者“同意甚至鼓励这种爆炸性的氛围”。受此指控的刺激，学校管理当局收集了对所有学者的指称并加以调查。只有两项指控被发现是有效的：一项是在一间寝室墙上的反犹涂鸦——宿舍管理员工没有及时对其进行处理；另一项是一位研究生在系邮件发送清单中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该邮件讲了一个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笑话。尽管令人遗憾，但这却几乎构不成“迫害和隔离氛围”的证据，而这正是一名犹太学生在2002年对芝加哥大学所作的描述。然而，以色列驻芝加哥总领事和当时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却在此后不久即刻到访芝加哥大学。他们的目的是迫使校长和教务长找到改善以色列在该校形象的办法。在同一期间，著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教员、历史学家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的电子邮件系统受到垃圾邮件的狂轰滥炸。[49]

哥伦比亚大学前教务长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报告说，当哥伦比亚大学从芝加哥大学将哈利迪招聘走的时候，“受到那些与他的政治观点不同的人的指控”。数年之后，当普林斯顿大学试图恳

请哈利迪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面临着完全相同的问题。[50]已故的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他是类似谴责所针对的目标；科尔后来说道："著名的文艺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公开声明，都将引起数以百计的电子邮件、信函和新闻报道，呼吁我们谴责萨义德，制裁或解雇他。"[51]哥伦比亚大学的艰苦工作并未到此结束：2004年，"戴维计划"制作了一个宣传片，指责哥伦比亚大学的中东研究项目人员是反犹的，威吓那些为以色列进行辩护的犹太学生。[52]虽然在像《纽约太阳报》这样的新保守派出版物中哥伦比亚大学被反复筛查，但是被指派调查这些指控的教员委员会没有发现反犹的证据，而且唯一值得注意的一起事件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一位教授曾对一个学生的问题"作出过气愤的反应"。该委员会也发现，被指控的那些教授曾经是受到公然威吓活动的目标。[53]

虽然人们可能愿意认为这些只是孤立性的事件，但是完全相同的事情在2006年又发生了，当时耶鲁大学的历史系和社会学系投票赞成对胡安·科尔（Juan Cole）教授的任命。科尔教授是密歇根大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也是获奖博客"见多识广的评论"（Informed Comment）的作者，在近些年里曾对以色列的许多政策提出过批评。《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的亲以色列专栏作家对科尔的任命进行了攻击，而《犹太人周报》则报道说，数位著名的犹太捐款人呼吁耶鲁大学的官员对这一任命决定进行抗议，而这项任命随后则被耶鲁大学的任命委员会推翻。虽然捐款人施压的实际影响力并不清楚，但是这一事件强调了这样一种重要性，即某些以色列的支持者曾在塑造校园话语的过程中发挥作用。[54]

使以色列免受批评的努力也曾将目标对准单个的发言者、访问教授以及客座教授，其目的是要形成一种限制自由表达和公开辩论的氛围。1984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学生团体邀请该校校友、前国会议员皮特·麦克洛斯基（Pete McCloskey）作为客座教授来讲学。麦克洛斯基是一个针对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著名批评者，他曾在1980年提出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削减美国提供给以色列每年用于西岸地区定居点的资助。他的行动导致了说他是一个反犹分子的指控，并且使之在1980年的参议院竞选中必败无疑。但是争议还不仅限于此：希勒尔犹太人校园生活基金会斯坦福大学分会主任说，对他（麦克洛斯基）的任命是"向犹太人社会当面扇了一记耳光"，而且斯坦福学生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威胁，如果他不从自己的教学大纲中删掉一篇前助理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的文章，增加反映亲以色列观点的材料，就要减少它的薪水或中止对他的任命。与正常的学术活动形成尖

锐对照的是，他们还坚持要求他增加另外代表不同观点的来客的课堂讨论。一项教员评估发现，该学生团体对学术自由的“被严重剥夺”感到愧疚，而麦克洛斯基最终则得到了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的正式道歉。[55]

我们两位作者本身也有一些遭遇这种手段的经历。2006年初，我们俩各自独立地应邀出现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年度“当前战略论坛”的一个座谈会上。座谈会的主题是“权力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主题同中东政治或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在我们最初的那篇文章《以色列游说集团》于2006年3月发表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就接到数名国会议员的电话，质疑让我们在这个会议上讲话是否合适。[56]值得称道的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没有为回应这些电话而采取行动，而我们也顺利地出现在这次会议上。（斯蒂芬·）沃尔特随后被邀请在蒙大拿大学的一个系列讲座中发表演讲，也引发了该校数名教员的激烈谴责，他们开始了一场延宕不决但并不成功的活动，以便使该系列讲座的教员协调员从他的职位上走人。[57]

除了将目标针对教员和校园里的教员聘用外，许多亲以色列的学术机构和团体还曾试图压制那些挑战它们具体观点的学术作品的出版。例如在1998年，反诽谤联盟就呼吁由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和鲁斯·贝蒂纳·伯恩（Ruth Bettina Birn）所著的《受审的民族》一书的出版社（Metropolitan Books）中止发行该书。《受审的民族》一书是对丹尼尔·戈德海根（Daniel Goldhagen）所著的颇具争议性的畅销书《希特勒那些自愿的刽子手》言词尖锐的批评。该书认为，大屠杀不仅是纳粹信仰和希特勒自己疯狂的产物，而且也植根于德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种族灭绝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先于纳粹时期而存在。就像戈德海根的书一样，《受审的民族》一书也引发了那些受人尊敬的学者们的褒扬和批评。然而，反诽谤联盟的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却说道，《受审的民族》一书本不应该出版，因为他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戈德海根论点是对是错，而在于什么是‘合法的批评’，以及什么是超过许可范围的”[58]。

类似的事件发生在2003年，当时代表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艾伦·德肖维茨的律师，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发去了一封威吓信，企图阻止芬克尔斯坦所著的《何止是“虎刺怕”[59]》一书的出版，这是一部对德肖维茨的作品《为以色列辩护》一书进行广泛批评的作品。作为反对芬克尔斯坦的一部分，德肖维茨也写信给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名义上他对像大学那样的公共机构拥有权力。虽然德肖维茨随后宣称，他不是试图对出版进行压制，但是那显然是由于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官员如何理解他的行动

所导致的结果。无论如何，他们抵制住这些压力，出版了芬克尔斯坦的著作。[60]

使美国人避免读到或者听到有关以色列的批评观点，甚至出现在高中这种层面。例如，2005年2月《纽约太阳报》报道说，哥伦比亚大学的哈利迪涉及一个为高中教师进行授课的项目，该项目是由纽约市教育局所主办的。《纽约太阳报》和一些当地政治家立即行动起来将哈利迪解雇了。《纽约太阳报》指责哈利迪将以色列称之为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哈利迪激烈地否认这一指控，而且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他那时候是一名市长候选人——将哈利迪参与那一项目称之为“蛮横无耻”，而布鲁克林市议会议员西姆查·费尔德（Simcha Felder）则称之为“可憎之极的事情”。纽约市教育局长乔尔·克莱因（Joel Klein）第二天就将哈利迪从该项目中除名，并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拉希德·哈利迪不应该包括在一个为（教育局）教师提供职业发展的项目之中，并且他将来也不会参与这样的项目。”[61]第二年，纽约市议会批准了一个“由以色列驻纽约领事馆公关部发起的”以色列研究项目。[62]与此同时，一个由30多个犹太团体组成的联盟已经组织起一个新的全国性项目，以培训高中学生对以色列进行更有效的辩护。[63]

为了塑造校园中的话语，亲以色列的团体和个人针对学生、教授、行政官员以及课程本身，进行了多条战线的战斗。虽然他们在学术机构中所作的努力不像在国会山甚至媒体上那样成功，但是他们的工作并未白费力气。尽管在中东地区存在持续的混乱，以色列在被占领土进行持续的扩张，但是今天的美国校园中对以色列的批评比起5年以前是更加少了。[64]

令人不快的手段

正如我们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就像通过参与到有关以色列事务的公共话语来塑造公众观点的努力一样，代表以色列进行游说是完全合法的。虽然我们认为以色列游说集团目前的影响力不是为美国的利益或者以色列的利益服务，但是它的大多数手段都是合理的，这是喧喧嚷嚷的民主政治本质的正常组成部分。不幸的是，有些亲以色列的个人和团体偶尔把他们对以色列的辩护推向不合法的极端，企图使那些同他们持不同观点的个人噤声。这种努力可能涉及威吓和诽谤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的人，甚或企图损害或破坏他们的职业。上文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学术机构中所采取的行动提供了大量的例证，而此类行动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是没有其存在空间的。然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施暴手段不只是限于学术机构领域。

让我们看看2006年10月发生在托尼·朱特身上的事情吧。朱特是一位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却经常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批评。按计划他要在波兰驻纽约领事馆发表一次《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演讲。波兰政府没有主办这次活动，波兰驻纽约领事馆只是向网络20/20（Network 20/20）——一个主办一系列主题广泛的演讲的独立团体——租借了它的设施而已。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戴维·哈里斯得到了这次活动的风声，并且同波兰总领事进行了接触。哈里斯后来解释道，他是“作为一个波兰朋友”而打电话，说那个演讲“同波兰外交政策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波兰总领事也收到了反诽谤联盟的两通询问，而且他后来将这两个询问电话描述为“进行得体的施压……我们是成年人，有足够的智商理解那一点”。波兰领事馆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朱特的演讲，这导致了一群著名的美国知识分子发表一封公开信，谴责这种明显压制自由讨论的行径。[65]朱特也报告说，在其他场合他曾收到针对他及其家人的死亡威胁信，这是由他此前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所激起的。[66]

在那同一个月的稍晚时间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当时法国驻美国大使馆计划了一个庆祝卡门·卡利尔（Carmen Callil）的《欺骗》一书出版的招待会，这是一部对一名下流的法国官员在将法国犹太人放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过程中所起作用进行审查的、广受欢迎的作品。虽然这部作品对法国人在大屠杀中的共犯关系进行了充满激情、令人感动的控诉，但是据报道，法国大使馆却收到了对卡利尔在作品中的这一小段附言的控告：“在我追捕路易·达尔奎尔的时候，使我感到万分痛苦的是，要如此近距离地接近无助的法国犹太人的恐惧，以及目睹以色列犹太人正将这种恐惧转嫁到巴勒斯坦人民头上。”由于屈服于这样的压力，法国大使馆因此说道：“它不能够支持作者在本书附言中所表达的个人观点”，并取消了这次招待会。[67]

一个甚至更加著名的例子牵涉到《我的名字叫雷切尔·科里》这部作品，这是一个关于一位年轻妇女在2003年3月被以色列推土机杀死的剧本，当时她正试图阻止以色列国防军摧毁加沙地带的一个巴勒斯坦家园。该剧以科里的日记和电子邮件为基础，于2005年4月在伦敦皇家剧院开始上演，并且受到广泛的称赞。计划于2006年3月在纽约剧院创作室开始上演的这部作品，只是在计划开始上演之前而被推迟了一个月，而且这个剧院创作室有着演出那些具争议性作品的良好声誉。《纽约时报》报道说，纽约剧院创作室的艺术主任“在对当地犹太宗教领袖和犹太社会领袖进行关于该剧感受的民意调查之后”，决定推迟该剧的上演；而《洛杉矶时报》则引用这位艺术主任的话说：“我们所听到的，是在阿里埃勒·沙龙患病以及哈马斯在最近巴勒斯坦选举中的获胜之后，我们的局势处于高度紧张之中。”[68]皇家剧

院该剧原汁原味的产品，最终在2006年秋来到纽约限演80场。类似的事件于2006年12月发生在加拿大，当时该国最大的非营利剧院取消了一出计划好的戏剧演出，原因是害怕那会激怒多伦多的犹太人社会。[69]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4月，在发生《迈阿密先驱论坛报》（*Miami Herald*）所称的“慷慨激昂的少数人”——他们是捐款人和迈阿密以外的个人——的抗议之后，迈阿密马赛克剧院取消了上演该剧的计划。[70]

对据称是“危险批评者”过于急切的追击，甚至使得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一个著名团体陷入司法审判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反诽谤联盟争取到一个名叫罗伊·布洛克（Roy Bullock）的私人调查人员为其效力，此人也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政府作情报收集工作。布洛克依次从一名洛杉矶警察情报官那里获得情报，而据称这名官员则从警察部门和机动车管理局盗取机密文件。据报道，在布洛克总共持有的有关加利福尼亚州2000个个人和600个组织的两个文件中，他将有些内容提供给了反诽谤联盟。除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团体外，这项监控的目标还包括了许多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阿拉伯-美国团体，以及其他对以色列政府政策进行批评的人。旧金山地方检察官对此进行了刑事调查，而那位警官最终对未经授权使用一台警察电脑放弃辩护。但是旧金山地方检察官却不愿起诉反诽谤联盟，因为他认为该组织是一股善的力量。相反，这位检察官接受反诽谤联盟所给的7.5万美元，以打击当地的偏见行为，而对该组织和布洛克却没有提起任何刑事控告。

然而，却有三个被作为目标监控的人提起了控告，其中两个是犹太人。反诽谤联盟最后以向每人支付5万美元和法院费用的方式同意庭外解决。虽然反诽谤联盟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否认该组织对任何人进行暗中监视，但是却为该组织调查批评以色列团体的做法进行了辩护，因为他说在以色列的“一个有生存能力、安全、牢固的避难所”，是“犹太民族安全、牢靠和生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反诽谤联盟是要防止对犹太人社会的反犹主义和偏见行为，这是它所声明的使命；它只是针对那些被认为支持对以色列或美国进行批评的个人。[71]

“新反犹主义”

如果不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一件最强有力的武器——对反犹主义的指控——进行考察，那么对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如何运作的进行讨论就是不完整的。任何批评以色列行为的人，或者说亲以色列团体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的人，都有很高的机会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事实上，任何说存在着一个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人，都有被指控

为反犹主义的风险，即便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几乎一点也不羞于描述它们的影响力，即便以色列媒体本身也提到美国的“犹太人游说集团”。[72]事实上，以色列游说集团既夸耀自己的权力，又经常攻击那些唤起人们注意它的人。

指责是在一种大惊小怪的气氛中进行的，这种观点认为恶毒的反犹主义正在复苏——尤其是在欧洲。2002年10月，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主席摩提默尔·B.祖克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写到《反犹主义的可耻蔓延》一文时警告说“欧洲又患病了”，而《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杰夫·雅各比，则为该报2004年3月的专栏献上了一个复苏的《欧洲反犹主义癌症》专栏。[73]2004年初，美国驻欧盟大使说道，我们“正接近临界点，其糟糕的程度就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74]虽然衡量反犹主义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是证据的重心却是指向相反的方向。事实上，当2004年春对欧洲反犹主义的指责弥漫美国之际，由反诽谤联盟和皮尤大众与媒体研究中心分别对欧洲公众舆论进行的调查显示，反犹主义实际上正在下降。[75]

让我们看看法国的情况。亲以色列团体经常将法国描绘为欧洲最反犹的国家，而按照《新共和》的马丁·佩雷茨的观点，法国的首都“就像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那样，它今天是反犹主义欧洲的司令部”[76]。然而，2002年对法国公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9%的人可以面对同一个犹太人生活，97%的人相信进行反犹主义的涂鸦是严重犯罪，87%的人认为攻击法国的犹太教堂是可耻的，85%进行礼拜的法国天主教徒拒绝指责犹太人在工商界和金融领域中的影响力太大。[77]法国犹太人社会负责人在2003年夏声称：“法国不比美国更加反犹。”[78]根据以色列《国土报》的报道，法国警察报告说，2005年法国的反犹事件下降了几乎50%，尽管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法国所拥有的穆斯林人口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多。[79]

当2006年2月一名法国犹太人被一个穆斯林帮伙残忍杀害的时候，好几万法国示威者涌上街头对反犹主义进行谴责。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总统和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总理都参加了受害者的丧礼，以公开显示同法国犹太人的团结。[8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犹太人报纸《前沿》的一篇文章中的资料，2002年，从苏联帝国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超过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从而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犹太人社会成长最快的地方”[81]，如果欧洲真的“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糟糕的话”，那就很难想象犹太人会大规模地移居到那个地方去。

我们承认，欧洲并没有免于反犹主义的祸患。虽然没有人会否认说在欧洲——就像在美国一样——存在一些当地恶毒的反犹分子，但

是他们的数量不大，而且他们的极端观点为绝大多数欧洲人所拒绝。我们也不否认在欧洲的穆斯林中间存在反犹主义，有的是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所引发的，有的明白无误就是种族主义。[82]例如在大不列颠，监控反犹主义的监察团体社会安全信任组织（Community Security Trust， CST）报告说，这样的事件在2006年上升了31%。虽然决不应该对这样的不幸事件掉以轻心，但是（在一个人口超过6000万的国家里）所报告的这些事件的总数为594起，而且其中几乎1/4与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同时发生。就像社会安全信任组织的马克·加德纳（Mark Gardner）所承认的那样："这当然不可与20世纪30年代或任何像那样的遥远事情相比。"[83]包括落脚在以色列的全球反犹主义论坛（Global Forum Against Anti-Semitism）等其他几个团体报告说，在同一时期反犹主义事件实际上下降了。考虑到可能的编码和低估问题，这些冲突性的结果意味着，应该谨慎地看待和理解实际的反犹主义事件陡生或陡降的说法。[84]

当亲以色列的团体受到压力不要只是提出含糊不清的主张时，该团体现在声称存在一种"新的反犹主义"，他们将此等同于对以色列进行批评。[85]当英国教会会议在2006年初投票摆脱美国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 Inc）的时候——理由是该公司生产用于摧毁巴勒斯坦人家园的推土机，英国的犹太教大拉比抱怨说，它将"对英国的犹太-基督教关系……有着最负面的影响"，而改革运动的负责人托尼·贝菲尔德（Tony Bayfield）拉比则说道："明显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在草根阶层，甚至在英国教会的中层，正在出现反犹太复国主义——近乎反犹主义——的态度。"[86]英国教会对既不是反犹太复国主义又不是反犹主义心有愧疚；它只是抗议以色列的政策而已。[87]

事实上，以色列的支持者有着利用"新反犹主义"的恐惧来使以色列免受批评的历史纪录。1974年，当以色列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要求它从1967年所占领的土地上撤走的时候，反诽谤联盟的阿诺德·福斯特（Arnold Forster）和本杰明·爱泼斯坦（Benjamin Epstein）即出版了《新反犹主义》一书，该书认为，反犹主义正在上升，并且以其他社会日益不愿意支持以色列的行动作为说明的例证。[88]20世纪80年代初，当以色列因入侵黎巴嫩和扩张定居点而引发另外批评的时候，当美国向其阿拉伯盟国的军售面临激烈竞争的时候，当时的反诽谤联盟负责人内森·珀尔马特（Nathan Perlmutter）及其妻子鲁思·安·珀尔马特（Ruth Ann Perlmutter）即出版了《美国真正的反犹主义》一书，该书认为反犹主义正在回潮，就像向以色列施压要它与阿拉伯人达成和平所显示的那样，就像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这样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89]珀尔马特夫妇还认为，许多"非犹太"（a-Semitic）行动，虽然他们俩将其定义为并非处于敌视犹太人

的行动，却可能伤害犹太人的利益（尤其是以色列的福利），能够容易地使真正的反犹主义死灰复燃。[90]

这样一个事实——即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几乎没有提到反犹主义，当时以色列参与到奥斯陆和平进程之中——表明了（珀尔马特夫妇）这一观点在逻辑上存在的含混不清。事实上，有位以色列学者在1995年写道："从来没有什么时候，至少是自从基督教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以来，反犹主义的厉害程度要比目前更加逊色。"[91]反犹主义的指控只是在2002年春才普遍起来，当时以色列由于它在被占领土的野蛮行为而在全世界受到严厉的批评。

批评者也指责将以色列放到了一个不公平的标准上，或者质疑以色列的生存权。因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现为以色列著名作家和政治家的纳坦·沙兰斯基（Natan Sharansky）宣称："在质疑以色列的生存权利时，新反犹主义是以'对以色列进行政治批评'的伪装形式出现的，是由对这个犹太国家采取歧视手段和双重标准组成的。"[92]这意味着任何对以色列的行动——或者其行动的支持者——进行批评的人，都是在反对它的存在，因而是对犹太人怀有敌意的。但这是一种伪指控，因为它将对以色列行动的批评同拒绝以色列的合法性混为一谈。事实上，西方对以色列的批评者几乎从未质疑过它存在的权利。相反，他们质疑它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这是合法的批评；许多以色列人自己也质疑这种行为。

当西方的批评者进行这样的指责时，他们并不是以双重标准来评判以色列。虽然有一些批评者将以色列挑出来进行不适当的批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以适用于所有民主国家的标准来评判以色列的。这一标准是完全恰当的，尤其是既然以色列及其美国支持者反复强调说它需要得到特殊对待，原因乃是因为它是"中东的唯一民主国家"。换言之，人们期待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像当代的英国、加拿大、丹麦和美国等民主国家一样。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引起批评，因为这与普遍接受的人权准则和国际法，以及民族自决的原则相左。而以色列几乎说不上是因为这些原因而面临尖锐批评的唯一国家。美国因为在阿布格里布监狱（Abu Ghraib）出现的滥用权力，以及在关塔那摩监狱（Guant□namo）对拘押人员的同样做法而遭到普遍谴责。但是美国也没有被放到一个双重标准上；人们只是期望它能够合乎它自己所陈明的那些价值标准，合乎那些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而以色列也同样如此。

使人沉默的巨大力量

虽然存在这样的洞察力，但是反犹主义的指控依然是普遍用来对

付以色列批评者的武器，尤其是在美国。这种手段由于许多原因而一直行之有效。第一，反犹主义是一套在过去导致了巨大罪恶的信念，其中包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而这种罪行今天在大部分的社会中都是绝对名誉扫地的。反犹主义的指控是一个人在美国攻击某个人最强有力的侮辱性言词之一，而且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要让自己被这样的言词抹黑。毫无疑问，对被称为反犹分子的恐惧，使许多人缺乏勇气来对以色列的行为或美国对其支持的价值持保留意见。

第二，用反犹主义的指控去抹黑批评以色列或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人，对使他们在公众领域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奏效、管用。如果坚持对批评者进行指控，那么批评者的争辩并不会受到媒体、政府官员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精英的严肃对待，而且那些反而注意那位批评者观点的团体就会缺乏勇气去招募他们。政治家们尤其不愿意同任何曾被指控为反犹分子的人有瓜葛，因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的生涯将会产生不寒而栗的效果。

第三，这种手段管用，因为任何人都难以向所有人释疑说他（她）不是个反犹分子，尤其是他（她）在批评以色列或者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时候更是如此。在任何情况下，提供否定的回答几乎都是难以做到的，特别是当回答涉及意向和动机那样的东西时更是如此，因为那些东西是不能够直接观察到的；而指向与反犹主义不一致的其他行为是不可能具有很大分量的。因此直到最近，反犹主义的指控曾经是保证这一情况的可能手段，即人们几乎不对以色列或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批评；而当批评之声发出的时候，要么是对其置之不理，要么是对其进行诬蔑毁谤。

这种指责可能在美国犹太人中间得到回响，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相信反犹主义是普遍存在的。不仅离散中的犹太人历史提供了大量令人担忧的理由，而且在大量的美国犹太人中间，大屠杀在他们的态度中所起的作用也使那种倾向得到扩大。就像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在他那部新颖的作品《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清楚表达的那样，那一灾难性事件已成为了美国犹太人意识中的关键因素。它决定着许多美国犹太人如何来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而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它助长了他们中一些人强烈的牺牲意识。尽管犹太人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许多美国人依然担心，恶毒的反犹主义随时可能重返。就像杰克·沃特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按几乎任何标准去衡量，国内的反犹主义都锐减了；然而，许多美国犹太人还在相信，其他犹太人是偏见行为的目标。"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里奇在下面这样写的时候，他承认了这种想法，他说："就像许多其他犹太人一样，我或许是完全太愿意相信整个世界都是反犹的。"[93]

当2002年春以色列在全世界遭到激烈批评的时候，美国犹太人中间存在的这种深深的恐惧感显得清晰明了。为文化周刊《村声》写作的纳特·亨托夫（Nat Hentoff）那时评论道：“如果扬声器一响，有个声音说‘所有犹太人都到时代广场集合，’它决不会使我感到吃惊。”而《纽约观察家报》的罗恩·罗森鲍姆（Ron Rosenbaum）则警告说，在“以色列的第二次大屠杀”有可能发生。这些关注的声音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本身深深致力于为以色列进行辩护的《新共和》的利昂·威塞提尔（Leon Wieseltier），都感到被迫要写一篇题为《希特勒已死：反对犹太民族恐慌的理由》的公开报道。在描述美国犹太人的时候，他写道：“犹太人社会陷于容易兴奋之中，陷于想象的灾难之中。（他们）存在智力上的失控状态。焦虑是这种状态存在最有力的证明。到处都充斥着不准确的煽动性类比。到处都是大屠杀的比喻。”[94]简而言之，许多美国犹太人发现，很容易相信一个批评以色列行动或者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种团体影响力的公民，可能打心眼里是一个反犹分子。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当面对以色列的政策遭到批评时，以色列的某些辩护者就会很快提出反犹主义的指控。首先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吉米·卡特最近的著作《巴勒斯坦：要和平而非种族隔离》的反应。尽管书的标题具有挑衅性，但是这本书既不是要对以色列的战略局势挑起争端，也不是对之不抱同情。卡特当然对以色列占领西岸地区，以及这对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意味着什么持批评态度，并且他正确地观察到，在美国很难对这些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但是就像著名的以色列政治家约西·贝林（Yossi Beilin）所指出的那样：“卡特对以色列的批评中没有什么不是以色列人本身曾经说过的。”[95]即使卡特所使用的“种族隔离”这一术语——这引发了针对他的许多愤怒，这也是附和对以色列占领进行批评的人对此术语的使用，也是附和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主教和目前担任情报部长的龙尼·卡斯利尔斯（Ronnie Kasrils）这样著名的南非人对此语的使用。[96]

就像所指出的那样，反诽谤联盟和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以突出的广告在主要报纸上攻击卡特的这本书，而且尽管许多批评者对卡特主张的基本内容进行讨论，其他人却立即对这位前总统进行人身攻击。[97]亚伯拉罕·福克斯曼说：“我相信他卷入到反犹主义之中。”而马丁·佩雷茨则写道：“卡特将作为一个仇视犹太者在历史上留名。”[98]在一起针对臭名昭著的否认大屠杀者戴维·欧文的划时代诉讼中，历史学家德博拉·李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胜诉了，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卡特反复求助——可能是无意识地——于传统的反犹主义谣言”，认为在卡特的某些观点与前三K党领袖戴维·杜

克（David Duke）的观点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似性。[99]就像卡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曾被称为反犹分子。我曾被称为顽固分子。我曾被称为剽窃分子。我曾被称为懦弱分子。"[100]对这样一个人的如此反应是引人注目的，他在担任埃以和平进程中管理者的工作时为促进以色列总体安全所做的工作，不亚于任何其他的一个人。

当以前的新保守派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一篇文章，批评查尔斯·克劳萨默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2004年欧文·克里斯托尔讲座的时候，类似的反应——尽管规模更小——出现了。虽然福山的分析率直而带恭维——除其他分析之外，福山称克劳萨默是位"天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值得严肃对待"，但是他认为克劳萨默如何对待伊斯兰世界的观点太多是来自以色列的经历，这导致克劳萨默以反犹主义来指控福山。[101]

我们对这种攻击路线并不陌生。当我们最初的那篇文章《以色列游说集团》于2006年3月发表在《伦敦书评》上的时候，我们被广泛但却是错误地指控为反犹分子。埃利奥特·科恩在《华盛顿邮报》上针对我们的那篇文章发表了一篇社论版文章，标题为《是的，它是反犹的》；《纽约太阳报》则立即将我们同戴维·杜克联系在一起。[102]反诽谤联盟将我们的那篇文章冠以"引起犹太人权力和控制谣言的经典反犹主义阴谋分析"，但却罔顾我们明白无误的声明——说以色列游说集团只不过是涉及合法政治活动的另一个利益集团而已；而《新共和》则针对我们的文章发表了四篇不同的文章，所有文章都将我们的那篇文章描述为反犹主义的东西。[103]在《华尔街日报》的不同观点文章中，威廉·克里斯托尔指控我们"反犹太教"。而哈佛大学的意第绪文学教授鲁思·怀斯（Ruth Wisse），则将我们的文章比喻为19世纪德国臭名昭著的反犹分子的作品。以色列《国土报》的施穆尔·罗斯纳（Shmuel Rosner）在他对卡特的书进行批评时，宽宏大量地认为，这位前总统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比不上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那样反犹"[104]。

2007年初，指控批评以色列的人为反犹分子的趋势达到了新的高度——或者可能是新的低点，当时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发表了印第安纳大学的英语教授阿尔文·H.罗森菲尔德（Alvin H.Rosenfeld）的一篇文章，标题为《"进步的"犹太思想和新的反犹主义》。罗森菲尔德认定了一群自由派美国犹太人——其中包括剧作家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诗人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以及《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理查德·科恩，他们曾批评过以色列，并指控他们"一道"参与否认以色列生存权的新反犹主义。在这篇文章的导言中，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戴维·哈里斯写

道："这一新潮流最使人吃惊的——也是最使人痛苦的——特点，正是一些犹太人公开参与到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这个犹太国家的口诛笔伐之中。"[105]

罗森菲尔德所批评的那些人激烈否认对他们的各种指控，恢复和谐社会组织的迈克尔·勒纳（Michael Lerner）拉比指出了这些无根无据的指控的后果。他写道："当我们对国会议员谈到谁是自由派，或者甚至在任何其他问题上谁是极端进步主义的时候，他们私下告诉我们说，他们害怕说出有关以色列政策损害美国最佳利益或世界和平最佳利益的做法，以免他们也被贴上反犹主义和反以色列的标签。他们中有人最近告诉我，如果这种标签能够被贴在吉米·卡特——一个毫无道德瑕疵的人——身上，那么就没有哪个人在政治上是安全的。"[106]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存在真正的反犹主义证据。真正的反犹主义是以各种惹人反感的方式将犹太人视为异类，这赋予其他人将犹太人单挑出来，并且以大大小小的方式来迫害他们。反犹分子坚持认为，卷入看似合法的政治活动——竞选公职、政治竞选捐赠、撰写文章和著作，或者组织游说团体——的犹太人，实际上卷入到黑暗秘密的阴谋之中。真正的反犹分子有时候赞成采取严厉措施来否认犹太人完整的政治权利，不时地鼓吹甚至对犹太人进行更为暴力的迫害。即使是以更加温和的形式，在寻求否认犹太人完整自由地参与到社会各领域活动中的能力时，反犹主义也沉迷于各种形式的陈词滥调，并暗示应该怀疑、轻蔑地看待犹太人。在其本质特点中，真正的反犹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歧视相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们在欧洲和美国都受到了严厉谴责。

相反，现在几乎所有批评以色列政策或担忧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力的许多非犹太人和犹太人都发现，这样的观点是使人深感不安的，并且要完全加以拒绝。相反，他们认为犹太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既能够为善又能够作恶，并且他们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有权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他们也相信，以色列的行为像其他国家一样，也就是说，以色列有力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有时候追求既不明智又不公正的政策，有时候做那些在战略上愚蠢甚至不道德的事情。这种观点与反犹主义背道而驰。它呼吁像对待任何其他人一样对待犹太人，像对待一个正常合法的国家一样对待以色列。根据这种观点，当以色列行为得体的时候就应该受到称赞；当以色列行为不当的时候就应该受到批评。当以色列做了伤害美国利益事情的时候，美国人也有权感到不快并进行批评；而当以色列政府采取被认为也不符合以色列利益政策的时候，关心以色列的美国人应该对它进行自由的批

评。这里既不存在特殊对待，也不存在双重标准。类似地，大多数对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批评的人，没有将它看作一个秘密团伙或阴谋；相反，他们认为——就像我们认为的那样，亲以色列组织的行为像其他利益集团一样。虽然反犹主义指控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抹黑手段，但那却是毫无根据的。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反犹主义指控本身正开始失去它压制辩论的权力。对吉米·卡特那本书的攻击，没有使这位前总统远离公众视线——包括在布兰代斯大学的一次成功亮相，而其他许多公众人物和主流出版物最近也提供了对以色列政策和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富有智慧的批评。[107]甚至连威廉·克里斯托尔都似乎承认，将对以色列或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批评的人称为反犹分子，正在丧失其使他人沉默不语的能力。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主流的犹太人组织如此经常地打'反犹主义'这张牌，以至于它已经贬值了。"[108]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严重的指控不仅反复针对那些并非反犹分子的个人，而且针对那些只是质疑以色列政策，或指出以色列游说集团总是推行那些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个人。

还是让我们清楚明白地表明我们的观点吧：反犹主义是一种具有漫长悲剧历史的可鄙现象，所有人都应该警惕它的死灰复燃，在它出现时予以谴责。进而言之，对于真正的反犹主义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部分地区——以及其他社会，如俄罗斯——的存在，还有在美国和欧洲社会中的某些挥之不去的现象，我们所有人都应对其感到不安。但是对真正的反犹主义和对以色列政策的合法批评进行区分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将它们混淆在一起使得打击真正的偏见行为更加困难，使得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富有智慧的讨论变得更加困难。美国人应该自由地讨论那些推动美国慷慨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团体的活动，就像我们考察其他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一样，在这样做的时候用不着担心被抹黑和被边缘化。

结论

以色列游说集团所使用的各种战略——就像在本章和前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正在互为强化，如果政治家知道质疑以色列的政策或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具有风险，那么主流媒体要找出那些愿意跟以色列游说集团持不同意见的权威声音就越困难。如果有关以色列的公众话语能够被塑造成大多数美国人都对这个犹太国家怀有普遍正面的印象，那么政治家们就甚至会有更多理由围着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理由打转。打反犹主义的牌，甚至更多地压制了讨论，允许有关以色列生存的神话不受挑战。尽管其他利益集团以多样的形式来使用类似的

战略，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够梦想着具有亲以色列组织所积聚的政治力量。因此，问题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在美国国家利益中具有影响力吗？或者说它鼓励对美国甚至以色列本身有害的政策吗？这恰恰是我们现在要转而关注的一个问题。

---

[1] Robert H.Trice，“Interest Groups and the Foreign Policy Process： U.S.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Sage Professional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ed.V.Davis and M.East（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76）， pp.63—65.

[2] Eric Alterman，“Intractable Foes， Warring Narratives，” *MSNBC.com*， March 28， 2002.

[3] 《理性》（*Reason*）杂志的卡西·扬（Cathy Young）抗议阿特曼将她列入“条件反射式的”亲以色列学者名单之中，而且阿特曼承认了这个错误。

[4] 克里斯托夫是通过注意到“在民主党人之间或共和党人之间不存在有关我们的以色列政策或巴勒斯坦政策严肃的政治辩论”而开始他的批评的，并且认为这种情况对所有的相关各方都不利，包括以色列本身。虽然这一观点本应不具争议性，但它却招致了来自反诽谤联盟的一封抗议信，而且克里斯托夫的观点还被亲以色列的媒体监察组织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描述为“片面指责以色列的做法”。参见他的“Talking About Israel，”*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07；“Letter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2007，登录www.adl.org/media-watch/newspapers/20070319-NYTimes.htm，以及CAMERA，“Kristof's Blame-Israel Rant，” March 21， 2007，登录www.camera.org/index.asp？x-context＝2&x-outlet＝139&x-article＝1303。

[5] 引自Bret Stephens，“Eye on the Media by Bret Stephens： Bartley's Journal，”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22， 2002。

[6] Jerome N.Slater，“Muting the Alarm：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2000—2006，”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 no.2（Fall 2007）； Howard Friel and Richard Falk， *Israel-Palestine on Record*： *How the New York Times Misreports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Verso， 2007）.

[7] Max Frankel， *The Times of My Life and My Life with The Tim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pp.401—403.

[8] 引自Robert I.Friedman，“Selling Israel to America： The Hasbara Project Targets the U.S.Media，” *Mother Jones*， February-March 1987。

[9] 有关佩雷茨恋上以色列的评论引自Alexander Cockburn and Ken Silverstein， Washington Babylon（London： Verso Books， 1996）， p.6。他在《新共和》上有关“政党路线”的声明引自J.J.Goldberg， *Jewish Power*： *Inside the American Jew ish Establishment*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6）， p.299。《时代》杂志曾将佩雷茨领导下的《新共和》描述为“顽固地支持以色列”。参见William A.Henry III，“Breaking the Liberal Pattern，” *Time*， October 1， 1984。

[10] 引自Michael Massing，“The Israel Lobby，” *Nation*， June 10， 2002。

[11] Felicity Barringer，“Some U.S.Backers of Israel Boycott Dailies over Mideast Coverage That They Deplore，” *New York Times*， May 23， 2002； Michael Getler，“Caught in the Crossfire，” *Washington Post*， May 5， 2002； Tim Jones，“Pro-Israel Groups Take Aim at U.S.News Media，” *Chicago Tribune*， May 26， 2002； Massing，“Israel Lobby”，以及David Shaw，“From Jewish Outlook， Media Are Another Enemy，”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8， 2002。

[12] 引自Massing，“Israel Lobby”。

[13] 引自Friedman，“Selling Israel to America”。

[14] 伊夫欣的话引自Lloyd Grove，“On the March for Israel； The Lobbyists from AIPAC， Girding for Battl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1991。也可参见Daniel Eisenberg，“AIPAC Attack？”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anuary/February 1993； Robert I.Friedman，“The Israel Lobby's Blacklist，” *Village Voice*， August 4， 1992； Robert I.Friedman，“A PAC with McCarthy，” *Village Voice*， August 25， 1992； Robert I.Friedman，“The Wobbly Israeli Lobby，”*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 1992； Thomas A.Dine and Mayer Mitchell，“The Truth About AIPAC，”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4， 1992，以及Lawrence N.Cohler，“The AIPAC Flap，”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5， 1992。

[15] 例如，可参见“Conflict of Interest Fits NPR Bias，”登录www.camera.org/index.asp？x-context＝4&x-outlet＝28&x-article＝100，以及Joel Berkovsky，“NPR Responds to Claims of Bias with Weeklong Series on Mideast，” *JTA.org*， October 4， 2002。

[16] 关于那一条实际的广告，登录www.camera.org/images-user/advertisements/large/CAMERA-CarterAD.pdf。

[17] 对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和全国公共广播网的讨论选自Barringer，“Some U.S.Backers”； James D.Besser，“NPR Radio Wars Putting Jewish Groups in a Bind，” *Jewish Week*， May 20， 2005； Samuel Freedman，“From ‘Balance’ to Censorship： Bush's Cynical Plan for NPR，” *Forward*， May 27， 2005； Nathan Guttman，“Enough Already from Those Pro-Israel Nudniks，” *Ha'aretz*， February 1， 2005； Mark Jurkowitz，“Blaming the Messenger，” *Boston Globe Magazine*， February 9， 2003； E.J.Kessler，“Hot Seat Expected for New Chair of 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Forward*， October 28， 2005； Gaby Wenig，“NPR Israel Coverage Sparks Protests，” *Jewish Journal of Greater Los Angeles* （online）， May 9， 2003，以及Gila Wertheimer，“NPR Dismisses Protest Rallies，” *Chicago Jewish Star*， May 30-June 12， 2003。

[18] Bret Stephens，“An Open Letter to Ian Buruma，”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5， 2003.布鲁玛起初的文章是“How to Talk About Israel，”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31， 2003。

[19] 朱特在接受2007年由荷兰的公共广播公司VPRO 国际频道制作的纪录片《以色列游说集团》采访时，以及在由《伦敦书评》主办、于2006年9月28日在纽约市库珀联盟举行的一次关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辩论中，透露了这一事件。关于纪录片的影像资料和这场辩论，可登录www.scribemedia.org/2006/10/11/israel-lobby/和www.youtube.com/profile？user＝VPROinternational。

[20] James Traub，“Does Abe Foxman Have an Anti-Anti-Semite Problem？”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4， 2007.

[21] 登录www.conferenceofpresidents.org/content.asp？id＝34和www.americasvoices.net。在这个案例中，一个美国组织（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中的关键官员在把（建立以色列美国之声的）倡议描述为以色列公共关系（hasbara）活动的组成部分。

[22] 关于思想库不断增加的作用和活动，参见Donald E.Abelson， *American Think-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6）； Trudy Lieberman， *Slanting the Story*： *The Forces That Shape the News*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David M.Ricci，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The New Washington and the Rise of Think Tank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James Allen Smith，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以及Diane Stone，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Portland， OR： Frank Cass， 1996）。

[23] Joel Beinin，“Money， Media and Policy Consensu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 January-February 1993， pp.10—15； Goldberg， *Jewish Power*， pp.221—222，以及Mark H.Milstein，“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An AIPAC ‘Image Problem，’”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online）， July 1991。

[24] 引自Milstein，“Washington Institute”。

[25] *Towar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Report of a Study Group*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75）.

[26] Andrew Ross Sorkin，“Schlepping to Moguldom，”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04.Andrew Ross Sorkin，“Schlepping to Moguldom，”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04.萨本也是希拉里·克林顿总统竞选的主要支持者。Jeffrey H.Birnbaum and Matthew Mosk，“Clinton Fundraising Goes Full Forc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7， 2007.

[27] 莱弗里特从2003年5月至2006年6月任职于布鲁金斯协会萨本中东政策中心，一开始他在那里任客座研究员，后来任高级研究员。他与他的上司马丁·因迪克在美国的伊朗政策和叙利亚政策问题上存有明显的分歧。莱弗里特坚持认为，如果伊朗不放弃其核计划，那么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的威胁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并且坚持认为，追求同德黑兰进行一项大交易则更有意义。因迪克则持相反的观点。莱弗里特也不同意因迪克的这一观点，即认为暗杀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为削弱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艾尔-阿萨德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莱弗里特之所以被迫离开布鲁金斯协会，部分原因是他与因迪克之间的分歧，部分原因则是因为他批评萨本中东政策中心研究主任肯尼思·波拉克对伊拉克战争的鼓吹。参见2006年10月17日与本书两位作者的晤谈；2007年6月6日、6月12日与本书两位作者的通信。

[28] 2005年度的“萨本论坛”是在以色列举行的，并且在一次会议中还出现了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财政部部长萨拉姆·法亚德（Salam Fayad）和民政部部长穆罕默德·达赫兰（Mohamed Dahlan）。

[29] 所引用的福克斯曼的话参见David E.Sanger，“Iran's Leader Relishes 2nd Chance to Make Wave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1， 2006。也可参见“Ahmadinejad Talks to U.S.Think Tank，”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1， 2006，以及Eli Lake，“N.Y.'s Jewish Leaders Reject Offer to Meet Iran's Leader，” *New York Sun*， September 18， 2006。

[30] James D.Besser，“Turning Up Heat in Campus Wars，” *Jewish Week*， July 25， 2003； Ronald S.Lauder and Jay Schottenstein，“Back to School for Israel Advocacy，” Forward， November 14， 2003，以及

Rachel Pomerance，“Israel Forces Winning Campus Battle， Say Students Attending AIPAC Meeting，” *JTA.org*， December 31， 2002。

[31] Michal Lando，“Christians to Train in Israel Advocacy，” *Jerusalem Post*， May 14， 2007.

[32] Besser，“Turning Up Heat”； Pomerance，“Israel Forces Winning.” 2005年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其年度会议上接待了100位学生自治会（student government）主席——其中80位不是犹太人。Nathaniel Popper，“Pro-Israel Groups： Campuses Improving，” *Forward*， June 24， 2005.

[33] “Policy Conference Highlights，”登录www.aipac.org/2841.htm。

[34] Jonathan S.Kessler and Jeff Schwaber， *The AIPAC College Guide*： *Exposing the Anti-Israel Campaign on Campus*，为希勒尔基金会准备的特辑（Washington， DC： AIPAC， 1984），以及Kristine McNeil，“The War on Academic Freedom，” *Nation*， November 11， 2002。

[35] Michael Dobbs，“Middle East Studies Under Scrutiny in U.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3， 2004； Michele Goldberg，“Osama University？” *Salon.com*， November 6， 2003； Kristine McNeil，“The War on Academic Freedom，” *Nation*， November 11， 2002，以及Zachary Lockman，“Behind the Battle over US Middle East Policy，”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 January 2004。

[36] Tanya Schevitz，“‘Dossiers’Dropped from Web Blacklist； Mideast Center Says Denouncing Professors Was Counterproductiv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nline）， October 3， 2002.

[37] 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第六款要求，所有种族（肤色和民族血统）的纳税人缴纳的公共资金，不能以任何方式用于鼓励、保护、资助或导致种族（肤色或民族血统）的歧视。——译者注

[38]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ct（HR 3077），”文本登录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text.xpd？bill＝h108-3077。

[39] Stanley Kurtz，“Anti-Americanism in the Classroom，” *National Review Online*， May 16， 2002； Martin Kramer， *Ivory Towers on Sand*： *The Failur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1）.

[40] 联名信的文本张贴在马丁·克雷默的网站，登录www.geocities.org/martinkramerorg/Documents/HR3077/jointletter.htm。

[41] Goldberg，“Osama University？”； Ron Kampeas，“Campus Oversight Passes Senate as Review Effort Scores a Victory，” *JTA.org*， November 22， 2005； Stanley Kurtz，“Reforming the Campus： Congress Targets Title VI，” *National Review Online*， October 14， 2003； McNeil，“War on Academic Freedom”； Ori Nir，“Groups Back Bill to Monitor Universities，” *Forward*， March 12， 2004； Sara Roy，“Short Cut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April 1， 2004，以及Anders Strindberg，“The New Commissars，” *American Conservative*， February 2， 2004。

[42] 众议院第609号决议（第109届国会），“College Access and Opportunity Act of 2006，”登录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xpd？bill＝h109—609。

[43] 参见Martin Kramer，“Title VI Verdict，”登录http：//sandbox.blog-city.com/title-vi-verdict.htm，以及Stanley Kurtz，“Title Bout： Bipartisan Hope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Reform，” *National Review Online*， April 2， 2007。也可参见Committee to Review the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s，“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Keys to Securing America's Future”（Washington， D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7）， p.3。

[44] 引自Scott Jaschik，“New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side Higher Ed* （online），登录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07/03/28/intl。也可参见Sierra Millman，“Education Department Should Have High-Ranking Official to Oversee Foreign Language Study，”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Daily Report*， March 28， 2007。

[45] Draft legislation，“Title VI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s，” April 19， 2007.该立法草案将要求联邦资金申请者“对以下问题加以描述，即申请者将如何处理有关受到申请资助的活动是否反映了不同看法和许多不同观点的争议”。一项后续的条款则说：“如果关于受《民权法案》第六款资助活动的投诉，并没有在相关接受者申请概述的程序中加以解决，这类投诉应提交（教育）部并由部长审查。”

[46] 130个犹太研究项目的数字来自Mitchell G.Bard，“Tenured or Tenuous： Defining the Role of Faculty in Supporting Israel on Campus，” 这是一份由以色列校园联盟和美国-以色列合作企业（American-Israeli Cooperative Enterprise）两个组织于2004年5月11日出版的报告。也可参见Nacha Cattan，“NYU Center： New Addition to Growing Academic Field，” *Forward*， May 2， 2003； Samuel G.Freedman，“Separating the Political Myths from the Facts in Israel Studie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2005； Jennifer Jacobson，“The Politics of Israel Studie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ne 24， 2005， pp.10—12； Michael C.Kotzin，“The Jewish Community and the Ivory Tower： An Urgent Need for Israel Studies，” *Forward*， January 30， 2004，以及Nathaniel Popper，“Israel Studies Gain on Campus as Disputes Grow，”

Forward， March 25， 2005。

[47] 引自Cattan，“NYU Center”。

[48] Shmuel Rosner，“Donor May Fund Georgetown Jewish Center to Give U.S.Leaders Another Viewpoint，” *Ha'aretz*， June 14， 2006； Shmuel Rosner，“Academic Lies About Israel，” *Ha'aretz*， June 14， 2006，以及Stephen Santulli，“Jewish Program May Get Major Gift，” *Hoya* （online）， September 1， 2006。

[49] 关于最初的投诉，参见Chicago Friends of Israel，“Jewish and Pro-Israel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ubject to Intimidation and Hate，” July 24， 2002， on the *Campus Watch website*。也可参见Ron Grossman，“Mideast Conflict Boosts Tensions at U.S.Colleges，” *Chicago Tribune*， October 17， 2002； Dave Newbart，“Allegations of Anti-Semitism on Campus，” *Chicago Sun-Times*， November 4， 2002； Joshua Steinman，“University Professors Labeled Anti-Israeli by Campus Watch Site，” *Chicago Maroon* （online）， October 29， 2002；“University Responds to Anti-Semitic Inciden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October 2002，以及Sean Wereley，“Students Debate Presence of Anti-Semitism on Campus，” *Chicago Weekly News*， October 17， 2002。

[50] Jonathan R.Cole，“The Patriot Act on Campus： Defending the University Post-9/11，” *Boston Review*， Summer 2003； Chanakya Sethi，“Khalidi Candidacy for New Chair Draws Fire，” *Daily Princetonian* （online）， April 22， 2005； Chanakya Sethi，“Debate Grows over Khalidi Candidacy，” *Daily Princetonian* （online）， April 28， 2005，以及“Scholarship， Not Politics， Is the Measure of a Professor，” *Daily Princetonian editorial* （online）， April 27， 2005。

[51] Cole，“The Patriot Act on Campus.”

[52] Robert Gaines，“The Battl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online）， April 2005； Caroline Glick，“Our World： The Columbia Disaster，” *Jerusalem Post*， April 4， 2005； Joseph Massad，“Witch Hunt at Columbia： Targeting the University，” *CounterPunch.org*， June 3， 2005； Nathaniel Popper，“Columbia Students Say Firestorm Blurs Campus Reality，” *Forward*， February 11， 2005； Scott Sherman，“The Mideast Comes to Columbia，” *Nation*， April 4， 2005，以及Chanan Weissman，“Film on ‘Bias’ at Columbia U.Sparks Fury Among Israeli Alumni，”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6， 2005.

[53] “Columbia University Ad Hoc Grievance Committee， Final Report， New York， 28 March 2005（excerpt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34*， no.4（Summer 2005）： pp.90—100.

[54] Scott Jaschik，“Blackballed at Yale，” *Inside Higher Ed* （online）， June 5， 2006； Liel Liebovitz，“Middle East Wars Flare Up at Yale，” *Jewish Week*， June 2， 2006； Steve Lipman，“Opening the Ivy Doors，” *Jewish Week*， December 22， 2006； Philip Weiss，“Burning Cole，” *Nation*， July 3， 2006； and the symposium“Posting Mortem，”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uly 28， 2006.

[55] Paul Findley， *They Dare to Speak Out*： *People and Institutions*Confront Israel's Lobby， 3rd ed.（Chicago： Lawrence Hill， 2003）， pp.50—58，以及“Stanford Apologizes to Ex-Representative McCloskey，” *Washington Post*， July 28， 1983。

[56] 海军战争学院的教员彼得·多布罗斯基（Peter Dombrowski）于2006年6月13日向我们通报了此事，并且在2007年4月5日的一封电子邮件通信中对此加以确认。

[57] “UM Deserves to Hear Both Sides on Israel Lobby，” letter， *Montana Kaimin*， September 7， 2006； Trevor Kilgore，“Profs Off-Base in Labeling Lecturer as Anti-Semitic，” letter， *Montana Kaimin*， September 8， 2006； Brenna Moore，“U.S.Foreign Policy Mistakes， Consequences Discussed b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ert，” *Montana Kaimin*， September 12， 2006； Rob Chaney，“Professor Questions U.S.-Israeli Relationship，” *Missoulian*， September 12， 2006；“Anti-Semitic Lecturer Bad for UM，” letter， *Montana Kaimin*， September 13， 2006，以及“Presidential Lecturer Starts Debate， Not Hatred，” letter， *Montana Kaimin*， September 12， 2006。 10月，同一讲座系列中出现了约瑟夫·约菲（Joseph Joffe），他是众所周知的欧洲外交政策专家，并且对我们最初的那篇文章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他出现在这个系列讲座上，并没有平息对邀请沃尔特持批评态度的那些人，这些批评者还在继续他们那最终并未成功地赶走该系列讲座协调员的活动。Hannah Heimbuch，“Lecture Series Not Skirting Foreign Policy，” *Montana Kaimin*， October 26， 2006.

[58] Ralph Blumenthal，“Cries to Halt Publication of Holocaust Book，”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1998； Norman G.Finkelstein， *Beyond Chutzpah*： *On the Misuse of Anti-Semitism and the Abuse of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55—56.

[59] Chutzpah一词是希伯来语，有大胆、蛮横、肆无忌惮等含义。此处音义结合翻译为“虎刺怕”效果较好。——译者注

[60] Jon Weiner，“Giving Chutzpah New Meaning，” *Nation*， July 11， 2005，以及随后的通信，Ibid.， August 29， 2005。也可参见“Dershowitz， Prof Spar over Plagiarism，” *New York Times*， July 14， 2005；

Neve Gordon，“The Real Case for Israel，” *In These Times* （online），October 12，2005；Jennifer Howard，“Calif.Press Will Publish Controversial Book on Israel，”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online），July 22，2005，以及Jon Wiener，“Chutzpah and Free Speech，” *Los Angeles Times*，July 11，2005。

[61] Andy Humm，“Academic Freedom，Intimidation，and Mayoral Politics：The Case of Rashid Khalidi，” *Gotham Gazette* （online），April 7，2005；Julia Levy，“Khalidi Is Tapped to Teach Teachers About Middle East，” *New York Sun*，February 15，2005；Julia Levy，“Education Dept.Drops Columbia Prof.from Teaching Program for Teachers，” *New York Sun*，February 16，2005，以及Alisa Solomon，“When Academic Freedom Is Kicked Out of Class，” *Forward*，March 4，2005。

[62] Yaniv Halili，“New Yorkers to Study About Israel，” *Ynetnews.com*，September 8，2006；David Andreatta，“Schools Back Israeli Teacher Course，” *New York Post* （online），September 28，2006.他们甚至能够向私立高中施压。2007年1月，来自关注此事的家长以及硅谷地区犹太人社会关系委员会（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 of Silicon Valley）的抗议，导致斯坦福大学教授乔尔·贝宁（Joel Beinin）在圣何塞私立哈克学校（Harker School）的讲座被取消。虽然贝宁是犹太人，而且并不质疑以色列的生存权，但由于他也是一位以色列巴勒斯坦政策的批评者，因而对于他向一群高中学生发表演讲，显然是不可接受的。Joel Beinin，“Silencing Critics Not Way to Middle East Peac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nline），February 4，2007.

[63] Max Gross，“Israel Advocacy Coalition Targeting High Schools，” *Forward*，January 23，2004；Rachel Pomerance，“With Israel Issue Hot on Campus，Groups Train High School Advocates，” *JTA.org*，January 22，2004，以及“New Pro-Israel Campaign Targets High School Students，” *JTA.org*，June 2，2004。

[64] Jonathan Kessler，“Pro-Israel Activism Makes Comeback on Campus，” *Forward*，December 26，2003；Popper，“Pro-Israel Groups：Campuses Improving”；Barry Silverman and Randall Kaplan，“Pro-Israel College Activists Quietly Successful on Campus，” *JTA.org*，May 9，2005，以及Chanan Tigay，“As Students Return to Campus，Activists Prepare a New Approach，” *JTA.org*，September 1，2005。然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对校园的影响是有限的。参见Joe Eskenazi，“Book：College Campuses Quiet，but Anti-Israel Feeling Is Growing，” *JTA.org*，November 29，2005，以及Gary Rosenblatt，“U.S.Grad Students Seen Hostile to Israel，” *Jewish Week*，June 17，2005。

[65] 所引用的哈里斯和波兰总领事克尔兹斯托夫·卡斯普尔兹克（Krzystof Kasprzyk）的话，参见Michael Powell，“In N.Y.，Sparks Fly over Israel Criticism，” *Washington Post*，October 9，2006。也可参见J.J.Goldberg，“A ‘Lobby’ Prof Asks：Can We Talk？” *Forward*，October 13，2006；Larry Cohler-Esses，“Off Limits？Talk by Israel Critic Canceled，” *Jewish Week*，October 6，2006，以及Ira Stoll，“Poland Abruptly Cancels a Speech by Local Critic of the Jewish State，” *New York Sun*，October 4，2006。公开信的副本可见“The Case of Tony Judt：An Open Letter to the AD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ovember 16，2006。关于反诽谤联盟的回应和原信两位主要作者的后续回应，参见“The ADL & Tony Judt：An Exchang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ovember 30，2006。

[66] Graham Bowley，“Lunch with the FT：Tony Judt，” *Financial Times*，March 16，2007.

[67] 引自“French Embassy Cancels N.Y.Book Launch over Author's Israel Views，” *Ha'aretz*，October 10，2006。也引自 Ed Pilkington，“US Free Speech Row Grows as Author Says Jewish Complaints Stopped Party，” *Guardian*，October 11，2006，以及Henry Porter，“The Enemies of Free Speech Are Everywhere，” *Observer*，October 15，2006。卡利尔书中那一相关段落内容如下：“法国忘记了维希，澳大利亚人忘记了土著居民，英国人忘记了爱尔兰人，统一党党员忘记了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美国忘记了智利、忘记了关塔那摩。所有人都忘记了东帝汶和卢旺达。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人们不断问我，我如何能够忍受书写这样的邪恶之徒和如此可怕的事情。事实上，过去的恐怖吓不倒我。令我痛苦之极的……是与在法国那些无助的犹太人的恐惧靠得如此之近，是目睹以色列的犹太人正在施加给巴勒斯坦人民的东西。就像其他人一样，以色列的犹太人‘忘记了’巴勒斯坦人。每个人都忘记了；每个国家都忘记了。”Carmen Callil，*Bad Faith*：*A Forgotten History of Family*，*Fatherland*，*and Vichy France* （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437.

[68] Jesse McKinley，“Play About Demonstrator's Death Is Delayed，”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8，2006；Katharine Viner，“A Message Crushed Again，” *Los Angeles Times*，March 1，2006.也可参见Rachel Irwin，“Censoring Rachel's Words？” *Jerusalem Post*，March 20，2006；Edward Rothstein，“Too Hot to Handle，Too Hot to Not Handle，” *New York Times*，March 6，2006，以及Philip Weiss，“Too Hot for New York，” *Nation*，April 3，2006。

[69] Richard Ouzounian，“‘Corrie’ Cancelled in Canada，” *Variety* （online），December 22，2006.

[70] Christine Dolen，“Theater Won't Stage Controversial Drama，” *Miami Herald* （online），April 3，2007.多兰也报道说，该剧在西雅图的成功演出引发了三个犹太团体的抗议，这些团体向观看演出者散发传单。

[71] 福克斯曼的话引自Jim McGee，“Jewish Group's Tactics Investigated，” *Washington Post*，October 19，1993。关于反诽谤联盟的案子，参见Chip Berlet and Dennis King，“ADL-Gate，” *Tikkun*，July/August 1993；Jeffrey Blankfort，Anne Poirier，and Steve Zeltser，“The ADL Spy ing Case Is Over，but the Struggle Continues，” *CounterPunch.org*，February 25，2002；Phil Bronstein，“Suspect in Cop Spy Case Tells His Story，” *San Francisco Examiner*，January 22，1993；Lynne Duke，“Anti-Defamation League Sued：Rights Violations Alleged in Spying，” *Washington Post*，October 22，1993；Bob Egelko，“Jewish Defense Group

Settles S.F.Spying Sui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nline）， February 23， 2002； Robert I.Friedman，“The Enemy Within，” *Village Voice*， May 11， 1993；“Inquiry Is Dropped over Spy Charg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 1993，以及“The ADL Snoops，” *CounterPunch.org*， November 11， 1998。

[72] 就像在本书的第四章中所讨论的那样，我们认为“犹太人游说集团”这一术语既是误导性的，又是不适当的，因为它意味着所有犹太人都支持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立场，但却忽略了非犹太人的个人和团体也是这一松散联盟的组成部分。

[73] Mortimer B.Zuckerman，“A Shameful Contagion of Anti-Semitism in Europe，” *U.S.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7， 2002； Jeff Jacoby，“The Cancer of Anti-Semitism in Europe，” *Boston Globe*， March 21， 2004.

[74] 引自Tony Judt，“Goodbye to All That？” *Nation*， January 3， 2005。

[75] Anti-Defamation League，“Attitudes Toward Jew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in Ten European Countries，” April 2004；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A Year After Iraq War*： *Mistrust of America in Europe Even Higher*， *Muslim Anger Persists*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March 16， 2004）， pp.4—5， 26.关于反诽谤联盟的调查，参见“ADL Survey Finds Some Decrease in Anti-Semitic Attitudes in Ten European Countries，” ADL press release， April 26， 2004，以及Shlomo Shamir，“Poll Shows Decrease in Anti-Semitic Views in Europe，” *Ha'aretz*， April 27， 2004。这些研究结果其实对亲以色列的学者几乎没有影响，因为他们继续认为反犹太主义在欧洲是猖獗的。例如可参见Daniel J.Goldhagen，“Europe's Toothless Reply to Anti-Semitism： Conference Fails to Build Tools to Fight a Rising Sickness，”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30， 2004，以及Charles Krauthammer，“The Real Mideast ‘Poison，’” *Washington Post*， April 30， 2004。

[76] Martin Peretz，“Cambridge Diarist： Regrets，” *New Republic*， April 22， 2002， p.50.

[77] 本段落中的数据来自“Anti-Semitism in Europe： Is It Really Rising？” *Economist*， May 4， 2002.

[78] 引自Marc Perelman，“Community Head： France No More Antisemitic Than U.S.，” *Forward*， August 1， 2003。也可参见Francois Bujon de l'Estang，“A Slander on France，” *Washington Post*， June 22， 2002，以及“French President Accuses Israel of Conducting Anti-French Campaign，” *Ha'aretz*， May 12， 2002。

[79] “French Police： Anti-Semitism in France Sharply Decreased in 2005，” *Ha'aretz*， January 19， 2006.

[80] “French Protest for Murdered Jew，” *BBC News* （online）， February 26， 2006； Michel Zlotowski，“Large Memorial Held for Parisian Jew，”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3， 2006.

[81] Avi Beker，“The Eternally Open Gate，” *Ha'aretz*， January 11， 2005； Josef Joffe，“A Boom， if Not a Renaissance， in Modern-Day Germany，” *Forward*， July 25， 2003； Nathaniel Popper，“Immigrant Policy Eyed as German Community Swells，” *Forward*， July 25， 2003，以及Eliahu Salpeter， “Jews from the CIS Prefer Germany to the Jewish State，” *Ha'aretz*， May 28， 2003。《泰晤士报》（伦敦）也报道说，在2005年春季，“估计有10万犹太人在过去几年中已返回俄罗斯，从而在一个具有悠久反犹太主义历史的国家中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犹太生活复兴运动”。Jeremy Page，“Once Desperate to Leave， Now Jews Are Returning to Russia， Land of Opportunity，” *Times* （London）， April 28， 2005.也可参见Lev Krichevsky，“Poll： Russians Don't Dislike Jews， and More Are Against Anti-Semitism，” *JTA.org*， February 2， 2006。

[82] 以色列犹太人代理处教育科（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Jewish Agency for Israel）主席曾这样说道：“目前的反犹主义暴力源于两个不同的根源：中东和西欧激进的伊斯兰分子，以及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新纳粹青年因素。”Jonathan Schneider，“Anti-Semitism Still a World Problem，” *Jerusalem Post*， January 26， 2006.

[83] “Study： Anti-Semitic Attacks Hit Record Level in Britain in 2006，” *Ha'aretz*， February 1， 2007； Community Security Trust，“Antisemitic Incidents Report 2006，” 登录www.thecst.org.uk。

[84] 具体来说，伦敦警方报告说，反犹主义的攻击行动在5年中下降了25%，而“在伦敦发生的对黑人、亚洲人和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攻击事件则远远更高”。全球反犹主义论坛的数字显示，从2005年到2006年，反犹主义事件稍微有所下降（3%）。Jonny Paul，“Sharp Rise in U.K.anti-Semitism？ Numbers Don't Add Up for Everyone，” *JTA.org*， February 22， 2007.

[85] 关于这一争论的例子，参见Phyllis Chesler， *The New Anti-Semitism*： *The Current Crisis and What We Must Do About I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3）； Hillel Halkin，“The Return of Anti-Semitism： To Be Against Israel Is to Be Against the Jew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2002； Barry Kosmin and Paul Iganski，“Judeophobia-Not Your Parents' Anti-Semitism，” *Ha'aretz*， June 3， 2003； Amnon Rubinstein，“Fighting the New Anti-Semitism，” *Ha'aretz*， December 2， 2003； Gabriel Schoenfeld， *The Return of Anti-Semitism*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3）； Natan Sharansky，“Anti-Semitism Is Our Problem，” *Ha'aretz*， August 10， 2003； Yair Sheleg，“A World Cleansed of the Jewish State，” *Ha'aretz*， April 18， 2002，以及Yair Sheleg，“Enemies， a Post-National Story，” *Ha'aretz*， March 8， 2003。关于对此观点的批评，参见Akiva Eldar，“Anti-Semitism Can Be Self-Serving，” *Ha'aretz*， May 3， 2002； Brian Klug，“The Myth of the New Anti-Semitism，” *Nation*， February 2， 2004； Ralph Nader，“Criticizing Israel Is

Not Anti-Semitism，” *CounterPunch.org*， October 16/17， 2004； *Reframing Anti-Semitism*： *Alternative Jewish Perspectives*， *ed.Henri Picciotto and Mitchell Plitnick* （Oakland， CA： Jewish Voice for Peace， 2004），以及Finkelstein， *Beyond Chutzpah*， chaps.1—3。

[86] Helen Nugent，“Chief Rabbi Flays Church over Vote on Israel Assets，” *Times* （London）， February 17， 2006.也可参见Bill Bowder，“Sacks Seeks Talks after Synod Vote on Disinvestment，” *Church Times* （online）， February 17， 2006；“Bulldozer Motion ‘Based on Ignorance，'” *Church Times* （online）， February 10， 2006； Ruth Gledhill，“Church Urged to Reconsider Investments with Israel，” *Times* （London）， May 28， 2005，以及Irene Lancaster，“Anglicans Have Betrayed the Jews，” Moriel Ministries（UK） website， 登录www.moriel.org/articles/israel/ anglicans-have-betrayed-the-jews.htm。也可参见“U.K.Chief Rabbi Attacks Anglicans over Israel Divestment Vote，” Ha'aretz， February 17， 2006。

[87] 英国教会只是批评以色列的政策而不是在从事反犹主义活动，这种情形清楚地反映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Rowan Williams）博士2006年2月10日致大拉比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ks）的信中，以解释教会摆脱美国卡特彼勒公司的决定。“Archbishop： Synod Call Was Expression of Concern，” Church of England website，登录www.cofe.anglican.org/news/pr2006.html。

[88] Arnold Forster and Benjamin R.Epstein， *The New Anti-Semitis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用他们的话来说：“新的反犹主义的核心”是“对犹太人民严重的忧惧基本上冷漠不顾，对处理反犹太人的行为软弱而缺乏兴趣，对以色列存在的必要性之于全世界犹太人的安全和生存普遍不能够理解或不愿意理解。”（p.324）

[89] 按照珀尔马特夫妇的说法：“正是反犹主义的外柔内刚，为（里根）政府（在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交易中）的胜利提供了理由。”Nathan Perlmutter and Ruth Ann Perlmutter， *The Real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New York： Arbor House， 1982）， p.236.

[90] 用珀尔马特夫妇的话来说：“现在犹太人的利益更多地受到非犹主义政府政策——此类政策的支持者免于反犹主义的指控——的威胁，而不是他们所熟悉的祸患——残酷的反犹主义——的威胁”。这些政策包括“西方经济体对石油美元再循环的渴求”，新孤立主义和补偿性群体的权利（如赞助型行动），等等。在他们看来：“犹太人今天所面临的更大危险是来自那些虽然并非偏执、但却比长期而易于辨认的反犹主义祸患对我们造成更大危险的领域。由于不受挑战和阻止，因此这些在表面上对犹太人中立的问题，却能够伤害犹太人；而且这些需要加以抵制的问题，可能再次放任典型的反犹主义行为。”*Real Anti-Semitism*， 9， pp.231—232.

[91] 引自Hillel Halkin，“The Return of Anti-Semitism，”*Commentary*， February 2002， p.30。

[92] Natan Sharansky，“Anti-Semitism Is Our Problem，” *Ha'aretz*， August 10， 2003.也可参见Zuckerman，“Shameful Contagion”。

[93]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9）； Jack Wertheimer，“Jewish Organizational Life，” in *American Jewish Yearbook 1995*（New York：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1995）， 70，以及Frank Rich，“The Booing of Wolfowitz，” *New York Times*， May 11， 2002。

[94] Leon Wieseltier，“Hitler Is Dead： The Case Against Jewish Ethnic Panic，” *New Republic*， May 27， 2002。（所引用的亨托夫和罗森鲍姆话均见此文）。前副国务卿斯图亚特·埃森斯塔特在2007年4月提出了类似的警告，他写道：“虽然反犹主义并未灭绝，但是大屠杀的严重性已嵌入世界舆论之中。普遍性的反犹主义态度的程度已急剧下降。天主教-犹太人之间的成功对话已经存在长达数十年之久了，伴之以梵蒂冈减少以宗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的那些重要声明……大多数西欧国家有大屠杀纪念日，有几个国家还有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几乎每个主要欧洲国家都提供警察来保护犹太人的犹太教会堂和宗教学校。例如在法国，虽然来得迟了点，但是反犹主义的行动却遇到了强硬的回应。” Stuart Eizenstat，“The Dangers Are Great， but It Is Not 1938，” *Forward*， April 20， 2007.

[95] Yossi Beilin，“The Case for Carter，” *Forward*， January 16， 2007.

[96] 使用这一术语的著名的以色列人包括前总检察长迈克尔·本·亚尔（Michael Ben Yair）、耶路撒冷副市长梅隆·本维尼斯提、和平活动家尤里·阿乌内里、前教育部长舒拉米特·阿龙尼（Shulamit Aloni）以及许多以色列和平团体。参见Joseph Lelyveld，“Jimmy Carter and Aparthei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9， 2007。关于图图和卡斯利尔斯，参见Desmond Tutu and Ian Urbina， “Against Israeli Apartheid，” *Nation*， June 27， 2002，以及Jonny Paul，“South African Jewish Minister Sends Support to ‘Israel Apartheid Week’ Organizers，”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2， 2007。

[97] 就像施穆尔·罗斯纳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对卡特进行批评的人“几乎都是犹太人”，但是就像在上一段落中所引用的约西·贝林的话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对这位前总统持批评态度。“The Carter Trap，” *Ha'aretz*， January 15， 2007.关于在非犹太人中间对卡特所作出的反差很大的反应，参见M.J.Rosenberg，“Israel's Increased Isolation，” Weekly Opinion Column， Issue #308， Israel Policy Forum， Washington， DC， January 19， 2007。

[98] 所引用的福克斯曼的话参见James Besser，“Jewish Criticism of Carter Intensifies，” *Jewish Week*， December 15， 2006，以及Martin Peretz，“Carter's Legacy，” *The Spine* （*New Republic*web-log）， November 28， 2006。

[99] Deborah Lipstadt，“Jimmy Carter's Jewish Problem，”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0， 2007.

[100] “Carter Defends Book on Israel Conflict，” *Jerusalem Post*， January 21， 2007.

[101] 具体来说，克劳萨默称福山的观点为一种“使新保守主义犹太化的新奇方法”，并且说“他的观点并不是由帕特·布坎南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等人所提出的原汁原味的（观点）。那种观点认为，美国新保守派（即犹太人）只是照以色列的命令行事，正在劫持美国外交政策为以色列和更大的犹太阴谋服务。福山的立场更加狡猾和含蓄”。尽管存在这样的区别，但是克劳萨默显然认为福山是一个“隐伏的”反犹主义者。关于他们的观点交锋，参见Francis Fukuyama，“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 *National Interest 76*（Summer 2004）； Charles Krauthammer，“In Defense of Democratic Realism，” *National Interest 77*（Fall 2004）； Francis Fukuyama，“Letter，” *National Interest 78*（Winter 2004/05）；以及Charles Krauthammer，“Letter，” *National Interest 79*（Spring 2005）。

[102] Eliot Cohen，“Yes， It's Anti-Semitic，” *Washington Post*， April 5， 2006； Eli Lake，“David Duke Claims to Be Vindicated by a Harvard Dean，” *New York Sun*， March 20， 2006.

[103] Anti-Defamation League，“Mearsheimer and Walt's Anti-Israel Screed： A Relentless Assault in Scholarly Guise，” *ADL Analysis* （online）， March 24， 2006； Josef Joffe，“Common Denominator，” *New Republic Online*， April 10， 2006； Benny Morris，“And Now for Some Facts： The Ignorance at the Heart of an Innuendo，” *New Republic*， May 8， 2006； Michael B.Oren，“Quiet Riot： Tinfoil Hats in Harvard Yard，” *New Republic*， April 10， 2006，以及Martin Peretz，“Oil and Vinegar： Surveying the Israel Lobby，” *New Republic*， April 10， 2006。

[104] William Kristol，“Anti-Judaism，”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8， 2006； Ruth R.Wisse，“Israel Lobby，”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2， 2006； Shmuel Rosner，“Is Carter an Anti-Semite？” *Ha'aretz*， December 21， 2006.

[105] 所引用的内容来自Alvin H.Rosenfeld，“‘Progressive’ Jewish Thought and the New Anti-Semitism，”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December 2006， v， 9。也可参见Patricia Cohen，“Essay Linking Liberal Jews and Anti-Semitism Sparks a Furo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2007； Larry Cohler-Esses， “Anger over Broadside Aimed at Jewish Leftists，” *Jewish Week*， February 9， 2007； Ben Harris，“Suddenly， Little-Noticed Essay Is Focus of Debate on Israel Criticism，” *JTA.org*， February 7， 2007； Alan Wolfe，“Free Speech， Israel， and Jewish Illiberalism，” *Chronicle Review* （of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17， 2006，以及Gaby Wood，“The New Jewish Question，” *Observer*， February 11， 2007。

[106] Michael Lerner，“There Is No New Anti-Semitism，” *Baltimore Chronicle* & *Sentinel* （online）， February 2， 2007.

[107] Kristol，“Talking About Israel”； George Soros，“Of Israel， America， and AIPAC，”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12， 2007；“Diaspora Blues，” *Economist*editorial， January 13， 2007.

[108] Kristol，“Anti-Judaism.” 相反，克里斯托尔的解答是指责那些批评以色列的人——包括我们两位作者——“偏执”和“反犹太人”。

第二部分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行动

第二部分导论

如果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议程仅限于确保美国国会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外援的话，那么它的影响力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担忧的。虽然这些提供给以色列的钱可能派更好的用场，但是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能够负担得起每年提供给它的30多亿美元。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努力并不仅限于外援方面。就像其他许多特殊利益集团一样，以色列游说集团也想办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在它这个例子中，则主要是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方方面面。这些塑造该地区政策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物质援助是有价值的，但是让世界上这个唯一超级大国以其巨大的能力来担负代表以色列的角色，则对它甚至更有帮助。

尽管如此，如果以色列游说集团鼓励那些明显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那么其议程的这个方面就几乎不会引人关注。在此后的5章中，我们的研究显示，情形并非如此。美国今天在中东有三大主要利益：保持波斯湾的石油流向世界市场，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减少源于该地区的反美恐怖主义。虽然存在着以色列游说集团支持推进这些利益政策的事例，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组织长期推动的许多政策，却最终使得美国的情况更加糟糕。当然，这并非它们的本意，而且推动这些政策的个人和团体无疑相信，他们所赞成的行动将对美国有利。他们错了。虽然这些政策的本意是要对以色列有利，但是其中许多政策也损害了以色列的利益。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议程

除了保持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团体还寻求以它们相信那些将推进以色列利益——特别是在安全方面——的方式，来利用美国的权力塑造中东的环境。实际上，这意味着长期支持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引导美国反对那些可能同以色列相左的运动和国家。

就像在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亲以色列社会的内部，就有关成立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的价值存在着分歧，其中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领导人比草根阶层更倾向于敌视这一想法。然而，几乎

没有以色列的支持者主张对双方一碗水端平，而呼吁美国向以色列的定居点行为施压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大多数亲以色列团体——特别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核心组织——也要求美国帮助以色列维持在中东的支配性军事权力。除了保持对以色列军事设备的慷慨援助外，以色列还赞成利用美国的权力来对付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伊朗、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叙利亚。至少，以色列游说集团要求美国遏制这些所谓的“流氓国家”，并确保它们得不到核武器。这些团体中有的甚至走得更远，主张美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颠覆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权，以愿意同以色列和平相处的领导人取而代之。如果真可以成为现实的话，华盛顿将通过扩展民主和使支持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走向穷途末路的方式，来改造整个中东地区。

最后，以色列游说集团曾推动美国领导人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帮助建立一个对以色列友好的黎巴嫩。但是如果不根本性地改变伊朗和叙利亚的行为，这些目标就实现不了，因为这些国家支持并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叙利亚还有长期卷入黎巴嫩政治的历史。考虑到以色列对手之间的这些联系，以色列游说集团倾向于将它们全部看作一张联系紧密的罪恶之网的组成部分，美国如果不去摧毁这种罪恶，至少也必须牵制它。

为了对付以色列面对的这些不同威胁，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团体鼓励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大量的军事力量。就像我们的研究将要显示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向伊拉克开战的事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是更广泛的地区改造运动的第一步。即便在今天，许多支持以色列叫嚷得最凶的人，也反对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将它们部署到该地区以外的地方，因为将美国军队留在以色列的邻国，将使美国军队处于对以色列的对手进行威胁的有利位置，或者在需要时或机会出现时处于对这些以色列的对手采取行动的有利位置。

“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和以色列

20世纪90年代期间，即便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更难有理由说以色列是美国战略资产的情况下，以色列游说集团在推进它的议程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然后是2001年9月11日的攻击，它迫使美国人相当集中地关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这对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如果布什政府的结论是美国同以色列的更紧密联系使得反美的恐怖主义更加炽烈，那么它会因此通过拉开自己同以色列的距离——即

便是稍微拉开而已——来改善它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吗？具体而言，布什政府会向沙龙政府施压，要求它结束在西岸地区的殖民化的努力并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吗？美国也可能减少自己在中东地区更大范围的军事存在吗？这种军事存在从1990年以来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增加，并且是为以色列的利益而服务的。

这些并非杞人忧天。就像我们在第二章中所描述的那样，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奥萨马·本·拉登致力于巴勒斯坦事业，对美国如此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感到愤怒。同样清楚的是，他十分憎恨美国在阿拉伯土地上——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土地上——的军事存在；而将这两项政策结合在一起，则使得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怒气火上浇油，对基地组织所作的努力有所促进。美国可能对局势作出这样的回应吗？即回到它原先在中东地区“离岸平衡手”的立场，为结束以巴冲突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前恰恰存在这一类反应的先例：里根政府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黎巴嫩短暂驻军，但是在贝鲁特发生一起使241名海军陆战队死亡的自杀式爆炸后，军队就撤离了；吉米·卡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虽然也在该地区取得了真正的和平进展，但是唯有通过向以色列施压和更加不理会以色列游说集团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关注，后“9·11”时期对中东威胁的集中关注也成了以色列及其美国拥护者的一个机会。如果能够使布什政府确信以色列是反恐战争中的一个关键盟友，而且以色列的敌人也是美国的敌人，那么美国或许就能够被引回到沙龙对巴勒斯坦人的强硬做法上来，将目标对准以色列的地区对手：黎巴嫩真主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本质上必须向美国的决策者表明，试图消除在中东地区的以色列敌人对美国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那些敌人据说也是美国的敌人。就像人们将预期到的那样，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团体开始一道使这一机会变成现实。

他们的努力成功了。布什政府最终接受了以色列游说集团有关新的威胁环境的观点，拒绝了不同的观点范式。美国不仅逐渐接纳了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伊朗，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政策偏好，而且还接纳了许多以色列为这些政策进行辩护的理由。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开始听起来像是在念同一页纸上的文字语句。

以传统的智慧来看，这一结果是过于武断的。在这个版本的事件中，布什和沙龙（以及现在的埃胡德·奥尔默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的。总统及其顾问们几乎用不着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的鼓励，因为在如何应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问题上，从一开始——“9·11”事件之后甚至更是如此——他们就接受了以色列的观点。[1]

对“9·11”事件之后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如何演变的这种解释是不精确的，因为它忽视了布什政府同以色列政府之间偶尔存在的真正分歧。“9·11”事件之后的第一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布什同沙龙之间有过几次冲突。即使在这些争议解决之后，他们在关于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上依然存在重要的分歧。事实上，布什应对以巴冲突的努力有时候反映了替代性选择方案的内容，因为他呼吁作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以巴和平以及减轻阿拉伯人的敌意。这种观点在国务院和美国情报机构内部，以及着装的正规军队中得到相当的支持。在有关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方面，布什同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也存在重要的分歧。然而，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这两个问题上，以色列游说集团都成功地向布什施压以使其改变路线，并代之以接纳他的政策偏好。

进而言之，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制定美国的伊拉克和伊朗政策，以及布什政府将中东地区改造成民主地区的宏伟计划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且以色列游说集团不遗余力地使美国人相信，在2006年夏季的黎巴嫩战争期间，以色列是正确有理的一方；并保证美国两党的政治家们都无保留地支持以色列。

这些是具有争议性的主张，不应轻率作出。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和伊拉克战争期间，许多公众人物认为，布什总统的中东政策——特别是他入侵伊拉克的决定——至少是部分地打算让以色列获益。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以色列人和著名的亲以色列美国人都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挑战，在有的情况下还引发了人们所熟悉的指控，说这些人是反犹分子。但是无论是否具有争议性，此处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施加了重要的影响吗？果真如此，结果是有利于美国还是有利于以色列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而且我们相信，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绝对不是否定的。

还是让我们更密切地关注一下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吧。一开始还是让我们先看看布什政府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政策的支持，接下来再考察它入侵伊拉克的决定。然后我们将考虑到华盛顿范围更广的地区改造政策，尤其注意它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政策。最后，我们将考察美国对2006年黎巴嫩战争的应对处理。我们认为，在每一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游说集团不是那么强大，或者说以色列游说集团内的主要团体支持的是不同的方法，那么美国的政策将会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行动也将会与其国家利益更加一致，同样更有利于以色列。

---

[1] 关于一般人观点的好例子，参见Nathan Guttman，“A Marriage Cemented by Terror，” *Salon.com*，January 24， 2006。

第七章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巴勒斯坦人

2001年秋和2002年春，布什政府曾寻求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减少反美情绪，途径之一是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它停止在被占领土上的扩张主义政策，途径之二是倡议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一切现在几乎全被人们忘记了。随着“9·11”袭击的发生，美国决策者相信，停止以巴冲突或至少严肃地尝试这样去做，将削弱像基地组织那样的恐怖主义团体所得到的支持，并且促进国际反恐联盟的建立——在这一联盟中甚至可能包括像伊朗和叙利亚这样的国家。[1]

然而，布什政府却无力说服耶路撒冷改变其政策，相反，华盛顿最终支持的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强硬做法。时光流转，布什及其助理人员也开始接纳以色列这一做法的那些理由，而美国和以色列的言词也变得雷同了。2003年2月《华盛顿邮报》的大字标题是这样对局势进行归纳的：《布什与沙龙在中东政策上几乎相同》。[2]以色列游说集团是这一变化的核心原因之一。

事情始于2001年9月底。布什总统开始向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施压，要求他在被占领土上表现出克制，竭尽所能地遏制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的暴力行为。如《纽约时报》所描述的那样，布什政府向沙龙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他允许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同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进行会晤，即便布什对阿拉法特的领导持高度批评的态度。[3]10月初，这位美国新总统首次公开说他支持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建立）。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展，因为甚至连克林顿总统都是直到任期的最后数月里才敢公开说“巴勒斯坦国”的话，而克林顿曾殚精竭虑地促成一个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4]布什在“9·11”事件之前曾强调说，他打算对阿以冲突采取不插手的方法，这使得他对这一问题突然产生兴趣尤其引人注目。

这些发展使以色列领导人惊诧不已，他们害怕华盛顿可能“出卖”这个犹太国家，以便赢得阿拉伯人的欢心。《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接近沙龙的消息来源说，他对美国试图将伊朗、叙利亚以及其他支持攻击以色列的那些国家包括在美国领导的联盟之中，感到愤怒至极。”[5]10月初，沙龙的怒火爆发出来了，他指责布什企图“以我们为代价来绥靖阿拉伯人”。他警告道，以色列“将不会是捷克斯洛伐克”[6]。在沙龙发表这些评论数小时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入侵了希伯伦（Hebron，即哈利勒）的数个巴勒斯坦人地区。[7]

据报道，布什对沙龙将他的行动与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慕尼黑的投降行为扯在一起感到愤怒，而且白宫新闻秘书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称沙龙的评论是“不可接受的”[8]。虽然以色列总理在形式上进行了道歉，但是基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9]10月底，在巴勒斯坦的反叛分裂团体暗杀以色列旅游部长雷哈瓦姆·泽维（Rehavam Zeevi）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起了又一轮对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控制领土的大规模入侵。布什同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进行了私人晤谈，要求（以色列）迅速撤离；他说他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尽快撤走他们的军队”[10]。以色列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说在阿拉法特镇压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并使以色列政府满意的时候，以色列军队才会离开。英国《卫报》（*Guardian*）写道，阿里埃勒·沙龙“挑起了自从乔治·布什上台以来与华盛顿之间最为激烈的冲突，他断然拒绝了结束对巴勒斯坦人土地占领的要求，而那威胁到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生存”[11]。

通过使布什政府和美国人民相信美国和以色列面临共同的恐怖威胁，沙龙和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迅速行动起来，以解决这一不断激烈的争议。以色列官员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团体在随后的数年反复强调说，阿拉法特与奥萨马·本·拉登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因此美国和以色列应该孤立这位民选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不同他进行政治上的接触。就像沙龙在2001年12月告诉他自称的“长期支持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所说的那样：“你们在美国处在一场反恐战之中。我们在以色列处在一场反恐战之中。它是同一场战争。”[12]

沙龙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关注实际上在“9·11”事件之后就马上开始了，这比布什表示支持一个巴勒斯坦国要早上数周。9月14日，他同美国犹太人领袖进行过电话交谈，他在交谈中清楚表明，他担心布什政府将区别对待阿拉法特和本·拉登这两个人，担心布什为赢得阿拉伯人支持反恐战争而试图强硬地对待以色列。沙龙请求这些犹太人领袖予以帮助。[13]但是在紧接着的那次电话交谈之后，几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虽然部分是因为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依然为“9·11”事件所震动，可也是因为还不清楚美国的外交政策要走向何方的原因。在这个不确定的时刻，美国新世纪计划在9月20日向布什发表了一封由许多新保守派——包括威廉·J.贝内特、埃里奥特·科恩、阿隆·弗里德伯格、雷欧尔·马克·格拉齐特、罗伯特·卡根、查尔斯·克劳萨默、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威廉·克里斯托尔、理查德·珀尔和诺曼·波德霍雷茨——签名的公开信。公开信将以色列描述为“美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最坚强的盟友”，呼吁（布什）总统“全力支持我们的民主伙伴”。他也建议切断对巴勒斯坦当局的所有支持。[14]

布什打败恐怖主义粗略的政策框架在他支持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之后变得清晰多了，而沙龙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对这一新的议程都感到不快。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通过发表一项声明对布什的评论作出了立即回应，声明宣称，推动布什这一想法的顾问们是“在削弱美国的反恐战。他们是在鼓励总统去回报而非惩罚那些庇护和支持恐怖主义的人”[15]。与此同时，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主席摩提默尔·祖克曼说道，布什正推动“一项非常短视而错误的政策”[16]。亲以色列的势力开始利用一切机会来重复这一基本信息。

以色列游说集团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开始向布什政府施压，要求布什政府允许以色列国防军留在它最近重新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只要沙龙认为合适即可。反诽谤联盟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在10月23日写信给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在信中他说道，他对国务院要求以色列从最近夺取的地区撤出军队感到“极端的困惑”。他写道：“我们认为这样的评论是不恰当的，并同美国的长期政策——即以色列有权利保卫自己——相抵触。世界正团结起来打击恐怖主义，而不幸的是，巴勒斯坦当局却拒绝采取措施阻止暴力和恐怖主义。”[17]祖克曼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说布什向以色列施压是“不恰当的、过度的，并且挑衅美国面临反恐战努力的逻辑”[18]。

以色列游说集团也在国会做工作。11月16日，89位参议员寄给布什一封信，称赞他拒绝会见阿拉法特，直到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采取必要措施来结束针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他们也要求美国不要约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报复，坚持布什政府应公开声明它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这封信“源自两周前美国犹太人社会领袖同主要参议员之间的一次会晤”，《纽约时报》还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对这封信提供建议方面尤其积极”。[19]

到11月底，耶路撒冷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改观了。虽然这部分要归功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努力，但也要归功于美国最初在阿富汗所取得的胜利——这一胜利降低了人们所认为的用阿拉伯人的支持来对付基地组织的需要。沙龙在12月初走访白宫，同布什进行了友好的会晤。事实上，就在这次会晤开始之前，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的目标进行了攻击，以回应在以色列发生的3起自杀式爆炸。布什既不对以色列人进行批评，也不要求他们以后要加以克制。相反，白宫发言人强调说，“以色列是一个主权政府”，而且它“有权利生活得安全”。与此同时，布什要求阿拉法特采取更多措施来制止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20]

沙龙在2002年2月再度造访白宫，又一次友好地拜访了布什。这位以色列总理反复指责阿拉法特支持恐怖主义，将他视为解决以巴冲

突的主要障碍。布什现在显然愿意接受这种观点。他相信报道所说的，即有争议的“卡林A号船”（ Karine A ）事件背后的主谋是阿拉法特，该事件发生在一个月前的2002年1月。“卡林A号船”是一艘装有50吨武器弹药的货船，该船显然是从伊朗驶出的，在红海被以色列海军捕获。它的目的地似乎是加沙地带，尽管那时候证据并不确凿。事实上，有人认为这船武器是驶向黎巴嫩的真主党的。[21]

虽然没有直接包含阿拉法特卷入其中的确凿证据，可是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却竭力证明说阿拉法特采购了这些武器弹药，来煽动他反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活动。[22]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拒绝自己对“卡林A号船”承担责任，而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和其他人则说，他们见不到与阿拉法特无辜说法自相矛盾的证据。[23]然而，布什最后却同意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说法。布什在白宫说——他的旁边站着沙龙，“阿拉法特先生收到了我们的信。我说得再也不能够更清楚的了……他必须尽力用他的权力来打击恐怖活动。显而易见，当‘卡林A号船’暴露了它所装载的武器时，我们起初感到吃惊，继而极度地失望，这些武器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实施恐怖统治”[24]。

以色列游说集团使布什蒙羞

虽然美国和以色列的立场正合而为一，但是两国之间的麻烦却在2002年3月底再度爆发，当时一名哈马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一个犹太人逾越节[25]家宴（Passover seder）上杀死了30名以色列人：巴勒斯坦当局立即谴责了这次袭击，并保证起诉那些对此负责的人。但是巴勒斯坦当局惩罚好战分子令人沮丧的纪录使以色列人不为所动，他们已经受够了。沙龙发起了防御盾牌行动（Operation Defensive Shield），以色列国防军在此次行动中重新控制了西岸地区差不多所有主要的巴勒斯坦地区。[26]布什立即明白以色列的行动将损害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削弱反恐战争，因此他在4月4日要求沙龙“停止入侵和开始撤离”。两天后，他对这一发出的信息加以强调说，这意味着“毫不拖延的撤离”。4月7日，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告诉记者说：“毫不拖延的撤离意味着不拖延。意味着现在撤离。”同一天，国务卿鲍威尔动身前往中东向双方施压，要求停止战斗并开始谈判。

布什政府立即受到攻击，要求它改弦更张。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是鲍威尔，因为他不仅被认为对以色列缺乏同情、怀有敌意，而且在他的中东之行期间还计划会晤阿拉法特。这位国务卿立即感受到来自副总统办公室和五角大楼那些以色列坚定支持者的激烈批评，他们推动布什和赖斯放弃了约束以色列的努力。赖斯不断地给鲍威尔打电话，

有时候听起来俨然她“正在责备”他一样。他相信她的关注反映了“白宫中某个要人的观点”[27]。

新保守派也在媒体上对鲍威尔进行连篇累牍的批评。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在4月11日的《旗帜周刊》上写道，鲍威尔已经“几乎抹去了恐怖分子和那些打击恐怖分子的人之间的区别”[28]。第二天，当时正效力于《旗帜周刊》的戴维·布鲁克斯在（美国公共电视台的）“吉姆·莱勒新闻时间”节目上，将鲍威尔的中东之行描述为“一个堪与十足的灾难相对比的灾难”。他继续说道，鲍威尔“伤害了美国的威望……粉碎了美国的中东政策……而最重要的是，他伤害了我们的道德清白”[29]。以色列前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当时正在美国为以色列辩护，他说道，甚至在到达以色列之前，他的中东之行“就将意味着不会（取得）任何东西”[30]。内塔尼亚胡说对了：布什政府内部的均势如此迅速彻底地朝鲍威尔的对方倾斜，以至于他在华盛顿的副手打电话告诉在以色列的鲍威尔说：“我在这里阻止那该死的门给关上。他们却正在挖您的墙脚。”[31]鲍威尔后来说，他的中东之行是“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悲惨的10天”[32]。

鲍威尔明白了这一信息，因为在离开以色列之前同阿里埃勒·沙龙举行的一次联合记者会上，这一信息就在他的行为中得到了反映。《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的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写道：“国务卿的语言——身体语言和口头语言——当然不是工薪出纳员叫唤客户来点钱的语言。远远不是那种语言。鲍威尔先生似乎是在讨好别人、恭维别人；毫无疑问，他知道沙龙先生在华盛顿得到了多么大的支持、沙龙先生在那里的朋友们对总统有多么大的影响力。”[33]内塔尼亚胡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鲍威尔的中东之行没有“取得任何东西”。

第二个针对的目标是布什本人，他正受到来自犹太领袖和基督教福音派的压力。汤姆·迪莱和迪克·阿尔梅特别坦言需要支持以色列，而且迪莱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还在4月10日亲自出马到白宫，警告布什要使自己的政策逆转过来。[34]根据《时代周刊》杂志的说法，第二天，“由杰里·福尔韦尔牧师率领的一群福音派领导人和前总统候选人加里·鲍尔寄了一封信给布什，要求布什政府‘停止施压’使沙龙从西岸地区撤离。在福尔韦尔恳请他的追随者做同样的事情之后，白宫被电话和电子邮件给淹没了。有消息来源说，在接下来的一天，总统的高级助手打电话给福尔韦尔，保证布什支持沙龙”[35]。

同一天（4月11日），布什屈从的外部信号出现了——这离他坚持沙龙应该撤离他的军队只有一个星期，此时阿里·弗莱舍说总统相信

沙龙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36]。在4月18日鲍威尔从他那不成功的中东使命之行归来的时候，布什公开重复了这一声明，而且总统还告诉记者说，沙龙已经令人满意地回应了他要求完全立即撤离的电话。[37]虽然沙龙并不曾那样做，但是布什已不再愿意把这看作一个问题了。虽然以色列在4月21日宣布正式结束防御盾牌行动，但是以色列国防军依然留在许多巴勒斯坦人的地区，而且以色列管制制度的许多内容今天依然有效。

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其他团体继续施压。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于4月中旬在华盛顿发起了一场主要集会，出场的有阿尔梅、内塔尼亚胡、祖克曼、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以及其他著名的官员。集会人群甚至对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都发出嘘声（叫嚷“打倒阿拉法特”），因为他当时简略地提到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以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负责人莫顿·克莱因说：“如果布什不明白停止向以色列施压的信息，我们本来是会丧失这一集会良机的。”作为对这一集会的回应，一位不具名的政府官员评论道，那“不是一项基于人们欢迎的政策”。但是同样是这位官员也承认：“我们收到犹太人领袖太多的来信，我们明白许多犹太人出席这个（集会）就将正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38]

与此同时，国会也正朝向支持沙龙的方向靠拢。4月中旬，内塔尼亚胡走访了国会山，他在那里同40名参议员会晤，伴之以“堪比接待国家元首的安全警戒”[39]。5月2日，国会推翻了行政当局的反对意见，并通过了两项强化支持以色列的决议——参众两院通过的情况分别是94票对2票和352票对21票。两项决议都强调说，美国“坚定地同以色列站在一起”。沿用众议院决议中的话来说，美以两个国家“现在参与到共同的反恐斗争之中”。众议院版本的决议也谴责“亚西尔·阿拉法特正在支持恐怖活动”，将他描绘为恐怖主义问题的核心因素。[40]

数日之后，一个由两党组成的国会代表团在以色列进行的发现真相的使命中，公开宣称沙龙——此时他正在华盛顿与布什会晤——应该抵制美国行政当局要求他与阿拉法特进行会谈的压力。[41]然后在5月9日，众议院的拨款小组委员会举行会议，考虑额外拨给以色列2亿美元来打击恐怖主义。白宫反对这一揽子的拨款，国务卿鲍威尔带头与国会领袖会晤，试图阻止这一拨款。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却支持这项拨款，因为它曾经帮助国会拟就这两项决议。鲍威尔输了，而布什则心不甘情不愿地签署了这项立法，将钱款拨付给以色列。[42]

沙龙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盛气凌人地对待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并且得胜了。以色列报纸《晚报》（*Ma'ariv*）记者切米·夏勒夫报道

说：“由于鲍威尔的失败，”沙龙的助手“喜不自禁。沙龙在布什的眼中看到了傲慢，他们俩竞相吹嘘夸口，而先眨眼的却是总统。”事实上，布什所受到的羞辱没有逃过世界各地评论家的眼睛。西班牙著名日报《国家报》（*El País*）表达了许多外部观察家的观点，当时该报评论道：“如果一个国家的分量是由其对事件影响的程度来衡量的话，那么超级大国不是美国，而是以色列。”[43]但是在阻碍布什追求一项更平衡政策的努力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沙龙或者以色列，而是在美国的亲以色列势力。

“越多的事情发生改变……”

尽管有这些挫折，但是布什依然在寻找结束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起义，建立一个同以色列比邻而居，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的方法。他明白，尽快平息阿以冲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布什并没有接近实现那个目标，主要原因是自2002年春以来，布什同以色列游说集团之间的均势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种局面使以色列领导人对布什的中东政策有相当的掣肘力量，使得他们能够对自己不喜欢的政策不予理睬或使之中立化。

为寻求走出2002年初所处的麻烦困境，布什在6月24日发表了一次有关中东的主要讲话。[44]出于两个原因，这次讲话值得人们注意。第一，布什坚持认为，在和平进程往前推进之前，阿拉法特必须放弃权力。他说：“和平需要新的和不同的巴勒斯坦领导。”事实上，就像戴维·兰多（David Landau）在以色列《国土报》上所指出的那样：“看似不朽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政治上已遭到乔治·W.布什总统……的暗杀。”[45]由于以色列人数月以来都在呼吁孤立阿拉法特，因此他们对此感到狂喜不已。事实上，至少有两个著名的保守的以色列人——纳坦·沙兰斯基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声称，他们在说服布什在那次讲话中加进这一要求的内容发挥了主要的作用。[46]以色列《国土报》有一篇关于这次讲话的大字标题报道，《分析：阿里埃勒·沙龙同意他自己的想法》。[47]

第二，布什呼吁到2005年的时候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为追求那一目标，他强调说，“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必须停止”，而且由于安全局势得到改观，“以色列军队需要完全撤离至2000年9月28日（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的开始）之前所占据的位置”。由于没有更多地谈及最终的定居点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以及计划如何走到那一步，因而布什受到广泛的批评。[48]虽然布什有关未来协议的具体细节当然是含糊不清的，然而他的这些评论却是重要的。当此之际，布什政府正与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紧密协调，以形成导致以色列和

巴勒斯坦人之间进行和平谈判的“路线图”（Road Map）。所谓的四方会谈计划，是基于布什讲话中所列出的要点而具体设计的。

从根本上来说，布什政府2002年夏决定，路线图是解决以巴冲突的最佳途径。但是直到2003年春之前，在实施这一路线图方面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路线图实施的拖延要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说服阿拉法特靠边站，以及会谈的四方设计出路线图细节，乃是需要时日的。进而言之，布什政府正忙于准备伊拉克战争，它在2003年3月19日入侵伊拉克。有关路线图的严肃运动最后在3月7日开始，当时阿拉法特通过提名马哈茂德·阿巴斯担任巴勒斯坦当局的总理，来表明他正在削减自己的政治权力。[49]一个星期后的3月14日，布什宣布他准备推动路线图。4月30日，会谈四方发布了那一和平计划的详细内容。[50]

然后，总统在6月初进行了中东之行，以推动路线图，并试图加强阿巴斯相对于阿拉法特的力量。在紧随萨达姆被成功推翻的那些日子里，布什的声望如日中天。他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那得意洋洋的“使命完成”的照片，发生在此前的一个月，战后重建的那些问题在那时几乎一点都不明显，而布什在国内受欢迎的程度几乎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他处在向各方施压要求他们严肃对待和平的理想位置。他先是于6月3日在埃及会晤阿拉伯领导人，第二天又在约旦的亚喀巴（Aqaba）同阿巴斯和沙龙会晤。在此次行程之前，记者们曾怀疑布什能否向以色列施压来实现他的目标，特别是因为他2004年再次选举活动的迫近。布什告诉记者们说：“我当然能够，听着，如果由于政治原因我就害怕作出必要的决定，我就不会去走这一趟。”[51]

会晤是诚恳的，而且布什直接介入和平进程似乎是朝向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路线图无处可走。尽管沙龙偶尔在口头上应付会谈四方的计划，但是他反对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由于这些会谈的目的是在被占领土上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因此他没有兴趣来同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他对路线图的反对早在2003年3月之前就已经明明白白了。《华盛顿邮报》在2002年12月16日的一篇社论中认为，虽然沙龙“一直在告诉选民他准备支持布什的计划”，但事实却是，他的“公使在会晤美国官员时曾严厉地批评‘路线图’草案。按照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在最近一次内阁会议中，沙龙先生亲自将布什政府的计划看作‘是不相关的’而不加以理睬”[52]。

2003年3月中旬，沙龙并没有公开说很多的话，当时布什宣布他正在朝前推动路线图，主要是因为当美国正准备入侵伊拉克的时候，他不想对布什进行批评。[53]然而，沙龙对此计划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就像切米·夏勒夫在他《前沿》上的一篇文章中所清楚表明的那

样：“沙龙及其顾问的战略目标，是最终破坏路线图和排除所谓的马德里四方会谈（Madrid Quartet）的其余三方（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积极介入和平进程。”[54]4月中旬，以色列《国土报》在一篇社论中宣称，沙龙“没有为了取得基于妥协的和平安排而使他的内在概念发生必要的变化。显而易见……总理还没有放弃他的定居点和逐渐兼并西岸地区的想法”[55]。

考虑到沙龙对路线图的反对，引用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主席祖克曼的话来说，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主要团体的负责人将布什的计划看作“无路可走的路线图”就几乎没有什么好让人吃惊的了。[56]在布什3月14日说他正使路线图滞后的数小时内，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在白宫同一个犹太领导人代表团进行了会晤。根据以色列《国土报》一篇文章的说法，这一会晤的目的是“弱化美国对犹太人有关此项计划持保留意见的立场”[57]。但是根据同一篇文章的观点，“赖斯不能够缓和许多会议参加者的关注”。反诽谤联盟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执行副主席马尔科姆·霍恩莱因尤其尖刻。虽然霍恩莱因说需要等待以色列对此计划的反应，但是他强调说，如果以色列表达保留意见，美国犹太人社会将予以支持。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也在国会山发起了一封致布什总统的信函，敦促他在有关路线图的问题上不要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在以色列作出任何让步之前，应要求巴勒斯坦人完全遵守该计划的安全要求。到5月初的时候，有85名参议员和283名众议员在这封信上签了名。[58]虽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最终有条件地支持该路线图，但是路线图计划却没有尽力赢得在国会的支持，这“实际上为那些公开反对这一计划的团体大开了游说之门”[59]。许多亲以色列的评论家对布什政府推进路线图的决定进行非难。例如，在《华盛顿邮报》上写文章的查尔斯·克劳萨默就坚持认为，只要阿拉法特保持任何权力，“沿着路线图前行”就是“外交自杀”。[60]然而，《纽约时报》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却对那些主要犹太组织不支持该和平计划进行批评。[61]除了像“恢复和谐社会”和以色列政策论坛这样更具鸽派色彩的团体外，几乎没有什么亲以色列的团体热心支持路线图计划。那意味着该路线图计划不会有未来可言。

结果，当路线图的详细内容在4月30日全部写出来的时候，以色列强硬派并不是非常担心。在以色列《国土报》上第二天的一篇文章中，布拉德利·布尔斯顿问道：“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在笑呢？”[62]答案是布什政府已经私下同沙龙及其助手达成了一系列的谅解。这些谅解缓和了他们对四方会谈和平计划的担心。[63]事实上，《金融时报》

报道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两位主要角色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和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秘密地向沙龙保证说："他在路线图上不会面临美国的压力。"[64]

然而，在2003年6月初布什的中东之行后，沙龙肯定是担忧的。布什的这次中东之行，被普遍看作推进总统和平努力的重要一步。就在总统回到美国之后不久，以色列进行了杀死哈马斯主要领导人阿卜杜拉·阿齐兹·兰提斯（Abdel Aziz Rantisi）的不成功图谋。这是5天中7个定点暗杀目标中的第一个。[65]5月沙龙已经答应国务卿鲍威尔，以色列将停止定点暗杀，除非他们牵涉"定时炸弹"（ticking bomb），而在这起定点暗杀当中，情形却并非如此。[66]事实上，哈马斯曾在这次攻击的前一天宣告，它愿意恢复有关停火的会谈。[67]进而言之，《前沿》周报报道说，在亚喀巴峰会上，沙龙曾"同意避免可能'激化'局势和削弱这位巴勒斯坦新总理地位的行动"[68]。以色列批评家明白，以色列总理现正试图使路线图消亡。有位以色列《国土报》的记者写道："以色列人清楚暗杀行动的反常时机。"[69]

布什对此并不满意。但是他只是对沙龙进行了轻微的责备，他在6月10日说："我对以色列直升机炮舰最近的攻击感到困惑。"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说法，布什的助手只是"略微强硬一点而已"。但对于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强硬派来说，即便是对以色列最轻微的批评也是不能够接受的，他们立即对布什那一刻所显示出来的独立性进行掣肘。迪莱私下会晤总统的助手，告诉他们说，如果布什继续批评以色列，那么他就将推动国会提出一项支持以色列的决议。6月11日晚，布什在白宫举办一个招待100名犹太领袖的餐会，以庆贺在大屠杀纪念博物馆（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中举办的一个新展览。那天晚上私下与布什进行会晤的马尔科姆·霍恩莱因说，总统"和白宫的其他人认识到，他们的反应能够产生反效果"。霍恩莱因继续说道："根据每个人所告知的情形，那些评论使人们有点感到吃惊，白宫非常清楚这一点。"[70]

到第二天的6月12日，白宫进行了又一次的彻底改弦更张，转而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协调一致的声明中，白宫和国务院官员试图将对以色列行动的外交关注，转移到一个星期前埃及首脑峰会上阿拉伯领导人所作的承诺——减少资助和支持恐怖分子对以色列人的攻击。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在打给阿拉伯外交部长们的一轮电话中证明了那一点。"[71]白宫新闻秘书阿里·弗莱舍说道："问题不是以色列"，问题是"正在进行杀戮的恐怖分子，他们企图中止有希望取得进展的进程"。[72]那个月稍晚的时候，众议院以399票对5票通过了一项决议，以表达"同以色列人民团结在一起"，并且

说以色列完全有理由使用武力来对付恐怖主义。[73]

虽然布什又一次试图对以色列的行动——这些行动强化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削弱了布什政府的反恐战——加以约束，但他却以忍受又一次的羞辱失败而告终。[74]

单边主义登场，路线图出局

完全相同的模式在2003年7月底显而易见地出现了，当时布什政府开始对所谓的安全墙发出反对的声音，这一安全墙被普遍认为是以色列企图形成“既成事实”，从而成为谈判解决方案的主要障碍。问题不在于安全墙本身的建立，而在于安全墙所计划的路径——这堵安全墙事实上将使被占领土上的其他部分连接在一起，给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增加额外的困难。[75]7月25日，布什在与巴勒斯坦总理马哈茂德·阿巴斯举行的一次白宫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自己的不快：“我认为该（安全）墙是一个问题，而且我同阿里埃勒·沙龙讨论过这一问题。由于有一堵墙蜿蜒穿过西岸地区，因此在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之间发展信任是非常困难的。”[76]但沙龙4天后却在白宫清楚地表明——布什就站在他的身边，他打算继续修建安全墙，尽管他说会尽量减少安全墙带给巴勒斯坦人的困难。布什没有对沙龙进行挑战，而是相反，接受了这位总理的观点，即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是“和平的根本障碍”[77]。

然而，布什政府继续表达其对安全障碍的不快。国务卿鲍威尔在一次访谈中认为，安全墙是以色列夺取巴勒斯坦人土地的企图，而康多莉扎·赖斯则暗示，布什政府可能从美国4月份批准的用于安全墙费用的担保贷款中扣除90亿美元。[78]就像参议员查尔斯·舒默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在国会中的支持者动员起来对白宫强调说，如果总统“蔑视国会的意志，试图因为以色列自身的防卫而惩罚以色列，那么国会将动用一切权力来保证这些担保贷款不受阻挠”[79]。以色列人自己对此并不严重关注。就像一位以色列高官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没有任何压力……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取向的政府。现实有时候是由政治约束力来形成的。”[80]

然而，担保贷款问题不会就此消失；11月底，布什政府说它将从那一年早先时候拨给以色列的30亿美元担保贷款中削减2.895亿美元。以色列游说集团之所以没有对此进行强烈的抗议，主要是因为这实际上只是一种从轻处罚而已。美国没有削减给以色列的直接外援——那是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物质援助的真正重要的部分。减少大约10%的担保贷款，只是意味着以色列只需对它打算借贷的全部款项中的一小部分支付更高的利息而已。以色列前财政总局局长估计，更高

的利息每年将耗费以色列大约400万美元；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繁荣兴旺的国家来说，这不是一笔很大数目的钱。[81]

布什政府在2003年秋赢得了另外一个小小的胜利。沙龙威胁说要从西岸地区把阿拉法特赶走，并打发他去流亡。鲍威尔和赖斯告诉以色列人说，驱赶巴勒斯坦领导人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人明白了其中的含义，而阿拉法特则在西岸地区待了下来。[82]

但是，这些小小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潮流的改变。相反，在2003年秋天，通过提出自己的单边撤离计划，沙龙开始一劳永逸地朝破坏乔治·布什路线图的方向前进。[83]沙龙邀请著名的新保守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近东及北非事务高级主任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在罗马秘密会晤。在会晤中，沙龙通知这位美国官员说，他打算将自己的解决办法强加给巴勒斯坦人，而不是追求路线图中所呼吁的谈判解决办法。[84]就像这一政策在此后数月中的演变一样，很清楚，以色列将首先从加沙地带的所有定居点撤离，并把那一地区移交给巴勒斯坦人。随后以色列虽然会把西岸地区的某些地方移交给巴勒斯坦人，但是却将那片被争夺的土地的大部分留给自己。

沙龙将被占领土的这些部分留给巴勒斯坦人，不是基于对他们的苦难所怀有的同情之心，而是担心如果以色列保留加沙地带和整个西岸地区，阿拉伯人的数量在“大以色列”将很快超过犹太人。换言之，这位总理的政策动力是人口统计学问题。[85]

巴勒斯坦人在这一过程中将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以色列将支配解决方案的条件，而且巴勒斯坦人最终将得不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在沙龙最亲密的顾问达夫·维斯格拉斯（Dov Weisglass）像下面这样说的时候，他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所作所为的意义……是冻结政治进程。而当你冻结了那一进程的时候，你就防止了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你就防止了对有关难民、边界和耶路撒冷问题的讨论。实际上，这个被称为巴勒斯坦国的一揽子计划，它所包含的一切东西，都已经无限期地从我们的议程上抹去了。”维斯格拉斯还说道，沙龙的计划“实际上是甲醛。[86]他提供必要的甲醛量，结果是同巴勒斯坦人之间没有政治进程可言”。[87]

人们可能预期布什会对沙龙感到愤怒，并且保持路线图的生命力，据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说，特别是因为总统认为，“那将是带来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唯一路线”[88]。但那并不是所发生的事情。2004年春，布什公开支持沙龙的单边手段，他说那是一个“勇敢的步骤”，而且由于沙龙追求这种单边手段，世界应该向沙龙进行“道谢”。[89]然后在4月14日出现了一次大转弯，布什通过宣告以色列不必归还它在

1967年占领的几乎所有土地，巴勒斯坦人将不被允许回到他们先前在以色列的家园，而是必须定居在一个新的巴勒斯坦国，从而颠覆了一项自林登·约翰逊以来每位美国总统都声明过的政策。[90]此前，美国的政策是以色列人同巴勒斯坦人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谈判。虽然这些步骤在中东激起了怒火，但是在美国却被普遍看作乔治·布什在准备再次竞选总统年份里漂亮的政治表演。[91]

《纽约时报》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在2004年初所写的东西，抓住了布什有关以巴冲突困境的本质："沙龙先生不仅将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囚禁在他的拉姆安拉（Ramallah）的家中，而且将乔治·布什囚禁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中。沙龙先生让坦克包围阿拉法特先生，却让犹太人和基督教亲以色列的游说人员、让一个准备做沙龙命令他一切事情的副总统迪克·切尼、让告诉总统不要在选举年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的政治经理人员包围布什先生——所有这些人都协同起来确保总统一事不做。"[92]

在这整个期间，以色列人继续在西岸地区修建定居点，尽管美国抗议，尽管路线图明显要求以色列"冻结所有的定居点活动——包括定居点的自然增加"[93]。他们也继续暗杀巴勒斯坦领导人，有时候是在最无济于事的时刻——至少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看是如此。例如，以色列国防军在2002年7月22日使建议的巴勒斯坦停火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它在当时杀死了著名的哈马斯领导人西克·萨拉·西哈达（Sheik Salah Shehada）以及其他14人——其中包括9个孩子。虽然白宫谴责这次袭击"下手过重"，但是却没有迫使以色列结束其定点清除的暗杀政策。[94]就像先前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国防军在2003年破坏了另外一次快要出现的停火，当时它企图杀死哈马斯另一位领导人兰提斯，但却并不成功。

2004年3月22日，以色列使用美国制造的狱火导弹暗杀了哈马斯领袖西克·阿默德·亚辛（Sheik Ahmed Yassin）。这一举动被普遍看作对美国中东立场的严重打击，原因不仅是因为以色列使用了美国武器，而且也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许多人相信，布什政府为以色列杀死一个坐在轮椅上半身瘫痪的人开了绿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吉姆·霍格兰在那起暗杀事件发生后即刻写道："除了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这一可能的例外，没有哪个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像沙龙那样，不断地使得现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更加严重地复杂化。他以令所有其他人大吃一惊和别无选择的斗士的固执和直率，去追求以色列的利益。"[95]在不到1个月后的2004年4月17日，以色列国防军最终杀死了兰提斯。[96]

阿拉法特去世了，而一切却依然如故

阿拉法特在2004年11月去世，阿巴斯作为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出现，因为他在2005年1月的一次和平民主的选举——外界的观察家欢呼这是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最终当选了。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推动和平进程朝前发展的理想机会，因为阿巴斯承认以色列、放弃恐怖主义、渴望设计出一个解决冲突的谈判方案。[97]进而言之，布什刚刚赢得了第二个任期，因此比任何总统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帮助支持温和的阿巴斯。布什政府虽然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位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但是对于帮助他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国家，却几乎一事无成，因此最终削弱了他的权力基础。

布什几乎帮不上阿巴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已经承诺支持沙龙——及其继任者埃胡德·奥尔默特——单边性地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撤离，因而与他自己所宣布的路线图的必要性相抵触。布什正支持一项不承诺巴勒斯坦人得到自己可以生存下去的国家的战略，这一战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该计划的命运。

有一些亲以色列团体，如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正统犹太教组织，反对放弃任何领土给巴勒斯坦人。但是像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人大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这样的主要组织，却支持以色列的撤离。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的高级官员估计，介于60%至75%的领导人赞成撤离，这足以保证以色列游说集团最终支持沙龙和布什改变政策，尽管这种支持的热情并不是很高。[98]

通过拒绝与阿巴斯进行会谈，使阿巴斯不可能将看得见的好处带给巴勒斯坦人民，沙龙直接帮助了哈马斯在2006年1月的选举中获胜。以色列《国土报》专栏作家布雷德利·布尔斯顿就在那次选举举行之前写道：“如果对于你来说似乎……以色列是下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的哈马斯竞选经理，几乎没有人——特别是在哈马斯里面——会对此持有异议。”[99]由于哈马斯掌权，以色列有了另外一个不谈判的理由，而且布什政府甚至更加没有可能推动他们同巴勒斯坦人进行会谈。

更为糟糕的是，以色列的单边撤离政策在2006年夏天失败了，这离埃胡德·奥尔默特作为新总理首次造访白宫时布什欢呼该项政策的时间大约是两个月。[100]在2005年8月撤离加沙地带后，以色列人实际上用警戒线将那一小片不动产给隔离起来了，从而使得生活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不可能过着体面的生活，更不要说奢望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继续将火箭弹发射到以色列，而且那时他们还在2006年6月25日抓获了一名以色列士兵。由于以色列人感到局

势变得不可容忍，因此在3天后他们重新进入加沙地带。[101]对大多数以色列人——当然也是对奥尔默特——来说，很快变得明显的是，如果他们从西岸地区的一些地方单边撤离，并实际上封锁留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就将面临类似的局面。

在数周之后的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在沿以黎边境的地方抓获了两名以色列士兵，由此突然引发了一场战争，战争中黎巴嫩真主党将火箭弹投射到以色列北部。考虑到以色列在2000年从黎巴嫩南部单方面撤离，这场危机强化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只是从西岸的部分地区撤离本身不会结束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结果，在以色列公众的支持下，奥尔默特在2006年夏末放弃了单边撤离行动。在2007年1月接受中国新华社的一次坦诚的采访中，奥尔默特说，在2006年1月接替瘫痪的沙龙的时候，他对采取单边战略——或者他所称的“汇聚计划”（convergence plan）——能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抱有信心。但是他错了，而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谈判而非（单边）撤离，将是实现两个国家解决方案更现实的做法”。[102]

赖斯变得“鲍威尔化”[103]

布什政府也理解，单边主义是一种正在失败的战略，因而它开始再次沿着路线图计划推动一项谈判决议。2006年底，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率先试图使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举行会谈。[104]她的目标是开始讨论有关全面解决方案的粗略纲要——她将此称为“政治前景”——应该像什么样子。

在赖斯严肃推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的同时，沙特阿拉伯人在2007年3月说服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简称阿盟）重新发布它的2002年和平计划。就像原先的计划一样，新的建议不仅提出了建立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正常关系，而且提出了建立以色列同所有22个阿盟成员之间的此种关系。作为回报，以色列将必须从所有被占领土和戈兰高地撤离，接受在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被占领土上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谈判“公正地解决”相关各方“取得一致意见”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105]沙特阿拉伯人清楚地表明，该建议是谈判的基础，而非要么接受要么拉倒（take-it-or-leave-it）的协定。

美国人和沙特阿拉伯人都有强大的动力来结束以巴之间的冲突。[106]继续美国对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政策，不仅给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火上浇油，而且使得布什政府让阿拉伯国家来帮助它对付伊拉克战争以及伊朗的核问题更加困难。就沙特阿拉伯人而言，虽然他们要密切同美国人一道来遏制伊朗，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却有限，因为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在沙特阿拉伯人民中间造成了无比的愤怒。沙特阿拉伯人也需要结束冲突，因为伊朗正在从被占领土上的激进巴勒斯坦势力中间获得影响力。

考虑到这些情形，有利于和平进程取得严肃进展的条件似乎成熟了。但是进展却没有发生。奥尔默特对阿盟的倡议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这似乎注定了该建议同2002年的和平建议一样具有相同的命运。以色列总理对此项建议的某些内容并不满意，如规定以色列必须从所有被占领土上撤离。他同样拒绝在巴勒斯坦人“回归权”问题上进行任何妥协，2007年3月，他告诉《耶路撒冷邮报》说：“我不会同意任何以色列就此问题承担责任的观点。打住。”他继续说道，甚至连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回到以色列都是“不可能的”[107]。

但是，如果以色列同意以那一建议的基础来进行谈判的话，那么，那一争论和其他的问题就可以在继起的谈判中进行处理。以色列《国土报》在3月底的一篇社论中很好地陈述了这一点：“一个现实主义的政府本会求之不得地接受这一承认与和解的意愿，对它不接受的东西表达保留意见，并且在区域层面上寻求对话。”[108]5月中旬，由于没有成功地追求同阿拉伯人之间的和平，奥尔默特受到广泛的批评，包括两位以色列坚定的支持者——反诽谤联盟的亚伯拉罕·福克斯曼和诺贝尔奖得主埃利·维瑟尔——的批评。奥尔默特回应说，虽然以色列愿意讨论阿盟的倡议，但是他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超出言辞的行动。相反，以色列发起了责备阿拉伯人要对和平倡议失败负责的外交行动。[109]

布什政府几乎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来推动奥尔默特接受阿盟的建议，虽然它确实敦促过阿拉伯领导人将建议改变成以色列喜欢的内容。[110]至今为止，赖斯推动和平进程向前发展的努力已经失败。作为发起者，赖斯在2007年2月初同来自15个主要犹太人组织领导人的一次会晤中清楚地表明，布什政府不仅将不对以色列施压，而且它也不会提出“政治前景”看起来可能像个什么样子的建议。[111]这些退让极大地限制了这位国务卿的效力。赖斯随后前往耶路撒冷，在2月19日使奥尔默特和阿巴斯在那里一起进行会谈。但是赖斯恢复和谈的努力破产了，因为以色列总理拒绝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的纲要。事实上，奥尔默特和阿巴斯都拒绝与她一起出席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此后不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次会议的社论，标题为《耶路撒冷的猜字游戏》。该社论指出，在赖斯宣读“他们一直不情愿同意内容不受约束的联合声明”的时候，她甚至连让这两位领导人同她站在一起都做不到。[112]

2007年3月底，赖斯回到以色列同奥尔默特进行会晤，提出这样

的一种可能性，即她可能充当以巴之间的调停者。这是她8个月里第七度走访以色列。奥尔默特断然拒绝了赖斯充当外交掮客的想法，结果迫使她取消了会后计划好的记者招待会。奥尔默特和赖斯会晤后一天，（伦敦的）《每日电讯报》的大字标题道出了一切：《以色列冷落康多莉扎·赖斯》。[113]国务卿两手空空回到华盛顿，并且在布什政府离职之前，也几乎看不到布什政府将使阿以和平取得有什么意义进展的前景。

这一结果不仅是对国务卿的羞辱，而且也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左。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至少是由两个因素所导致的。第一，就像他的前任沙龙一样，奥尔默特对同巴勒斯坦人谈判和平决议不感兴趣，因为那将要求以色列放弃几乎所有的西岸地区，并在那片领土上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奥尔默特曾清楚地表明，虽然他愿意放弃西岸地区的部分土地，但是他打算为以色列保留大部分的西岸地区。事实上，他的政府在2006年12月底曾宣布，它将在10年中在西岸地区建立第一个定居点，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以色列宣布说它计划在以色列现有的最大定居点马阿里·阿杜米姆（Ma'aleh Adumim）修建新的房舍。[114]如果和平意味着将大约95%的西岸地区交给巴勒斯坦人的话，那么以色列将喜欢占领胜于和平。[115]

有人可能会认为，和平的真正障碍不是以色列，而是2006年1月上台并依然致力于摧毁以色列的哈马斯。毫无疑问，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社会内部不断升高的地位，使取得任何和平的努力变得复杂化了。然而，这个问题并非不可克服。如果以色列人对同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真的感兴趣，他们可以同阿盟、阿巴斯以及哈马斯内部更温和的成员一道来推进和平进程，孤立——甚或可能转变——哈马斯里面的拒绝派以及像伊斯兰杰哈德这样的其他激进团体。[116]但相反，以色列人几乎没有热情同那些阿拉伯人一道达成和平，虽然对于同这个犹太国家达成和平真正感兴趣的阿拉伯人的人数在不断增加。通过削弱要求达成和平的温和派，这一政策只是强化了那些宣称暴力是唯一有效手段的小派系。

第二，美国亲以色列的力量使得美国——特别是国务卿赖斯——将奥尔默特推向和平成为不可能。在白宫内部，对以色列施加任何有意义的压力的主要障碍是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然而，他却得到两位强有力的新保守派的帮助，他们是为副总统效力的约翰·汉纳和戴维·乌姆瑟尔。吉姆·洛贝（Jim Lobe）报道说，各种消息员告诉他："艾布拉姆斯一直在系统地削弱赋予赖斯实质希望的任何严肃谈判前景——以及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那越来越令其不耐烦的要求，这是因为该要求将给予巴勒斯坦人最终解决问题的'政治前景'。"[117]

艾布拉姆斯同奥尔默特的总参谋长约拉姆·塔波维茨（Yoram Turbowitz）和外交顾问沙洛姆·图尔曼（Shalom Turgeman）关系密切，他们一道协力确保布什政府不推动以色列追求奥尔默特不喜欢的政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顾问丹尼尔·利维（Daniel Levy）指出："如果赖斯太过于热衷她的制造和平的诉求，那么双T——约拉姆·塔波维茨和舍拉姆·图尔曼——就将总是能够被派到在白宫的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那里，艾布拉姆斯回过头来又请求切尼的帮助来拖住总统。"[118]相应地，在外交关系委员会长期研究中东问题的亨利·西格曼坚持认为："每当出现美国最终可能严肃参与政治进程的最轻微苗头时，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总是同奥尔默特在欧洲或其他地方的公使进行秘密会晤，以向他们保证不存在这样的危险。"[119]就在赖斯2月19日为参加同奥尔默特和阿巴斯的会晤而抵达以色列之前，通过让媒体得知他在前一天已经同布什进行过交谈，并且"总理和总统看法一致"，以色列总理使得国务卿安分守己。就像阿留夫·本（Aluf Benn）和施穆尔·罗斯纳在以色列《国土报》上所写道的那样："该信息是明白无误的：赖斯曾说过的几乎无关痛痒。"[120]

布什政府内部重重反对赖斯均势的程度，由2006年末国务院法律顾问菲利普·泽利考（Philip Zelikow）的辞职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是赖斯的长期朋友、作品的合著者，以及最密切的顾问之一。到2006年夏末的时候，他正鼓励赖斯进行严肃的努力，以使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谈判一个和平协议。他感觉到，如果华盛顿希望使阿拉伯国家和欧洲人同自己形成一个有效的针对伊朗的联盟，那么上述和平协议就是至关重要的。他在2006年9月15日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一次讲话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21]

这次讲话之后，亲以色列团体立即提出抗议。而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国务院立即使自己同这次讲话拉开距离，发表声明否认自己与此有任何关联；被泽利考的评论弄得神情紧张的以色列官员说，赖斯女士后来对以色列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保证，美国将伊朗和巴勒斯坦问题看作两码事情。"[122]泽利考则宣布他在下一个月打算离开国务院。在辞职信中，虽然他对离开国务院的解释是因为止痛药的原因，但是不具名的白宫消息来源却说，他的离职部分原因是他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不满意。2007年3月初，赖斯任命新保守派埃利奥特·科恩——一个在新美国世纪计划此前所有信函上签过名的人——为泽利考的继任者。[123]

尽管努力的空间受到限制，但是赖斯曾试图以哈马斯为代价来帮助加强阿巴斯的地位。可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也在那条战线上限制她的效力。具体而言，布什总统在2007年1月底决定给阿巴斯6800万美元

来加强他的安全部队。但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妮塔·洛维（Nita Lowey）却阻止了这一要求。[124]洛维是以色列坚定的捍卫者，是一个重要的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另一位亲以色列的立法人员安东尼·韦纳写信给赖斯，要求她撤销所要求的钱款。[125]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莫顿·克莱因也参加到辩论中来，他说布什“对阿巴斯应该像对哈马斯和基地组织一样强硬。”[126]

许多犹太人领袖持有像克莱茵对阿巴斯不妥协那样的相同观点。[127]他们尤其对阿巴斯在2007年2月同意加入到哈马斯的联合政府中感到不快，即便这位巴勒斯坦总统清楚地表明，他依然致力于对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和同以色列和平相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试图推动国会使美国政府不可能与联合政府中的任何人打交道，其中包括阿巴斯；但是它的这一努力失败了。[128]为了安抚洛维，布什政府将那笔要求的钱款减少至5900万美元，规定这笔钱款只用于训练、采购非致命性设备，以及改善以色列和加沙地带之间一个关键交叉点的安全。洛维赞同这一安排，而这笔钱款则被批准了。[129]

然而，布什政府孤立和边缘化哈马斯的努力，在2007年6月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当时哈马斯在美国加强法塔赫的安全部队之前而将他们赶出了加沙地带，并且夺取了那里的权力。在支持阿巴斯的迟到的努力中，以色列答应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和冻结巴勒斯坦的税收，而且耶路撒冷和华盛顿还放松了一些经济限制。但是并无迹象表明以色列将给予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建立他的权威并压住拒绝派所需要的东西：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国家的现实前景。因此，冲突将继续恶化，从而进一步损害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立场。

结论

如果没有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话，布什政府几乎肯定将远比现在更加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在推动以巴和平方面将远为顽强。毕竟，美国在利用各种工具迫使其他国家改变其行为以符合美国的利益方面，有着丰富的历史，尤其是在近些年里更是如此。随着苏联的解体，华盛顿反复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取得让步，而且后来它还向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施压，迫其放弃自己的核武器。类似的努力最终劝服利比亚放弃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以换取放松对它的全面经济制裁。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进行密集紧张的空战，以迫使塞尔维亚从科索沃撤离，而布什政府则向无数的国家施压拒绝建立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就像我们在第十章中所详细讨论的那样，美国花了相当的精力来说服伊朗放弃自己的核野心。为了取得最终的和平安排，向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和相关的阿拉伯国家施

压，将几乎不会与美国在其他问题上的行为相抵触。

美国在处理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它可以威胁切断对以色列的所有经济和外交支持。如果那还不够的话，它在纠合国际支持以孤立以色列方面几乎不存在什么困难，完全可以以20世纪末将南非单挑出来并孤立它的方式来进行。关于巴勒斯坦人，美国能够继续承诺使他们在被占领土上实现一个可以生存的国家的梦想，佐之以大规模的长期经济援助。作为回报，巴勒斯坦人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活动。考虑到以色列内部的分裂以及巴勒斯坦领导的经常性失效，还有以巴双方都存在的拒绝派的暴力，达成最终的决议并非易事。但是无所事事或者如此一以贯之地支持以色列，没有使事情得到改观。相反，这一政策几乎肯定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情况更糟，继续销蚀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使得美国在应对像伊朗和伊拉克这样的紧急问题时更加困难。

有人可能认为，考虑到以色列在许多美国人眼中普遍存在的良好形象，这一分析是不切实际的。按照这种观点，布什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人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公众舆论强烈地支持以色列所致。简而言之，总统恰恰是在对人民的意志作出反应。我们以前就见识过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美以之间特殊关系道德理论的核心。然而，这种解释忽视了这样的论据，即如果是一项规模更大的和平协定，美国人民是愿意向以色列施压的。虽然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以色列的同情多于对巴勒斯坦人，但是他们也对一项更为平衡的政策表明了相当的支持。例如，大多数美国人普遍支持布什2002年春对以色列强硬立场的努力。4月10日至11日由《时代》/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进行的联合民意调查发现，60%的美国人感到，如果沙龙拒绝从他所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撤离，就应该取消或减少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进而言之，75%的被调查者认为，在走访以色列的时候，鲍威尔应该同阿拉法特进行会晤。关于沙龙，只有35%的人发现他值得信任，而有35%的人认为他是个好战分子，20%的人将他看作恐怖分子，25%的人认为他是美国的敌人。[130]

一年之后的2003年5月，由马里兰大学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报道说，如果以色列在解决冲突问题上抗拒美国的压力，有超过60%的美国人愿意扣留美国给以色列的援助。在“政治上活跃的”美国人中间，那一数字上升到70%。事实上，73%的人说，美国不应该支持冲突的任何一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只有17%的回应者同意布什和沙龙的主张——以巴冲突是“恐怖主义战争的组成部分”。相反，54%的人将其看作“两个民族群体之间为争夺同一片土地的冲突”。同一民意调查还显示，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对路线图不甚了解，但是有55%的人对它

持“正面看法”。当被告知路线图的主要内容时，支持率上升到74%。[131]甚至由反诽谤联盟在2005年进行的一次调查都发现，有78%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政府应该既不支持以色列，也不支持巴勒斯坦人。[132]

自“9·11”事件以来，当相信对以色列施压符合美国的利益时，美国人民已经接受了对以色列施压的做法。布什总统也已承认，让巴勒斯坦人得到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自己的国家，是结束以巴冲突的唯一途径；而且他的政府已数次试图推进那一目标。但是公众舆论和总统的倡议都不很管用，因为以色列游说集团已经使得美国向以色列施压谈判解决方案变得不可能了。

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布什在2001年秋正式支持巴勒斯坦国这一想法。2002年春，他呼吁以色列从西岸地区的数个巴勒斯坦地方撤离军队，委派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到该地区发起和平进程。同年夏天，布什发起了路线图的倡议，那被认为是提供了导致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巴勒斯坦国的清晰时间表。第二年，布什巡访中东地区以推动路线图计划。在2006年以色列将单边解决方案强加给巴勒斯坦人的计划失败以后，布什政府——以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打头阵——重新进行结束冲突的努力。

在每种情况中，以色列游说集团都迅捷有效地减缓了布什政府所作努力的作用。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曾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公开信、国会决议、不代表报纸立场的评论和新闻发布会，以及布什政府官员与有影响力的犹太人领袖和基督教福音派团体之间的直接会晤。对以色列怀有同情的政府官员——如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在这些努力中帮助使力，不时同以色列官员会晤，反对那些正在进行当中的倡议。布什政府每次支持的都是沙龙（和现在的奥尔默特）所选择的政策，而不是使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迈向和平（例如，通过将美国的支持同以色列在路线图上的合作联系到一起）。就像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在2004年10月所宣称的那样，沙龙将布什总统“玩弄于股掌之间”[133]。

以色列挑衅美国的能力，甚至让华盛顿遵照它所偏好的手段来应对巴勒斯坦人，典型地说明了利益集团政治在起作用。尽管公众舆论调查显示，美国人民将支持迫使以色列给予巴勒斯坦人一个公平解决方案的做法，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团体，尤其是它的强硬派团体，却比一般的美国人更加关心这一问题。结果，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样的团体，以及像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这样的组织的领导人，能够对民选官员施加不成比例的巨大压力，而且他们的政策偏好更加有可能胜出，即便是对美国不利的，即便是在总体上也

对以色列造成无意伤害的。

虽然坚持美国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许多团体的核心目标，但是他们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此。他们也要求美国帮助以色列维持在该地区的支配性力量地位。以色列政府和美国的亲以色列团体携手制定了布什政府的对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政策，以及它重组中东的宏大计划。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以色列游说集团和以色列是如何影响美国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的决定的，入侵决定的期望是，这一大胆的打击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化。

---

[1] Thomas Oliphant，“A Delicate Balance，” *Boston Globe* ，September 18， 2001； Jane Perlez and Patrick E.Tyler，“Before Attacks， U.S.Was Ready to Say It Backed Palestinian Stat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 2001.

[2] Robert G.Kaiser，“Bush and Sharon Nearly Identical on Mideast Policy，”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9， 2003.

[3] Jane Perlez and and Katharine Q.Seelye，“U.S.Strongly Rebukes Sharon for Criticism of Bush， Calling It ‘Unacceptable，’”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6， 2001.也可参见John Donnelly，“Nation Set to Push Sharon on Agreement，” *Boston Globe* ， October 10， 2001； Lee Hockstader，“Sharon Apologetic over Row with U.S.，” *Washington Post* ， October 7， 2001； Lee Hockstader and Daniel Williams，“Israel Says It Won't ‘Pay Price’ of Coalition，” *Washington Post* ， September 18， 2001；“Israel's Opportunity，” *Los Angeles Times*editorial，September 18， 2001，以及Jonathan Karp，“Sharon Cancels Peace Talks in Rebuff to U.S.Concerns，” *Wall Street Journal* ， September 24， 2001。

[4] Julian Borger，“US Backs State for Palestine，” *Guardian* ， October 3， 2001； Kurt Eichenwald，“U.S.Jews Split on Washington's Shift on Palestinian State，”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5， 2001，以及Glenn Kessler，“Talking Points Aside， Bush Stance on Palestinian State Is Not a First，” *Washington Post* ， October 5， 2001。与此同时，托尼·布莱尔首相作出了“对巴勒斯坦国家地位至今为止最强烈的支持”。Michael Dobbs，“Blair Backs Creation of Palestinian State，” *Washington Post* ， October 16， 2001.

[5] Hockstader，“Sharon Apologetic.”

[6] James Bennet，“Sharon Invokes Munich in Warning U.S.on ‘Appeasement，’”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5， 2001； Perlez and Seelye，“U.S.Strongly Rebukes Sharon”，以及Alan Sipress and Lee Hockstader，“Sharon Speech Riles U.S.，” *Washington Post* ， October 6， 2001。关于其他以色列人同沙龙同样具有的担心，参见Israel Harel，“Lessons from the Next War，” *Ha'aretz* ， October 6， 2001。

[7] Sipress and Hockstader，“Sharon Speech.”

[8] Donnelly，“Nation Set to Push Sharon”； Perlez and Seelye，“U.S.Strongly Rebukes Sharon”； Sipress and Hockstader，“Sharon Speech.”

[9] Hockstader，“Sharon Apologetic”； Serge Schmemann，“Raising Munich， Sharon Reveals Israeli Qualms，”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6， 2001.

[10] 引自Tim Weiner，“Israel Rebuffs Demands to End West Bank Raids，”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24， 2001。

[11] Suzanne Goldenberg， “Sharon Defies US Demand to Retreat，” *Guardian*， October 24， 2001.也可参见Peter Beaumont，“Defiant Israelis Abandon Pull-out，” *Observer*， October 28， 2001； Suzanne Goldenberg， “Israel Lays Down Tough New Conditions for Withdrawal，” *Guardian*， October 27， 2001； Dana Milbank and Lee Hockstader， “Israeli Incursion Strains Relation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4， 2001；以及Staff and Agencies， “US Criticizes Israeli Offensive，” *Guardian*， October 22， 2001.

[12] William Safire，“‘Israel or Arafat，’”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3， 2001.也可参见Aluf Benn，“Analysis： Clutching at Straws，” *Ha'aretz* ， September 18， 2001，以及“Excerpts from Talk by Sharon，”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4， 2001。

[13] Shlomo Shamir，“U.S.Jews： Sharon Is ‘Worried’ by Terrorism Distinction，” *Ha'aretz* ， September 18， 2001.

[14] 这封信发表在2001年10月1日的《旗帜周刊》上。

[15] 引自James D.Besser，“Terror Clouds Bush Plan to Back Palestinian State，” *Jewish News Weekly* （online），October 5，2001。

[16] 引自Kurt Eichenwald，“U.S.Jews Split on Washington's Shift on Palestinian State，” *New York Times*，October 5，2001。也可参见Michael J.Jordan，“Bush Backed—Finally，” *Jewish Journal of Greater Los Angeles* （online），October 12，2001。

[17] ADL press release，“ADL ‘Extremely Troubled’ by Comments from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October 23，2001.也可参见Milbank and Hockstader，“Israeli Incursion”。

[18] 引自Kenneth R.Bazinet，“Israel Rejects Call for Pullout；Bush，Powell Demand Troops Leave Six Towns，” *New York Daily News* （online），October 24，2001。

[19] Elaine Sciolino，“Senators Urge Bush Not to Hamper Israel，”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7，2001.

[20] 引自Dana Milbank，“Bush Spokesman Gentle on Israeli Assault，”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3，2001；David Sanger，“U.S.Walks a Tightrope on Terrorism in Israel，” *New York Times*，December 4，2001，也可参见Safire，“‘Israel or Arafat’”。

[21] 对有关巴勒斯坦人同“卡林A号船”之间的联系提出怀疑的文章包括Charles D.Smith，“The ‘Do More’ Chorus in Washington，”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April 15，2002；Brian Whitaker，“Voyage of the Arms Ship，” *Guardian*，January 14，2002，以及Brian Whitaker，“The Strange Affair of Karine A，” *Guardian*，January 21，2002。

[22] James Bennet，“Skipper Ties Cargo to Arafat's Group，” *New York Times*，January 8，2002；Lawrence F.Kaplan，“Torpedo Boat，” *New Republic*，February 18，2002；Ion Mihai Pacepa，“The Arafat I Know，”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10，2002；Tom Rose，“Arafat's Naval Adventure：It's Time for Him to Go，” *Weekly Standard*，January 21，2002；Robert Satloff，“Karine-A：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Iranian-Palestinian Collusion，” Policy Watch #593，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January 15，2002，以及Gerald M.Steinberg，“The Demilitarization Scam，” *Jerusalem Post*，January 11，2002。也可参见Robert Satloff，“The Peace Process at Sea：The Karine-A Affair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National Interest 67*（Spring 2002）。

[23] 鲍威尔在“卡林A号船”被捕获一周后说：“我们收到的信息……清楚地表明（该船）同巴勒斯坦当局有联系。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直接与阿拉法特主席有关联的信息。”“Powell Comments on Arms Shipment Seized by Israel，” January 10，2002，*CNN.com./Transcripts*.受到布什政府施压要求他承担此一事件责任的阿拉法特，虽然否认事先知道此事，但最终还是承担了责任。“Arafat Takes Blame for Arms Shipment，” *BBC News* （online），February 14，2002；Lee Hockstader，“Arafat Arrests 3 in Arms Incident，” *Washington Post*，January 12，2002，以及“Powell Says Arafat Takes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4，2002。

[24] “Remarks by President George Bush and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 in Photo Opportunity，” White House，February 7，2002，副本可在以色列外交部网站找到，登录www.mfa.gov.il/。

[25] 逾越节，又称无酵节、巴斯卦节，是犹太教的主要节日之一。此节日纪念上帝在杀死埃及一切头胎生物的同时，并没有杀死犹太人的长子。逾越节是犹太历正月十四日白昼及其前夜，是犹太人的新年、犹太民族的四大节日之一（其他三个为吹角节-赎罪日-住棚节、献殿节和普尔节）。——译者注

[26] Keith B.Richburg and Molly Moore，“Israel Rejects Demands to Withdraw Troops，” *Washington Post*，April 11，2002.本段落中所有引用的内容均来自Fareed Zakaria，“Colin Powell's Humiliation：Bush Should Clearly Support His Secretary of State—Otherwise He Should Get a New One，” *Newsweek*，April 29，2002。也可参见Mike Allen and John Lancaster，“Defiant Sharon Losing Support in White House，” *Washington Post*，April 11，2002，此文描述了布什政府对沙龙的愤怒。

[27] Karen DeYoung，*Soldier*：*The Life of Colin Powell* （New York：Knopf，2006），p.383.

[28]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Senior White House Aides’：Speak Up！” *Weekly Standard*，April 11，2002.

[29] Transcript of “Shields and Brooks，”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April 12，2002，登录www.pbs.org/newshour/bb/political-wrap/jan—june02/sb-4—12.html。

[30] Elaine Sciolino，“Netanyahu Says Powell Mission ‘Won't Amount to Anything’ and Urges Arafat's Exile，” *New York Times*，April 11，2002.

[31] Bob Woodward，*Bush at War*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p.323—326.

[32] 引自DeYoung，*Soldier*，p.383。布什在鲍威尔动身前往中东之前曾对他说：“我知道这会有多么困难。情况将变得十分糟糕。但是你有足够的地位……虽然将引火烧身，但是你对付得了。问题过去之后，你将留下很多

东西。”Ibid.， p.379.

[33] John Simpson，“Israeli Leader Has More Power in Washington than Powell，” *Sunday Telegraph*（London）， April 14， 2002.

[34] James D.Besser，“No Tennessee Waltz，” *Jewish Week* ， December 27， 2002； Romesh Ratnesar，“The Right's New Crusade，” *Time* ， May 6， 2002.也可参见Mike Allen and Juliet Eilperin，“White House and DeLay at Odds，” *Washington Post* ， April 26， 2002，以及Judith Eilperin and Helen Dewar，“Lawmakers Endorse Israel's Offensive，” *Washington Post* ， May 3， 2002。布什不仅感到来自国会议员的紧张压力，而且还有来自犹太人领袖和福音派基督教徒的紧张压力。参见Allen and Lancaster，“Defiant Sharon”； Dan Balz，“Bush Statement on Mideast Reflects Tension in GOP，” *Washington Post* ， April 7， 2002； Elisabeth Bumiller，“Seeking to Stem Growing Political Fury， Bush Sends Conservative to Pro-Israel Rally，” *New York Times* ， April 16， 2002； Bradley Burston， “Background： Can Bush Afford to Press Sharon for Peace？” *Ha'aretz* ， May 6， 2002； Alison Mitchell，“U.S.Political Leaders Seek Unity on Mideast，for Now，” *New York Times* ， April 12， 2002； William Safire，“On Being an Ally，” *New York Times* ， April 11， 2002； Diana Jean Schemo，“Over 100000 Rally in Washington to Support Israel，” *New York Times* ， April 16， 2002； Alan Sipress，“Policy Divide Thwarts Powell in Mideast Effort，” *Washington Post* ， April 26， 2002，以及Alan Sipress and Karen DeYoung，“U.S.Presses Ahead with Peace Efforts，” *Washington Post* ， May 9， 2002。

[35] Ratnesar，“The Right's New Crusade.”

[36] Randall Mikkelsen，“White House Calls Sharon ‘Man of Peace’，” Reuters， April 11， 2002； Bill Sammon，“White House Softens Tone with Israel，” *Washington Times* ， April 12， 2002.布什后来告诉沙龙说，称他为“和平者”是“一派胡言”。Glenn Kessler，“Bush Sticks to the Broad Strokes，” *Washington Post* ， June 3， 2003.

[37] David Sanger，“President Praises Effort by Powell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Times* ， April 19， 2002； Peter Slevin and Mike Allen，“Bush： Sharon a ‘Man of Peace’，” *Washington Post* ， April 19， 2002.关于记者招待会的副本，参见“President Bush， Secretary Powell Discuss Middle East，” *White House* ，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April 18， 2002。

[38] 本段落中所有引用的内容均来自Matthew E.Berger，“D.C.Rally Is Large and Loud—but Will Bush Listen？” *JTA.org* ， April 19， 2002。也可参见Sharon Samber and Matthew E.Berger，“Speakers Stick to Consensus Theme at National Solidarity Rally for Israel，” *JTA.org* ， April 15， 2002。

[39] John Diamond，“Netanyahu Tells U.S.That Arafat ‘Has to Go’，” *Chicago Tribune* ， April 11， 2002； Nathan Guttman，“Ladies and Gentlemen， Benjamin Netanyahu，” *Ha'aretz* ， April 15， 2002.也可参见Benjamin Netanyahu，“The Root Cause of Terrorism，” *Wall Street Journal* ， April 19， 2002。

[40] Eilperin and Dewar，“Lawmakers Endorse Israel's Offensive”； Juliet Eilperin and Mike Allen，“Hill Leaders Plan Votes on Pro-Israel Resolutions，” *Washington Post* ， May 2， 2002，以及Alison Mitchell，“House and Senate Support Israel in Strong Resolutions，” *New York Times* ， May 3， 2002。参见“2 Resolutions ‘Expressing Solidarity with Israel’，” *New York Times* ， May 3， 2002，以及Matthew E.Berger，“Bills in Congress Boost Israel， Treat Arafat as Terrorist，” *Jewish Bulletin*（online）， April 26， 2002。

[41] Arieh O'Sullivan，“Visiting Congressmen Advise Israel to Resist Administration Pressure to Deal with Arafat，” *Jerusalem Post* ， May 6， 2002.

[42] Eli Lake，“Israeli Lobby Wins ＄200 Million Fight，”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May 11， 2002.

[43] 本段落中所引用的两个内容均来自Jefferson Morley，“Who's in Charge？” *Washington Post* ， April 26， 2002。就在沙龙向布什施以高压之前，阿吉瓦·厄尔达尔指出：“沙龙对于使之粘上美国人有很多经验……最终，无论是巴勒斯坦的恐怖活动问题、阿拉法特的错误问题，还是国内的政治问题，美国人都被看作不值得重视的角色。”参见“Words Are Not Enough，” *Ha'aretz* ， April 8， 2002。

[44] “President Bush Calls for New Palestinian Leadership，” 2004年6月的演讲副本，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45] 引自Tracy Wilkinson，“In Mideast， Sharon Looks Like a Winner After Speech，” *Los Angeles Times* ， June 25， 2002。

[46] Uzi Benziman，“Right-hand Man，” *Ha'aretz* ， June 28， 2002.

[47] Aluf Benn，“Analysis： Ariel Sharon Agrees to His Own Ideas，” *Ha'aretz* ， July 5， 2002.也可参见Elisabeth Bumiller and David E.Sanger，“Bush Demands Arafat's Ouster Before U.S.Backs a New State； Israelis Welcome Tough Line，” *New York Times* ， June 25， 2002； Glenn Kessler，“Framework for Peace Tough on Palestinians，” *Washington Post* ， June 25， 2002，以及Don Wycliff，“Sharon Dictates and Bush Follows，” *Chicago Tribune* ， June 27， 2002。

[48] “An Uncertain Road Map，” *Washington Post*editorial， June 25， 2002；“A Plan Without a Map，”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June 25， 2002； Richard Cohen，“Answers on an Empty Page，” *Washington Post* ， June 27， 2002； Jonathan Freedland，“George W's Bloody Folly，” *Guardian* ， June 26， 2002； Jim Hoagland，“Thorny Details to Come，” *Washington Post* ， June 26， 2002； Gideon Samet，“Another Step Toward Nowhere，” *Ha'aretz* ， June 26， 2002，以及Patrick E.Tyler，“Clear Terms， Murky Future，” *New York Times* ， June 25， 2002。

[49] James Bennet，“Arafat Wants No.2 Man in the P.L.O.as the Premier，” *New York Times* ， March 7，2003.

[50] “A Performance-Based Roadmap to a Permanent Two-State Solution to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2003年4月30日的新闻声明。

[51] 引自Ami Eden，“Bush's Maneuvers Bewilder Jerusalem and Activists，” *Forward* ， June 6， 2003。也可参见Ronald Brownstein，“Push for Peace Poses Domestic Political Risk for Bush，” *Los Angeles Times* ， June 5， 2003，以及David E.Sanger，“Middle East Mediator： Big New Test for Bush，” *New York Times* ， June 5，2003。

[52] “Mr.Sharon's Promise，” *Washington Post*editorial， December 16， 2002.也可参见Akiva Eldar，“Truth or Consequences，” *Ha'aretz* ， December 12， 2002。

[53] Ori Nir，“U.S.Groups Seek to Cast Peace ‘Map’ as a Threat，” *Forward* ， May 2， 2003； Chemi Shalev，“Sharon Government Scrambles as Bush Prepares ‘Road Map’，” *Forward* ， March 21， 2003.

[54] Shalev，“Sharon Government.”也可参见Glenn Kessler and Molly Moore，“Sharon’s Refusal to Accept Plan Vexes Powell Trip，” *Washington Post* ， May 13， 2003，以及Gideon Samet，“From Determination to Wimpiness，” *Ha'aretz* ， May 14， 2003。

[55] “No New Sharon，” *Ha'aretz*editorial， April 14， 2003.

[56] 引自Nir，“U.S.Groups”。

[57] 本段落中随后所有引用的内容和信息均来自Nathan Guttman，“American Jews Tread Softly on ‘Road Map’ During War in Iraq，” *Ha'aretz* ， March 26， 2003。

[58] Nir，“U.S.Groups.” 也可参见Nathan Guttman，“Senators， Congressmen Put Pro-Israel Stance in Writing，” *Ha'aretz* ， April 18， 2003。

[59] Ori Nir，“Right Slams Plan， Center Remains Quiet，” *Forward* ， June 6， 2003.

[60] Charles Krauthammer，“The Roadblock on the Road Map，” *Washington Post* ， May 9， 2003.

[61] Nir，“Right Slams Plan.”

[62] Bradley Burston，“Background： Betting on Abu Mazen—to Lose，” *Ha'aretz* ， May 1， 2003.也可参见Dan Izenberg，“Bush Statehood Call Doesn't Faze Israel，” *Jerusalem Post* ， March 16， 2003。

[63] Aluf Benn，“Analysis： The U.S.Is Now Micro-managing the Process，” *Ha'aretz* ， June 22， 2003；Uzi Benziman，“Corridors of Power： On the Road to Nowhere，” *Ha'aretz* ， June 13， 2003；Burston，“Background： Betting”，以及Ori Nir，“No Discussion of Settlements， Diplomats Say，” *Forward* ，May 9， 2003。

[64] Guy Dinmore and Harvey Morris，“‘Road Map’ Drivers Reluctant to Embark on First Leg of Journey，” *Financial Times* ， May 9， 2003.

[65] Bradley Burston，“Background： Has Sharon's Hamas Hitlist Converted Bush？” *Ha'aretz* ， June 17， 2003.

[66] Ze'ev Schiff，“Focus： Americans Fear Abu Mazen Is Further Weakened，” *Ha'aretz* ， June 12， 2003.

[67] Arnon Regular，“Hamas Says It Will Consider Renewing Cease-fire Dialogue，” *Ha'aretz* ， June 10，2003.

[68] “Sad， but Not Surprising，” *Forward*editorial， June 13， 2003.

[69] Burston，“Background： Sharon's Hamas Hitlist.”也可参见Uzi Benziman，“The Cock's Arrogance，” *Ha'aretz* ， June 15， 2003。

[70] 本段落中的信息和所引用的内容均来自Dana Milbank，“Bush's Shift on Israel Was Swift，” *Washington Post* ， June 21， 2003。也可参见Ori Nir，“American-Israeli Relations Strained Following Attack，” *Forward* ，June 13， 2003，以及Steven R.Weisman and James Dao，“Bush Under Fire in Congress for Criticizing Israel，” *New York Times* ， June 12， 2003。

[71] Glenn Kessler，“White House Backs Latest Israeli Attacks，”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2003.也可参见Burston，“Background： Sharon's Hamas Hitlist”。

[72] 引自Kessler，“White House Backs Latest Israeli Attacks”。

[73] “U.S.Congress Backs Israel's Response to Terrorist Attacks，” *Ha'aretz* ， June 26， 2003.

[74] 中东研究所负责人和美国前外交官爱德华·S.沃克（Edward S.Walker）那时候指出，布什“发表了一个声明，而沙龙却毫不在乎。他的可信性有问题”。引自Kessler，“White House Backs Latest Israeli Attacks”。

[75] 关于显示所建议的“隔离障碍路线的详细地图”，登录以色列人权团体贝泽雷姆的网站www.btselem.org/Download/Separation-Barrier-Map-Eng.pdf。

[76] “President Bush Welcomes Prime Minister Abbas to White House，”布什总统和阿巴斯总理发表评论的副本，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3年7月25日。

[77] Rupert Cornwell，“Sharon Rejects Bush's Call to Take Down ‘Security’ Fence，” *Independent* ， July 30， 2003； Herb Keinon，“Israel-US Rift Emerges over Security Fence Issue，” *Jerusalem Post* ， June 30，2003；“PM： We Will Build Fence； Bush： PA Must Dismantle Terror Groups，” *Ha'aretz* ， July 30， 2003，以及David Stout，“Israel to Continue Building Security Fence Criticized by Bush，” *New York Times* ， July 29，2003。

[78] 以色列将在三年中每年得到30亿美元。Ze'ev Schiff，“U.S.Warns of Financial Sanctions over Security Fence，” *Ha'aretz* ， August 3， 2003；“U.S.Officials Confirm Aid to Israel May Be Cut over Fence，” *Ha'aretz* ，August 5， 2003； Steven R.Weisman，“U.S.May Reduce Aid to Get Israel to Halt Barri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2003，以及Robin Wright，“U.S.May Punish Israel for Building Fence in W.Bank，” *Los Angeles Times* ， August 5， 2003。

[79] 引自Ori Nir，“Bush Eases Pressure on Both Sides over Peace Plan，” *Forward* ， August 8， 2003。也可参见Stewart Ain，“Bush Rapped for Mulling Sanctions over Fence，” *Jewish Week* ， August 8， 2003，以及Eric Marx，“Dems Blast Bush over Threats to Israel，” *Forward* ， August 15， 2003。

[80] 引自James Bennet，“Israel Reportedly Willing to Delay Portions of Barri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03。

[81] Nathan Guttman，“U.S.Confirms Fence Prompted Loan Cuts，” *Ha'aretz* ， November 27， 2003.也可参见Guy Dinmore，“US ‘to Withhold Funds’ over Israeli Actions，” *Financial Times* ， September 15， 2003，以及Richard W.Stevenson，“U.S.Cutting Loan Guarantees to Oppose Israeli Settlement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7， 2003。

[82] Douglas Jehl，“U.S.Wary of Steps by Israelis on Arafa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2003；“Powell Says U.S.Opposes Expulsion of Arafa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2003，以及Steven R.Weisman，“Bush Administration Warns Israel Not to Expel Arafa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2003。

[83] 沙龙的一位主要顾问达夫·维斯格拉斯后来回忆说：“2003年夏末，我们得出了可悲的结论，即没有人可进行会谈、没有人可进行谈判。因此才有了单边撤离计划。因为当你在玩单人纸牌游戏的时候，如果在桌子对面空无一人，除了自己玩牌之外你别无其他选择。”引自Avi Shavit，“The Big Freeze，” *Ha'aretz*， October 8， 2004。

[84] Aluf Benn，“Sharon Met Secretly with U.S.Emissary，” *Ha'aretz*， November 24， 2003； Peter Slevin，“Delicate Maneuvers Led to U.S.-Israeli Stanc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6， 2004.也可参见Chris McGreal，“U.S.to Endorse Israeli Plans for Gaza，” *Guardian*， February 18， 2004。

[85] Yossi Alpher，“Middle East： Beware of Ariel Sharon Bearing Gift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pril 13， 2004； Aluf Benn，“Israel's Identity Crisis，” *Salon.com*， May 16， 2005； Meron Benvenisti，“Sharon's Second ‘Big Plan’，” *Ha'aretz*， January 12， 2006，以及“Indyk： Sharon's Plan to Pull Out of Gaza and Part of West Bank Could Lead to Increased Violence，”2004年3月19日伯纳德·格韦茨曼（Bernard Gwertzman）对马丁·因迪克进行的采访，登录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www.cfr.org/publication/6882/。

[86] 由于甲醛具有防腐蚀的性能，而沙龙将巴勒斯坦的建国计划看作腐蚀性的变化，因此沙龙提供的计划，就是防止巴勒斯坦建国。——译者注

[87] 引自Shavit，“Big Freeze”。也可参见John Ward Anderson，“Sharon Aide Says Goal of Gaza Plan Is to Halt Road Map，”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7， 2004； Aluf Benn，“Analysis： The Adviser That Roared，” *Ha'aretz*， October 8， 2004，以及Terence Neilan，“Israeli Causes Uproar over Status of Road Map，” *New York Times*， October 6， 2004。

[88] “Rice： Israel Must Fulfill Its Responsibilities for Peace，” *Ha'aretz*， August 25， 2003.

[89] “Bush Says World Owes Sharon a ‘Thank You’，” *Ha'aretz*， April 21， 2004； George W.Bush，“Our Nation Is Stronger and Safer with Israel as an Ally，” 2004年5月18日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年度会议发表

的演讲。也可参见“President Bush Commends Israeli Prime Minister Sharon's Plan”，布什总统和沙龙总理所发表评论的副本，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4年4月14日。

[90] 关于前总统们的观点，参见Clyde R.Mark，“Israeli-United States Relation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29， 2002， p.7。关于布什的评论，参见“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Regarding Israel-Arab Peace Process，” April 14， 2004，以及“President Bush's Letter to Prime Minister Sharon，” April 14， 2004，登录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也可参见Slevin， “Delicate Maneuvers”。

[91] 关于阿拉伯的反应，参见“Bush Says World Owes Sharon”。关于布什连任的后果，参见E.J.Kessler，“Hardliners Knock Bush for Endorsing Sharon Initiative，” *Forward*， April 23， 2004； Dana Milbank and Mike Allen，“Move Could Help Bush Among Jewish Voter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5， 2004，以及Maura Reynolds and Peter Wallsten，“Bush Gains in Efforts to Win Over Jewish Vote，” *Los Angeles Times*，May 19， 2004。

[92] Thomas L.Friedman，“A Rude Awakening，”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2004.

[93] “A Performance-Based Roadmap.” 关于定居点问题上以色列和布什政府的持续分歧，以下文章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许多文章中的样本：“Bush Condemns Settlement Policy； UN Adopts Road Map，” *Ha'aretz*， November 20， 2003；“Israel Has Stepped Up the Pace of Settlement Building，” *Guardian*， March 3， 2004； Donald Macintyre，“Sharon Vows to Defy Bush over Expansion of Israeli Settlements，” *Independent*， April 22，2005； Greg Myre and Steven R.Weisman，“Israel to Build 600 Homes in 3 Settlements； U.S.Officials Are Critica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2003； Ze'ev Schiff，“U.S.： Israel Shirking Its Promises on Settlement Boundaries，” *Ha'aretz*， March 15， 2005； Peter Slevin，“Bush Won't Press End to Israeli Settlements，” *Washington Post*， July 28， 2002，以及Amy Teibel，“U.S.to Israel： Stop Expanding Settlements，” *Washington Post*， June 26， 2005。

[94] 引自Karen DeYoung，“U.S.Decries Israeli Missile Strike， Ponders Effect on Peace Bid，” *Washington Post*， July 24， 2002。也可参见John Ward Anderson and Molly Moore，“Palestinians Vow Revenge after Gaza Missile Strike，” *Washington Post*， July 24， 2002； James Bennet and John Kifner，“Palestinian Cease-Fire Was in Works Before Israeli Strike，” *New York Times*， July 25， 2002，以及James Bennet，“Stalemate in Mideast After Deadly Bombing，” *New York Times*， July 28， 2002。

[95] Jim Hoagland，“Sharon and the Big Pictur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5， 2004.也可参见Roane Carey and Adam Shatz，“Israel Plays with Fire，” *Nation*， April 12， 2004； H.D.S.Greenway，“Assassination Fallout Bodes Ill for US，” *Boston Globe*， March 26， 2004； Tony Karon，“How Israel's Hamas Killing Affects the U.S.，” *Time*， March 23， 2004； Bill Nichols，“U.S.Objectives at Risk in Anti-Israel Backlash，” *USA Today*， March 22， 2004； David R.Sands，“Israel's Killing of Yassin Puts U.S.in Line of Fire，” *Washington Times*， March 23， 2004，以及Brian Whitaker，“Assassination Method： Surveillance Drone and a Hellfire Missile，” *Guardian*， March 23， 2004。

[96] John Ward Anderson，“Top Hamas Leader in Gaza City Killed，” *Washington Post*， April 17， 2004.

[97] 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The Last Palestini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0，2005； Steven Erlanger，“Abbas Declares War with Israel Effectively Ove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2005； Donald Macintyre，“Abbas Pledges to Seek Peace with Israel，” *Independent*， January 16， 2005，以及Arnon Regular and Amos Harel，“Report： Abbas to Declare Not All Refugees to Return to Israel，” *Ha'aretz*，March 15， 2005。

[98] “No Time for Dithering，” *Forward*editorial， October 22， 2004； Ori Nir，“Influential American Jewish Coalition Balks at Endorsing Sharon's Gaza Plan，” *Forward*， October 22， 2004，以及Shlomo Shamir，“U.S.Jewish Leaders Split over Public Support for Pullout，” *Ha'aretz*， October 17， 2004。也可参见James D.Besser，“The Real Coalition： U.S.and Israel，” *Jewish News Weekly* （online）， May 5， 2006，以及James D.Besser，“Olmert Capitalizes on Uncertainties in Washington，” *Jewish News Weekly* （online）， June 2， 2006。

[99] Bradley Burston，“Hamas ‘R’ Us，” *Ha'aretz*， January 18， 2006.也可参见Akiva Eldar，“Kadima to a New Middle East，” *Ha'aretz*， December 19， 2005； Akiva Eldar，“Who Needs Abu Mazen？” *Ha'aretz*，November 7， 2005； Ran HaCohen，“Hamas and Israel： Rival Twins，” *Antiwar.com*， February 6， 2006；M.J.Rosenberg，“No Partner—As Always，” Weekly Opinion Column， Issue #260， Israel Policy Forum，Washington， DC， February 3， 2006； Danny Rubenstein，“All We Did Was Switch the Non-Partner，” *Ha'aretz*， February 5， 2006，以及“Disarray Among the Palestinians，” *New York Times*editorial， January 17， 2006。

[100] Peter Baker and Glenn Kessler，“Israel Has ‘Bold Ideas，’ Bush Says，” *Washington Post*， May 24，2006； Aluf Benn，“Analysis： George Bush Wants the Convergence Plan Too，” *Ha'aretz*， May 24， 2006.

[101] Ian Fisher and Steven Erlanger，“Israel： Troops Move into Gaza，” *New York Times*， June 28，2006.

[102] 引自Aluf Benn，“PM： Unilateralism Has Been a Failure，” *Ha'aretz*， January 9， 2007。也可参见Yehuda Ben Meir and Dafna Shaked，“The People Speak： Israeli Public Opin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2005—2007，” Memorandum no.90（Tel Aviv：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May 2007）， pp.10， 20，59—63； Akiva Eldar，“A Post-Zionist Agenda，” *Ha'aretz*， Oc tober 8， 2006； Yoav Peled，“Illusions of Unilateralism Dispelled in Israel，”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 October 11， 2006，以及Jeremy Pressman，“Israeli Unilateralism and Israeli-Palestinian Relations， 2001—2006，”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7*， no.4（November 2006）。

[103] 当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2007年试图推进和平进程的时候，布鲁金斯协会的马丁·因迪克说：“在政府里还有其他人想使她‘鲍威尔化’”。这些“其他人”肯定是新保守派，他的意思是他们要明显削弱她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力，就像他们曾对在她之前担任国务卿的鲍威尔所做的那样。因迪克的话引自Jim Lobe，“Rice Faces Formidable White House Foe，”国际新闻社，2007年2月21日。

[104] Aluf Benn and Avi Issacharoff，“Jordan： US Must ‘Actively Push’ to Revive Mideast Peace Efforts，” *Ha'aretz*， January 14， 2007； Glenn Kessler，“Abbas Rejects ‘Temporary Borders’ for Palestinian Stat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5， 2007，以及Associated Press，“Rice Restates US Road Map Commitment，”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4， 2007。

[105] 2002年和2007年阿拉伯联盟的建议可登录以色列区域和平运动网站www.rpm.org.il/initiative.html。

[106] Helene Cooper，“After the Mecca Accord， Clouded Horizon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2007.

[107] 奥尔默特还说：“我将永远不会接受基于他们返回以色列的解决方案，无论任何返回以色列的人数的解决方案，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接受所产生问题的任何形式的责任。没别的说的了。”引自Steven Erlanger，“Olmert Rejects Right of Return for Palestinians，”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2007。

[108] “A Welcome Summit in Riyadh，” *Ha'aretz*editorial， March 29， 2007.也可参见Yossi Alpher，“Respond to Riyadh by Convening ‘Consultations’，” *Forward*， April 13， 2007； Alon Ben-Meir，“Israel Must Choose Peace， Not Occupation，” *Jerusalem Post*， April 10， 2007； Akiva Eldar，“The Lost Five Years of the Peace Process，” *Ha'aretz*， March 15， 2007； Jonathan Freedland，“Now Is the Time to Call the Bluff of the Land of Missed Opportunities，” *Guardian*， March 28， 2007； M.J.Rosenberg，“Go for the Saudi Plan，” Weekly Opinion Column， Issue #316， Israel Policy Forum， Washington， DC， March 30，2007； Ze'ev Tsahor，“Our Leaders' Blindness，” *Ynetnews.com*， April 1， 2007，以及“U.S.Should Insist Israel Engages with Arab Peace Plan，” *Financial Times*editorial， March 20， 2007。

[109] Orly Halpern，“Foxman， Wiesel Upbraid Israel for Pace of Peace Effort，” *Forward*， May 18，2007； Aluf Benn，“PM： I'm Ready to Negotiate Saudi Peace Plan with Arab Leaders，” *Ha'aretz*， May 15，2006；“PM Invites Arab Leaders to Talk Peace，” *Jerusalem Post*， May 15， 2007； Akiva Eldar，“Headlines Instead of Initiatives，” *Ha'aretz*， April 5， 2007，以及Herb Keinon，“Israel to Brand Arabs as Peace Spoilers，” *Jerusalem Post*， March 23， 2007。

[110] Adam Morrow and Khaled Moussa al-Omrani，“Egypt： Israel Seen as Fighting Peace，”国际新闻社，2007年4月12日。

[111] Nathan Guttman，“Rice Briefs Jewish Groups as Palestinians Make Deal，” *Forward*， February 9，2007.犹太团体几乎没有必要担心，因为赖斯在此前一个月并未表示出她会对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子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参见Anne Gearan，“Rice Has Loose Agenda for Mideast Talks，” *Chicago Tribune*， January 18， 2007； Glenn Kessler，“Rice Highlights Opportunities After Setbacks on Mideast Trip，”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9， 2007，以及Thom Shanker and Greg Myre，“Rice Backs Mideast Moderates，but Offers No Pl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2007。

[112] “Charade in Jerusalem，” *New York Times*editorial， February 21， 2007.也可参见Glenn Kessler，“Rice's Mideast Talks Yield Little Except a Promise to Meet Agai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0，2007，以及Glenn Kessler，“Rice Looks Back for a Way Forward on Mideast Peac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1， 2007。

[113] Tim Butcher，“Israel Snubs Condoleezza Rice，” *Daily Telegraph*（London）， March 28， 2007.也可参见Helene Cooper，“Mideast Leaders to Hold Talks Twice a Month，”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2007；Glenn Kessler，“On Mideast Trip， Rice to Try a New Formula，” *Washington Post*， March 23， 2007，以及Donald Macintyre，“Israel Resists Rice Plan for Talks on Peace Settlement，” *Independent*， March 27， 2007。

[114] Associated Press，“Israel Breaks Settlement Promise to U.S.，” *MSNBC.com*， December 26， 2006；Associated Press，“U.S.Challenges Israel on Settlement，” *MSNBC.com*， December 27， 2006； Steven Erlanger，“First Settlement in 10 Years Fuels Mideast Tensio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2006； Mark Lavie，“Israel Approves New Housing in West Bank，” *San Diego Union-Tribune*（online）， January 15， 2007.

[115] Uri Avnery，“Next to Israel， Not in Place of I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March 8， 2007； Glenn Kessler，“Rice Cautions Israel on Syria，” *Washington Post*， May 30， 2007，以及Gideon Levy，“Israel Doesn't

Want Peace，” *Ha'aretz*， April 8， 2007。

[116] Khalil Shikaki，“With Hamas in Power： Impact of Palestinian Domestic Developments on Options for the Peace Process，” Working Paper #1， Crow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Brandeis University， February 2007.

[117] Lobe，“Rice Faces Formidable White House Foe.”

[118] Daniel Levy，“Time to Change the Tune，” *Ha'aretz*， March 24， 2007.

[119] 引自Lobe，“Rice Faces Formidable White House Foe”。

[120] Aluf Benn and Shmuel Rosner，“Olmert Reminds Rice： Bush Is Still Her Boss，” *Ha'aretz*， April 2，2007.所引用的“看法完全一致”（eye-to-eye）一词来自这篇文章。

[121] Philip Zelikow，“Strategies for the Multifront War Against Radical Islamists，” 2006年9月15日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温伯格创始者会议（Weinberg Founders Conference）上的主旨演讲。也可参见Nathan Guttman，“US Sees Link Between Iran， Peace，”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18， 2006，以及Shmuel Rosner，“State Dept.Adviser： U.S.Tying Iran Policy to Palestinian Issue，” *Ha'aretz*， September 18， 2006。

[122] Helene Cooper and David Sanger，“Rice's Counselor Gives Advice Others May Not Want to Hea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06.也可参见Helene Cooper，“Senior Aide to Rice Resigns from Pos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06； Yochi J.Dreazen， Cam Simpson， and Mariam Fam，“Mideast Turmoil Pressures Bush to Revise Tactic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30， 2006，以及Glenn Kessler，“Close Advisor to Rice Plans to Resign，”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8， 2006。

[123] Glenn Kessler，“Rice Names Critic of Iraq Policy to Counselor's Post，” *Washington Post*， March 2，2007； Eli Lake，“Trouble Looming for Rice，” *New York Sun*， March 5， 2007，以及Jim Lobe，“Rice Picks Neocon Champion of Iraq War as Counselor，” *Antiwar.com*， March 3， 2007。

[124] James D.Besser，“New Fight Brewing on PA Aid， Contacts，” *Jewish Week*， April 6， 2007； Helene Cooper，“Splits Emerge Between U.S.and Europe over Aid for Palestinian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2007； Nathan Guttman，“U.S.， Israel at Odds over Palestinian Coalition，” *Forward*， March 23，2007，以及Eli Lake，“N.Y.Lawmaker Freezes ＄86M Meant for Abbas，” *New York Sun*， February 14， 2007。

[125] Nathan Guttman，“As Capitals Cautiously Greet Palestinian Deal， Israel's Allies in D.C.Push for Pressuring Hamas，” *Forward*， February 16， 2007.

[126] 引自Besser，“New Fight Brewing”。

[127] Guttman，“As Capitals Cautiously Greet Palestinian Deal.”

[128] Besser，“New Fight Brewing”； Nathan Guttman， “Lawmakers Sign Protest on Palestinian Aid，” *Forward*， March 30， 2007； Guttman，“U.S.， Israel at Odds”； Rosenberg，“Go for the Saudi Plan”，以及Shmuel Rosner，“Battles Lost and Won，” *Ha'aretz*， March 22， 2007。

[129] “Lowey Will Not Place Hold on Revised PA Security Assistance Proposal，” 2007年3月30日国会议员妮塔·洛维办公室的新闻稿。

[130] “Poll： Americans Support Cutting Aid to Israel，” Reuters， April 12， 2002； Jean-Michel Stoullig，“Americans Want Cutback in Aid to Israel， If It Refuses to Withdraw： Poll，” Agence France Presse，April 13， 2002.也可参见*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ast updated August 15， 2002）。

[131] Steven Kull（principal investigator）， *Americans on the Middle East Road Map*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ay 30， 2003）， pp.9—11， 18—19.也可参见Steven Kull et al.， *Americans o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University of Maryland， May 6， 2002）。

[132]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Israel and the Middle East，” 马提拉通讯集团在2005年3月18日至25日，以及2005年6月19日至23日为反诽谤联盟所作的调查。

[133] “US Scowcroft Criticizes Bush Admin's Foreign Policy，”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3， 2004.也可参见Glenn Kessler， “Scowcroft Is Critical of Bush，”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6， 2004。

第八章 伊拉克与改造中东之梦

为什么入侵伊拉克？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刺客之门：美国在伊拉克》一书中宣称：“这个问题依然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而这是有关伊拉克战争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他引用布什第一任期时的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现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的话说，他将“至死也不知道答案”[1]。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不能肯定对此问题的答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决定就是在今天也叫人难以看透。虽然他显然是一个具有令人担忧野心——其中包括渴望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野心——的血腥暴君，但是他自己的无能却使得这些危险目标变得不可企及。他的军队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Gulf War）中被击溃，并进而被联合国的10年制裁所削弱。结果，伊拉克军事力量除了在名义之外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且到2003年的时候这支军队已经容易被控制了。联合国进入伊拉克进行检查，已经清除掉了伊拉克的核计划以及化学武器储备。在萨达姆·侯赛因与奥萨马·本·拉登之间，并不存在有联系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事实上相互敌视，而且本·拉登和他的同伙是在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而不是在伊拉克。然而，紧随“9·11”事件之后，当人们原本期待美国会像激光一样聚焦在基地组织身上的时候，布什政府却选择了入侵一个情况严重恶化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同进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毫无关联，而且它已经实际上受到了遏制。从这种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困惑的决定。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决定却不难理解。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而且如果美国作出选择，那么对它推翻萨达姆的能力就不存在任何怀疑。美国不仅赢得了长期的冷战，并且在1989年之后在军事行动上的成功也引人注目：1991年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伊拉克，1995年阻止了巴尔干半岛的流血，1999年战胜了塞尔维亚。紧随“9·11”事件之后对塔利班的迅速驱逐，加强了美国在军事上天下无敌这样一种印象，使得在伊拉克问题上持怀疑态度的人更难以说服其他人，即进行战争是没有必要的、不明智的。“9·11”事件也使美国人备感震惊，而且使许多领导人信服，在一个恐怖分子可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美国不能允许哪怕是相隔遥远的地方的危险加大。那些支持战争的人相信，推翻萨达姆将使其他的“流氓国家”相信，美国简直太强大了，以至于不是要反对美国，而是要迫使这些政权符合美国的愿望。简而言之，在战前时期，美国既是威力强大的，

又对它的超凡军事充满信心，并且对自身的安全深感忧虑——这是数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危险情形。[2]

这些各种因素形成了决定开战的战略环境，并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推动那一选择的某些潜在力量。但是在这一等式之中还有另外一个变量，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因素，战争将几乎肯定不会发生。那一因素就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特别是一伙自“9·11”事件之前就一直在推动美国进攻伊拉克的新保守派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这个主战的小集团相信，清除萨达姆将改善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地位，并且将启动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两家的地区改造进程。以色列官员和前以色列领导人支持这些努力，因为他们渴望见到美国推翻他们主要的区域对手之一，而这个对手在1991年曾向以色列发射过飞毛腿导弹。

虽然来自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压力并不是布什政府在2003年3月作出进攻伊拉克决定背后的唯一因素，但那却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虽然许多美国人相信，这是一场“石油战争”——或者说为了像哈利伯顿（Halliburton）这样的公司的“石油战争”，但是支持这一观点的直接证据却少之又少，并且有大量的证据对此提出了怀疑。其他观察家指责像卡尔·罗夫（Karl Rove）这样的共和党战略家，认为这是马基雅维利式阴谋的组成部分，目的是要使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从而确保共和党的长期支配地位。虽然这一观点有一些党派上的吸引力，但是太过于缺乏证据了，以至于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如此多著名的民主党人会支持开战。另外一种解释观点，则将战争看作通过民主传播改造中东地区的勇敢努力而迈出的第一步。虽然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明显雄心勃勃的计划同以色列的安全关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与这些可供选择的解释相反，我们认为这场战争的动机，至少有一大部分是期望使以色列更加安全。虽然在战争开始之前这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观点，但是值此伊拉克已经变成了战略上的灾难之时，这场战争甚至更加具有争议性。毫无疑问，那些推动这场战争的个人和团体相信，战争对美国和以色列都有利，而且他们当然没有预期到最终出现的崩溃。无论如何，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在鼓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恰当的描述，最终是一个证据问题；而有相当充分的证据表明，以色列和亲以色列的团体——尤其是新保守派——在进行入侵的决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对证据进行考察之前，值得指出的是，许多博学多才、广受尊敬的人曾公开说，这场战争同以色列的安全联系在一起。菲利普·泽利考——总统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Foreign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成员（2001—2003年）、“9·11”委员会的执行主

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法律顾问（2005—2006年）——曾在2002年9月10日告诉弗吉尼亚大学的听众说，萨达姆并不是美国的直接威胁。他认为“真正的威胁”是“对以色列的威胁”。他继续说道：“而这却是不敢言明的威胁，因为欧洲人不很关心那一威胁……而美国政府不想在言词上对此太过严厉，因为这并不畅销。”[3]

北约卸任的退休指挥官、前总统候选人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将军在2002年8月说：“那些支持进攻的人现在将在私下里坦诚相告，说萨达姆·侯赛因可能真的不是美国的威胁。但在某个时刻他们担心，如果他拥有核武器，他会决心用来打击以色列。”[4]2003年1月，一位德国记者向著名的新保守派学者、有影响力的国防政策委员（Defense Policy Board）——委员会主席是理查德·珀尔——成员卢斯·维奇伍德问道，为什么记者应该支持这场战争。维奇伍德说道，我可能要“不客气了，并且提醒德国它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萨达姆呈现给以色列的是关乎这个国家生存上的威胁。事情就是那样地真真切切”。维奇伍德并没有通过说伊拉克对德国或美国构成威胁而为这场战争进行辩护。[5]

在美国入侵伊拉克数周之前，新闻记者乔·克莱因（Joe Klein）在《时代》杂志上写道：“一个更强大的以色列是向伊拉克开战的十足缘由。以色列是人们不敢明言这场战争的理由的部分原因，它是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派小集团和许多美国犹太人社会静悄悄地追求的一个幻想。”[6]前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在2004年5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霍林斯在指出伊拉克并非美国的直接威胁之后，他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入侵伊拉克。[7]他说“每个人都知道的答案”乃是“因为我们要使我们的朋友以色列安全”。许多犹太人团体立刻给霍林斯贴上反犹分子的标签，同时反诽谤联盟将他的评论称之为“老掉牙的反犹主义谣言——有关犹太人控制和操纵政府的阴谋谣言”[8]。霍林斯坚决拒绝了这种指控，并且提到他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他只是陈明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并非提出一种不真实的主张。他要求他的批评者“因为谈及反犹主义而向我道歉”[9]。

对于美国的亲以色列强硬派是伊拉克战争背后的主要推手这一点，有少数其他的公众人物——帕特里克·布坎南、阿诺·德·博尔奇格雷夫（Arnaud de Borchgrave）、莫林·多德、格杰·安妮·盖耶（Georgie Anne Geyer）、加里·哈特（Gary Hart）、克里斯·马修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P.莫兰（James P.Moran）、罗伯特·诺瓦克、蒂姆·拉塞特、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将军——或者把它说了出来，或者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暗示。[10]在诺瓦克的例子中，早在战争发生之前他就将这场战争称之为“沙

龙的战争”，而且今天还在继续这样说。2007年4月他说道：“我确信，在着手这场战争的决定中，以色列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知道，在伊拉克战争前夕，沙龙在一次同参议员们的秘密谈话中曾说过，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除掉萨达姆·侯赛因，那就将解决以色列的安全问题。”[11]

早在战斗打响之前，人们就广泛地认识到以色列同伊拉克战争之间的联系。当2002年秋天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前景开始占据报纸大字标题的时候，新闻记者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写道：“缺乏对以色列所起作用的公开讨论……就像是在房间里的那头寓言中的大象一样：人人都看见，人人都不提。”[12]他注意到，这种不情不愿的原因，是因为害怕被贴上反犹分子的标签。在战争爆发两周前，内森·瓜特曼在以色列《国土报》上报道说：“将以色列同这场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声音越来越大了。人们认为，渴望帮助以色列是乔治·布什总统将美国士兵送到波斯湾这场不必要的战争中的主要原因。”[13]

数日之后，现为《纽约时报》执行编辑的比尔·凯勒（Bill Keller）写道：“这场战争是有关以色列的战争这一想法，要比你可能想到的被更多的人所普遍坚持。”[14]最后，在战争开始后的2005年5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巴里·雅各布斯（Barry Jacobs）承认，认为以色列和新保守派两者要对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承担责任的想法，在美国情报界是“普遍存在的”[15]。

有人肯定会这样认为，任何持此主张——即对以色列安全的关心对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他要么是反犹分子，要么是仇视自身的犹太人。这样的指控既是预料之中的，又是错误的。就像我们现在所要表明的那样，有大量充分的证据说明，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在使这场战争发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并不是主张说以色列或以色列游说集团“控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只是说他们对一套具体的政策进行了成功的施压，并且能够在具体的背景中取得他们的目标。如果背景不同，他们将不能够使美国走向战争。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美国今天就可能不会陷在伊拉克。

以色列和伊拉克战争

虽然以色列总是将伊拉克当作敌人，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色列却对伊拉克尤其关注，当时法国同意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一个核反应堆。由于这一充足的理由，以色列担心伊拉克可能利用这个核反应堆作为建造核武器的手段。为回应这一威胁，以色列人在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运转之前，于1981年对其进行了轰炸。[16]尽

管遭受这一挫折，伊拉克却在分散的秘密地点继续进行它的核项目。这种情形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以色列热情支持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它主要关心的不是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而是推翻萨达姆，尤其是确保伊拉克的核项目被分解。[17]虽然美国没有剥夺萨达姆的权力，但是海湾战争之后联合国对巴格达实施的核查机制，却减少了——但并未消除——以色列的忧心。事实上，以色列《国土报》在2001年2月26日曾报道说："由于萨达姆·侯赛因政权难以预测的不负责任行为，沙龙相信伊拉克对地区稳定构成的威胁要比伊朗更大。"[18]

尽管有沙龙的这些评论，但是到2002年初，当布什政府正认真考虑针对伊拉克发动另一次战争的情形变得日益明显的时候，有些以色列领导人却告诉美国官员说，他们认为伊朗是个更大的威胁。[19]然而，他们并不是反对推翻萨达姆，而且以色列领导人从不打算劝说布什政府不要发动伊拉克战争，尽管在轮到向他们的美国同事提建议的时候，这些以色列领导人几乎不会一言不发。以色列政府也不曾尝试动员它在美国的支持者进行反对入侵伊拉克的游说。相反，以色列领导人所担忧的，只是美国在打击萨达姆的时候，可能顾及不到伊朗的威胁。一旦他们认识到布什政府正允诺进行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一个要求在伊拉克快速取胜，然后再对付伊朗和叙利亚的计划——时，他们就开始用力推动美国的入侵计划。

简而言之，以色列没有进行倡议向伊拉克开战的活动。就像将要变得清楚的那样，是美国的新保守派想出了那个主意，并且要对9·11事件之后向前推动这一想法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以色列确实同新保守派一道帮助向布什政府和美国人民推销了这场战争，这种做法远在布什总统作出最终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之前。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在战争开始之前的几个月里，曾不断担心布什总统可能根本就不会作出发动战争的决定，而他们则尽力确保布什不会临阵退缩。

以色列人在2002年春开始作出努力，这是发生在布什政府发动向美国公众兜售伊拉克战争活动之前的几个月里。以色列前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4月中旬来到华盛顿，同美国参议员们、《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和其他人进行会晤，警告他们萨达姆正在发展核武器，这些核武器可放在手提箱和书包里运到美国本土。[20]数周之后，沙龙的发言人拉阿南·吉森（Ra'　anan Gissen）告诉一位克利夫兰（Cleveland）的记者说："如果现在不阻止萨达姆·侯赛因，5年后、6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对付一个被核武器武装起来的伊拉克，一个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投放系统的伊拉克。"[21]

5月中旬，现担任外交部长的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出现在美

国有线新闻广播网上，他在那里说道，“萨达姆·侯赛因就像本·拉登一样危险”，而萨达姆在建造核武库的时候，美国“不能够坐视不管”。相反，佩雷斯坚持认为，是该推翻这位伊拉克领导人的时候了。[22]一个月之后，另一位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在《华盛顿邮报》的公众舆论版上撰文，建议布什政府“应该首先聚焦在伊拉克和清除萨达姆·侯赛因这一问题上。一旦他下台滚蛋，就会出现一个不同的阿拉伯世界”[23]。

2002年8月12日，沙龙告诉以色列议会的外交事务和国防委员会说，伊拉克“是以色列面临的最大危险”[24]。尔后在8月16日，那是副总统切尼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海外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VFW）大会上以一篇演说而开始战争活动的10天之前，数家报纸和电视、电台——包括以色列《国土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报道说，以色列正敦促美国不要拖延对伊拉克发动进攻。沙龙告诉布什政府说，推迟这一行动“不会为未来的行动创造更加便利的环境”。拉阿南·吉森说，推迟进攻将“只是再次给他（萨达姆）一个加速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机会”。外交部长佩雷斯告诉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说：“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进攻伊拉克）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他说，推迟进攻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萨达姆今后将更好地武装起来。国防部副部长维茨曼·雪莉（Weizman Shiry）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警告说：“如果美国现在不这样做，以后做起来就会更加困难。一到两年之后，萨达姆·侯赛因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将走得更远。”或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其报道的大字标题中最好地抓住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忠告美国：别拖延对伊拉克的进攻。”[25]

佩雷斯和沙龙都肯定地强调，他们“不要被别人看作在敦促美国采取行动，美国应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26]。以色列领导人以及他们在美国的许多支持者非常清楚，有些美国评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帕特里克·布坎南，曾认为，1991年海湾战争背后的驱动力，是“以色列国防部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amen corner[27]）”[28]。虽然否认承担任何责任在政治上是能够很好理解的，但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公开评论，毫无疑问的是，到2002年8月的时候，以色列领导人将萨达姆看作对这个犹太国家的威胁，鼓励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来剥夺他的权力。

大约在同一时候的新闻报道说：“以色列情报官员已收集到证据，表明伊拉克正努力加速生产生化武器。”[29]佩雷斯告诉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说：“我们认为并且知道他（萨达姆）正在获取核武

器。”[30]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萨达姆已经“在上周向……伊拉克原子能委员会下令加快工作”[31]。以色列正向华盛顿灌输这些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警讯报道，按照沙龙自己所承认的说法，当此之时，“以色列同美国的战略协调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维度”[32]。入侵伊拉克表明在那里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以色列议会各自发表报告，显示以色列给布什政府的大量情报是虚假错误的。就像一位退休的以色列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伊拉克的非传统实力问题，以色列情报机关是美英情报机关所提供画面的完全合作者。”[33]

当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推动另外一个国家采取代价高昂或高风险行动的做法，以色列几乎算不上是第一个这样的国家。面临外部危险的国家经常企图将责任推给别人，而美国本身就有着类似行为的丰富传统。[34]它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以遏制来自发生革命的伊朗的威胁；它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武装并支持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员（mujahideen）。美国没有派自己的军队去进行这些战争，它只是尽力帮助战争的其他方——他们有自己战斗的理由——去奋力战斗。

考虑到他们让美国去消除一个区域对手的那种可以理解的愿望，当布什总统在2002年9月决定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对战争进行授权的时候，以色列领导人所表现出的痛苦就并不令人感到吃惊；而当萨达姆同意让联合国核查人员回到伊拉克的时候，他们甚至更加忧虑了。这些发展使以色列领导人苦恼，因为它们似乎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外交部长佩雷斯告诉记者说：“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动是必需的。虽然核查和核查人员对于诚实正直的人有好处，但是不诚实者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核查和核查人员。”[35]在9月底走访莫斯科的时候，沙龙向正负责领导新核查工作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清楚地表明，对他们来说太迟了，以至于不会有效果的。[36]佩雷斯对接下来几个月的联合国进程变得如此愤怒，以至于他在2003年2月中旬狠批法国，质疑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37]

以色列对核查的坚决反对使之处在一个孤立和尴尬的位置上，就像马克·佩雷尔曼（Marc Perelman）2002年9月在《前沿》上面的一篇文章中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萨达姆·侯赛因令人吃惊地‘无条件’接受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使得以色列本周处在困境之中，迫使它公开自己作为唯一积极支持布什政府对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的国家。”[38]

为面对联合国的外交而进行事先施压，以色列人用最可怕的话来描绘萨达姆，经常将他比作阿道夫·希特勒。他们宣称，如果西方不对抗伊拉克，就将犯下对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犯下的同样错误。

著名的以色列学者施罗姆·阿韦内利（Shlomo Avineri）在《洛杉矶时报》上面写道："所有那些谴责20世纪30年代同德国绥靖的人都应该进行长期而艰难的反思：今天对伊拉克行动的失败是否有一天将被人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39]其含义够明显：任何反对入侵伊拉克的人——或者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任何推动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的人——都是像内维尔·张伯伦一样的绥靖者，注定要被后代人这样看待。《耶路撒冷邮报》的立场特别具有鹰派色彩，它经常刊登支持战争的社论和舆论，几乎从不登载反对战争的文章。[40]事实上，它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发表社论说："推翻萨达姆是反恐战争的关键，非如此则不可能热切地开始反恐战争，遑论赢得反恐战争。"[41]

其他以色列公众人物则附和佩雷斯和沙龙对战争的鼓吹，而不是进行外交争论。2002年9月初，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在《纽约时报》的舆论版撰文宣称："萨达姆·侯赛因的核武器计划，迫切地要求（我们）清除他。"他继续警告道："现在最大的风险是不采取行动。"[42]他的前任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数周之后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文章的标题为《推翻萨达姆的情形》。内塔尼亚胡宣称："今天没有什么事情比瓦解他的政权更加管用，"他还说道："我相信我所说的是代表了支持对萨达姆政权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观点，"他称这个政权"正狂热地试图获得核武器"。[43]

当然，内塔尼亚胡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在舆论版写写文章和在电视上露露面。由于曾在美国上中学、大学和研究生院，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不仅熟悉美国政治制度是如何运转的，而且在其中运作得很娴熟。他同布什政府内外的新保守派联系紧密，在国会山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在那里进行过无数次讲话或作证。[44]巴拉克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安全专家和学者也具有很好的联系。

以色列政府的战争狂热并没有在战斗打响之前的几个月里面消失。例如，以色列《国土报》在2003年2月17日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是《热情的以色列国防军等待伊拉克的战争》，该文说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渴望伊拉克战争"。10天之后，詹姆斯·贝内特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大字标题为《以色列说伊拉克战争将使该地区受益》的报道。《前沿》在2003年3月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以色列不满美国向伊拉克开战延迟》的文章，该文清楚表明，以色列领导人希望战争早点而不是更迟发生。[45]

考虑到所有的这些活动，比尔·克林顿在2006年这样的一番叙述就并不令人感到惊奇："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以色列政治家"都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是如此大的威胁，以至于即便他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应该被清除掉。[46]渴望战争也不仅限于以色列领导人。除了被萨达

姆于1990年征服的科威特之外，以色列是美国以外唯一多数政治家和公众热情支持战争的国家。2002年初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8%的以色列犹太人相信，“以色列应该鼓励美国进攻伊拉克”[47]。一年后的2003年2月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7.5%的以色列犹太人要求美国入侵伊拉克。[48]即便是在托尼·布莱尔的英国，就在战前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51%的回应者反对战争，而只有39%的人支持战争。[49]这一相当异乎寻常的情形促使以色列《国土报》的吉德昂·利维问道：“为什么是在英国有5万人游行反对伊拉克战争，而在以色列却没有一人反对？为什么在以色列不存在有关这场战争是否必要的辩论？”他继续说道：“以色列是西方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他的领导人毫无保留地支持战争，而且在以色列听不到替代性的选择观点。”[50]

以色列的战争热情，最终导致其在美国的某些盟友告诉以色列官员缓和自己的鹰派言辞，以免战争看起来像是在为以色列而进行的。[51]例如在2002年秋，一群因以色列计划（Israel Project）而为人所知的美国政治顾问，曾将一份6页纸长的备忘录在美国的地位关键的以色列人和亲以色列领袖当中传阅。备忘录的名称是《谈论伊拉克》，并且打算以此作为有关战争的公开声明指导。“如果你的目标是政权更迭，由于可能的反弹，你就必须对自己的语言措辞小心谨慎得多。你并不希望美国人相信，伊拉克战争的进行是为了保护以色列而非美国。”[52]

根据数篇报道说，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出于同样的思考，沙龙告诉以色列外交官和政治家对可能的伊拉克战争保持缄默，当然不要说到任何似乎是以色列推动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的话。一种不断强化的观点使以色列领导人感到担忧，即以色列正鼓动美国入侵伊拉克。事实上，以色列过去是这样做的：它只是不希望自己的立场为人所知而已。[53]

以色列游说集团和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推动力是一小群新保守派，他们长期以来支持大力使用美国的权力来改造世界的关键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们就鼓吹推翻萨达姆，相信这一步骤将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54]这一群人包括布什政府内的著名官员，如五角大楼的第二号和第三号非军职官员保罗·沃尔福威茨、道格拉斯·费思，具有影响力的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理查德·珀尔、肯尼斯·阿德尔曼和詹姆斯·伍尔西、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斯库特·利比、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及其特别助理戴维·乌姆瑟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东政策的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这一群人也包括为数不多的著名新闻记

者，如罗伯特·卡根、查尔斯·克劳萨默、威廉·克里斯托尔和威廉·萨菲尔。

任命大量新保守派担任高级政策职务，被以色列人及其美国盟友看作非常积极正面的发展。当沃尔福威茨在2001年1月被挑选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时候，《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犹太人和亲以色列的社会正欢欣雀跃”[55]。2002年春，《前沿》周报指出，沃尔福威茨以“布什政府中最具鹰派色彩的亲以色列声音而为人所知”，该杂志还在2002年末挑选他为50个“有意识地追求犹太行动主义”名人中的第一人。[56]大约与此同时，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由于他促进以美之间的坚强伙伴关系，因而将该研究机构的亨利·M.杰克逊杰出服务奖（Henry M.Jacks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授予他；而《耶路撒冷邮报》则将沃尔福威茨描述为“忠心亲以色列”的人，并提名他为该报的2003年“年度人物”。[57]

费思在塑就战争理由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应该放在这样的背景中来理解：他长期对以色列的承诺以及先前同以色列强硬路线团体的联系。费思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主要组织——如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和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联系密切。20世纪90年代他写文章支持定居点，并认为以色列应该保留被占领土。[58]更为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费思与珀尔、乌姆瑟尔一道，是1996年6月著名的《干净了结》报告的作者。[59]由于报告是在一个以色列右翼思想库的主办下为即将就任的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所撰写的，因而除其他内容，该报告还建议内塔尼亚胡“集中关注剥夺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权力——这是根据以色列自身权利的重要战略目标”。报告也要求以色列采取步骤重组整个中东地区的秩序。虽然内塔尼亚胡并没有执行他们的建议，但是费思、珀尔和乌姆瑟尔却即刻鼓动布什政府追求这些目标。这种情形促使以色列《国土报》专栏作家阿吉瓦·厄尔达尔警告费思和珀尔，说他们“正在对美国的忠诚……和以色列的利益之间走钢丝”[60]。就像乔治·帕克在《刺客之门》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费思和乌姆瑟尔来说，以色列的安全或许是”他们背后支持这场战争的“主要起因”。[61]

约翰·博尔顿和斯库特·利比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一贯热情地捍卫以色列的利益。事实上，博尔顿捍卫以色列的利益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在2006年5月，开玩笑地把博尔顿描述为“以色列自己在联合国团队的秘密成员”。他继续说道：“秘密泄露了。我们实际上只有5名外交人员。我们至少有6名外交人员，包括约翰·博尔顿。”[62]当2006年底博尔顿具有争议性地被再次任命担任那一职务成为问题的时候，亲以色

列的团体选择了支持博尔顿一方。[63]至于利比，当他在2005年秋离开白宫的时候，《前沿》周报曾报道说："以色列官员喜欢利比。他们将他描述为能够接近的重要中间人，他发自内心地对跟以色列相关的问题感兴趣，并且非常同情他们的事业。"[64]

布什政府外的新保守派，完全像他们那些在布什政府内的同路人一样致力于以色列的事业。我们来看看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在2002年6月10得到以色列巴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的天国卫士奖（Guardian of Zion Award）之后所发表的评论吧。[65]他讲话的主题是将以色列参与奥斯陆和平进程，刻画成误导犹太人弥赛亚信念的一个例子。在他的评论中，克劳萨默明确地使自己认同以色列——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以色列人。他一度注意到："35年前的今天，六日战争结束了。它似乎像是一个新纪元……耶路撒冷被重新统一了，圣殿山（Temple Mount）是我们的，我们以色列的。"他继续说道："今夜我的观点是，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犹太国家，我们今天的许多麻烦事情都恰恰是植根于这种新的弥赛亚激情之中。"就像其他几乎所有的新保守派学者一样，一直到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克劳萨默都是一个无情的战争权利鼓吹者。

虽然许多著名的新保守派都是强烈眷恋以色列的犹太裔美国人，但是赞成战争的那一伙人当中的著名成员，却并不是犹太裔美国人。除了约翰·博尔顿之外，由美国新世纪计划发起的致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的公开信的签名者，包括像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和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这样的非犹太人。伍尔西尤其执迷于证明萨达姆要对"9·11"事件负责，而且他花费相当的气力来试图确认早先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认为"9·11"事件劫机犯之一的穆罕默德·阿塔曾经同伊拉克情报人员在布拉格碰过面。虽然这种说法似乎不像是真实的，而且人们普遍认为是虚假的，但是伍尔西和副总统迪克·切尼却都据此作为支持战争的理由。[66]

新保守派并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唯一推动伊拉克战争的那部分人。亲以色列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都声援战争行动。当然，许多新保守派本身同这些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2002年9月中旬，当战争的兜售还在进行的时候，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即在《沙龙》（*Salon*）杂志上写道："主流的犹太人团体和领袖，现在是美国主张入侵巴格达的那些人中最强烈的支持者。"[67]这一观点在巴格达陷落很久之后刊登在《前沿》周报的一篇社论中："由于布什总统试图兜售……伊拉克战争，美国最重要的犹太组织像一个组织那样动员起来捍卫他。在一个又一个的声明中，犹太人团体领导人强调需要从世界上清除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些团体甚至走得更

远，认为清除伊拉克领导人将代表带给中东地区和平和赢得美国反恐战而迈出的重大一步。”社论继续说道：“对以色列安全的关注顺理成章地成为主要犹太团体思虑的因素。”[68]

虽然在主要犹太组织中几乎不存在对战争的任何反对声音，但是如何表述对战争的支持则存在分歧。主要的关注是担心太过于公开地支持入侵，将使得战争好像是为了以色列而进行的。[69]然而，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却在2002年秋投票支持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且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一些著名人物甚至走得更远。[70]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主席摩提默尔·祖克曼是支持入侵者中最直言不讳的人，他经常公开声明要推动战争。2002年8月末，他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他现在担任该报主编——上写道：“那些预测如果我们试图推翻萨达姆就会有可怕结果的人，恰恰是拒绝明白——就像布什总统明显所做的那样——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选择同噩梦生活，情形只会变得更糟糕。更糟糕得多。换言之，这里最有效的药品就是预防性药品。”[71]

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杰克·罗森（Jack Rosen）和犹太教改革宗教行动中心负责人戴维·萨珀斯坦（David Saperstein）拉比，也是热情支持战争的鹰派分子。以自由派观点著称并被《华盛顿邮报》称为“国会山典型的宗教说客”的萨珀斯坦在2002年9月说道：“犹太人社会很愿意看到针对萨达姆·侯赛因构成的威胁而作出的强有力决议。”[72]在大纽约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报纸《犹太人周报》也支持这场战争。该报编辑和发行人加里·罗森布拉特（Gary Rosenblatt）在2002年12月中旬所写的一篇社论中强调说：“华盛顿对萨达姆·侯赛因迫在眉睫的战争，不仅只是为世界清除掉一个危险暴君——他对以色列构成特别可怕的威胁——的机会。”他继续说道：“当暴君宣布他的邪恶意愿的时候，要相信他所说的。这是我们应该从希特勒和大屠杀中吸取的教训之一。进而言之，教律（Torah）教导我们说，当你的敌人试图杀害你的时候，先把他给杀了。自卫不是许可的问题，而是被迫的问题。”[73]虽然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反诽谤联盟这样的组织也支持这场战争，但是他们却尽量低调地做这件事情。

既然这场战争现已变成了一场灾难，以色列的支持者有时候认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并没有支持入侵。[74]但这种观点经不住常识的验证，因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通常支持以色列所需要的东西，而以色列当然是要求美国入侵伊拉克。就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内森·瓜特曼在2003年春天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年度会议上的报告中，正好进行了这样的联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向来支持有利于以色列的

任何事情，而且只要以色列支持这场战争，聚集在美国首都数以千计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游说人员也会同样支持。”[75]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霍华德·科尔2003年1月在《纽约太阳报》上的声明，对此甚至更加表露无遗，因为他承认，“‘静悄悄地’游说国会批准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是“过去一年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功”之一。[76]而在《纽约客》上面一篇有关斯蒂芬·J.罗森——伊拉克战争预备阶段其间他担任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政策主任——的冗长人物素描中，杰弗里·戈德堡报道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游说国会支持伊拉克战争”[77]。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一直是美国驻扎伊拉克的坚定支持者。2003年秋，当布什政府在说服参议院民主党人给战争拨付更多的款项遇到困难时，参议院共和党人要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游说他们的民主党同僚支持这一拨款要求。由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代表们同一些民主党参议员进行了谈话，款项于是得以批准。[78]当布什2004年5月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为其伊拉克政策进行辩护的时候，他赢得了23次长时间的起立鼓掌。[79]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2007年的会议上——当时美国有关战争的公众舆论已经恶化，副总统切尼为留在伊拉克的路线进行辩护。按照《耶路撒冷邮报》的戴维·霍罗威茨（David Horovitz）的说法，他得到了“大量的掌声”[80]。而当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波尔纳讲到下面这番话的时候，他则得到了长时间的起立鼓掌：“谁不相信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不会是对以色列国的直接威胁呢？在伊拉克失败的后果对美国来说是如此糟糕，以至于人们甚至都不能够去开始想这件事情。”相反，当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批评布什政府的“高潮”（surge）战略时，听众中许多人却发出了嘘声。[81]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并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唯一在伊拉克问题上坚持同布什站在一起——或者至少不起来反对战争——的主要团体。就像《前沿》周报在2007年3月所报道的那样：“大多数犹太人组织拒绝发出反对战争的声音，并且不时地表示他们对布什政府的支持。”[82]考虑到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对这场战争本身的态度，这一行为尤其引人注目。根据2007年盖洛普组织以2005年以来的13次民意调查结果为基础所进行的研究，美国犹太人反对这场战争（77%）与总体的美国公众反对这场战争（52%）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83]关于伊拉克，规模更大、更富有的亲以色列组织，显然同范围更广的美国犹太人步调不一。少数犹太人组织，如“恢复和谐社会”和“犹太人和平之音”，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反对这场战争，并且今天依然如此。但是就像在本书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团体资金既不充裕，又不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之类的组织那样具有影响力。

这种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团体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同美国犹太人的公众态度之间的落差，凸显了一个值得特别强调的根本点。虽然著名的以色列领导人、新保守派，以及许多以色列游说集团的领导人都渴望美国入侵伊拉克，但是在范围更广的犹太人社会中则不然。[84]事实上，就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萨缪尔·弗里德曼（Samuel Freedman）即报告说："皮尤研究中心编辑的全国范围的公众舆论民意调查显示，犹太人比普通民众对伊拉克战争更加不支持，民调的比例为52%对62%。"[85]因此，将伊拉克战争归咎于"犹太人的影响力"，或因为战争而"责难犹太人"，那将是一个主要的根本错误。相反，战争部分地要归咎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尤其是它的新保守派一翼。而就像我们以前强调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总是代表它所经常宣称的更大范围的犹太人社会。

向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兜售伊拉克战争

早在布什成为总统之前，新保守派就已经开始他们使用武力推翻萨达姆的活动。通过组织两封致克林顿总统的信函，呼吁解除萨达姆的权力，他们在1998年初引起了一阵骚动。第一封信（1998年1月26日）是在美国新世纪计划主导下写成的，有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约翰·博尔顿、罗伯特·卡根、威廉·克里斯托尔、理查德·珀尔、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其他的人在上面签名。第二封信（1998年2月19日）是在为了波斯湾的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的主办下进行的，该组织于1990年由珀尔、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政治主任安·刘易斯（Ann Lewis）和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前国会议员斯蒂芬·J.索拉兹（Stephen J.Solarz）创办，以便为第一次海湾战争进行游说。除上面那封信上的签名者之外，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仅列举少数几个名字——还包括道格拉斯·费思、迈克尔·雷丁、伯纳德·刘易斯、马丁·佩雷茨、戴维·乌姆瑟尔。[86]

除了这两封引人注目的信函之外，新保守派及其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盟友，还在1998年苦心孤诣地让国会通过《伊拉克解放法案》（Iraq Liberation Act），该法案要求"支持剥夺以萨达姆·侯赛因为首的政权在伊拉克的权力，并促进一个民主政府的出现以取代该政权的努力，应该是美国的政策"。新保守派对这一立法特别热心，不仅是因为该法案许可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而且还因为它提供9700万美元，以资助那些致力于推翻萨达姆的团体。[87]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主要团体就是伊拉克国民大会（Iraqi National Congress， INC）——该团体由新保守派的密切伙伴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所领导。就像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一样，珀尔、沃尔福威茨和伍尔西都卖力地代表这一立法进行游说。[88]该法案在众议院以360票对

38票获得通过，在参议院则获得全体一致的通过。然后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10月31日签署了该法案。

虽然克林顿不怎么需要《伊拉克解放法案》，但是他却不能够承受否决该法案而要付出的代价，原因是他正面临中期选举和弹劾。[89]克林顿及其顾问都不怎么尊敬沙拉比，而且他们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实施这一法律。事实上，到克林顿卸任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将任何拨出的款项花在像伊拉克国民大会这样的反对派团体身上。虽然克林顿总统确实在口头上说过要推翻萨达姆的目标，但是他对发生这件事情没有进行什么样的作为，而且他当然不考虑使用美国的军队来使那位伊拉克独裁者下台。[90]简而言之，在克林顿时期，新保守派并不能够兜售他们伊拉克战争的想法，虽然他们确实成功地使得在巴格达进行政权更迭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目标。

在布什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面，他们也不能够产生许多入侵伊拉克的热情，尽管许多著名的新保守派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并且对他们的事业没有失去丝毫的激情。理查德·珀尔后来说道，在布什政府的早期阶段，拥护推翻萨达姆的那些人当时在布什政府内部的辩论中输了。[91]事实上，《纽约时报》在2001年3月曾报道："一些共和党人"抱怨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说他们"没能成功实现他们在选举前加紧努力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主张"。与此同时，《华盛顿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鹰派已成鸽派乎？》的社论。那篇社论的文本即1998年1月26日致克林顿总统的那封信函。[92]

考虑到围绕2004年出版的两部书——理查德·克拉克所著的《反对一切敌人》和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所著的《忠诚的代价》——的宣传和争论，人们可能认为，从2001年1月底就职的那一刻起，布什和切尼就倾向于入侵伊拉克。[93]然而，这种解释却是错误的。虽然他们肯定对推翻萨达姆感兴趣，但是在公开记录中，却并没有证据表明在"9·11"事件之前他们就在认真思考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2000年的竞选期间，布什不主张使用武力来对付萨达姆，而且他清楚地向鲍博·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表明，在"9·11"事件之前他没有考虑过对萨达姆发动战争。[94]有趣的是，他在竞选中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于2000年初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该文说美国能够同一个核武装起来的伊拉克相处。赖斯宣称，萨达姆的"常规军事力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并且说对他的政权"不需存有许多的恐慌感"。[95]

副总统切尼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坚持认为，征服伊拉克将铸成战略上的大错，他在1998年新保守派致克林顿总统那两封呼吁对萨达姆采取军事行动的信上面都没有签名。[96]在2000年竞选的结束阶段，

他为1991年没有进军巴格达——他作为当时的国防部长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的决定进行了辩护，说“我们要维持目前对伊拉克的态度”。[97]没有证据表明他或者总统的想法在2001年初有了重大的变化。[98]在两封致克林顿总统的信函上都签过名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似乎是布什政府高级官员行列中在就职时唯一可能赞成伊拉克战争的人。当此之时，在那些有时被指责要对战争负责的其他团体——如石油公司、武器生产商、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或像凯洛格·布朗和鲁特公司（Kellogg Brown & Root）这样的国防承包商——中，没有一个团体在嚷着要入侵伊拉克。在开始的时候，新保守派基本上是孤军作战。

然而，尽管新保守派的重要程度达到了成为这场战争主要设计师的地步，但是他们却无力说服克林顿或布什支持入侵伊拉克。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需要帮助，而所需要的帮助在“9·11”事件发生之际降临了。具体而言，那个悲剧性日子里的事件导致布什和切尼彻底地改变了路线，并成为以预防性战争推翻萨达姆的坚定支持者。罗伯特·卡根在接受乔治·帕克的访问时很好地陈明了这一点：“9月11日是个转折点。其他什么都不是。这不再是9月10日的布什了。”在说服总统和副总统支持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新保守派——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斯库特·利比、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他们来说，“9·11”事件是兜售他们过去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背景。用卡根的话来说，他们所具有的最大优势，可能是在总统和副总统都在试图弄清楚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它似乎要求对国际政治进行全新的思维——的意义之际，“有一个应对世界的现成方法”[99]。

沃尔福威茨的行为特别惹眼。2001年9月15日与布什在戴维营进行的一次关键会晤中，沃尔福威茨主张在进攻阿富汗之前进攻伊拉克，即便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卷入到对美国的攻击之中，即便人们知道本·拉登呆在阿富汗。[100]沃尔福威茨如此执著于征服伊拉克，以至于5天后切尼不得不叫他“别煽动以萨达姆为目标”[101]。根据一位共和党的立法人员所说的话，他“像鹦鹉一样一直在唠叨（伊拉克）。这使得总统心烦不已”[102]。虽然布什拒绝了沃尔福威茨的建议而去攻打阿富汗，但是同伊拉克的战争现在则被严肃地看作一种可能性，而且总统在2001年11月21日交给军事规划人员任务，制定好入侵伊拉克的精确计划。[103]

其他的新保守派也在权力的门廊中卖力地穿行。虽然我们对此还没有完全的掌握，但是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像伯纳德·刘易斯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福阿德·阿杰米这样的学者，在说服副总统切尼支持伊

拉克战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4]事实上，网络杂志《Slate》的编辑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将刘易斯描述为“或许是伊拉克战争背后具有最重要影响力的知识分子”[105]。切尼的观点也严重地受到他的工作人员中那些新保守派——如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和约翰·汉纳——的影响。但是对副总统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则肯定是他的办公室主任斯库特·利比。他是布什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个人之一，而且他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观点，与他的亲密朋友和长期导师保罗·沃尔福威茨的观点相类似。[106]就在“9·11”事件之后不久，《纽约时报》曾报道说：“以保罗·D.沃尔福威茨……和I.刘易斯·利比为首，某些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不仅迫切要求一场时间最早和范围最广的针对在阿富汗的奥萨马·本·拉登的网络，而且也针对在伊拉克和黎巴嫩贝卡（Bekka）谷地的其他可疑恐怖基地的军事行动。”[107]当然，到2002年初的时候，副总统的立场——即美国可能将不得不清除萨达姆——有助于说服布什总统。[108]

其他两点考虑显示，在使得伊拉克战争爆发的问题上，新保守派在布什政府内部影响力是多么地深远，多么地重要。第一，新保守派不只是下决心，而且简直就是执迷于剥夺萨达姆的权力，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就像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在2003年1月所指出的那样：“我确实相信有些人已经以神学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了。它几乎是一种宗教——即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的话，那将是我们社会的终结。”一位《华盛顿邮报》记者这样描述在伊拉克战争预备期间柯林·鲍威尔从参加白宫会议回来时的情形，“（他）不断地溜动他的眼睛”，并且说道：“哎呀，对伊拉克是多么地执迷呀！”鲍博·伍德沃德报道说，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肯尼思·阿德尔曼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因支持的消退而似乎不会发生战争，因而他真是忧心如焚。”[109]

第二，在国务院、情报界，或者正规军队里面，对伊拉克开战几乎没有什么激情。虽然国务卿鲍威尔最终支持总统的战争决定，但是他相信那是个坏主意。在国务院里面的那些普通成员像他一样对此持怀疑态度。然而，在国务院里面却有两个主要的局外人——约翰·博尔顿和戴维·乌姆瑟尔，他们都是与白宫关系密切的著名新保守派。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虽然也支持白宫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他却不是强烈的主战者。事实上，在情报界内部，几乎没有人发现战争的理由令人信服。就像下面所要讨论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新保守派建立自己的情报单位的原因。军队对伊拉克问题充满怀疑，陆军尤其如此。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对陆军参谋长埃里克·欣赛克（Eric Shinseki）将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前者将欣赛克将军有关占领伊拉克所要求达到必需的军队水平的估计，看作“离

题万里”而不予理睬，后者则因欣赛克将军对伊拉克战争的计划表达怀疑而对他进行批评。[110]布什政府内部的战争鹰派主要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高级文职官员，他们几乎全部都是新保守派。

他们争分夺秒地辩解说，入侵伊拉克对于赢得反恐战争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努力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布什进行不断地施压，另一方面是试图克服政府内外的反战声浪。2001年9月13日，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发布了一份标题为《这超越了本·拉登》的新闻稿。该新闻稿坚持认为：“以起诉确定性来对奥萨马·本·拉登进行漫长的调查以证明他的罪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的所说所讲和所作所为都是有罪的。他的历史即他的罪行根源。同样的情形适用于萨达姆·侯赛因。我们过去的行动当然不够强有力，而我们现在必须抓住机会改变这种被动性的模式。”[111]一星期后的9月20日，一群著名的新保守派及其盟友发表了一封致布什的公开信，告诉他“即使证据并没有将伊拉克同（‘9·11’事件的）攻击直接联系起来，任何针对根除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战略，都必须包括剥夺萨达姆·侯赛因权力的坚定努力。”[112]这封信还提醒布什说：“以色列一直而且依然是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最坚定盟友。”

刚过了一个星期后的9月28日，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华盛顿邮报》上认为，在我们对付完阿富汗之后，叙利亚应该是下一个目标，接下来则是伊朗和伊拉克。他认为，当我们终结了“世界上这个最危险的恐怖政权的时候，反恐战争将在巴格达画上句号”。此后不久，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在10月1日的《旗帜周刊》那一期上，要求在塔利班被打败之后立即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113]其他学者，如迈克尔·巴龙（Michael Barone），则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主张，甚至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尘埃落定之前，“累积起来的证据就表明，伊拉克支持或者可能策划了这一攻击行为”[114]。

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面，新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懈的公关运动，来赢得人们对入侵伊拉克的支持。2002年4月3日，他们发表了另一封致布什的公开信，该信明白无误地将以色列的安全同一场推翻萨达姆的战争联系在一起。[115]这封信一开始就赞赏总统“因以色列政府参与到目前的反恐运动中，而对以色列政府进行坚决支持的立场”。该信随后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有个共同的敌人”，并且在“打一场相同的战争”。信中还敦促布什“加快剥夺萨达姆·侯赛因权力的计划”，否则“我们的以色列朋友和我们至今已经遭受的损失，似乎只是要比这大得多的恐怖的序幕而已”。该信以下面的内容结束道：“以色列的反恐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以色列的胜利是我们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道德和战略的双重理由，我们需要支持以色列的反恐战。”

该信的基本目的，是要将阿拉法特、本·拉登、萨达姆·侯赛因描述为笼罩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的主要部分。这种对不断增加的共同危险的描述，不仅为美以之间的紧密关系辩护，而且也为美国将这三个人当作美国的死敌，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强硬回应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进行辩护。就像在前一章所指出的那样，2002年4月初当撰写这封信的时候，布什政府同沙龙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充满着争争吵吵。该信的签名者包括肯尼思·阿德尔曼、威廉·贝内特、琳达·查韦斯（Linda Chavez）、埃利奥特·科恩、米奇·德克特（Midge Decter）、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雷欧尔·马克·格拉齐特、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罗伯特·卡根、威廉·克里斯托尔、耶和华·穆拉维奇科、马丁·佩雷茨、理查德·珀尔、丹尼尔·派普斯、诺曼·波多雷茨、詹姆斯·伍尔西，以及其他的人。

其他通常被认为是新保守派的亲以色列学者也为倾向战争的主张坚决擂鼓呐喊助威。支持战争的理由在2002年肯尼思·波拉克（Kenneth Pollack）出版的那本题为《威胁风暴》的预兆不祥的书中得到了主要的声援。该书认为萨达姆太愿意接受冒险，太缺乏理性，以至于无法对他进行吓阻；并得出结论说，预防性战争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因为波拉克是前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他先前曾宣称推翻萨达姆是“时光倒流的幻想”（rollback fantasy），因此他转向支持战争的立场似乎特别有说服力，尽管该书以具有支持某种立场的倾向来对待证据。[116]在这一时期，波拉克由外交关系委员会改投布鲁金斯协会的萨本中东政策中心，在那里他与该中心主任马丁·因迪克于战前的数月中写了大量的舆论版社论和评论文章，警告说萨达姆是不能够被吓阻的，联合国的核查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无论多么令人遗憾，武力几乎肯定是必要的。[117]

新保守派及其盟友使用的是同以色列政府过去常常推动战争的相同观点和几乎相同的语言。新保守派经常提到20世纪30年代的慕尼黑，将萨达姆比作希特勒，将像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参议员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这样的反战者比作像内维尔·张伯伦那样的绥靖者。[118]他们坚持认为，以色列和美国正面对一个飘忽不定的共同敌人——“国际恐怖主义”；而引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的话来说，伊拉克则是“世界恐怖的中心”[119]。战争鹰派将萨达姆描述为特别具有侵略性的鲁莽领导人，他不仅会对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也会把这些武器交给恐怖分子。[120]由于将外交和多边主义等同于软弱，因此新保守派的评论家们唯有蔑视联合国及其在伊拉克的核查人员，法国就更不用提了。[121]事实上，他们重复着以色列的古老格言说，武力在中东有着巨大的效用，因为借用克劳萨默的话来说，中东是一个“权力首先支配尊敬”的地区。[122]

有人可能认为，这一分析夸大了致总统的公开信、报纸专栏、书籍，以及舆论版社论对决策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毕竟，相对来说只有为数很少的人实际上会阅读各种各样的公开信，而且在美国报纸上存在大量同伊拉克战争毫不相干的其他文章、社论和舆论版社论。然而，这种观点将是错误的。致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的各种信函的签名者，都是与那些重要的决策者和国会山的立法者有联系，并对他们产生影响力的有权有势者，其中有些是他们在职业生涯过程中一起密切工作的人。事实上，许多在早先致克林顿的信函上签名的那些个人——包括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以及费思——成了布什政府的核心决策者。因此，在“9·11”事件至入侵伊拉克期间那些在致布什的信函上签名的人，并非在白费气力地叫嚷。对于像查尔斯·克劳萨默和威廉·萨菲尔这样的新闻记者来说，情形也是如此。他们俩分别经常为美国两份著名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撰写有关伊拉克的文章。就像对待在《旗帜周刊》这样的新保守派杂志上的文章一样，美国政府里里外外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很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观点。事实上，这些置身布什政府之外的人的写作，起到了强化身处布什政府之内的人的观点，他们都拥有认为需要入侵伊拉克的相同观点。所有这些努力的潜在目标，是要以一种将会推动战争的肯定性决定的方式来确定辩论的条件。通过使战争显得似乎既是必要的又是有利的，通过将潜在的反战者描绘成在恐怖问题上“软弱”，通过重复那些熟悉的道德和战略观点而将美国的命运同以色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些努力起到了抑制进行有关入侵正反面严肃讨论的作用，并且是更为广泛的支持战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23]

将情报工作锁定在伊拉克身上

赢得对入侵伊拉克公关活动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对情报信息的操纵控制，以便使萨达姆看起来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斯库特·利比是这一努力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因为他数次走访中央情报局向情报分析人员施压，以便找到进行战争理由的证据。2003年初他也帮助准备了一份柯林·鲍威尔要求抓紧的有关伊拉克威胁的简报，鲍威尔那时正在忙着准备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那份声名狼藉的陈述发言。[124]按照鲍博·伍德沃德的说法，鲍威尔的副手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对他所认为的事情做得过头和夸张感到震惊。利比从零零碎碎的蛛丝马迹中得出了最糟糕的结论”[125]。虽然鲍威尔舍弃了利比那些最奇怪的观点，但就像鲍威尔现在所承认的那样，他的联合国陈述发言却依然存在漏洞百出的错误。[126]

操纵情报的努力——当时情报被泄露给支持战争的大惊小怪的新闻界——也涉及两个组织机构，它们在“9·11”事件之后创立，直接向

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报告。[127]反恐政策评估小组（The Policy Counterterrorism Evaluation Group）的任务，是找到基地组织同伊拉克之间的联系——美国情报界被认为漏掉了对这些联系的关注。该机构的两位主要成员是戴维·乌姆瑟尔和迈克尔·马鲁夫（Michael Maloof），后者是一名同理查德·珀尔关系密切的黎巴嫩裔美国人。《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森（James Risen）写道："以色列情报机构在说服沃尔福威茨不能信任中央情报局方面起到了不为人知的作用"，而这种不满使他依赖艾哈迈德·沙拉比的情报，并对创办反恐政策评估小组起到了帮助作用。[128]

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 OSP）的目标指向是找到可用于兜售伊拉克战争的证据。该机构由同沃尔福威茨有长期联系的新保守派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领导，它的普通成员包括从亲以色列的思想库中招募而来的人，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鲁宾，以及从大学毕业后曾为当时的总理西蒙·佩雷斯效力过的迈克尔·马科夫斯基（Michael Makovsky）。[129]特别计划办公室在信息上严重地依赖沙拉比和其他的伊拉克流亡者，同各种以色列的情报源关系紧密。《卫报》报道说，事实上，它"同一个平行的特定情报机构打造了密切的关系，这个情报机构在以色列阿里埃勒·沙龙的办公室运作，它特地绕开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而向布什政府提供有关萨达姆伊拉克的报告——这种报告要比摩萨德准备批准的东西更加大惊小怪"[130]。国防部检察长在2007年2月发布了一份批评特别计划办公室的报告，说它散播"选择性的情报评估"，"而按照我们的观点，考虑到那些情报评估就是情报结果，而且明显显示出同情报界的共识不一致"，因而它们"是不当的"。[131]

五角大楼和白宫的新保守派不仅严重依赖沙拉比及其流亡伙伴有关伊拉克的情报，而且他们还拥护他在萨达姆下台以后成为伊拉克未来的领导人。另一方面，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则认为沙拉比不诚实、不可靠，对他敬而远之。由于我们现在知道沙拉比和伊拉克国民大会向美国提供假情报，那一严厉的判断现在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沙拉比同美国占领军之间的关系不久就恶化了，原因是沙拉比后来被指控向伊朗提供被指定为机密的信息——他已经否认了这一指控。新保守派对他将成为"伊拉克的乔治·华盛顿"的冀望，其结果并不比他们其他的战前预测要更好。[132]

那么为什么新保守派拥抱沙拉比呢？这位伊拉克国民大会的领导人曾竭尽全力地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个人和团体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且他同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的联系尤其紧密，"自1997年以来"，他就是那里举行的"董事会议、研讨会和其他事件中的常客"。

[133]他也培育了与亲以色列的组织——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之间的紧密关系。曾帮助创立赫德森研究所的马克斯·辛格，把沙拉比描述为一个“少有的人。他虽然深深扎根于阿拉伯世界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个西方人”[134]。2005年11月初，严阵以待的沙拉比回来向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他的第八次演讲的时候，该思想库的主席将他介绍成一个“非常伟大、非常勇敢的伊拉克爱国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解放者”[135]。沙拉比的另一大支持者是伯纳德·刘易斯——他认为在巴格达沦陷后应该让这位伊拉克国民大会领导人来管理伊拉克。[136]

作为对以色列游说集团支持的回报，沙拉比保证一旦他掌权后就培育同以色列的良好关系。按照费思的前法律合伙人L.马克·泽尔（L.Marc Zell）的说法，沙拉比还许诺重建一度从以色列的海法（Haifa）到伊拉克的摩苏尔（Mosul）之间的输油管道。[137]这恰恰正是那些支持政权更迭的亲以色列的人要听的话，因此他们以支持沙拉比作为回报。新闻记者马修·伯杰（Matthew Berger）在《犹太人周报》上对这一协定的本质展开了讨论：“伊拉克国民大会将改善同以色列的关系，看作利用犹太人在华盛顿和耶路撒冷的影响力，并竭力争取对其事业不断支持的一种手段。就他们而言，如果当伊拉克国民大会参与到取代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行为之中时，犹太人团体就看到了一个铺就以色列同伊拉克之间更好关系的机会。”[138]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内森·瓜特曼报道说，“美国犹太人社会和伊拉克的反对派”多年来“尽力掩藏”他们之间的联系。[139]

当然，新保守派及其盟友不是在真空中活动，他们本身并没有将美国导向战争。就像早先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9·11”的攻击，这场战争就可能不会发生，因为“9·11”的攻击迫使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考虑采取一种新的激进外交政策。由于像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这样的新保守派从1998年初以来，就一直敦促在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因此他很快地就将“9·11”事件同萨达姆·侯赛因联系在一起——即便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卷入其中，并且将推翻他的统治描述为赢得反恐战争的关键。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行动是战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事实上，在有关新保守派在使得伊拉克战争爆发中所起作用的一次讨论中，理查德·珀尔向乔治·帕克精确地阐明了这一点。珀尔指出：“如果布什政府的成员是一群由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吉姆·贝克所挑选的人来充任的话——这种情况本可能发生，那么情形就会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不会把最终由身居要职的那些人的这些想法，带到布

什政府之中来。”[140]《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在2003年5月有过类似的评估，他告诉以色列《国土报》的阿里·谢维特（Ari Shavit）说，伊拉克是“新保守派所需要的战争……是新保守派营销的战争……我可以给你一份25人的名单——他们此刻全部都在（华盛顿特区）离我这间办公室五个街区的半径范围之内。如果一年半之前你曾把他们流放到一个荒岛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就不会发生”。虽然我们完全同意珀尔和弗里德曼的观察，但是也承认这一事实，即最终导致战争的决定，是由于个人、理念和环境诸因素结合在一起所致。[141]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为了石油的战争吗？

有些读者虽然可能承认以色列游说集团对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有某些影响力，但是却认为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它的总体分量是很小的。相反，许多美国和外国的观察家似乎认为，石油——而非以色列——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背后的真正动机。在这种说法中有一种变相的观点，认为布什政府决心要控制中东地区巨大的石油储备，因为那将使得美国拥有对其潜在对手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根据这一版本的观点，布什政府将征服伊拉克看作朝向达到那一目标所迈出的巨大一步。这种说法的另外一种版本，则将石油生产国——尤其是石油公司——看作伊拉克战争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它们主要受到更高油价和更大利润欲望的驱使。即便是经常批评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学者，如诺阿姆·乔姆斯基也明显支持这种看法，而且这种观点在电影制片人迈克尔·穆尔（Michael Moore）2004年的影片《华氏911》中得到了普及。[142]

考虑到石油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有关征服伊拉克主要是因为石油的观点乍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143]但是这种解释却面临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双重困难。就像在第二章中所强调的那样，美国的决策人员长期以来关注由谁来控制波斯湾的石油；他们尤其关注可能由单个国家控制那里的全部石油的危险。美国虽然曾与海湾地区的各种石油生产国搅在一起，但是却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包括布什政府——曾严肃地考虑过征服该地区的主要石油生产国，以获得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威慑性影响力。如果一场革命或者石油禁运导致该地区的石油不能够流向世界市场，美国可能会考虑入侵一个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但是那并不是伊拉克的情形；只要愿意付钱，萨达姆渴望将石油卖给任何客户。进而言之，如果美国要征服另外一个国家以控制其石油的话，那么沙特阿拉伯——它的石油储量更大、人口更少——将是一个吸引力大得多的目标。并且本·拉登生于斯长于斯，9月11日打击美国的19名恐怖分子中有15人是沙特阿拉伯人——而其中没有一个人来自

伊拉克。如果控制石油是布什的真正目标的话，那么“9·11”事件将是一个采取行动的理想借口。占领沙特阿拉伯虽然并非易事，但是比起企图平息数量巨大、难以驾驭、武备精良的伊拉克人口来说，几乎肯定要更容易。

几乎也不存在任何证据表明，2002年至2003年期间石油利益在积极推动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相反，在1990年至1991年期间，沙特阿拉伯领导人明显向老布什政府施压，要求它使用武力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就像当时的许多美国决策者一样，他们担心萨达姆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入侵沙特阿拉伯，那将使得该地区的大量石油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沙特阿拉伯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Prince Bandar）同这里（美国）的亲以色列团体一道密切工作，为将萨达姆从科威特赶走提供支持。[144]但是临近第二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情形却大为不同：这一次沙特阿拉伯公开反对美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145]沙特阿拉伯领导人担心，一场战争将导致伊拉克的解体，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而即便伊拉克完好无损，什叶派也可能掌权；这种情况使掌管沙特阿拉伯的逊尼派担心，担心的理由既有宗教的，也因为它将增强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此外，沙特阿拉伯人还面临国内不断高涨的反美主义，因此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那就可能使（沙特阿拉伯的）情况变得更糟。

石油公司也不是征服伊拉克决定的主要角色，因为这些石油公司一般寻求的是迎合像萨达姆的伊拉克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的石油生产大国。他们没有为2003年的战争进行游说，因为他们大多数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就像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2002年9月在《新共和》杂志上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年来美国石油业游说的并不是战争，而是结束制裁。”[146]情形似乎总是如此，美国石油公司要的是赚钱，而不是打仗。

梦寐以求的地区改造

当时，伊拉克战争不被认为是陷入代价高昂的泥潭之中。相反，人们倾向于将这场战争看作以一种有利于美国和以色列长远利益的方式，来对中东地区进行重组的更宏大计划的第一步。具体来说，美国并不只是打算将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就打道回府；在这一梦想之中，入侵和占领将很快使伊拉克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然后它将作为吸引生活在该地区各种独裁国家中的人民的一个样板。伊拉克的结果将引发一连串的多米诺民主效应，虽然除伊拉克外将民主传播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可能依然需要使用刀剑，可是一旦民主在该地区取得了控制地位，那么对以色列和美国友好的政权就将成为模范典型；用《干净了

结》研究报告中的话来说，以巴之间的冲突就将被“超越”；该地区的其他敌手就会噤声；而且恐怖主义和核扩散这两个孪生问题基本上就将烟消云散。

副总统切尼在2002年8月26日向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发表的讲话中，展示了这一野心勃勃的地区改造理论，从而公开了布什政府兜售伊拉克战争的活动。他说道：“当最严重的威胁被消除的时候，该地区热爱自由的国家将有机会促进能够带来持久和平的价值……该地区的极端分子将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圣战战略。整个地区的温和派将振作起来。而我们促进以巴和平进程的能力也将得到提高。”[147]在未来的6个月里面，切尼在数个场合重复这些论点。

当布什总统在为伊拉克战争进行合理化辩护的时候，他带着同样的热情说到地区改造。2003年2月26日，他告诉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听众说，美国的目标是“在中东培育自由与和平”。他强调说：“世界显然对民主价值的传播感兴趣，因为稳定和自由的国家产生不了谋杀的意识形态思想。他们鼓励和平地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且在中东存在渴望自由充满希望的迹象。”进而言之，他宣称道：“在伊拉克的成功也能够为中东的和平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推动真正民主的巴勒斯坦和平向前发展。”[148]

这一野心勃勃的战略大大地偏离了美国此前的政策，因为它的根基几乎是以一种神学般的信念去相信自由对权力的改造；而且可以肯定，在“9·11”事件之前没有迹象表明布什和切尼会支持这一战略。事实上，他们两个人——还有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的公开记录显示，他们是反对此类野心勃勃的国家建设计划的，而这是地区改造的中心内容；而且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布什曾尖锐地批评克林顿政府对国家建设计划的强调。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一变化呢？根据2003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美国中东政策发生主要变化背后关键的推动力，是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新保守派。该篇报道的大字标题说明了一切：《布什总统的梦想：不仅进行政权更迭，而且进行地区改造——一个亲美的民主地区是一个具有以色列和新保守派根源的目标》。[149]

查尔斯·克劳萨默说，这一在中东地区传播民主的宏伟计划，是纳坦·沙兰斯基智慧的产物，据说这位以色列政治家的作品曾给布什总统留下深刻的印象。[150]但是沙兰斯基几乎谈不上是以色列国内的一种孤立声音。事实上，所有政治领域的以色列人都坚持认为，推翻萨达姆将使中东地区变得对以色列有利。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于2002年9月初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认为：“结束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将改变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图景。”他宣称说：“没有萨达姆·侯

赛因的阿拉伯世界，将使这一代（即将掌权的领导人）中的许多人支持渐进式的民主开放，而这种开放是一些海湾国家和约旦已经开始享有的。”巴拉克也坚持认为，推翻萨达姆将“为以巴冲突的向前发展创造出路”。[151]

2002年8月，以色列议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利库德党成员伊瓦尔·斯泰尼茨（Yuval Steinitz）告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说：“在美国军队占领伊拉克之后，在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政权在阿富汗被安插之后，在伊拉克的基地成为美国的基地之后，向叙利亚施压以使之停止对像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斯兰杰哈德这样的恐怖组织的支持，允许黎巴嫩军队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可能结束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就将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们就将真正看到一个新中东的出现。”[152]类似地，阿留夫·本2003年2月在以色列《国土报》上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以及像国家安全顾问伊弗雷姆·哈勒维（Ephraim Halevy）这样接近阿里埃勒·沙龙的人，为以色列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精彩未来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他们预想着多米诺效应的出现，随着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以色列的其他敌人也将纷纷倒下：阿拉法特、（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巴沙尔·阿萨德、伊朗的阿亚图拉（ayatollah），甚至可能还有穆阿迈尔·卡扎菲（Muhammar Gadaffi）。恐怖活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随这些领导人一同消失。”[153]

《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哈勒维于2003年2月在慕尼黑发表演讲说：“从后萨达姆时代的巴格达出现的惊涛骇浪，能够对德黑兰、大马士革和拉姆安拉产生广泛的影响。”[154]该篇文章的作者指出，以色列“希望，一旦萨达姆·侯赛因被废黜，多米诺效应就将开始滚动。按照这种希望……整个中东地区的温和派和改革者就将被鼓励对他们的政府施加新的压力，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当局也不例外”。就在战争爆发之前，《前沿》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以色列的地区改造思想进行了归纳概括：“以色列的高层政治、军事和经济官员已经逐渐把即将来临的伊拉克战争，看作改变政治经济格局和使以色列从目前的困境中脱身的实际解决之道。”[155]

有人可能会认为，以色列领导人太过于精明和老练，以至于他们不会相信这一解决之道和支持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他们太熟悉该地区的复杂性，以至于他们不会相信该计划会取得成功。但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长期以来都支持重塑该地区地图这一极为野心勃勃的计划。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初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梦想，就完全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因为这样一个犹太国家在几乎两千年的时间里根

本就没有存在过；而就像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戴维·本-古里安曾希望夺取所有西岸地区的土地，一部分黎巴嫩的土地，以及埃及的部分领土。类似地，阿里埃勒·沙龙相信，1982年对黎巴嫩的入侵将导致在那里建立一个亲以色列的基督教国家，一劳永逸地彻底击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而连接以色列所控制的被占领土。考虑到那一段历史，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坚持那一希望或许就不是那么令人吃惊的事情，即在他们（以色列人）早先失败之处，美国却可能取得成功。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改造中东中的作用

到2002年的时候，许多新保守派也热衷这种想法，即美国能够使中东地区民主化，并且使那里的环境对美国和以色列更为友好。由于对冷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感到幻灭，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那种立场。

亲以色列的团体——而且不仅仅只是新保守派——长期以来对使美国军队直接介入中东一直感兴趣，这样美国军队就可以保护以色列。他们尤其对看到大量美军永久驻扎在该地区感兴趣。[156]但由于美国充当着该地区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因此冷战期间它在这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功比较有限。大多数被指派到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如快速反应部队，都被保持在超出受到伤害的“视距之外”。通过使该地区的强国相互争斗，华盛顿维持了一种有利的均势，这就是为什么里根政府在两伊战争（1980—1988）期间支持伊拉克反对革命的伊朗的原因。

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这一政策发生了改变，当时克林顿政府采取的是“双重遏制”战略。新战略支持在该地区驻扎相当的军队立即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遏制，而不是利用伊朗和伊拉克来相互制衡对方，美国则根据需要来改变自己的支持。双重遏制之父是马丁·因迪克，他最先在1993年5月在华盛顿近东研究所阐明了这一战略，然后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近东和南亚事务主任的时候执行了该战略。[157]就像因迪克的布鲁金斯协会同事肯尼思·波拉克所观察的那样，双重遏制是一项基本上为回应“以色列安全关注”而采取的政策。具体来说，以色列清楚地向克林顿政府表明，“唯有以色列”从伊朗那里“感觉到合理的安全”，它“才愿意在和平进程中往前走”。[158]

由于双重遏制使得美国成为两个相互仇恨的国家的致命敌人，由于双重遏制迫使华盛顿承受同时遏制这两个国家的负担，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人们对此已经存在相当的不满。就像在第十章中所讨论的那样，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以色列游说集团

中的团体不仅保住了这一政策，而且说服国会和克林顿使这一政策变得更加强硬。然而，新保守派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越来越相信，双重遏制不管用，萨达姆·侯赛因必须被赶下台，并代之以一个民主政府。他们的想法在1998年致克林顿总统的两封公开信，以及他们对《伊拉克解放法案》的支持中得到了反映。

大约与此同时，相信在整个中东地区传播民主将使整个地区得到平息的想法，开始在新保守派的圈子中扎下根来。虽然在冷战一结束就有几个新保守派胡乱思忖过这一想法，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想法才得到广泛的支持。[159]当然，这一思想脉络在1996年一群新保守派为内塔尼亚胡所撰写的《干净了结》研究报告中已经清晰了。到2002年，当入侵伊拉克已成为最优先的问题的时候，地区改造随即成了新保守派之间的坚强信念。而这些新保守派回过头来又帮助使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160]因此，以色列领导人、新保守派和布什政府都将同伊拉克的战争，看作在重塑中东这场野心勃勃的运动中迈出的第一步。

结论

布什政府针对伊拉克以及范围更广的中东地区的计划是极其失败的。美国军队不仅胶着于一场失败的战争之中，而且在中东地区输出民主几乎不存在任何很快出现的前景。伊朗是这场构想拙劣的冒险的主要获益者，而且它似乎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下定决心要获得核能力。就像伊朗一样，叙利亚依然同华盛顿争争吵吵，而且这两个国家都从美国军队陷入伊拉克的困境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哈马斯现在控制着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当局严重分裂——这使得同以色列达成和平甚至更加捉摸不定，而在2006年的战争中反击以色列之后，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用国务卿赖斯令人觉得遗憾的话来说，我们可能正目睹“一个新中东在剧痛中出现”，但是这个新中东几乎肯定将比美国在入侵伊拉克之前更不稳定和更加危险。[161]

伊拉克战争对以色列也不利，特别是自那以来它加强了伊朗在该地区的力量。事实上，《前沿》周报在2007年初报道说，在以色列有一种“不断增强的众口一词”的声音，他们现在说，既然萨达姆已经被赶下台了，这个犹太国家“可能发现自己更加危险”[162]。阿马茨亚·巴拉姆（Amatzia Baram）是以色列的一位伊拉克问题专家，他在战前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时事通讯《近东报道》的访谈中支持推翻萨达姆，而现在他却说：“如果我那时知道我现在——2007年1月——所知道的事情，我就不会建议发动战争，因为萨达姆的危险性比我所认为的要小得多。”进而言之，他承认入侵已经产生了“比我预料

的要多得多的（恐怖主义）”。以色列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Shin Bet）负责人伊瓦尔·狄斯金（Yuval Diskin）在2006年2月说：“我不能肯定说我们不会想念萨达姆。”[163]

由于美国寻找使自己从这种灾难性局势中脱身的途径，因此要求布什政府同伊朗和叙利亚进行会谈，并进行解决以巴冲突的一致努力的压力在不断增强。当然，新保守派和以色列人都相信，抵达耶路撒冷之路要经由巴格达。他们相信，一旦美国在伊拉克获胜，巴勒斯坦人就将根据以色列的条件而达成和平。但是由两党组成的伊拉克研究小组、托尼·布莱尔，以及许多其他人都相信，实际情况与此相反：抵达巴格达之路要经由耶路撒冷。[164]换言之，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将有助于美国处理伊拉克和其他的中东地区问题。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有力地挑战了这一派观点，坚持认为美国在伊拉克遭遇的麻烦同巴勒斯坦人毫不相干。事实上，就在伊拉克研究小组的报告发布前夕，以色列《国土报》在2006年11月底曾报道说，埃胡德·奥尔默特总理“希望犹太人的游说，能够动员新一届国会中的民主党多数在巴勒斯坦人问题上反对任何对现状的偏离”[165]。类似地，许多亲以色列的团体依然坚持认为，美国应该拒绝同伊朗和叙利亚会谈，直到这些国家同意华盛顿的所有要求。[166]

虽然布什政府面临不断加大的从伊拉克撤出的压力，但是以色列领导人却鼓励它继续待在那里完成这项工作。为什么？因为这些以色列领导人相信，美国的撤离将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和奥尔默特在2007年3月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都表明了这一点。利夫尼说：“在一个看重印象的地区，国家必须小心不要向极端分子示弱和屈服。”[167]奥尔默特说的甚至更加直截了当：“那些关心以色列安全的人……那些关心整个中东地区的人，应该认识到美国在伊拉克的成功以及从伊拉克负责任地撤离的必要性。”他在评论的结尾处这样说道：“当美国在伊拉克取得成功的时候，以色列就会更加安全。以色列的朋友们知道这一点。关心以色列的朋友们知道这一点。”[168]批评者之所以严厉批评奥尔默特作出这样的评论，主要是因为他的评论提供了另外表明以色列曾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证据。为以色列《国土报》写作的布拉德利·布尔斯顿，对于奥尔默特冒险在伊拉克问题上卷入美国的论辩尤其感到愤怒。他对这位总理有一句简单明了的话要说：“别见鬼似地介入到辩论之中”。[169]

在2006年11月访问白宫期间，奥尔默特实际上表达了他对美国继续留驻在伊拉克的支持。他说道：“对美国在伊拉克的伟大行动给中东带来的稳定，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并大受鼓舞。”[170]甚至是一些

以色列的一贯支持者也为奥尔默特的好战言论所烦扰，因此国会议员加里·阿克曼说道：“我大大地感到吃惊。这是非常不现实的言论。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明白，我们的政策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171]

考虑到现在许多美国人对战争有着与阿克曼一样的观点，我们对这样一种现象就不应该感到吃惊了：有些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美国盟友企图改写历史记录，以便使以色列免于承担伊拉克灾难的任何责任。2007年3月，《耶路撒冷邮报》的编辑戴维·霍罗威茨写了有关“以色列鼓励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的错误观念”的文章。[172]类似地，前贾菲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布兰代斯大学克朗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的夏伊·费尔德曼，在2006年夏告诉《华盛顿邮报》的格伦·弗兰克尔（Glenn Frankel）说：“瞧，以色列并未动员任何人征服伊拉克，而在这个问题上将以色列同新保守派联系在一起是荒谬可笑的。以色列没有将伊拉克看作一个危险；进而言之，它没有兴趣推动布什政府的民主议程。”[173]虽然这种观点无疑反映了费尔德曼有关以色列利益及其所面临威胁等级的看法，但是就像我们所显示的那样，这同在战争即将来临时以色列领导人实际上的言行完全相左。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马丁·克雷默更胜一筹，他声称任何试图将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同伊拉克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企图，“简直就是虚假的谎言”，并认为“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一年里，以色列一次又一次地同美国意见不一致，认为伊朗构成了更大的威胁”。[174]但是就像上面所显示的那样，以色列对伊朗的关注从来就没有导致它作出重要的努力来阻止伊拉克战争的进程。相反，以色列高官却竭尽所能确保美国会紧追萨达姆不放，不会在最后一秒钟罢手。他们将伊拉克看作一个严重威胁，确信布什在对付完伊拉克之后将着手对付伊朗。他们可能更喜欢美国先关注伊朗而非伊拉克，但是就像克雷默所承认的那样，以色列人“对萨达姆的灭亡不会掉一滴泪”。相反，他们的领导人迷恋上了美国的电台、电视，撰写报刊的公众舆论版社论，在国会进行作证，同五角大楼和副总统办公室的新保守派过从甚密，以便形成有关伊拉克的情报信息并整合走向战争的推动力。

贾菲研究中心的以色列战略家约西·阿尔菲现在坚持认为，前总理沙龙对入侵伊拉克怀有极度的保留意见，而且他私下警告过布什反对这样做。阿尔菲甚至暗示说，如果沙龙说出了他所关注的事情的话，他本可以阻止这场战争。他写道：“如果沙龙通过引证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利益所构成的威胁而公开他的批评的话，他本可能使美国和世界的战前辩论变得不同吗？”[175]既然对伊拉克的占领已经走下坡路

了，因此这就成了便利的借口托词，但是没有公开的记录证据表明沙龙曾经建议布什不要进攻伊拉克。事实上，有相当的证据表明这位以色列领导人及其主要顾问都强烈支持这场战争，并鼓励布什政府与其晚打这场战争还不如早打。如果沙龙相信这场战争将是错误的，为什么他自己的发言人要反复强调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为什么沙龙本人警告布什政府说推迟进攻“不会为未来的行动创造更便利的环境”呢？[176]

沙龙在私下里和公开场合表达不同的观点是可能的。然而，这种情况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不是在巴格达陷落一年或两年之后，在战争开始之前沙龙反对战争的言词肯定已经泄露了出来。沙龙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很少有出言谨慎的情况——即便是这样做的时候涉及美国。而如果他认为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将对以色列产生损害，很难相信他会在公开场合沉默不言。简而言之，阿尔菲的观点无论在事实上或逻辑上都说不通。

“对胜利人人趋之若鹜，对失败则避之唯恐不及。”就像伊拉克灾难形形色色的始作俑者现在想方设法要撇清自己一样，约翰·F.肯尼迪那满怀悲伤的评论再合适此刻的情景不过了。但是伊拉克的结果却并不总是像它看起来的那样是个大错。在2003年春短暂的几个月里面，美国似乎赢得了非常大的胜利，而那时候以色列的捍卫者们几乎不需要否认战争的责任。事实上，在这短暂的行事良机，地位关键的以色列人及其美国盟友开始向布什政府施压，将美国的权力导引到叙利亚和伊朗，冀望这两个“流氓国家”将遭受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同样厄运。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及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如何影响美国的叙利亚政策的，然后再转向伊朗。

---

[1] George Packer， *The Assassins'Gate*： *America in Iraq*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p.46.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因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谜团之一是伊拉克战争在什么时候变得不可避免。” George Tenet with Bill Harlow， *At the Center of the Storm*： *My Years at the CIA* （New York： Harper， 2007）， p.301.

[2] 据报道，就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在2003年5月所观察的那样：“并不只是新保守派带领我们来到巴格达的郊外。恰恰是美国的焦虑与傲慢这两个因素带领我们来到巴格达郊外。”参见Ari Shavit，“White Man's Burden，” *Ha'aretz*， May 4， 2003。

[3] 引自Emad Mekay，“Iraq Was Invaded ‘to Protect Israel’—US Official，” *Asia Times Online*， March 31， 2004。我们在《伦敦书评》中最初的那篇文章中使用了这些所引用的内容，而泽利考则对我们的解释提出了质疑。我们的讨论以他的完整无误的评论记录为基础，而他的质疑事实上是毫无根据的。关于泽利考的质疑以及我们所作出的回应更详细的讨论，参见“Letter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May 25， 2006。泽利考在布什第一任期时也同赖斯一道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效力，后来与她合著了一本关于德国统一的著作。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这份文件的主要作者之一，该文件可能是对布什主义最为全面的声明。

[4] 引自“US Assumes UK Help in Iraq， Says General，” *Guardian*， August 20， 2002。

[5] 引自对萨斯查·勒哈纳茨（Sascha Lehnartz）的采访，“Dann helfen uns eben die Osteuropa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January 26， 2003。关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的国家政策委员会的影响力，参见Stephen J.Hedges，“Iraq Hawks Have Bush's Ear，” *Chicago Tribune*， August 18， 2002。

[6] Joe Klein，“How Israel Is Wrapped Up in Iraq，” *Time*， February 10， 2003.

[7] Senator Ernest F.Hollings，“Bush's Failed Mideast Policy Is Creating More Terrorism，” *Charleston Post and Courier* （online）， May 6， 2004；“Sen.Hollings Floor Statement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on His Mideast Newspaper Column，” May 20， 2004，起初张贴在这位前参议员的网站上（现在无法进入），但仍然可以登录www.shalomctr.org/node/620。

[8] “ADL Urges Senator Hollings to Disavow Statements on Jews and the Iraq War，”反诽谤联盟2004年5月14日的新闻稿。

[9] Matthew E.Berger，“Not So Gentle Rhetoric from the Gentleman from South Carolina，” *JTA.org*， May 23， 2004；“Sen.Hollings Floor Statement”；“Senator Lautenberg's Floor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Senator Hollings，” June 3， 2004， 登录http：//lautenberg.senate.gov/news room/video.cfm。

[10] Aluf Benn，“Scapegoat for Israel，” *Ha'aretz*， May 13， 2004； Matthew Berger，“Will Some Jews' Backing for War in Iraq Have Repercussions for All？” *JTA.org*， June 10， 2004； Patrick J.Buchanan，“Whose War？” *American Conservative*， March 24， 2003； Arnaud de Borchgrave，“A Bush-Sharon Doctrine？” *Washington Times*， February 14， 2003； Ami Eden，“Israel's Role： The ‘Elephant’ They're Talking About，” *Forward*， February 28， 2003；“The Ground Shifts，” *Forward*， May 28， 2004； Nathan Guttman，“Prominent U.S.Jews， Israel Blamed for Start of Iraq War，” *Ha'aretz*， May 31， 2004； Spencer S.Hsu，“Moran Said Jews Are Pushing War，” *Washington Post*， March 11， 2003； Lawrence F.Kaplan，“Toxic Talk on War，”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8， 2003； E.J.Kessler，“Gary Hart Says ‘Dual Loyalty’Barb Was Not Aimed at Jews，” *Forward*， February 21， 2003； Ori Nir and Ami Eden，“Ex-Mideast Envoy Zinni Charges Neocons Pushed Iraq War to Benefit Israel，” *Forward*， May 28， 2004，以及 Robert Novak，“Sharon's War？” *CNN.com*， December 26， 2002。

[11] 引自Akiva Eldar，“Sharp Pen， Cruel Tongue，” *Ha'aretz*， April 13， 2007。

[12] Michael Kinsley，“What Bush Isn't Saying About Iraq，” *Slate.com*， October 24， 2002.也可参见Michael Kinsley，“J'Accuse， Sort Of，” *Slate.com*， March 12， 2003。

[13] Nathan Guttman，“Some Blame Israel for U.S.War in Iraq，” *Ha'aretz*， March 5， 2003.

[14] Bill Keller，“Is It Good for the Jews？” *New York Times*， March 8， 2003.

[15] Ori Nir，“FBI Probe：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Forward*， May 13， 2005.

[16] Shai Feldman，“The Bombing of Osiraq-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7*， no.2（Autumn 1982）；Dan Reiter，“Preventive Attacks Against Nuclear Programs and the ‘Success’ at Osiraq，”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12*， no.2（July 2005）.

[17] Joel Brinkley，“Confrontation in the Gulf： Israelis Worried by U.S.Restraint，” *New York Times*，August 30， 1990； Joel Brinkley，“Top Israelis Warn of Deep Worry over Diplomatic Accord in Gulf，”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90； Hugh Carnegy，“Pullout Not Enough， Says Israel，” *Financial Times*，January 10， 1991； Sabra Chartrand，“Israel Warns Against a Gulf Retrea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6， 1990； Jackson Diehl，“Israelis Fear Iraqi Threat Will Endur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9， 1990；Rowland Evans and Robert Novak，“Israel's Call for Action，”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4， 1990； Michael Massing，“The Way to Wa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8， 1991； Martin Merzer，“Israel Hopes Diplomacy Won't Let Iraqi Stay in Power，” *Miami Herald*， August 29， 1990，以及“Sharon to Americans：Blast Iraqis Immediately，” *Jerusalem Post*， August 12， 1990。

[18] Aluf Benn，“Sharon Shows Powell His Practical Side，” *Ha'aretz*， February 26， 2001.

[19] Seymour Hersh，“The Iran Game，” *New Yorker*， December 3， 2001； Peter Hirschberg，“Background： Peres Raises Iranian Threat，” *Ha'aretz*， February 5， 2002； David Hirst，“Israel Thrusts Iran in Line of US Fire，” *Guardian*， February 2， 2002；“Israel Once Again Sees Iran as a Cause for Concern，” *Ha'aretz*， May 7， 2001，以及 Alan Sipress，“Israel Emphasizes Iranian Threat，”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7， 2002。

[20] Robert Novak，“Netanyahu's Nuke Warning，” *Chicago Sun-Times*， April 14， 2002； Robert Novak，“War on Iraq Won't Be ‘Cakewalk’，” *Chicago Sun-Times*， April 25， 2002，以及William Raspberry，“To Solve the Crisi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5， 2002。

[21] Elizabeth Sullivan，“Sharon Aide Expects United States to Attack Iraq； He Says Saddam Must Be Stopped from Making Nuclear Arms，” *Cleveland Plain Dealer* （online）， May 3， 2002.

[22] 引自Joyce Howard Price，“Peres Encourages U.S.Action on Iraq，” *Washington Times*， May 12，2002。

[23] Ehud Barak，“No Quick Fix，” *Washington Post*， June 8， 2002.

[24] 引自Gideon Alon，“Sharon to Panel：Iraq Is Our Biggest Danger，” *Ha'aretz*，August 13，2002。也可参见Nina Gilbert，“Iraq Poses Greatest Threat，” *Jerusalem Post*，August 13，2002。

[25] “Israel to US：Don't Delay Iraq Attack，” *CBSNews.com*，August 16，2002.所引用的沙龙和佩雷斯的话来自Aluf Benn，“PM Urging U.S.Not to Delay Strike Against Iraq，” *Ha'aretz*，August 16，2002。所引用吉森的话来自Jason Keyser，“Israel Urges U.S.to Attack，” *Washington Post*，August 16，2002。所引用的雪莉的话来自Ben Lynfield，“Israel Sees Opportunity in Possible US Strike on Iraq，”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August 30，2002。也可参见Anton La Guardia，“Sharon Urges America to Bring Down Saddam，” *Daily Telegraph*（London），August 17，2002；Reuven Pedhatzur，“Israel's Interest in the War on Saddam，” *Ha'aretz*，August 4，2002；Jonathan Steele，“Israel Puts Pressure on US to Strike Iraq，” *Guardian*，August 17，2002；Walter Rodgers，“Rice and Peres Warn of Iraqi Threat，” *CNN.com*，August 16，2002；Tony Snow et al.，interview with Ra'anan Gissen，“Fox Special Report with Brit Hume，” August 16，2002，以及Ze'ev Schiff，“Into the Rough，” *Ha'aretz*，August 16，2002。

[26] Benn，“PM Urging U.S.” 关于“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在2002年深切关注这一情况——“即批评者认为，美国将为了以色列而进行战争；甚或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将按照以色列的命令而进行战争”——的证据，参见Marc Perelman，“Iraqi Move Puts Israel in Lonely U.S.Corner，” *Forward*，September 20，2002。

[27] amen corner，本意为“支持发言者的人的座位”，此处根据上下文意译为“支持者”。——译者注

[28] 关于以色列游说集团对1991年海湾战争预备阶段的关注，参见John B.Judis，“Jews and the Gulf：Fallout from the Six-Week War，” *Tikkun*，May/June 1991；Allison Kaplan，“Saddam Splits Jewish Lobby，” *Jerusalem Post*，January 14，1991，以及 David Rogers，“Pro-Israel Lobbyists Quietly Backed Resolution Allowing Bush to Commit U.S.Troops to Combat，”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28，1991。关于以色列在那时的关注，参见Brinkley，“Top Israelis Warn of Deep Worry”；Carnegy，“Pullout Not Enough”；Chartrand，“Israel Warns”；Diehl，“Israelis Fear Iraqi Threat”，以及Merzer，“Israel Hopes”。 所引用的布坎南的话来自Chris Reidy，“The War Between the Columnists Gets Nasty，” *Boston Globe*，September 22，1990。

[29] Benn，“PM Aide”；Keyser，“Israel Urges U.S.to Attack.”

[30] 引自Rodgers，“Rice and Peres Warn”。

[31] Benn，“PM Aide.”

[32] Alon，“Sharon to Panel.” 2002年10月16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沙龙说：“总统先生，我要谢谢您的友谊和合作。而据我记忆所及，当我们回望此前的许多年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与任何其他美国总统的关系都不及与您的关系，而且我们从未有过像与您这届政府这样在所有事情上的合作。”“President Bush Welcomes Prime Minister Sharon to White House；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with the Press，” 2002年10月16日美国国务院记者招待会新闻稿副本。也可参见Robert G.Kaiser，“Bush and Sharon Nearly Identical on Mideast Policy，”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9，2003。

[33] Shlomo Brom，“An Intelligence Failure，” *Strategic Assessment*（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Tel Aviv University）6，no.3（November 2003）：9.也可参见“Intelligence Assessment：Selections from the Media，1998—2003，” Ibid.，pp.17—19；Gideon Alon，“Report Slams Assessment of Dangers Posed by Libya，Iraq，” *Ha'aretz*，March 28，2004；Dan Baron，“Israeli Report Blasts Intelligence for Exaggerating the Iraqi Threat，” *JTA.org*，March 29，2004；Molly Moore，“Israel Shares Blame on Iraq Intelligence，Report Says，”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5，2003；Greg Myre，“Israeli Report Faults Intelligence on Iraq，” *New York Times*，March 28，2004；Ori Nir，“Senate Report on Iraq Intel Points to Role of Jerusalem，” *Forward*，July 16，2004，以及 James Risen，*State of War*：*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6），pp.72—73。

[34] 关于推诿责任的普遍现象，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pp.157—162。

[35] 引自Perelman，“Iraqi Move”。

[36] Herb Keinon，“Sharon to Putin：Too Late for Iraq Arms Inspection，” *Jerusalem Post*，October 1，2002.

[37] “Peres Questions France Permanent Status on Security Council，” *Ha'aretz*，February 20，2003.

[38] Perelman，“Iraqi Move.”

[39] Shlomo Avineri，“A Haunting Echo，” *Los Angeles Times*，November 24，2002.也可参见Benjamin Netanyahu，“The Case for Toppling Saddam，”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20，2002，以及Nathan Guttman，“Shimon Peres Warns Against Repeat of 1930s Appeasement，”*Ha'aretz*，September 15，2002。

[40] 关于一些有代表性的社论文章，参见“Next Stop，Baghdad，” *Jerusalem Post*editorial，November 15，2001；“Don't Wait for Saddam，” *Jerusalem Post*editorial，August 18，2002；“Making the Case for War，” *Jerusalem Post*editorial，September 9，2002。关于一些有代表性的专栏文章，参见Ron Dermer，“The March to

Baghdad，”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21， 2001； Efraim Inbar，“Ousting Saddam， Instilling Stability，” *Jerusalem Post*， October 8， 2002，以及 Gerald M.Steinberg，“Imagining the Liberation of Iraq，”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18， 2001。

[41] “Don't Wait for Saddam.”

[42] Ehud Barak，“Taking Apart Iraq's Nuclear Threat，”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2002.

[43] Netanyahu，“The Case for Toppling Saddam.” 也可参见 Benjamin Netanyahu，“U.S.Must Beat Saddam to the Punch，” *Chicago Sun-Times*， September 17， 2002。

[44] 例如，可参见“Benjamin Netanyahu Testifies About Iraq to Congress，” CNN Live Event，*CNN.com*， September 12， 2002； Jim Lobe，“Hawks Justify Iraq Strike as War for Democracy，” Inter Press Service， September 27， 2002，以及 Janine Zacharia，“Netanyahu： US Must Guarantee Israel's Safety from Iraqi Attack，”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13， 2002。

[45] Aluf Benn，“Background： Enthusiastic IDF Awaits War in Iraq，” *Ha'aretz*， February 17， 2003； James Bennet，“Israel Says War on Iraq Would Benefit the Regi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2003，以及Chemi Shalev，“Jerusalem Frets as U.S.Battles Iraq War Delays，” *Forward*， March 7， 2003.

[46] 引自James Bennet，“Clinton Redux，” *The Atlantic Aspen*weblog， July 8， 2006。

[47] Asher Arian，“Israeli public Opin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2002，”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Tel Aviv University， Memorandum no.61， July 2002， pp.10， 34.

[48] Ephraim Yaar and Tamar Hermann，“Peace Index： Most Israelis Support the Attack on Iraq，” *Ha'aretz*， March 6， 2003.关于科威特，2003年3月发表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9.6%的科威特人赞成即将来临的对伊拉克的战争。James Morrison，“Kuwaitis Support War，” *Washington Times*， March 18， 2003.2007年5月初在以色列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59%的受访者说，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是正确的。“Poll Shows That Israel Is a Staunch American Ally，” Anti-Defamation League press release， May 18， 2007.那时候，大多数美国人都得出结论认为这场战争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49] “America's Image Further Erodes， Europeans Want Weaker Ties： a Nine-Country Survey，”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Washington， DC， March 18， 2003.也可参见 Alan Travis and Ian Black，“Blair's Popularity Plummets，” *Guardian*， February 18， 2003。

[50] Gideon Levy，“A Deafening Silence，” *Ha'aretz*， October 6， 2002.

[51] 参见Dan Izenberg，“Foreign Ministry Warns Israeli War Talk Fuels US Anti-Semitism，” *Jerusalem Post*， March 10， 2003， 这篇文章清楚表明，“以色列外交部已经得到美国的报告”，告诉以色列人要更慎重，因为美国媒体正在把以色列描绘为“企图驱使美国政府陷入战争”。

[52] 引自Dana Milbank，“Group Urges Pro-Israel Leaders Silence on Iraq，”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7， 2002。

[53] David Horovitz，“Sharon Warns Colleagues Not to Discuss Iraq Conflict，” *Irish Times*， March 12， 2003.也可参见James Bennet，“Threats and Responses： Israel's Role； Not Urging War， Sharon Says，”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2003，以及 Aluf Benn，“Sharon Says U.S.Should Also Disarm Iran， Libya and Syria，” *Ha'aretz*， February 18， 2003。

[54] 新保守派及其盟友的影响力，在战争之前得到广泛的反映，并清楚地反映在撰写于战争之前和战争刚刚开始之后的这些文章之中：Joel Beinin，“Pro-Israel Hawks and the Second Gulf War，”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 April 6， 2003； Elisabeth Bumiller and Eric Schmitt，“On the Job and at Home， Influential Hawks' 30-Year Friendship Evolve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2002； Kathleen and Bill Christison，“A Rose by Another Nam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Dual Loyalties，” *CounterPunch.org*， December 13， 2002； Robert Dreyfuss，“The Pentagon Muzzles the CIA，” *American Prospect*， December 16， 2002； Michael Elliott and James Carney，“First Stop， Iraq，” *Time*， March 31， 2003； Seymour Hersh，“The Iraq Hawks，” *New Yorker*， December 24-31， 2001； Michael Hirsh，“Hawks， Doves and Dubya，” *Newsweek*， September 2， 2002； Glenn Kessler，“U.S.Decision on Iraq Has Puzzling Past，”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2， 2003； Joshua M.Marshall，“Bomb Saddam？” *Washington Monthly*， June 2002； Dana Milbank，“White House Push for Iraqi Strike Is on Hold，”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8， 2002； Susan Page，“Showdown with Saddam： The Decision to Act，” *USA Today*， September 11， 2002； Sam Tanenhaus，“Bush's Brain Trust，” *Vanity Fair*（online）， July 2003； Patrick E.Tyler and Elaine Sciolino，“Bush Advisers Split on Scope of Retaliatio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2001，以及Jason A.Vest，“The Men from JINSA and CSP，” *Nation*， September 2/9， 2002。

[55] Janine Zacharia，“All the President's Middle East Men，”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9， 2001.

[56] “Rally Unites Anguished Factions Under Flag of ‘Stand with Israel’，” *Forward*， April 19， 2002； “Forward 50，” *Forward*， November 15， 2002.

[57] John McCaslin，“Israeli-Trained Cops，” *Washington Times*， November 5， 2002； Bret Stephens，“Man of the Year，” *Jerusalem Post*（Rosh Hashana Supplement）， September 26， 2003，以及Janine Zacharia，“Invasive Treatment，” Ibid。其他有关沃尔福威茨的有益文章包括Peter J.Boyer，“The Believer，” *New Yorker*， November 1， 2004； Michael Dobbs，“For Wolfowitz， a Vision May Be Realized，” *Washington Post*， April 7， 2003； James Fallows，“The Unilateralist，” *Atlantic*， March 2002； Bill Keller，“The Sunshine Warrio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22， 2002，以及“Paul Wolfowitz， Velociraptor，” *Economist*， February 7， 2002。

[58] 例如，可参见Douglas J.Feith，“The Inner Logic of Israel's Negotiations： Withdrawal Process， Not Peace Process，” *Middle East Quarterly 3*， no.1（March 1996）； Douglas Feith，“A Strategy for Israel，” *Commentary*， September 1997。关于费思观点的有益讨论，参见Jeffrey Goldberg，“A Little Learning： What Douglas Feith Knew and When He Knew It，” *New Yorker*， May 9， 2005； Jim Lobe，“Losing Feith， or Is the Bush Team Shedding Its Sharper Edges？” *Daily Star*（online）， January 31， 2005； James J.Zogby，“A Dangerous Appointment： Profile of Douglas Feith，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 Under Bush，” Middle East Information Center， April 18， 2001，以及“Israeli Settlements： Legitimate， Democratically Mandated， Vital to Israel's Security and， Therefore， in U.S.Interest，”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Transition Brief no.96-T 130， December 17， 1996。注意后一篇文章的标题，该文是由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一个组织所发表的，文章说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即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失去费思》（Losing Feith）一文中，洛布写道：“根据华盛顿内部时事通讯《尼尔森报道》（*Nelson Report*）的说法，当2003年代替拉姆斯菲尔德参加中东问题跨部门‘负责人会议’的费思代表五角大楼进行总结评论的时候，（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说：‘感谢道格，但是在我们想要以色列的主张的时候，我们会邀请以色列大使。’”

[59] 《干净了结：为保证地区安全的新战略》（A Clean Break： A New Strategy for Securing the Realm）是为耶路撒冷的高级战略与政治研究所所准备的，并于1996年6月发表。此文的副本可登录www.iasps.org/strat1.htm。

[60] Akiva Eldar，“Perles of Wisdom for the Feithful，” *Ha'aretz*， October 1， 2002.

[61] Packer， *Assassins' Gate*， p.32.

[62] “Israel's UN Ambassador Slams Qatar， Praises U.S.Envoy Bolton，” *Ha'aretz*， May 23， 2006.也可参见 “Bolton Is Israel's Secret Weapon， Says Gillerman，” *BigNewsNetwork.com*， November 18， 2006，以及 Ori Nir，“Senate Probes Bolton's Pro-Israel Efforts，” *Forward*， May 6， 2005。

[63] Marc Perelman，“Siding with White House， Groups Back Bolton，” *Forward*， November 17， 2006；“Dear John，” *Forward*editorial， December 8， 2006.

[64] Ori Nir，“Libby Played Leading Role o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Forward*， November 4， 2005.

[65] “He Tarries： Jewish Messianism and the Oslo Peace，” Rennert Lecture for 2002.克劳萨默每次在他的专栏中激烈地为以色列辩护。

[66] Asla Aydintasbas，“The Midnight Ride of James Woolsey，” *Salon.com*， December 20， 2001； Anne E.Kornblut and Bryan Bender，“Cheney Link of Iraq， 9/11 Dismissed，” *Boston Globe*， September 16， 2003； David E.Sanger and Robin Toner，“Bush and Cheney Talk Strongly of Qaeda Links with Hussein，” *New York Times*， June 18， 2004，以及 R.James Woolsey，“The Iraq Connec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8， 2001。

[67] 戈德堡说：“在华盛顿圈内的犹太游说人员当中，对迫在眉睫的战争的支持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些人还对这种主张感到困惑，即有可能出现任何一种热心反对入侵伊拉克的情形。” Michelle Goldberg，“Why American Jewish Groups Support War with Iraq，” *Salon.com*， September 14， 2002.

[68] “An Unseemly Silence，” *Forward*editorial， May 7， 2004.

[69] Nacha Cattan，“Resolutions on Invasion Divide Jewish Leadership，” *Forward*， October 11， 2002； Laurie Goodstein，“Threats and Responses： American Jews； Divide Among Jews Leads to Silence on Iraq War，”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03，以及 Milbank，“Group Urges”。

[70] Matthew E.Berger，“Jewish Groups Back U.S.Stand on Iraq，” *Jewish Journal*（online）， October 18， 2002； Jewish Council for Public Affairs，“Statement on Iraq，” 由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董事会于2002年10月所采用。

[71] Mortimer B.Zuckerman，“No Time for Equivocation，” *U.S.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26/September 2， 2002.也可参见Mortimer B.Zuckerman，“No More Cat and Mouse，” *U.S.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28， 2002； Mortimer B.Zuckerman，“Clear and Compelling Proof，” *U.S.News* & *World Report*， February 10， 2003，以及Mortimer B.Zuckerman，“The High Price of Waiting，” *U.S.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10， 2003。

[72] 所引用的两段话均来自Goldberg，“Why American Jewish Groups”。

[73] Gary Rosenblatt，“The Case for War Against Saddam，” *Jewish Week*，December 13，2002.也可参见Gary Rosenblatt，“Hussein Asylum，” *Jewish Week*，August 23，2002。

[74] Ron Kampeas，“Cheney：Iran，Iraq a Package Deal，” *JTA.org*，March 13，2007.

[75] Nathan Guttman，“Background：AIPAC and the Iraqi Opposition，” *Ha'aretz*，April 7，2003.也可参见Dana Milbank，“For Israel Lobby Group，War Is Topic A，Quietly，” *Washington Post*，April 1，2003。

[76] David Twersky，“A Bittersweet Affair for AIPAC，” *New York Sun*，January 23，2003.关于反诽谤联盟，参见Cattan，“Resolutions on Invasion”；Nacha Cattan，“Jewish Groups Pressed to Line Up on Iraq，” *Forward*，August 23，2002，以及Nathan Guttman，“Groups Mum on Iraq，Despite Antiwar Tide，” *Forward*，March 2，2007。

[77] Jeffrey Goldberg，“Real Insiders：A Pro-Israel Lobby and an FBI Sting，” *New Yorker*，July 4，2005.战争开始之前的数月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出版的针对中东问题的双周刊《近东报道》，刊登的都是针对伊拉克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没有明确要求入侵伊拉克，但是都把萨达姆描绘为一个特别危险的威胁，从而使读者认为如果不推翻他的政权，以色列和美国毫无疑问将有严重的麻烦。例如，可参见“Saddam's Diversion，” *NER*，October 7，2002；interview with Ze'ev Schiff，*NER*，October 21，2002；interview with Amatzia Baram，*NER*，February 25，2002；interview with Amatzia Baram，*NER*，October 7，2002；interview with Kenneth M.Pollack，*NER*，September 23，2002；“Arming Iraq，” *NER*，July 1，2002，以及“Backing Saddam，” *NER*，February 3，2003。

[78] John Bresnahan，“GOP Turns to Israeli Lobby to Boost Iraq Support，” *Roll Call*（online），October 6，2003.

[79] Matthew E.Berger，“Bush Makes Iraq Case in AIPAC Appearance，” *Deep South Jewish Voice*（online），May 11，2004.

[80] David Horovitz，“Editor's Notes：Wading into the Great Debate，” *Jerusalem Post*，March 15，2007.根据罗恩·坎皮斯的说法，切尼的“辩护词并没有得到热情反应。只有约1/3到一半的听众……礼貌性地报以掌声”。参见“Cheney：Iran，Iraq a Package Deal”。同样地，内森·瓜特曼写道，切尼的演讲“受到了冷遇”。参见“Cheney Links Action on Iran to Winning Iraq，” *Forward*，March 16，2007。但是，格雷戈里·利维在《沙龙》杂志上的文章指出：“切尼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有力的掌声。”参见“Inside America's Powerful Israel Lobby，” *Salon.com*，March 16，2007。

[81] 关于波尔纳和佩洛西所受到的接待，参见Guttman，“Cheney Links Action”；Levey，“Inside”，以及Ian Swanson，“Pelosi Hears Boos at AIPAC，” *The Hill*（online），March 13，2007。

[82] Guttman，“Groups Mum on Iraq.”

[83] Ibid.；and Jeffrey M.Jones，“Among Religious Groups，Jewish Americans Most Strongly Oppose War，” Gallup News Service，February 23，2007.

[84] 就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国会议员詹姆斯·P.莫兰在说了这番话之后产生了轰动，他说道：“如果不是犹太人社会强烈支持这场同伊拉克的战争，我们就不会打这场战争。”引自Hsu，“Moran Said”。然而，莫兰的话错了，因为在犹太人社会并不存在对战争的广泛支持。他应该这样说：“如果不是新保守派和以色列游说集团领导层强烈支持这场同伊拉克的战争，我们就不会打这场战争。”

[85] Samuel G.Freedman，“Don't Blame Jews for This War，” *USA Today*，April 2，2003.也可参见James D.Besser，“Jews Souring on Iraq War，” *Jewish Week*，September 24，2004；Goodstein，“Threats and Responses”，以及 Ori Nir，“Poll Finds Jewish Political Gap，” *Forward*，February 4，2005。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之前。到国会投票支持1991年1月12日的战争的时候，“唯一未记录在案支持政府立场的华盛顿重要犹太人组织，是现在就要和平的美国朋友（American Friends of Peace Now），因为它赞成继续进行制裁”。Judis，“Jews and the Gulf，” p.13.尽管以色列游说集团努力使1991年的战争发生，然而，大部分的美国犹太人社会却反对这场战争，就像在2003年的情形一样。例如，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犹太人议员以17票对16票的结果投票反对授权战争的决议，而犹太人参议员投票反对授权战争决议的结果则是5票对3票。Ibid.，p.14.这一结果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关于是否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问题，与2002年至2003年期间所发生的情况相比，1990年至1991年期间有过严肃的辩论；这一结果还反映了另外一个事实，即以色列游说集团有时候采取与相当一部分美国犹太人社会相左的立场。

[86] 1998年1月26日的信函可以登录美国新世纪计划网站www.newamericancentury.org/iraqclintonletter.htm；1998年2月19日的信函可以登录伊拉克观察（Iraq Watch）网站www.iraqwatch.org/perspectives/rumsfeldopenletter.htm。关于为了波斯湾的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的背景，参见Judis，“Jews and the Gulf，” p.12。也可参见1998年5月29日由美国新世纪计划所赞助的写给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的信函，登录 www.newamericancentury.org/iraqletter1998.htm。需要强调的是，新保守派主张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参见“The End of Containment，” *Weekly Standard*，December 1，1997；Zalmay M.Khalilzad and Paul Wolfowitz，“Overthrow Him，” Ibid.；Frederick W.Kagan，“Not by Air Alone，” Ibid.，以及Robert Kagan，“A Way to Oust Saddam，” *Weekly Standard*，September 28，1998。

[87] 伊拉克解放法案的副本可登录www.iraqwatch.org/government/US/Legislation/ILA.htm。

[88] John Dizard，“How Ahmed Chalabi Conned the Neocons，” *Salon.com*， May 4， 2004；“Iraqi Myths，” *Jerusalem Post*editorial， October 7， 1998； Seth Gitell，“Neocons Meet Israeli to Gain U.S.Backing，” *Forward*， July 31， 1998； Kagan，“Way to Oust Saddam”； Martin Kettle，“Pentagon Balks at ‘Idiotic’ Law Urging Bay of Pigs-type Invasion of Iraq，” *Guardian*， October 21， 1998， 以及Vernon Loeb，“Congress Stokes Visions of War to Oust Saddam； White House Fears Fiasco in Aid to Rebel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0， 1998。关于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参见“Concrete Responses to Saddam，” *jinsa.org*， Report no.79， August 10， 1998；“To Overthrow Saddam，” *jinsa.org*， Report no.82， October 2， 1998；“Spring 1998 Board Resolution-Iraq，” *jinsa.org*， March 22， 1998， 以及 “Resolution in Support of the Iraqi Opposition，” *jinsa.org*， October 19， 1998。

[89] 参见克林顿在签署1998年的伊拉克解放法案后所作的评论。1998年10月31日的白宫新闻办公室总统声明。也可参见Kettle，“Pentagon Balks”，以及Loeb，“Congress Stokes”。

[90] Vernon Loeb，“Saddam's Iraqi Foes Heartened by Clinton，”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6， 1998； Nicholas Lemann，“The Iraq Factor： Will the New Bush Team's Old Memories Shape Its Foreign Policies？” *New Yorker*， January 22， 2001，以及Robert Litwak， *Rogue States and U.S.Foreign Policy*（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0）， chap.4。

[91] Packer， *Assassins' Gate*， p.41.

[92] Jane Perlez，“Capitol Hawks Seek Tougher Line on Iraq，” *New York Times*， March 7， 2001；“Have Hawks Become Doves？” *Washington Times*editorial， March 8， 2001.也可参见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29—131。

[93] Richard A.Clarke， *Against All Enemies*： *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Ron Suskind， *The Price of Loyalty*： *George W.Bus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94] Bob Woodward， *Plan of Attack*（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12.也可参见Lemann，“Iraq Factor”； Eric Schmitt and Steven Lee Meyers，“Bush Administration Warns Iraq on Weapons Program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01。

[95] 她还指出，如果伊拉克的确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的适当反应将是发表一项“明确而典型的威慑声明——如果他们确实获得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他们也将无法使用，因为任何使用这种武器的企图都将给他们带来国家灭亡。” 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79*，no.1（January/February 2000）： 60—62.

[96] Timothy Noah，“Dick Cheney， Dove，” *Slate.com*， October 16， 2002； Adam Meyerson，“Calm After Desert Storm，” interview with Dick Cheney， *Policy Review 65*（Summer 1993）.

[97] 引自Kessler，“U.S.Decision on Iraq Has Puzzling Past”。埃利奥特（Elliott）和卡尼（Carney）（在“First Stop， Iraq”这篇文章中）报告说，当切尼被选择作为布什的竞选搭档时，由于切尼在结束第一次海湾战争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因而威廉·克里斯托尔这样的新保守派都心情沉重。但是克里斯托尔说，“9·11”事件之后，“新保守派却高兴地‘把他看作同路人’”。

[98] Elliott and Carney，“First Stop， Iraq”； Glenn Kessler and Peter Slavin，“Cheney Is Fulcrum of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3， 2002； Kessler，“U.S.Decision on Iraq Has Puzzling Past”，以及“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Talks About Bush's Energy Plan，” interview with Tim Russert on NBC's Meet the Press， May 20， 2001。虽然切尼对于入侵伊拉克的态度在“9·11”事件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这显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参见“The Vice President Appears on Meet the Press with Tim Russert，” Camp David， Maryland，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eptember 16， 2001。 切尼对有关伊拉克具体问题的回应，并不表明在双子塔倒塌5天之后，他已改变了认为有必要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想法。

[99] 所引用的卡根的两段话均来自Packer， *Assassins' Gate*， p.38。也可参见帕克本人在*Assassins' Gate*， p.32，中所作的类似评论。

[100] Woodward， *Plan of Attack*， pp.25—26.

[101] Page，“Showdown with Saddam.”

[102] Elliott and Carney，“First Stop， Iraq.” 伍德沃德把沃尔福威茨描述成一个“像不会停息的鼓声”一样的人。*Plan of Attack*， p.22.

[103] Woodward， *Plan of Attack*， pp.1—44.

[104] 关于新保守派对切尼的影响，参见Elliott and Carney，“First Stop， Iraq”； Page，“Showdown with Saddam”； Michael Hirsh，“Bernard Lewis Revisited，” *Washington Monthly*， November 2004； Frederick

Kempe，“Lewis's ‘Liberation’ Doctrine for Mideast Faces New Test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3， 2005，以及 Carla Anne Robbins and Jeanne Cummings，“How Bush Decided That Hussein Must Be Ousted from Atop Iraq，”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4， 2002。尤其是关于阿杰米，参见Adam Shatz，“The Native Informant，” *Nation*， April 28， 2003。

[105] Jacob Weisberg，“Are Neo-cons History？” *Financial Times*， March 14， 2007.这篇文章清楚表明，切尼和刘易斯有着亲密的关系。

[106] 伍德沃德在*Plan of Attack*（pp.48—49）一书中对利比的影响力进行了简明的描述：“利比曾有三个正式头衔。他既是副总统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又是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最后还是布什总统的助理。以前可能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一身三任。斯库特（Scooter，含义为喷水炮）一词就是用在他自己身上的权力中心……利比是参加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非部门负责人中仅有的两个人之一，而且他还参加由赖斯主持的独立部门首长会议。”也可参见Ibid.， pp.50—51， 288—292， 300—301， 409—410； Bumiller and Schmitt，“On the Job and at Home”； Karen Kwiatkowski，“The New Pentagon Papers，” *Salon.com*， March 10， 2004，以及Tyler and Sciolino，“Bush Advisers Split”。

[107] Tyler and Sciolino，“Bush Advisers Split.” 也可参见 Bumiller and Schmitt，“On the Job and at Home”，以及 William Safire，“Phony War II，”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02。

[108] 关于切尼在布什政府中的重要影响力，参见Jeanne Cummings and Greg Hitt，“In Iraq Drama，Cheney Emerges as President's War Counselor，”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7， 2003； Mark Hosenball，Michael Isikoff， and Evan Thomas，“Cheney's Long Path to War，” *Newsweek*， November 17， 2003； Kessler and Slavin，“Cheney Is Ful crum”； Barbara Slavin and Susan Page，“Cheney Rewrites Roles in Foreign Policy，” *USA Today*， July 29， 2002，以及 Woodward， *Plan of Attack*， pp.27—30。

[109] Kessler，“U.S.Decision on Iraq Has Puzzling Past”，以及Woodward， *Plan of Attack*， 410。也可参见ibid.， pp.164—165， 409。

[110] 引自Eric Schmitt，“Pentagon Contradicts General on Iraq Occupation Force's Siz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2003。

[111] “This Goes Beyond Bin Laden，” *jinsa.org*， September 13， 2001.也可参见Vest，“The Men from JINSA and CSP”。

[112] 这封信发表于2001年10月1日的《旗帜周刊》上。 签名者当中有威廉·贝内特、埃利奥特·科恩、阿隆·弗里德伯格、唐纳德·卡根、罗伯特·卡根、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威廉·克里斯托尔、查尔斯·克劳萨默、理查德·珀尔、诺曼·波多雷茨、蒂芬·索拉兹和利昂·威泽惕尔。

[113] Charles Krauthammer，“The War： A Road Map，”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8， 2001；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The Right War，” *Weekly Standard*， October 1， 2001.也可参见 “War Aims，” *Wall Street Journal*editorial， September 20， 2001。

[114] Michael Barone，“War by Ultimatum，” *U.S.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1， 2001.也可参见Bill Gertz，“Iraq Suspected of Sponsoring Terrorist Attacks，”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21， 2001；“Drain the Ponds of Terror，” *Jerusalem Post*editorial， September 25， 2001； William Safire，“The Ultimate Enem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2001，以及 Mortimer B.Zuckerman，“A Question of Priorities，” *U.S.News* & *World Report*， October 8， 2001。

[115] 2002年4月3日的信函可以登录www.newamericancentury.org/Bushletter040302.htm。

[116] Daniel Byman， Kenneth M.Pollack， and Gideon Rose，“The Rollback Fantasy，” *Foreign Affairs 78*， no.1（January/February 1999）.

[117] Kenneth M.Pollack， *The Threatening Storm*： *The Case for Invading Iraq*（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Kenneth M.Pollack，“Why Iraq Can't Be Deterre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2002； Kenneth M.Pollack，“A Last Chance to Stop Iraq，”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2003； Martin S.Indyk and Kenneth M.Pollack，“How Bush Can Avoid the Inspections Trap，”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03，以及Martin S.Indyk and Kenneth M.Pollack，“Lock and Load，”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19， 2002。

[118] William Kristol，“The Axis of Appeasement，” *Weekly Standard*， August 26/September 2， 2002； Robert Bartley，“Thinking Things Over： What We Learned，”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9， 2002； Michael Ledeen，“Scowcroft Strikes Out，” *National Review Online*， August 6， 2002； George Melloan，“Who Really Doubts That Saddam's Got to Go，”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0， 2002； John O'Sullivan，“Chamberlain Deserves an Apology： Scowcroft， Hagel， and Raines Are No Chamberlains，” *National Review Online*， September 3， 2002；“This Is Opposition？ There Is No Revolt in the GOP Against Bush's Iraq Policy，” *Wall Street Journal*editorial， August 19， 2002，以及“Who Is Brent Scowcroft？” *New York Sun*editorial， August 19， 2002。新保守派表示愤怒的那些目标中，没有一个人主张对伊拉克进行绥靖，而是支持对战争进行控制。

[119] William Safire，“Our ‘Relentless’ Liberatio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2001.也可参见 William Safire，“Saddam and Terror，”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2002，以及William Safire，“Big Mo，”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2001。

[120] Robert Kagan，“On to Phase II，”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7， 2001；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What to Do About Iraq，” *Weekly Standard*， January 21， 2002，以及 Safire，“Saddam and Terror”。

[121]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The U.N.Trap？” *Weekly Standard*， November 18， 2002；Charles Krauthammer，“A Costly Charade at the U.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8， 2003； George F.Will，“Stuck to the U.N.Tar Baby，”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9， 2002，以及 William Safire，“The French Connection，”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2003。

[122] Krauthammer，“Our First Move.” 也可参见Reuel Marc Gerecht，“A Necessary War，” *Weekly Standard*， October 21， 2002，以及Charles Krauthammer，“Where Power Talk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4， 2002。

[123] 对政府兜售战争行动的精彩描述参见Frank Rich，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 from 9/11 to Katr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124] James Bamford， *A Pretext for War*： *9/11*， *Iraq*， *and the Abuse of America's Intelligence Agencies* （New York： Doubleday， 2004）， chaps.13—14； Karen DeYoung， *Soldier*： *The Life of Colin Powell* （New York： Knopf， 2006）， pp.440—446； 以及 Woodward， Plan of Attack， pp.288—292， 297—301。也可参见Ibid.， pp.72， 163。

[125] Woodward， *Plan of Attack*， p.290.

[126] “Powell Regrets UN Speech on Iraq WMDs，” *ABC News Online*， September 9， 2005.

[127] Bamford， *Pretext for War*， pp.287—291， 307—331； Julian Borger，“The Spies Who Pushed for War，” *Guardian*， July 17， 2003； David S.Cloud，“Prewar Intelligence Inquiry Zeroes in on Pentagon Offic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1， 2004； Seymour M.Hersh，“Selective Intelligence，” *New Yorker*， May 12， 2003； Kwiatkowski，“New Pentagon Papers”； W.Patrick Lang，“Drinking the Kool-Aid，” *Middle East Policy 11*， no.2（Summer 2004）； Jim Lobe，“Pentagon Office Home to Neo-Con Network，” Inter Press Service， August 7， 2003； Greg Miller，“Spy Unit Skirted CIA on Iraq，”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0， 2004； Paul R.Pillar，“Intelligence， Policy， and the War in Iraq，” *Foreign Affairs 85*， no.2（March-April 2006）； James Risen，“How Pair's Finding on Terror Led to Clash on Shaping Intelligence，”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2004，以及Eric Schmitt and Thom Shanker，“Threats and Responses： A C.I.A.Rival；Pentagon Sets Up Intelligence Uni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2002。

[128] Risen， *State of War* ， pp.72—73.

[129] Lobe，“Pentagon Office.” 关于马科夫斯基，参见Jack Herman，“A Whole New Ballgame Overseas，” *St.Louis Post-Dispatch*， February 20， 1989。这篇文章写在马科夫斯基正要离开美国移居以色列的时候。他告诉赫尔曼（Herman）说：“我对帮助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怀有强烈的感情。”他然后补充说：“这就像落叶归根一样。”

[130] Borger，“The Spies.”

[131] Inspector General， Department of Defense，“Review of the Pre-Iraqi War Activities of the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Report no.07-INTEL-04， February 9， 2007.

[132] Franklin Foer，“Founding Fakers，” *New Republic*， August 18， 2003.

[133] Robert Dreyfuss，“Tinker， Banker， NeoCon， Spy，” *American Prospect* ， November 18， 2002.也可参见 “Who Will Lead a Free Iraq？” *jinsa.org*， May 9， 2003，以及 “Creating a Post-Saddam Iraq，” *jinsa.org*， Report no.481， April 6， 2005。

[134] 引自Dreyfuss，“Tinker， Banker”。也可参见Matthew E.Berger，“Iraqi Exiles and Jews Form Unlikely Alliance，” *Jewish News Weekly* （online）， October 18， 2002； Juan Cole，“All the Vice-President's Men，” *Salon.com* ， October 28， 2005，以及 Michelle Goldberg，“The War over the Peace，” *Salon.com* ， April 14， 2003。

[135] 引自Robert Dreyfuss，“Chalabi and AEI： The Sequel，” *TomPaine.com*， November 10， 2005。也可参见Laurie Mylroie，“Unusually Effective，” *New York Sun*， November 8， 2005，以及Michael Rubin，“Iraq's Comeback Kid，” *National Review Online*， December 5， 2005。

[136] Bernard Lewis，“Put the Iraqis in Charg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9， 2003.也可参见 Ian Buruma，“Lost in Translation，” *New Yorker*， June 14， 2004，以及 Michael Hirsh，“Bernard Lewis Revisited，” *Washington Monthly*， November 2004。

[137] Dizard，“How Ahmed Chalabi Conned the Neocons.” 2003年6月中旬，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宣布说：“不久你将见到伊拉克的石油流向海法。” Reuters，“Netanyahu Says Iraq-Israel Oil Line Not Pipe-Dream，” *Ha'aretz*，June 20，2003.当然，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发生。也可参见Douglas Davis，“Peace with Israel Said to Top New Iraq's Agenda，” *Jerusalem Post*，April 21，2003。

[138] Matthew E.Berger，“New Chance to Build Israel-Iraq Ties，” *Jewish Journal*（online），April 28，2003.也可参见 Bamford，Pretext to War，p.293，以及 Ed Blanche，“Securing Iraqi Oil for Israel：The Plot Thickens，” *Lebanonwire.com*，April 25，2003。

[139] Nathan Guttman，“Mutual Wariness：AIPAC and the Iraqi Opposition，” *Ha'aretz*，April 27，2003.

[140] 引自Packer，*Assassins' Gate*，p.41。

[141] 弗里德曼通过加入这样的话而修正了这一评论：“在最后的分析中，煽动战争的是美国对9·11事件的过度反应。”我们同意这种修正；导致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潭的，乃是以下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保守派对战争的积极推动、以色列游说集团中主要团体的支持，以及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参见Shavit，“White Man's Burden”。

[142] Noam Chomsky，“The Israel Lobby？” *Znet*（online），March 28，2006.也可参见 Stephen Zunes，“The Israel Lobby：How Powerful Is It Really？” *Znet*（online），May 25，2006。

[143] 有位学者指出，即将来临的伊拉克战争的反战力量“喜欢的口号”，是“不要为了石油而流血”。John B.Judis，“Over a Barrel，” *New Republic*，January 20，2003，20.也可参见William R.Clark，*Petrodollar Warfare*：*Oil*，*Iraq and the Future of the Dollar*（Gabriola Island，Canada：New Society Publishers，2005）；Michael Elliott，“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s War：Bush Should Take Israel and Oil Out of the Iraq Equation，” *Time*，November 18，2002；Michael Meacher，“This War on Terrorism Is Bogus，” *Guardian*，September 6，2003；Kevin Phillips，“American Petrocracy，” *American Conservative*，July 17，2006，以及 Sandy Tolan，“Beyond Regime Change，” *Los Angeles Times*，December 1，2002。

[144] Judis，“Jews and the Gulf，” pp.16—17.

[145] Stephen J.Hedges，“Allies Not Swayed on Iraq Strike，” *Chicago Tribune*，August 28，2002；“Saudi Arabia Says It Won't Join a War，” *New York Times*，March 19，2003；“Saudis Warn US over Iraq War，” *BBC News*（online），February 17，2003；Jon Sawyer，“Saudi Arabia Won't Back War on Iraq without U.N.Authority，Prince Warns，” *St.Louis Post-Dispatch*（online），January 23，2003；“Scorecard：For or Against Military Action，” *New York Times*，August 27，2002，以及 Brian Whitaker and John Hooper，“Saudis Will Not Aid US War Effort，” *Guardian*，August 8，2002。

[146] Peter Beinart，“Crude，” *New Republic*，October 7，2002；Michael Moran and Alex Johnson，“The Rush for Iraq's Oil，” *MSNBC.com*，November 7，2002；Anthony Sampson，“Oilmen Don't Want Another Suez，” *Observer*，December 22，2002；John W.Schoen，“Iraqi Oil，American Bonanza？” *MSNBC.com*，November 11，2002，以及Daniel Yergin，“A Crude View of the Crisis in Iraq，”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8，2002。

[147]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2年8月26日）副总统向海外退伍军人协会 第103届全国大会发表的讲话，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也可参见（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2年8月29日）副总统向朝鲜战争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 of the Korean War）发表的讲话，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

[148] 关于演说的副本，参见“In the President's Words：‘Free People Will Keep the Peace of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7，2003。也可参见（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2年9月12日）总统向联合国大会发表的讲话，纽约；（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2年6月1日）总统向毕业班发表的讲话，西点军校；（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5年1月20日）总统的就职演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02）[*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2002）]。

[149] Robert S.Greenberger and Karby Leggett，“President's Dream：Changing Not Just Regime but a Region：A Pro-U.S.，Democratic Area Is a Goal That Has Israeli and Neoconservative Roots，”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1，2003.也可参见 George Packer，“Dreaming of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rch 2，2003；Paul Sperry，“Bush the Nation-Builder：So Much for Campaign Promises，” *Antiwar.com*，October 6，2006，以及Wayne Washington，“Once Against Nation-Building，Bush Now Involved，” *Boston Globe*，March 2，2004。

[150] Charles Krauthammer，“Peace Through Democracy，” *Washington Post*，June 28，2002.

[151] Barak，“Taking Apart.”

[152] 引自Lynfield，“Israel Sees Opportunity in Possible U.S.Strike on Iraq”。

[153] Benn，“Background.”

[154] Bennet，“Israel Says.”

[155] Shalev，“Jerusalem Frets.”

[156] 例如，可参见*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Strategy*，*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Report of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Washington，DC，September 2000），pp.14，17—18。

[157] Martin Indyk，“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Middle East，”向索里夫研讨会（Soref Symposium）发表的演讲，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1993年5月18日。也可参见 Anthony Lake，“Confronting Backlash States，” *Foreign Affairs 73*，no.2（March/April 1994）。

[158] Kenneth M.Pollack，*The Persian Puzzle*：*The Conflict Between Iran and America*（New York：Random House，2004），pp.261—265.

[159]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eds.，*Present Dangers*：*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San Francisco：Encounter Books，2000）；Charles Kraut-hammer，“Universal Dominion：Toward a Unipolar World，” *National Interest 18*（Winter 1989/90）；Michael A.Ledeen，*Freedom Betrayed*：*How America Led a Global Democratic Revolution*，*Won the Cold War*，*and Walked Away*（Washington，DC：AEI Press，1996）；Joshua Muravchik，*Exporting Democracy*：*Fulfilling America's Destiny*（Washington，DC：AEI Press，1991）；Marina Ottaway et al.，“Democratic Mirage in the Middle East，” *Policy Brief20*（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October 2002）；Norman Podhoretz，“Strange Bedfellows：A Guide to the New Foreign-Policy Debates，” *Commentary*，December 1999；“Statement of Principles，”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June 3，1997，以及 Albert Wohlstetter，“A Vote in Cuba？Why Not in Iraq？” *Wall Street Journal*，May 24，1991。

[160] 关于新保守派进行中东地区改造的思想，参见Robert Blecher，“Free People Will Set the Course of History，”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March 2003；Jack Donnelly and Anthony Shadid，“Iraq War Hawks Have Plans to Reshape Entire Mideast，” *Boston Globe*，September 10，2002；Halper and Clarke，*America Alone*，pp.76—90；Nicholas Lemann，“After Iraq：The Plan to Remake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er*，February 17，2003，以及 Klein，“How Israel”。

[161] 引自Roula Khalaf，“Rice ‘New Middle East’ Comments Fuel Arab Fury over US Policy，” *Financial Times*，July 31，2006。

[162] Orly Halpern，“Israeli Experts Say Middle East Was Safer with Saddam in Iraq，” *Forward*，January 5，2007.也可参见 Leslie Susser，“Iraq War：Good or Bad for Israel？Saddam's Execution Revives Debate，” *JTA.org*，January 2，2007。

[163] 引自Chris McGreal，“Israelis May Regret Saddam Ousting，Says Security Chief，” *Guardian*，February 9，2006。

[164] James A.Baker III and Lee H.Hamilton，co-chairs，*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New York：Random House，2006），xv，pp.28—29，43—45，50—58.一再呼吁解决以巴冲突，并主张同伊朗和叙利亚进行谈判的托尼·布莱尔说，伊拉克研究小组“提供了一条坚定的前进道路”。引自Sheryl Gay Stolberg and Kate Zernike，“Bush Expresses Caution on Key Points in Iraq Panel's Report，” *New York Times*，December 7，2006。也可参见 Kirk Semple，“Syrian Official，in Iraq，Offers Assistanc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9，2006。

[165] Akiva Eldar，“The Gewalt Agenda，” *Ha'aretz*，November 20，2006.

[166] Michael Abramowitz and Glenn Kessler，“Hawks Bolster Skeptical President，”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10，2006；Associated Press，“Israel Experts Doubt Focusing on Israel-Arab Conflict Will Help in Iraq，”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ember 6，2006；“Gates's Shocking Thinking on Iran，” *Jerusalem Post editorial*，December 6，2006；Nathan Guttman，“Baker Group Advisers ‘Surprised，’ ‘Upset’ at Report's Israel-Iraq Link，” *Forward*，January 30，2007；Jeff Jacoby，“Fighting to Win in Iraq，” *Boston Globe*，December 3，2006；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A Perfect Failure，” *Weekly Standard*，December 11，2006；Ron Kampeas，“ISG Fallout Continues with Query：Is Israeli-Arab Peace the Linchpin？” *JTA.org*，December 10，2006；Jim Lobe，“Neocons Move to Preempt Baker Report，” *Antiwar.com*，December 6，2006；Marc Perelman，“As Washington Studies Iraq Report，Jerusalem Frets over Tehran Talk，” *Forward*，December 15，2006；Shmuel Rosner，“Baker's Brew，” *Ha'aretz*，December 8，2006，以及“The Iraq Muddle Group，” *Wall Street Journal*editorial，December 7，2006。

[167] 引自Shmuel Rosner，“FM Livni：U.S.Must Stand Firm on Iraq，” *Ha'aretz*，March 13，2007。也可参见Shmuel Rosner，“Livni to AIPAC：U.S.Can't Show Weakness on Iraq，Iran，” *Ha'aretz*，March 12，2007。

[168] 所引用的奥尔默特的话来自Bradley Burston，“Israel Must Stay the Hell Out of U.S.Debate on Iraq，” *Ha'aretz*，March 13，2007，以及Hilary L.Krieger，“PM's AIPAC Talk Surprises Delegates，” *Jerusalem Post*，March 13，2007。

[169] Burston，“Israel Must Stay.”也可参见 Krieger，“PM's AIPAC Talk”，以及Shmuel Rosner，“No Easy Answers on Israel and the Iraq Debate，” *Ha'aretz*，March 13，2007。

[170] “President Bush Welcomes Prime Minister Olmert of Israel to the White House，”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6年11月13日。

[171] 引自James D.Besser，“Olmert Support for Iraq War Stirs Anger，” *Jewish Week*，November 17，2006。

[172] David Horovitz，“Editor's Notes：Wading into the Great Debate，” *Jerusalem Post*，March 15，2007.

[173] 引自Glenn Frankel，“A Beautiful Friendship？” *Washington Post Sunday Magazine*，July 16，2006。

[174] Martin Kramer，“The American Interest，” *Azure 5767*，no.26（Fall 2006）：29.克雷默还声称说：“代表以色列而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论断是纯粹编造的故事，”这一评论与奥尔默特总理2007年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政策会议发表的声明相左，因为他明确把以色列的安全与在伊拉克的胜利挂钩。参见前面的第167条注释。也可参见Yossi Alpher，“Sharon Warned Bush，” *Forward*，January 12，2007。

[175] Alpher，“Sharon Warned Bush.” 也可参见Herb Keinon，“Sharon Warned Bush of Saddam Threat，” *Jerusalem Post*，January 11，2007。

[176] 参见前面的注释21和注释25。

第九章 目标对准叙利亚

美国同叙利亚之间充满问题的关系几乎长达50年之久了。冷战期间，这个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是苏联的主要随从国，其独裁政府在过去犯下了严重的人权虐待罪，至今依然不给予其人民基本的自由。虽然布什总统没有将叙利亚包括在他那声名狼藉的“邪恶轴心”之中，但是它却经常被描述为一个威胁美国重要利益的“流氓国家”。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变得更加充满敌意，而2003年4月巴格达的陷落，也为美国将攻击大马士革的这一推测添加了助力。虽然此刻伊拉克局势的恶化结束了此类谈论，但是同大马士革的关系却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冲突依然是今天的议事日程。

然而，人们如果以一种更加超然的眼光来看待叙利亚的话就会发现，为什么就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言，同那个阿拉伯国家之间严格敌对的关系却并不明显。虽然华盛顿与大马士革之间从来没有特别地友好过，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为了双方的利益而合作过；而且叙利亚中等程度的军事实力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并不构成威胁。考虑到目前的情势，在中东和其他地方那些同样令人厌恶的独裁政权享有美国的庇护时，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叙利亚应该被考虑当作理想的政权更迭样板。

事实上，布什政府对叙利亚的不断敌意在战略上是不明智的。具体而言，它伤害了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妨碍了美国反对核扩散的努力，使稳定伊拉克的工作更加困难，而且使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因此，在美国最近有很多声音呼吁布什政府改弦更张，寻求与大马士革的暂时妥协（modus vivendi）就并不令人吃惊。例如，伊拉克研究小组在2006年12月就要求布什政府以“无前提条件的外交对话”方式同叙利亚进行“积极的接触”[1]。在同一个月里，4名美国参议员访问大马士革，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艾尔-阿萨德进行会谈；而在2007年4月，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则率领一个由6名众议员——他们当中包括确信无疑地亲以色列的汤姆·兰托斯和亨利·沃克斯曼——组成的两党代表团，到叙利亚同阿萨德谈论推进和平进程的事宜。[2]

在推动布什政府追求越来越具对抗性的叙利亚政策中，尽管有些勉强，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却起到了中心的作用。以色列游说集团曾卖力地使美国孤立大马士革并对它施压，即便在这样做的时候危害到有价值的合作形式。如果不存在这种压力，华盛顿同叙利亚的关系将会明显不同，而且可能会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虽然在以色

列游说集团不那么具有影响力的情况下，美国和叙利亚也几乎成不了盟友，但是美叙之间一种实用而使双方受益关系的可能性却会大得多。

叙利亚的威胁

叙利亚对美国或以色列都不是严重的军事威胁。它的国防预算不足以色列的1/5，而且其陆军和空军都能力有限，因此如果出现严重的战斗时，以色列国防军将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其打败。[3]在1982年叙利亚入侵黎巴嫩期间，以色列国防军打败叙利亚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而且在那场战争发生的时候，叙利亚还从其苏联庇护者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帮助。然而，自苏联解体以来，大马士革已经得靠自己了；而以色列则每年继续得到美国的重要援助。以叙之间的战争将是完全不匹配的，这就是为什么叙利亚领导人竭力避免激怒以色列的原因所在。

在一场击败叙利亚人的战争中，美国军队遇到的麻烦将更加少。叙利亚军队比伊朗或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要弱小得多，而且自从以色列在1982年对其实施严惩以来，它还没有与像样的敌人交过手。与今天的伊朗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不同，叙利亚缺乏成为地区霸主的人口规模和财富。虽然它有能力使美国和以色列的日子更难过，但是却缺乏严重威胁这两个国家中任何一国所需的资金。

进而言之，叙利亚并没有核武器计划，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它随时会立即追求这样的一个计划。它确实拥有化学武器，那是在1973年第一次从埃及获得的；而且它可能还有一个生物武器的计划。[4]它也拥有一份很大的弹道导弹存货清单，并因此有能力将化学武器发射到以色列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虽然它无力这样针对美国。但是以色列从来就不很担心这一威胁，因为它拥有自己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而且相对于叙利亚能够对以色列造成的损害，以色列能够对叙利亚造成的损害要大得多。换言之，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具有有效的阻吓力。[5]

虽然叙利亚制造麻烦的能力基本上依靠的是它对许多恐怖组织的支持，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但是也包括对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这两个组织的支持。事实上，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米沙尔（Khaled Meshal）就生活在大马士革。虽然所有这些组织都威胁到以色列，但与基地组织不同，它们没有一个——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直接威胁到美国。就像希伯来大学的叙利亚专家摩西·梅佐所指出的那样：“虽然人人都知道，叙利亚并非圣人，但是黎巴嫩基本上是以色列的一个威胁。”[6]进而言之，叙利亚和基地组织相互之间是死

敌，主要是因为本·拉登是一个逊尼派和伊斯兰激进分子，而阿萨德则是一个世俗国家的什叶派领导人。事实上，据信基地组织同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该组织是一个同世俗的阿拉伯复兴党政府战斗了20多年的伊斯兰恐怖团体——有联系。[7]考虑到华盛顿与大马士革有基地组织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在“9·11”事件之后，叙利亚即开始向布什政府提供有关本·拉登组织的重要情报就几乎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了。与有关全球反恐战的言词相反，认为叙利亚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这是一个同时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全球恐怖主义团体和国家所构成的网络——的观点将是错误的。相反，叙利亚所支持的是那些议程主要集中在以色列身上的一组特定恐怖组织。

有人可能认为，叙利亚是美国的一个严重威胁，因为它支持伊拉克的叛乱。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马士革正在向伊拉克的叛乱分子提供支持，这肯定是布什政府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主要指责的是伊朗而非叙利亚的原因。实际情形可能是叙利亚对某些战斗人员和武器穿过其边界流入伊拉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但是自“9·11”事件以来，华盛顿所追求的是对抗性的大马士革政策，这使得叙利亚人具有强烈的动机使得美军在伊拉克忙乎个不停。然而，最终叙利亚并非美国在伊拉克的麻烦根源；而且如果布什总统和他的助理人员不对阿萨德政权进行威胁，大马士革将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来削弱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底线是对美国来说叙利亚不构成严重的危险，而它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来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行挑衅。

事实上，在过去不久的时间里，大马士革同华盛顿在许多点上关系相当地好。在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叙利亚同美国并肩战斗，而且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有着充满热忱的——如果说是谨慎的——关系，当时美国正试图作为中间人来安排大马士革同耶路撒冷之间的一项和平协定。[8]克林顿总统甚至在1994年10月访问大马士革，同哈菲茨·阿尔-阿萨德总统会见，这是在20年中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叙利亚。克林顿后来评论道：“我到那里去，因为我相信我们需要给会谈增添新的活力，而且我离开那里的时候相信，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活力。”[9]后来在2002年秋，当叙利亚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时候，它对联合国1441号决议（UN Resolution 1441）投了赞成票，该决议要求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回到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而尽管布什政府在2005年迫使叙利亚离开黎巴嫩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多年来美国都依靠叙利亚来终止黎巴嫩内战（1976—1989年），并保持该国的和平。[10]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当然不想成为美国的敌人。前布什政府官员弗林特·莱弗里特是西方最重要的叙利亚专家之一，他指出：“巴沙尔反

复声明他有兴趣看到同美国的关系得到改善。这种兴趣完全同他的父亲哈菲茨的剧本相符，而且符合对叙利亚战略需要的任何现实主义的评估。”莱弗里特也相信，得到改善的（美叙）关系“对他的（阿萨德的）长远国内改革的雄心方面是至关重要的”[11]。西摩·赫什于2003年在阿萨德的大马士革办公室拜访了他，他发现阿萨德渴望谈论，因为“他需要改变自己的形象，他需要改变自己国家的形象”[12]。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叙利亚也一直试图同以色列谈判一项和平协议。虽然他们在2000年初接近达成一项协定，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却在最后时刻退却了。自从那时以来，叙利亚人进行了无数的努力以重启谈判，并试图消弭他们的分歧。但是巴拉克的继任者——阿里埃勒·沙龙和埃胡德·奥尔默特——却拒绝了，并反之以追求对抗性的叙利亚政策。这两位领导人还推动美国将大马士革看作危险的敌人。

以色列与戈兰高地

为了抓住华盛顿、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之间所跳的复杂舞步的本质，为了抓住以色列游说集团所起作用的本质，人们首先必须明白，为什么以色列在2000年急切地几乎接近同叙利亚签署一项和平协议，但是自那以后却不愿意同阿萨德进行会谈的原因。[13]

以叙之间目前冲突的主因涉及戈兰高地。以色列在1967年的战争中从叙利亚手里夺取了那片领土，将8万叙利亚人赶出他们的家园。以色列的法律在1981年扩及戈兰高地，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实际上的兼并。[14]现在有1.8万犹太定居者生活在那里的32个定居点和一座城市里。[15]叙利亚坚定地承诺要收回这片领土，而且为了这一目标，它支持像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激进团体；叙利亚军队太弱小，威胁不了以色列，而这些团体是它向以色列施压的唯一手段。1994年，伊扎克·拉宾总理原则上同意归还叙利亚全部的戈兰高地领土，以换取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对逐渐为人所知的“拉宾定金”（Rabin deposit）的普遍理解是，它意味着以色列将撤回到1967年6月4日存在的边界处，而叙利亚则将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的所有支持。[16]

虽然拉宾一年后遭到暗杀，但是他的两位继任者——西蒙·佩雷斯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却在原则上承诺撤回到1967年6月4日的边界。然而，佩雷斯的任期太短，以至于无法达成一项协定；而内塔尼亚胡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充分地将它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虽然内塔尼亚胡的继任者埃胡德·巴拉克不承诺完全撤回到1967年的边界，但是他也愿意将几乎全部的戈兰高地归还给叙利亚。[17]

由于双方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以叙关系并不是那么糟糕。克林顿政府被深深地卷入到谈判的过程之中，并致力于作为中间人来安排达成最终的协定，其做法与吉米·卡特于1979年在戴维营推进埃以之间的协定非常相似。而这意味着叙利亚和美国在此期间关系相当良好，即便叙利亚是一个一党独裁的国家，而克林顿政府则公开承诺要“扩展民主”。实际上以色列彼时对大马士革与华盛顿之间的热忱关系表示欢迎，因为它需要美国来帮助解决同叙利亚旷日持久的争执。在克林顿总统1994年10月访问大马士革后，《纽约时报》上的一个大字标题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以色列期待克林顿之行同叙利亚人取得进展》。[18]

1999年秋，克林顿认为他最终达成了以叙之间的协定。受到巴拉克的强烈敦促，他于2000年1月初将双方召集到西弗吉尼亚州的谢泼兹敦（Shepherdstown ）。但是由于突然间意识到以色列公众舆论对将戈兰高地归还给叙利亚表现冷淡，因此巴拉克变得顽固了，并通过减缓谈判进程试图显示他是一个强硬的谈判者。谈判失败了，克林顿的主要中东谈判人员丹尼斯·罗斯后来评论道：“如果不是巴拉克打退堂鼓，2000年1月就可能达成一项协定。”[19]两个月后阿萨德与克林顿在日内瓦随后进行的会面毫无结果，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位叙利亚领导人不再信任巴拉克了。克林顿明确指责以色列而非叙利亚要对谈判失败负责。[20]

2001年2月，沙龙取代巴拉克成为以色列总理。这一发展使以叙关系变得更糟，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叙美关系。与他的四位前任不同，沙龙无意归还戈兰高地。他说：“那么我们得到什么回报呢？我再怎么想也想不出来。”[21]沙龙的继任者埃胡德·奥尔默特也清楚地表明说：“戈兰高地将永远留在我们手里。”[22]

这种坚持将那片有争议的领土留在以色列手中的做法，在以色列右翼方面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当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在2007年3月说他将乐意帮助叙利亚收回它1967年丧失的土地时，来自利库德集团的一名以色列议会成员以色列·卡茨（Yisrael Katz）回应道：“以色列决不从戈兰高地撤退；这一地区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它的安全和保护来说至关重要。”[23]进而言之，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现在显然相信，以色列必须留在戈兰高地。[24]以色列公众舆论也明显支持继续抓住那片领土不放；2006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64%接受调查的回应者反对从戈兰高地撤出，即便那样做能够导致同叙利亚的全面和平。相反，只有19%的人支持那一协定。在此前的2006年10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存在着类似的结果：70%的人反对全面撤离以换取和平，而16%的人则赞成这样做。[25]

尽管反对撤离的力量很牢固，但是为了试图同叙利亚谈判一项协定，在以色列统治圈内——尤其是军队内部——对此却相当支持。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在2004年说，没有戈兰高地，以色列也能够保卫自己，而且如果同叙利亚签署和平条约，以色列会更加安全。[26]不仅以色列将同一位长期的敌人有着正常的关系，而且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将不再从叙利亚得到支持；就黎巴嫩真主党而言，丧失叙利亚的支持将使得伊朗向它提供武器变得更加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叙利亚能够利用自己在黎巴嫩相当大的影响力，来严格管束黎巴嫩真主党。2006年黎巴嫩战争后，这种观点更加呈现出它的紧迫性，因为在战争中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能够使以色列国防军停滞不前。作为回应，许多有影响力的以色列人——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和以色列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的前首脑——创立了一个名为"同叙利亚的和平倡议论坛"组织。其目标是劝说以色列政府对叙利亚的和平提议作出回应，希望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之间达成和平协议。[27]就像奥尔默特的国防部长阿米尔·佩雷茨一样，以色列《国土报》也强烈支持同大马士革进行谈判。[28]然而，沙龙和奥尔默特都坚决拒绝了这种方法。

考虑到以色列当前的领导人物不打算把戈兰高地归还给叙利亚，他们就不会有同大马士革重开和平谈判的兴趣。[29]有什么要谈的呢？为了对自己的不妥协进行辩护，他们试图将叙利亚描绘为不能够信任、只懂得武力的"流氓国家"。并不奇怪的是，叙利亚驻华盛顿大使在2004年初说道："我们越是谈论和平，我们就越是受到攻击。"[30]根据以色列目前的领导人的观点，对抗而非合作是对付叙利亚最好的政策，而这位领导人显然有兴趣让布什政府以类似的眼光来看待叙利亚。因此，与20世纪90年代末相反——当时以色列赞成同叙利亚进行合作，自2001年以来，以色列及其许多美国的支持者竭力说服美国政府将叙利亚视为充满敌意的危险敌人。

叙利亚依然希望收回戈兰高地，反复尝试同以色列重开会谈，并沿着"拉宾定金"的线路来谈判一项和平协议。[31]但是以色列领导人甚至拒绝同叙利亚进行对话。2006年12月初在叙利亚给出一项和平建议后，老资格的记者泽厄夫·希夫在以色列《国土报》上发表自己的观察说："对叙利亚总统建议恢复会谈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以色列官员对此作出的反应……阿里埃勒·沙龙总理已经沉默了。从他那里没有听到作出回应的只言片语……在过去，我们总是期待这样的建议。"[32]

2006年12月中旬，在接受意大利报纸《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的采访时，阿萨德总统约请奥尔默特同他进行谈判："同

叙利亚会谈，就像许多以色列人所说的那样，‘即便你认为是个骗局，你也将不会失去什么。’”[33]与此同时，叙利亚外交部长告诉《华盛顿邮报》说，叙利亚将愿意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同以色列进行会谈，而这似乎是叙利亚谈判立场的重大变化。[34]奥尔默特拒绝了开始会谈的机会，并且把它归咎于布什总统；根据这位总理的说法，布什总统禁止他同叙利亚进行谈判。[35]这位总理发表的评论所暗示的——许多其他的以色列人也反复这样说，乃是如果他对布什不忠诚的话，他本将会同阿萨德进行会谈。

这种观点并不令人信服。不仅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否认华盛顿在阻止以色列同叙利亚进行会谈，而且当关乎自己至关重要的利益时，以色列也不习惯听命于美国的领导人。[36]最重要的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尔默特对同叙利亚进行有意义的和谈感兴趣。用以色列《国土报》的阿留夫·本的话来说，一位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曾告诉他："在美国还未决定它是否希望会谈的时候，决不要请求美国允许同叙利亚进行会谈。"[37]这位总理拒绝谈判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借用国防部长佩雷茨的话来说，一项协议"即带上了价格标签"，那就是放弃戈兰高地，而奥尔默特则反对作出那一让步。以色列《国土报》的吉迪恩·萨米特（Gideon Samet）写道，奥尔默特抓住了布什提供的"借口，因为它不愿意承认真正的原因：他不想从戈兰高地上走下来"[38]。

叙利亚对同以色列达成和平的兴趣和以色列不愿意抓住机会的进一步证据，在2007年1月得到了显示，当时的以色列新闻媒体报道说，为了提出一项叙利亚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之间协议的建议，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曾于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之间在欧洲秘密会晤。会晤是非官方的，不涉及双方政府的决策者。然而，这些会谈都告知了双方的政府；而且按照以色列《国土报》的说法，"欧洲协调人和叙利亚代表在讨论中同叙利亚高级官员进行了8次会晤，其中包括副总统法劳克·沙拉（Farouk Shara）、外交部长瓦利德·穆阿勒姆（Walid Muallem），以及一名'将军'级别的叙利亚情报官员"[39]。双方达成了要求以色列回到两国之间1967年6月4日边界的协定。作为回报，叙利亚将停止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甚至"使自己同伊朗拉开距离"。会谈结束时，叙利亚人建议他们应该从"学术层面"转向"官方层面"，而奥尔默特政府则对此加以拒绝。

然后在2007年4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大马士革访问了阿萨德总统，并告诉他说，此前她曾在以色列会晤过的奥尔默特"准备重开谈判以及和谈"[40]。然而，佩洛西误解了奥尔默特的立场，而以色列政府则毫不含糊地让她知道，它对与叙利亚会谈不感兴趣，因为以色

列官方声明谴责叙利亚“是邪恶轴心的一部分，是一股鼓励在整个中东地区进行恐怖活动的力量”[41]。

当然，奥尔默特在戈兰高地上的立场总是能够改变的。事实上，2007年6月初有新闻媒体报道说，他可能愿意开始同叙利亚人谈判，虽然当时的副总理西蒙·佩雷斯立即对此泼了一瓢冷水，因为佩雷斯声称叙利亚不准备进行严肃的会谈。[42]就像伊扎克·拉宾所做过的那样，某位未来的以色列领导人可能愿意为换取和平而归还这片有争议的领土，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们的观点并不是以色列将永远拒绝放弃戈兰高地，而是说以色列的大马士革政策——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基本上决定了美国的叙利亚政策，而不是与此相反。

考虑到自从阿里埃勒·沙龙于2001年2月上台以来以色列强烈反对与叙利亚进行谈判，此前一个月上台的布什政府，在同一时期竭力孤立阿萨德政府并对其施压，就几乎不会让人感到吃惊了。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分析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即叙利亚继续支持像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恐怖组织，因此它完全值得布什总统将它当作一个“流氓国家”来对待。但是记住：这些恐怖组织中没有一个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威胁，而且大马士革之所以支持它们，主要是因为它们乃是叙利亚仅有的向以色列施压归还戈兰高地的手段。以色列能够通过同意与叙利亚达成和平来结束叙利亚同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与叙利亚进行谈判的原因，即便大马士革那时候像现在一样支持激进主义。

就像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把叙利亚当作不可调和的仇敌曾发生过重要的抵制情形。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尤其提出理由说，与大马士革对抗在战略上是不明智的。然而，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则对此持相反的立场，而且他们在布什总统那一方面占得了优势。让我们更加详细地看看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叙利亚政策的演变。

“9·11”之后的耶路撒冷与大马士革

从一开始，沙龙总理和他的助手们就清楚地向布什政府表明，他们把叙利亚看作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43]然而，在2003年3月之前，他们没有推动华盛顿聚焦在叙利亚身上，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更加关注伊朗；他们正在推动伊拉克战争，不希望华盛顿因其他问题而分神。2003年4月中旬巴格达一陷落，以色列领导人就开始敦促美国集中关注大马士革，并利用它无可匹敌的权力来改变该政权的行为或该政权本身。[44]

在2003年4月15日的一次高调采访中，沙龙列出了他的要求。这位总理在《希伯来文报》上说，阿萨德“是危险的。他的判断是有害的”，并且他声称，在伊拉克战争之前，阿萨德允许萨达姆将军事设备转往叙利亚。沙龙呼吁美国向叙利亚施加“非常严厉的”压力，以迫使阿萨德停止对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的支持、促使伊朗革命卫队撤出黎巴嫩的贝卡山谷（Bekka valley ）、停止与伊朗进行合作、清除以黎边境的黎巴嫩真主党并代之以部署黎巴嫩军队，以及消除黎巴嫩真主党瞄准以色列的导弹。[45]在看到这一明显大胆的要求时，一位高层以色列外交官警告说，在有关大马士革同华盛顿之间关系的建议问题上，沙龙应该采取更为低调的姿态。[46]

但是沙龙不是唯一要求布什政府对叙利亚持强硬态度的以色列高级官员。以色列国防部长沙尔·莫法兹（Shaul Mofaz）在4月14日告诉以色列《晚报》说：“我们有一长串向叙利亚人提出要求的问题，而通过美国人来提这些问题是恰当的。”[47]具体而言，他要求叙利亚停止帮助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两个星期之后，沙龙的国家安全顾问伊弗雷姆·哈勒维来到华盛顿，鼓励美国官员采取《前沿》周报记者奥瑞·尼尔所称的针对叙利亚的“决定性行动”。除了警告叙利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外，哈勒维还反复将阿萨德描绘为“不负责任的”和“自以为是的”人。[48]在5月3日向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一个会议发表讲话的时候，他说阿萨德“容易受到坏影响”，并且警告说“不能让他玩他的老伎俩”。相反，哈勒维强调说：“除了战争之外，还能够利用许多措施来消除这位年轻、傲慢、缺乏经验的叙利亚总统的危害。”[49]

随着萨达姆的消失，以色列试图说服布什政府相信，叙利亚至少像伊拉克一样危险，甚至可能更加危险。甚至只要简单地看一下叙利亚的实力——毕竟它只是一个人口不足1 900万和国防预算只有美国1/300的国家，这种观点就是荒谬的。然而，以色列战略家约西·阿尔菲现在却从以色列的观点进行警告说：“叙利亚能够形成许多伤害，这些伤害要多过伊拉克所能够进行的。”《华盛顿邮报》在2003年4月中旬报道说，通过向美国提供有关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行动的情报报告，沙龙和莫法兹正在给针对叙利亚的行动火上浇油。[50]

在他们妖魔化叙利亚和诱使美国进一步向叙利亚施压的努力中，以色列指控大马士革庇护来自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高官，甚至更为严重的是隐藏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51]2003年8月，当一名驾驶卡车的自杀式袭击者在巴格达的联合国总部引爆炸弹的时候，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认为叙利亚提供了那辆卡车——这实际上意味着叙利亚要对此承担部分责任，从而引发了一场外交口水战。[52]前以色列

驻美国大使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以非常相同的语气告诉西摩·赫什说，他“考虑到他们的资料来源的质量，他想知道……叙利亚人是否事先已掌握了9月11日阴谋的信息——而却没有对美国发出警告”[53]。虽然几乎没有或者根本就没有证据来支持这些令人惊诧的指控，但是以色列的意愿显示出他们是多么渴望使美国卷入到同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纠纷之中。

“9·11”事件之后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大马士革

在此值得我们回顾一下早在双子塔倒塌之前，某些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有关他们对叙利亚所持的看法。在1996年由一小撮新保守派为即将就任的内塔尼亚胡总理撰写的《干净了结》研究报告中，大马士革显然是其锁定的目标。此外，丹尼尔·派普斯和为了自由的黎巴嫩美国委员会（U.S.Committee for a Free Lebanon，USCFL）前负责人齐亚德·阿布德尔诺尔（Ziad Abdelnour）在2000年5月合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要求美国利用自己的军事威胁来迫使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消除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54]为了自由的黎巴嫩美国委员会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关系密切的近亲；许多新保守派是其主要的活动分子和支持者，其中包括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道格拉斯·费思、理查德·珀尔，以及戴维·乌姆瑟尔。事实上，就像亲以色列的国会议员、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埃里奥特·恩格尔（Eliot Engel）一样，他们所有人都在2000年的报告上签了名。[55]

在克林顿当政的岁月里，像其他这样的建议一样，这一建议在华盛顿并没有获得许多吸引力，主要原因是在此时期以色列致力于同叙利亚达成和平。除了这些强硬派之外，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大多数团体，几乎没有什么动力来挑战克林顿的叙利亚政策，因为克林顿总统的做法总是反映了以色列的做法。但是当2001年沙龙上台的时候，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看法发生了急剧变化。作为对这一变化的反应，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许多团体开始为一项更加咄咄逼人的大马士革政策进行施压。

2002年春，当伊拉克正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也在推动将叙利亚放在“邪恶轴心”中的立法，而且国会议员恩格尔将《叙利亚义务法案》（Syria Accountability Act）提交到国会。[56]该法案威胁，如果叙利亚不从黎巴嫩撤离、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那么就将制裁叙利亚。[57]这份建议的法案也呼吁叙利亚和黎巴嫩采取同以色列媾和的具体步骤。这一法案得到了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许多团体——尤其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

务委员会——的支持；而且按照犹太通讯社（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JTA）的说法，是由“国会中一些以色列最好的朋友制定的”。犹太通讯社也报道说，法案在“行政当局中最热心的支持者”是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艾布拉姆斯经常与奥尔默特办公室进行接触。[58]

布什政府之所以在2002年春反对《叙利亚义务法案》，部分是因为布什政府担心该法案可能削弱为兜售伊拉克战争而进行的努力，部分是因为布什政府担心该法案可能导致大马士革停止向华盛顿提供有关基地组织的有用情报。国会同意将该项法案暂时搁置一旁，直到平定萨达姆的事情之后再说。

但是一旦巴格达在2003年4月陷落，以色列游说集团就立即重新开始了它针对叙利亚的活动。受到那时候在伊拉克看似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鼓舞，一些以色列的支持者不再对只是要叙利亚改变其行为感兴趣了。相反，他们现在要推翻这个政权本身。保罗·沃尔福威茨宣称：“必须在叙利亚进行政权更迭。”而理查德·珀尔则告诉新闻记者说：“我们可以（向中东的其他敌对政权）传递一个简短的信息，一个两个词组的信息：‘你们是下一个。’”[59]成员包括肯尼思·阿德尔曼、埃利奥特·科恩和詹姆斯·伍尔西，由珀尔所领导的具鹰派色彩的国防政策委员会，也在推动强硬的叙利亚路线。[60]

除了艾布拉姆斯、珀尔和沃尔福威茨之外，其他政府内部推动在叙利亚进行政权更迭的人，主要是助理国务卿（以及后来的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伊拉克战争爆发一个月之前，他就告诉以色列领导人说，在萨达姆倒台之后，布什总统就将立即对付叙利亚、伊朗和朝鲜。[61]朝着这一目标，据报道，博尔顿在7月中旬准备告诉国会说，叙利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已经达到了严重威胁中东地区稳定、早晚都要对付的地步。然而，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反对他的说法，并认为博尔顿正在扩大危险。结果，布什政府不允许博尔顿那时候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作证。[62]然而，博尔顿的作证并没有延迟很久。2003年9月，他出现在国会，并且将叙利亚描述为对美国中东利益的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63]

4月初，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两党研究报告，声称叙利亚“应该明白这一信息，即那些追求萨达姆式鲁莽的、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的国家，其命运将会同他一样”[64]。4月15日，以色列裔美国新闻记者约西·克莱因·哈勒维（Yossi Klein Halevi）在《洛杉矶时报》上撰写了一篇题为《接下来，轮到向叙利亚施压》的文章；而在同一天，新保守派安全政策中心主任弗兰克·加夫尼则在《华盛顿时报》上写道，布什政府应该利用“无论什么必要的手段——包括军

事手段，来影响大马士革修正其行为或在那里进行政权更迭”[65]。第二天，以色列裔美国新闻记者、前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泽夫·查夫茨在《纽约每日新闻报》（*New York Daily News*）上，撰写了一篇题为《恐怖——友好的叙利亚也需要改变》的文章。劳伦斯·卡普兰不甘落后，他在4月21日的《新共和》上撰文写道，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66]

对叙利亚的指控显然与此前对萨达姆的指控相类似。保守派评论家杰德·巴宾（Jed Babbin）在《国民评论在线》（*National Review Online*）上撰写文章时坚持认为，即便阿萨德的军队是只纸老虎，他依然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那一观点的基础是“以色列人的消息来源”，该来源告诉巴宾，“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队确信，阿萨德将进行一位谨慎的领导人不会进行的冒险”，因此，“阿萨德的不可预测性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危险”。[67]前美国驻摩洛哥大使马克·金斯伯格（Marc Ginsberg）对“叙利亚秘密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它对炮兵导弹和火箭的武器研究”发出了警告。[68]就像他们的以色列同道一样，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也认为叙利亚正在隐藏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会议员恩格尔评论道：“如果我们在伊拉克没找到的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今天最终出现在叙利亚，那将不会使我感到吃惊。”[69]

回到国会山，恩格尔于4月12日将《叙利亚义务法案》重新提交国会。[70]三天后，理查德·珀尔要求国会通过这一法案。[71]但是布什政府对这项立法依然几乎没有什么热情，并且能够再次使之停顿下来。8月中旬，恩格尔同一群政治家和犹太领导人从纽约动身到以色列，他们在阿里埃勒·沙龙耶路撒冷的办公室里同他会见了90分钟。这位以色列领导人对来访者抱怨说，美国没有向叙利亚施以足够的压力，虽然他要特别感谢恩格尔支持《叙利亚义务法案》；沙龙并且明确说，他强烈支持在国会山继续推动这项立法的努力。[72]接下来的一个月，恩格尔说由于他“受够了……行政当局的叙利亚策略”，他开始再次推动这项法案。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全力支持下，恩格尔开始在国会山拉票。[73]面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全面压力，布什再也不能够阻止国会通过这项立法了；这项反叙利亚的法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投票结果分别为398票比4票和89票比4票。布什于2003年12月12日签署这一法案，使之成为法律。[74]

布什为什么踌躇不决？

虽然国会以压倒性优势投票支持向叙利亚施压，但是布什政府对于这项政策的明智与否却存在深刻的分歧。虽然像珀尔、博尔顿和沃

尔福威茨这样的新保守派急切地要向大马士革寻衅闹事，但是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内部，对这一方法却存在着普遍的反对意见。[75]甚至连总统对直接同叙利亚发生冲突都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在犹太通讯社对他签署《叙利亚义务法案》的描述中得到了反映：“布什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里签署了这一法案，这是一个行政当局保留自己的活动而不是与公众分享自己活动的时间，而白宫关于这一话题的声明则这样说道：‘虽然我不得不签署，但是却不希望’它得到签署。”[76]即便在签署这项法律之后，布什也强调他将缓慢地执行它。[77]

布什有充分的理由踌躇不决。就像所指出的那样，自“9·11”事件以来，叙利亚政府向美国提供了有关基地组织的重要情报，它还曾警告过华盛顿有关在海湾的计划好的恐怖攻击。[78]进而言之，叙利亚让中央情报局审问员见到了被指称为一些“9·11”劫机犯招募者的穆罕默德·扎马（Mohammed Zammar）。那时候在白宫为布什效力的弗林特·莱弗里特写道，总统“在他同巴沙尔的通信中——无论是通过信函还是电话，总是承认叙利亚同美国针对基地组织而进行的合作”[79]。将目标对准阿萨德政权将威胁到这些有价值的联系，在总体上削弱国际反恐活动，特别是削弱打击基地组织的活动。总统认识到，对叙利亚推行对抗性的政策将置美国于危险之中。

布什也明白，即便将叙利亚在支持伊拉克的叛乱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考虑在内，叙利亚也不是美国的威胁。阿萨德实际上渴望同华盛顿进行合作；根据西摩·赫什的说法，阿萨德的军事情报头子告诉美国行政当局说，叙利亚甚至愿意通过背后的渠道来讨论限制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和政治活动。[80]对阿萨德表现强硬，将使美国看起来像一个狠狠打击阿拉伯国家的贪得无厌的欺凌弱小者。而将叙利亚放在美国的打击名单上，将给予大马士革强制性的理由在伊拉克制造麻烦，并使美国军队陷在那伊拉克里，这样美国就不能够打击叙利亚。即便总统要向叙利亚施压，也是在首先完成伊拉克的任务之后理由才够充分。

行政当局中的新保守派自然是反对同叙利亚进行合作。他们甚至对向华盛顿提供有关基地组织重要信息的情报渠道都感到不快。莱弗里特写道：“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副总统办公室里面的新保守派反对接受叙利亚的帮助，因为他们认为那将可能形成一种亏欠大马士革的感觉，阻止美国对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作出适当的反应。”[81]然而，布什总统对这种“适当反应”几乎没有显示出一点兴趣。事实上，他下令五角大楼不要在2003年4月中旬计划叙利亚战争，当时美国似乎刚刚在伊拉克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而且当时空气中弥漫着打击叙利亚的声音。[82]考虑到那些令人悸动的日子以来伊拉克所发生的

事情，他当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改变自己的想法。总统在实施《叙利亚义务法案》方面也行动迟缓，因为他在签署这一法案时曾经有过许诺，这使得美国那些亲以色列的强硬派非常烦恼焦躁。到2004年春的时候，国会议员恩格尔和他的一些同事对布什拖他们的后腿感到如此沮丧，以至于他们威胁说要提出一个更强硬的、新的立法版本。[83]

与奥尔默特的观点相反，过去数年中媒体上甚至有散见的报道说，如果以色列接受阿萨德重开和谈的提议，布什政府可能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例如，泽厄夫·希夫就在2003年12月写道："按照熟悉行政当局想法的美国消息来源的观点，如果以色列接受阿萨德的建议，美国行政当局将会有正面的回应。原则上美国不寻求同大马士革的军事冲突，准备让阿萨德走上正轨。"[84]一个月之后，阿留夫·本在以色列《国土报》上写道，"美国高级官员"已经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以色列接受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重新进行谈判的提议"，美国"将不反对"。然而，阿留夫·本指出道："以色列已经从较低层级的美国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了矛盾性的建议。"[85]也有其他的报道说，华盛顿反对以色列同叙利亚进行会谈。[86]由于政策制定者之间就如何最好地对付叙利亚和认清相互竞争的利益存在不断的激烈竞争，因此布什政府的底线难以清晰地看出来。

虽然布什没有采取严肃的措施来推翻阿萨德，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已经推动他采取比自己可能采取的叙利亚路线更具对抗性的政策。[87]当谈到大马士革的时候，总统及其顾问们不断使用严厉的言词，或者进行含蓄的威胁；他们反复指控叙利亚支持伊拉克的叛乱分子。无论什么时候在黎巴嫩出现麻烦，他们也急不可待地对叙利亚进行指责；而布什并没有尝试同叙利亚构筑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或者修补同叙利亚的关系。行政当局里里外外的新保守派继续要求对阿萨德政权使用军事力量。在2006年夏季的黎巴嫩战争期间，这样的要求尤其明显。[88]在赫德森研究所负责中东政策研究中心的梅拉夫·乌姆瑟尔在伊拉克战争之后评论道，以色列的新保守派同事"由于这一事实"而对以色列感到颇为愤怒，即"以色列没有打击叙利亚人。相反，以色列却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美国行政当局的许多部门都相信，以色列应该打击真正的敌人是叙利亚而非黎巴嫩真主党"[89]。

结论

不幸的是，华盛顿的大马士革对抗方法除了带给美国负面后果，削弱以色列的长远利益之外，别无其他东西。一开始，叙利亚停止了向华盛顿提供有关基地组织的情报。[90]阿萨德几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来帮助美国平定伊拉克的叛乱，而且通过帮助维持伊拉克的叛乱而

可能试图保护自己的地位。[91]毕竟，让美国陷在巴格达，使得美国较少有可能腾出手来对付叙利亚。大马士革也继续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同伊朗结成了心照不宣的同盟，这使得在黎巴嫩维持和平变得更加困难，也让伊朗丧失了寻求核武器的信心。虽然这些发展并不利于美国，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强硬分子却依然致力于对抗性的政策，急不可待地批评任何建议采取不同路线的人。

然而，紧接着去年夏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崩溃，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在伊拉克所面临的灾难性局面，布什总统在向叙利亚伸出橄榄枝方面压力很大。[92]他希望叙利亚可以帮助稳定伊拉克的局势，让美国军队撤走，并在伊拉克建立表面上的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也可能使叙利亚脱离同伊朗的联盟关系，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力量。就像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包括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已不顾布什政府而去大马士革同阿萨德总统进行会晤。他们的目的是改善叙美之间的关系，就像两党组成的伊拉克研究小组所建议的那样，那将使得应对许多地区安全问题变得更加容易。

但是以色列领导人对美国同叙利亚建立合作关系不感兴趣，他们似乎决心抓住戈兰高地不放。[93]以色列游说集团中最强大的那些团体同样持这样的观点，而且他们曾竭力阻止布什政府追求一种与阿萨德政权更具合作性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结果是美国继续在战略上追求愚蠢的叙利亚政策，而且完全有可能继续这样做，直到以色列有一位像伊扎克·拉宾这样的总理出现，因为拉宾明白，以戈兰高地换取同叙利亚的和平，将使得以色列处于实质上有利得多的战略地位。

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只有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就不会有《叙利亚义务法案》，美国的大马士革政策就会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人们可能还会说，不同的美国政策现在可能已经催生了一项叙以和平条约；这项条约将进一步铭记以色列的合法性以及它的区域优势，减少它那些最坚定、最顽强、最暴力的敌人——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斯兰杰哈德——所得到的国际支持。

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歧途，不只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坚持那些达不到预期目标的对抗性政策，有损美国和以色列利益政策的唯一例子。在美国最近的伊朗政策中，人们看到了许多的相同之处，而这正是下一章的话题。

---

[1] James A.Baker III and Lee H.Hamilton， co-chairs， *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p.50.

[2] Ferry Biedermann and Roula Khalaf，“Western Politicians Take the Road to Damascus，” *Financial Times*，December 22，2006；Nathan Guttman，“Senators Visit Damascus，Push for Syrian Talks，” *Forward*，December 29，2006；Hassan M.Fattah and Graham Bowley，“Pelosi Meets with Syrian Leader，” *New York Times*，April 4，2007，以及Anthony Shadid，“Pelosi Meets Syrian President，” *Washington Post*，April 4，2007。另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达雷尔·伊萨（Darrell Issa），在佩洛西访问之后的第二天访问了阿萨德。Yoav Stern，Amiram Barkat，and Barak Ravid，“U.S.Republican Meets Assad Day after Contentious Pelosi Visit，” *Ha'aretz*，April 5，2007.

[3] 备受尊重的军事分析人员理查德·M.贝内特（Richard M.Bennett），将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威胁简明地作了这样的描述："虽然叙利亚军队依然是阿拉伯世界中规模最大和训练最有素的部队之一，这种情况基本上还是真实的，但是自1948年以来它在与以色列的主要冲突中都失败了。由于设备越来越荒废、维修不善，以及零配件短缺等原因，过去15年中它的战斗力已急剧恶化。""Syria's Military Flatters to Deceive，" *Asia Times Online*，July 28，2006.类似地，阿里赫·奥沙利文（Arieh O'Sullivan）也写道："叙利亚军队对以色列并不构成重大的战术威胁，而且它没有任何可行的战术性战争选择……坦率地说，叙利亚军队过去20年来非但停滞不前，而且还倒退了。" "How Big a Threat？" *Jerusalem Post*，October 10，2003.也可参见Arieh O'Sullivan，"Jaffee Center：Syrian Military Weakening，" *Jerusalem Post*，November 23，2005；Susan Taylor Martin，"Experts Disagree on Dangers of Syria，" *St.Petersburg Times*（online），November 3，2002；Martin Sieff，"Eye on Iraq：Enter the Saudis，"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November 27，2006，以及Stephen Zunes，"Bush Has Clear Run at Syria，" *Asia Times Online*，March 2，2005。关于叙利亚军事能力的描述，以及国防预算的比较数字，参见*The Military Balance*，*2007*（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January 2007），pp.243—245。

[4] Karen DeYoung，"U.S.Toughens Warnings to Syria on Iraq，Other Issues，" *Washington Post*，April 15，2003；Flynt Leverett，*Inheriting Syria*：*Bashar's Trial by Fire*（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5），pp.13—14，以及 Alfred B.Prados，"Syria：U.S.Relations and Bilateral Issues，" *Report for Congres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une 22，2006，pp.11—12。关于叙利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详情，登录www.nti.org/e_research/profiles/Syria/index.html，核威胁倡议组织（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的"叙利亚档案"（Syria Profile）。

[5] 以色列关于叙利亚化学武器的主流思想是由娄文·珀达特祖尔（Reuven Pedatzur）进行归纳总结的："以色列国防军估计，叙利亚人不敢向以色列发射装有化学弹头的弹道导弹，因为他们清楚，由于以色列国防军对叙利亚后方的可怕攻击而将要使之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以至于叙利亚不会有对以色列发动首次打击的理由。""Update the Gas Masks，There's a Syrian Threat，" *Ha'aretz*，August 5，2003.

[6] 引自Martin，"Experts Disagree"。

[7] Seymour M.Hersh，"The Syrian Bet，" *New Yorker*，July 28，2003.也可参见Richard Spring，"This Is Not Another Iran，" *Guardian*，October 27，2006。

[8] 20世纪90年代，叙利亚和美国之间存在的总体良好关系，反映在克林顿政府中以下主要人物的回忆录之中：Madeleine Albright with Bill Woodward，*Madame Secretary*：*A Memoir*（New York：Miramax Books，2003）；Bill Clinton，*My Life*（New York：Vintage Books，2004）；Warren Christopher，*Chances of a Lifetime*：*A Memoir*（New York：Scribner，2001），以及 Dennis Ross，*The Missing Peace*：*The Inside Story of the Fight for Middle East Peac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4）。也可参见Helena Cobban，*The Israeli-Syrian Peace Talks*：*1991—1996 and Beyond*（Washington，DC：U.S.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9），这本书对拉宾和佩雷斯担任总理期间以色列、叙利亚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以及Itamar Rabinovich，*The Brink of Peace*：*The Israeli-Syrian Negoti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9] 引自Douglas Jehl，"Clinton in the Middle East：The Overview；Clinton Reports Progress in Talks in Syrian Capital，" *New York Times*，October 28，1994。也可参见"Clinton in the Middle East；Assad and Clinton Speak：Shared Quest for Peac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8，1994。

[10] Henry 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9），chap.33；William B.Quandt，*Peace Process*：*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3），pp.250—254.

[11] Leverett，*Inheriting Syria*，134.也可参见 Jim Lobe，"The Damascus Dance，" *Antiwar.com*，October 28，2006；"Syrian Ambassador Calls for Comprehensive Peace Settl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伊迈德·穆斯塔法（Imad Moustapha）2005年6月2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中心（Burkle Center）的演讲，登录www.international.ucla.edu/bcir/article.asp？parentid＝25567，以及Volker Perthes，"The Syrian Solution，" *Foreign Affairs 85*，no.6（November/December 2006）。

[12] Hersh，"Syrian Bet."

[13] 弗林特·莱弗里特指出："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在以下两个方面之间起伏不定，即一方面努力促成以叙之间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则试图孤立大马士革、并对大马士革施压以使其为实现和平解决而改变条件和策略。"（*Inheriting Syria*，p.7）。虽然莱弗里特肯定是正确的，但是他却从未解释这种起伏不定的原因，尽管他的书提供了许多证据，表明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是那些政策变化背后的主要动力。

[14] 以色列议会于1981年12月通过了《戈兰高地法》（Golan Heights Law），并且将以色列的法律延及戈兰高地的领土。然而，该法没有“兼并”的字眼，或者将以色列的“主权”适用于戈兰高地。在以色列议会对这项立法进行辩论期间，梅纳赫姆·贝京总理对一位批评者作出回应说：“虽然你使用吞并这个字眼，但是我却不然。” Ian S.Lustick，“Has Israel Annexed East Jerusalem？” *Middle East Policy 5*，no.1（January 1997），以及 “The Golan Heights Law，”登录www.mfa.gov.il/MFA/Peace＋Process/Guide＋to＋the＋Peace＋Process/Golan＋Heights＋Law.htm。

[15] “Golan Statistics，”登录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Peace/golanstats.html；“Settlements in the Golan Heights，” Foundation for Middle East Peace，Settlement Report 17，no.1（January-February 2007），以及“Regions and Territories：The Golan Heights，” *BBC News*（online），April 26，2007。

[16] Clinton，*My Life*，pp.883—884；Cobban，*Israeli-Syrian Peace Talks*，chap.3；Leverett，*Inheriting Syria*，47，以及Ross，*Missing Peace*，p.111.“拉宾定金”有时被称之为“口袋承诺”或“拉宾口袋”。

[17] 虽然内塔尼亚胡否认他愿意回到1967年6月4日的叙以边界（“I Never Agreed to Full Golan Withdrawal，” *IsraelNationalNews.com*，June 23，2004），但是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在他担任总理时（1996—1999年），他同意这一立场。参见Akiva Eldar，“Ex-MI Chief：‘Netanyahu Was Ready to Give up All of the Golan，’” *Ha'aretz*，June 24，2004；Clinton，*My Life*，883；Ross，*Missing Peace*，pp.527—528，577，以及 Daniel Pipes，“The Road to Damascus：What Netanyahu Almost Gave Away，” *New Republic*，July 5，1999。关于巴拉克，参见Clinton，*My Life*，pp.883—888，903；Leverett，*Inheriting Syria*，pp.47—48，以及Ross，*Missing Peace*，chaps.20—22。罗斯指出：“巴拉克对与叙利亚和平问题上的立场比内塔尼亚胡更不热心。” Ibid.，p.528.

[18] Clyde Haberman，“Israelis Look to Clinton Trip for Progress with Syrians，” *New York Times*，October 25，1994.

[19] Ross，*Missing Peace*，p.589.

[20] Clinton，*My Life*，pp.883—888，903.根据奥费尔·西拉（Ofer Shelah）的说法：“大部分（以色列）高级官员都同意克林顿在他的著作《我的生活》中所提出的观点：由于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公众反对叙利亚人的领土要价，所以巴拉克临阵退缩了”。参见“The Situation：Syrian Offer of Talks Throws a Wrench into Sharon's Plans，” *Forward*，September 17，2004。也可参见Jerome Slater，“Lost Opportunities for Peace i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Israel and Syria，1948—2001，”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no.1（Summer 2002）：esp.97—100，以及 Akiva Eldar，“Between Katzrin and Nahariya，” *Ha'aretz*，July 24，2006。然而，巴拉克却否认克林顿的指责。参见Yifat Zohar，“Barak Rejects Clinton's Charges of Missed Syria Deal，” *Maariv International*（online），June 29，2004。

[21] 引自“Sharon Suggests Future Attacks on Syria，” *New York Times*，October 17，2003。也可参见Aluf Benn，“U.S.Officials Eyeing Possible Assad Successors，” *Ha'aretz*，October 3，2005；Ori Nir，“Bush Seeks to Pressure Iran，Syria on Weapons，” *Forward*，January 2，2004，以及Ofer Shelah，“Pressured，Assad Offers Charm Campaign，” *Forward*，January 9，2004。

[22] 引自Harry de Quetteville，“Syria Threat over Golan Puts Israel on War Alert，” *Daily Telegraph*（London），September 30，2006。也可参见Larry Derfner，“Why Israel Must Talk to Syria，” *Jerusalem Post*，November 9，2006；Tovah Lazaroff，“Peretz Open to Syrian Talks，” *Jerusalem Post*，September 27，2006，以及 Gideon Samet，“O.K.from a Declining America？” *Ha'aretz*，December 20，2006。

[23] 引自Amnon Meranda，“‘Israel Will Never Return Golan Heights，’” *Ynetnews.com*，March 14，2007。也可参见“EU Backs Syria's Aim to Regain Golan Heights—Solana，” *Ynetnews.com*，March 14，2007。

[24] Yoav Stern and Aluf Benn，“PM Associates：Syria Will Support Terror，Even with Golan，” *Ha'aretz*，December 17，2006.

[25] “Israeli Opinion Regarding Peace with Syria and Lebanon，”登录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Politics/golanpo.html。

[26] Shelah，“The Situation.”也可参见 Aluf Benn，“United States Leaving Syrian Track to Israel's Discretion，” *Ha'aretz*，January 9，2004；Aluf Benn and Amos Harel，“IDF Presses Sharon for Talks with Syria，” *Ha'aretz*，January 8，2004；Shlomo Brom，“Israel-Syria Negotiations：A Real Possibility？” *Strategic Assessment*（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Tel Aviv University）7，no.1（May 2004）；“Israel ‘Can Give Up Golan to Syria’，” *Straits Times*，August 14，2006；“Jerusalem's Rejectionists，” *Ha'aretz*editorial，January 9，2004；Ilan Marciano，“Foreign Ministry Official：Syria Ready to Negotiate，” *Ynetnews.com*，December 26，2006，以及 Ori Nir，“As Israel Debates Syrian Overture，Washington Presses to Stop Talks，” *Forward*，December 17，2004。

[27] Yaakov Lappin，“New Forum Pushes for Syria Talks，” *Ynetnews.com*，January 28，2007；Roi Mandel，“Former Shin Bet Chief Calls for Dialogue with Syria，” *Ynetnews.com*，January 29，2007.

[28] “Don't Turn Syria Away，” *Ha'aretz*editorial，December 18，2006；“Respond to Assad，Convince

Bush，” *Ha'aretz*editorial， December 21， 2006.关于佩雷兹，参见Gideon Alon， Aluf Benn， and Yoav Stern，“Olmert： Now Is Not Time to Start Talks with Syria， Bush Opposed，” *Ha'aretz*， December 17， 2006，以及Gideon Alon，“Olmert， Peretz Spar over Syrian Overtures，” *Ha'aretz*， December 18， 2006。

[29] 摩西·梅佐说得很好：“不论美国政府是什么立场，沙龙都不想谈判，因为他并不想放弃戈兰高地。”引自Nir，“As Israel Debates”。

[30] 引自Ori Nir，“U.S.Advice to Israelis： Don't Start Syria Talks，” *Forward*， January 23， 2004。

[31] “A Serious Proposal，” *Ha'aretz*editorial， December 30， 2003； Aluf Benn，“UN Envoy Urges Israel to Exploit Syrian Peace Moves，” *Ha'aretz*， January 9， 2004； de Quetteville，“Syria Threat”， 以及 Marc Perelman，“Syria Makes Overture over Negotiations，” *Forward*， July 11， 2003。

[32] Ze'ev Schiff，“The Peace Threat from Damascus，” *Ha'aretz*， December 8， 2003.2004年夏末，在叙利亚提出另一项和平建议之后，《前沿》周报上的一篇文章以下面的一段打趣的话开始写道：“好像他的问题还不够多，看看右翼不断增加的对他的撤离计划的反对吧！看看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重新复活吧！看看他那处于混乱之中的执政联盟吧！沙龙总理在他的北方前线现在又有麻烦了。以色列最棘手的敌人叙利亚正在要求达成和平。” Shelah，“The Situation.”

[33] 引自Stern and Benn，“PM Associates”。

[34] Ibid.；“Syria Expert： Assad's Overtures Serious，”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31， 2006.也可参见“You Can't Bring Peace to Iraq Without Working with Syria，” interview with Syria's deputy prime minister， *Spiegel Online*， February 21， 2007。

[35] Alon， Benn， and Stern，“Olmert： Now Is Not Time”； Aluf Benn，“Bush vs.Olmert，” *Ha'aretz*， February 8， 2007； Akiva Eldar，“Closed-Door Policy，” *Ha'aretz*， February 26， 2007； Akiva Eldar， Mazal Mualem， Shmuel Rosner， and Yoav Stern，“PM： Conditions Not Ripe for Talks with Syria，” *Ha'aretz*， December 8， 2006；“Israel， Syria and Bush's Veto，” *Forward*editorial， December 22， 2006； Shmuel Rosner， Akiva Eldar， and Yoav Stern，“Olmert Rejects Talks with Syria， Says Conditions Are ‘Not Ripe’，” *Ha'aretz*， December 7， 2006； Samet，“O.K.from a Declining America”，以及 Ze'ev Schiff， Amos Harel， and Yoav Stern，“U.S.Takes Harder Line on Talks Between Jerusalem， Damascus，” *Ha'aretz*， February 24， 2007。

[36] Aluf Benn，“Israel， U.S.Sources Say Views on Israel-Syria Talks Unchanged，” *Ha'aretz*， May 25， 2007； Akiva Eldar，“U.S.Ambassador： We Won't Stop Israel from Talking to Syria，” *Ha'aretz*， March 14， 2007，以及Ze'ev Schiff，“U.S.Envoy Denies Pressure on Israel Not to Engage in Talks with Syria，” *Ha'aretz*， May 23， 2007。也可参见Hilary Leila Krieger，“‘No New Overture to Syria in the Works’，” *Jerusalem Post*， March 7， 2007。

[37] Benn，“Israel， U.S.Sources Say.”

[38] 所引用的佩雷茨的话参见Alon， Benn， and Stern，“Olmert： Now Is Not Time”； Samet，“O.K.from a Declining America？”也可参见Uzi Benziman，“Help， They Want Peace，” *Ha'aretz*， January 17， 2007。

[39] Akiva Eldar，“Secret Understandings Reached Between Representatives from Israel and Syria，” *Ha'aretz*， January 16， 2007.本段落中以下所引用的两段话也来自Akiva Eldar，“Secret Understandings Reached Between Representatives from Israel and Syria，” *Ha'aretz*， January 16， 2007。也可参见Akiva Eldar，“Exclusive： Full Text of Document Drafted During Secret Talks，” *Ha'aretz*， January 16， 2007； Akiva Eldar，“Background： From Turkey， Via Europe， to Damascus，” *Ha'aretz*， January 16， 2007；“Olmert： No Government Officials Involved in Secret Syria Talks，” *Ha'aretz*， January 17， 2007，以及M.J.Rosenberg，“When Uncritical Support Leads to Disaster，” *Weekly Opinion Column*， Issue #307， Israel Policy Forum， Washington， DC， January 19， 2007。

[40] 引自Fattah and Bowley，“Pelosi Meets with Syrian Leader”。也可参见 Hassan M.Fattah，“Pelosi， Warmly Greeted in Syria， Is Criticized by White Hous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07，以及 Shadid，“Pelosi Meets Syrian President”。

[41] 引自Fattah and Bowley，“Pelosi Meets with Syrian Leader”。 也可参见 Ron Kampeas，“Rhetorical Battle over Pelosi Trip，” *JTA.org*， April 8， 2007，以及Yoav Stern and Amiram Barkat，“PMO： Pelosi Did Not Carry Any Message from Israel to Assad，” *Ha'aretz*， April 5， 2007。

[42] “Olmert to Assad： Israel Willing to Withdraw from Golan Heights，” *Ynetnews.com*， June 8， 2007； Aluf Benn and Yoav Stem，“MK Orlev： PM Willing to Sell Golan Heights in Order to Stay in Power，” *Ha'aretz*， June 8， 2007，以及 Aluf Benn and Yoav Stern，“Peres Downplays Chances of New Syria Talks， Says Damascus Not Ready，” *Ha'aretz*， June 10， 2007。据这些报道，布什曾被征询过意见，并且“说美国不会阻挡以色列”。参见“Olmert to Assad”。 也可参见Sever Plocker，“Suddenly Syria，” *Ynetnews.com*， June 10， 2007， 这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说奥尔默特所要求的会谈是“空洞的政治姿态”。

[43] 例如，可参见“Sharon Wants U.S.Action Against Syria，” *NewsMax.com*， April 16， 2001。

[44] Hersh， “Syrian Bet”； Molly Moore， “Sharon Asks U.S.to Pressure Syria on Militant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7， 2003； Ori Nir， “Jerusalem Urges Bush： Next Target Hezbollah，” *Forward*， April 11， 2003； Ori Nir， “Sharon Aide Makes the Case for U.S.Action Against Syria，” *Forward*， April 18， 2003； Marc Perelman， “Behind Warnings to Damascus： Reassessment of Younger Assad，” *Forward*， April 18， 2003，以及 Daniel Sobelman and Nathan Guttman， “PM Urges U.S.to Keep Heat on Syria， Calls Assad ‘Dangerous’，” *Ha'aretz*， April 15， 2003。

[45] 所引用的沙龙的话以及他所提的一连串要求来自Sobelman and Guttman， “PM Urges U.S.to Keep Heat on Syria”。也可参见Moore， “Sharon Asks U.S”。

[46] Herb Keinon， “Sharon Criticized for Public Statements on Syria-US Tension，” *Jerusalem Post*， April 16， 2003.

[47] 引自Nir， “Sharon Aide Makes the Case”。 也可参见DeYoung， “U.S.Toughens Warnings”，以及 Moore， “Sharon Asks U.S”。

[48] Nir， “Sharon Aide Makes the Case.” 也可参见DeYoung， “U.S.Toughens Warnings”，以及 Perelman， “Behind Warnings”。

[49] Ephraim Halevy， “The Post-Saddam Middle East： A View from Israel，” 2003年向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发表的演讲， 登录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7.php？CID＝147。

[50] Moore， “Sharon Asks U.S.” 所引用的阿尔菲的话也来自Ephraim Halevy， “The Post-Saddam Middle East： A View from Israel”。也可参见Marc Perelman， “Syria Makes Overture over Negotiations，” *Forward*， July 11， 2003。

[51] Perelman， “Behind Warnings”； Laurie Copans， “Israeli Military Boss Claims Iraq Had Chemical Weapons，”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6， 2004； Dany Shoham， “An Antithesis on the Fate of Iraq's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19*， no.1（Spring 2006）； Ira Stoll， “Saddam's WMD Moved to Syria， an Israeli Says，” *New York Sun*， December 15， 2005，以及Ira Stoll， “Iraq's WMD Secreted in Syria， Sada Says，” *New York Sun*， January 26， 2006。

[52] Michael Casey， “Israeli Ambassador Believes Truck Used in Bombing of UN Headquarters Came from Syria，”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21， 2003； “Israeli Envoy Links Syria to UN Blast， Stirs Flap，” Reuters， August 21， 2003.

[53] Hersh， “Syrian Bet.” 拉宾诺维奇也清楚地向赫什表明，“以色列敦促华盛顿不要给阿萨德开后门”。相反，以色列希望美国对叙利亚领导人表现强硬。

[54] *Ending Syria's Occupation of Lebanon*： *The U.S.Role*， *report of the Middle East Study Group*（Philadelphia： Middle East Forum， May 2000）.

[55] Jordan Green， “Neocons Dream of Lebanon，” *ZNet*（online）， July 23， 2003； David R.Sands， “Hawks Recycle Arguments for Iraq War Against Syria，” *Washington Times*， April 16， 2003，以及为了自由的黎巴嫩美国委员会网站首页，登录www.freelebanon.org。

[56] Matthew E.Berger， “AIPAC Mounts New Offensive to Display Support of Congress，” *JTA.org*， April 22， 2002.所建议立法的全称是《叙利亚义务和黎巴嫩主权恢复法》（Syria Accountability and Lebanese Sovereignty Restoration Act）。

[57] 关于这一建议的立法，参见Zvi Bar'el， “Deciphering the Syrians，” *Ha'aretz*， July 9， 2003； “The Return of the Syria Accountability Act，” *NewsMax.com*， April 19， 2003，以及Claude Salhani， “The Syria Accountability Act： Taking the Wrong Road to Damascus，” *Policy Analysis 512*（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March 18， 2004）。

[58] Ron Kampeas， “Bush， Once Reluctant on Sanctions， Prepares to Take Tough Line with Syria，” *JTA.org*， March 16， 2004.

[59] 沃尔福威茨的话引自 Nathan Guttman， “Some Senior U.S.Figures Say Syria Has Crossed the Red Line，” *Ha'aretz*， April 14， 2004； 珀尔的话引自Michael Flynn， “The War Hawks： The Right Flexes Muscle with New U.S.Agenda，” *Chicago Tribune*， April 13， 2003。关于沃尔福威茨，也可参见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pp.151—152。

[60] Perelman， “Behind Warnings.”就在巴格达陷落之后，国防政策委员会中著名的鹰派人物詹姆斯·伍尔西认为，美国卷入到第四次世界大战之中了，其主要敌人包括像叙利亚这样的国家中的“法西斯分子”。Barbara Slavin， “Some See Victory Extending Beyond Iraq，”*USA Today*， April 11， 2003.

[61] Flynn， “The Right Flexes Muscle.” 也可参见 John R.Bolton， “Beyond the Axis of Evil： Additional

Threats from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向传统基金会发表的讲话，美国国务院新闻秘书办公室，2002年5月6日。

[62] Douglas Jehl， “New Warning Was Put Off on Weapons Syria Plans，” *New York Times*， July 18， 2003； Marc Perelman， “State Department Hawk Under Fire in Intelligence Flap over Syria，” *Forward*， July 25， 2003，以及Warren P.Strobel and Jonathan S.Landay， “Intelligence Data on Syria Now Disputed，” *Philadelphia Inquirer* （online）， July 17， 2003。

[63] Nathan Guttman， “US： Syria Supporting Terror Groups Developing WMD，” *Ha'aretz*， September 16， 2003.

[64] 引自Robin Wright， “U.S.Insists Syria Alter Its Course，”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4， 2003。也可参见赫什的“Syrian Bet”一文中马丁·因迪克和丹尼斯·罗斯有关叙利亚的冷峻言辞。

[65] Frank Gaffney Jr.， “Who's Next in Line？” *Washington Times*， April 15， 2003.

[66] Lawrence F.Kaplan， “White Lie，” *New Republic*， April 21 & 28， 2003.也可参见William Kristol and Lawrence F.Kaplan， *The War over Iraq*： *Saddam's Tyranny and America's Mission*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3）。

[67] Jed Babbin， “Regime Change， Again，” *National Review Online*， November 12， 2003.

[68] Marc Ginsberg， “Bashing Bashar，” *Weekly Standard*， April 28， 2003.

[69] 引自Robert Fisk，“Western ‘Intelligence’ Services，” *Independent*， September 29， 2003。也可参见Babbin， “Regime Change”，以及 Prados， “Syria，” p.10。

[70] DeYoung， “U.S.Toughens Warnings”； Melissa Radler， “Bill to Impose Sanctions on Syria Brought to Congress，” *Jerusalem Post*， April 13， 2003.

[71] Sands， “Hawks Recycle Arguments.”

[72] “Engel Meets with Sharon in Jerusalem，” 国会议员埃里奥特·恩格尔办公室2003年8月18日的新闻稿；“NY Congressman Says Will Push Bill to Pressure Syria，” *Ha'aretz*， August 19， 2003，以及Janine Zacharia and Arieh O'Sullivan， “Sharon Tells Congressmen US Must Pressure Assad More，” *Jerusalem Post*， August 19， 2003。

[73] Bar'el， “Deciphering the Syrians.” 也可参见Matthew E.Berger， “Struggle over Syria Looms，” *Jewish News of Greater Phoenix* （online）， September 27， 2002； Barbara Slavin， “White House Stops Blocking Syria Bill，” *USA Today*， October 8， 2003，以及Janine Zacharia， “US Probes Syria Policy，”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18， 2002。

[74] Salhani， “Syria Accountability Act，” p.5.

[75] Hersh， “Syrian Bet”； Salhani， “Syria Accountability Act，” p.6.也可参见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这本书展现了布什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对付叙利亚这一问题存在深刻分歧的大量证据。

[76] Kampeas， “Bush， Once Reluctant.”

[77]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H.R.1828，”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December 12， 2003； Janine Zacharia， “Bush Signs Syria Accountability Act，”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14， 2003.

[78] Hersh， “Syrian Bet.” 其他讨论美国同叙利亚进行合作有好处的文章包括Clifford Krauss， “U.S.Welcomes Thaw in Relations with ‘Pragmatic’ Syri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2003； Martin， “Experts Disagree”； James Risen and Tim Weiner， “C.I.A.Is Said to Have Sought Help from Syri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0， 2001； Salhani， “The Syria Accountability Act”，以及Zunes， “Bush Has Clear Run”。

[79]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p.142.

[80] Hersh， “Syrian Bet”； Perelman， “Syria Makes Overture.”

[81]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p.142.也可参见Hersh， “Syrian Bet”。

[82] Julian Borger， “Bush Vetoes Syria War Plan，” *Guardian*， April 15， 2003.也可参见Hersh， “Syrian Bet”，以及Warren P.Strobel and John Walcott， “Bush Advisers Debating Syria's Role in Terrorism，” *Miami Herald* （online）， January 11， 2004。

[83] Robin Wright and Glenn Kessler， “Some on the Hill Seek to Punish Syria for Broken Promises on Iraq，” *Washington Post*， April 30， 2004.也可参见Glenn Kessler， “President Imposes Sanctions on Syria，”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4； Marc Perelman， “Israel Blames Attacks on Syria-Iran Axis，” *Forward*， July 14， 2006； Barbara Slavin， “U.S.Warns Syria； Next Steps Uncertain，” *USA Today*， September 17，

2003，以及Janine Zacharia，“U.S.May Postpone Syria Sanctions，” *Jerusalem Post*， March 19， 2004。

[84] Schiff，“The Peace Threat.”

[85] Benn，“United States Leaving Syrian Track.”

[86] Nir，“As Israel Debates”；以及Nir，“U.S.Advice.”

[87] 巴格达在2003年陷落后，《前沿》周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暗示了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如何影响美国的叙利亚政策的。在4月中旬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写道：“最近几天美国对叙利亚突然发出的阵阵警告表明，华盛顿已经向以色列及其在此间的支持者几个月来一直在敦促的事情作出了承诺：全面重新评估叙利亚统治者巴沙尔·阿萨德。” Perelman，“Behind Warnings.” 几个月后的7月中旬，同一位作者写道：“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以色列高级官员警告他们的美国同行和听众说，阿萨德是不可靠的。美国官员们应声附和这一立场，并且新闻报道已在推测美国可能在叙利亚进行的军事干预。” Perelman，“Syria Makes Overture.”

[88] Jim Lobe，“Are They Serious About Syria？” *Antiwar.com*， December 17， 2004； Eric S.Margolis，“Syria in the Sights？” *American Conservative*， March 28， 2005，以及“Serious About Syria？” *Wall Street Journal*editorial， December 15， 2004。

[89] 引自Yitzhak Benhorin，“Neocons： We Expected Israel to Attack Syria，” *Ynetnews.com*， December 16， 2006。

[90] Richard Boucher， 美国国务院每日新闻简报，2005年5月24日； Douglas Jehl and Thom Shanker，“Syria Stops Cooperating with U.S.Forces and C.I.A.，” *New York Times*， May 24， 2005； Michael Hirsh and Kevin Peraino，“Dangers in Damascus，” *Newsweek*，October 17， 2005，以及“Syria Halts Cooperation with U.S.，” *CNN.com*， May 24， 2005。

[91]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pp.134—142； Prados，“Syria，” pp.8—11.

[92] Jim Lobe，“Bush Under Growing Pressure to Engage Syria，” Inter Press Service， October 27， 2006. 也可参见Jim Lobe，“Damascus Now Seen as Pivotal in Mideast Crisis，” Inter Press Service， July 25， 2006。

[93] 媒体上有零星报道说，鉴于萨达姆政权推翻之后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以色列领导人可能已经失去在叙利亚进行政权更迭的热情。参见Stewart Ain，“Israel Getting Dragged into Syrian Mess，” *Jewish Week*， October 28， 2005； Ori Nir，“America， Israel Bracing for Violence from Syria，” *Forward*， December 2， 2005。 虽然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以色列仍然深深地致力于确保华盛顿对大马士革奉行对抗性的政策。

第十章 瞄准伊朗

自伊朗1979年革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以来，美国和伊朗就处于敌对关系。考虑到过去美国对伊朗的干涉——最引人注目的是1953年使穆罕默德·礼扎·夏·巴列维（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复辟掌权的政变，以及新政权对各种激进团体的支持，两个国家之间依然相互猜疑并且只有偶然接触的有限合作行为，就不会让人感到吃惊。

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比叙利亚更加构成战略挑战。大马士革和德黑兰都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它们都是基地组织的敌人。它们每一方都拥有化学武器，并可能拥有生物武器，虽然有关生物武器的证据不是结论性的。但是在伊朗和叙利亚之间存在三个根本的区别。

第一，伊朗正寻求全面掌握核燃料循环，这使得它如果选择建立核武器的话，就能够做到。它也在开发针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邻国的运送核弹头的导弹。[1]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经常将伊朗称之为“关乎（以色列）生存的”威胁。虽然伊朗在任何时候并不能够立即打击美国本土，但是它开发的任何武器都能够用于针对驻扎在中东的美国军队，或者用来针对欧洲国家。

第二，有些伊朗领导人——尤其是现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发表了令人深感不安的评论，他对大屠杀的发生和以色列的生存权都提出质疑。虽然艾哈迈迪-内贾德要求以色列“从历史中消失”——或者“从历史中抹去”——的话，经常被误译成要求毁灭以色列的存在，即“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但是这依然是一种令人吃惊的主张，那肯定会使以色列人和许多其他的人深深地感到不安。[2]伊朗在2006年12月主办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些引人注目的否认大屠杀者和名誉不佳的极端分子，这样只是加强了全球对伊朗意图的关注。

第三，伊朗是波斯湾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具有控制那一富产油区的潜在能力。[3]考虑到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在那里所发生的情况，这种潜在能力尤其真实可信。虽然伊拉克曾经是伊朗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但是它现在已经是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分裂社会，没有资格来制衡伊朗。伊朗同伊拉克几个占支配地位的什叶派派别保持联系，从而赋予它对伊拉克的变化比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巴格达的时候不曾有过的、远远要大得多的影响力。这一地区均势的急剧变化，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相信“伊朗看起来像伊拉克战争的获胜

者”[4]。当然，如果伊朗获得了核武器的话，伊朗对邻国的权力优势就会更加显著。

伊朗不断增加的权力对美国并不利，而美国曾经长期寻求阻止任何一个国家在波斯湾建立霸权。这一基本原则解释了为什么里根政府要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萨达姆，在它们之间的血腥战争中，当时看起来伊朗可能要打败伊拉克。美国也有强烈的动机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因为那样一股地区性的势力可以是长期的战略威胁。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的前景甚至使以色列领导人更加忧虑，他们倾向于将它看作极为恐怖、梦魇一般的情景。

但是以色列不是中东现在唯一担心伊朗的国家。许多伊朗的阿拉伯邻国也关心伊朗的核野心以及它在该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它们担心力量特别强大的伊朗，可能有一天企图威吓它们或者侵略它们的国家，就像萨达姆在1990年8月侵略科威特一样。它们也对伊朗有点怀疑，因为它们关心伊斯兰内部什叶派同逊尼派之间的权力均衡。伊朗是由深深忠于什叶派的人所统治的，这使得像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的领导人感到惊慌，因为它们看到什叶派的影响力在阿拉伯世界正不断增加。什叶派统治伊拉克；紧接着2006年同以色列的战争之后，黎巴嫩真主党——一个什叶派组织——已经在黎巴嫩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这些事情都是第一次发生的。更糟糕的是，德黑兰同有些伊拉克领导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是黎巴嫩真主党的长期支持者。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阿拉伯邻国，包括许多美国的海湾盟国，对于使伊朗保持为一个非核国家，并阻止其成为地区霸主，有着非常关键的利益。即便以色列不存在，华盛顿也将致力于制衡伊朗，以便防止其他的海湾国家被德黑兰征服或受其压制。来自阿拉伯世界不受限制的支持，将使得美国更加容易保持海湾的均势，而要获得那种支持则需要一项行之有效的战略。

在过去的15年间，以色列及以色列游说集团曾推动美国追求一项战略上并不明智的伊朗政策。具体地说，如今他们是布什政府和国会山背后谈论有关以军事力量摧毁伊朗核设施的核心力量。不幸的是，这样的言词使得防止伊朗走向核国家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20世纪90年代期间，以色列及其美国的支持者鼓励克林顿政府追求一项对抗性的伊朗政策，即便伊朗有兴趣改善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相同的模式在布什政府的最初年份里以及2006年12月——当时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共同努力破坏伊拉克研究小组向布什总统提出的同伊朗进行谈判的建议——再次发挥作用。如果不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话，美国将几乎肯定出台一项更为有效的、不同的伊朗政策。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采取的镇压政策，进一步破坏了美国对付伊朗而作出的努力，这使得美国要获得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更加困难。事实上，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2006年底最后推动阿以和平进程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因为沙特阿拉伯坚持认为，只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世界对美国有如此多的愤怒，沙特阿拉伯就不能够与华盛顿形成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就像在第七章中所讨论到的那样，赖斯的努力可能失败了，因为以色列现任领导人不希望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国，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将使得布什总统或任何其他总统让以色列改变这一问题的方法变得非常困难。简而言之，多亏以色列及其美国的支持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才追求了一项同预期结果相反的伊朗政策，而且在得到有其自身理由帮助华盛顿对付伊朗的国家支持方面遭遇困难；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这些国家倾向于帮助华盛顿来对付伊朗。

对抗还是安抚？

从1953年一直到1979年，美国同伊朗之间有着极好的关系；1979年美国支持的国王被推翻，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和他的神权政体掌权。自从那时以来，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是敌对的。自从国王被推翻以来，以色列也一直同德黑兰关系敌对。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受到伊朗的严重威胁，主要是因为它卷入到同伊拉克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这使得它受到压制、力量逐渐受到削弱。为保持区域均势，美国只要确保战争以胶着状态结束即可。通过帮助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使伊朗军队陷在战场上，美国完成了这一目标。当战争在1988年结束的时候，伊朗已是精疲力竭了，因而至少有几年它没有资格在该地区引起麻烦。进而言之，可能是因为这场战争，20世纪80年代期间，伊朗的核计划被暂时搁置到了一边。

随着德黑兰核野心的证据开始出现得越来越多，以色列有关伊朗的威胁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1993年，以色列领导人开始警告华盛顿说，伊朗不仅对以色列是个严重威胁，而且对美国也是如此。自从那时以来，那种杞人忧天而咄咄逼人的言词就没有平息过，主要是因为伊朗在朝核方向继续迈进。今天，许多专家相信，伊朗人将最终建立自己的核武器，除非发生什么事情来推翻伊朗的神职人员政权，改变它的核野心，或者拒绝它拥有此种能力。以色列游说集团追随着以色列，随声附和它有关让伊朗成为核强国的危险的警告。

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也对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支持巴勒

斯坦人的事业，以及拒绝以色列的生存权感到烦恼。不用说，像艾哈迈迪-内贾德那样的声明强化了这些关注。虽然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总是把伊朗的政策看作意识形态上深深仇视这个犹太国家的反映，但是更为准确地说，伊朗的政策是被看作改善伊朗在该地区全面地位的战术措施。具体地说，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以及帮助像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团体，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同情，有助于阻碍一个反波斯人伊朗的阿拉伯联盟的形成。就像伊朗专家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令人信服地显示的那样，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人的承诺，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很大的改变，改变通常是针对全面威胁环境而作出的反应。伊朗的神职人员政权与基本上是世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并不热络，而伊朗对像伊斯兰杰哈德这样强硬路线的巴勒斯坦团体的支持，只是在它被排除在1991年的马德里会议之外，以及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始的时候。这些事件导致德黑兰抵制它所正确看到的美国孤立它并拒绝承认它是一个重要地区角色的广泛努力，它是通过支持反对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极端主义团体来做到这一点的。就像马丁·因迪克——他在当时制定美国的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后来回顾的那样，伊朗“为了打败我们的遏制政策和鼓励政策，它有动机搞垮我们的和平进程”[5]。

为对付伊朗的核计划及其地区野心，存在着两种广泛的选择。一种方法受到以色列政府及其美国支持者的赞成，它产生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一旦伊朗获得了核武器就不能够对它进行遏制。这种观点假定，德黑兰可能对以色列使用核武器，因为鉴于伊朗领导人天启式的历史观，他们将不会害怕以色列的报复。[6]他们将把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或用来对付美国本身，即便这样做会招致自动的大规模报复。因此，不能够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虽然以色列愿意让华盛顿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以色列领导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如果美国打退堂鼓的话，以色列国防军可能试图来解决这一问题。

这种方法也假定认为，调和性的外交和正面激励将不会说服伊朗放弃核计划。具体地说，如果伊朗继续沿着核武器的道路往下走的话，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制裁伊朗——甚至可能对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为促进对伊朗施以严厉的压力，以色列人和以色列游说集团要美国在中东维持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这种情况同美国在1990年之前充当离岸平衡手，使自己的军队远离地面的做法形成了对照。

在过去的15年间，这种对付伊朗核计划的对抗性公式，一直与一种更加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第二种战略相竞争。这种替代性的方法主张，虽然如果伊朗得不到核武器对美国来说会更好，但是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也能够受到遏制和受到威慑，就像冷

战时期的苏联被遏制一样。[7]这种方法还认为，防止伊朗建立核武器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外交接触，并尝试使其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战略要求不将先发制人战争的威胁考虑在内，因为以政权更迭来威胁伊朗只会使伊朗领导人有更多理由来获得他们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像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一样，伊朗人也认识到，对于一个在他国打击名单上的国家来说，核武器是这个国家能够得到的最佳保护手段。就像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伊朗专家雷·塔克赫（Ray Takeyh）所写到的那样："伊朗的核计划不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意识形态，而是出于一种头脑精明的尝试，以技巧性地使自己能够生存的威慑能力来应对一系列正在演变的威胁……伊朗领导层显然明白，自己正成为华盛顿的瞄准目标，而正是这种看法驱使它加快自己的核计划。"[8]

预防性战争看起来不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选择这一事实，成了支持进行接触的理由。即便美国能够消除伊朗的核设施，但是德黑兰将几乎肯定会进行重建，而这一次伊朗人将会更加竭尽全力地分散、隐藏和加固这些设施来应对打击。[9]同样，如果华盛顿发动对伊朗先发制人的战争，那么德黑兰将肯定进行不分时间地点的报复，包括打击波斯湾的石油装运，并利用它在伊拉克相当的影响力而使得美国在那里的处境更糟。此外，伊朗还将可能同中国和俄罗斯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而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相反，如果美国撤除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并与之进行接触，那么德黑兰就将更倾向于帮助美国来对付基地组织，压缩伊拉克国内的战争规模，使阿富汗稳定下来。它同中国和俄罗斯结盟的可能性也就更小。[10]

考虑到美国同伊朗之间恶劣关系的历史，并不能保证接触就会产生终止伊朗核计划的"大交易"出现。毕竟，几乎不存在以色列放弃自己的核武器的机会，而且伊朗领导人可能相信，如果以色列拥有核威慑能力，那么伊朗也就必须拥有这种能力。然而，这种方法比起威胁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可能更加管用；而且如果该方法失败，美国也总是能够转而依靠威慑的方法。

到这个时候，有人可能期待美国在接触战略上采取一些变化的立场，特别是考虑到15年的对抗没有产生结果的情况。接触战略在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甚至在美国军队中得到大量的支持，这些部门对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伦敦的《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在2007年2月底报道："根据高级国防和情报来源，如果白宫下令打击伊朗的话，一些美国最高级别的军事指挥官就准备辞职。"[11]事实上，伊朗反复发出了有兴趣进行接触的信号：在过去的15年间，其领导人曾经多次向美国伸出手来，希望改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引人注目的是，伊朗甚至开出了为谈判而提供其核计划和

同以色列暂时进行妥协的条件。

然而，尽管有这些充满前途的机会，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却不厌其烦地阻止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同伊朗进行接触，而且他们几乎每个回合都取胜了。不幸但却可以预料的是，比起追求一项接触战略来，这种强硬方法并不像其被推销的那样管用，而是更加糟糕。为回应这一失败的战略，华盛顿内外一致不断升高的声音是寻求同伊朗重建友好关系。同样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正用力阻止美国的路线变化和寻求同德黑兰恢复友好关系。相反，他们继续推广一项越来越具对抗性和同预期结果相反的政策。

克林顿政府与双重遏制

1993年初，就在克林顿政府要上台的时候，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他的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开始宣称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一个越来越大的威胁。以色列领导人将伊朗描绘成危险的敌人，部分原因是，既然苏联的威胁已经消失，那么他们就将伊朗看作促进华盛顿同耶路撒冷更紧密关系的途径。其希望在于，美国将把以色列看作对付伊朗扩张主义的防波堤，这与将以色列看作对付苏联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防波堤如出一辙。以色列也无可非议地关注伊朗重新有兴趣开发精密核武器的计划。[12]《华盛顿邮报》在1993年3月中旬报道说："在以色列政界，人们坚信需要使美国公众舆论和政治领导人相信约束伊朗的紧迫性，而且美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这样做的全球性力量。"[13]

正如我们以前讨论过的那样，通过采取双重遏制的政策，克林顿政府对以色列的恳求作出了响应。该政策不仅首先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由马丁·因迪克进行了清楚的表达，而且当时的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特·佩莱特鲁（Robert Pelletreau）也告诉特尔塔·帕西说，这项政策实质上是以色列一项建议的翻版。[14]布鲁金斯协会萨宾中心的肯尼斯·波拉克也指出道："耶路撒冷是地球上不会误解双重遏制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15]新政策要求美国放弃在波斯湾充当离岸平衡手的传统战略，相反却为了遏制伊朗和伊拉克的目的而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驻扎相当数量的军队。事实上，这项政策设计是用来更多地遏制伊朗；该政策的目标也是要引起"伊朗行为的巨大变化"。在其目标当中，其中之一是要迫使伊朗停止支持恐怖分子，放弃它的核计划。[16]

虽然有以色列的关注这一原因的存在，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采取强硬路线的伊朗政策并没有充足的理由。如果有理由的话，那也是相反的理由。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在1989年成为伊朗总统，他致力于改善伊朗同美国的关系；而刚刚遭受同伊拉克毁灭性战争的伊朗，那时候对美国几乎说不上是一个军事威胁。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领导人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关注要多得多，因为美国刚刚同他打了一仗。[17]此外，伊朗的核计划在1993年几乎还没有成功开始。以色列喧嚷着要采取更加对抗性的政策之前，在华盛顿几乎听不到要求更加强硬的伊朗政策的声音；而双重遏制政策在开始宣布的时候曾受到广泛的批评。[18]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双重遏制政策存在着越来越多的不满，因为这一政策迫使美国同两个互相厌恶对方的国家都维持敌对的关系，这使得华盛顿在处理使这两个国家循规蹈矩这一费力的工作时备感孤单。结果在美国，考虑同伊朗接触而非对抗的压力开始形成。[19]然而，与此同时在以色列，拉宾受到要求克林顿政府使自己的政策强硬起来的压力。[20]拉宾的批评者感到，双重遏制没有真正的威力，因为它几乎阻止不了伊朗同美国之间实质性的经济交往。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特别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动员起来拯救双重遏制，并且关闭那些允许美国公司在伊朗进行贸易和投资的窗口。帕西在1994年中期报道说："在以色列政府的命令下，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华盛顿起草并散发了一篇74页长的文件，该文件认为伊朗不仅是对以色列的威胁，而且也是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威胁。"[21]按照波拉克的观点："右翼、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以色列人全都在大声叫嚷着（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22]克林顿政府之所以愿意继续前进，基本上是因为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原因，想确保以色列感觉安全，以及潜在的破坏者伊朗不会破坏和平进程。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1995年4月设计出了基本的游戏计划，当时它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伊朗进行全面制裁：行动计划》的报告。[23]然而，根据那一点，将经济套索加在伊朗脖子上勒紧的步骤已经开始采取了。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Alfonse D'Amato）——按照波拉克的话来说，在"得到以色列人的帮助下"——于1995年1月提出一项立法，要求终止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全部经济联系。[24]克林顿政府一开始的时候反对这项立法，因而该项立法在国会处于胶着状态。

但是两个月之后，在伊朗选择美国的石油公司美国大陆石油公司（Conoco）开发斯瑞（Sirri）油田的时候，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团体取得了他们的首次成功。[25]伊朗故意在其他外国竞标者当中挑选美国大陆石油公司，以便发出它有兴趣改善同美国关系的信号。但是这一友好的提议毫无结果，因为克林顿在3月14日扼杀了这一交易。一天之后，他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司帮助伊朗开发油田。克

林顿后来说道，对美国大陆石油公司交易“起到最大作用的反对者之一”，是世界犹太人大会前主席埃德加·布隆福曼爵士。[26]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也在搞砸这项交易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27]

5月6日，总统发布了第二道禁止同伊朗进行一切贸易和金融投资的行政命令，他将同伊朗的这些活动贴上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了非同寻常的极端威胁”的标签。[28]一星期前，克林顿在对世界犹太人大会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实际上宣布他打算采取那一措施。[29]波洛克指出，他禁止美国大陆石油公司的交易，并发布那两道行政命令的决定，是“我们对以色列进行支持的主要表现”[30]。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以色列支持美国切断同伊朗经济联系的决定，但是它却没有通过任何禁止以色列—伊朗贸易的法律，而且以色列人还继续通过第三方购买伊朗的货物。[31]

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却不满足于那些行政命令，因为如果克林顿改变自己的决定，那些行政命令就能够迅速加以改变。以色列坚强的捍卫者A.M.罗森塔尔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表明了这一点，他在其中对大陆石油公司的交易进行批评：“（行政命令的）唯一问题，是总统能够取消他所颁布的东西。”[32]为回应这一潜在的问题，特尔塔·帕西报道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动地”修改达马托参议员在1995年1月提出的这一法案，“并说服这位纽约州的参议员重新提出这一法案——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建议修改过的版本”[33]。新法案最终变成《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Iran-Libya Sanctions Act），该法案对任何在伊朗或利比亚投资超过4000万美元进行石油资源开发的公司实施制裁。虽然这项建议的立法激怒了欧洲的盟国，但是众议院还是在1996年6月19日以415票对0票获得通过；1个月之后，参议院也全体一致地通过了这一法案。即便在整个行政当局中对这一新的立法有着重要的反对意见，但是克林顿却在8月5日签署了这一法案。事实上，肯尼思·波拉克写道：“行政部门的许多人痛恨达马托法案。对于许多人来说，‘痛恨’这个词实际上还太过于温和。”然而，“克林顿总统的许多国内政策顾问却认为，白宫如果不支持这一法案将是愚蠢透顶的”。[34]

由于克林顿在3个月后要进行重新选举，因此他们可能是正确的。就像以色列《国土报》军事记者泽厄夫·希夫当时指出的那样：“以色列虽然只是这个大方案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因素，但是人们不应该断定它不能够影响华盛顿圈内的那些人。”[35]类似地，就在进行这些制裁之后，在不同的行政当局里担任过许多内阁级别职务的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评论道：“几乎不可能存在夸大以色列支持者对我们中东政策的影响力。”[36]

美国大陆石油公司的插曲，进一步使人怀疑这种经常为人们反复说到的观点——即“石油游说集团”才是隐身在美国中东政策背后的真正力量。在这个例子中，一家美国公司想同伊朗进行交易，而伊朗也想同它做生意。石油行业反对推翻美国大陆石油公司的交易，它也反对向伊朗实施制裁的立法。[37]就像本书第四章中指出的那样，虽然迪克·切尼今天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同伊朗进行对抗的鼓动者，而他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哈利伯顿石油供应公司总裁的时候，却公开反对美国的制裁计划。但是，在每次决定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都以不可抗拒之势战胜了石油利益集团。在同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比较的时候，这些结果为石油公司对美国中东政策产生如何微小的影响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即使是在明显有新的接触机会的情况下，美国的态度依然还是强硬的。1997年5月23日，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当选为伊朗总统。他比他的前任甚至更加热心于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在8月4日的就职演说和12月14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发表了和解性的评论。更为重要的是，在1998年1月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他进行的一次冗长采访中，他特地表达了他对“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他们的伟大文明”的尊敬。他还清楚地表明，伊朗并不“以摧毁或削弱美国政府……为目的”。他对1979年占领美国使馆的臭名昭著的行为感到遗憾。由于认识到在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存在的敌意，他要求“为准备变化和创造研究新局势的机会而砸碎缺乏信任之墙”[38]。

进而言之，哈塔米没有排除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存在一个以色列国的可能性，宣称说：“所有形式、所有表现的恐怖主义都应该受到谴责。”他也谴责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主义，并指出说：“在我看来，支持那些为解放自己的土地而战的人不是支持恐怖主义。”纵然有这样的警告，但是哈塔米的评论依然是伊朗立场的明显改变，而且其他的伊朗发言人立即附和说，如果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伊朗愿意接受以色列的存在。[39]

紧接着哈塔米的和解性评论，克林顿政府在同以色列和国会中的主要人物协商之后，作了许多改善伊美关系的小姿态。[40]克林顿和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对西方过去的作为发表了后悔的评论，而且美国放宽了两国之间的旅行签证限制。甚至连双重遏制的设计师、当时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马丁·因迪克都告诉记者说：“美国已清楚地反复表明，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伊朗的伊斯兰政府……我们准备进行对话。”[41]但是商业限制依然有效，而且双重遏制在克林顿第二个任期余下的时间里依然继续下去。路线改

变的失败，部分原因是由于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他们强烈反对哈塔米同“大魔鬼”进行接触的计划。[42]但是以色列及其美国的支持者，也在阻碍美国同伊朗恢复友好关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发起者来说，以色列游说集团基本上要对哈塔米1997年上台之前那些年里发展出并维持的遏制情形负责。当然，那一政策起到了毒化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关系的作用，而这回过头来又增加了那些反对这位更温和的伊朗新领导人的政客们的力量。进而言之，哈塔米要求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在1997年12月中旬一旦变得清楚，以色列官员就对他的倡议进行阻碍。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就有关美国对伊朗政策即将改变的报道，以色列已经对华盛顿表示了它的关注。”该报还说，内塔尼亚胡总理“已经要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国会加紧行动，以阻止这样的一种政策变化”[43]。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像内塔尼亚胡所要求的那样做了。按照一位美国著名的伊朗问题专家加里·西克（Gary Sick）的话来说：“哈塔米当选后美伊关系的逐步改善，没有反映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立场中。事实上，到1999年初，只有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伊朗流亡的君主制主义者和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 Khalq）这样的恐怖团体坚持他们的冷酷立场，即伊朗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发生变化。”[44]甚至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于2000年春说过这番话——即可以接受克林顿允许某些食品和药品出口到伊朗——之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依然反对这一立法。虽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对取消从伊朗进口鱼子酱、波斯地毯、乳香子禁令的决定，但是反诽谤联盟和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却主张这样做。[45]在这两起事件中，克林顿之所以最终都没有顾及反对意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两起事件涉及的都是小额贸易量，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但是美国并没有作出严肃努力来抓住哈塔米试探性地伸出来的那只手。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有很好的理由同伊朗接触，以便改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像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所观察到的那样，双重遏制“是一个疯狂的想法”[46]。然而，以色列领导人却相信，阻止克林顿总统追求接触政策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即便那一更加咄咄逼人的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以色列一位对伊朗持鹰派立场的著名人物伊弗雷姆·斯奈（Ephraim Sneh）简明地陈述了这一点：“我们反对它（美伊对话）……因为美国的利益并不与我们的利益相一致。”[47]以色列游说集团追随以色列的领导。

布什政府与政权更迭

就像本书第八章中所讨论的那样，2001年9月11日的攻击，导致布什总统放弃双重遏制的政策，并转而追求甚至更具野心的地区改造战略。美国军队将被用来推翻中东地区的那些敌对政权。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伊朗适合作为布什政府打击名单上的第一个理想目标。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色列领导人总是将伊朗描述为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伊朗是最可能获得核武器的敌人。就像以色列国防部长宾雅明·本-厄里泽（Binyamin Ben-Eliezer）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一年所评论的那样："伊拉克是个问题……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你应该明白，伊朗今天比伊拉克更加危险。"[48]

然而，沙龙及其助手到2002年初的时候承认，美国决心先同伊拉克进行对抗，在萨达姆被赶下台之后再对付伊朗。他们对这一议程的排序没有提出严肃的反对意见，尽管他们不断提醒布什政府，说它一完成巴格达的任务就必须对付伊朗。在2002年11月《伦敦时报》进行的一次采访中，沙龙开始公开推动美国同伊朗进行对抗。[49]他将伊朗描述为"世界恐怖中心"，热切地想得到核武器，因此他宣称布什政府应该在征服伊拉克的"那一天之后"就对伊朗采取强制手段。

2003年4月底巴格达陷落之后，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以色列在华盛顿的大使现在要求在伊朗进行政权更迭。他指出，推翻萨达姆还"不够"。用他的话来说，美国"必须穷追猛打。我们依然有大量来自叙利亚、来自伊朗的巨大威胁"[50]。10天之后，《纽约时报》报道说，华盛顿对伊朗的核野心越来越关注，有"许多来自以色列要求我们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的压力"[51]。西蒙·佩雷斯在6月25日的《华尔街日报》舆论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阻止阿亚图拉·核武器的出现》的文章。他对伊朗人威胁的描述听起来同早先萨达姆威胁的描述如出一辙，其中甚至包括20世纪30年代绥靖教训的老生常谈。他强调说，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不会容忍它成为核国家。[52]

新保守派也迫不及待地提出在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理由。2003年5月，国际新闻社（Inter Press Service）报道说："自从5月初以来，新保守派现在集中关注在伊朗进行'政权更迭'所作的努力的密度要大得多了，并且（已经）产生了相当的成果。"[53]按照《前沿》周报的说法，6月初，"行政当局里里外外的新保守派一直在积极努力地推动德黑兰的政权更迭。有关可能的秘密行动报道在最近几周已经浮出了水面"[54]。

像往常那样，那些著名的新保守派——从根本上来说是那些推动伊拉克战争的人——发表了一组文章，来为打击伊朗找到理由。威廉·克里斯托尔在5月12日的《旗帜周刊》上写道："解放伊拉克是未来中

东的第一个伟大战役……但是下一场伟大战役——我们希望不是军事战役——将是针对伊朗而进行的。”[55]一位著名的对伊朗持鹰派立场者迈克尔·雷丁在4月4日的《国民评论在线》上写道：“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外交‘解决’了。此时此地，我们将不得不对付这些恐怖分子的祸首。由于伊朗人民公开厌恶这个政权，因此伊朗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纪念的胜利的可能性；而如果美国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他们将热切地与这个政权进行战斗。”[56]

其他在此时提供类似观点的学者，包括中东论坛的丹尼尔·派普斯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帕特里克·克劳森（Patrick Clawson），后者在5月20日的《耶路撒冷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伊朗施压》的文章。他们要求布什政府支持人民圣战者组织。该组织以伊拉克为基地，致力于推翻德黑兰的政权，但是美国政府已将它定性为一个恐怖组织。劳伦斯·卡普兰在6月9日的《新共和》上撰文认为，美国需要对伊朗的核计划更加强硬，因为他担心伊朗的核计划要比大多数美国决策者所承认的那样要走得更远。[57]

5月6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同两个其他的亲以色列组织民主捍卫基金会和赫德森研究所，共同主办了一次全天候有关伊朗未来的会议。[58]发言者几乎都是强烈支持以色列的人：他们是伯纳德·刘易斯、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以色列国防军高级顾问和以色列政府前南黎巴嫩协调员尤里·卢布兰尼（Uri Lubrani）、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和前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莫里斯·阿米塔伊、迈克尔·雷丁、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雷欧尔·马克·格拉齐特，以及赫德森研究所的梅拉夫·乌姆瑟尔。在台面上进行讨论的问题明显只有一个：“美国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促进伊朗的民主化和政权更迭？”答案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每位发言者都要求美国做远远更多的事情来推翻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用一个民主国家来取代它。

朝着这一目标，以色列游说集团开始了同伊朗已故国王之子里扎·巴列维（Reza Pahlavi）的密切关系。人们相信他同沙龙和内塔尼亚胡都进行过私人会见，他也同美国的那些亲以色列团体和个人有过广泛的接触。这种变化中的关系，与此前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有影响力的团体曾刻意培养的与伊拉克流亡者艾哈迈德·沙拉比的关系非常相像。亲以色列团体似乎不清楚巴列维（就像沙拉比一样）在其祖国几乎不存在合法性，因而这些团体促进了他的事业发展。作为回报，巴列维清楚地表明说，如果他在伊朗掌权，他将保证这个国家同以色列会存在友好的关系。[59]

2003年5月19日，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宣布，他计划将提出资助反对派团体和在伊朗推进民主的立法。所谓的《伊朗民主法案》

（Iran Democracy Act）不仅得到伊朗流亡者的支持，而且也得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以及伊朗民主联盟（Coalition for Democracy in Iran）——该联盟的创始人包括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的莫里斯·阿米塔伊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雷丁——的支持。该法案在众议院由另一位致力于支持以色列、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布拉德·谢尔曼提出。到7月底的时候，国会两院都通过了该法案，尽管资助反对派的内容在最终的立法中被删除了。[60]

支持这项立法的团体曾强调说，伊朗是个主要的威胁，因为它支持恐怖主义，接近成为一个核国家。但是他们也试图指控伊朗要对巴格达沦陷以后美国所面临的一些其他问题负责。五角大楼的新保守派认为，伊朗正庇护一些在2003年5月12日曾攻击过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利雅德其他目标的基地组织人员。伊朗人否认了这一指控，而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则相当怀疑地看待新保守派的这种指控。[61]新保守派也是这种观点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即伊朗一直支持对在伊拉克的美国军队的攻击。就像迈克尔·雷丁于2004年4月所写的那样："只要德黑兰通过其边境派遣恐怖主义干部，伊拉克就不会有和平和安全。"[62]

如果伊朗正在伊拉克贡献民兵部队，那么这几乎证明不了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伊朗并不是美国在伊拉克所面临问题的主要根源，而且即使伊朗什么事情都不做，美国将依然深深地陷在麻烦之中。如果伊朗正在这样做，那也同样不会令人感到吃惊。毕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已经入侵了伊朗的两个邻国，同时宣称德黑兰是"邪恶轴心"的组成部分。美国国会通过了要求在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的法律，而且布什政府对伊朗流亡团体进行了资助，数次暗示它可能以军事力量打击伊朗。难道任何面临此种威胁的国家不会尽力保护自己吗？伊朗保护自己的举措，包括利用它在不同伊拉克派别中的影响力，以及可能向他们送去各种形式的援助。如果一个敌对强国征服了加拿大或墨西哥，并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志趣相同的政府，美国难道不会试图搅浑那个敌对强国所作的努力，确保结果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吗？虽然美国有足够的理由来怨恨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却几乎不应该为此感到吃惊，或者将此看作伊朗敌意不断的证据。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当莫斯科正提供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援助给北越的时候，对苏联深深的厌恶之情没有阻止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同苏联领导人进行接触，而北越则用这些援助杀死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

起而保卫以色列

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显然成功地使布什以及其他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相信，一个用核武装起来的伊朗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且防止那种威胁的加剧乃是美国的责任。事实上，有一些证据表明，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某些个人认为，对于以色列的利益来说，他们是太成功了。

总统目前的言辞清楚地反映了以色列所偏好的对伊朗的措施，这在总统2006年3月20日于克利夫兰发表的演讲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他说："当然，来自伊朗的威胁是他们所言明的以摧毁我们的盟友以色列为目标。那是一个威胁，一个严重的威胁……我清楚地表明过，而且我将再次清楚地表明，我们将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来保护我们的盟友以色列。"[63]布什的评论同他此前的声明是一致的。他在一个月之前接受路透社的采访中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起而保卫以色列。"[64]进而言之，多数2008年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一样——似乎都同意总统的观点。例如，2007年4月，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明确地说，他同意布什的观点，即美国有责任保护以色列不受伊朗的攻击，确保伊朗不能够获得可能威胁以色列的核武器。[65]2007年5月，他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重复了那一观点；同为候选人的巴拉克·奥巴马、米特·罗姆尼、比尔·理查森、萨姆·布朗巴克也有类似的评论。[66]

布什热心将伊朗界定为对以色列而非美国的致命威胁，佐之以他所声明的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向伊朗开战，向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各类构成部分开启了警铃。2006年春，《前沿》杂志报道说："犹太人社会的领袖已经督促白宫克制这样的公开保证，即针对伊朗的可能敌意而保卫以色列。"问题并不是这些犹太领袖反对使用美国的力量来保护以色列，而是他们担心，布什的公开声明"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为了以色列的理由而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上的选择——而这能够导致美国犹太人遭受承担美国打击伊朗负面后果责任的指控"[67]。正如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执行副主席马尔科姆·霍恩莱因在2006年4月所说的那样："就像我们充分意识到的那样，问题在于将此同以色列挂钩是否有利。"[68]

以色列领导人有着同样的关注，这反映在那年春末奥尔默特总理的评论当中，他希望亲以色列团体将对有关伊朗问题保持低调。他说"我们不希望这是关于以色列的战争"，而这恰恰与总统所说的完全相反。[69]

除了言辞，布什政府也用力做工作来终止伊朗的核计划，并且在总体上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布什政府已经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而且如果伊朗继续沿着核武器的道路往前走，那么它还威胁要

进行军事打击。美国领导人喜欢说："任何选择都是在考虑范围之内的。"[70]有多少同样策划了伊拉克战争的人，已经在开始设计五角大楼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詹姆斯·班福德（James Bamford）和西摩·赫什分别对此进行了描述。例如，直到2005年8月还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国防部长道格拉斯·费思，在发展打击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计划中起到了中心作用。赫什在2005年初指出："也存在着同以色列之间密切但基本上不被承认的合作。""在道格拉斯·费思的领导下，国防部文职人员一直在同以色列规划人员和顾问人员戮力发现和确定伊朗境内可能的核目标、化学武器目标和导弹目标。"五角大楼也一直在伊朗境内进行情报收集活动，更新了它"范围更广的入侵伊朗的应急计划"[71]。

2007年1月，布什政府以多种方式加紧了对伊朗的军事压力。5名伊朗官员在伊拉克城市厄比尔（Erbil）被捕，他们当时是在当地库尔德人和伊朗人认为是领馆设施的楼房中被捕的。总统在那时候宣布说，他正派遣另外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波斯湾，将爱国者反导弹防御系统送到那里保卫那些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的国家。与此同时，在巴格达的美国军队官员宣称，伊朗正在将用来对付美国军队的特别致命的路边炸弹关键零部件装运到伊拉克。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和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都清楚地表明，行政当局没有排除美国军队越境进入伊朗的可能性，以追捕那些买卖路边炸弹和其他武器的伊朗人。[72]

尽管有这些对抗性的举措，但是副总统切尼的中东事务顾问戴维·乌姆瑟尔还是明显感到，赖斯和赫德利对同伊朗进行谈判怀有太多的兴趣——即便威胁已经使得外交被中断了，而对军事选择却没有足够的承诺。2007年春，乌姆瑟尔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其他华盛顿的保守派思想库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谈话中他说副总统对国务卿还有布什总统完全追求外交解决感到不快，切尼则对同以色列一道提出一项能够兜售给总统的消除伊朗核计划的战略感兴趣。当乌姆瑟尔的活动为大家所知的时候，赖斯否认行政当局内部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强调副总统完全支持总统的政策。[73]

在同伊朗打交道时，华盛顿主要依靠的是威胁而非谈判；而欧盟则与此相反，试图找到外交解决危机的办法。2003年8月初，欧盟三国（英、法、德）倡议同德黑兰进行谈判；10月21日，伊朗同意推迟其核燃料的改进和回收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进行特别的突击性核查。一年后的2004年11月15日，伊朗同意"继续延长推迟其所有相关的核燃料改进和回收活动"，并"带着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长期安排协议的观点

来开始谈判”[74]。然而，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的努力失败了，而伊朗则在2005年8月宣布，它将恢复改进其铀燃料。虽然欧盟三国继续同伊朗谈判，但是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虽然美国愿意让欧盟三国尝试通过谈判来停止伊朗的核计划，但是它却对那一谈判过程几乎没有什么热情，而且也从不致力于使其发挥作用。[75]事实上，通过不断地威胁伊朗并促使欧洲谈判者对他们的伊朗谈判对手尽可能强硬，布什政府几乎确保了谈判将毫无结果。如果有任何外交将获得成功的希望，那么军事威胁就必须在考虑的范围之外。

在依靠威胁的外交没能够解决问题之后，布什政府开始在2005年秋用力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实施制裁。2006年12月底，在拖延太久之后，当时的中国和俄罗斯同意对伊朗的一揽子有限制裁决议，布什政府终于成功了。[76]2007年3月底，由于伊朗拒绝关闭其核更新设施，安理会批准对伊朗的第二套制裁方案。这些新的制裁规模也是有限的，包括禁止对伊朗的武器出口，对同伊朗核计划相关的伊朗个人实施旅行限制，冻结某些第一套联合国制裁方案未触及的伊朗个人和组织的资产。[77]很少有专家相信这些措施将使得伊朗放弃其核计划，而且也很少有人相信美国将能够说服安理会赞同那类能够起作用的强硬制裁方案。但是如果联合国的制裁并非解决之道，那么什么才是解决之道呢？

可供选择的替代性方案

留待布什政府终止伊朗核计划的选择有三个：它可以试图通过明显增加战争以外的军事压力、更强硬的美国制裁，以及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反伊朗联盟，来对德黑兰进行威吓；它可以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来消灭伊朗，或者它可以严肃地尝试进行一项大交易来阻止伊朗开发核武器。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大多数主要组织，特别是新保守派组织，赞成的是第二种选择。但是以色列领导人及其美国支持者完全清楚，在美国政府的里里外外以及国际社会——特别是考虑到伊拉克的可怕局势，存在着普遍反对攻打伊朗的情形。进而言之，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布什总统有这样的言辞，但是他对于军事选择却几乎没有显示出什么热情，这并不是说他决不会打击伊朗。

布什2007年的计划似乎是要求加大对伊朗施压，以期希望伊朗屈服于美国的要求而停止对铀进行提炼。[78]就像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行政当局在1月采取了许多直接针对伊朗的对抗性军事步骤。而且总统和国务卿赖斯也已经开始进行协调性的努力，来使中东的阿拉伯国

家与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起来反对伊朗。基于这样的背景，一直支持布什政策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团体，现在开始动员起来了。2007年3月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会议前夕，《前沿》杂志报道说："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正支持国会一项新的立法，该立法将加强对伊朗的制裁，把目标对准那些同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做生意的外国实体。"[79]

到目前为止，这一战略没有产生什么后果。许多伊拉克人，甚至库尔德人都因为逮捕5名伊朗人而对美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然后在3月，当伊朗人指控15名英国海军人员闯入伊朗的领海而扣留他们的时候，伊朗人证明双方都能够玩这样的游戏。[80]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发展它的核计划，并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团体。没有证据显示，派遣另外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到波斯湾对伊朗的行为产生了任何影响。虽然国会可以对伊朗执行远远更加严厉的制裁，但事实是，由于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对那些同伊朗做生意的盟国实施制裁，因而行政当局对采取这一路线的热情并不高。这是一项加剧美国同那些盟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政策，结果有可能削弱它们帮助华盛顿对伊朗施加额外压力的意愿。[81]

行政当局尝试同阿拉伯国家密切协调的工作也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作为。3月，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不仅邀请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访问利雅德，并且取消了一次对白宫的访问，还谴责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是"非法的"。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的主任说，阿卜杜拉在"告诉美国需要倾听盟国的意见，而不是将自己的决定强加给他们，并且总是站在以色列一边"。就像在第七章所讨论的那样，沙特阿拉伯那时候正推动阿拉伯联盟重新发布它有关结束以巴冲突的2002年和平倡议；然而，由于以色列对此感到不满，美国向沙特阿拉伯施压要求其改变这一建议。国务卿赖斯屈尊要求阿拉伯国家"开始同以色列接触"。这种劝告激怒了沙特阿拉伯人，特别是激怒了阿卜杜拉，结果他通过狠狠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存在而进行了回应。[82]

威吓不可能改变德黑兰的算计。以色列领导人及其美国的盟友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核伊朗看作以色列的致命威胁。由于那个原因，许多人已经无情地游说不仅要将军事选择考虑在内，而且提出理由说伊朗是如此危险，以至于如果它不对华盛顿的要求进行有条件的投降，就必须对伊朗动武。考虑一下2006年5月24日埃胡德·奥尔默特总理对一次国会联席会议所说的话吧。他强调说，核武装起来的伊朗不仅是对以色列的威胁，并且将置"整个世界的安全……于危险之中"。他清楚地表明说，他期待美国在阻止这一"正在

形成的黑暗风暴笼罩世界”方面起到主要的作用。[83]

数月之后的2006年11月，奥尔默特告诉《新闻周刊》的采访者说，他不相信伊朗将接受“妥协，除非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不达成妥协的后果。换言之，伊朗必须开始感到害怕”[84]。到2007年春的时候，奥尔默特正加紧兜售军事选择的活动。他在4月底告诉德国《焦点》（*Focus*）杂志说：“虽然摧毁整个（伊朗的）核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它进行摧毁却是可能的——即延后伊朗核计划的时间。”奥尔默特估计，“那将花费10天时间并涉及发射10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85]。然而，有位以色列将军却质疑布什是否有足够“攻打伊朗的政治权力”，并建议以色列“通过游说民主党……和美国报纸编辑……将伊朗问题变成一个两党问题，来帮助布什铺平道路”[86]。

以色列官员也警告说，如果伊朗继续沿着核发展的道路向前走的话，他们自己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除了向伊朗发出这一信号外，这些威胁还向华盛顿施压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美国不希望以色列自己采取行动。阿里埃勒·沙龙总理在2005年底曾警告说：“以色列——并且不仅仅只是以色列——不能够接受一个核伊朗。我们有能力对付这一问题，我们正在做一切必要的准备来应对这一局面。”伦敦的《星期日时报》在2007年1月报道说，以色列飞行员正在预演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战术打击；尽管以色列官方对此予以否认，但这却强有力地提醒人们以色列对此问题的看重。就像一名以色列防务分析员对美联社所说的那样：“这一泄漏有可能是作为威慑而故意为之，并且说‘在我们作出疯狂举动之前，有人最好阻止我们这样做’。”[87]以防信息没有通达，副总理阿维格多·利伯曼在2007年2月告诉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说，如果国际社会不解决这一问题的话，“那么以色列就可能不得不单独采取行动”[88]。

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有些人毫不含糊地要求进行“政权更迭”，并且开始证明说，一个核武装起来的伊朗是不可忍受的，而美国必须准备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一问题。[89]新保守派学者对来自伊朗的威胁和使用武力，或至少威胁伊朗，使伊朗就范，尤其直言不讳。他们的根本观点在一篇题为《结束伊朗僵局，为战争而作准备》的舆论版社论文章标题中得到真切的体现，该文是由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鲁宾发表在2006年10月3日的《纽约每日新闻报》上的。同样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耶和华·穆拉维奇科在一个月后宣称：“布什总统在离任前需要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完全不能够想象伊朗将接受任何激励而放弃它追求核弹的动机。”[90]类似地，理查德·珀尔在2007年1月充满赞许地说：“我毫不怀疑，如果伊朗在布什总统任期内取得核武器对他来说

将变成明显的事实的话，他将毫不犹豫地下令进行打击。”[91]最后，诺曼·波多雷茨2007年5月30日在《华尔街日报》的在线版上，发表了一篇人们广泛进行讨论的文章，标题为《轰炸伊朗：我希望并祈祷布什将做这件事情》。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宣传来自伊朗的威胁和推进军事选择方面，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该委员会过去两年的年会，已经使伊朗问题成为聚焦点，并强调了结束伊朗核计划的必要性。[92]事实上，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合会的负责人约翰·哈吉应邀在2007年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哈吉曾在2006年告诉《耶路撒冷邮报》说：“我真希望，为了拯救西方文明，美国将同以色列一道为去除伊朗的核能力而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93]在2007年3月的会议上，哈吉没有让会议的出席者感到失望，因为他对他们说：“这是1938年；伊朗是德国，艾哈迈迪内-贾德是新的希特勒。我们必须停止伊朗的威胁，勇敢地同以色列站在一起。”他因此得到了多次起立喝彩。[94]相反，《纽约邮报》报道，前一个月当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听众们发表讲话的时候建议，在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之前，同伊朗进行接触可能是有意义的，她因而“引起了声声怨言”[95]。

或许最能够表明美国以色列公共委员会对美国的伊朗政策所拥有影响力的证据，体现在2007年3月中旬，当时国会正试图对五角大楼的开支法案附加一条规定，要求布什在攻打伊朗之前得到国会的批准。考虑到已经发生在伊拉克的结果，这一措施在国会山大受欢迎，似乎能够获得批准。这也同国会的宪法权力相一致。但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却坚决反对，因为它将这一立法看作实际上取消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选择。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到国会进行游说，并且在少数几名亲以色列众议员——加里·阿克曼、埃里奥特·恩格尔和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谢利·伯克利——的帮助之下，该规定从这一开支法案中被删除了。[96]一个月之后，当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迈克尔·卡普阿诺（Michael Capuano）被问及，为什么关于伊朗的词语从法案中删除了的时候，他用一个词回答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丹尼斯·库钦奇（Dennis Kucinich）给出了同样的评价。[97]

尽管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某些人致力于推动军事选择打击伊朗，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威胁对伊朗动武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而且进攻那个国家的核设施，实际上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98]它将进一步使中东地区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使伊朗猛烈抨击美国和它的盟国。在这一点上，华盛顿最不想要的东西就是一场针对一个

伊斯兰国家发动另外一场战争。美国军队已经在巴格达陷入困境，而伊朗实质上比伊拉克拥有更多的领土和民众。进而言之，伊朗几乎肯定不会放弃它的核计划，而是加倍努力来进行重建，就像伊拉克在以色列于1981年摧毁其初期的核能力之后所做的那样。欧洲安全问题专家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所说的下面这番话并不令人吃惊，他说："我还没有发现有哪位欧洲决策者认为，战争的选择胜过了一个核伊朗的选择。"[99]

事实上，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即如果伊朗不结束它的核计划，其中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根据2007年5月的民意调查，可能有71%的以色列人——主张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100]类似地，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核心组织，是美国仅有的那些支持对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发动战争的重要团体。2007年初，当退休将军韦斯利·克拉克被问及为什么布什政府似乎正朝向同伊朗进行战争的方向前进时，他回答道："你只需看一看以色列媒体上有什么东西。虽然犹太人社会中存有分歧，但是来自纽约的有钱人的巨大压力，正压向那些谋求官位者的身上。"由于认为以色列和一些美国犹太人正将美国推向同伊朗进行战争，顷刻间，克拉克被诋毁为反犹分子；但是就像新闻记者马休·伊格莱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所指出的那样："克拉克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进而言之，人人都知道那是真实的。"[101]更为尖锐的是，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员、退休作者斯科特·里特（Scott Ritter）在他2006年的那本《把伊朗作为目标》的书中写道："说得清楚一点：如果美国同伊朗发生战争，那么这是一场在以色列而非别的什么地方作出决定而进行的战争。"[102]简而言之，如果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对这件事情不进行施压，那么在华盛顿的圈内圈外，就几乎将不存在对伊朗进攻的严肃讨论。

最不糟糕的选择

就像在先前所指出的那样，对布什政府来说，最好的选择是排除武力威胁，并试图同伊朗达成全面协议。[103]虽然难说这一战略是否奏效，但是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在过去甚至在将来该战略都有可能奏效。"9·11"以来，伊朗在两个不同场合发出信号，显示它对同美国达成谈判决议怀有严肃的兴趣。[104]通过向美国提供在阿富汗的打击目标建议，推动美国同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进行合作，帮助搜寻和营救使团人员，伊朗帮助美国于2000年秋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战争之后，德黑兰帮助华盛顿在喀布尔安置了一个友好的政府。与此同时，伊朗总统哈塔米一再清楚地表明，他希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将阿富汗的那些事件看作朝那一方向迈出的主要步伐。

同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一样，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内部，对于利用哈塔米的话和尝试同德黑兰关系正常化存在着大量的支持。然而，政府内外的新保守派却激烈地反对这一想法；他们支持对伊朗足够强硬的政策，而且他们赢得了布什和切尼的支持。在2002年1月底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讲话中，总统奖赏伊朗在阿富汗（同美国）的合作，是把伊朗包括在声名狼藉的“邪恶轴心”之中。更有甚者，布什在随后的那些月份里清楚地表明，虽然他全身心关注的是伊拉克的政权更迭，但是他最终将指向伊朗，并且也要推翻那个政府。

尽管有美国的敌意存在，就像在1997年的克林顿政府期间伊朗曾经做过的那样，它还是在2003年春再次尝试同美国进行接触。哈塔米说他愿意就伊朗的核计划进行谈判，这样“伊朗没有开发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努力”就会迅速透明化。关于恐怖主义，他说伊朗将结束“对巴勒斯坦反对团体（哈马斯、杰哈德等）的任何物质支持”，并“向那些组织施压，以阻止其”在1967年的以色列边界之内“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伊朗的目标是使之成为“黎巴嫩境内的一个纯政治组织”。哈塔米还暗示“接受”2002年的沙特阿拉伯和平倡议，他清楚地表明，这意味着接受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此外，伊朗还将帮助使伊拉克稳定下来。作为回报，哈塔米要求美国将伊朗从邪恶轴心名单上删除，不对他的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制裁也同样必须停止，而且伊朗要求“完全拥有和平的核技术”。实质上，哈塔米推进的是一个包括所有因素的大交易解决方案。[105]

2003年5月，伊朗给出了自己的提议，那正好是紧接着美国在阿富汗看似要获得大胜之后，又似乎要在伊拉克取得大胜之际。在那一时刻，许多人相信，美国可能实际上能够对整个中东地区进行重组。事实上，那是推动德黑兰达成交易的理想时机，因为美国的声望和影响力那时正处于巅峰，而伊朗的脆弱感则十分明显。不幸的是，美国的有利地位使得布什更倾向于下命令而非做交易。那一刻，以色列不仅向布什政府施压要求将目标针对伊朗，而且新保守派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其他人也在这样做。对哈塔米提议就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全面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布什几乎没有放在眼里，而且美国官员接到不追求那一目标的指令。

如果布什政府追求了这些目标的话，人们并不知道是否能够达成一项大交易。依然有许多伊朗强硬派反对同“大撒旦”进行任何交易。然而，如果仅仅因为那一方法是最不糟糕的选择，布什就不尝试同哈塔米达成一项交易，那就太愚蠢了。尝试达成交易有可能防止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当选，而内贾德不负责任的声明和好战态度，已经使得

困难重重的局面雪上加霜。而如果接触失败了，伊朗最终获得了核武器，美国依然能够转而依靠威慑战略。

同伊朗达成一项交易可能为时还不太晚，虽然现在取得成功机会的可能性不如2001年或2003年。不仅发生在伊拉克的事件弱化了美国的谈判地位，而且伊朗领导人比以往有更多的理由不相信布什。进而言之，内贾德已取代哈塔米成为伊朗总统，而他对同布什政府进行接触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然而，还是存在引人注目的追求一项大交易的理由。它不仅依然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战略，而且美国需要伊朗的帮助来挽救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局势。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研究小组在2006年12月建议布什总统同伊朗进行谈判，而不是发生冲突的原因。[106]该研究小组的成员明白，与伊朗发生冲突——就像布什政府在过去所做的那样——给予伊朗强大的动力，去干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事务，而这绝对不符合美国的利益。[107]

实际上，在美国国内存在同伊朗进行严肃谈判的大量支持者。[108]就像所指出的那样，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军队里面的许多人将支持这种想法。就在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其报告之前，2006年11月底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5%的美国人相信，美国“应该主要通过建立更好的关系来同伊朗政府打交道”。只有22%的人赞成“以暗示美国可能使用军事力量的威胁来对它进行施压”[109]。伊拉克研究小组——一个由著名人士组成的两党委员会——主张同伊朗进行接触的建议，是另一种进行谈判得到广泛支持的显示。甚至通常与以色列所关注的事情保持同调的《纽约时报》的托马斯·L.弗里德曼，都在2007年初的时候评论道，伊朗是美国的“天然盟国”。[110]

虽然美国有好的战略理由来追求同伊朗进行一项大交易，虽然在美国国内外存在对这一政策的大量支持，但是却不可能即刻发生。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将几乎肯定试图在同伊朗进行严肃的接触之前，阻碍任何这样的努力，就像他们自1993年以来一直坚持这样做的那样。事实上，以色列游说集团不厌其烦地破坏布什政府应该同伊朗进行谈判的建议。根据《前沿》杂志的说法，报告的发布“导致来自犹太团体反对该报告要求同伊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会谈的潮水般的抗议”。然而，“圈内人士说，以色列的焦虑所针对的真正目标既不是叙利亚，也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伊朗及其核计划”[111]。

以色列游说集团也可能企图确保美国继续以军事打击威胁伊朗，除非它放弃自己的核改进计划。考虑到这种威胁在过去并不奏效，在将来也可能不会奏效，有些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特别是新保守派——将继续要求美国进行威胁。虽然布什总统在离任前依然有机会决定进攻伊朗，但是却不可能确定会不会如此。考虑到那些总统候选人

不妥协的言词，他的继任者也有一定这样做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伊朗更接近开发出核武器，并且如果那里的强硬派继续掌权的话。如果美国确实进行这样的打击，那么它将部分地是在代表以色列而这样做的，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将因为推动这样的危险政策要承担重大的责任。而且这一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结论

与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入侵伊拉克的悲剧性决定，以及同叙利亚的对抗性方法一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伊朗政策的影响力，已经伤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通过反对伊朗同美国的缓和，更不用说反对它们之间的合作，以色列游说集团已经加强了伊朗强硬派的地位，因此使得以色列的安全问题更加糟糕。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消极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就像下一章所显示的那样，以色列游说集团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的影响力，也对美国和以色列造成相当的伤害。

---

[1] 关于伊朗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详情，登录www.nti.org/e_research/profiles/Syria/index.html，核威胁倡议组织（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的“Iran Profil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ran's Strategic Weapons Programmes*： *A Net Assess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5），以及Uzi Rubin，“The Global Reach of Iran's Ballistic Missiles，” *Memorandum no.86*（Tel Aviv：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November 2006）。

[2] “Iranian President at Tehran Conference： ‘Very Soon， This Stain of Disgrace [i.e.， Israel] Will Be Purged from the Center of the Islamic World—and This Is Attainabl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Special Dispatch Series no.1013， October 28， 2005.关于艾哈迈迪-内贾德演说译文更详细的讨论，参见第三章中的注释88。

[3] 虽然一个国家的实际军事能力取决于它如何有效地把这些资产转化为装备精良的熟练军队，但是潜在军事实力最好的两个指标却是人口规模和财富。伊朗比它在波斯湾地区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伊拉克，实质上拥有更多的人口和财富。例如，1989年伊朗在人口上以大约3：1的优势超过伊拉克（5450万人比1760万人）；2006年则以大约2.4：1的优势超过伊拉克（6500万人比2680万人）。U.S.Census Bureau，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Updated August 24， 2006.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财富的一个衡量指标，伊朗在1985年以4：1的优势超过伊拉克（1798亿美元比442亿美元）；2000年以3.9：1的优势超过伊拉克（1010亿美元比259亿美元）。World Bank，“Country at a Glance”（Iran and Iraq）， August 13， 2006；以及 World Bank Group，“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Iran Data Profile and Iraq Data Profile， April 2006。

[4] 这是阿莉莎·J.鲁宾（Alissa J.Rubin）于2006年12月10日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也可参见Geoffrey Kemp，“Iran and Iraq： The Shia Connection， Soft Power， and the Nuclear Factor，” Special Report 156（Washington， DC： U.S.Institute of Peace， November 2005）；“Iran Grows Strong， the World Yawns，” *Ha'aretz*editorial， December 13， 2006； Liz Sly，“Iranian Influence Soaring in Iraq，” *Chicago Tribune* ， March 8， 2007； Megan K.Stack and Borzou Daragahi，“Iran Was on Edge； Now It's on Top，” *Los Angeles Times* ， February 18， 2006，以及 Edward Wong，“Iran Is in Strong Position to Steer Iraq's Political Future，” *New York Times* ， July 3， 2004。

[5] 引自Trita Parsi，“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1970—2001： Ideological Calculus or Strategic Rivalry？”（PhD di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pril 2006）， p.413，以及pp.159—162， 262—263， 275—276， 300—301， 392—393， 406—411。也可参见Trita Parsi，“Israel and the Origins of Iran's Arab Option： Dissection of a Strategy Misunderstood，” *Middle East Journal* 60， no.3（Summer 2006），以及Trita Parsi，“The Geo-Strategic Roots of the Israeli-Iranian Enmity，” *Heartland-Eurasian Review of Geopolitics* 4（Summer 2005）。

[6] Bernard Lewis，“August 22： Does Iran Have Something in Store？” *Wall Street Journal* ， August 8， 2006.

[7] 关于威慑对反对核伊朗所起作用的仔细而令人信服的分析，参见Barry R.Posen，“A Nuclear Armed Iran：

A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Policy Problem”（Washington， DC： Century Foundation， 2006）； Barry R.Posen，“We Can Live with a Nuclear Iran，”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27， 2006。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虽然在2007年1月提出这一观点，但是却不得不很快收回他的言论，因为在西方，如果说能够对核伊朗进行威慑的话，那么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参见Elaine Sciolino and Katrin Bennhold，“Chirac Strays from Assailing a Nuclear Iran，”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1， 2007。

[8] Ray Takeyh，“Iran's Nuclear Calculations，” *World Policy Journal 20*， no.2（Summer 2003）.

[9] 毕竟，这是伊拉克1981年在以色列人消除其初期核能力后所做的事情。参见Dan Reiter，“Preventive Attacks Against Nuclear Programs and the ‘Success’ at Osiraq，”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12*， no.2（ July 2005）。

[10] Zbigniew Brzezinski，“Do Not Attack Ira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April 26， 2006； James Fallows，“Will Iran Be Next？” *Atlantic* ， December 2004，以及 Michael J.Mazarr，“Strike Out： Attacking Iran Is a Bad Idea，” *New Republic* ， August 15， 2005。

[11] Michael Smith and Sarah Baxter，“US Generals ‘Will Quit’ if Bush Orders Iran Attack，” Sunday Times（London）， February 25， 2007.

[12] Parsi，“Israel-Iranian Relations，” pp.285—297， 354—361， 400—401； Gary Sick，“The Clouded Mirr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1979—1999，” in ed.John L.Esposito and R.K.Ramazani， *Iran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204.

[13] David Hoffman，“Israel Seeking to Convince U.S.That West Is Threatened by Iran，” *Washington Post* ， March 13， 1993.

[14] Parsi，“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402.关于以色列对双重遏制形成的影响力的详细说明，参见Parsi，“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p.297—299，以及Kenneth M.Pollack， *The Persian Puzzle*： *The Conflict Between Iran and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pp.261—265。

[15] Pollack， Persian Puzzle， p.269.

[16] 关于双重遏制的官方观点，参见Martin Indyk，“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Middle East，”向索里夫研讨会发表的演讲，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1993年5月18日。也可参见Sick，“Clouded Mirror，” pp.198—199， 209n13。

[17] 关于拉夫桑贾尼同美国进行接触的努力，参见Ali M.Ansari， *Confronting Iran*：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ext Great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erseus Books， 2006）， pp.115—146； Parsi，“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p.257—266； Pollack， *Persian Puzzle* ， chaps.9—10，以及R.K.Ramazani，“Reflections on Iran's Foreign Policy：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s，’” in Esposito and Ramazani， *Iran at the Crossroads* ， pp.217—222。

[18] Parsi，“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p.298—299.对双重遏制的有益批评包括F.Gregory Gause III，“The Illogic of Dual Containment，” *Foreign Affairs 73*， no.2（March/April 1994），以及 Barbara Conry，“America's Misguided Policy of Dual Containment in the Persian Gulf，” Foreign Policy Briefing no.33（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November 10， 1994）。

[19]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Brent Scowcroft， *Differentiated Containment*： *U.S.Policy Toward Iran and Iraq*，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Study Group on Gulf Stability and Securit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7）， pp.5—32，以及Gary Sick，“Rethinking Dual Containment，” *Survival 40*， no.1（Spring 1998）。

[20] Parsi，“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p.304—305； Pollack， *Persian Puzzle* ， pp.269—270.

[21] Parsi，“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305.

[22] 所引用的波拉克的话见Parsi，“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308。据报道，波拉克曾补充说，克林顿政府“只是通过德黑兰对待以巴冲突态度的棱镜来看待伊朗的”。引自Parsi，“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309。

[23] AIPAC，“Comprehensive U.S.Sanctions Against Iran： A Plan for Action，” Washington， DC， April 2， 1995.

[24] Pollack， *Persian Puzzle* ， pp.270—271.

[25] 以下对美国大陆石油公司这一案例和克林顿政府对伊朗实施各种制裁的讨论，基于Sasan Fayazmanesh，“The Politics of the U.S.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Ira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5*， no.3（Summer 2003）； Herman Franssen and Elaine Morton，“A Review of US Unilateral Sanctions Against Iran，” *Middle East Economic Survey 45*， no.34（August 26， 2002）； Dilip Hiro， *Neighbors Not Friends*： *Iraq and Iran After the Gulf Wa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chap.9； Kenneth Katzman，“The Iran-Libya Sanctions Act（ILS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11， 2006；

Laurie Lande，“Second Thoughts，” *International Economy 11*， no.3（May/June 1997）； Pollack， *Persian Puzzle* ， chaps.9—10，以及Sick， “Clouded Mirror，” pp.198—207。

[26] “Remarks at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Dinner in New York City—President Bill Clinton Speech—Transcript，” April 30， 1995，登录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2889/is_n18_ v31/ai_17157196。也可参见 Agis Salpukas， “Conoco's Deal in Iran Faces Board Hurdle，” *New York Times* ， March 14， 1995，以及Daniel Southerland and Ann Devroy， “Clinton Bars U.S.Oil Pacts with Iran，” *Washington Post* ， March 15， 1995。

[27] Parsi， “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310.

[28]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行政命令12959号，1995年5月8日。

[29] Todd Purdum， “Clinton to Order a Trade Embargo Against Tehran，” *New York Times* ， May 1， 1995； “Remarks at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30] Pollack， *Persian Puzzle* ， p.273.

[31] Parsi， “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p.308， 311， 329—330.

[32] A.M.Rosenthal， “Plugging the Leak，” *New York Times* ， March 14， 1995.

[33] Parsi， “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312.根据另外一个消息来源的说法，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声称，国会“一句一句地与我们共同”起草这项立法。Franssen and Morton， “Review of US Unilateral Sanctions.”也可参见 George Moffett， “Push to Widen Libya Sanctions Riles US Alli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January 24， 1996。

[34] Pollack， *Persian Puzzle* ， p.287.

[35] 引自Brzezinski and Scowcroft， *Differentiated Containment* ， p.6.

[36] James Schlesinger， “Fragmentation and Hubris： A Shaky Basis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National Interest 49*（Fall 1997）：5.

[37] Fayazmanesh， “Politics of the U.S.Economic Sanctions，” pp.231—235.

[38] Reuters， “Call for ‘Détente’ as Tehran Swears in a Moderate President，” *Australian* ， August 5， 1997； Douglas Jehl， “Iranian President Calls for Opening Dialogue with U.S.，”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5， 1997，以及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Iranian President Mohammad Khatami，” *CNN.com* ， January 7， 1998.

[39] “Interview with Khatami”，以及 Parsi， “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p.330—336.

[40] 关于克林顿政府同以色列的协商，参见Pollack， *Persian Puzzle* ， p.319。关于克林顿政府为回应哈塔米建议而采取的步骤更全面的讨论，参见Hiro， Neighbors， chap.10； Parsi， “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p.331—345； Pollack， *Persian Puzzle* ， pp.319—342，以及Sick， “Clouded Mirror，” pp.200—206。

[41] 引自Parsi， “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329。

[42] Ansari， *Confronting Iran* ， chap.5； Hiro， *Neighbors* ， pp.235—240； Pollack， *Persian Puzzle* ， pp.325—342，以及Ray Takeyh， *Hidden Iran： Paradox and Power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pp.44—54， 110—116。

[43] Yerah Tal， “U.S.， Iran in Secret Talks，” *Ha'aretz* ， December 15， 1997.

[44] Sick， “Clouded Mirror，” 210n32.

[45] Eli Lake， “Israel， U.S.Jewish Lobby Disagree on Iran Sanctions，”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3， 2000.

[46] 引自Parsi， “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298。

[47] 引自Parsi， “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403。20世纪90年代初，斯奈在提出理由说伊朗是以色列的致命威胁方面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参见Parsi， “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p.286。

[48] 引自Alan Sipress， “Israel Emphasizes Iranian Threat，”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7， 2002。这篇写于沙龙抵达华盛顿时的文章清楚表明，耶路撒冷正以双倍的努力来警告布什政府说，伊朗所构成的威胁比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政权更大。也可参见Seymour M.Hersh， “The Iran Game，” *New Yorker* ， December 3， 2001； Peter Hirschberg， “Background： Peres Raises Iranian Threat，” *Ha'aretz* ， February 5， 2002； David Hirst， “Israel Thrusts Iran in Line of US Fire，” *Guardian* ， February 2， 2002； “Israel Once Again Sees Iran as a Cause for Concern，” *Ha'aretz* ， May 7， 2001； Dana Priest， “Iran's Emerging Nuclear Plant Poses Test for

U.S.，” *Washington Post* ，July 29， 2002，以及 Ze'ev Schiff，“Iran：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Ha'aretz* ，May 31， 2002。

[49] Stephen Farrell， Robert Thomson， and Danielle Haas，“Attack Iran the Day Iraq War Ends，Demands Israel，” *Times* （London）， November 5， 2002； Stephen Farrell and Robert Thomson，“The Times Interview with Ariel Sharon，” ibid.

[50] 引自“Ambassador to U.S.Calls for ‘Regime Change’ in Iran， Syria，” *Ha'aretz* ，April 28， 2003。

[51] Steven R.Weisman，“New U.S.Concerns on Iran's Pursuit of Nuclear Arms，” *New York Times* ，May 8， 2003.

[52] Shimon Peres，“We Must Unite to Prevent an Ayatollah Nuk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5，2003.

[53] Jim Lobe，“US Neo-Cons Move Quickly on Iran，” Inter Press Service， May 27， 2003.

[54] Marc Perelman，“Pentagon Team on Iran Comes Under Fire，” *Forward* ，June 6， 2003.也可参见Marc Perelman，“White House Is Aiming to Raise Iranian Nukes at U.N.Security Council，” *Forward* ，May 9，2003，以及Marc Perelman，“New Front Sets Sights on Toppling Iran Regime，” *Forward* ，May 16， 2003。

[55] William Kristol，“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Weekly Standard* ，May 12， 2003.

[56] Michael Ledeen，“The Others，” *National Review Online* ，April 4， 2003.雷丁还在2003年4月中旬写道：“只要在叙利亚和伊朗的政权继续掌权，那么赢得反恐战争就是不可能的。”他接着说：“好消息是，这两个政权都经不起政治上的打击。”引自Ronald Brownstein，“Those Who Sought War Are Now Pushing Peace，”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7， 2003。也可参见 Alex Koppelman，“Iranian Regime Change： ‘Faster， Please！’” *Salon.com* ，January 15， 2007。

[57] Daniel Pipes and Patrick Clawson，“Turn Up the Pressure on Iran，” *Jerusalem Post* ，May 21，2003； Lawrence Kaplan，“Iranamok，” *New Republic* ，June 9， 2003.

[58] 为这次会议——会议标题为“The Future of Iran： Mullahcracy， Democracy， and the War on Terror”——做广告的副本，可以登录www.aei.org/events/event ID.300/event_detail.asp。可参见Jordan Green，“Neocons Dream of Lebanon，” *ZNet* （online）， July 23， 2003，以及 Lobe，“Neo-Cons Move Quickly”。

[59] Connie Bruck，“Exiles： How Iran's Expatriates Are Gaming the Nuclear Threat，” *New Yorker* ，March 6， 2006； Lobe，“Neo-Cons Move Quickly”； Ron Perelman，“New Front Sets Sights on Toppling Iran Regime，” *Forward* ，May 17， 2003，以及“Shah of Iran's Heir Plans Overthrow of Regime，” *Human Events* （online）， May 1， 2006。

[60] 所有的信息来自“Senator Brownback Announces Iran Democracy Act with Iranian Exiles”，伊朗裔美国人全国理事会（National Iranian American Council）新闻稿，2003年5月20日，以及“Iran Democracy Act Passed， but No Money to Opposition and Satellite TV's”，伊朗裔美国人全国理事会新闻稿，2003年7月24日。

[61] Lobe，“Neo-Cons Move Quickly.”

[62] Michael Ledeen，“The Iranian Hand，”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6， 2004.

[63] “President Discusses War on Terror and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讲话（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2006年3月20日）。

[64] 引自Ori Nir，“Groups to Bush： Drop Iran-Israel Linkage，” *Forward* ，May 12， 2006。

[65] Associated Press，“John McCain Jokes About Bombing Iran at U.S.Campaign Stop，”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19， 2007.

[66] “The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Israel-U.S.Ties，” *Jerusalem Post* ，May 24， 2007.

[67] Nir，“Groups to Bush.” 也可参见 James D.Besser and Larry Cohler-Esses，“Iran-Israel Linkage by Bush Seen as Threat，” *Jewish Week* ，April 21， 2006； James D.Besser，“JCPA Delegates Spurn Israel Demands，” *Jewish Week* ，March 2， 2007；“Groups Fear Public Backlash over Iran，” *Forward* ，February 2， 2007；Ron Kampeas，“As Jewish Groups Huddle， Quagmire in Iraq Undermines Resolve on Iran，” *JTA.org* ，February 28， 2007，以及 Jim Lobe，“Jewish Community Worried About Iran Backlash，” Inter Press Service，May 10， 2006。

[68] 引自Besser and Cohler-Esses，“Iran-Israel Linkage”。

[69] 引自Ori Nir，“Bush Overture to Iran Splits Israel， Neocons，” *Forward* ，June 9， 2006。

[70] Gareth Porter，“Strategy Paper Reveals Bush Won't Attack Iran，” Inter Press Service， June 20，

2006.

[71] James Bamford，“Iran： The Next War，” *Rolling Stone* ，July 24，2006；Seymour M.Hersh，“The Coming Wars，” *New Yorker* ，January 24/31，2005；Seymour M.Hersh，“The Iran Plans，” *New Yorker* ，April 17，2006；Seymour M.Hersh，“Last Stand，” *New Yorker* ，July 10，2006；Seymour M.Hersh，“The Redirection，” *New Yorker* ，March 5，2007，以及“Iran： The Next Strategic Target，” 西摩·赫什采访Amy Goodman of Democracy Now！ *AlterNet.org* ，January 19，2005。也可参见Peter Baker，Dafna Linzer，and Thomas E.Ricks，“U.S.Is Studying Military Strike Options on Iran，” *Washington Post* ，April 9，2006；Perelman，“Pentagon Team on Iran”，以及 Craig Unger，“From the Wonderful Folks Who Brought You Iraq，” *Vanity Fair* （online），March 2007。本段落中所有引用的内容均来自Hersh，“Coming Wars”。

[72] 本段落中的信息取自Helene Cooper and Mark Mazzetti，“To Counter Iran's Role in Iraq，Bush Moves Beyond Diplomac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2007；Tony Karon，“The Problem with Confronting Iran，” *Time* ，January 16，2007；Eli Lake，“GIs Raid Iranian Building in Irbil，” *New York Sun* ，January 12，2007；David E.Sanger，“Opening a New Front in the War，against Iranians in Iraq，”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2007；David E.Sanger and Michael R.Gordon，“Rice Says Bush Authorized Iranians' Arrest in Iraq，”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3，2007，以及Trita Parsi，“Bush's Iraq Plan： Goading Iran into War，” Inter Press Service，January 17，2007。

[73] Helene Cooper，“U.S.Not Pushing for Attack on Iran，Rice Says，” *New York Times* ，June 1，2007.也可参见Arnaud de Borchgrave，“Guns of August？”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June 4，2007；Steven C.Clemons，“Cheney Attempting to Constrain Bush's Choices on Iran Conflict： Staff Engaged in Insubordination Against President Bush，” *Washington Note weblog* ，May 24，2007，登录www.thewashingtonnote.com/archives/002145.php；Michael Hirsh and Mark Hosenball，“Cheney vs.Rice： A Foreign-Policy Showdown，” *MSNBC.com* ，June 11，2007，以及 Glenn Kessler，“Cheney Backs Diplomacy on Iran Program，Rice Affirms，” *Washington Post* ，June 2，2007。

[74] 所引用的这些内容来自2003年10月21日的《协议声明》（Agreed Statement），副本参见国际战略研究所的*Iran's Strategic Weapons Programmes* ，p.19。伊朗和欧盟三国之间谈判的详情参见Ibid.，chap.1；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Strategic Survey，2004/5（New York： Routledge，May 2005），pp.196—200，以及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Strategic Survey*，2006（New York：Routledge，2006），pp.210—222。

[75] Kaveh L.Afrasiabi，“The Myth of the EU Olive Branch，” *Asia Times Online* ，August 13，2005；Ansari，*Confronting Iran* ，chap.7；British American Security Information Council，“EU3 Negotiations with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Not Out of the Woods Yet and Time Is Short，Very Short，” BASIC Notes：Occasional Pap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July 2005，以及 Hersh，“Last Stand”。

[76] Elissa Gootman，“Security Council Approve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over Nuclear Program，”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2006；Colum Lynch，“Sanctions on Iran Approved by U.N.，”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4，2006.也可参见 Nazila Fathi，“Iran Is Defiant，Vowing to U.N.It Will Continue Nuclear Effort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2006；Ron Kampeas，“The Iran Sanctions Package： Some Assembly Required，Teeth Not Included，” *JTA.org* ，December 25，2006；Nasser Karimi，“Iran Rebuffs U.N.，Vows to Speed Up Uranium Enrichment，”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5，2006，以及Neil King，“U.S.Bid to Limit Iran Gets Wary Respons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9，2006。

[77] Daniel Bilefsky，“Europe Approves More Sanctions Against Iran，” *New York Times* ，April 24，2007；Daniel Dombey and Gareth Smyth，“New EU Sanctions Raise Pressure on Iran，” *Financial Times* ，April 23，2007；Warren Hoge，“U.N.Council Gets New Draft Decree on Iran Nuclear Sanctions，” *New York Times* ，March 16，2007；Colum Lynch，“U.N.Backs Broader Sanctions on Tehran，” *Washington Post* ，March 26，2007；Colum Lynch，“U.S.，Allies Agree to Drop Proposed Iran Travel Ban，” *Washington Post* ，March 10，2007，以及Thom Shanker，“Security Council Votes to Tighten Iran Sanctions，” *New York Times* ，March 25，2007。

[78] Hersh，“The Redirection.”

[79] Nathan Guttman，“Activists Set to Push New Sanctions against Iran，” *Forward* ，March 9，2007.也可参见 Eli Lake，“AIPAC Will Press for Hard Line on Iran Regime，” *New York Sun* ，March 7，2007；Ian Swanson，“Chairmen Try to Tighten Screws on Iran，” *The Hill* （online），March 14，2007，以及Steven R.Weisman，“U.S.Tightens Financial Squeeze on Ira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20，2007。

[80] Richard Beeston and James Bone，“Hostage Fears over Troops Seized by Iran，” *Times* （London），March 24，2007；Sarah Lyall，“Iran Seizes 15 Britons on Patrol in Persian Gulf，” *New York Times* ，March 24，2007；Vali Nasr and Ray Takeyh，“What We Can Learn from Britain About Iran，” *New York Times* ，April 5，2007，以及Kevin Sullivan，“15 Britons Taken to Tehran as Iran Dispute Intensifies，” *Washington Post* ，March 25，2007。

[81] Guttman，“Activists Set to Push”；Lake，“AIPAC Will Press”，以及 Weisman，“U.S.Tightens Financial Squeeze”。关于欧洲不愿意减少同伊朗之间的交易，参见Steven R.Weisman，“Europe Resists U.S.Push

to Curb Iran Tie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2007。

[82] 本段落中所有引用的内容均来自Hassan M.Fattah，“Saudi King Condemns U.S.Occupation of Iraq，” *New York Times* ，March 28，2007。也可参见William J.Broad and David E.Sanger，“With Eye on Iran，Rivals Also Want Nuclear Power，” *New York Times* ，April 15，2007；Rachel Bronson，“Good Neighbors：What Saudi Arabia Wants，” *New Republic Online* ，April 3，2007；Helene Cooper，“U.S.Feels Sting of Winning Saudi Help with Other Arabs，” *New York Times* ，March 30，2007；Helene Cooper and Jim Rutenberg，“A Saudi Prince Tied to Bush Is Sounding Off-Key，” *New York Times* ，April 29，2007；Hassan M.Fattah，“Bickering Saudis Struggle for an Answer to Iran's Rising Influence in Middle Eas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2，2006，以及 Jonathan Steele，“As US Power Fades，It Can't Find Friends to Take on Iran，” *Guardian* ，February 2，2007。

[83] “Israeli PM Olmert Addresses Congress，” *Washington Post* ，May 24，2006.奥尔默特走访了白宫，并且对布什总统表明了他对伊朗的态度。参见“President Bush and Prime Minister Ehud Olmert of Israel Participate in Joint Press Availability，”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6年5月23日。 以色列学者本尼·莫里斯也提出了一个具有启示性的观点，即如果伊朗获得了核武器，以色列会怎么样。参见Benny Morris，“Essay： This Holocaust Will Be Different，”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8，2007，以及Benny Morris，“The Second Holocaust Is Looming，” *israelinsider .com* ，January 15，2007。

[84] Lally Weymouth，“Israel's P.M.on Iran，Lebanon，Palestinian State，” *Newsweek*interview，*MSNBC.com* ，November 11，2006.也可参见Uzi Benziman，“Trigger-Happy（On the Button），” *Ha'aretz* ，December 17，2006；“Iran Complains to UN Security Council over Sneh Comments，” *Ha'aretz* ，November 11，2006，以及 Ronny Sofer，“IDF： Only US Operation Can Stop Iran，” *Ynetnews.com* ，October 12，2006。

[85] 引自Gil Yaron，“Missile Raid Would Hit Iran Nuclear Plants—Olmert，” *Ynetnews.com* ，April 28，2007。

[86] Oded Tira，“What to Do with Iran？” *Ynetnews.com* ，December 30，2006.

[87] 所引用的沙龙的话来自Uzi Mahnaimi and Sarah Baxter，“Israel Readies Forces for Strikes on Nuclear Iran，” *Sunday Times* （London），December 11，2005。更新的报道（以及以色列的否认）来自Uzi Mahnaimi and Sarah Baxter，“Revealed： Israel Plans Nuclear Strike on Iran，” *Sunday Times* ，January 7，2007，以及 Uzi Mahnaimi and Sarah Baxter，“Israel Denies Planning Iran Nuke Attack，” Associated Press，January 7，2007。也可参见Richard Boudreaux，“Israel Sounds Alarm on Iran's Nuclear Efforts，”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7，2007，以及 Ilene Prusher，“Israel Buzzes over Notion of Attacking Ira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6，2007。

[88] “‘Israel May Have to Act Alone，’” 德国《明镜周刊》对阿维格多·利伯曼的采访，*Spiegel Online* ，February 12，2007。

[89] 关于这一事件卷帙浩繁的文献的样本，参见Stewart Ain，“Israel Urging U.S.to Stop Iran Nukes，” *Jewish Week* ，October 7，2005；Martin S.Indyk，“Iran's Bluster Isn't a Bluff，”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2005；Ron Kampeas，“With Time Short on Iran Nukes，AIPAC Criticizes Bush Approach，” *JTA.org* ，December 2，2005；Yossi Klein Halevi and Michael B.Oren，“Israel's Worst Nightmare： Contra Iran，” *New Republic* ，February 5，2007；Frederick Kempe，“Elie Wiesel Sounds the Alarm Regarding Iran，”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20，2006；Dafna Linzer，“Pro-Israel Group Criticizes White House Policy on Iran，”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5，2005；Ori Nir，“Israeli Aides Warn U.S.Not to Drop Ball on Iran，” *Forward* ，December 9，2005；Ori Nir，“Jewish Groups Press for Iran Sanctions，” *Forward* ，September 23，2005；Ori Nir，“Groups Push for anctions，Fear U.S.Will Falter on Iran，” *Forward* ，September 1，2006；Marc Perelman，“Groups Head to Emirates，as Worries Grow over Iran，” *Forward* ，January 19，2007，以及Brad Sherman，“The Unmet Threat of a Nuclear Iran，” *Forward* ，October 27，2006。

[90] Joshua Muravchik，“Operation Comeback，” *Foreign Policy 157*（November/December 2006）：68.

[91] 引自Yossi Melman，“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Ha'aretz* ，January 24，2007。

[92] Shmuel Rosner，“AIPAC Conference Focuses on Hamas and Iran，” *Ha'aretz* ，March 7，2006；Guttman，“Activists Set to Push.” Also see “Iran's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登录www.aipac.org/Publications/AIPACAnalyses-IssueBriefs/Irans_Pursuit_of_Nuclear_Weapons（1）.pdf。

[93] 引自James D.Besser，“Hardline Pastor Gets Prime AIPAC Spot，” *Jewish Week* ，March 9，2007。

[94] 引自“Christians for Israel，” *Jerusalem Post*editorial，March 14，2007。

[95] Maggie Haberman，“Israel Fans Groan over Hill Speech，” *New York Post* （online），February 2，2007.

[96] Jonathan Allen，“Iran Language Draws Opposition as Democrats Near Agreement on Supplemental，” *CQ Today*，March 8，2007；“Dems Abandon War Authority Provision，” Associated Press，March 13，2007；Eli Lake，“Democrats Retreat on War Funds，” *New York Sun*，March 14，2007；“Engel's Finest Hour，” *New York Sun*editorial，March 14，2007，以及John Walsh，“Why Is the Peace Movement Silent About AIPAC？” *CounterPunch.org*，April 17，2007。

[97] 所引用的卡普阿诺的话参见Walsh，“Peace Movement Silent，”该文也讨论了库钦奇的回应。

[98] Leon Hadar，“Osirak Redux？” *American Conservative*，January 15，2007；Gideon Rachman，“Talk of Another Preventiv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Folly，” *Financial Times*，November 21，2006，以及Scott Ritter，*Target Iran*：*The Truth About the White House's Plans for Regime Change*（New York：Nation Books，2006），pp.203—206。

[99] 引自Jim Lobe，“Pressure Grows on Bush to Engage Iran Directly，” *Antiwar.com*，May 26，2006。

[100] 调查由巴利安大学（Bar-Ilan University）以及反诽谤联盟进行；该调查发现，“71%的以色列人相信，如果制止伊朗核计划的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应该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参见Aluf Benn，“Poll：71% of Israelis Want U.S.to Strike Iran if Talks Fail，” *Ha'aretz*，May 18，2007。

[101] 所引用的克拉克的原话参见“The Huffington Post” on January 4，2007，登录www.huffingtonpost.com/arianna-huffington/dc-notes-wes-clark-is-_b_37837.html。所引用的伊格莱西亚斯的话来自Matthew Yglesias，“Smears for Fears，” *American Prospect*（online），January 23，2007。也可参见James D.Besser，“Gen.Clark's Controversy，” *Jewish Week*，January 12，2007；Nathan Guttman，“Top Dem Wesley Clark Says ‘N.Y.Money People’ Pushing War with Iran，” *Forward*，January 12，2007，以及 Shmuel Rosner，“The General and the ‘Money People，’” *Ha'aretz*，January 9，2007。虽然《前沿》周报中的一篇文章讨论过美国犹太人社会担心他们被指责应对一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负责，然而却承认说：“犹太人团体的确在对采取强硬的伊朗路线施压中起到主要作用。”该文还指出：“许多鼓动性的努力，即使没有同以色列联系在一起，还是带着不可磨灭的犹太人痕迹。”参见“Groups Fear Public Backlash”。

[102] Ritter，Target Iran，211.

[103] 关于同伊朗之间的大交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精彩讨论，参见Flynt Leverett，*Dealing with Tehran*：*Assessing U.S.Diplomatic Options Toward Iran*（New York：Century Foundation，2006），pp.19—25。

[104] 接下来关于伊朗与布什政府建立联系失败的讨论基于Gregory Beals，“A Missed Opportunity with Iran，” *Newsday*（online），February 19，2006；Bruck，“Exiles”；Leverett，*Dealing with Tehran*，pp.11—16；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What We Wanted to Tell You About Iran，”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2，2006；Glenn Kessler，“In 2003，U.S.Spurned Iran's Offer of Dialogue，” *Washington Post*，June 18，2006；Nicholas D.Kristof，“Diplomacy at Its Worst，” *New York Times*，April 29，2007；Jim Lobe，“Bush Administration Divided over Road to Tehran，” *Foreign Policy in Focus*，August 11，2003；Jim Lobe，“Bush Administration Paralyzed over Iran，” *Asia Times Online*，August 9，2003；Gareth Porter，“How Neocons Sabotaged Iran's Help on al-Qaeda，” *Antiwar.com*，February 23，2006；Gareth Porter，“Burnt Offering，” *American Prospect*，June 6，2006；Gareth Porter，“Neocons Blocked 2003 Nuclear Talks with Iran，” *Antiwar.com*，March 29，2006，以及 Gareth Porter，“Iran Proposal to US Offered Peace with Israel，” *Antiwar.com*，May 25，2006。

[105] 本段落中所描述的2003年的建议，在转交给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一份伊朗文件中作了详细说明。文件副本可登录《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夫的网站http：//kristof.blogs.nytimes.com/。

[106] James A.Baker III and Lee H.Hamilton，co-chairs，*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New York：Vintage Books，2006），pp.50—52.

[107] 关于阿富汗，参见David Rohde，“Iran Is Seeking More Influenc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7，2006。

[108] Jim Lobe，“Pressure Grows on Bush，” *Antiwar.com*，May 26，2006； Steven R.Weisman，“U.S.Is Debating Talks with Iran on Nuclear Issue，” *New York Times*，May 27，2006.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犹太人中间对美国攻打伊朗的支持已急剧下降。2005年秋，有49%的犹太人支持采取军事行动；2006年秋季，只有38%的犹太人支持采取这种行动。“Poll：U.S.Jews Back Strike against Iran—by Israel，” *Forward*，October 27，2006.

[109] Steven Kull，“Americans Assess U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World-PublicOpinion.org poll，由“国际政策态度”（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项目举办，2006年12月7日。 也可参见“Baker-Hamilton Redux：The U.S.Public Remains Enthusiastic About the Bipartisan Proposals，” Pew Research Center，May 29，2007。

[110] Thomas L.Friedman，“Not-So-Strange Bedfellow，” *New York Times*，January 31，2007.

[111] Marc Perelman，“As Washington Studies Iraq Report，Jerusalem Frets over Tehran Talk，” *Forward*，December 15，2006.也可参见Nathan Guttman，“Groups Mute Criticism of Iraq Report，” *Forward*，

December 15， 2006。

第十一章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第二次黎巴嫩战争

2006年夏，以色列打了一场针对黎巴嫩的34天的战争。7月12日，控制南黎巴嫩的什叶派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了一次跨越边界的进攻，杀死并抓获了数名以色列士兵。作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发动了一场主要的空袭行动，空袭行动杀死了11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而且有大约1/3是儿童。这次空袭行动也对黎巴嫩的基础设施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这些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办公楼、公寓楼、煤气站、工厂、水泵站、机场跑道、住家和超市。[1]虽然几乎没有哪个人挑战以色列对进攻进行反应或进行自卫的权利，但是它的过度反应在全球范围遭到了普遍的谴责。

尽管得到了美国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以色列却没有能够达成其军事和政治目标，而黎巴嫩真主党受欢迎的程度和声望则从战争中得到提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丹·哈鲁茨（Dan Halutz）中将数月后辞职，而且由前最高法院法官伊利亚胡·威诺格拉德（Eliyahu Winograd）所主持的以色列政府官方调查，随后发布了一份有关以色列计划和处理这场战争的措辞严厉的评估报告。威诺格拉德委员会尤其发现，以色列领导人没有能够“考虑总体范围的选择”，“没有能够使军事行动的方式及其目标适应地面的现实”，追求那些“并不清楚和不能够达成的”目标。[2]

这场战争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主要挫折。它削弱了贝鲁特的西尼乌拉政府（Siniora government），而西尼乌拉政府在2005年雪杉革命[3]之后的当选，曾是布什政府中东政策为数不多的成功之一。战争巩固了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朗之间的非正式联盟，并且使整个地区的反美态度激化，从而削弱了反恐战争，使得美国就伊拉克和伊朗问题形成地区共识的努力变得复杂化。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虽然以色列领导人要承担应对战争不当的主要责任，但是美国在战争开始之前以及战争期间通过向他们提供无条件的支持，则怂恿了这些错误的发生。早在7月12日战争开始之前，以色列就已经向布什政府通报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计划，而华盛顿则对此心照不宣地大开方便之门。与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不同，美国没有在战争期间批评以色列的行动，相反却给予它宝贵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在整个战争期间，以色列游说集团都一直在努力使美国同以色列站在一起。

布什政府对以色列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挑衅而作出的过度反应进行

支持，不存在什么战略理由，而且也不存在不得不接受支持以色列所作所为的道德理由。美国对以色列不加批评的支持，也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就像威诺格拉德报告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其领导人研究过“整体范围的选择”，那么以色列的情况将要比现在好得多。换言之，当以色列一开始勾勒它进攻黎巴嫩的计划的时候，如果美国敦促它采取不同的行动路线的话，那么美国将会是以色列的一个更好的盟国。如果美国这样做了的话，那么以色列将被迫想出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挑衅进行更棒的回应，并可能避免了以色列随后在黎巴嫩遭遇的崩溃局面。

以色列人及其许多美国支持者不想承认，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以色列游说集团都曾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他们提供了针对这一指控的数种替代性解释。就像在其他情况中出现的情形那样，有些以色列的捍卫者认为，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的无畏支持，反映了美国公众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深深承诺。按照这种观点，美国人民要求美国领导人完全支持以色列，因此布什总统和国会只是屈从于人民的意志而已。其他的人则认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是作为美国的代理国进行的。按照事件的这种版本的说法，布什政府是战争背后的推动力，而且其忠实的以色列代理者得到了照令行事的命令。虽然对某些观察者来说，这些替代性解释直觉上似乎是合理的，但是这两种解释都与能够得到的证据不相符合。

战前规划

虽然在过去的40年里，以色列曾对黎巴嫩进行过许多的主要军事打击，但是它此前只在黎巴嫩领土上进行过一次真正的战争。在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的领导下，以色列于1982年6月入侵黎巴嫩。以色列国防军最终离开黎巴嫩，已是18年之后的事情了，而且正是黎巴嫩真主党将其驱赶出黎巴嫩的。即使在以色列撤离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依然是死敌，而且它们之间的零星冲突继续在以黎边界发生。正是2006年7月12日发生的这样一场冲突，引发了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第二次战争。

由于黎巴嫩真主党从叙利亚，尤其是从伊朗获得了大量导弹和火箭储存，以色列在7月12日诱使战争爆发之前的数月里，一直在规划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出身名门的以色列战略家杰拉尔德·斯坦伯格（Gerald Steinberg）在战争期间确信：“1948年以来以色列的所有战争当中，这次是以色列进行过最精心准备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准备始于紧接着以色列撤离之后的2000年5月，当时的明显

事实是，国际社会不打算阻止黎巴嫩真主党储备导弹和进攻以色列。到2004年的时候，我们现在目睹的计划持续为期3周时间的军事行动，已经有了草样；而且在最后的一两年里，该行动曾进行过全面的模拟和演练。”[4]

类似地，西摩·赫什报道说：“涉及中东事务的数位现任和前任官员告诉我说，以色列将对其士兵的绑架看作开始其计划好的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的适当时机。同以色列有联系的美国政府顾问说：‘黎巴嫩真主党就像发条装置一样，每隔一两个月都在煽动某件小事情’。”[5]事实上，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曾告诉威诺格拉德委员会说：“早在2006年3月，他就作出了以广泛的军事行动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诱俘以色列士兵的决定。”而这是在冲突开始的4个月之前。在那时候，他要求看到为同黎巴嫩的战争而准备的现有“行动计划”，因为“万一有诱捕情况发生的话，他好当机立断”。奥尔默特还说道，2005年11月，他的前任阿里埃勒·沙龙曾“下令军队”在黎巴嫩真主党在边界村庄诱捕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失败之后，“准备对黎巴嫩的‘一串目标’作出军事回应”。奥尔默特在2006年1月初召开了他的首次黎巴嫩会议，此事发生在他被任命取代身体不能行动的沙龙4天之后。而且他随后“召开了比其最近的任何前任都更多的黎巴嫩局势会议”[6]。

据报道，早在7月12日之前，以色列官员就向布什政府内外那些主要的个人简报了他们的意图。赫什写道：“根据一位对以色列和美国政府目前想法都有了解的中东问题专家的说法，早在7月12日的绑架事件之前，以色列就已经制定攻打黎巴嫩真主党的计划，并且同布什政府的官员分享了该计划。”同样地，马修·卡尔曼在《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报道说：“一年多之前，一名以色列高级军官就通过不留下记录的方式，开始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新闻记者和思想库进行幻灯片陈述，这些陈述公开详细地规划了目前的行动计划。根据这些见报的程序，不能够认为这位军官参与了其中的活动。”[7]

可以得到的证据显示，布什政府支持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计划。根据赫什的说法：“今年夏天稍早的时候，即黎巴嫩真主党绑架活动之前，美国政府的顾问说，数名以色列官员分期访问了华盛顿，‘以获得轰炸行动的许可，并且弄清楚美国将能够承受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位顾问还说道：‘以色列从切尼开始入手。它需要确信能够得到他的支持，以及他的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组的支持。’这位顾问说道，在那以后，‘说服布什就绝不会是问题了，而康迪·赖斯则是在一条船上’。”[8]

在有关决策过程的公开记录中，没有许多导致布什总统支持奥尔

默特在适当时机进攻黎巴嫩计划的信息。然而，有理由认为，新保守派在那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自“9·11”事件以来，新保守派不仅一直倾向于消灭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在黎巴嫩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的几个月里面，白宫在中东问题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位顾问，都致力于支持以色列及其对敌人——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的强硬政策。[9]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中东政策的主要人物。《纽约时报》在战争期间报道说，他“推动了行政当局在背后支持以色列”[10]。

另外一个主要人物是戴维·乌姆瑟尔，他是副总统切尼的中东事务顾问。[11]他是《干净了结》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该报告主张，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应终结奥斯陆和平进程，并且使用军事力量来改变中东的政治景观。具体地说，该报告要求“通过起诉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朗为在黎巴嫩进行侵略的主要代理人”，来“保证”以色列北部边界的“安全”。[12]就像亚当·沙茨（Adam Shatz）早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之前就在《纽约书评》上所写到的那样，乌姆瑟尔是“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公开鼓吹者，这一立场受到布什政府内和接近布什政府的新保守派的支持”[13]。就像上面所引述的那样，当乌姆瑟尔说以色列有兴趣得到“（切尼）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组的支持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奥尔默特要求得到艾布拉姆斯和乌姆瑟尔的支持，而他肯定得到了这样的支持。除了那一既不令人觉得吃惊也不令人觉得矛盾的基本事实以外，有关布什政府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之前数月里进行的策划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几乎没有人知道了。

这一描述完全不是认为以色列或美国正在黎巴嫩阴谋挑起战争。考虑到边界上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导弹和火箭的合法关注，以色列国防军制定应对这一威胁的计划有完全充足的理由。毕竟，任何胜任的军事领导都会为那些可能决不会出现的偶发事件作准备。以色列向其保护人美国进行咨询也有完全充足的理由，以确保其正在准备的不是华盛顿可能反对的行动路线。

“强有力的支持大厦”[14]

一旦战争开始，并且以色列遭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严厉批评，布什政府即向以色列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外交保护。布什政府的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有一次曾戏称他为以色列联合国代表团的第六名成员——否决了一项批评以色列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且在一个月之久的时间里，不遗余力地阻止联合国实施停火，以便以色列能够解决黎巴嫩真主党。[15]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国务

卿康多莉扎·赖斯对以色列的暴力轻描淡写，一度还将此看作“新中东诞生的阵痛”而不予理睬。[16]只有当以色列国防军明显不会赢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布什政府——还有以色列——才承认需要停火。在继而导致联合国1701号决议的谈判中，美国竭尽全力保护以色列的利益。事实上，当决议正在收尾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在8月11日曾打电话给布什总统，感谢他“在安理会保卫以色列的利益”[17]。

总统经常公开地捍卫以色列的行动，在批评方面对以色列不置一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告诉安理会说，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是“蓄意针对无辜的平民、蓄意希望他们死亡”，而被以色列杀死的更多的黎巴嫩平民，则是“自卫所导致的令人悲伤和十分不幸的结果”。[18]除了这样的外交支持之外，布什政府还在冲突期间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情报；而当以色列开始发射低精确制导的炸弹的时候，总统立即同意给以色列送去替代品。[19]在战争处于高潮的时候，土耳其和伊拉克被成功地施压，不允许一架装满导弹的黎巴嫩真主党飞机从伊朗到大马士革途中飞越土耳其和伊拉克的领空。[20]正如一位出身名门的以色列学者夏伊·费尔德曼在战争的后期阶段所指出的那样：“总统对此大加赞赏，大加赞赏。”[21]

就像我们在其他背景中所看到的那样，以色列通常在美国国会找到对自己最坚强的支持，而黎巴嫩冲突期间，国会的行为毫不含糊地肯定了这种倾向。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竞相表明，是他们的政党而非对方政党才是以色列最好的朋友。有位犹太活动家说道，他认为“让国会议员通过表明自己的亲以色列可信度比他人更强而胜过其同僚是件好事情”[22]。最终，有关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这一问题，两党之间几乎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当人们想到民主共和两党之间在大多数其他外交问题上——例如像伊拉克这样的问题——都存在尖锐的区别时，这种情况是引人注目的。当反诽谤联盟的负责人亚伯拉罕·福克斯曼这样说——“在99%的事情上反对总统的民主党人，在以色列问题上则停止了争吵”——的时候，他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23]

作为反映两党的共识，2006年7月20日，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和支持以色列黎巴嫩政策的措辞强硬的决议。投票结果是410票对8票。参议院接着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决议，该决议得到62名参议员的支持，其中包括两党的领袖。包括参众两院领导人在内的许多著名民主党人，试图阻止伊拉克总理努里·阿尔-马利基（Nuri al-Maliki）向国会发表演说，因为他曾批评以色列的黎巴嫩政策。[24]因为民主党主席霍华德·迪安在过去曾被以色列游说集团作为靶子，因此他极端到了称这位伊拉克总理为反犹分子的地步。[25]国会中对以

色列的支持是如此地一边倒，以至于阿拉伯裔美国领袖目瞪口呆。黎巴嫩裔的民主党众议员尼克·J.拉霍尔（Nick J.Rahall）说道，“说得委婉一点”，众议院的决议使他“只感到恶心”。阿拉伯美国研究所（the Arab American Institute）的负责人詹姆斯·佐格比（James Zogby）说道：“这是如此灾难性的。我认为我们将会有比这更进一步糟糕的结果。”[26]

2008年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如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约翰·麦凯恩和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人乔·拜登，以及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尤其竭力表达了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27]唯一的例外是来自内布拉斯加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克·哈格尔，他对以色列的反应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表达了适度的保留态度。哈格尔的评论基本上被他的国会同僚和以色列游说集团所忽视，虽然这些评论毫无疑问对推进他自己的总统野心毫无帮助。[28]

主流媒体也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报道报纸产业的著名期刊《编辑与出版商》（*Editor & Publisher*）在战争开始大约一星期之后调查了数十份报纸，发现“这些报纸中几乎没有一份谴责以色列对平民区和黎巴嫩基础设施的攻击”[29]。24小时全天候的有线新闻台充斥的报道和评论，都是将这个犹太国家描绘成不会作恶、遭到围攻的斗士。

在报纸的头版和媒体的即时新闻报道中，以色列做得就没有那么好。一份哈佛大学的研究认为：“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以色列在标题中被描绘成侵略者的频率几乎有两次，而在照片中被这样描绘的频率则有三次之多。”[30]然而，这种新闻报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招致的损害，要比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所造成的损害大得多。到战斗结束的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杀害了43位以色列平民、损害或摧毁大约300座以色列建筑。相反，以色列国防军杀害的黎巴嫩平民多达750人，损害或摧毁的黎巴嫩建筑大约是16000座。[31]考虑到这些数字，照相机即刻就变成了以色列的敌人。新闻报道也是由这一事实来塑造的：几乎在战斗一打响的时候，黎巴嫩真主党和贝鲁特的西尼乌拉政府都支持停火；而以色列则要延长战争，直到其领导人意识到他们的战争目标实现不了的时候。

然而，在整个冲突期间，社论版的评论依然冷酷无情地保持亲以色列的立场，这种情况还经常潜入新闻报道中，从而保证了美国媒体对以色列的总体描述是非常有利的。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上的一篇文章，对主流媒体中的这种情形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对每次冲突来说，都存在冲突的双方——除非你依赖的是美国媒体有关黎巴嫩战斗的信息。观众被灌输的是盲目崇拜的新闻报

道，这种新闻报道将以色列当作好人，而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敌人则被当作罪恶的化身……不仅辩论几乎不存在，而且辩论本身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和令人怀疑的。”[32]

使美国对以色列进行如此明显的压倒一切地支持的原因是，美国是唯一热情支持以色列在黎巴嫩行动的国家。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国家，还有联合国领导人都批评以色列的反应以及华盛顿对此的坚定支持。这些情形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与世界的其他国家如此地不合拍？

愚蠢战略

一种可能的回答是，支持以色列对美国来说具有突出的道德战略理由。但是情形并非如此。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战略肯定要失败，因为就像威诺格拉德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采取行动的假设和预期是不现实的”。以色列作出的反应反映了“战略思维上的软弱”，因此布什政府从一开始支持的就是一项失败战略。[33]

以色列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的主要目标，是对作为一支战斗力量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效力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具体地说，以色列人决心清除掉那些数以千计、能够打击以色列北部的导弹和火箭。当埃胡德·奥尔默特总理说这番话——“威胁将不再是过去的威胁。他们将决不能够像过去发射火箭那样威胁这个国家的人民了”[34]——的时候，他是说到点子上了。类似地，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说道：“我们将不会半途而废，再次被扣为人质。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杀戮——清除黎巴嫩真主党。”[35]前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宣称，以色列的目标毫不含糊：“清除导弹。或者摧毁它们。”[36]

以色列有两种不同而互补的方法，来试图减缓黎巴嫩真主党的导弹和火箭威胁。以色列领导人有信心能够使用空中力量来直接打击那些武器，并将它们几乎全部拔除掉。[37]他们也有一种更加间接的方法来对付这个问题。具体来说，他们计划进行一场典型的惩罚战，通过摧毁住宅和基础设施，迫使数以千计的人逃离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将使黎巴嫩的平民百姓遭受大规模的痛苦。在这样一场战斗的过程中，大量的平民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杀害。就在绑架发生之后不久，奥尔默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当时许诺作出“非常痛苦而影响深远”的反应。[38]惩罚战的目的是向黎巴嫩领导人发出一个信号，即他们最终要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承担责任，而因此任何时候黎巴嫩整个国家都将为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付出高昂的代价。以色列总理在这一点上也不含糊：“黎巴嫩政府——真主党是其中的一分子——正企图破坏地区稳定。黎巴嫩是有责任的，并

且将承担其行为所带来的后果。”[39]

从一开始，这一战略的两个因素都注定是要失败的。试图从空中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简直是不可能的；即便有充足的智能炸弹供应，以色列空军也不可能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拥有的1万至1.6万枚火箭和导弹。[40]那些武器中的大部分被大范围地疏散安置在地洞、家舍、清真寺和其他的隐蔽地点。进而言之，即便以色列国防军试图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一大部分武器存量，伊朗和叙利亚也将给他们进行补充。并不令人感到吃惊的是，由于导弹和火箭每天继续发射到以色列北部，因此空军不能够取得曾被宣扬的效果就立即显而易见了。事实上，8月13日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这是在停火生效前一天的事情，要比战争期间的任何其他一天都更多。[41]

7月底，奥尔默特政府通过向黎巴嫩派遣大量地面部队而决心纠正这一问题，它因此宣称，以色列将需要多于几周的时间来一劳永逸地打败黎巴嫩真主党。[42]但这却是傻瓜犯下的又一个错误。毕竟，在1982年至2000年期间，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黎巴嫩同黎巴嫩真主党作战，而黎巴嫩真主党不仅生存下来了，并且在2000年最终迫使以色列撤离。以色列现在如何能够于数周之内取得18年都未能够取得的胜利呢？地面进攻的失败产生了决定性的结果，而以色列除了在8月14日接受停火之外，别无其他选择。[43]在停火生效两天之前，以色列遭受了最高的单日人员伤亡。[44]

以色列战略的第二个因素——即试图因允许黎巴嫩真主党自由行动而惩罚黎巴嫩——也肯定会适得其反。大量的历史证据和学术文献清楚地表明，使敌手的平民遭受痛苦，几乎不曾招致一个敌对政府束手就擒、并屈服于攻击者的要求。[45]相反，受害者通常将他们的愤怒直接朝攻击者发泄，而且反而会更加支持他们自己的政府。事实上，以色列先前曾两次对黎巴嫩进行过大规模的轰炸——1993年的责任行动和1996年的愤怒葡萄行动，而这两次行动都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损害到黎巴嫩真主党，或者削弱它受到的广泛支持。[46]

历史在2006年得以重演：紧随以色列的惩罚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以及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受欢迎度一路飙升，而大部分黎巴嫩人则将他们的怒火朝以色列和美国，而非黎巴嫩真主党和贝鲁特政府发泄。[47]但是即便这种情况证明是反常的，以色列的炸弹使得黎巴嫩领导人相信，现在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时候了，黎巴嫩政府也没有能力去做那件事情。黎巴嫩真主党太强大了，而黎巴嫩政府则太软弱了。

在大约两周的战斗之后，由于黎巴嫩真主党依然朝以色列北部发

射导弹和火箭，以及惩罚战的结果适得其反，因此以色列开始降低标准界定它的胜利。其领导人开始强调清除像黎巴嫩真主党前线阵地、部署国际力量来保护以色列免受真主党攻击这样的目标。[48]回到美国国内，《前沿》周报报道说："接近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消息来源说，政府鹰派已经对以色列无力给予黎巴嫩真主党以迅捷而致命的打击，表达了失望和挫折之情。"有些更具鹰派色彩的以色列支持者开始大声说，以色列处于战争失败的危险之中，有几个人还质疑以色列对美国来说是否依然是一项战略资产。8月4日，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战争给予以色列"一个"为"美国反恐战作贡献的异乎寻常的机会"。然而，美国"已经对"以色列的表现"感到失望"，这"不仅威胁到在黎巴嫩的行动，而且也威胁到美国对以色列的信任"。[49]

当战争最终在8月14日结束的时候，双方都宣称取得了胜利。[50]然而，对大多数独立专家而言，是黎巴嫩真主党在战斗中胜出。[51]几乎在所有方面来说，黎巴嫩真主党在战场上都表现出色，而且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它更加引人注目了。黎巴嫩真主党还保留了威胁以色列的数以千计的导弹和火箭，而且战争大大提升了它在黎巴嫩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地位。相反，以色列没有取得它最初的目标，而且以色列国防军在与黎巴嫩真主党交手的时候也大大地失策。随着时间的过去，显而易见的是——特别是在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是赢家，而以色列是输家。威诺格拉德委员会的任命，"是因为强烈的危机感和对战斗后果及其进行的方式感到深深的失望所致"[52]。该委员会的主要发现就是对这场战争的三位主要设计者——总理奥尔默特、国防部长阿米尔·佩雷兹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丹·哈鲁茨将军——的控诉。

对美国利益的伤害

将以色列或黎巴嫩真主党赢得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搁置一边，毫无疑问，美国因为完全支持以色列的行动而使得自己的利益遭受损失。就像我们清楚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在这一地区面临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恐怖主义，虽然美国也想清除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但是这一问题主要是打败基地组织。第二个关注的问题是该地区剩余的"流氓国家"伊朗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都支持恐怖主义，而且伊朗似乎决心掌握全部的核燃料循环技术，这将使得其朝核武器更接近一步。第三个问题是伊拉克战争，美国处在这场战争失败的严重危险之中。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布什政府对以色列不遗余力的支持，使得华盛顿应对其中的每个问题都变得复杂化了。

黎巴嫩的冲突使得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以两种方式复杂化了。由

于在战斗期间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将以色列描绘为“由美国的决心、美国的武器和美国的导弹所武装起来的国家”[53]，因此这场冲突强化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这种看法肯定有助于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招募到想攻击美国及其盟友的新成员。例如，就在战斗刚刚结束后的2006年8月底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69%的应答者说他们将美国看作“黎巴嫩的敌人”。不到一年前的2005年9月，该数字是26%。[54]在2006年8月底进行的另外一次民意调查中，64%的应答者说，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在战后比战前更糟。将近有一半的应答者说，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在战争之后“要糟糕得多”。[55]2006年秋季一项在沙特阿拉伯、埃及、摩洛哥、约旦和黎巴嫩进行的佐格比民意调查发现：“在所有五个国家中，人们对美国的态度在过去一年中恶化了。”虽然伊拉克战争和华盛顿的巴勒斯坦政策是这种负面态度变化的更重要因素，但是美国的黎巴嫩政策也产生了作用。[56]对美国增加的敌意，将导致对中东和其他地方的恐怖分子更加公开的支持。

进而言之，冲突增加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影响力。这部分地要归因于它那抵抗以色列国防军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而以色列国防军平常曾决定性地击败了其阿拉伯对手，但在这次冲突中却没能得手。以色列的轰炸行动也是黎巴嫩真主党支持度飙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战争一开始的时候，许多黎巴嫩人对黎巴嫩真主党促成这场冲突感到愤怒，特别是因为“一个兴旺的旅游旺季……正在黎巴嫩进行”[57]。在冲突开始的时候，黎巴嫩人民中间也存在对美国的许多善意，主要是因为布什政府在2005年迫使叙利亚撤出黎巴嫩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然而，当华盛顿支持以色列的进攻时，这种对美国的善意变成了怒火；相应地，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地位陡然上升。

战争之后在黎巴嫩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79%的应答者认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表现“好”或者“了不起”；另外一次民意调查则发现，40%的黎巴嫩人在战争之后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态度更加正面，而只有不到30%的人态度更加负面。[58]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没有直接威胁美国，但是它却威胁到以色列，并正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彻底扭转雪杉革命上，而布什总统曾支持这场革命，称赞它是民主推广的一个成功例子。到2006年秋末，黎巴嫩真主党已在展示它增加的分量，威胁福阿德·西尼乌拉（Fouad Siniora）领导的贝鲁特亲美政府。[59]更令人忧心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将使得黎巴嫩陷入另一场内战。美国同其盟友曾竭力阻止这一后果的出现，而且到目前为止都一直是成功的。但是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曾受到它所获得的成功和广泛支持的鼓励，这一问题完全有可能不会出现。

黎巴嫩的这场冲突，也使得对付伊朗和叙利亚更加困难。虽然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都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但是美国有强大的利益要削弱或拆散这种联系，还有大马士革与德黑兰之间的联系。[60]在伊朗和叙利亚之间打下一个楔子不应该是困难的，因为它们并不是天然的盟友；伊朗是个神权国家和波斯国家，而叙利亚则是一个世俗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反，布什政府却在战争期间盲目地支持以色列，而将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和叙利亚看作一张毫无缝隙的罪恶之网，从而将它们的关系推进得更加紧密。[61]

此外，许多新保守派还要求以色列或美国在冲突期间攻打叙利亚和伊朗。[62]事实上，赫德森研究所的梅拉夫·乌姆瑟尔——当然还有她的丈夫戴维·乌姆瑟尔，以及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在战争之后曾说道："美国行政当局的许多部门"都对以色列没有打击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感到不快。[63]结果呢？这种政策使伊朗甚至有更多理由来获得核武器，这样它就能够威吓以色列或美国进攻其家园。而在促使美国陷在伊拉克的时候，伊朗和叙利亚已继续武装和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美国就不能够攻打它们中的任何一个。[64]

这种适得其反在伊拉克还产生了其他的后果：黎巴嫩发生的事情也激怒了伊拉克人本身，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他们对也是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怀有一种松散的忠诚感。事实上，8月4日在巴格达为黎巴嫩真主党举行的集会，据报道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此类集会。[65]黎巴嫩战争之后，甚至有报道说，黎巴嫩真主党正在训练莫科塔达·阿尔-萨德尔（Moqtada al-Sadr）的民兵，而萨德尔是美国的死敌。[66]美国深陷伊拉克的麻烦之中，承担不起进一步疏远当地民众的后果。

为了以最有效的方式应对这三大问题——恐怖主义、"流氓国家"和伊拉克战争，华盛顿需要得到该地区像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这样友好政权的广泛支持。这些政权并不喜欢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如果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应更加克制的话，它们就可能支持美国——并默不作声地支持以色列。事实上，在冲突发生的最初时候，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批评黎巴嫩真主党挑起了这场战争。可是一旦以色列明显地作出了过度反应，而且布什政府坚定地支持这种行为的时候，这些领导人就开始批评华盛顿和谴责以色列。他们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主要原因，是要避免自己成为公众发泄怒火的对象。[67]美国的政策也激怒了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盟友，从而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处于孤立地位和缺乏政治影响力，并且提出了布什总统是不是一个对付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威胁问题靠得住的盟友的疑问。[68]

有人可能认为，当战争结束的时候，黎巴嫩战争期间阿拉伯领导

人与阿拉伯公众之间存在的深深裂痕，已经很快消散了，因此不会有严重的长期后果。但那是错误的，由于阿拉伯公众舆论对美国依然怀有深深的敌意，因此使得这些阿拉伯政权帮助布什政府遏制伊朗的核野心变得困难。问题的根源是，所谓的阿拉伯街头对美国的担心，远远大于对伊朗的担心。2007年2月发布的一项佐格比民意调查发现，6个阿拉伯国家中72%的应答者将美国看作最大的威胁，而只有11%的人认为伊朗是最大的威胁。进而言之，61%的应答者说，伊朗有权发展核能力，尽管他们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伊朗有可能走出建造核武器的下一步。[69]

还值得指出的是，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差强人意的表现显示，对于美国应对以色列国防军造成的威胁环境来说，以色列国防军的价值不大。就像我们在第二章中认为的那样，以色列的政策滋养和激励着恐怖团体，使得美国对付像叙利亚和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所作的努力复杂化，但是以色列却不是对付他们的一笔很有用的资产。

支持以色列发动黎巴嫩战争的战略，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很难不同意国务院前官员阿伦·米勒在这场冲突进行的中期所发表的看法：“在一项以色列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没有明显分别的政策中，危险是存在的。”[70]

违反战争法

但是道德维度又怎么样呢？有人虽然可能承认，美国支持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战略成本，但是却认为美国有道德责任支持以色列保卫自己而进行的努力。以色列遭到攻击，因此这种观点流传开来，而以色列是以一种遵守战争法则的方式来作出回应。实际上，有些以色列的支持者认为，它在黎巴嫩差强人意的表现，主要归咎于自己严格遵守这些法律和道德原则。例如，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的执行主任托马斯·纽曼（Thomas Neumann）即坚持认为：“比起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羁绊，以色列自己的道德感要更强。”[71]

然而，如果就近审视，这种观点并不令人信服。以色列显然有权自卫，而且那一自卫权还包括以军事力量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几乎没有人会质疑那种基本观点，而且许多批评过以色列行为的政府和个人，也从不质疑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进攻作出反应的权利。但是拥有自卫权，不意味着任何所有的措施在法律上或道德上都是得到许可的。关键问题是，2006年夏季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是否符合战争法和已确立的道德准则。

就像上面所讨论的那样，以色列的战略明显蓄意地寻求对黎巴嫩

平民进行惩罚。虽然有人可能很容易地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以色列发起的惩罚战，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导弹和火箭供给的反应，但是那并不是战争实际上如何进行的情形。事件开始于7月12日，当时黎巴嫩真主党跨过以色列边界，杀害了3名以色列士兵，抓获了两名士兵。作为那一行动的组成部分，黎巴嫩真主党向一些以色列城镇发射了数十枚火箭，目的是要将以色列国防军的注意力，从诱捕以色列士兵的地点引开。在那些牵制性的进攻中，没有以色列平民遭到杀害。[72]纳斯鲁拉随后立即在贝鲁特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希望在南部的局势升级，我们不需要战争。"[73]这种说法虽然不正当，但是由于自从以色列于2000年5月从南黎巴嫩撤出之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就一直在相互侵越对方的国界进行暴力活动，因此黎巴嫩真主党的进攻，不是异乎寻常的挑衅行为。[74]纳斯鲁拉甚至在数月前就清楚表明，他决心绑架一些以色列士兵。[75]

然而，以色列却通过对黎巴嫩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行动来对诱捕作出反应，这反过来导致了黎巴嫩真主党照样向以色列北部的城镇发射火箭和导弹。具体地说，在黎巴嫩真主党越境打击以色列第二天的7月13日，以色列国防军打击的目标包括贝鲁特国际机场。14日，以色列国防军继续从空中猛烈打击黎巴嫩，打击的目标有桥梁和道路，以及纳斯鲁拉在贝鲁特的办公室。在这一点上，由于有50多位黎巴嫩平民死亡，以及对黎巴嫩基础设施的损害不可胜数，因此纳斯鲁拉预示了对以色列的"公开战争"，这意味着对以色列进行全面的导弹和火箭攻击。[76]因此，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明显通过在7月12日杀害或绑架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而促成了这场战争，但是以色列却发动了对平民的大规模攻击。

以色列领导人从一开始即强调说，所有黎巴嫩人将在战争中付出严重的代价，而且惩罚将是以色列政策刻意而为的结果，而不仅仅是"附带伤害"。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鲁茨在冲突开始的时候即说道，他打算"使黎巴嫩倒退20年的时间"[77]。他还曾一度说，在黎巴嫩"没有什么是安全的"[78]。他说到做到。就在战斗刚刚结束的2006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对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造成的损害，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评估报告，在此值得大段引用该报告的内容：

在以色列武装力量对黎巴嫩进行地面和空中炮击的四星期中，黎巴嫩的基础设施遭到了灾难性的摧毁；由于居民纷纷逃离躲避炮击，因此以色列军队将楼房夷为平地，使整个社区变成瓦砾，把村庄和城镇变成了鬼蜮；主要的道路、桥梁和加油站被击得粉碎；整个整个的家庭在空袭中被打死在家中或者在逃离针对他们村庄的空袭时被打死

在车上；由于以色列的持续打击使得红十字会或其他营救人员不能够进入这些地区，许多人被埋在瓦砾或他们的家中好几个星期。成千上万逃离炮击的黎巴嫩人在回家的时候，面临那些尚未爆炸的弹药所带来的危险。

在7月12日至8月14日之间，以色列空军对大约7000个黎巴嫩的目标进行了7000多次的空中打击，而以色列海军还进行了另外2500次炮击。虽然打击的范围广泛，但是却特别集中在某几个地区。除了人们所付出的代价——估计有1183人死亡，其中1/3是孩童，4054人受伤，97万黎巴嫩人被赶出家园——之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重创。黎巴嫩政府估计，31处“至关重要的地点”——如机场、港口、水厂和污水处理厂，以及供电设施——被彻底或部分摧毁，还有大约80座桥梁和94条道路也遭此厄运。超过25个燃油站和大约9000个商业企业遭到打击。超过3万处居民不动产、办公室和商店遭到全部毁灭的厄运。两家在宾特吉·贝尔（Bint Jbeil）和梅斯·阿尔-杰贝尔（Meis al-Jebel）的政府医院在以色列的攻击中全部被毁，其他三家医院则严重受损。

在一个不到400万居民的国家中，超过25%的人作为被驱赶出家园的人流落路边街头。估计单单在贝鲁特就有50万人寻求栖身之所，其中许多人是在没有水或者洗浴设备的公园和公共场所。

南黎巴嫩的大赦国际代表报告说，一个个村庄的模式都是类似的：街道——尤其是主街道——从头到尾都布满弹坑；在有些情况下，集束炸弹的影响依稀可见；精确制导导弹挑中房舍进行打击，结果这些房舍被整个或部分摧毁；像超市或食品店、汽车修理站和加油站这些商业用房，它们都是被选中的目标，经常是被精确制导的炸弹和大炮击中后起火，并毁了里面的东西。由于断电、食品和其他的供应进不了村，因此摧毁超市和供油站在迫使居民离家出走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缺乏燃油也使得居民得不到水，因为抽水机需要电或者燃油发电机。[79]

大赦国际不是唯一对以色列国防军给黎巴嫩造成损害的评估者。军事事务专家和自称“制空权粉丝”的威廉·阿金（William Arkin）在《华盛顿邮报》的网络博客上写道：“为执行其惩罚战，以色列在战区之外留下的损害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我犹豫于使用‘使之成为废墟’和‘月球表面’这样的字眼，来描述黎巴嫩郊区地带的状况，因为同样的字眼曾一股脑地胡乱用来描述美国的空中打击。但是以色列所做的，却比精确战争时代美军——尤其是空军——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远远更具毁灭性。”[80]

以色列采用的更具毁灭性的惩罚战术之一，是使用集束炸弹，从而在大面积区域范围散落大量的子炸弹。这些子炸弹不仅不精确，而且许多并未爆炸，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敌意结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些子炸弹依然是威胁性的致命地雷。考虑到这些武器使用在平民区有多么致命，美国总是坚称以色列用这些打击被清楚界定为军事目标的对象身上。[81]实际上，就像曾经指出过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期间，当里根政府发现以色列国防军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时在平民区使用集束炸弹的情况时，曾在长达6年的期间里禁止向以色列出售集束炸弹。[82]

在最近的黎巴嫩战争的最后三天里，当知道停火即刻就要来到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在南黎巴嫩投射了超过100万的子炸弹，而该地区的人口是65万人。[83]目标是要用这些小而致命的炸弹来“使该地区饱和”。有位以色列的炮兵营士兵说道：“在最后的72小时里，我们发射了手中所有的弹药，全部是发射在同一个地区。我们甚至连炮口发射方向都没有改变一下。炮营中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也在最后三天里打完了所有的弹药——有普通炮弹、集束炸弹，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弹药。”[84]在整个的战争过程中，以色列国防军估计在黎巴嫩投射了400万颗子炸弹。当战斗最终在8月中旬停止的时候，联合国官员估计，在黎巴嫩南部大约有100万颗未爆炸的子炸弹。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研究人员说：“南黎巴嫩集束炸弹的密度，比他们所见过的任何其他地方都高。”[85]有位一起用集束炸弹“淹没”这一地区的以色列士兵说道：“我们的行为是疯狂而残暴的，整个整个的城镇都被我们的集束炸弹所覆盖。”[86]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让·埃格兰给以色列的行动贴上了“令人震惊”和“完全不道德”的标签。[87]在战争结束后的前8个月里面，29位黎巴嫩人死于集束炸弹，另外还有215人受伤，其中90%是孩童。[88]

直觉上似乎显而易见的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开展的毁灭行动违反了战争法。然而那还不够，了解这些法律的内容以及以色列是如何具体违反这些法律是重要的。

支撑战争法——以及现代正义战争理论——的根本区别，是平民和军事目标。[89]毫无疑问，国家相互之间有权通过攻击对方的军事资产进行自卫。然而，国家不应该攻击另外一个国家的平民目标，除非在战争的进程中这些目标已经转变成军事目标。例如，如果在一场战役中军队占领了一所学校或一座教堂，并当作行动基地来使用，那么就允许在那里对他们发动攻击。进而言之，当攻击敌人的军事目标时，国家必须作出坚决的努力来使连带损害最小化。这就是著名的平衡性概念（concept of proportionality）起作用的地方。具体而言，

考虑到那些军事目标的价值，国家对军事目标的打击，必须确信不会有过度的连带损害。简而言之，国家不能够对敌方的平民目标故意或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攻击；且在打击军事目标时，必须非常仔细地避免连带损害。

以色列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都没有遵守这些区分原则。毫无疑问，就像哈鲁茨将军说他会那样做的那样，以色列在黎巴嫩蓄意攻击了一系列广泛的平民目标。大赦国际组织报告中的描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记住，该报告归纳说，黎巴嫩的“基础设施遭到了灾难性的摧毁”。该报告还在另一处说，以色列的轰炸行动导致了“平民设施的大规模摧毁”。大赦国际组织在2006年11月发表了另外一份报告，进一步巩固了其在8月份报告中的那些发现。例如，11月的报告发现，“在南黎巴嫩，大约7500个家庭被摧毁，两万个家庭受损”，而“在它（大赦国际组织）考察的绝大多数被废或受损的房屋中”，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房屋曾被黎巴嫩真主党战斗人员用作藏身之所或储藏武器”。事实上，该组织“注意到的是以色列攻击所形成的摧毁模式，那意味着以色列军队锁定了那些对平民生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目标物”[90]。在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攻击进行的一份单独研究中，人权观察组织得出结论说：“以色列违反了战争法中最最根本的一条：只对军事目标进行攻击的责任。”[91]

同样清楚的是，当以色列打击那些被认为实际上是军事性目标的时候，没有足够谨慎地避免连带损害。人权观察组织得出结论说，尽管以色列宣称它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使对平民的伤害最小化”，但事实上却存在“以色列国防军没有系统性地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的现象”。[92]考虑一下在南黎巴嫩发生的事情吧，以色列人实际上将那里变成了一个“任意开火区”，任何留在该地区的人都被认为是合法的攻击目标。在警告居民离开该地区之后，以色列司法部长海姆·拉蒙（Haim Ramon）——曾经说：“我们必须将南黎巴嫩的村庄变成尘土。”——在7月27日宣布道：“所有那些现在在南黎巴嫩的人，都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同黎巴嫩真主党有联系的恐怖分子。”[93]然而，许多居民没有离开，而且许多留下来的人既非战斗人员，也非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大赦国际组织估计，在整个冲突期间，大约有12万人留了下来，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平民。8月7日，以色列在南黎巴嫩散发的传单警告说：“在利塔尼河（Litani River）以南行驶的任何种类的交通工具，由于被怀疑在运送火箭、军事设备和恐怖分子，因而都将遭到轰炸。”[94]

由于以色列的这些行动，因此大赦国际组织在11月份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说：“以色列军队严重地违反了国际人权和人道法律，其中包

括战争罪。具体而言，大赦国际组织发现，以色列军队进行了大规模不分青红皂白和缺乏平衡的攻击。”[95]类似地，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发现：“以色列国防军一直为了令人质疑的军事收益，而容忍高水平的平民伤亡。”[96]至少有一位以色列领导人毫不掩饰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即以色列正在违反平衡原则。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吉勒曼（Dan Gillerman）在战争开始一周之后说道：“对那些声称我们正使用不平衡武力的人来说，我要说的只有：您非常正确，我们是这样做了。因为如果你们的城市像我们的城市那样遭到炮击的话，如果你们的公民像我们的公民那样遭到恐怖威吓的话，你们就会比我们使用过度得多的武力。”[97]

然而，吉勒曼不加掩饰的承认却是个例外。大多数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美国支持者，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以色列涉及进行不平衡攻击作出回应的，即虽然承认以色列可能杀害了许多无辜的黎巴嫩人，但是他们却坚持认为，那是因为黎巴嫩真主党把他们当作人肉盾牌所致。[98]大赦国际组织11月份报告和人权观察组织研究报告中的证据，反驳了那种辩护词。以色列辩护词其中的一部分说，黎巴嫩真主党阻止平民离开南黎巴嫩，因为它要躲在平民背后。大赦国际组织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可得到的证据“并未证实黎巴嫩真主党阻止平民逃离，而且有几次情形正好相反”[99]。同样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黎巴嫩真主党战斗人员由于担心“他们迟早会被平民合作者出卖”[100]，因此他们有意避免同平民进行接触。

但更为重要的是，就像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能够得到的证据并不支持这样的主张，即以色列之所以最终杀害了大量的平民，是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利用留在南黎巴嫩的平民做人肉盾牌。很明显，人权观察组织确实承认，“黎巴嫩真主党偶尔的确在平民家中或附近储藏武器，战斗人员将火箭发射器安放在人口稠密区之内或联合国观察员附近的地方”，这两种做法都“严重违反了战争法”。[101]换言之，有一些证据表明，黎巴嫩真主党利用平民来保护它的战斗人员和武器。然而，这些情形显然都是例外而非常规。按照人权观察组织的执行主任肯尼思·罗思（Kenneth Roth）的说法：“绝大多数被杀害的人是平民，因为附近并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存在。”[102]具体地说，人权观察组织详细考察了24个案例，其中包括报告撰写时在黎巴嫩被杀害的大约1/3的平民。[103]该组织发现，在这些案例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黎巴嫩真主党蓄意利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来保护自己免受来自以色列国防军的报复性攻击”[104]。

有人可能接受这一发现但却提供不同的辩护词说，尽管黎巴嫩真主党可能不是蓄意利用平民做人肉盾牌，但是它确实是在人口稠密地

区进行战斗的，特别是当它的战斗人员在保卫自己家园的村庄或城镇的时候。在这些情形中，黎巴嫩真主党“躲在平民背后”将不违反战争法；它只是在保卫自己的领土。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人可能会认为，以色列在锁定真主党的过程中，只能迫不得已地杀害平民。虽然黎巴嫩真主党经常在城镇村庄及其周边进行战斗，但是这种辩护词也是站不住脚的。在人权观察组织研究的24个案例中，其中只有一例“有证据表明，在攻击期间或仅仅在攻击之前，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力量或武器是在以色列国防军锁定的地区或者周边地带”[105]。简而言之，大赦国际组织11月份的报告和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报告，提供了同以色列有关黎巴嫩真主党及其人肉盾牌说法相左的大量证据。进而言之，就在停火生效之前，以色列国防军用集束炸弹对南黎巴嫩进行饱和攻击的时候，显然没有对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进行区分。就像一位炮手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就像疯子一样开炮。”[106]以上所指出的两种反对观点，都不能够用来对这种残忍的行动——很难将这种行动看作是长期的报复行为——进行辩解。这种行动也不能用黎巴嫩真主党在向以色列北部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射导弹火箭时杀害以色列平民来进行辩解。

考虑到这种压倒性的证据，就不可能有理由说，美国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支持以色列，是因为那是道德上正确的政策选择。如果是道德问题的话，那么布什政府本应该从一开始就同时谴责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的行为。

过分卖力的以色列游说集团

战争期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的亲以色列组织，自始至终都在不遗余力地确保美国全面支持以色列。战争开始四天后，内森·瓜特曼在《耶路撒冷邮报》上报道说：“在以色列进行两线作战的时候，全体美国犹太人社会一直在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107]以色列游说集团为这个犹太国家募集款项，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紧密地操控媒体，派代表与立法人员和国会工作人员、布什政府的决策人员，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人物进行会晤。进而言之，自从战斗结束以来，亲以色列的组织一直卖力地对付战争的余波。

如果要明白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就看看以下的六个事例吧。

第一，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通过添加敦促“所有各方保护平民生活设施”的言辞，存在着减缓国会支持以色列决议的两党一致的努力。考虑到道德问题至关重要，时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国会议员南希·佩洛西和时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参

议员约翰·沃纳（John Warner），以及其他人都一致赞成这一立法改变。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语言如果不会受到欢迎，那么也不会有异议的。但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却强烈地反对这一特别条款，该委员会起草了这一决议，成为该决议背后的推动力。虽然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波尔纳从该决议中提出了建议添加的新内容，但是决议还是以410票比8票获得通过。[108]

第二，在7月30日，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弗·范霍伦（Christopher Van Hollen）给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写信，敦促她“在南黎巴嫩迅速部署国际军事力量之后呼吁立即停火”。他还写道：

以色列的反应……现在已经超出了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资产的程度。现在已经造成了对黎巴嫩平民设施的巨大损害，导致了巨大的平民生命损失，产生了超过75万的难民。不可否认，黎巴嫩真主党是罪魁祸首，但却是黎巴嫩人民——而非黎巴嫩真主党——日益成为暴力的牺牲品。结果，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轰炸行动已经将黎巴嫩人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愤怒，转变成对以色列和美国不断增强的敌意。结果是黎巴嫩真主党及其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政治力量和受欢迎度的飙升，以及本已脆弱的黎巴嫩政府遭到削弱……我们浪费了孤立黎巴嫩真主党和增强我们威信以及在该地区谈判影响力的机会。[109]

虽然范霍伦的信主要侧重的是美国的利益，并且支持以色列进行自卫的权利，但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却因为他胆敢批评以色列而对他愤怒不已，并立即采取行动毫不含糊地清楚表明，他决不应该写那封信。[110]范霍伦同来自主要犹太人组织——包括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各种各样的代表进行会晤，这位国会议员因而立即道歉说：“如果我对布什政府失败的批评，被理解成了对以色列在当前这场危机中的行为的强烈批评的话，我感到抱歉。那当然不是我的初衷。”[111]他强调说，他将继续是以色列强有力的支持者，并在此后马上进行了一次为期5天的对以色列的访问，访问是由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下属机构美国以色列教育基金会资助的，陪同他进行访问的是来自他所在国会选区的3名亲以色列活动家，以及来自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本身的一名工作人员。

尽管有范霍伦的道歉，但是大华盛顿地区犹太人社会关系委员会的领导人还是告诉一名记者说，范霍伦“需要继续同犹太人社会进行接触……需要向犹太人社会保证他在那里”是为以色列效力。反诽谤联盟的华盛顿地区主任说，就他所关心的事情而言，范霍伦的回应“并没有消除第一封信所造成的损害”[112]。当然，目标不仅是要责罚范霍伦，而且是要提醒其他的国会议员在这个问题上违规的代价。

第三，战争初期，布什总统曾温和地鼓励以色列小心不要推翻黎巴嫩的民选政府，因为是布什总统帮助这个政府上台掌权的。他说："要关注的是，任何以色列保护自身的行动都将削弱（黎巴嫩）政府，或推翻那个政府。"[113]布什清楚地表明，他和他的助手们已向以色列领导人传达了他们的观点。

以色列游说集团对此持反对意见，并且清楚表明他的观点是不可接受的。《前沿》杂志在7月14日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和犹太人社会的官员，正在因为布什政府要求耶路撒冷不要削弱黎巴嫩的民选政府而对其进行批评。"反诽谤联盟的亚伯拉罕·福克斯曼说道："布什政府和西方国家想保护黎巴嫩政府，但是这样做是一项误导性的政策，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巴勒斯坦的阿布·马赞[114]（Abu Mazen）政府……虽然他们感到那个政府比真空状态要好，但是人们不应该支持没有意义的东西。而且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知道，阿布·马赞没有出路，黎巴嫩政府不会有效力。"[115]紧随那番批评之后，布什不再说以色列有关需要保护美国所支持的贝鲁特政府的警告了。

第四，著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汤姆·里克斯（Tom Ricks）战争期间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上说："有些美国军事分析员"曾告诉他，"以色列故意放过黎巴嫩真主党的少量火箭，因为只要他们正受到火箭攻击的话，就能够继续在他们的黎巴嫩行动中拥有一种与道德相等的东西。"[116]作为回应，美国中东报道精确性委员会谴责里克斯的评论；纽约市前市长埃德·科克（Ed Koch）写信给《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小伦纳德·唐尼（Leonard Downie Jr.），对里克斯的评论进行抱怨。科克说道，这些评论"可以同反犹分子使用的那些在欧洲引发大屠杀的古老血诬案[117]相比拟"。唐尼写给科克的回信说："我曾清楚向汤姆·里克斯表明，他不应该有那些评论。"[118]为什么呢？唐尼并没有明言。里克斯说，就他而言，"评论是精确的：我说过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真希望没有说过那些话，而且从现在开始我打算对此只字不提了"[119]。

第五，亲以色列的团体对大赦国际组织，尤其是人权观察组织批评以色列轰炸行动的报告，进行了大规模的诽谤活动。根据艾伦·德肖维茨的说法："几乎所有犹太人社会组织的每个部分——从世俗派到宗教派、从自由派到保守派，都谴责人权观察组织的偏见。"[120]这两个人权组织都被不公平地指责，说它们单单把以色列挑出来，而却几乎对黎巴嫩真主党视而不见；这两个组织还被谴责对黎巴嫩在地面上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方面颠倒黑白。与此同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还散发新闻稿，以传达以色列国防军正对恐怖分子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和避免打击平民的信息。[121]

反犹主义的指责立即对准了这两个人权团体。人权观察组织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思承受了这些攻击的主要压力，尽管他是个犹太人，而且他的父亲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例如，《耶路撒冷邮报》上刊登了一篇杰拉尔德·斯坦伯格的社论版文章，标题是《肯尼思·罗思的血诬案》。《纽约太阳报》在一篇社论中断言说，罗思正参与“使犹太教非法化的活动”，因为他批评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的战略是“以眼还眼——在这个事件中，或者更精确的说法是二十倍的以眼还眼，（这）可能是某种更原始的道德”。亚伯拉罕·福克斯曼对罗斯的话作出了类似的反应，他指责罗思使用的是“有关犹太人的经典的反犹主义陈词滥调”[122]。

作为对这些指责的回应，当乔治敦大学法学教授和专栏作家罗莎·布鲁克斯（Rosa Brooks）在《洛杉矶时报》上写下以下这番稍微过头的话：“任何熟悉人权观察组织——或者罗思——的人都知道，这种指责简直是疯了。人权观察组织是不带党派色彩的——它在冲突中不偏不倚。而罗思是个反犹分子的想法几乎是疯狂的。”布鲁克斯继续说道：“但是针对罗思及其组织尖酸刻薄的观点最令人不安之处，是因为它是典型的。其典型之处在于，任何轻率到批评以色列的人都可能有此遭遇。在今天的美国，有关以色列的文明辩论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对其政策的严肃批评，都会立即遭到反犹主义的指责。”[123]

第六，以色列游说集团继续在用力限制集束炸弹争议所带来的伤害。8月31日，纽约国际犹太人组织总部国际圣约信徒会（B' nai B' rith International），给曾批评以色列使用集束炸弹的联合国领导人让·埃格兰寄了一封信，指责他充当“未经任命的道德裁判，来对地面发生的有争议性的未经证明的事实进行裁判，以及对国际人权法进行解释”[124]。一周之后，参议院对一项在平民区禁止使用集束炸弹，禁止将这些致命性武器转移到拒绝接受这一禁令的国家的立法进行辩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极力游说反对这一立法，结果以70票对30票击败了这一立法。[125]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主要组织曾开诚布公地讨论它们对美国黎巴嫩政策的影响力。例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弗里德曼曾在7月30日写信给他的朋友和他的组织的支持者，他在信的开始说道：“瞧瞧你们所做过的事情！”然后他写道：“世界上只有一个（ONE）国家站出来断然宣布：让以色列干完自己的事情。那个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而它之所以对这种情形有着明白无误、毫不含糊的观点的原因，是因为你们（YOU）以及其他的美国犹太人。”[126]因此，战争期间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所说的下面这番话几

乎没有什么令人感到吃惊："感谢上帝让我们有个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它是我们在全世界最伟大的支持者和朋友。"[127]

像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反诽谤联盟这样的组织，并不是在最近冲突期间卖力工作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中仅有的两家。像查尔斯·克劳萨默和威廉·克里斯托尔这样的新闻记者即说明了这一点。用克里斯托尔的话来说，以色列的战争"也是我们的战争"[128]。许多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在背后支持以色列。例如，根据《耶路撒冷邮报》的说法，福音派基督徒电视播音员帕特·罗伯逊就在战争期间，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以色列访问，以"提供他对这个国家的支持，而他相信恰恰是它的生存受到了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罗伯逊告诉《耶路撒冷邮报》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是在上帝心目中有着特殊地位的特殊国家。因此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这就是我为什么此刻在这里的原因之一。"[129]约翰·哈吉的"为了以色列而联合"组织于7月中旬在首都举行了两天的华盛顿/以色列峰会。这次峰会吸引了3500人，而且与会者被鼓励向他们选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表达自己对以色列的支持。[130]以色列基督教之友提供了一种非常非基督教的见解："这肯定是无缘无故的攻击，以色列拥有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的任何一切权利。"[131]

事实上，由于得到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许多人的支持，以色列确实"对他们进行了猛烈打击"。

美国公众与黎巴嫩

华盛顿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行动的坚定支持，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力的结果呢，还是只是表明了美国人民对以色列的深深承诺呢？或许以色列得到无条件的支持是因为美国公众舆论要求这样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詹妮弗·坎纳塔（Jennifer Cannata）在战争期间发表了这样类似的观点。在否认以色列游说集团有任何影响力之后，她宣称说："美国人民压倒性地支持以色列的反恐战争，理解值此危急之时我们应该支持我们最密切的盟友。"[132]

这种观点并不令人信服。黎巴嫩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情符合我们已经看到的模式：美国的政策没有反映美国公众的观点。这种观点明显在涉及黎巴嫩的6个关键问题的一系列广泛调查结果之中得到了体现。就谁应该被指责承担挑起冲突的问题，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与《华盛顿邮报》于2006年8月3日至6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46%的应答者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样应该受到指责。[133]另外，7%的人只指责以色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与《纽约时

报》于2006年7月21日至25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也发现，46%的应答者“对双方进行同样的”指责，而5%指责的“基本上是以色列”。

关于以色列的攻击是否太过度的问题，《今日美国报》与盖洛普于2006年7月21日至23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38%的应答者说，他们“不赞成以色列在黎巴嫩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与《华盛顿邮报》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中，32%的应答者说，他们认为以色列正使用“太过度的武力”；而48%的人说，以色列“轰炸黎巴嫩真主党在平民区的目标是不正当的，因为那里的平民可能被打死或受伤”；54%的人说，以色列“应该采取更多行动”来避免平民的伤亡。

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支持以色列或者在冲突中保持中立的问题，《今日美国报》与盖洛普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65%的应答者说，美国不应该在冲突中支持“任何一方”。在佐格比于2006年8月11日至15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52%的应答者说，美国应该在冲突中保持中立。[134]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与《纽约时报》进行的民意调查中，40%的应答者说，美国不应该公开支持以色列或黎巴嫩真主党，应该“什么都不说，或者什么都不做”；7%的人支持对以色列进行批评，14%的人不确定该做什么，39%的人赞成对以色列进行支持。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与《华尔街日报》于2006年7月21日至24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如果黎巴嫩战争扩大到“该地区其他数个国家进行作战”的程度，有40%的应答者反对“美国卷入到对以色列的支持之中”。

关于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应该同意即刻停火的问题，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于2006年7月19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43%的应答者认为，“以色列应该尽快地同意停火”。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与《华盛顿邮报》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中，35%的应答者说：“以色列应该同意在黎巴嫩进行即刻、无条件的停火。”

关于黎巴嫩战争对于美国的恐怖主义产生的后果的问题，在《今日美国报》与盖洛普进行的民意调查中，44%的应答者说，他们“非常担心”黎巴嫩的事件“将非常可能导致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增加”；31%的人“有点担心”黎巴嫩战争将恶化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最后，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与《华盛顿邮报》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中，35%的应答者说，黎巴嫩战争将“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处境有害”。

简而言之，在美国人如何看待以色列和黎巴嫩战争，以及华盛顿的领导人在冲突期间如何谈论和行动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大众舆论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布什政府和国会在2006年夏天会那样行

事。

秉承美国的意志办事吗？

另外宣告以色列游说集团不对美国的黎巴嫩政策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宣称美国是这场战争背后真正的推动力，以色列只是一个顺从的代理国家而已。换言之，以色列是作为一个忠诚的盟友行事的，是在为布什政府在中东的利益效力。以色列新闻记者尤里·阿乌内里（Uri Avnery）写道：“第二次黎巴嫩战争被许多人认为是‘代理人战争’。也即是说：黎巴嫩真主党是伊朗的杜宾犬，而我们则是美国的罗特韦尔犬。黎巴嫩真主党从那个伊斯兰共和国得到金钱、火箭和支持；我们从美利坚合众国得到金钱、集束炸弹和支持。”[135]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显然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他告诉伊朗电视台说：“美国下令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侵略黎巴嫩，”而以色列这样做则是“为美国的中东野心而效力”。[136]

虽然许多美国官员将黎巴嫩真主党看作敌人，在以色列打击它的时候并不感到遗憾，但是存在四个理由来质疑这种观点，即当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升级时，只是在秉承华盛顿的意志行事而已。如果以色列代表的是美国，那么它的轰炸行动就会限制在南黎巴嫩，并且非常小心地保护黎巴嫩政府，增强它的力量。毕竟，布什总统在危机一开始就清楚表明，他不希望贝鲁特政府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是他曾用力安排的一个政府。更全面地说，美国几乎肯定不希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所要求的“黎巴嫩倒退20年”的事情发生。

也几乎不存在什么证据，表明布什政府计划了这一进攻，并推动以色列执行进攻计划。就像在上面所讨论的那样，能够得到的有关规划过程的证据认为，以色列在7月12日绑架事件之前的数月里，已经计划好了黎巴嫩行动，而绑架事件是以色列用来发动进攻的借口。毫无疑问，虽然以色列向美国简报了进攻计划，并且得到了布什行政当局的支持，但是向以色列开绿灯与将以色列当代理国利用，告诉它做什么事情，却不是同一回事情。

有人有时候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布什政府鼓励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因为这将是一个对美国可能在空战中用于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武器和战略进行测试的机会。就像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告诉西摩·赫什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反对呢？我们将能够从空中捕获和轰炸导弹、隧道以及燃料库。这将是对伊朗的警示。”[137]除了不反对以色列的计划有别于推动以色列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之外，美国决策者将黎巴嫩看作对伊朗的演练的观点，也几乎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中的任务几乎不存在什么共同之处。进攻躲在黎巴嫩乡村、配备导弹和

火箭武器的小股游击队，根本不同于在伊朗轰炸那些少量可辨析且完全固定的核设施。不清楚从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空战中学到的教训，将怎样有助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战变得更加有效。

进而言之，有证据表明，2003年春大约在萨达姆倒台的时候，以色列敦促美国进攻黎巴嫩真主党，而不是倒过来美国敦促以色列这样做。根据《前沿》杂志的说法，以色列人当时警告美国的决策者说：“什叶派民兵组织威胁中东的稳定以及美国在全世界的安全。”[138]没有证据——至少是没有公开的记录——表明，布什政府受到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诱惑，或者说布什政府鼓励以色列自己做那件事。

最后，以色列的历史与以色列是任何国家——其中包括美国——驯服的代理国的描述相左。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总是表现为一个顽强自利的行为体，而考虑到以色列独立以来所面临的地区环境挑战，它这样表现是有理由的。1989年至1996年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沙布泰·谢维特（Shabtai Shavit）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做我们认为最有利于我们的事情，而如果碰巧满足了美国的要求，那只不过是两个朋友之间关系的部分内容而已。”关于黎巴嫩战争，他补充道：“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到了牙齿，并且以最先进的游击战技术进行训练。战争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必须对付它。”[139]这不是一个满是怨言的代理者所说的话。或者像摩西·达扬曾经评论的那样：“我们的美国朋友给钱、给武器、给建议。我们拿钱、拿武器，但拒绝建议。”[140]

结论

最终，在这些替代性的解释中，没有一种能够充分解释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的美国政策。人们也找不出引人注目的战略或道德理论来解释这一点，即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在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的时候，为什么美国却向以色列提供无条件的支持。事实上，在冲突期间保持美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游说集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尽管这使它蒙受了战略成本和令人怀疑的道德立场的代价。

黎巴嫩战争对黎巴嫩人民来说是个灾难，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也是一个大挫折。以色列游说集团通过阻碍布什政府进行独立的判断和在战前及战争期间施加影响力，能使以色列作出适得其反的反应。在这个例子中，就像在许多其他的例子中一样，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都是有害的。

如果以色列游说集团不支持不同的方法，或者说如果以色列游说

集团的影响力不受到削弱，那么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将依然难以实现，并伤害到相关的各方。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对什么应该是美国的政策进行了辨析，而且我们讨论了如何可能缓解或修正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负面影响。

---

[1] 人权观察估计，1125位黎巴嫩人在战争中被杀，其中300人至350人是战斗人员。2007年5月24日和30日本书两位作者与人权观察的私人通信。被杀死的人当中1/3为儿童的数据来自Amnesty International，“Israel/Lebanon： Deliberate Destruction or ‘Collateral Damage’？ Israeli Attacks on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Report MDE 18/007/2006， August 23， 2006。关于对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害，参见同上； Amnesty International，“Israel/Lebanon： Out of All Proportion—Civilians Bear the Brunt of the War，” Report MDE 02/033/2006，November 21， 2006，以及“Middle East Crisis： Facts and Figures，” *BBC News* （online）， August 31，2006。

[2] 关于威诺格拉德委员会的授权，参见*Ha'aretz*Staff，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Winograd Partial Report on the Second Lebanon War，” *Ha'aretz* ， May 1， 2007。

[3] 雪杉革命（Cedar Revolution），指2005年2月14日开始，由于拉菲克·哈里里被刺杀而导致的黎巴嫩大规模群众运动。通过这次运动，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出了所有14000人的部队，结束了1975以来对黎巴嫩长达30年的军事占领。这场运动因黎巴嫩国旗上的主要标志是雪杉而得名。——译者注。

[4] 引自Matthew Kalman，“Israel Set War Plan More than a Year Ago： Strategy Was Put in Motion as Hezbollah Began Increasing Its Military Strength，”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nline）， July 21， 2006。也可参见战争刚开始之后马丁·弗莱彻在蒂姆·拉塞特的与新闻界会面（*Meet the Press*）节目上的评论，“Transcript for July 16，” *MSNBC.com* ， July 16， 2006； Bernard Gwertzman， “Steinberg： Israel Hoping Attacks on Hezbollah Serve as a Warning to Iran，” 2006年8月1日对拉尔德·M.斯坦伯格的采访，外交关系委员会； Yagil Levy，“A Voluntary ‘Putsch，’” *Ha'aretz* ， July 24， 2006； Andrea Mitchell，“U.S.Stands Alone in Defending Israel，” *MSNBC.com* ， July 13， 2006； Robert Novak，“No Political Upside in Criticizing Israel，” *Chicago Sun-Times* ， August 7， 2006，以及Tanya Reinhart，“Israel's ‘New Middle East，’” *CounterPunch.org* ， July 27， 2006。

[5] Seymour M.Hersh，“Watching Lebanon，” *New Yorker* ， August 21， 2006.类似地，马修·卡尔曼（Matthew Kalman）写道：“在自以色列结束对南黎巴嫩军事占领以来的几年中，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存在，因此以色列留心地观察着。当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在上星期绑架两名以色列士兵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几乎准备好了立即作出反应。” Kalman，“Israel Set War Plan.”

[6] 参见“Main Findings of the Winograd Partial Report”。奥尔默特对维诺格拉德委员会证词的报道参见Aluf Benn，“PM Says Decided on Response to Abductions Months Before War，” *Ha'aretz* ， March 8， 2007。也可参见Aluf Benn，“Report： Interim Findings of War Won't Deal with Personal Failures，” *Ha'aretz* ， March 8，2007； Josef Federman，“Reports： Israel Ready Before Lebanon War，” *Washington Post* ， March 9， 2007；Amos Harel， Nir Hasson， Mazal Mualem， and Aluf Benn，“Officers Slam PM for Planning War but Not Preparing IDF，” *Ha'aretz* ， March 9， 2007，以及 Nir Hasson，“Senior IDF Officer to Haaretz： PM Did Not Order Us to Prepare for War，” *Ha'aretz* ， March 12， 2007。

[7] Hersh，“Watching Lebanon”； Kalman，“Israel Set War Plan.” Also see “Israel： Did Blair Know All Along？” *Daily Mail* （online）， August 14， 2006.

[8] Hersh，“Watching Lebanon.”

[9] 美国新世纪计划于2001年9月20日向布什总统发出了一封由许多著名的新保守派签署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说：“任何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必须针对真主党。”公开信发表在2001年10月1日的《旗帜周刊》上。

[10] Helene Cooper，“Rice's Hurdles on Middle East Begin at Home，”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0，2006.也可参见Sidney Blumenthal，“The Neocons' Next War，” *Salon.com* ， August 3， 2006； Hersh，“Watching Lebanon”； and Shmuel Rosner and Aluf Benn，“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Governments，” *Ha'aretz* ， July 28， 2006。

[11] Marc Perelman，“Cheney Taps Syria Hawk as Adviser on Mideast，” *Forward* ， October 31， 2003.也可参见Jim Lobe，“New Cheney Adviser Sets Syria in His Sights，” Inter Press Service， October 20， 2003。约翰·汉纳是黎巴嫩冲突之前和冲突期间切尼办公室中另一位重要的新保守派。Robert Dreyfuss，“Vice Squad，” *American Prospect* ， May 2006，以及Janine Zacharia，“Bush Appoints Mideast Advisers，”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7， 2001。

[12] “A Clean Break： A New Strategy for Securing the Realm”是为耶路撒冷的高级战略与政治研究所而准备的，并于1996年6月发表。报告副本可登录该研究所的网站www.iasps.org/strat1.htm。

[13] Adam Shatz，“In Search of Hezbolla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April 29， 2004.也可参见 Mark

Hosenball and Michael Isikoff，“Secret Proposals，” *Newsweek* ，August 9，2004。

[14] 这是《经济学家》用来描述黎巴嫩战争期间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话。参见“To Israel with Love，” *Economist* ，August 5，2006。

[15] 以色列大使丹·吉勒曼在战争之前发表讲话，他在纽约对国际圣约信徒会的一次会议说：“今天，秘密不再了。我们实际上不只是5名（以色列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我们至少有6名外交官，其中包括约翰·博尔顿。”引自Irwin Arieff，“Israel's UN Ambassador Slams Qatar，Praises Bolton，” Reuters，May 22，2006。关于博尔顿的行动，参见Associated Press，“Bolton：US Wanted Hizbullah Eliminated，” *Jerusalem Post* ，March 22，2007；“Bolton Admits Lebanon Truce Block，” *BBC News* （online），March 22，2007；Robin Wright，“Strikes Are Called Part of Broad Strategy，” *Washington Post* ，July 16，2006，以及“U.S.Vetoes Criticism of Israel，” *New York Times* ，July 13，2006。

[16] Transcript of “Special Briefing on Travel to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July 21，2006，登录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6/69331.htm，以及 Roula Khalaf，“Rice ‘New Middle East’ Comments Fuel Arab Fury over U.S.Policy，” *Financial Times* ，July 31，2006。

[17] 引自Warren Hoge and Steven Erlanger，“U.N.Council Backs Measure to Halt War in Leban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2006。

[18] “Remarks by Ambassador John R.Bolton，U.S.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on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at the Security Council Stakeout，July 17，2006，” USUN Press Release #174（06）.博尔顿对以色列的坚定捍卫促使美国正统犹太教会众联合会（Union of Orthodox Jewish Congregations of America）打破其“不介入人事任命”的传统，从而要求参议院让博尔顿成为常任联合国大使。Rosner and Benn，“How to Win Friends.”

[19] Blumenthal，“Neocons' Next War”； David S.Cloud and Helene Cooper，“U.S.Speeds Up Bomb Delivery for the Israelis，” *New York Times* ，July 22，2006.

[20] John Diamond，“Officials：U.S.Blocked Missiles to Hezbollah，” *USA Today* ，August 18，2006.

[21] 引自Sheryl Gay Stolberg，“Bush's Embrace of Israel Shows Gap with Fath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006。

[22] 引自David J.Silverman，“Politicking over Israel：Jewish State Becomes Fodder in Congressional War，” *JTA.org* ，August 15，2006。也可参见 Jim VandeHei，“Congress Is Giving Israel Vote of Confidence，” *Washington Post* ，July 19，2006。

[23] 引自Silverman，“Politicking over Israel”。在支持以色列战争中的行动的一次集会上，《纽约时报》报道说：“狂热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对以色列行动进行捍卫的布什总统得到了一长排的政治家的赞誉，他们几乎百分之百是民主党人。”Clyde Haberman，“At Israel Rally，a Word Fails，” *New York Times* ，July 18，2006.

[24] James D.Besser，“Scoring Points with the Israel Issue，” *Jewish Week* ，July 28，2006； “To Israel with Love.”

[25] Brian Skoloff，“Dean Calls Iraqi PM an ‘Anti-Semite’，”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online），July 26，2006.

[26] 所引用的拉霍尔的话参见Anne Plummer Flaherty，“House Overwhelmingly Backs Israel in Vote，” *Guardian* ，July 20，2006；所引用的佐格比的话参见Noam N.Levey，“In Politicians' Pro-Israel Din，Arab Americans Go Unheard，” *Los Angeles Times* ，July 23，2006。

[27] 关于克林顿的话，参见Gal Beckerman，“New York Jews Rally in Support of Israel，” *Jerusalem Post* ，July 18，2006；关于麦凯恩的话，参见Christopher Grimes，“European Criticism of Israel ‘Amazes’ Senator，” *Financial Times* ，July 18，2006；关于拜登和金里奇的话，参见他们在蒂姆·拉塞特的与新闻界会面节目上的评论，2006年7月16日。也可参见Michael Abramowitz，“Conservative Anger Grows over Bush'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Post* ，July 19，2006。

[28] Novak，“No Political Upside.”

[29] “Editorials Continue to Back Wide Air War Against Lebanon，” *Editor & Publisher* ，July 20，2006.也可参见 Greg Mitchell，“Few Editorials Find Fault with the Bombing of Beirut，” *Editor & Publisher* ，July 18，2006。这种普遍模式的一个重要例外是Nicholas D.Kristof，“In Lebanon，Echoes of Iraq？” *New York Times* ，July 25，2006。

[30] 引自Marvin Kalb and Carol Saivetz，“The Israeli-Hezbollah War of 2006：The Media as a Weapon in Asymmetrical Conflict，”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RWP07-012，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February 2007，p.15。从亲以色列的观点写成的卡尔布和萨伊维茨研究报告（Kalb and Saivetz study）认为，由于以色列是一个“开放性社会”，而黎巴嫩真主党则是一个“封闭性社会”，因此以色列受到媒体的不公正对待。由于该研究报告集中关注对冲突的新闻报道，基本上忽视了社论和评论，因此它能

够说，相对于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总是被描述得更加负面。由于以色列是一个相对开放性的社会，因而它在媒体上处于劣势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新闻记者能够清楚看到以色列和黎巴嫩正在发生的事情。

[31] 被杀平民的数量基于以上注释1中人权观察所描述的数字。损坏或被摧毁的建筑物数字来自“Middle East Crisis： Facts and Figures”。

[32] Andrew Gumbel， “America's One-Eyed View of War： Stars， Stripes， and the Star of David，” *Independent* ， August 15， 2006.也可参见“Is America Watching a Different War？ American， Lebanese and Israeli Panel on How the US Media Is Covering the Invasion of Lebanon，” *Democracy Now.org* ， August 3， 2006。

[33] “Main Findings of the Winograd Partial Report.” 报告还说，“实现具有重大政治—国际分量的军事利益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部分已被宣告的一些战争目标是……通过授权的军事行动模式实现不了的”。

[34] 引自Larry Cohler-Esses， “Israel Seeks to Redefine Victory，” *Jewish Week* ， August 4， 2006。也可参见Jack Khoury， “Top IDF Officer： We Knew War Would Not Get Our Soldiers Back，” *Ha'aretz* ， April 26， 2007，以及 Ori Nir， “Israel Seeks to Eliminate Iran's Hezbollah Option，” *Forward* ， July 14， 2006。

[35] 引自Wright， “Strikes Are Called”。

[36] Benjamin Netanyahu， “No Ceasefire in the War on Terror，” *Wall Street Journal* ， July 22， 2006.

[37] 一名以色列高级指挥官告诉《纽约时报》说：“在考虑任何地面部队之前，军队计划了15天的空战……我们不希望进行任何的地面攻击，并且认为我们可以在没有进行主要地面攻击的情况下创造停火条件。”引自Steven Erlanger， “Israeli Officer Says Army Aims to Kill Nasrallah，” *New York Times* ， August 20， 2006。

[38] 本段落中所引用的奥尔默特的两段话均来自“PM Olmert： Lebanon Is Responsible and Will Bear the Consequences，”以色列外交部2006年7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副本。

[39] 这一基本战略在以色列的军事政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对约旦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队的报复行为，部分地是为了说服约旦政府严厉打击跨境袭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团体。参见Jonathan Shimshoni， *Israel and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Border Warfare from 1953 to 1970*（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2.

[40] Noam Ophir， “Look Not to the Skies： The IAF vs.Surface-to-Surface Rocket Launchers，” *Strategic Assessment* （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Tel Aviv University） 9， no.3（November 2006）.

[41] Uzi Rubin， “Hezbollah's Rocket Campaign Against Northern Israel： A Preliminary Report，” Jerusalem Issue Brief（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6， no.10（August 31， 2006）.

[42] Jonathan Finer and Edward Cody， “No Cease-Fire Soon， Israeli Leader Says，” *Washington Post* ， August 1， 2006； Yochi J.Dreazen and Marc Champion， “U.S.， Israel Start to Diverge as Casualties Mount，” *Wall Street Journal* ， August 1， 2006.

[43] Amos Harel， “Analysis： Hezbollah Is Still Showing No Signs of Breaking，” *Ha'aretz* ， July 20， 2006； John Kifner， “Israel Is Powerful， Yes.But Not So Invincible，” *New York Times* ， July 30， 2006； Ze'ev Schiff， “A Strategic Mistake，” *Ha'aretz* ， July 20， 2006； Ari Shavit， “An Aerial War，” *Ha'aretz* ， July 20， 2006； “What About the Missiles？” *Ha'aretz*editorial， August 3， 2006，以及Martin Van Creveld， “In This War， Too， Victory Is Unlikel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August 2， 2006。

[44] John Kifner and Greg Myre， “After U.N.Accord， Israel Expands Push in Lebanon，”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3， 2006.

[45] 对这一主题进行开创性工作的是Robert A.Pape， *Bombing to Win*： *Air Power and Coercion in War*（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也可参见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Norton， 2001）， pp.85—110。

[46] Amnesty International， “Unlawful Killings During 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 July 1996； Warren Christopher， “A Time to Act，” *Washington Post* ， July 28， 2006； Human Rights Watch， “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 The Civilian Victims，” September 1997； Ze'ev Schiff， “Strategic Mistake”，以及 Avi Shlaim， “Israel's Error， Then and Now，”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August 4， 2006。

[47] Beirut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oll Finds Support for Hezbollah's Retaliation： Opinions Diverge on Sectarian Lines—But Not Completely，” July 29， 2006； Dahr Jamail， “Hezbollah Rides a New Popularity，” *Antiwar.com* ， August 8， 2006； Nadim Ladki， “US Policy Alienates All the Lebanese，” *Gulf Times* （online）， August 1， 2006； Neil MacFarquhar， “Tide of Arab Opinion Turns to Support for Hezbollah，” *New York Times* ， July 28， 2006，以及Shibley Telhami， “Hezbollah's Popularity Exposes al-Qaeda's Failure to Win the Hearts，” *San Jose Mercury News* （online）， July 30， 2006。

[48] Cohler-Esses， “Israel Seeks to Redefine Victory”； Steve Erlanger， “Israel Seeks Hint of Victory，”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3， 2006； Anshel Pfeffer，“Analysis： The IDF's New Definition of Victory，” *Jerusalem Post* ， July 26， 2006，以及Zeev Sternhell，“The Most Unsuccessful War，” *Ha'aretz* ， August 2， 2006。

[49] Charles Krauthammer，“Israel's Lost Moment，” *Washington Post* ， August 4， 2006； Ori Nir，“Conservatives Slam Israeli War Strategy，” *Forward* ， August 11， 2006.也可参见Bret Stephens，“Israel Is Losing This War，” *Wall Street Journal* ， August 1， 2006，以及“Olmert and Bush，” *Wall Street Journal* editorial， August 1， 2006。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的表现，在此期间——即从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到8月14日战争结束期间——并未得到改善。

[50] 关于以色列赢得这场战争，或至少没有输掉这场战争的观点，参见Nahum Barnea，“Think Again： Israel vs.Hezbollah，” *Foreign Policy 157*（November—December 2006）； Cameron S.Brown，“Iran's Investment Just Went Down the Tubes，” *Ha'aretz* ， September 10， 2006； Shai Feldman，“The Hezbollah-Israel War：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Middle East Brief no.10（Crow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Brandeis University， September 2006）； Michael A.Fletcher，“Hezbollah the Loser in Battle， Bush Says，” *Washington Post* ， August 15， 2006； Efraim Halevy，“Blind Date，” *New Republic* ， August 14 & 21， 2006； Shmuel Rosner，“U.S.Diplomats Begin Viewing Lebanon War as Success，” *Ha'aretz* ， September 15， 2006，以及Asher Susser，“Lebanon： A Reassessment，” *Jerusalem Post* ， September 13， 2006。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急需把这场战争说成以色列的胜利，即使只是勉强说说，这样美国人就会继续把以色列看作一个可靠的盟友。利昂·哈达尔（Leon Hadar）在下面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佐证：“Neocons amid Lebanon's Rubble： A Challenge to Krauthammer's Israel-as-Strategic-Asset Argument，” *National Interest* （online）， September 14， 2006。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在8月4日看到以色列正在输掉战争（Israel's Lost Moment）的查尔斯·克劳萨默，在9月1日所写的一篇专栏文章（Hezbollah's “Victory，” Washington Post）中却宣称：“虽然黎巴嫩真主党可能已经赢得了宣传战，但是却输掉了地面战。它输得很惨。”然而，大多数以色列军官的看法却与此相反。参见Amos Harel，“Chief Education Officer： We Lost Lebanon War，” *Ha'aretz* ， September 22， 2006，以及Hanan Greenberg，“Officers Slam IDF War Conference，” *Ynetnews.com* ， January 2， 2007。《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就在战争结束之前，以色列《国土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0%的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正在赢得战争，30%的人认为以色列正在输掉战争，43%的人认为没有一方正在赢得战争。参见Hoge and Erlanger，“U.N.Council Backs Measure”。大多数以色列人在战争结束后赞同这项评估，就像2007年初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所发现的那样，51%的回应者认为双方都没有赢得战争，26%的回应者说黎巴嫩真主党赢得了战争，23%的回应者说以色列赢得了战争。Ben Meir and Shaked，“The People Speak，” p.9， pp.20—21.进而言之，就在战争结束之后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3%的回应者认为奥尔默特总理应该辞职，74%的回应者认为国防部长阿米尔·佩雷兹应该辞职；而54%的回应者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丹·哈鲁茨将军应该辞职。“Poll： Majority Wants Olmert Out，” *Ynetnews.com* ， August 25， 2006.

[51] 关于认为黎巴嫩真主党是这场冲突最后赢家的精彩评估，参见《亚洲时报在线》（*Asia Times Online*）的三期连载系列文章Alastair Crooke and Mark Perry： “Winning the Intelligence War，” October 12， 2006；“Winning the Ground War，” October 13， 2006；以及“The Political War，” October 14， 2006。也可参见Anthony H.Cordesman，“Preliminary ‘Lessons’ of the Israeli-Hezbollah Wa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ugust 17， 2006； Ron Tira，“Breaking the Amoeba's Bones，” *Strategic Assessment* （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Tel Aviv University）9， no.3（November 2006）， 以及 Amir Kulick，“Hizbollah vs.the IDF： The Operational Dimension，” in Ibid。

[52] “Main Findings of the Winograd Partial Report.”也可参见 Gregory Levey，“Israel's Surge of Despair，” *Salon.com* ， February 15， 2007。

[53] “Hizbullah Secretary-General Hassan Nasrallah Calls upon Arab Leaders to Promote Cease-Fire in Meetings with the Americans，”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TV Monitor Project， Clip no.1219， August 3， 2006，登录www.memritv.org/Transcript.asp？P1＝1219 on May 17， 2007。

[54] 参见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Poll， August 22—27， 2006， in Gary C.Gambill， ed.，“Lebanese Public Opinion，” *Mideast Monitor*1， no.3（September—October 2006）。

[55] “Poll： 64% of Lebanese Say Opinion of U.S.Worsened After War，” *Ha'aretz* ， November 14， 2006.也可参见 Jim Lobe，“Backing for Israel Stymies Larger U.S.Aims in the Region，” *Antiwar.com* ， July 22， 2006； Jim Lobe，“Losing Arab Allies' Hearts and Minds，” Inter Press Service， December 14， 2006； Shmuel Rosner，“They Know You Know They're Winning，” *Slate.com* ， December 4， 2006，以及Shibley Telhami，“Annual Arab Public Opinion Survey”（with Zogby International）， 结果来自2006年11月11日至16日的黎巴嫩民意调查。

[56] Zogby International，“Five Nation Survey of the Middle East，” 2006年12月为阿拉伯美国研究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也可参见Zogby International，“AAI Poll： Continuing Conflict in Iraq and Palestine Deepens U.S.-Arab Rift with Growing Costs to Both Sides，” December 14， 2006。

[57] Thanassis Cambanis，“Travel Industry Suffers Another Blow in Lebanon，” *Boston Globe* ， September 4， 2006.

[58]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Poll， August 22—27， 2006； Telhami，“Annual Arab Public Opinion Survey.”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黎巴嫩人并不埋怨真主党挑起了战争，就像一项民意调查所发现的那样，84%

的回应者“同意以黎战争是以色列和美国企图强加一种中东秩序的结果”。参见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poll published in Gambill，“Lebanese Public Opinion”。

[59] “Another Killing in Lebanon，” *New York Times*editorial，November 23，2006；“Beirut Rally Attracts Huge Crowd，” *BBC News*（online），December 10，2006；Akiva Eldar，“Israel Fears Siniora Government May Fall，” *Ha'aretz*，December 3，2006；“Fleeting Gains from Lebanon War？” *Jewish Week*，December 8，2006；Michael Slackman，“Anti-Syrian Minister Is Assassinated in Lebanon，”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1，2006；“Lebanon on the Brink，” *Chicago Tribune*editorial，November 23，2006；Tim McGirk，“Losing Lebanon，” *Time*，December 3，2006；Jim Quilty，“Winter of Lebanon's Discontent，”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January 26，2007，以及Anthony Shadid，“As Crises Build，Lebanese Fearful of a Failed State，” *Washington Post*，June 5，2007。

[60] Michael Slackman，“Iran's Strong Ties with Syria Complicate U.S.Overtures，”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8，2006.

[61] Rafael D.Frankel，“Israel Troubled That War in Lebanon Drove Its Enemies Clos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September 22，2006.

[62] Blumenthal，“Neocons' Next War”；Max Boot，“Israel Should Hit Syria First，” *Los Angeles Times*，August 23，2006；Daniel J.Goldhagen，“Israel's Way Out，” *Los Angeles Times*，August 8，2006；William Kristol，“It's Our War，” *Weekly Standard*，July 24，2006；Michael Ledeen，“The Thirties All Over Again？” *National Review Online*，July 31，2006；Ori Nir，“U.S.Ripped for Inaction on Israeli，Syrian Front，” *Forward*，August 4，2006；Michael B.Oren，“Necessary Steps for Israel，” *Washington Post*，July 14，2006；Michael B.Oren，“Why Israel Should Bomb Syria：Attack Add，” *New Republic Online*，July 17，2006；Tom Regan，“US Neocons Hoped Israel Would Attack Syri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August 9，2006，以及George F.Will，“Transformation's Toll，” *Washington Post*，July 18，2006。

[63] Yitzhak Benhorin，“Neocons：We Expected Israel to Attack Syria，” *Ynetnews.com*，December 16，2006.也可参见Jim Lobe，“Neo-Cons Wanted Israel to Attack Syria，” Inter Press Service，December 18，2006。

[64] Robin Hughes，“Iran Replenishes Hizbullah's Arms Inventory，” *Jane's Defence Weekly*，January 3，2007；Yaakov Katz，“Syria Resupplying Hizbullah with Long-Range Missiles，” *Jerusalem Post*，December 4，2006；David R.Sands，“Iran，Syria Rebuild Hezbollah，” *Washington Times*，October 25，2006；Elaine Shannon and Tim McGirk，“Iran and Syria Helping Hizballah Rearm，” *Time*，November 24，2006，以及Ronny Sofer，“Ashkenazi：Hizbullah Trying to Move South of Litani，” *Ynetnews.com*，April 29，2007。

[65] Damien Cave，“Protestors in Baghdad Denounce U.S.and Israel，” *New York Times*，August 4，2006；Andy Mosher，“In Baghdad，Shiites Rally for Hezbollah，” *Washington Post*，August 5，2006，以及“Tens of Thousands Rally in Baghdad to Show Support for Hezbollah，” *USA Today*，August 4，2006。

[66] Michael R.Gordon and Dexter Filkins，“Hezbollah Said to Help Shiite Army in Iraq，”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8，2006.

[67] MacFarquhar，“Tide of Arab Opinion.” 也可参见Scott MacLeod，“Egypt's Mubarak：‘No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Time*，July 27，2006；“Saudi Arabia Harshly Criticizes Hezbollah for Escalating Mideast Crisis，” Associated Press，July 14，2006，以及Andy Mosher，“From Arab Leaders，Sympathy for Civilians but Not Hezbollah，” *Washington Post*，July 18，2006。

[68] Philip Gordon and Jeremy Shapiro，“US Has Emerged as a Loser in the Middle East，” *Financial Times*，August 20，2006；Richard Holbrooke，“The Guns of August，” *Washington Post*，August 10，2006；Howard LaFranchi，“Why Europe，US Differ on Mideas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August 4，2006；Neil MacFarquhar，“Anti-U.S.Feeling Leaves Arab Reformers Isolated，” *New York Times*，August 9，2006；Tyler Marshall，“On Cease-Fire，U.S.Diplomacy Again Takes a Go-It-Alone Path，” *Los Angeles Times*，August 1，2006；Tyler Marshall and Alissa J.Rubin，“U.S.Clout a Missing Ingredient in Mideast，” *Los Angeles Times*，August 8，2006；Mark Perry and Alastair Crooke，“The Loser in Lebanon：The Atlantic Alliance，” *Asia Times Online*，August 8，2006；“The US and Israel Stand Alone，” 《明镜周刊在线》（*Spiegel Online*）2006年8月15日对吉米·卡特的采访，以及Robin Wright and Colum Lynch，“US at Odds with Allies on Mideast Conflict，” *Washington Post*，July 20，2006。

[69] Peter Kiernan，“Middle East Opinion：Iran Fears Aren't Hitting the Arab Street，” *WorldPoliticsWatch.com*，March 1，2007.也可参见 Jim Lobe，“Arabs Less Worried About Iran，” Inter Press Service，February 8，2007。

[70] 引自Stolberg，“Bush's Embrace”。也可参见John B.Judis，“Bush's Failed Israel Strategy：Apocalypse Now，” *New Republic Online*，August 2，2006。

[71] 引自Nir，“Conservatives Slam Israeli War Strategy”。也可参见Eliot Cohen，“Nasrallah's War：

Observations upon Returning from Israel，” *Berlin Journal 13*（Fall 2006）： 23—25。

[72] 在黎巴嫩真主党最初的袭击中，有3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死亡；而在以色列国防军最初试图营救被俘人员时又有5人死亡。Helena Cobban，“The 33-Day War，” *Boston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2006； Amos Harel，“Hezbollah Kills 8 Soldiers， Kidnaps Two in Offensive on Northern Border，” *Ha'aretz* ，July 13，2006；“Hezbollah Warns Israel over Raids，” *BBC News* （online）， July 12， 2006； Greg Myre and Steven Erlanger，“Clashes Spread to Lebanon as Hezbollah Raids Israel，” *New York Times* ，July 13， 2006，以及Anthony Shadid and Scott Wilson，“Hezbollah Raid Opens 2nd Front for Israel，” *Washington Post* ，July 13，2006。

[73] 引自Shadid and Wilson，“Hezbollah Raid”。纳斯鲁拉在战后再次清楚地表明，他没有兴趣同以色列打仗，因为他说如果知道袭击将导致战争的话，他就不会下令进行袭击。Zvi Bar'el，“Analysis： Nasrallah Is Still in Charge，” *Ha'aretz* ， August 28， 2006，以及Rory McCarthy，“Hizbullah Leader： We Regret the Two Kidnappings That Led to War with Israel，” *Guardian* ， August 28， 2006。

[74] Shlomo Brom，“The Confrontation with Hezbollah，” Tel-Aviv Note no.177， 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July 13， 2006； Margot Dudkevitch，“UN-Brokered Cease-Fire Holds after Hizbullah Shells Mount Dov，” *Jerusalem Post* ， February 3， 2006；“Israeli Army Targets Hezbollah，”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4， 2006； Herb Keinon，“Security Council Condemns Hizbullah，” *Jerusalem Post* ， November 24，2005； Greg Myre，“Israel Strikes Northern Gaza and Lebanon with Planes，”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28， 2005； Anders Strindberg，“Hizbullah's Attacks Stem from Israeli Incursions into Leban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August 1， 2006； Scott Wilson，“Hezbollah Shelling Kills 1； Ends Calm on Israeli Border，” *Washington Post* ， June 30， 2005； Scott Wilson，“Hezbollah， Israeli Forces Clash on Lebanese Border，” *Washington Post* ， November 22， 2005，以及Scott Wilson，“Violence Flares Across Israel-Lebanon Border，” *Washington Post* ， May 29， 2006。

[75] Margot Dudkevitch，“Nasrallah Vows More Kidnapping Attempts，” *Jerusalem Post* ， November 27，2005.

[76] “Day-by-Day： Lebanon Crisis—Week One，” *BBC News* （online）， July 19， 2006.

[77] 引自Chris McGreal，“Capture of Soldiers Was ‘Act of War’ Says Israel，” *Guardian* ， July 13， 2006。就在战争结束之前，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告诉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说：“在接下来的12至13个小时里，是我们尽一切可能摧毁尽可能多的基础设施的时候了，然后我们再看看接下来干什么。”引自Cobban，“The 33-Day War”。

[78] 引自Hassan M.Fattah and Steven Erlanger，“Israel Blockades Lebanon； Wide Strikes by Hezbollah，” *New York Times* ， July 14， 2006。

[79] Amnesty International，“Israel/Lebanon： Deliberate Destruction.”

[80] William M.Arkin，“Israel's Failed Strategy of Spite，” August 15， 2006，登录http：//blog.washingtonpost.com/earlywarning/2006/08/did_israel_win.html。

[81] David S.Cloud，“Inquiry Opened into Israeli Use of U.S.Bomb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2006； Richard Moyes and Thomas Nash，*Cluster Munitions in Lebanon* （London： Landmine Action，November 2005）， pp.7—12.

[82] Richard Ben Cramer，“Israel Criticized for Use of Indiscriminate Bombs，” *Washington Post* ， June 30， 1982； Kevin Danaher，“Israel's Use of Cluster Bombs in Lebano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1—12*，nos.4， 1（Summer—Autumn 1982）； Judith Miller，“U.S.Bars Cluster Shells for Israel Indefinitely，” *New York Times* ， July 28， 1982，以及 “U.S.Removes Ban on Bombs to Israel，” *Washington Post* ， December 7，1988。

[83] Cloud，“Inquiry Opened into Israeli Use of U.S.Bombs”； Human Rights Watch，“Israeli Cluster Munitions Hit Civilians in Lebanon，” 2006年7月24日的新闻稿； Greg Myre，“Israel Orders Investigation of Bomb Use in Lebanon，”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1， 2006； Meron Rappaport，“IDF Commander： We Fired More Than a Million Cluster Bombs in Lebanon，” *Ha'aretz* ， September 12， 2006；“Shooting Without a Target，” *Ha'aretz*editorial， September 14， 2006，以及Michael Slackman，“Israeli Bomblets Plague Lebanon，” *New York Times* ， October 6， 2006。

[84] 引自Meron Rappaport，“What Lies Beneath，” *Ha'aretz* ， September 8， 2006。

[85] 引自“U.N.Official Denounces Israel Cluster Bomb Use，” *MSNBC.com* ， August 30， 2006。

[86] 引自Rappaport，“IDF Commander”。

[87] “U.N.Official Denounces Israel Cluster Bomb Use.”

[88] Associated Press，“UN Envoy： Israel Broke Int'l Law in War，” *Jerusalem Post* ， April 13， 2007.也可参见 Thomas Nash，*Foreseeable Harm*： *The Use and Impact of Cluster Munitions in Lebanon*， *2006*（London：

Landmine Action， October 2006）。

[89] 有关这一主题的主要作品是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 4th ed.（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90] Amnesty International，“Israel/Lebanon： Out of All Proportion，” pp.26， 28， 45.

[91] Human Rights Watch，“Fatal Strikes： Israel's Indiscriminate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in Lebanon，” hrw.org， vol.18， no.3（August 2006）： 3.

[92] Ibid.也可参见Peter Bouckaert，“For Israel， Innocent Civilians Are Fair Gam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August 3， 2006； Peter Bouckaert，“White Flags， Not a Legitimate Target，” *Guardian* ， July 31， 2006，以及Kenneth Roth，“Fog of War Is No Cover for Causing Civilian Deaths，” *Forward* ， August 4， 2006。

[93] 所引用的拉蒙的话来自Mark Levine，“Qana Rules，” *CommonDreams.org* ， July 31， 2006，以及Amnesty International，“Israel/Lebanon： Out of All Proportion，” p.21。也可参见 Gideon Levy，“Days of Darkness，” *Ha'aretz* ， July 30， 2006。

[94] Amnesty International，“Israel/Lebanon： Out of All Proportion，” pp.21—22， 28—30.

[95] Ibid.， p.64.

[96] Human Rights Watch，“Fatal Strikes，” p.5.

[97] 引自Shimon Golding，“New Yorkers Rally for Israel，” *Jewish Press* （online）， July 19， 2006.

[98] Steven Erlanger，“With Israeli Use of Force， Debate over Proportion，” *New York Times* ， July 19， 2006； Lt.Col.Reuven Erlich，“Hezbollah's Use of Lebanese Civilians as Human Shields，”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Center for Special Studies， Israel， November 2006.该项研究得到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外交部的支持。关于简要的批评，参见Kenneth Roth，“Violation of Rules of War in Israel's Lebanon Attacks，”给编辑的信， *Wall Street Journal* ， December 19， 2006。

[99] Amnesty International，“Israel/Lebanon： Out of All Proportion，” pp.63—64.

[100] Mitch Prothero，“The Hiding Among Civilians' Myth，” *Salon.com* ， July 28， 2006.

[101] Human Rights Watch，“Fatal Strikes，” p.3.

[102] Roth，“Violation of Rules of War.”

[103] Sarah Leah Whitson，“Armchair Sleuths，”给编辑的信， *Jerusalem Post* ， September 7， 2006。

[104] Human Rights Watch，“Fatal Strikes，” p.3.也可参见Amnesty International，“Israel/Lebanon： Out of All Proportion，” pp.59—64， 该文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105] 《致命打击》（Fatal Strikes）报告（p.3， 5）指出，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人员没有发现以色列国防军锁定的24个地区中，任何一个地区周围存在军事活动的证据。不过，在进一步的研究之后，却在其中一个地区证明有军事活动的证据。2007年5月30日人权观察组织给两位作者的私人通信。

[106] 引自Amnesty International，“Israel/Lebanon： Out of All Proportion，” p.26。

[107] Nathan Guttman，“American Jews Mobilize for Israel，” *Jerusalem Post* ， July 16， 2006.也可参见Jacob Berkman，“Emergency Drive Tops $ 320 Million； Shifts Toward Rebuilding Israel's North，” *JTA.org* ， October 10， 2006； Laurie Goodstein，“As Mideast Churns， U.S.Jews and Arabs Alike Swing into Action，” *New York Times* ， July 28， 2006； Avi Krawitz，“Israel Bonds Raises $ 1.2 Billion in 2006，” *Jerusalem Post* ， December 10， 2006； Ori Nir，“Bush Urged to Give Israel More Time for Attacks，” *Forward* ， July 21， 2006，以及Shmuel Rosner，“Despite Criticism， War Raises Genuine Concern for Israel to the Fore，” *Ha'aretz* ， August 20， 2006。

[108] Ari Berman，“AIPAC's Hold，” *Nation* ， July 29， 2006； Silverman，“Politicking over Israel.”

[109] 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弗·范霍伦致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信，2006年7月30日，登录www.buzzflash.com/articles/releases/6。

[110] 施穆尔·罗斯纳在8月9日报道说：“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弗·范霍伦激怒了一些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因为他致函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敦促她在黎巴嫩‘呼吁立即停火’。最早在今天他将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代表会面，会面中他将听到这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举措。”参见“Rosner's Mid-Term Diary： On the Mid-Terms， the Mideast， the Jewish Voters and Israel，” *Ha'aretz* ， August 10， 2006。

[111] 引自Eric Fingerhut，“Van Hollen Issues Clarification； Some Critics Still Question Commitment to

Israel，” *Washington Jewish Week* （online）， August 16， 2006。也可参见Eric Fingerhut，“Van Hollen ‘Advice’ Draws Critics，” *Washington Jewish Week* （online）， August 10， 2006，以及Eric Fingerhut，“At Odds，” *Washington Jewish Week* （online）， August 30， 2006。

[112] 所引用的两段话均来自Fingerhut，“Van Hollen Issues Clarification”。

[113] 引自Elise Labott，“U.S.Worried Israeli Operations Could Weaken Lebanese Government，” *CNN.com* ，July 14， 2006。也可参见Peter Baker，“U.S.Urges Restraint by Israel，” *Washington Post* ， July 14， 2006； Fattah and Erlanger，“Israel Blockades Lebanon”，以及Wright，“Strikes Are Called Part of Broad Strategy”。

[114] 即巴勒斯坦过渡政府总理马哈茂德·阿巴斯。——译者注

[115] 引自“Bush Criticized over Concern for Lebanese Regime，” *Forward* ， July 14， 2006。

[116] “Coverage of War in the Middle East”的副本，根据美国有线新闻广播网的可靠消息来源，2006年8月6日。

[117] 11世纪至14世纪之间，由英国东部到法国，犹太人被诬告“杀婴魔”，说他们将外族的婴儿杀害后，喝他们的血，并将肉做成犹太人的无酵面球（Matzoh Ball，犹太人逾越节食物），欧洲社会史上称之为“血诬案”（Blood Libel）。——译者注

[118] 关于唐尼和科奇之间的通信，参见Kathryn J.Lopez，“Ed Koch and Len Downie，” in “The Corner，” *National Review Online* ， August 17， 2006，以及Alex Safian，“Updated： Post's Thomas Ricks Charges Israel Intentionally Leaving Hezbollah Rockets Intact，”登录www.camera.org/index.asp？x_context＝2&x_outlet＝38&x_article＝1174。

[119] 引自Leora Folk，“Washington Post Editor Rebukes His Reporter for Television Comments on Israel，” *New York Sun* ， August 18， 2006。

[120] Alan Dershowitz，“What Is ‘Human Rights Watch’ Watching？” *Jerusalem Post* ， August 25， 2006. 也可参见Alan Dershowitz，“Amnesty International Redefines ‘War Crimes’，” *Jerusalem Post* ， August 31，2006。对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组织的攻击在战争的余波中还在继续。参见Gerald Steinberg，“Scrutinize Amnesty International，” *New York Sun* ， May 23， 2007，以及Marc Stern，“The Media Was Misled by Amnesty's Legal Advocacy，” *Forward* ， March 30， 2007。

[121] Ken Silverstein，“AIPAC Points to Legion of Doom in Bekaa Valley，” *Harper's* （online）， August 10， 2006；“Israel Taking Significant Steps to Prevent Casualties as Hizballah Hides Behind Civilians，” AIPAC memo， August 1， 2006，以及“Israel's Defensive Actions in Lebanon and Gaza，” AIPAC FAQ， July 24，2006。

[122] Gerald M.Steinberg，“Ken Roth's Blood Libel，” *Jerusalem Post* ， August 27， 2006；“Roth's Supersessionism，” *New York Sun*editorial， July 31， 2006，以及Abraham Foxman，“No Accident，” *New York Sun* ， August 2， 2006。也可参见Avi Bell，“Getting It Straight，” *New York Sun* ， July 25， 2006；Joshua Muravchik，“Human Rights Watch vs.Human Rights，” *Weekly Standard*， September 11， 2006；Rabbi Aryeh Spero，“Why Liberals Refuse to Admit the Reality of Islamic Fascism，” *Human Events* （online），August 16， 2006；“Roth's False God，” *New York Sun*editorial， August 8， 2006，以及 “Sharansky Speaks，” *New York Sun*editorial， September 12， 2006。

[123] Rosa Brooks，“Criticize Israel？ You're an Anti-Semite！” *Los Angeles Times* ， September 1， 2006.关于抹黑人权观察组织的精彩的讨论，参见Aryeh Neier，“The Attack on Human Rights Watc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November 2， 2006， pp.41—44；以及Philip Weiss，“Israel Lobby Watch，” *Nation* ， September 18， 2006。也可参见 Kathleen Peratis，“Diversionary Strike on a Rights Group，” *Washington Post* ， August 30， 2006，以及Ian Seiderman， “Right of Reply： Biased Against Israel？” *Jerusalem Post* ， September 11，2006。

[124] 引自Nathan Guttman and Yaakov Katz，“Israel Condemned for Cluster Bomb Use，”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7， 2006。

[125] Nathan Guttman，“US Senate Rejects Bid to Curb Use of Cluster Bombs，”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8， 2006.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挫败这一立法中所起作用的叙述，以人权观察组织的信息为基础。2006年9月13日、9月14日，2007年5月30日，人权观察组织与两位作者的私人通信。

[126] 引自John Walsh，“AIPAC Congratulates Itself on the Slaughter in Lebanon，” *CounterPunch.org* ，August 16， 2006。

[127] 引自“To Israel with Love.”

[128] William Kristol，“It's Our War： Bush Should Go to Jerusalem—and the U.S.Should Confront Iran，” *Weekly Standard* ， July 24， 2006.也可参见 Jim Lobe，“Energized Neocons Say Israel's Fight Is

Washington's，” *Antiwar.com* ，July 18， 2006； Krauthammer，“Israel's Lost Moment”，以及Charles Krauthammer，“Lebanon： The Only Exit Strategy，” *Washington Post* ，July 19， 2006。

[129] 引自Tovah Lazaroff，“‘Evangelicals the World Over Are Praying Fervently for Israel’，” *Jerusalem Post* ，August 9， 2006。也可参见George Conger，“US Support for Israel Soars After Hizbullah War，” *Jerusalem Post* ，August 27， 2006。

[130] “To Israel with Love.”

[131] 引自Daphna Berman，“U.S.Jewish， Christian Groups Back Lebanon Operation，” *Ha'aretz* ，July 14， 2006。也可参见Zev Chafets，“I Want Falwell in My Foxhole，” *Los Angeles Times* ，July 23， 2006。

[132] 引自Flaherty，“House Overwhelmingly Backs Israel”。这种论点也反映在“To Israel with Love”之中。

[133] 除特别加以指出外，本部分中所有的调查数据均来自“Israel， the Palestinians”， *PollingReport.com* 。

[134] “Zogby Poll： U.S.Should Be Neutral in Lebanon War，” 佐格比国际民意调查公司新闻稿，2006年8月17日。

[135] Uri Avnery，“America's Rottweiler，” *Gush-Shalom.org* ，August 26， 2006.也可参见 Yossi Ben-Ari，“America's Honey Trap，” *Ynetnews.com* ，July 24， 2006； Lawrence F.Kaplan，“America's Proxy War： Other Means，” *New Republic* ，July 31， 2006，以及Shmuel Rosner，“America's Deadly Messenger，” *Ha'aretz* ，July 19， 2006.

[136] Ali Waked，“Nasrallah： U.S.Pressured Israel into War，” *Ynetnews.com* ，May 7， 2007。

[137] 引自Hersh，“Watching Lebanon”。也可参见Cobban，“The 33-Day War”。

[138] Ori Nir，“Jerusalem Urges Bush： Next Target Hezbollah，” *Forward* ，April 11， 2003.也可参见Daniel Sobelman and Nathan Guttman，“PM Urges U.S.to Keep Heat on Syria， Calls As-sad ‘Dangerous，’” *Ha'aretz* ，April 15， 2003。

[139] 引自Hersh，“Watching Lebanon”。

[140] 引自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Norton， 2001）， p.316。

结论 该做什么呢？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认为战略上和道德上的考虑，既不能够解释当前美国对以色列现有程度的支持，也不能够为这种支持所达到的程度提供正当的理由。它们也不能够对那种实质上差不多是无条件的支持进行解释，或者对美国以打算保卫以色列的方式来指导其外交政策的意愿进行解释。我们认为，对这种反常情况的主要解释，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就像其他的特殊利益集团一样，组成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个人和组织从事大量合法的政治活动，以图推动美国外交政策朝亲以色列的方向发展。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某些组成部分也利用更加具有异议的战术，如企图让任何挑战以色列游说集团作用或批评以色列行动的人保持缄默，或对他们进行诋毁。虽然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能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在实现其基本的目标方面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了描述，认为其影响力无意间对美国和以色列都是有害的。华盛顿对以色列不假思索的支持，在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激起了反美主义的怒火，也损害了美国在许多其他国家的形象。以色列游说集团使得美国领导人更难以对以色列施压，因此使得以巴之间的冲突拖长。这种情形给予伊斯兰激进分子一种招募成员的强有力的工具，有利于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发展。对以色列的核计划和违犯人权问题视而不见，使得美国在这些方面批评其他国家的时候显得虚伪，破坏了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鼓励政治改革的努力。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对导致美国陷入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使得美国对付叙利亚和伊朗的目标难以实现。它还鼓励美国支持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的拙劣构想，这一攻击行动加强了黎巴嫩真主党的地位，使得叙利亚同伊朗走得更近，进一步玷污了美国的全球形象。对于上述的每一种发展——其中任何一种发展都不利于美国，虽然说以色列游说集团不需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却要承担相当的责任。结果是难以逃脱的：如果以色列游说集团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虽然美国在中东的那些问题并不会消失，但美国领导人将发现更容易探究选择替代性的方法，更可能采取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对以色列也无益处，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里。美国给以色列的援助，间接地对以色列拖而不决、耗费高昂的对被占领土的殖民化努力进行了补贴，而且以色列游说集团使得华盛顿

顿说服以色列放弃这种适得其反的政策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以色列游说集团说服华盛顿支持这种扩张主义议程的能力，也阻碍了耶路撒冷把握住将拯救以色列人生命、分化以色列的敌人，以及使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规模受到压制的机会，例如同叙利亚签订和平条约或立即全面执行奥斯陆和平协议。使以色列具有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合法愿望的能力，没有使得以色列更加安全。长期的杀戮、监禁，或者使一代巴勒斯坦领导人边缘化的活动，已经使得像哈马斯这样的团体掌权，并且减少了欢迎通过和谈来解决问题和使之生效的巴勒斯坦领导人的人数。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双双都支持的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结果证明是给伊朗的一大恩赐，而伊朗是许多以色列人最担心的一个国家。以色列游说集团通过向美国官员施压，要求他们支持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可结果却是该游说集团中的团体——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合会、反诽谤联盟，以及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对他们认为正在保护的这个国家，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行动都直接对以色列造成损害。

那么要做什么事情呢？如果要逆转最近的美国政策所造成的损害，就明显需要一项新的战略。但是发展并实施一种不同的方法，则意味着要找到对付以色列游说集团权力的新方法。绘制新的路线图因此将要求：

- 认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 勾勒出保护这些利益的战略
- 同以色列发展出一种新的关系
- 通过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来结束以巴冲突
- 将以色列游说集团改造成一支建设性的力量

让我们来逐一考虑这些步骤。

美国的利益是什么？

美国外交政策最主要的目标是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与繁荣。在追求那一目标的时候，美国曾总是把西半球的安全看作极为重要的。在最近几十年里，决策者也已经将世界的其他三个地区，看作包含了美国人足以为之战死的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即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1]这些地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那里或者存在权力中心，或者

存在关键的自然资源，因而谁控制这些地区对全球均势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美国在中东拥有三种不言而喻的战略利益。由于该地区含有高比例的全球能源供应，因此美国最重要的利益就是保持能够获取位于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一目标不要求美国本身来控制该地区；它只需要确保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处于一种阻止中东的石油流入世界市场的地位。为做到这一点，美国曾长期寻求防止任何本地势力在波斯湾建立霸权，制止外来势力建立对该地区的控制。

美国在中东第二重要的战略利益是阻止中东国家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像在第二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里的风险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蓄意核攻击、核勒索，或者对恐怖分子蓄意的“核转手”（nuclear handoff）的可能性，因为考虑到美国自己的核威慑力，这样的威胁并不可信。相反，美国之所以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该地区的扩散，是因为那将使得向该地区投放力量更加困难，因此可能使美国保持中东石油流通的努力复杂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也增加了核武器偶发性使用或未经授权使用的危险。考虑到该地区某些国家存在不稳定的可能性，这也增加了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政变或叛乱发生时，落入不当之人手中，或者被恐怖分子从防卫不严的设施中盗取的风险。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该地区的扩散，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目标。

第三，美国在减少反美的恐怖主义方面有着明显的利益。这一目标要求瓦解威胁美国的现有恐怖主义网络，防止新的恐怖团体出现。这两个目标都是通过与该地区的国家进行广泛有效的合作而得以推进的，基本的合作方式是情报共享和其他的法律执行行动。美国也迫切需要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来防止像基地组织这样的团体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起来的恐怖分子，将比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更难以威慑，而且他们有可能对美国或其盟国使用这些武器。虽然美国应该对迅速的民主改造谨慎从事，并且当然不应该试图在暴力威胁下扩展民主，但是鼓励政治改革和更大范围的民主参与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而这反过来又要求同主要的地区大国维持良好的关系。

虽然我们相信美国应该支持以色列的生存，但是以色列的安全对美国来说，最终并不具有战略上的至关重要性。[2]倘若以色列被征服——考虑到以色列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及其强大的核威慑，这种情况是极不可能发生的，那么美国的领土完整、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的经济繁荣，以及美国的核心政治价值不会受到威胁。相反，如果从波斯湾的石油出口大量减少，对美国的福祉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美国之所以支持以色列的生存，不是因为这样做使美国人更加安全，而是因为美国人承认犹太人长期的苦难史，相信犹太人民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合乎情理的。就像我们曾反复指出的那样，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有着强烈的道德理由，而且我们相信，如果以色列的生存受到威胁，我们就应该继续致力于帮助以色列。但是美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在道德上是恰当的，而不是因为这对他们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一项不同的战略："离岸平衡手"的理由

自"9·11"事件以来，美国追求的是在中东进行地区改造的政策。在追求这一明显野心勃勃的战略时，布什政府将大量的美国军队留在该地区，而这是冷战期间美国从未有过的情形。这一误导性的政策给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火上浇油，并导致在伊拉克的持续崩溃。这一政策也对美国在全世界的声誉——包括与其欧洲盟国和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

如果美国放弃地区改造而采取离岸平衡手的战略，那么就将最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这一战略在规模上虽然并不那么雄心勃勃，但是在保护美国的中东利益方面却要有效得多。在这一战略中，只有当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而且只有当本地的行为体自己不能应对这些威胁的时候，美国才会将它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地面部队——部署到海外。[3]在这种方法指导下，华盛顿将保持在外交上的接触，依靠空中和海上力量来表明它继续对该地区的承诺，提供对出乎意料的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它也将沿着最初快速反应部队的路线维持强大的干预能力，而这些快速反应部队的单位则是超远程驻扎，或者在美国驻扎。

离岸平衡手是美国传统的大战略，而且也是在冷战大部分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不打算派兵驻守该地区，而且也从未根据民主路线来对该地区进行改造。相反，美国通过支持各种当地的盟国和发展出在当地均势遭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直接干预的能力，来寻求该地区的均势。美国在过去建立快速反应部队来威慑或击败苏联夺取石油丰富的波斯湾，因而华盛顿在20世纪80年代向伊拉克倾斜，以遏制革命的伊朗。但是当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征服威胁到均势朝有利于萨达姆的方向倾斜时，美国就召集了一个多国联盟，派遣一支大军来粉碎萨达姆的军事机器，并解放科威特。

离岸平衡手作为一项正确的战略至少有三方面原因。第一，该战略明显减少了——但不是完全消除了——美国卷入像伊拉克那样血腥而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机会。这一战略不仅绝对拒绝使用军事力量来重

塑中东，而且也承认美国不需要控制这一至关重要的地区；该战略只需要确保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做而已。为了这一目标，该战略要求慎用美国的资源，并主要依靠本地的盟国来遏制它们的危险邻国。作为离岸平衡者，美国只是作为最后的被求助者而进行干预。而当美国进行干预的时候，它应该尽快地完成任务后重新回到离岸者的位置。

第二，离岸平衡手将改善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20世纪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民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本地身份，依旧是极端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外国占领产生的常常是激烈的抵抗。[4]除非需要，通过将美国军事力量超远距离驻扎，离岸平衡手使得美国军队永久驻扎在阿拉伯土地上所产生的敌意被减少到最低程度。这种敌意经常出现在恐怖主义甚或针对美国的大规模叛乱之中。

第三，不同于地区改造，离岸平衡手使得像伊朗和叙利亚这样的国家，更少有理由担心美国的攻击，因而也使得它们更少有理由去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的干预进行威慑的需要是伊朗寻求核能力的一个理由，而说服德黑兰改弦更张，则要求华盛顿讨论伊朗合法的安全关注和克制自己不发出公开的威胁。虽然美国承担不起完全与中东脱钩的代价，但是离岸平衡手的战略却将使得美国的卷入对该地区的国家造成更小的威胁，甚至可能鼓励我们当前的某些敌人来寻求我们的帮助。离岸平衡手将促进一项分离和征服的战略，而不是将潜在的敌人一股脑地搅和到“邪恶轴心”之中，并鼓励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只要没有一个敌对的国家或联盟能够威胁像波斯湾这样至关重要的地区，美国的利益就能够得到满足，因而这一基本方法具有很好的战略理由。

事实上，离岸平衡手的战略，将使得美国目前几乎所有的地区政策逆转过来。美国将尽快撤离，集中精力遏制其鲁莽的入侵决定所产生的地区性后果，而不是继续将伊拉克改造成一个多种族、多教派的民主国家的毫无结果的努力；美国将推动以色列放弃戈兰高地来换取一项和平条约，而不是试图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这不仅会将叙利亚带进那些已经正式接受以色列生存的阿拉伯国家的行列，而且还将孤立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与伊朗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削弱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的能力。这也将鼓励大马士革帮助美国对付基地组织和其他的恐怖团体。

最后，美国将试图在伊朗的核野心上达成一项交易，使得伊朗的强硬派领导人处于守势，而不是以先发制人的战争来威胁伊朗——这是一种为伊朗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渴望火上加油，并使得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能够用民族主义来转移民众不满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将不会消除美国在该地区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比起以色列游说

集团中的大多数团体所支持的政策来说，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却会更有利。我们已经尝试过它们的方法了，而失败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种新的关系：将以色列当作正常国家看待

但是以色列怎么样呢？离岸平衡手怎样谈到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呢，尤其是因为它对美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样的战略价值这一点？

这个犹太国家的历史几乎已经60年了，而且现在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承认并接受了它的生存。以色列的经济发展迅速，大多数以色列人日益富足，尽管其政治制度目前似乎因国内分裂而瘫痪，因腐败而遭遇麻烦，因不断的丑闻而摇摇欲坠。美国是时候不将以色列当作特例而是当作正常国家了，而且与它打交道要完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一样。换言之，美国应该支持以色列的继续生存，就像支持法国、泰国或者墨西哥的生存一样，而且如果以色列的生存一旦受到威胁，美国就应该准备干预。

将以色列当作正常国家看待，就意味着不再假装以色列和美国的利益是等同的，或者无论以色列做什么事情，好像都值得美国坚决支持似的。当以色列的行为是美国认为想要的时候，以色列就应该得到美国的支持；当并非如此的时候，以色列就应该预期到面临美国的反对，就像其他国家要面临的一样。这也意味着美国应该逐渐切断目前提供给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色列现在是一个先进的经济体，而一旦它同邻国达成完全的和平、同巴勒斯坦人达成最终决议的时候，以色列将更是一个这样的经济体。

当然，美国将继续同以色列进行贸易，而且美国和以色列的投资者无疑将继续相互在对方的国家为企业融资。文化交流、教育交流和科学交流将依然如故，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同许多其他国家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之间特殊的个人和家庭联系将依然密切。美国武器生产商将依旧能够向以色列销售武器，就像他们卖给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但是必须遵守相关的美国法律，而且华盛顿和耶路撒冷无疑将分享它们的情报信息，保持其他双向有利的安全合作形式。但是美国纳税人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要继续给以色列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援助款项，特别是在许多国家有着更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虽然美国可能必须提供一些额外的支持，以说服以色列保证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能够生存的国家，但是将以色列当作正常国家看待，却应该最终导致美国援助的减少。

结束以巴冲突

首先，美国应该利用它相当的影响力来结束以巴冲突。就像两党组成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在2006年12月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对所有战线——黎巴嫩、叙利亚，以及2002年6月布什总统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承诺的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上的全面阿以和平有新的持续承诺……美国不支持其盟国以色列回避直接参与解决阿以冲突问题。"[5]

虽然美国领导人曾参与这一和平进程的几乎所有方面的活动，但是他们却几乎从未使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影响力来推进这一进程。在重申其对以色列1967年边界之内的安全承诺时，美国应该清楚地表明，自己竭力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定居点政策——包括以色列夺取的"安全墙"土地，而且这一政策不符合美国或以色列的长期利益。

这一方法意味着放弃布什政府奄奄一息的路线图——该路线图强调会谈的时间表，代之以确定美国自己对于正义的和平所应该包括的内容的观点。具体来说，美国应该清楚地表明，为换取全面的和平，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6月占领的几乎所有领土上撤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将必须根据1948年被驱赶而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有回到自己土地上的权利来达成协议。允许全面行使这一"权利"将威胁到以色列的身份，并且显然不可实行。但是这一基本原则既是根本性的正义问题，又是巴勒斯坦人除了在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外将不会进行任何妥协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以色列必须承认回归的"权利"——即实际上承认以色列的建立涉及违反巴勒斯坦人权利的问题，而巴勒斯坦人必须同意永久放弃这一权利，以换取适当程度的补偿。美国和欧盟组织并资助一个慷慨的重建援助计划来补偿巴勒斯坦人，这将结束他们回归到从今往后实际上都是以色列的领土上的一切主张。

以色列据说有时候不能够作出这样的让步，因为它小而脆弱，而且如果它保证巴勒斯坦人有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国家的话，情形就将更是如此。但是这种耳熟能详的观点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自从以色列的早期岁月以来——我们不应忘记，当时它几乎没有得到美国的帮助，却仍然在设法打败各种敌人——战略形势已经发生多么大的改观。比起以色列在1967年6月刚刚占领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时候，以色列现在要远远安全得多。以色列当年的国防支出不到埃及、伊拉克、约旦和叙利亚合在一起的国防支出的一半；而今天，以色列已经同埃及和约旦签署了和平条约，被美国占领的伊拉克几乎或者根本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则多于伊朗和叙利亚的总和。以色列的敌人过去常常从苏联得到大量的军事援助；今天，那个超级大国已经消失了，而以色列同美国的联系则加强了。以色列在1967年不拥有可使用的核武器；而今天，它则拥有或许200件核武

器。简而言之，在1967年的边界内，以色列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全过；而正是它继续在被占领土——以及戈兰高地——上的存在，给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安全问题，主要是以恐怖暴力的形式出现。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者通过向华盛顿施压，继续对占领进行资助，这对以色列并不利。

有些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认为，实际情况与此相反。以色列今天的安全形势比1967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危险。具体而言，他们认为，像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伊斯兰团体，依然致力于毁灭以色列，并得到叙利亚和伊朗的强烈支持，因此形成潜在的致命威胁。对这一派的观点存在两种明白无误的回应。第一，这种观点夸大了恐怖主义对以色列所构成的威胁——恐怖主义显然是一个问题，但却并非关乎存亡的威胁；而就像在第二章和第十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种观点也夸大了伊朗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代表的威胁。第二，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结束占领也将有助于分裂和缓解厄运预言者现在所认为的联合起来针对以色列的力量联盟。叙利亚曾清楚地表明，如果重新获得了戈兰高地，它就将同以色列达成和平；而一旦它拿回了自己的土地，它已承诺切断向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提供支持。结束占领和帮助创建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将夺走伊朗在本地区的同情者，有助于将哈马斯或伊斯兰杰哈德这样的团体，从国家事业捍卫者变成进步和繁荣的过时障碍。

美国有充分的正当理由来向以色列施压进行这一交易：只要美国资助以色列，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威胁到自己的安全，那么它就有权说愿意支持什么或反对什么。2000年2月设定的克林顿参数，表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为新的会谈提供了最佳的底线；而布什总统及其继任者应该清楚地表明，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如果最终地位协议能够达成，那么美国和欧盟就应该愿意慷慨地资助新的安排，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对付双方的那些拒绝派。

结束以巴冲突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作出贡献。尽管以色列有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地理位置优势，但是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却因其在本地区内的被遗弃地位而受到削弱。只要巴勒斯坦人还被拒绝拥有一个国家，无论何时美国试图召集一个“志愿者联盟”，以色列的孤立地位都将使之不能够参与其中。如果冲突得到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发展出正常的关系——就像目前阿拉伯联盟所想象的和平建议那样，那么美国就将不用为支持以色列而付出外交代价，而当严重的地区威胁出现时，以色列则将可以加入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国的行列中来。简而言之，如果冲突得到解决，以色列就可能变成其支持者经常所宣称的一种战略资产。

如果以色列依然不愿意向巴勒斯坦人保证一个他们可以生存的国家，或者如果以色列试图单方面将不公正的解决方案强加于人，那么美国就应该缩减对它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美国之所以应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容忍以色列的任何恶意，而是因为它承认占领对美国不利，并且与美国的政治价值相左。如果坚持离岸平衡手的战略，那么美国就将根据自己的利益而非盲目地忠于一个不合作的伙伴而行动。事实上，美国应该给予以色列选择：或者结束它那事与愿违的对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并继续作为美国的密切盟国，或者继续做自己的殖民国。

这一步骤不像听起来那么激进：美国只是以应对过去其他殖民的民主国家同样的方式来应对以色列。例如，美国在冷战初期曾推动英国和法国放弃了它们的殖民帝国，迫使它们（以及以色列）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从埃及的领土上撤离。美国也曾对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像日本、德国和韩国这样的密切盟国——采取强硬立场。就像在第七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公众舆论的民意调查证实，如果为了取得正义持久的和平而有必要对以色列持强硬立场的话，那么美国人民将支持一位这样的总统。

毫无疑问，这一政策对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大多数——尽管或许不是全部——组成部分来说，都是令其觉得极其讨厌的事情，并且也有可能激怒一些其他的美国人。进而言之，考虑到巴勒斯坦人社会内部的暴力分歧，以色列现任领导人的软弱地位，布什政府在该地区数不清的记录，以及以色列内部支持两个国家解决方案遭到销蚀，目前的情形几乎谈不上是有希望的。即使某些通过谈判达成两个国家解决方案最坚定的支持者，现在也哀叹道：“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双边进行谈判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达成最终协议的想法，现在已经寿终正寝了。”[6]

但是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替代性的方案是什么？以色列的强硬捍卫者必须提供什么样的相反的未来视野呢？

考虑到目前的情形，对于上面描述的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存在着三种可能的替代性解决方案。第一，以色列可以从其1967年之前的土地上和被占领土上驱逐巴勒斯坦人，从而通过公开的种族清洗行动来保持其犹太特性。虽然一些以色列强硬派，包括现在的副总理阿维格多·利伯曼，曾鼓吹过这种方法的不同版本，但是这样将会是反人类罪行的做法，以色列的真正朋友不会支持如此十恶不赦的一套行动。如果这就是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反对者所鼓吹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应该明白无误地这样说。然而，这种形式的种族清洗将不会结束冲突；它只会增强巴勒斯坦人进行复仇的欲望，加强那些依然拒绝以色列生

存权的极端分子的力量。

第二，受托管的巴勒斯坦将成为一个由两个民族构成的民主国家，他们在其中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不是相邻分离的犹太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这一解决方案由一小部分犹太人和人数不断增加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提出。[7]然而，对这一选择的实际障碍却是令人畏惧的，而且一个由两个民族构成的国家，也没有令人鼓舞的记录可循。这一选择也意味着放弃一个犹太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想象。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以色列的犹太公民将自动地接受这一解决方案，而且人们也有把握认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个人和团体对这种结果几乎不会有什么兴趣。我们两位作者也不相信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最后一个选择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即以色列继续增加其对被占领土的控制，但是允许巴勒斯坦人在一群领土上互不连接、经济上严重受损的独立小国中进行有限的自治。[8]虽然以色列人常常对将此比作南非的白人统治作出愤怒的反应，但是，如果他们在否认整个这片土地上很快将有超过犹太人口的阿拉伯人的完整政治权利时，却试图控制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的话，那么这就将是他们所面临的未来。不管怎样，种族隔离的选择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长期解决办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巴勒斯坦人将继续抵抗到他们得到自己的国家的那一天。这种情形将迫使以色列对镇压政策进行升级，而这一政策已经使它付出了重大的生命财产代价，鼓励了政治腐败行为，严重地损坏了其全球形象。[9]

这些可能性是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不二选择，而且那些希望以色列好的人没有谁会对其中的任何一种选择怀有热情。考虑到这种冲突给以色列、美国，尤其是巴勒斯坦人造成的伤害，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一悲剧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换言之，解决这种长期痛苦的冲突不应该被看作今后某个时刻的必要选择，或者被看作美国总统为自己的遗产添辉生彩和得到诺贝尔奖的好方法。相反，结束这种冲突应该被看作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目标。但是，只要以色列游说集团使这件事情——使美国领导人利用其自行处理的影响力来对以色列施压，迫使其结束占领和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对中东和平作出过最大贡献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乔治·H.W.布什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每一位都曾愿意绘制不同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线路。就像以色列前外交部长施罗姆·本-阿米曾经写道的那样：“卡特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作为政治家中少见的一员，特别是白宫那些主人中少见的一员，他对犹太人的声音和游

说集团并不特别敏感和关心……就像结果所证明的那样，正是此类总统——20世纪80年代末的乔治·（H.W.）布什是另外一个这样的适当例子——准备与以色列进行正面冲突，不顾及以色列在美国的朋友们的感受，这些人设法最终在通往阿以和平的路上产生有意义的突破”[10]。本-阿米是正确的，而且他的重要见解再次强调了以色列游说集团所作出的努力是如何不知不觉地破坏了以色列自己的利益。

为使以色列接受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的建立——这实际上是意味着接受克林顿参数之内的解决方案，美国就必须对以色列施以重压。巴拉克政府在2001年1月接受了克林顿参数，尽管带有重要的保留，但是广泛支持这一解决方案的主要因素在目前则是缺乏的。虽然以色列多数人（2007年是55%）原则上支持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但是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支持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12月所描述的和平解决方案主要内容的以色列人则要少得多。具体而言，即便以色列被允许保留其大型的定居点，也只有41%的以色列人支持在95%的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只有37%的以色列人将支持把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社区转交给巴勒斯坦人，只有22%的以色列人赞成在数年后将约旦河谷的控制转交给一个巴勒斯坦国。最后，27%的以色列人支持将圣殿山的控制——条件是以色列保留对西墙的控制——交给巴勒斯坦人，而且只有17%的以色列人支持允许有限的难民人数回到以色列。[11]事实上，对于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在以色列存在广泛的反对意见，这意味着任何希望解决这一冲突的未来的美国总统，都将必须严厉地要求以色列改变其对如何达成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的思维。

当然，对于和平决议来说，障碍不只是以色列的不妥协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而且结束冲突还要求美国（以及其他方）也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施压。如果巴勒斯坦人和主要的阿拉伯国家认为美国真心诚意地致力于公正的和平，愿意充当诚实的调解人，而不是作为“以色列的律师”在行动，那么做到这一点将要容易得多。对结束冲突真心诚意的努力——而不是像布什政府对路线图半心半意的承诺或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对中东地区毫无意义的访问，将迫使巴勒斯坦人进行真正的选择。就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说，巴勒斯坦人几乎没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像哈马斯这样的团体，因为有意义的会谈的可能性希望渺茫，而且支持最激进的团体对妨碍那些错失的机会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代价。但是，如果美国严厉施压以帮助他们获得一个能够生存的国家，哈马斯就会呈现为妨碍那一目标实现的一个主要障碍，那时候，巴勒斯坦人将更可能反对哈马斯并抓住橄榄枝。

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们需要承认，拒绝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政治权

利没有使以色列更加安全，而那些尽最大努力游说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人，最终却滋养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极端主义，并出人意料地使他们设法支持的那个国家处境艰难。是该放弃这一破产政策并追求一种不同路线的时候了。

在此勾勒的这些政策并非万灵药，它们也不会消除目前美国在中东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达成以巴之间的最终和平，将要求所有各方参与到同以巴双方那些拒绝派的艰难且有可能是暴力性的对抗之中。以巴和平不是解决所有地区问题的特效药：以巴和平本身既不会消除该地区的反犹主义，也不会导致阿拉伯精英用新的活力和献身精神来应对那些折磨他们社会的其他问题。但是结束这一冲突和接受一种同以色列的更正常的关系，将有助于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重建自己的形象，使美国处于一种这样的位置——即它能够更令人信服地鼓励该地区其他地方迫切需要的各种改革。

有人可能认为，美国目前在中东面临的问题是扭曲变形的，主要是因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一个小集团——新保守派——的影响力所致。一旦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结束，新保守派就将丧失权力；有人可能希望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复归于明智，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处境将很快得到改善。

唉，这种充满希望的前景太过于乐观了。虽然许多著名的新保守派不再在政府中任职，但是他们在目前的政策辩论中依然活跃。他们中有的人是2008年总统候选人的顾问，在主流媒体中依然到处是他们的身影。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新保守派似乎因他们的政策所造成的大破坏而改正自己，而对他们的误导性建议所造成的人员损失表达悔意的，则更是少之又少。支持他们的思想库在华盛顿圈内依然活跃和有影响力，并在下一次选举之后将继续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许多主要组织依然致力于同样的政策议程：坚决支持以巴勒斯坦人为代价的以色列扩张主义，或为了根本改变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目的，或为了推翻某个国家政权的目的，而同以色列的敌人进行对抗，以及在更长的时期里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存在。就像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曾建议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重大的改变，而当然更没有像我们在此所勾勒的战略之类的东西。因此，任何相信2008年选举将导致明显不同的中东政策的人，可能会感到失望。这种情形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做什么事情能够破解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个桎梏呢？

对付以色列游说集团

理论上，存在着削弱以色列游说集团负面影响力的四种方法。第一，人们可以通过减少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资源或消除其某些影响力的途径来削弱它。第二，由于其他团体可能试图在民选官员方面和决策过程上抗衡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因此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移动。第三，学者和媒体能够对抗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各种观点，以便纠正那些经久不衰的神话，并暴露以色列游说集团那些政策偏好的弱点。最后，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可能朝正面的方向演进，它可以保留目前的影响力，但是却提倡一组不同的政策。

削弱以色列游说集团？

如果以色列游说集团不再享有慷慨的财政支持，或者如果其指挥竞选资金捐赠和向媒体组织施压的能力下降，它就不会这么具有影响力。然而，这两种情况的发展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不可能顷刻之间丧失财富和慷慨的支持者。虽然无条件地致力于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人数在下降，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有充分数量的美国人足够强烈地感到要拿大笔的钱来支持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著名组织。禁止此类捐赠是不可能的，或许是非法的。而且，试图限制对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将明显是反犹主义的做法，因为所有美国人向任何合法事业捐赠是他们固有的权利。

减少以色列游说集团（以及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明显的一种办法是竞选资金改革。所有选举资金资助的公开将严重削弱以色列游说集团与当选官员之间的联系，并使得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当选的官员向以色列施压——或者只是撤回美国的支持——变得更加容易。由于政治家将依然取悦犹太人和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选民，而且以色列游说集团内的团体和个人依然能够向美国官员反映他们的事情，用力塑造公众舆论，因此这样一种举措不能够消除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然而，竞选资金改革将几乎肯定削弱它的影响力，并将在国会的权力走廊内鼓励更多的公开协商。

不幸的是，有意义的竞选资金改革前景却是黯淡的。在位议员在目前的制度中有着太大的利益，而且许多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将加入进来，一道对任何修改这一目前给予他们太大影响力的制度的努力进行抵抗。如果要说服美国人相信从选举过程中清除掉私人钱款的必要，那可能将要有一堆杰克·艾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式的丑闻[12]发生。就短期而言，试图直接削弱以色列游说集团是不管用的。

抗衡以色列游说集团？

建立“抗衡以色列游说集团”（counterlobby）来平衡以色列游说集团，也将可能是失败的。就像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那样，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团体比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组织要弱小得多，而自吹自擂的石油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施加的影响力，则要比人们普遍所相信的小得多。其他的平衡性组织——如无党派色彩的国家利益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和为了理解中东的美国人组织（Americans for Middle East Understanding）——在规模上和财力上，也要比以色列游说集团差得太大、太多。

但是即便这些各种各样的团体更大、更富有，它们也将依然发现，要克服利益集团政治核心的集体行动动力的障碍是困难的。就像在早先所指出的那样，亲以色列团体之所以成功，部分是因为其成员将支持以色列置于特别优先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这些团体总是涉及单一议题的政治——只支持那些建立了亲以色列的良好信用记录的候选人。即便许多美国人意识到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这也不是他们最优先的议题，而且在那些怀疑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人以及那些强烈反对这种做法的人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结果，试图通过将这些不同团体拉进一个有凝聚力的联盟来平衡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并不是一种有希望的战略。我们也将怀着强烈的疑虑来看待形成一个明显“反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因为此类团体能够很容易地促使真正的反犹主义死灰复燃。

促进更加公开的对话

第三种选择——比前两种选择要更有希望得多——是鼓励就这些问题进行更公开的辩论，目的是要纠正有关中东的现有神话，迫使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在面对消息灵通的反对方时，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具体而言，美国人需要明白以色列建国的真正历史，以及以色列随后行为的真相。美国人需要吸收和思考以色列“新历史学家们”的发现，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列昂·尤里斯所提供的阿以冲突的版本；这些“新历史学家们”学识上的勇敢，非常必要地阐明了需要这样一场运动，即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本地的阿拉伯人口中间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虽然这两种情形几乎毫无相同之处，但是如果不明白基督教反犹主义的长期历史，人们就不能够理解犹太复国主义；如果不清楚环绕1948年战争——以色列人将这场战争称之为独立战争，而巴勒斯坦人则将它称之为灾难（al-Nakba），或“大灾难”（the Catastrophe）[13]——的那些事件，人们就不能够彻底理解当代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

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犯下的罪行，只是模模

糊糊地知道一点，因此他们将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抵抗看作非理性的复仇行为，或者是对犹太人毫无根据的仇恨——这种仇恨类似于老欧洲那种地方性的反犹主义——的证据。无视过去的历史，也鼓励美国人将巴勒斯坦人的补偿要求——特别是回归故土权利的补偿——当作完全非正当的要求而加以拒绝。虽然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指望依靠恐怖主义而悲叹不已，而且也很清楚他们对这场久拖不决的冲突所起到的作用，但是我们相信，他们的冤情是的的确确的，而且必须加以讨论，即便他们的某些梦寐以求的目标——如不受限制地回归故土的权利——必将落空，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加以解决，就像上面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也相信，如果对于过去的事件和目前的情况有更精确的了解，那么大多数美国人将会支持一种不同的解决冲突之道。

作为民主社会中独立思考的基本来源，应该鼓励学者和新闻记者抵制以色列游说集团对塑造公众话语所作的努力，鼓励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更公开的讨论。目标不是要把以色列单挑出来进行批评，或者挑战这个犹太国家的合法性，而是要帮助美国人对过去的行为如何给目前投下巨大阴影这一画面有更精确的认识。虽然依旧会有——而且应该有——许多声音为以色列进行辩护，但是如果美国公民接触到有关以色列的各种观点，那将更有利于美国。而公民接触到各种观点是世界上大多数的民主国家——其中包括以色列——的共有特点。

新闻记者在政治竞选活动期间特别有责任提出严厉的问题。就像在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的主要总统候选人都是这样开始其2008年的竞选活动的：表达个人对以色列的坚定承诺，以及清楚表明他们无条件地支持这个犹太国家和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敌人采取对抗措施。当政治家们发表自己惯常的亲以色列的陈词滥调的时候，他们不应该轻轻松松地过关。记者和评论家应该坚持，那些渴望登上总统大位的人应该解释他们为什么如此强烈地支持以色列，问问他们是否支持一个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并在当选后极力推动之。应该要求候选人考虑一下，附带更多条件的美国政策——例如，其中一个条件是将美国的军事援助同和平取得真正进展挂钩——是否可能更有利于美国以及以色列。而且公平的游戏应该是要求那些冀望这块土地上最高职位的人们回答，他们的观点是否曾受到来自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或者个人捐赠的影响，正如人们会问到来自石油公司、工会或药品商的捐赠影响其观点这样的问题一样。

为促进更加公开的讨论，所有各种背景的美国人都必须拒绝使他人保持沉默的战术伎俩，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某些团体和个人还在继续使用这种伎俩。压制辩论和诋毁对手与民主赖以为基础的有活力的公开对话原则格格不入，而且继续依靠这种不民主的战术伎俩，冒

着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产生敌意反弹的后果。

我们谴责所有使合法的讨论和辩论归于沉默的企图，包括偶尔使亲以色列的声音归于沉默的企图，并且我们希望，本书将有助于在这些困难问题上进行更公开的观点交流。美国和以色列都面临应对许多中东问题的令人烦恼的挑战，而且这两个国家都不能够因为使那些支持一种新方法的人保持沉默而获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批评者总是对的，但是他们的建议至少值得像那些近年来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团体所支持的失败政策一样加以考虑。

一个新的以色列游说集团？

说服以色列游说集团内的那些团体支持一项不同的议程，也将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这种发展可以包括加强业已存在的更温和的力量——如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和“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或者通过建立支持不同政策的亲以色列新团体。通过从现在控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或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那些强硬派手中夺走他们的权力，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都将得到推进。这些努力也可以通过机构改革——让草根阶层在决定这些政策立场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得到加强。

当然，这一幕的发生要求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都认识到，他们许多人近年来所支持的那些政策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他们也必须逐渐明白，固守这些立场将给以色列一个甚至更加阴暗的未来。犹太人社会中那些发出更加明智声音的人，将必须抛弃对以色列进行公开批评的禁忌，挑战那些对以色列乃至对海外犹太人有害的以色列政策。我们同意哈佛大学希勒尔名誉主任本-蔡恩·戈尔德（Rabbi Ben-Zion Gold）的观点，他在2002年写道：“美国犹太人是最大的海外犹太人社会，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关注焦点……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批评以色列这样做，是因为以色列是我们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批评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把主动批评以色列看作对以色列人民表达我们的尊敬和爱。”[14]或者就像《经济学人》最近所观察到的那样：“帮助以色列不应再意味着不加批评地为它进行辩护……海外犹太人的机构应该……对批评以色列政治家宣讲种族主义和不宽容的观点感到自如随意……（而且）鼓励对有关以色列的政策进行活跃的辩论。”[15]

的确，目前的中东情势给以色列游说集团中更强硬的那些成员造成了严重的两难困境。他们现在不是在保卫一个四面为敌人所包围的弱小国家，而是被迫保卫一个强大、现代、繁荣的国家——这个国家在粗暴对付像黎巴嫩这样的麻烦邻居的同时，正使用自己的优势力量

从巴勒斯坦人那里没收土地和拒绝他们完整的政治权利。当这种行为激起明智的温和派批评的时候，这些团体被迫企图诋毁和边缘化那些明显既非极端分子，也非反犹分子的人。虽然谴责那些新纳粹分子或否认大屠杀的人是值得去做的事情，但是诋毁像吉米·卡特、理查德·科恩、托尼·库什纳，或托尼·朱特这样受人尊敬的个人，或者攻击像忧心忡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这样的进步团体，则是完全不同且令人不快的事情。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强硬分子越是攻击任何所有的批评者，他们就越是表露出自己同美国所广泛承诺的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格格不入。而一旦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都被等同于反犹主义，那么指控本身的威胁也就毫无意义了。

考虑到有关末日时刻（end-time）的预言在时代主义神学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考虑到他们明显愿意看到中东在一场高度毁灭性的“预示灾祸的”战争中被吞没，要说服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放弃他们对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承诺的可能性更小。在福音派基督徒长期不断追求新成员的议程变化趋势中，在这些运动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大量波动的总趋势中，人们可以发现希望。特别是考虑到布什的中东政策已经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下一任美国总统不可能会像乔治·W.布什一样对这些团体持同情态度。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也可能意识到，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当他们考虑到他们预计在末日时刻中所扮演的那个没有吸引力的角色的时候，他们开始同福音派基督徒的拥抱拉开距离。[16]就基督教福音派教徒而言，应该鼓励他们思考以色列继续给巴勒斯坦人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考虑他们自己对“大以色列”的承诺是否与基督的爱和兄弟的启示相一致。

虽然给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议程进行重新定位可能显得牵强，但是这些组织中有一些在过去支持不同的政策，而且没有理由假定他们目前的偏好是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对主要犹太人组织支持的主张的不满正在增加，并且存在进行培育更好地反映主流犹太人观点声音的新努力。像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布里特·泽德克和舍拉姆（犹太人正义和平联盟）、“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这样的团体，已经变得更加为人所知和更加有效了。据报道，他们正考虑合并以提高他们的影响力，并鼓励美国对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作出更大的努力。许多著名的美国犹太人也已经考虑成立一个新的游说团体，该团体明确打算提供一种比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更加合理的选择。[17]

类似的运动也在其他国家发生。2007年2月，一群英国的犹太人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独立犹太人之声（Independent Jewish Voices， IJV），该组织赞成人权法的普遍适用性，赞成以色列人和

巴勒斯坦人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独立犹太人之声谴责反犹主义，谴责反阿拉伯主义，谴责仇视伊斯兰，并且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即这些声称有权代表全体犹太人社会的机构，没有反映出这个国家犹太人当中的广泛意见”。独立犹太人之声的成立宣言也强调：“反对反犹主义的战斗是生死攸关的，而每当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被自动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时，这场战斗就遭到了削弱。”[18]

在澳大利亚，那些批评以色列政策、发现难有机会说出自己观点的犹太人，已经成立了一个名为独立的澳大利亚犹太人之声（Independent Australian Jewish Voices）的组织。2006年11月，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行动，德国的25名和平研究人员要求质疑德国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数月之后的2007年3月，当一小群犹太人发表《5767年[19]再见的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 Shalom 5767）时，德国犹太人社会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议，因为按照《前沿》周报的说法，该宣言批评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政策，批评“对有关中东事务进行公开辩论的限制”。[20]像这样的倡议提醒我们，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团体所支持的政策主张，并不代表所有——甚至不代表大多数——海外犹太人的观点，而且他们使人们有理由抱有这样的希望，即以色列游说集团内的许多团体，可能最终使他们的影响力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产生结果。

最后总结

以色列的建立以及随后的发展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如果美国犹太人不曾为了以色列而组织起来，不曾说服那些重要的政治家支持他们的目标，那么以色列可能决不会成立。然而，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从来不曾是相同的，而且以色列目前的政策同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某些美国的核心价值相左。不幸的是，近年来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和在公共关系上的敏锐力，已经使得美国领导人没有勇气追求那些将推进美国利益、防止以色列犯下最严重错误的政策。简而言之，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害的。

然而，在美国目前的境况中还存有一线希望。因为这些失败政策的代价现在是如此明显，因此我们有反思和更新的机会。虽然以色列游说集团依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是它的反作用力却日益难以忽视。虽然像美国这样富有、强大的国家能够维持一时的错误政策，但是现实却不能够永远被忽视。

因此，需要做的就是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进行坦诚而文明的讨论，对美国在这一至关重要地区的利益进行更公开的辩论。虽然以色列的福祉位列那些利益之中——出于道德理由，以色列继续在被

占领土上的存在则不是。公开辩论和更广泛的媒体报道将揭示那些问题——那些因目前的“特殊关系”而造成的问题，鼓励美国追求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更加符合该地区其他国家利益，以及我们坚决相信也更加符合以色列利益的政策。

---

[1] 关于这一点，参见Robert J.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45—46。

[2] 考虑到美国人简单地假定以色列的安全对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倾向，这一声明似乎令人吃惊。例如在2000年，虽然一个自我标榜的著名外交政策专家委员会报告说，维持以色列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对美国的利益 “至关重要”，但是该委员会却从未解释为什么如此，或者以色列的命运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安全或福祉。更理智地说，罗伯特·阿尔特断言：“以色列对美国几乎没有战略价值，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美国的战略负担。尽管如此，美国同以色列的联系却很深，美国同另外一个民主国家具有血缘关系，而且对其生存的道德承诺是明确的。”参见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Cambridge， MA：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0）； and Art，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p.137。

[3] 离岸平衡要素的详细说明参见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 ， no.1（Summer 1997）；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chap.7，以及Stephen M.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Primacy* （New York： Norton， 2005）， pp.222—223， 235—236。

[4] 关于这一点，参见Robert A.Pape， *Dying to Win* ：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New York：Random House， 2005）。

[5] James A.Baker III and Lee H.Hamilton， co-chairs， *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 （Washington， DC：U.S.Institute of Peace， 2006）， p.39.

[6] 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 “The Road from Mecc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May 10， 2007， p.43.阿加和马利还写道：“对于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来说，也不存在许多的意识形态激情。虽然以色列人接受这一点、并且大多数人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激情或热情已经消失。”（p.44）

[7] 例如，可参见Ali Abunimah， *One Country* ： *A Bold Proposal to E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Impass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Josef Asevar， “Mideast Solution： A Confederation，” *Jewish Journal* （online）， November 3， 2003； Meron Benvenisti， “What Kind of Binational State？” *Ha'aretz* ， November 20， 2003； Richard Boudreaux， “Arabs Say Israel Is Not Just for Jews，” *Los Angeles Times* ， February 22， 2007； Tony Judt， “Israel： The Alternativ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October 23， 2003； Isabel Kershner， “Noted Arab Citizens Call on Israel to Shed Jewish Identity，”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8， 2007，以及Yaakov Lappin， “Academic： Israeli-Arabs Want End of Jewish State，” *Ynetnews.com* ， January 22， 2007。

[8] 一份2007年5月的世界银行报告，对以色列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在被占领土上的检查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些障碍“已经将领土分割为不能再小和更加不连贯的条条块块”，“如果因经济目的而仍然无法进入大面积的西岸地区，并且如果对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流亡的巴勒斯坦投资者来说限制迁移依然是准则的话，那么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将依然无法实现”。参见World Bank Technical Team， “Movement and Access Restrictions in the West Bank： Uncertainty and Inefficiency in the Palestinian Economy，” May 9， 2007， pp.1—2， 登录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WESTBANKGAZA/Resources/WestBankrestrictions9Mayfinal.pdf。

[9] 2007年，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台（BBC World Service）对27个国家的2.8万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以色列在所列举的12个国家中形象最差，56%的回应者报告说，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负面的”，只有17%的人说它的影响力是“正面的”。伊朗的形象是第二差的，54%的人认为其影响力是负面的，18%的人则认为其影响力是正面的。参见Bradley Burston， “The BBC Poll： Israel as Satan's Bastard Child，” *Ha'aretz* ， March 6， 2007； “Israel， Iran Top ‘Negative List，’” *BBC News* （online）， March 6， 2007。关于由占领所导致的腐败影响，参见Dror Wahrman， “Is Israel Falling Apart？” *History News Network* ， March 5， 2007，登录www.hnn.us/articles/35958.html。

[10] Shlomo Ben-Ami， *Scars of War* ， *Wounds of Peace* ： *The Israeli-Arab Trage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67.

[11] Yehuda Ben Meir and Dafna Shaked， “The People Speak： Israeli Public Opin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2005—2007，” Memorandum no.90（Tel Aviv：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May 2007）， pp.65—67.

[12] 杰克·艾布拉莫夫号称美国的“游说教父”，2006年1月因游说印第安族部落开办赌场而获得数千万美元暴利，结果东窗事发而伏法认罪。——译者注

[13] 参见本书导论部分中的注释28和29中的参考文献。

[14] 拉比戈尔德还引述前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对美国犹太人的警告说："我们没有奢侈到承担得起公开的分歧或公开的批评，因为这正好给了我们的敌人以可乘之机。"戈尔德对此（沙米尔的警告）回应道："我不明白一个有着活跃政治反对派的民主国家的总理，会如何企图让国外犹太人的批评保持缄默……美国犹太人批评的危险在何处？是它的批评有害，还是那些受到批评的政策和行动有害？"Rabbi Ben-Zion Gold，"The Diaspora and the Intifada： The Responsibility of American Jews，" *Boston Review* ， October/November 2002.

[15] "Diaspora Blues，" *Economist*editorial， January 13， 2007， pp.14—15.也可参见"Second Thoughts About the Promised Land，" ibid.， pp.53—56。

[16]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改革犹太教联盟主席拉比埃里克·约菲最新的专栏文章，"When We Let John Hagee Speak for Us，" *Forward* ， May 18， 2007.

[17] Nathan Guttmann，"Dovish Groups Mull Mega-Merger in Bid to Build Peace Powerhouse，" *Forward* ，May 30， 2007； Amiram Barkat，"New Pro-Israel Lobby as Alternative to AIPAC，" *Ha'aretz* ， November 12， 2006； Bernd Debusmann，"Soros Adds Voice to Debate over Israel Lobby，" *Washington Post* ， April 15， 2007； Guy Dinmore，"Jewish Lobby for Peace with Palestinians Gathers Pace in US，"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4， 2006； Gary Kamiya，"Can American Jews Unplug the Israel Lobby？" *Salon.com* ， March 20，2007； Gregory Levey，"The Other Israel Lobby，" *Salon.com* ， December 19， 2006，以及Gidon D.Remba，"Wanted： A Moderate Pro-Israel Lobby，" *Ha'aretz* ， November 17， 2006。

[18] 截至2007年4月，独立犹太人之声的宣言已获得超过400个签名。关于宣言和宣言签署者的名单，登录独立犹太人之声的网站，www.ijv.org.uk。也可参见Martin Hodgson，"British Jews Break Away from 'Pro-Israeli' Board of Deputies，" *Independent* ， February 5， 2007，以及Ned Temko，"Furor over Jewish Critics' Challenge to State of Israel，" *Observer* ， February 4， 2007。

[19] 犹太历5767年即公元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译者注

[20] Ben Weinthal，"German Jews Feud over Criticizing Israel，" *Forward* ， March 9， 2007.也可参见Jason Frenkel，"Dissidents Set for Australia-Wide Media Campaign，" *Australian Jewish News* （online），March 1， 2007； Antony Loewenstein， *My Israel Question* （Carlton， Austral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7），以及"Why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ermany and Israel Has to Be Reconsidered，" Manifesto of 25 German Peace Researchers， November 15， 2006，登录www.tlaxcala.es/pp.asp？lg＝en & reference＝1569。

译者后记

从形式上说，翻译犹如“青灯古寺”般的平静恐怕是不为过的。在翻译本书的时候，与外表的平静相伴的是内心的激荡——激荡因书中所描绘的美国国内幻化的政治图景和中东地区诡谲的风云而起，激荡因刚刚学步的女儿——她现在已经满屋子跑了——不时来到身旁抓住爸爸敲打键盘的手而发出“咿咿呀呀”的稚嫩声而起。

本书翻译的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我以前的学生、现远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进一步深造的吴迪同学，是她帮助完成了本书注解部分的翻译工作——尽管本书译者随后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校译。此外，也要感谢出版社负责本书的编辑张玲雅老师和任俊萍老师所提供的无私帮助。当然，更要感谢家人所给予的支持和谅解。

2009年**8**月**28**日于同济园

东方编译所译丛·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
斯蒂芬·M.沃尔特　著
王传兴　译　98.00 元

长和平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
冷战史考察　　潘亚玲　译　68.00 元

国际制度　　[美]莉萨·马丁　等编
黄仁伟　等译　110.00 元

联盟的起源　　[美]斯蒂芬·沃尔特　著
周丕启　译　68.00 元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十版)　　[美]小约瑟夫·奈
[加拿大]戴维·韦尔奇　著
张小明　译　78.00 元

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　　[美]彼得·卡赞斯坦　等编
秦亚青　等译　98.00 元

国际关系精要(第七版)　　[美]卡伦·明斯特
伊万·阿雷奎恩-托夫特　著
潘忠岐　译　78.00 元

无政府状态之后　　[美]伊恩·赫德　著
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性与权力　　毛瑞鹏　译　52.00 元

我们建构的世界　　[美]尼古拉斯·格林伍德·奥努夫　著
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　　孙吉胜　译　62.00 元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加拿大]诺林·里普斯曼
[美]杰弗里·托利弗
[美]斯蒂芬·洛贝尔　著
刘　丰　张　晨　译　42.00 元

告别霸权!　　[美]西蒙·赖克
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理查德·内德·勒博　著
陈　锴　译　38.00 元

国际实践　　[加拿大]伊曼纽尔·阿德勒
文森特·波略特　主编
秦亚青　等译　65.00 元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美]罗伯特·杰维斯　著
秦亚青　译　75.00 元

无政府社会　　[英]赫德利·布尔　著
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　　张小明　译　45.00 元

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
王义桅　等译　68.00 元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美]亚历山大·温特　著
秦亚青　译　75.00 元

战争的原因 权力与冲突的根源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 著 何 曜 译 65.00 元
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	[美]凯文·纳里泽尼 著 白云真 傅 强 译 48.00 元
国家为何而战 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	[美]理查德·内德·勒博 著 陈定定 等译 52.00 元
货币与强制 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	[美]乔纳森·科什纳 著 李 巍 译 55.00 元
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	[美]戴维·莱克 著 高婉妮 译 38.00 元
超越范式 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	[美]鲁德拉·希尔 彼得·卡赞斯坦 著 秦亚青 季 玲 译 37.00 元
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美]斯科特·巴雷特 著 黄智虎 译 36.00 元
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	[美]肯尼思·华尔兹 著 信 强 译 32.00 元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美]玛莎·芬尼莫尔 著 袁正清 译 25.00 元
国家与市场(第二版)	[美]苏珊·斯特兰奇 著 杨宇光 等译 38.00 元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年	[美]邹 谠 著 王 宁 周先进 译 59.00 元
霸权之后(增订版)	[美]罗伯特·基欧汉 著 苏长和 译 55.00 元
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	[美]彼得·J.卡赞斯坦 主编 秦亚青 等译 42.00 元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杨宇光 等译 52.00 元
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美]海伦·米尔纳 著 曲 博 译 48.00 元
民主国家的承诺:立法部门与国际合作	[美]莉萨·L.马丁 著 刘宏松 译 30.00 元
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美]肯尼思·J.奥耶 编 田 野 辛 平 译 32.00 元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	[美]本杰明·J.科恩 著 杨 毅 钟飞腾 译 30.00 元
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	[英]巴里·布赞 等著 潘忠岐 等译 58.00 元
干涉的目的	[美]玛莎·芬尼莫尔 著 袁正清 等译 38.00 元
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 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美]许田波 著 徐 进 译 68.00 元

驯服美国权力	[美]斯蒂芬·M.沃尔特 著 郭 盛 等译	28.00 元
国际政治理论	[美]肯尼思·华尔兹 著 信 强 译	58.00 元
系统效应	[美]罗伯特·杰维斯 著 李少军 等译	40.00 元
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	[英]克里斯托弗·希尔 著 唐小松 等译	36.00 元
世界事务中的治理	[美]奥兰·扬 著 陈玉刚 等译	36.00 元
大棋局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著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译	36.00 元
美国和诸大国	[英]巴里·布赞 著 刘永涛 译	25.00 元
全球政治经济学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杨宇光 等译	36.00 元
帝国的悲哀	[美]查默斯·约翰逊 著 任 晓 等译	24.00 元
美国的致命弱点	[美]理查德·福肯瑞斯 等著 许 嘉 等译	22.00 元
美国和美国的敌人	[美]伊多·奥伦 著 唐小松 等译	20.00 元
建构安全共同体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 著 王正毅 等译	25.00 元
美国时代的终结	[美]查尔斯·库普乾 著 潘忠岐 译	28.00 元
欧洲的未来	[美]戴维·卡莱欧 著 冯绍雷 等译	28.00 元
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	[美]罗伯特·吉尔平 著 杨宇光 等译	22.00 元
国家的性格	[美]安吉洛·M.科迪维拉 著 张智仁 译	20.80 元
世纪之旅	[美]罗伯特·A.帕斯特 编 胡利平 等译	22.00 元
预防性防御	[美]艾什顿·卡特 著 胡利平 等译	14.00 元

The Israel Lobby and U.S.Foreign Policy

by John J.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Walt

Copyright©2007 by John J.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Wal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2019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